

杭大人出版社

杭大轶事

第五集



杭州大学回忆丛书之一：【杭大轶事】第五集

杭州大学回忆丛书之一：【杭大轶事】第五集

杭大轶事

（第五集）

温时幸 主编

杭大人出版社

2023

杭州大学回忆丛书之一：【杭大轶事】第五集

图书编目数据

杭大轶事（第五集）/温时幸编。——美国西雅图：杭大人出版社，2023.10

（杭州大学回忆丛书 1）

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1-970152-42-5

I. 杭大轶事 II. 温时幸 III. 杭州大学回忆丛书 IV. 杭州大学——回忆录

杭大轶事

（第五集）

温时幸 主编

封面设计：吴延风

封面题词：任 平

封三题诗：施建基

封底印章：任 平

出版发行：杭大人出版社（Hangdaren Press）

地 址：2303 N 147th Street Unit B, Shoreline, WA 98133

网 址：<http://www.white-clouds.com/hdrp/>

电子信箱：shixingwen@yahoo.com

出版日期：2023 年 10 月 12 日

本书网址：<http://www.white-clouds.com/hdrp/hdys5.pdf>

开 本：小 16K

字 数：31 万 8 千余字

定 价：免费阅读

国际书号：ISBN 978-1-970152-42-5

【杭大轶事】

第五集编委会

（按姓氏笔画排列）

毛宝钺（杭州大学中文系 84 级）

伊建新（杭州大学中文系 80 级）

郑良根（杭州大学中文系 77 级）

温时幸（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

杭州大学回忆丛书之一：【杭大轶事】第五集

《杭州大学回忆丛书》序

张美凤和史晋川向我推荐由杭大人出版社计划出版的《杭州大学回忆丛书》，目前已经出版的有《杭大轶事》和《杭大诗词》。细细阅读了这两部新作，我被文中的内容吸引住了，感动了，也说几句。

首先，我被同学们对母校杭州大学的深情怀念打动了。作者编者大多是 1977 年恢复高考以后那几年的大学生。大约四十年了，同学们对当年的青春生活记忆犹新，朴实无华，真情流露，感人肺腑，逾久弥香。实际上，那个时候各方面还在恢复和发展当中，教学条件和生活条件还比较艰苦。同学们在回忆文章和诗词里，记录了那个时候的求学经历；在相对简单的生活里，体现了勤奋、乐观、胸怀大志，和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这些精神，不只是一个大学生要有的，也是人生必须有的。

其次，同学们的诗文回忆，也反映了历史的痕迹。很多同学都经历过那个特殊时代的严峻考验：高等教育遭受破坏，同学们面临青春荒芜的危险。高中阶段的同学，失去高考机会，当兵当工人，上山下乡当农民；年龄稍小一点的，可能在中学甚至小学阶段就实际上失去了读书学习的机会。幸好等来了重启高考，恢复了大学教育。你们被时代耽误过，而最后还是成了时代的幸运儿。有这些复杂和艰苦的经历，你们人生目标特别明确，有强烈的求知欲望和独立思考的能力，被教授们称为“空前绝后”的一代优秀学子。大多数成为改革开放新时代最倚重的人才，成为浙江省乃至全国各界发展的中坚力量。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我注意到，《杭大轶事》也梳理了杭州大学的源流，对于“求是育英”这个校训的来源和意义都有诠释。这些，对于人们了解杭州大学曾经有过的历史渊源、发展轨迹、和办学成果等，都是有意义的。杭州大学在 1958 年成立挂牌，通过浙江师范学院承继了求是育英的百年滋养，至 1998 年四校合并，经历了整整四十年，在新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书写了光辉的一页。

《杭大诗词》给了我一个惊喜。没想到同学们不只是学业界的优秀人才，也很有才情和诗意，也是诗人词人。正如一句“时髦”的话说的，人生不止要学习和工作，还要有诗和远方。读同学们的诗，我也觉得很有意思，尤其咏西溪，咏校园，每每把我也带回到自己过去的青春岁月。

我自己也是一辈子的杭大人。我从1952年华东师范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在杭州大学工作。经历了从浙师院到杭大的全过程，经历了杭大在文化大革命十年间的停顿，经历了高考恢复以后杭大重新焕发青春的岁月，直至1992年离任，也是整整四十年。同学们说，“火红的青春年代”跟母校杭大紧紧联系在一起；我的青春，也是跟杭州大学连在一起的。

如今，我虽然已至耄耋之年，同学们对杭大的缅怀，对杭大的歌咏，我读来是那么熟悉，那么亲切。

因此，乐为之序。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reading '薛艳庄'.

原杭州大学校长
2019年1月15日

《杭大轶事》 第一版（集） 前言

才忆校园书声朗，不觉两鬓竞成霜。我们逝去的青春呢？

路上车马今胜昔，花前楼馆似而非。我们杭州大学的校门呢？

自 1958 年杭州大学正式挂牌，我们的母校像杭州西湖一样，一直是一颗全国闪亮的明珠。它文脉久远，历经曲折。到 1978 年，忽如一夜春风来，一年内两届特别的新生到来，杭大开始焕发第二春。先是省内唯一的重点大学，继而跻身全国 211 名校，一直名列省级大学的前茅。

我们杭大人曾经是幸运的，自豪的。我们等来了邓公力挽狂澜，为我们重新打开大学校门。从此，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人生发生重大转变，开启一个崭新的阶段。进入杭大也成为我们人生的一大荣耀。

然而，时至 1998 年 9 月，因高校合并，杭州大学被摘了牌子，变成西溪校区。从此，我们的杭州大学和我们的青春一样，只留在回忆里。我们杭大人何等遗憾！有人说，假如地处杭州的这所综合型大学发展至今，那将是何等格局！我们知道，历史没有假如。我们也无意去评说这场高校合并的是非功过。我们只是回顾我们的青春。

承百年渊源，杭州大学经历了四十年。我们这些杭大人，较早的从 1978 年入校算起，至今也是四十年。四十年啊！人生有几个四十年！历史一瞬间，人生已大半，而且是最重要的那一半！每当我们想起自己逝去的青春，就想起我们已经消失的母校。因为，母校就是我们的青春。

四十年过去，杭大人数以万计。如今，很多人已经是学界名人，商界大款，政界精英，或者桃李满天下的默默园丁，还有社会各界难以计数的名流名媛。或不倦深耕于家乡本土，或游刃有余于全国各地，或开枝散叶于五洲四海。不论身在何处，无分贫富贵贱，母校杭州大学，永远是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

“杭大人”微信群是这个共同的精神家园里一个非常活跃的花坛。这里，人气旺、地域广、阅历深、感受强、主题明、才艺多。地不分南北东西，人不分男女，不分先进后学，我们共同拥有曾经的杭大。这个纽带凝聚着杭大人一起缅怀青春岁月，抒发杭大人的情怀。

“杭大人”微信群成了最活跃的杭大校友联谊会。建群一年来，日日高楼，昼夜无歇，散文佳作，诗词歌赋，书法画作等等接踵而至，精彩纷呈，目不暇给。有感于此，“杭大人”微信群发起人温时幸、金友元等，秉建群之初心，提议编辑出版《杭州大学回忆丛书》，将各位学友的名篇佳作汇编成册，既是记录我们的青春，也是对母校杭州大学的缅怀；既便于校友相互学习交流，亦或可流传于世！

本册《杭大轶事》即为丛书之一，是“杭大人”微信群校友们抒情忆旧的散文佳作选编。入选的文章内容、篇幅不拘，有洋洋洒洒的长篇巨制，也有短短的三言两语。凡校友回忆杭大旧事，兼收并蓄。“轶事”虽非正史，却是校友们真实的经历，有感而发，真情流露，读来饶有趣味，也充满了历史的痕迹。

比如高考，是在那个青春荒芜、怀才不遇的痛苦之后转折的关口，自然是充满着惊喜、奋斗、角逐、继而有待的焦虑和入榜的喜悦；

比如入校和学习，因人生开启了新的阶段，既充满了新鲜，更多是奋发立志，和刻苦求索；

比如生活、同学和校园，则在字里行间浸润着对当年青春的赞美，温馨校园里美好的回忆和对同学间友谊的怀念，也偶尔透露了年少时期的某些谬误，记录着成长的足迹；

比如师长，除了尊敬、缅怀和感恩，也往往记录着自己学业和事业的发展轨迹。

最后一部分荟萃，综合涉及多个方面。尤其推重其中有关杭州大学校史和学术成就地位的几篇重头资料，相信有助于读者对于母校的来龙去脉有个更全面的了解，以期求是育英，精神永存！

谈笑间，四十年。这样的抒情忆旧就不只是停留于过去的岁月，而是基于这些鲜活的回忆，透露着人生几十年之后的回望和对过去的审视，亦或夹杂着理性的剖析。回忆就不仅仅是回忆，而是充满着对

杭州大学回忆丛书之一：【杭大轶事】第五集

人生青春美好的赞扬，对人生道路真谛的思考，因而也可能作为对未来人的警示，启迪和参考。如此，则幸甚。

《杭大轶事》编委会

郑良根执笔

2018年12月19日

《杭大轶事》第二集出版说明

《杭大轶事》第一版于2018年12月19日，即“杭大人”微信群成立一周年之际，正式出版。问世后，《杭大轶事》先后被多所美国名牌大学图书馆收藏，如：俄亥俄州立大学图书馆、密歇根大学图书馆、哈佛大学图书馆、耶鲁大学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印第安纳大学图书馆。此外，我还收到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的电子邮件：

“我在几天前推荐了这本书。然而，我们的图书收购馆员需要一段时间来弄清楚如何处理中文电子书捐赠，因为你们的这本电子书是我们想要收藏的第一本中文电子书。

我今天刚刚听说，他们将先在图书编目里添加链接，到时把这本电子书添加到开放存取（即，open access，免费阅读）电子书馆藏，以便今后在国会图书馆网上提供在线阅读服务。”

如今，读者可以通过美国国会图书馆下面这个链接，免费下载那本电子书：<https://www.loc.gov/item/2018372764/>

当初策划出版《杭大轶事》一书时，曾设想每年出一个增订版。那样的话，所有的回忆文章都会收录在最新的增订版中。后来在创办《杭大人》月刊时，也特地设立了“杭大轶事”栏目，为以后出版《杭大轶事》增订版提供素材。

然而，随着《杭大人》月刊收录的“杭大轶事”文章逐年增多，显而易见，按照原来的设想，《杭大轶事》一书会变得越来越厚，长达几万页，甚至几十万页！那么厚的书，除了历史学家，其他人恐怕都会望而却步。而我们出版《杭大轶事》电子书，主要的目的就是广为传播，让人们记得曾经有过一所辉煌的杭州大学。

为了便于阅读，我们决定修改原定计划。每年或每两年出版一集新的《杭大轶事》，视稿件情况而定。

自《杭大轶事》第一版问世以来，至今已有4年。是时候出版《杭大轶事》第二集了。

《杭大轶事》第二集的稿件，均选自《杭大人》月刊2019年的1月号至12月号，共12期。依照第一版，分8个章节：高考、入校、

杭州大学回忆丛书之一：【杭大轶事】第五集

学习、生活、师长、同学、校园、荟萃。第二集收录了 52 位校友的 92 篇回忆作品。

编辑对选自《杭大人》月刊的原稿进行了仔细的校订和修改。

在此出版之际，谨代表杭大人出版社，衷心地感谢《杭大人》月刊的各位编辑积极收集有关杭州大学的稿件！衷心地感谢各位杭大校友回忆有关杭大的亲身经历！

温时幸

2023 年 3 月 15 日

《杭大轶事》第三集出版说明

《杭大轶事》第三集的稿件，均选自《杭大人》月刊 2020 年的 1 月号至 12 月号，共 12 期。依照前 2 集，分 8 个章节：高考、入校、学习、生活、师长、同学、校园、荟萃。

第三集收录了 47 位校友的 57 篇回忆作品，共计 25 万 6 千余字。

编辑对选自《杭大人》月刊的原稿进行了仔细的校订和修改。

在此出版之际，谨代表杭大人出版社，衷心地感谢《杭大人》月刊的各位编辑积极收集有关杭州大学的稿件！衷心地感谢各位杭大校友回忆有关杭大的亲身经历！

温时幸

2023 年 6 月 1 日

《杭大轶事》第四集出版说明

《杭大轶事》第四集的稿件，均选自《杭大人》月刊 2021 年的 1 月号至 12 月号，共 12 期。依照前 3 集，分 8 个章节：高考、入校、学习、生活、师长、同学、校园、荟萃。

第四集收录了 63 位校友的 73 篇回忆作品，共计 28 万 3 千余字。

编辑对选自《杭大人》月刊的原稿进行了仔细的校订和修改。

在此出版之际，谨代表杭大人出版社，衷心地感谢《杭大人》月刊的各位编辑积极收集有关杭州大学的稿件！衷心地感谢各位杭大校友回忆有关杭大的亲身经历！

温时幸

2023 年 8 月 1 日

《杭大轶事》第五集出版说明

《杭大轶事》第五集的稿件，均选自《杭大人》月刊 2022 年的 1 月号至 12 月号，共 12 期。依照前 4 集，分 8 个章节：高考、入校、学习、生活、师长、同学、校园、荟萃。

第五集收录了 66 位校友的 85 篇回忆作品，共计 31 万 8 千余字。编辑对选自《杭大人》月刊的原稿进行了仔细的校订和修改。

在此出版之际，谨代表杭大人出版社，衷心地感谢《杭大人》月刊的各位编辑积极收集有关杭州大学的稿件！衷心地感谢各位杭大校友回忆有关杭大的亲身经历！

温时幸

2023 年 10 月 12 日

目录

作者	标题	页码
薛艳庄	《杭州大学回忆丛书》序	i
郑良根	《杭大轶事》第一版（集）前言	iii
温时幸	《杭大轶事》第二集出版说明	vi
温时幸	《杭大轶事》第三集出版说明	viii
温时幸	《杭大轶事》第四集出版说明	ix
温时幸	《杭大轶事》第五集出版说明	x

第一章：高考

陈文育	一九七七的光荣与梦想	3
吴磊	三进考场	5
王琳	爸爸，我考上大学了！	10
张玲燕	我要读书！	18
沈小杭	1977年，我被举报信夺去了上大学的权利	28
吴朝骞	两次高考 三次考试	31
任晓岗	改变命运的天书	37
应沪晨	十六岁的高考	42
郑广宣	两个梦想，两件“牛事”	47
沈卫东	招飞未成，我进了杭大中文系	57
吴存存	我的高考杂忆	61
赖文洪	我的生命奇迹	68
朱承君	我的高考前传	72
童国樑	从打工、支农到高考	79
田伟	走向高考	88
宋宏亮	我的高考录取通知书	95

第二章：入校

吴 磊	忆杭大报到日	99
倪建平	上大学前夕的感慨	103

第三章：学习

李剑亮	曾经聆听在杭大 听飞白讲俄国诗歌	111
李剑亮	曾经聆听在杭大 听草婴讲文学翻译	113
李剑亮	曾经聆听在杭大 听张毕来讲红楼梦	115
李剑亮	曾经聆听在杭大 听谢晋讲电影艺术	117
李剑亮	曾经聆听在杭大 听韩素音讲时事	119
李剑亮	曾经聆听在杭大 听吴逸亭讲古典音乐	121
李剑亮	曾经聆听在杭大 听李玉茹讲京剧艺术	123
李剑亮	曾经聆听在杭大 听乌丙安讲民俗文化	125
李剑亮	曾经聆听在杭大 听浦安迪讲“四大奇书”	128
李剑亮	曾经聆听在杭大 听唐耿良讲苏州评弹	130
陈东辉	西溪园里曾读书	132
黄仕忠	上大学时，你是怎么学的外语？	141

第四章：生活

屠一宝	四十一年前日记一则	149
陈文育	中文系的戏	150
黄仕忠	大学生活之体育篇	152

第五章：师长

金 锵	我眼里的沈善洪校长	161
王元骧	沈善洪校长印象	164
孙仁宗	与沈善洪在千岛湖交谈	168
陈新铤	沈善洪校长和杭州大学的国际交流	174
吴熊和	治学治校具慧眼识人明鉴，重德重才	178

陈村富	一位有胆识 有作为 有功业的校长	181
陈 坚	学者的风范精神的魅力	188
杨树标	我心中历史系的一些事	193
吴志刚	深切怀念敬爱的杨招棣老师	202
金友元	悔之勉之一回忆杨招棣先生	205
郭在贻	回顾我的读书生活	213
黄 征	郭在贻先生评传	219
杨芳菲	毛昭晰伯伯	228
吴工圣	投身为师十二年	229
孙春涛	师恩绵绵无尽期：纪念恩师戚文彬先生	234
黄朴民	人往低处走：宋显昌老师印象	238
郑广宣	三十年，师恩如山 ——怀念吴熊和教授	245
韩泉欣	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	251
李 丹	曲海史册留公名——缅怀徐朔方教授	259
黄朴民	东浦镇之行：徐和雍老师印象侧记	268
孔大元	忆系主任陈嗣虞先生二三事	273
罗卫东	良师余式厚	275
黄朴民	黎子耀教授学述	280
黄 征	蒋礼鸿先生的无徵不信	291
郑良根	师母的笑容	295
贺圣谟	林淡秋先生剪影	297
金普泰	纪念陈立先生——中国工业心理学的奠基人	308

第六章：同学

林珍珍	应娅舒：“杭大之声”	327
辛赛克	“背字典”的语言奇才	328

第七章：校园

辛赛克	图书馆轶事与我的杭大情结	338
陈恒武	我经历的一次化学系搬家	346
严芸芸	常忆西溪河下	350

第八章：荟萃

沈善洪	沈善洪校长自述	356
薛家柱	我在杭州大学	359
徐琦玲	我那 77 级的杭大四年	367
龚钰秋	尘封两往事，经历忘亦难	371
孙春涛	依稀往事杭大情	374
谌群芳	杭大，那时的我们	383
方 达	物非人非	393
方 达	杭大是时代潮流的引领者	397
费君清	我魂牵梦绕的精神家园	401
金军民	种下一粒求知的种子	408
任 平	说不完的回忆	414
岳耀勇	我和杭大的故事	418
王自亮	我和杭大之间的故事	423
余 刚	我和杭大的故事	431
杨金田	我在杭州大学读书的时光	434
李树茂	我的大学生活	446
钱志熙	大学之门	455
厉才茂	杭大哲学系求学杂忆	466
蒋 遂	怀任斋，父亲的会客厅	474
祝 毅	今天是你的生日，世上再无杭州大学	484

第一章：高考

一九七七的光荣与梦想

—杭州大学中文系77级 陈文育

我是七七年考上杭州大学中文系的。轰轰烈烈的春季考试；轰轰烈烈的四年求学；轰轰烈烈的年代；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感情锤炼过程，怎一个“读书”能够概括！

人们往往把一九七七年作为内地能够排除一切干扰，让人正式安心读书的分水岭。其实这是局外人的一种理论推测。七七级的成长，七七级的干练，他们的风华，以及他们目前在中国所扮演的各种角色，对那些当年的莘莘学子来说，能安心读书只是一个不特别重要的因素。与现在大学校园里的安静氛围相比较，只有用轰轰烈烈这个词才能触动那些年风华正茂者的书生意气，才能撩拨起他们封闭多年的敏感神经。

我不知道民国以后有没有过春季招生的先例。我知道现在没有了。考试要分初试、复试两个阶段。先在众多的考生中淘汰一批，闯关成功者才进入复试。考过试的人都知道，最难熬的莫过于考前的煎熬和考后的期盼了。两次的煎熬和期盼，对我们是重复的考验，也可折射出当时决策者和考生们一样的时不我待的心情。

其实，我当时还是懵懵懂懂的。记得我们家有两个人参加高考，我姐姐和我。她在初中高中都是学校的拔尖人物，而我却是个喜欢自行其是的调皮鬼，至少不是个三好生。可我偏偏考中了，她却落选了。当时我还笑她运气不济，全然不顾她的痛苦。她的一生确实命运多舛，辛苦备尝。不过她的儿子读书很好，现在美国读博，也算是圆了她的读书梦。

说来也巧，我高中的几百号同学中，就我们七、八个平时在一起玩的同学考中了不同的高校。他们都不是当时标准的好学生，自有一套不成熟的学习方法，脑后长点反骨，偶尔会故意跟老师对着干。这些同学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喜欢读课外书。凡能到手的书都读，囫圇吞枣、不求甚解。所以，他们的脑袋里都有一大堆有用无用的垃圾知

识。或许就是这些垃圾知识在高考中帮了他们的忙。这些同学的榜上有名，对好学生是个打击。我的器量小，对好学生的打击使我得意了好长一段时间。

很快要开学了。接下来是对故乡的惜别和对将来的憧憬。不过，当时我们还不知道憧憬什么。记得经过上海时，我们吃了好几家酒楼，喝生啤，胀肚子。真是“中榜放歌喜若狂，青春作伴辞故乡”。

实际上，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才把我们卷入范围广泛的争辩和思考之中。一时间信息如油星，热情似烈火。校园成了各种思潮和观点的海洋，学子们自然便是不知畏惧的弄潮儿。我们讨论最激烈的是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概念。列宁说帝国主义是腐朽的资本主义。但没有腐朽，是垂死的，却没有垂死的气息。而社会主义却普遍贫穷落后。讨论是激烈的，有时甚至是针锋相对的，广泛而深刻，触及习以为常的意识形态，触及人的灵魂。

实践大讨论基本贯穿四年求学的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才真切地感受到时代变了。我们赶上了一个特定的年代。在实践大讨论中求学，真是一种全新的体验。最后一年，系里出现了许多同学们自办的报刊杂志，如《文学公民》、《星期一晨报》、《扬帆》等；有的自编自导话剧；也已经有同学在全国性刊物上发表中篇小说了。学术、创作热情高涨。我也有幸在学报上发表了首篇学生论文《论唐诗中的色彩》，还在《文学公民》中刊出我的新小说《奔奔 X 的解脱》，讲 X 为求解脱在宇宙中狂奔。未知名的 X，没有具体内容的解脱，没有明确目的地的狂奔。这或许就是我们那时候梦想不断超越的心理写照吧！

这就是我四年轰轰烈烈的大学生涯。这就是那个时代给我的馈赠，也是这个国家为我们创造的空前的机遇。可以说，这就是我从七七年开始的光荣与梦想，可遇不可求。先行者未赶上，后来者时已晚！

（原载《大公报》2009年3月21日）

[返回目录](#)

三进考场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吴磊

(2022 年 6 月 11 日)

以前我一直没有写自己的高考经历，感觉不知从何说起。现在写出来了，看看也挺有意思。记得妈妈以前老说我是“三考出生”，意思是我曾经参加过三次高考。

我是新三届。初中毕业时，哥哥在农村插队落户，轮到我留城工作。但是，我很想继续学业。很小的时候，有一次去上海，在同济大学就读的姨妈带我去校园里玩了一整天。记得她牵着我走啊走啊，实在走不动了。她就背着我，一句一句叮嘱我：“长大了，也来这里上学，记住哦。”我连连点头。校园太神圣了，太美丽了。从此，读书就成了我的梦想。

那天，班主任老师登门家访。他一离开，妈妈便告诉我：“老师没有同意你上高中的要求。根据政策，已分配你去新华书店工作。准备去报到上班吧。”高中没上成，去书店也不错。一辈子和书打交道的工作我是愿意去做的。

同学们都纷纷去上班了，唯独我却还没有收到上班的通知。爸爸到处找熟人打听，结果是我的档案上有一句：“此人外公是国民党时期的市长，故取消分配资格。”这是他工作单位的人事科长杜撰出来，然后写入我的档案。爸爸一路投诉，最后由粮食局的一位山东南下老干部出来主持公道，重新给我分配工作，去粮食仓库当学徒。那是 1970 年，我 15 周岁，身高 1.55 米，体重 34 公斤。走进粮食仓库大门，迎面是同事们好奇的目光，听到他们悄悄议论：“怎么来了个小孩？”

一九七三年

三年一晃而过，读书梦一天也没有中断。1973 年是中国历史上不应该忘记的年份。当时的中国已经经历了 7 年的动乱，邓小平在那一年戏剧性地复出后，主持国务院，批转科教组《关于高等学校 1973 年

招生工作的意见》，提出要恢复文化考试。按规定：我这个满了两年的小学徒，居然通过了政审，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被推荐参加考试。

考场设在嘉兴一中。记得跟在一大群大哥哥、大姐姐身后，十分紧张地步入教室。参加考试的好多是在农村插队落户的老知青。他们情绪激动，议论纷纷，怕错过这次唯一的机会。考试的科目：政治、语文、数学、理化。题目是县教育局出的。通过笔试后，我参加了英语面试和体检。

后来，全国人民目睹了一位白卷英雄——张铁生的拙劣表演。他的《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用信的形式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编者按指出，文化考试是“旧高考制度的复辟”，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反扑”。至此，邓公努力恢复的高考被否定。考试成绩没有公布，按推荐制招收了 15 万工农兵大学生。

我这位落榜生倒是另有收获，认识了负责监考和口试的英语老师。他原来在京城《参考消息》工作，见过大世面。因为照顾家庭关系，刚刚调回嘉兴中学执教。他鼓励我不要放弃，并一直辅导我继续英语学习。

一九七七年

四年后的 1976 年 10 月 6 日，“四人帮”被粉碎，全国人民欢欣鼓舞。1977 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立刻主持恢复高考。他在 8 月 8 日指示：“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当年，有 570 万被十年动乱耽误的历届生和应届高中毕业生参加了这场非同一般的高考。

1977 年 10 月，恢复高考的消息就传开了：一个月后，高考将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当时的复习资料除了考试提纲以外，还有一套从新华书店门口排长队买到的《青年自学丛书》。经过紧张备考，终于得到一张小小的，淡黄色的中专、技校准考证。发证单位：浙江省 1977 年高校招生委员会，准考证号：134298。考试须知有 7 条。比较有意思

的是第一条：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正确对待文化考试；第二条，...应试时将本证放在桌上；第七条，文考后，凭本证参加体检。

12月16日至18日，跟随着570万心怀梦想的知识青年，冒着凛冽的寒风，我们从工厂、从农场、从乡村、从山区、从海岛、从边陲、步伐坚定地迈入心中希望的田野——高考考场。

当年录取人数27万人，其中浙江省录取了5346名，嘉兴地区（湖州在内）录取了461名；录取率4.7%。而我则是名落孙山，听说是因为我伯父的右派问题被排出门外了。

至今还记得三件事。第一、数学卷的代数部分我拿了满分；几何一题没做，是没有学过。第二、体检时，身高159，体重42公斤。看到体检医生签下“体重太轻”四个字后，我就感觉大事不妙。和医生理论了一番：体重轻重和读书好坏有关系吗？他坚持有关系。第三、落榜后，东栅中学的校长来找我。他们奇缺英语老师，看到了我的考试成绩，特别是英语和语文，有意让我调动到他们中学当老师。我非常感谢他的认可，但志不在此，便婉言谢绝了。

一九七八年

1978年秋季，高考传来一个好消息：外语专业免考数学。那我就可以直接报考大学了！英语、语文、历史、地理、政治五门课，需要半年内拿下。

首先，我找到单位领导，表示主动放弃加一级工资（人民币5元），条件是不参加每天晚上讨论加工资的会议。第二，我有10多天的存休日，分成20多个半天，上午上班，下午休假。这两项要求得到批准。

初中的母校，向她的学子们敞开了温暖的怀抱：我得到了一张粉红色历届毕业生升学辅导听课证。当年5月开始，入夜后的校园里灯火通明。教室里人头济济，最优秀的老师们执教讲台。一个教室听完课，马上赶另一个教室，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还有嘉一中的名师们，他们的课堂设在一中的大礼堂和老师家中的饭桌上。40年后的今天，我仍然由衷地感谢当年的恩师们。

总算领到了由浙江省 1978 年高校招生委员会颁发的高校文科准考证，编号为 11301442。考生须知缩减成 4 条，多了一句准考证不得顶替使用，所以贴上一张照片。考试时间从 7 月 20 日开始，共 3 天，上下各一场。考场设在嘉兴实验小学——我的母校。

记得第一门考政治。刚刚开始做题目，忽然听到一声大叫，只见前排的一个女同学捂着脸，哭着冲出考场。一位老师追出去，没有追回来。

1978 年的 7 月太热了。没有电风扇，考场里放了好几块大冰块；监考老师把各人的毛巾放到冰块上，然后送到我们手中：真是“暑中送冰”。

第一天考试，题目做得很顺手。监考老师一直站在边上看着我，好像在帮我鼓劲。第二天一早的数学考试，看了一遍，没做，准备离场；监考老师坚决不让走。我只得告诉他，我没上过高中，真的不会。第三天发挥最好，英语是强项，语文拿了 77 分。因为几道古文题，嘉一中的语文老师都讲到过。我只要听过一遍的题目都能记得。

又到了体检一刻，时间是下午 3 点。想起半年前发生称体重事件，有点担心。于是喝了一大杯凉开水，估计有 1000 克左右，然后慢悠悠地骑车，去体检的医院。听表姐说，走的太快会减少重量的，那一大杯水就白喝了。看到磅秤上 44 公斤的字样，和医生脸上浮现出和蔼的笑容，我高兴得跳了起来。

我拿到考试成绩，就赶去嘉兴考试院填志愿。选了几所学校后，交给负责的老师。她一看，便大叫起来：马上改，马上改！这个分数，除了重点学校，都可以填的！于是杭大外语系就成了我的首选。真心感谢当年这位素不相识的老师。若没有她的指点，我和杭大就会擦肩而过。

一切搞定，我便回单位上班。每天焦急地等录取通知书。终于有一天，电话铃响了，我赶紧赶过去抢过听筒。表姐在那一头激动地说：“通知到嘉兴邮电局了，是杭大的。”我什么都没想，一把抓起一大串钥匙，扔在桌上，对着边上的同事说了一句：“走了。”骑自行车飞快地往家的方向赶去……不知为什么，这个情景后来多次在梦中浮现。

1978 年，参加全国参加高考 610 万人，录取 40.2 万人，录取率 6.6%。嘉兴县录取人数为 158 名，而其中和我一样，高中学历为“自学”的有 7 名。

作为当年的幸运儿之一，我非常感谢那个时代。因为邓公的英明决断，拨乱反正，改变了千百万人的命运，拯救了中国教育，拯救了中国。高考往事，历历在目，终身不忘。

[返回目录](#)

爸爸，我考上大学了！

—杭州大学中文系78级 王琳

我参加高考，是为了实现父亲的遗愿，也是为了抚平那场刻骨铭心的生离死别在母亲心里留下的伤痕。

十岁那年的夏天，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进入到了所谓的“清理阶级队伍”阶段。我家的天塌了！我的父亲因为不堪忍受批斗之辱，跳进幽深的新安江自尽。

爸爸的遗体被打捞上来，身上盖着席子，两只惨白的脚露在外面，好像在对天哀叹。那年他才33岁。

我知道温和的爸爸再也不能背着我去采野花，再也不能紧捏拳头让我记住大小有别的十二个月。我记得，当新安江大桥建成后，爸爸是多么高兴，兴致勃勃地借了相机，给我拍照。我很小会认字，这让爸爸有些惊讶，说一定要培养我上大学。可是爸爸，你怎么就这样扔下我们走了呢？

我和五岁的弟弟站在爸爸的遗体旁嚎啕大哭。我们不明白这清澈的江水怎么就那么轻易地吞没了亲爱的爸爸。我怎么也想不通，爸爸为什么一定要走！根据妈妈的猜测，我的房门被打开过，那是爸爸深夜跳江前来和我告别。可是我睡着了！

妈妈一直在哭，哭得非常压抑，哀伤中带着深深的恐惧。她不知道丈夫的死会给孩子们带来什么？她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带着两个孩子继续往前走。隐约听见妈妈和她的同事说，如果没有这两个孩子，她也想随我爸走了。

这话把我吓着了。她走哪，十岁的我就跟到哪。外面，墙上到处都是打倒我爸爸的大标语。我就像在梦游一样紧跟着我的妈妈。走着走着，突然腿一软，趴在地上。我妈以为我被绊了一下，哪知我根本无法站立，连看东西也出现了重影。

妈妈被吓坏了。她来不及哀伤，立即带我到浙二医院看病。因为我那病，建德治不了。

现在想想我妈真可怜。丈夫惨死，女儿大病。对她而言，连匆匆离世都成了奢望。长途车驶进杭州，路过西湖。我妈指着窗外淡淡地说：这就是西湖。

我看着窗外移动的景物，惊异地叫了起来：“这是西湖吗？这些树和山还有湖水，不是和平常看到的树啊湖啊一模一样？”

因为之前爸爸妈妈去杭州出差，总说那是天堂。在我印象里，天堂是金碧辉煌的，怎么会是这些早就看过的普通山水？妈妈没有回答。她已经悲痛得人都变麻木了。

来到浙二医院，医生说必须住院，却没有床位。只有走廊里还有一张木板床，床板上有一大滩陈旧的血迹。我们就在上面铺了席子，算是住了院。记得医生用榔头敲我的膝盖和腿。一周后，眼睛慢慢好了。医生说我这病是遭受了巨大的精神刺激造成的。

看病的间隙，妈妈带我和弟弟去西湖边。记得妈妈大部分时间都是坐在西湖边的椅子上发呆。西湖在我眼里惨淡得没有色彩。妈妈带我们去吃面条，给我们点了鳝丝面。她自己点的是阳春面，但她吃不下，只是看着我们吃。我忍不住流泪，把碗里的鳝丝夹给她。我知道这些天她不时胃疼发作，连连问她：胃还疼吗？你吃一点嘛，吃一点嘛！

出院后回到建德，单位要妈妈去五七干校劳动。干校所在地盆柏，是离新安江比较远的山区。当时没有公路，要坐船。下船后，还要走很长一段的羊肠小道，才能到五七干校。

干校周围没有村庄、没有农户，估计是一个林场吧。自然也就没有学校。我的上学就成了问题。如果在新安江继续上学，就必须住在妈妈同事家。而我妈妈因为出身大地主，六十年代初被下放。后来再回原单位只有临时工的身份。微薄的临时工工资要养活我们已很困难，更别说供我上学了。

江山的奶奶知道这个情况，就派小姑夫来接我们。她希望我和弟弟能回江山上学。

妈妈挣扎了好久，终于同意让我们去江山。离别的那个晚上，在我的记忆中，是个永恒的黑夜。

建德火车站离城很远，在一个叫檀村的地方，也很小。去的路很黑很黑。不知为什么，好像没有路灯。妈妈拉扯着我俩，小姑夫背着我们的行李，抱着爸爸的骨灰。一路静默，只有脚步声。

到了车站，火车很快来了。汽笛响起，妈妈突然蹲下把我和弟弟紧紧地搂在怀里。我第一个哭出声来，接着是弟弟，然后是妈妈。她浑身颤抖，放声大哭，很响，很响。在爸爸去世的时候，她从来没有这么哭过。我感觉车站里只有我们四个人，车站里也只有我们的哭声。妈妈一边哭，一边喃喃地反复说：你要照顾好弟弟，好好读书。爸爸希望你出有出息。

火车开动了，我们还一直哭个不停。小姑夫轻声地和其他乘客解释。我一边哭，一边想象着妈妈一个人回去的情景：一个人走在漆黑的小路上。爸爸不在了，孩子又离她而去。她会怎样地难受和孤独？

后来知道，妈妈也的确是一路哭着回去的。

这种失去父亲的悲痛和对母亲的担忧，每个晚上都会在我的心里折腾。半夜做梦，常常见到爸爸；有时梦见他还活着，只是跑到一个很远的地方。现在回来看我了。我高兴极了！醒来却是一场梦。

我以前那么怕鬼，现在却希望这个世界有鬼。那我就可以见到爸爸了！可是现实却是我再也见不到、永远见不到爸爸了。眼泪一次次打湿枕头。我这样的状况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虽然后来不再流泪，但痛楚永驻心底，一想起来就钻心般地疼痛。

在老家江山，奶奶和我们两个孩子相依为命。妈妈每月给我们10元生活费，在武汉工作的二姑妈每月给奶奶寄15元，在西北工作的大舅每月给我寄10元，过年寄20。一直持续寄了8年，直到18岁我到江山丝厂工作。

关于大舅寄钱一事，有一幕永难忘记。那年头，邮递员送汇款单到门口，总是大声喊叫：“王琳，拿私章！”当我把印章拿出来的时候，几个邻居已经围着邮递员在看我的汇款单了。大家七嘴八舌，问我：“谁给你寄钱啦？”我说是大舅。他们说，“你大舅真好啊。”另外的人说，“舅舅好，还要舅妈好。”你一言，我一语。这些话深深印在我心底。

亲人们无私的帮助，让我们避免缺吃少穿的窘况，但是却无法挡住别人的歧视。好像没过几个月，就有同学知道我父亲的事情了。在上学或放学回家的路上，总有几个人结伙在远处骂我：反革命！地主！自杀！为逃避这种谩骂，我不愿意提早去学校，总是等上课时间快到了，才匆匆赶到学校。

给我安慰的是，学校的老师一直对我不错。有老师在场的时候，我总是感到安全。

还有一事我记着，当年初中升高中的时候，能不能上高中，由所在居委会负责政审提名。会上有人提出，我这样的家庭情况不能上高中。这时，平常没有往来，路上遇到也从不打招呼的居委主任说了一句：成绩好的人不能读高中，难道让不想读书的人去读？

我因此才没有失学。

初中的时候，我有个同桌，性格外向，口才出众，有情有义，又爱打抱不平。我很快被她吸引。没想到，她也觉得我人好成绩好。我俩，王八瞪绿豆，看对眼了。我非常欣赏她的性格。

这个同桌故事很多。除了欣赏她的性格和能力外，她语文成绩一枝独秀，又善解人意。我们俩有说不完的话。尤其是我，情绪低落时，只要和她一聊天就渐渐云消雾散，浑身充满力量。直到现在，遇到什么事，电话一拨就打到她那儿去了。我体会到了什么是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话说回来，我和她交往多了，就知道她们一家很艰难。她是遗腹女。她在母亲肚子里时，父亲因为公私合营失去了全家赖以生存的酒店，抑郁成疾去世了。她没有工作的母亲靠帮人洗衣纳鞋底养活五个子女。当时她和最小的哥哥因为没吃的，差点被送掉。到初中时，虽然生活缓过一点来，但每到姐姐发工资前，家里就没钱买米了。

我知道后很震惊！我手头正好有钱，那是在武汉铁路医院的二姑妈给的。二姑妈每月给奶奶寄钱，收到钱我回信。二姑妈觉得我信写得好，学习成绩也不错，就单独给我每个月寄2元钱，说给我买学习用品。她说奶奶很节约，小时候不给她零花钱。我一再告诉她我什么都

不缺，她还是一如往常地寄。她还叮嘱这两块钱不要告诉奶奶，是专门给我的。

其实那时候没什么学习用品好买。我是一个小孩子，哪里用得了这些钱？正好借给同桌派上用场。而且我跟她说不用还，因为我用不着这个钱。但是只要她姐姐发了工资，她妈就让她还我，并说：“有借有还，再借不难。”

她的妈妈不识字，但非常有文化有修养，平时聊天随时淌出的谚语警句，一下子点透事物的要害，把我和她女儿都佩服得不行。她家里一尘不染，自己也收拾得干干净净，见到人笑眯眯的。

当时能借钱给同桌，我非常开心。我一直希望成为大舅二姑妈那样的人。她给了我机会。

我和同桌都特别喜欢上语文课。这和江山中学有很多优秀的语文老师有关。

许惠民老师是我们崇拜的老师。他知识渊博，上课旁征博引，滔滔不绝。听他的课，总觉得时间过得太快。

这天，他给我们一段文字材料，让我们根据材料当场写作文。有人交卷后，他就坐在讲台边当场批。我这次交卷也比较快，交了卷就出去到操场玩了。不一会儿，我的同桌一路冲过来，一边跑一边大叫：王琳，你的作文得了110分，超过了100分，110分！她那高兴的样子好像是她得了110分。

在江山中学，我们俩都很喜欢的语文老师还有几位，其中有两对夫妻。

一对是许惠民和周晖影老师。他们家我们去过好多次。许老师谈吐生动有趣，周老师则热情洋溢。至今记得，聊看聊着周老师就拿出茹志鹃的小说《百合花》，一边读一边讲。读到最后，我们个个泪花闪闪。

还有一对语文老师杨怀仁和王梅芬夫妇。杨老师慈祥宽厚，王老师文静瘦弱，就是一个“弱柳扶风娇花照水”的林黛玉。每次去她家，都看到她用一个小炭炉熬中药。和林妹妹不同的是，她今年已经九十多岁了，胖胖的杨老师却在十多年前走了。

王老师也教过我们语文，后来因为身体不好，调到学校的图书室。有一天，她把我和另一个要好的同学叫到图书室，让我俩帮她整理图书。她打开图书室的门锁，给我们每人一张图书目录，让我们进去把目录上的书挑出来。

我们一进去， she 就把门锁上了。看到一排排的书，我们兴奋极了！好像孙悟空进了王母娘娘的蟠桃园，那个贪婪啊！根本顾不上挑书，拿上一本就看。我们当时都知道图书室里的这些书都是“毒草”和禁书，平时根本借不到。现在有机会进去，当然先睹为快。快到老师下班时间了，赶紧去找两本交差。

后来我们发现王老师并不在意我们给她挑的书。我们有时很惭愧地告诉她，按她给的目录，一本也没找到。她用她那惯有的悄声细语笑着说：没关系。

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下午上完两节课，就到王老师那里报到。然后她拿出钥匙，打开图书室门锁，把我们关进去。

现在想起来，那个图书室里的书其实也是被筛选过的。没有经典名著，甚至连大部头的书都很少。大部分都是49年以后的经过革命洗礼的作家写的，像王蒙、王愿坚、茹志鹃、丁玲（丁玲也是后期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印象中沒有早期作品），还有《宝葫芦的秘密》之类的儿童文学。但对于处于文化沙漠的我们来说，这已是非常丰美的绿洲了。

前些日子，我5岁多的孙女要我给她听故事。我看到“喜马拉雅”音频分享平台上有《宝葫芦的秘密》，想到当时我曾一口气看完，心想孙女也会喜欢。可是听过了《淘气包埃米尔》、《不一样的卡梅拉》的小孙女，听了一个开头就告诉我说不好听。我倒回去一听，果然拖沓无味。可是，这就是我们当时难以得到的精神食粮。

现在回忆起来，那个图书室也是小得可怜，好像还没有一个教室大。除了有学校老师进去过，好像从来没有看到学生去借过书。也许只是供老师借阅的资料室吧。

1975年，我高中毕业。当时江山丝厂刚刚筹办，要招很多女工。我们姐弟两个，按政策可以选一个留城。家人的意见就是先把我留下

来再说。弟弟要五年后读完高中，谁知道那时候政策会不会有变？我就这样成了一名丝厂女工。

77年听说可以高考，非常高兴。但马上想到自己中学都在学工学农学军，课本就是工业农业，没有学过正儿八经的知识，考得上吗？虽然疑惑，但还是报了名，当时好像也没什么时间复习就去考了。

记得下午要考语文时，先是认真盯着时间的。也许前面精神高度紧张，后来竟然睡着了。醒来一看迟到了，赶紧奔过去。迟到了半小时，好说歹说进了考场，赶紧填考卷。

当时的作文题目“路”是写在黑板上的，可是我埋头写试卷，居然没看见。然后疑惑怎么没有作文题目，当时也缺少考试经验，不知道问一下老师，又怕时间来不及，自己随便写了一篇。等我交卷时才发现黑板上的作文题目！

我一度非常沮丧。我在丝厂做缫丝工，三班倒。缫丝工上班必须专注认真，不然就会出次品。所以上班时间绝不可能复习功课，只有下班才有时间复习，而且麻烦的是没有复习的课本。但是我的妈妈、舅舅、姨妈、姑妈都一再来信：不要灰心！想想你爸当年多么喜欢你，期待你。你不能打退堂鼓。

我的同桌更是一直给我打气。有一天，她听说江山中学办了高考复习班，召集在校成绩好的同学回校复习。成绩比我差的同学都去了，但我还在上班。她非常生气，找到我，说一起到学校找老师去！我不肯去，她说：“凭啥不去？比你差的都能去。”拉着我就走。

到了学校，找到负责的老师。她收起了刚才生气的情绪，微笑着问：“王琳成绩那么好，为什么不让她进复习班？”

自从初中认识她以后，我几乎没有看见她咄咄逼人大喊大叫的样子。但是她给我介绍自己以往的时候，总是说她在底层社会长大，天不怕地不怕，整天和人吵架，是非常“ki”（第四声）的人。“ki”是江山话，有凶的意思，但不是单纯的凶，还包含了厉害和讲道理的意思。但我很少看到她“ki”的样子。她说，这是因为和我以及另一个好友的交往缘故。我们使她爱上读书，是书让她懂得修养和优雅。她

后来果然成为一位既实在又极为优雅的大学老师。其实我觉得这一切应该归功于她妈妈的耳濡目染。

当时老师很快就弄清我的情况，让我进了复习班。

当时我还问她，为什么你不帮自己争取进复习班？她说我要是成绩和你差不多，就两个人一起争取。但我差你一截呢，为你争取是很正当的。

其实当时复习班里就有成绩跟她差不多的，后来也考上大学了。但她说人家是本校教师子女有照顾的，她不能去跟别人比。

正是因为进了这个复习班，我不仅有了时间，还有了老师的指点，关键是还有了油印的复习资料。那时候我们都没上过历史、地理课，也没课本。记得复习地理全靠发的几张油印地图，然后我把老师讲的要点密密麻麻记在地图空隙之处，对照地图来记忆，居然考了九十多的高分。

考试结束后，我觉得我已经尽力了，考得上考不上都不再去想了。

有一天，我正在缫丝车上埋头添茧，车间的机修工走过来。这个机修工的父亲是江山教育局的领导。他一边帮忙添茧一边告诉我，高考分数出来了。你考上了！你是文科第一名，我妹妹是第二名。

第二天，高考红榜公布了，但并没有成绩和排名。成绩也好，名次也好，对于当年的我并没有太大的意义。重要的是：我考上了！

我不知道机修工是什么时候走的。我只是紧张机械地在水里添茧、拉丝、接头，心里却一遍一遍地重复着一句话：爸爸，爸爸，我考上大学了！爸爸，爸爸，我考上大学了！爸爸，爸爸，我考上大学了！

眼泪一颗颗滴落在煮茧的水里。

（原载2022年7月6日《钱江晚报》）

[返回目录](#)

我要读书！

—杭州大学中文系 78 级 张玲燕

1977年秋天恢复高考的时候，我已经在黄岩县澄江区农村插队落户3年，此时正在当地小学做民办教师。尽管我心心念念盼着上大学，但当大学的考场向我敞开的时候，我胆怯了。

我生于1956年。因为有了母亲是小学教师的方便，我1962年上学。但读了4年就遭遇文化大革命。小县城从1966年开始“停课闹革命”，直到1970年才复课，五届小学毕业生一起涌进初中的大门。县城只有一所县级公办中学和一所镇级民办中学，而且县中学的校舍已被占用。当时的办法是，把两所中学的老师合并为一，同时在老三届中招收一批民办教师。征用孔庙庙产和民办中学的校舍，分两个校区实行半日制教学。在这样的速成班读了两年后，70届小学生继续读第三年的初中，其余四届就算初中毕业。而想继续求学的我，再次遭遇失学的痛苦。

我大哥1969年支边到内蒙古。我和二哥同时初中毕业，按规定必须有一个去支农，另外一个才能安排工作。父母亲经过内心煎熬后决定，留下二哥，送我去乡下插队落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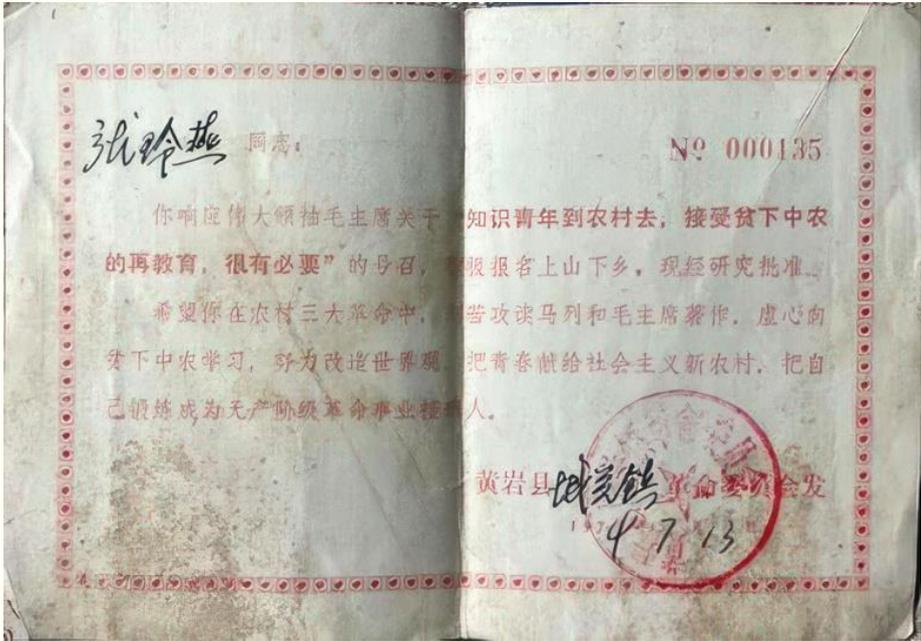
但这个决定遭到了我的坚决抵制！我明确表示，必须读完高中才能下乡。因为没有高中的文凭，我以后怎么上大学啊？——我的几个堂哥堂姐都是“文革”前的大学生。读高中上大学，这是我童年唯一的梦想！

好在当时小城的上山下乡已是强弓末弩，我暂时没有下乡，却因被定位“支农”而失去了上高中的资格。开学后，我每天一早就站在面街的门口，目送捧着书本从我身边经过的学生；下午快到放学的时间，我又早早地站到门口，看着他们从我面前说笑而过。

我妈妈怕我憋出精神病来，一年后帮我找到了城东一个公社的中心小学。学校先是在6年制小学的基础上办了初中部，又在初中部的基础上再“戴帽”办了高中班。里面的老师，好像除了一个因为台特嫌

疑而被驱赶到这里的中学语文老师外，其余全部由原来的初中老师担任。

但这样的学校于我就是神仙福地了。我就在这里插班读高二。一年后，1974年春天，我拿到了高中毕业文凭，然后就下乡插队落户做了知青。



1977年秋天，高考报名。但这样的中学文凭，让我心中对考大学没了底。在公社中学读戴帽高中时，大家都想着毕业时高考也许能恢复正常。凡是有点关系的就转到了区中学或县中学。有一个女生在转学时狠狠地撂下一句话：在这样的地方还想考大学？！——这样的戴帽高中出来真考不了大学吧，何况我连戴帽中学都没有读完整？犹豫再三，最终我选择了报考中专。

1977年高考、中考都有初试。初试考场就设在我读高中的学校，监考的是我的化学老师。考完后老师说，数学全对，语文多少分你自己估摸吧！有台特嫌疑的语文老师两眼直勾勾地盯着我，像个祥林嫂似地嘴里反复就一句话：你怎么会去考中专的？你怎么会去考中专的？

我说，我和弟弟同时考。我妈说女孩子年纪大了，考个中专回城就行了。

其实我没有告诉老师，我出身于一个“黑五类”家庭，外祖父一脉在大陈岛。当年岛上的亲戚们，有钱的“渔霸”自购机票飞去了美国，没钱的渔民每人领两块大洋漂到台湾。黑五类加上“美蒋台特嫌疑”，无异于雪上加霜。

1974年下乡时，好多知青直接选择到下乡插队的地方当民办教师。这样户口下去了也避免了强体力劳动，知青民办教师仍然可以推荐上大学。但我想，我是一个“可教育好子女”，日后我必须拿出比别的知青更雄厚的资本才能竞争到上大学的机会吧？所以我放弃了当民办教师的机会，像一个男劳力一样整整劳动了3年。以我92斤重的身躯，我挑过180斤重的担子，插过可以排到天边的秧苗，扛过数不清的桔篓，下过生产队所有的水田。我的工分从开始的4分，上升到8分，——队长跟我说，你完全可以拿10分。但你就养一个人，我们上有老下有小，只能从你这里刨点便宜。

除了参加田间劳动，农闲时我也绝少回家。三年里，有两个春节在农村度过。我在大队会场上给前来开会的社员们讲故事、在公社会场上给前来开会的干部们讲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在政治夜校给低年级的青年扫盲、带领高年级的青年学理论；组织文宣队排练节目去县城演出；带领武装民兵上疏浚河道工地挑泥土，和女民兵一起从三八大盖到半自动步枪；我们从卧姿射击练到跪姿射击，百米内打过气球、砖头、啤酒瓶，拼刺刀、急行军……我这样投身农村，就是为了给自己搏一张“可教育好子女”上大学的通行证。

我似乎已经达到了目标。两年后，我已经是四野八荒的知青标杆。但我怎么也没有想到，1976年冬季最后一届工农兵推荐上大学的时候，我被戴上了“揭批查‘四人帮’运动中表现不积极，思想有问题”的帽子。公社书记表态暂缓推荐，先查问题。大队书记送完儿子上大学回来给我定性说：“查无此事，不入档案。”

真的不敢告诉这位慈父般的语文老师，经过三年削骨锉皮撕心裂肺的疼痛之后，1977年9月，我终于承认我是“不可教育好子女”，终

于放弃推荐上大学的梦想，带着劳动落下的伤痛做了一名小学民办教师——既然上不了大学，那就一辈子守着校园吧

然而命运好像跟我开了个玩笑，三年劳动盼大学，大学犹在九重天。一朝任教回校园，高考就在眼面前——就在我站上小学讲台没多久，传来了恢复高考择优录取的好消息，心灰意冷又来不及任何的准备，仓促中我选择了考中专。

非常意外的是，1977年正式考试后，我和弟弟双双落榜。更加意外的是，那年考中专的作文题是“战斗”，而我的作文《战斗》却被当作“满分作文”在坊间传抄！

其实下乡后，除了大批判文章，除了流水账般的日记，我基本上没有写过像样的作文。但农村数年，毕竟生活题材很丰富，考场上看到这样的题目，我第一时间想到了身边的生活。在当年“抓革命促生产”的斗争中，我所在的大队、公社、区乃至县里的主要领导，确实把很多的精力放在了抓生产上。再加上我所在的大队本身就是多种经济综合生产区，所以那几年经济收入明显比别的大队要好。这些我亲身经历的题材随手可拈。体裁呢？我首先想到了我要写的战斗，不是一般意义上兵刃相见的战场，而是战天斗地的生产劳动（当然也不乏与人斗），从辨析字义入笔。我很自然想到了巍巍《谁是最可爱的人》。那篇文章我倒背如流啊！几乎没有什么犹豫，我提笔就写，洋洋洒洒写到最后，好像用这样一段话结束：“亲爱的朋友，看到这里你一定会和我一样地理解，这是一场战斗吧？是的，这是一场战斗，一场流汗不流血但比流血更残酷的战斗。在英明领袖华主席（当时华国锋执政）的领导下，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场战斗必将继续进行下去并且无往而不胜！”打上惊叹号我感到有一种兴奋过后的疲惫感，懒得看第二遍就交上了卷子。

后来作文被阅卷老师手抄出来，说看到了一篇两报一刊社论一样的作文。看字迹看文气好像是男生写的，50分满分的作文，给了我48分。文章传到我们公社老师手中，我一看，这不是我写的吗？没有想到戴帽高中写出来的文章也能被人看好，这一下我有了一点信心。

既然考不上中专，那就——索性考大学去吧！

身为小学民办老师，每周24节以上的课程，进高复班不可能，补习高中课程完全是妄想。但中考的“满分作文”，给我这个从来没有想过读文科的考生动了考文科的念头。而且，我戴帽高中同班同学曹官法在77年考上了杭州大学中文系，也给了我极大的信心。我妈妈的同事，杭州的严阿姨给我寄来了学军中学的三份复习资料：政治、历史、地理。我自作主张，放弃语文、数学、外语的复习，专攻政治、历史、地理三门课。

我的住处在村西头，小学校在村东头。我每天早晨从西往东背历史，每天傍晚从东往西背地理。每个周末，村口约上邻村的知青，两人一路从乡下往城里背政治。村里人见我走路两眼发直口中念念有词，都说我有病了，好心的大妈们甚至还劝我进城去医院看看。

我当然没病，但我也没有办法啊。如果预先能知道77年恢复高考，打死我也不会来当民办教师啊！那样我就可以回城好好补习我心爱的数理化。但现在我做了民办教师。1977年邓公主政以后猛抓教育质量。当时全国掀起听课潮，本公社的本校的互相听课不要说，隔壁公社、别的区、甚至别的县的老师们都会主动来联系听课（我们也一样四处听课），而我就成了我们学校的“被听课专业户”。因为我有几个被听课的有利条件。首先，我年轻，是个女教师。其次，我是个新教师。三是我会讲几句普通话。在当年闭塞的台州农村，会讲几句普通话的老师站讲台就有几分天然优势。我们校长很有“战略眼光”，推我出来讲课。他攻守自如。我要是讲好了，他就跟人吹嘘：这是我们学校培养的新教师，上讲台才几个月。我要是讲砸了，他就跟人解释：这是我们学校的新教师，上讲台才几个月。当然，他有恃无恐，又锐意进取，召集了几个资深老教师帮我备课。我所在的学校是公社中心小学，有好几个解放前的师范毕业生。和我同上四年级语文的平衡班老师也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民办教师。他们的普通话不好，但专业水平杠杠的，做我的指导教师绰绰有余。所以77年这一年里，白天的时间我基本上都用在了教学上，复习备考只能利用早晚路上这点时间了。

相比较于复习的紧张，其实心中的压力更大。1977年，我们公社三个女知青参加考试。我中考落榜，另外两个参加高考也失败了。两

人中，其中一个和我同姓。初中我们两个是同一校区仅有的持全优成绩单毕业的学生，被老师戏称为“双张”。后来我失学，红二代的她顺利进入县高中，依然以神话般的全优成绩毕业。1977年，她的父亲进入了“某某体系学习班”，她也是不可思议地高考落榜。和我一起背政治的程同学倒是有幸参加了1977年的体检，但政审仍然被刷下来。她当时发疯似地到处追问原因。有知情者告诉她，因为在她的档案中，对她当中学老师的父母在“文革”期间的定性有：“说过错话办过错事”这一条。

1978年，我们三个人继续复习备考。也许北京的暖风已然吹拂，我们心中也希冀冰河会逐渐解冻。但民间一直经验性地认为，1977年的高考、中考，除了成绩，还有三道关：第一道是报名关，第二道是体检关，第三道是政审关。坊间不相信，“双张”1977年的考试成绩会不好。他们坚信，我们是体检前被恶意刷掉了。以此类推，坊间坚信，我们三个人1978年的高考成绩肯定不差，但也肯定上不了大学。因为我们肯定无法通过政审关。在这样的压力下，我们首先必须考出好成绩来，不能辜负坊间对我们的评价，不能辜负江东父老乡亲。政审能不能过关的担心倒放在了其次。

虽然备考彻底放弃语文复习，但我写过一篇作文。那是全区民办教师摸底考试。考之前，全区进行了教学大听课，由区教办组织听课力量，一个公社一个公社，篋头发式的听课。就是说，如果一个公社100个老师，听102节课。每个老师听一节课，最差的老师和最好的老师再各听一节课，然后全公社教师集中起来讲评。

亏了老教师们的言传身教，我这个被听课专业户作为我们公社最好的老师被听了两节课。现在想不起来了，做总结的时候，我因为什么事情没有去公社开会。反馈回来的信息说：全公社唯有我教的班级作文没有一篇是雷同的，也唯有我给学生的作文百分百写批语而且和学生反复互动等等。有了这样的评价，再加上我考中专的作文已经名声在外，那次摸底考试老师们对我的作文寄予了无限的期望。结果很出他们的意外，给我的评价是：散文的结构，小说的语言，写得不伦不类。

终于忙到学期结束，离高考还有10来天时间，真的头悬梁锥刺股地进行考前最后冲刺。天气很热，房东的凳子很粗糙，屁股都磨出了水泡。楼下的乡亲们心疼我，时不时喊我下去帮他们绣一朵花、织一圈网、帮助收个辣椒什么的。这就算是我的课间休息了。

临考前两天，回到县城熟悉考场。和我同一考场的主要是西部山区一个中学的应届生。第一天上午考语文，二楼遇见隔壁公社的一个男知青，坐在教室门口走廊的地上，身边堆着四本《红楼梦》，说：肯定考《红楼梦》，肯定考《红楼梦》。毛主席说的，《红楼梦》要看五遍。我一下子心拔凉拔凉的。《红楼梦》我虽然看过很多遍，但从来没有想到会考它啊！

好在卷子发下来粗粗看了一遍，没有《红楼梦》！做完语文卷子还有半个小时。舍不得提前离场，我就趴在桌子上数作文缩写部分的字数，结果发现比要求多了几百字，我又懒得全文精删，就把最后一部分的“措施”部分全涂掉了（后来才知道这部分有得分点的，我要更懒一点啥都不动就好了）。上午考完语文，监考老师就对我另眼相看了。下午考历史，招生办的一个老师来巡视考场，站在我身后看了一会。交卷的时候，监考老师悄悄告诉我：巡考老师说你前面十道简答题全对。考数学那天特轻松，试卷拿到我随看随做。那道25分的平面几何我直接跳过，很快就看到了最后的附加题。我兴致勃勃地开始解题，监考老师急坏了，几次三番以各种形式提醒我不要做附加题，有时间到前面去能拿几分是几分。但我不听，我本来就打定主意不拿数学分的么。

最后一个下午考英语。吃过中饭，当初中英语教师的大嫂把我和弟弟叫到一起，简单说了一下单数复数、陈述句疑问句什么的。上了考场，15分钟后考生纷纷走人。半个小时后监考老师告诉我，整个学校所有考场就剩下我一个。老师说你慢慢做，我陪你到最后。但我没有熬到最后，那个和我一起背政治的程同学从城南的考场来到城北的考场，一路呼喊着我的名字寻到二楼，敲着窗户让我放下试卷不要考了。老师赶都赶不走，我就提前半小时交卷，结束了我的高考。

高考结束后整整一个星期，我基本处于瘫痪状态，除了吃喝拉撒就是睡觉。然后就等到了一个惊喜，我的高考成绩在县里仅次于一个老三届（那是个66年毕业的老高三，当过高中的语文数学历史地理老师。他后来去了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供职于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可惜英年早逝）。区教办也知道成绩了，大家开始担忧我政审能不能过。已经有领导跟我妈妈说，如果此次政审还是不能过，他们考虑调我担任区中学语文教师。

但此时我已经陷入了一个恐慌之中。县招生办的老师从杭州带回首批参加体检的10名考生名单，里面没有我。因为有77年的失败，我们都怀疑是不是又有猫腻。我妈妈为此跑到地区招生办，确证我的试卷肯定送到省里复改去了。与此同时，县招生办也发现了其中的诡异。西部山区那个和我同一考场的中学里，有一个女生名字出现在10人名单中。他们学校老师欣喜若狂之后觉得不可思议——那个学生平时成绩很差的。招生办老师安慰我妈妈说：可能名单有误。他马上回杭州，而且第一批没有也不要紧，要扩招了，不止就这10名。

隔两天，那老师果然带回了第二批扩招的体检名单，还有第一批正确的10人名单。原来当时还没有计算机，招生办老师也是急考生之所急，以手抄的方式提前拿到名单，但抄错了一个号码，偏偏错在我这个惊弓之鸟身上。那两天又一次经历了茶饭不思惶惶恐恐的心理体验。

9月份我回到小学校上课，方才知我在城里为10人名单惊慌失措的时候，我的同事们正在乡里为我的高考成绩而狂欢。老师们首先为我松了一口气，继而为大听课中把我评为全公社最优教师而开心自己有伯乐的眼光，而后诧异我民办教师摸底考试那篇作文为什么不咋的呢？据说他们翻出我那份试卷再看了一次，说好像看出了一点味道，又讨论应该给我往上加多少分——其实那篇作文并不写实，内容情节是我当场虚构的。主要元素有月夜、小桥、树影、两个女孩子在桥上抒发人生理想，对话用词比较隐晦。这一方面因为当时是民办教师摸底考试，考场上没有压力，我的思绪随意飘散。另一方面，当时我已经听到了坊间关于78年政审我们依然不可能过关的议论，心情有些压

抑，所以文章比较小资——这大概给看惯了我中考作文风格的老师们一个意想不到吧。



系排球队，也是班排球队

左起：孟丽珍 张玲燕 叶晓芳 徐敏 金红 虞卓娅。

值得庆幸的是，78年我们公社三个知青还有我弟弟都有幸参加体检。填志愿的时候，我报了杭州大学，弟弟报了浙江大学。程同学因为妹妹报杭州大学，她就报了浙师院。而我的同姓同学此时父亲还在某某体系学习班里，她也是身心疲惫不敢妄想，尽管已经知道自己成绩可观，她还是在普通大学栏里首填了一个当地的师专。

多年以后，有知情人告知。虽然那一年中央规定高考录取放松政审关，但我们家还是受到影响。78年政审，我们姐弟两人，我顺利通过，但弟弟却被他们卡下，好像理由是：不能都让他们家的人读大学（我支边的大哥已经于1972年通过推荐和考试选拔成为工农兵大学生）。多亏浙江省招生办，看到政审表格后当即打电话给当地招生办，严肃告知，该生是本省理科高分者。这样的考生如果政审不合格，当地招生办必须写出专题报告，由招生办主任自己送到省里，当面汇报。

强劲的东风终于吹到小城，坚硬的冰河终于开始解冻。1978年10月，我和我弟弟有惊无险地分别进入杭大和浙大。我刚初中毕业的妹妹那一年考了高中又去考中专，结果先被县高中重点班录取还当了班长。读了一个月以后，地区卫校的录取通知书也到了。那时我和弟弟已经分别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我们就劝妹妹不要去读中专，安心高中，准备大学。但历尽劫难的父母和亲戚们认为，1978年是个难得的好年份，谁知道以后政策会不会变呢，能读中专就读个中专算了吧，省得以后担心事。于是我妹妹放弃高中去了地区卫校。一年中，一家三人考了四场而且每场都中——我们成了小城居民关注的新闻焦点。

和我同考的另外两位知青，这一年也都顺利通过政审，走进了各自的大学。分手的时候，赴浙师院物理系的程同学送我一本红色封面的日记本，扉页上写了一首陈毅陈老总的诗：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我也回送她一本日记本，扉页上写了一段莫泊桑《人生》中罗莎莉的格言：人生，您可看见。它从来不像人揣想的那么好，也不像那么坏。去地区师专的张同学没有和我们做特意的告别，多年以后三人相聚，政绩斐然的张同学仍然不无惆怅地说：我当年的成绩，其实可以报考杭大化学系的。

四十四年来，回顾这条艰难曲折的高考之路，我经常有许多遐想：如果没有那场文化大革命，我应该顺利完成小学、初中、高中学业。有那么完整的知识结构，我会选什么专业呢？如果早一点承认自己就是“不可教育好子女”，我也用不着艰苦劳动三年，直接去当知青民办教师。我可能还会有时间补上那些数理化吧？如果我能预知邓公主政后77年就能恢复高考，我肯定不会去当民办教师，那样我也有时间走进高复班里……但我身边的朋友，一旦知道我77年78年从考中专到考大学的逆行报考之旅，大多会说：中专没考上还敢考大学？你很厉害啊！

其实没有什么厉害的。所谓破釜沉舟背水一战——就当历了个劫，此后看什么都云淡风轻。

（原载2022年7月26日《钱江晚报》）

1977年，我被举报信夺去了上大学的权利

—杭州大学中文系78级 沈小杭

1977年恢复高考，我正好从余姚中学高二（3）班毕业，历史性的机遇就这样突然降临了。在班主任王传弘、任课老师袁英杰等人的精心辅导下，经过紧张复习，我幸运地上了录取分数线。作为班里的学习委员，这个成绩也不算什么意外。我们班先后有5人考上大学，4人考上中专。那年的高考成绩未公布，王传弘老师给我估了高分，让我充满信心。

我的户口在高中毕业的当月，就以知青的身份迁至余姚青山公社下沙畈。那里是我的外婆家。当地有的知青下放了好几年，甚至十几年，还看不到前途。如今我只挂了个名，就可以不用再去“摸六株头”了。喜悦之情，一时难以言表。当时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话是这么说，但若真轮到自己，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干得不好遭尽白眼。还有油盐酱醋、吃喝拉撒，一桩桩一件件，实在都艰难得很。

谁料天有不测风云。一封针对我的举报信，悄然寄到了当地招办。这种信当年人称“八分头”（只需贴八分钱邮票），很有杀伤力。有关部门收信后，往往不管三七二十一，给被举报人来个“待审查”。先搁着，以后能查则查，查不了就不了了之。就这样，我参加体检之后，便没了下文。没有任何人来找我，作任何方面的了解，也没有人来给我作解释。

我父亲托教育系统的关系私下进行打探，才朦胧得知，是受了他的牵连。我的政审结论是：“不宜录取”。这一消息，犹如晴天霹雳般震惊了我。谁写的信？什么内容？为什么？直到26年后，2003年10月，我才偶然从余姚当地政法系统一位同志口中得知，她就是当年负责高考政审的招办负责人之一。我的那封举报信系一某姓人士所写。此人与我父亲私下有仇，给我来了个公报私仇、父仇子偿！

我去询问父亲。他沉重地告诉我，那是他的老同事。“文革”开始后，他们分属不同派别的群众组织，各自认定自己才是领袖的真正拥护者。不同意见的冲突之中，互相之间产生了矛盾。有一次，他因情绪失控，打了对方几记耳光。虽然很后悔，但仇反正就这样结下了。在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有人曾狂热到了六亲不认的地步。我就亲眼见过一对夫妻，一方是“无联总”，一方是“造联委”，从而反目成仇。那是一个不堪回首的年代。

当时，随着两派武斗的不断升级，浙东一带陷入了深重的灾难和恐怖之中，也给我家带来了不幸。我当时还未上小学，但已有些记忆，总感到每日慌兮兮的。我父亲有个朋友，前一日刚来过我家，次日就在最良桥畔，被对岸射来的一颗步枪子弹击中了腰部，送到阳明医院不久，就气绝身亡。我家住在医院东侧不远的洪家道地，他的惨死是我亲眼目睹的。又一日，我在家里的小天井洗澡，头顶上突然响起了“哒哒哒”的枪声，还夹杂着瓦片的破碎声，吓得连忙逃入屋内。若被打死了，恐怕连被谁打死的都不知道哇。

于是，父亲带着我们从余姚火车站乘火车外出逃难。那时的火车可以白乘，车来了爬上即走，想去哪里就在哪里下车，全国各地都可以。就在月台候车时，赶来了一帮凶神恶煞模样的人，架起一个坐在我们身边水泥地上的年轻人，边走边不停地拳打脚踢。那人吃了一半的西瓜落在地上，染得一片血红。多年后，我曾在一份资料上看到，此人与一个死于“文革”期间的中学生很相似，不知是否就是他。我家几口一路逃难到杭州、上海。在浙江省军区大门口救济站，排队抢喝过冬瓜汤；在上海街头，我替父亲拣来烟蒂抽。这一幕幕，至今难忘。

“文革”结束后，随着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深入，我父亲与其他不少人一样，按程序接受组织审查。至1982年11月，他才被确定没有严重问题，批准离休，享受科局级生活待遇。

若无那封举报信，我很可能在恢复高考第一年就上了大学。但如今看来，那位人士的行为，按照当时的逻辑，又是顺理成章的。我内心只是对株连子女这种做法感到不齿。那不是封建余罪，又是什么呢？

我后来曾多方寻找，希望一睹自己当年高考文化考试及政审、体检等资料，可惜全无踪影。

感恩党中央的英明决策，1978年起对高考政审做出了调整，更注重考生本人的表现。我这才重拾信心，再次参加高考，圆了大学梦。

大学毕业回到家乡后，我曾较长时期担任基层政工干部，参与过多次政审。可又有谁知道，我曾是一度被高考政审所淘汰的人呢？以史为鉴，可以明是非、知兴替。我们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倍加珍惜当下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原载2022年6月20日《钱江晚报》）

[返回目录](#)

两次高考 三次考试

—杭州大学中文系78级 吴朝蹇

恢复高考是十年文革后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作为一个亲历者，40多年前的高考仿佛就在眼前，历历在目。

我于1970年开始在温州六中（现在温州实验中学），初中、高中连读4年。当时教育是低谷，流行“读书无用论”。张铁生这样交白卷的是英雄，读书则被人耻笑。有工作、有钱赚才硬气。读了书，也要装出不读书的样子。去学校，书包也不敢带，几本课本塞进袖口，一路低着头，很怕遇见邻居或熟人。课堂风气很乱，课桌摆成战壕的样子，学生各占一边，喊打喊杀，任课老师只是苦笑。

1972级温六中高中部招生四个班级，每个班60多个学生。毕业时合计只40余人，逃离率高达80%。那不是个读书的年代，而我喜欢读书的感觉。

1974年高中毕业，成为“待业青年”，陷于失业的尴尬。有三年时间呆在家无所事事。这期间有几件事记忆深刻。

第一是苦涩的临工经历。

温州是对台前线，国有大型企业寥寥，就业极其困难。在家门口看着上班下班的人，说不出的羡慕。我在每年旧历年底前后，约有一个多月时间在父亲的年糕厂做临时工，1天工资1.17元。每年过年，温州市区居民每人计划供应2斤年糕，这个光荣任务就落在国有的年糕厂。这时厂里特别忙，需要很多临时工。这份临工延续到大学四年的寒假。我对年糕情有独钟，对生产加工各环节都非常熟悉。若干年后，我在网上写了篇“年糕世家”，记叙这段经历，获赞不少。

我做过2次泥水工，时间都很短。一次市区中山桥修建时，干了2个来月临时工，不用技术，只使蛮力，给泥工师傅当下手，挑运砖头、石子、水泥等。短短几天，手上、肩膀都起了水泡。当时个子不到1米60，体格瘦弱，苦不堪言。

还记得在一个家庭作坊做过工，是信河街邮电局后面的一条小巷，有5、6个人用砂磨磨着小轴承的平面。忘了是什么用的，结果也不了了之。

第二是学会了围棋。

我几个最好的朋友，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中都是同班。其中一对双胞胎刘加智、刘加勇会下围棋，他的大哥也会下。我在他家看到他们下棋，觉得有趣。加智鼓励说，你数学这么好，下围棋一定好。借了几本书给我。我拿着吴清源《白布局》、《黑布局》、《定式要领》等书，囫囵吞枣，打谱练习，很快就入门，可以与他们对局了。我认识了当时市区水平最高的几个棋手，和他们下，我肯定输得多。他们说我棋路挺正。我知道是说我杀力不够，是“书房棋”。上了大学，我订了上海的《围棋》月刊，唬倒很多同学。

学会围棋是一种机遇，如果不是高中毕业无事可干，也许不会和围棋结缘。不管是在大学读书时，还是在今后的工作中，蕴含中华文化丰富内涵的围棋都使我获益良多。

第三是在温州图书馆蹭书。

我家不是书香之家，父亲高小学历，母亲片字不识。除了课本，家里仅有的一本藏书是养兔子的专业书，都被我翻烂了。里面几幅彩色兔子解剖图，至今还有印象。后来被母亲用去纳鞋底，心疼好长时间。

距我家仅200多米的温图是我最好的去处，一周都去好几次，浏览新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日报》等报纸，用一个“假阅览证”（办证需要单位证明，待业的不能办）在馆内看书。这里工作人员很知性，明明知道证件不符，也不愿揭穿。找到书以后，看着你，意味深长地一笑，尽在不言中。

当时很红火的《金光大道》、《林海雪原》、《欧阳海之歌》、《红岩》、《艳阳天》等书籍，都是在温州图书馆阅读的。还有苏联作家高尔基的《童年》、《我的大学》，古代小说《西游记》、《镜花缘》、《红楼梦》，还有鲁迅先生的许多作品。除这些文学作品外，

范文澜先生主编《中国通史》是我看过的第一部大部头的书，囫圇吞枣，有的看得懂，有的似懂非懂。对温州图书馆的记忆，温暖又温馨。

当时温州最大图书馆，2014年转为全国第一家“城市书房”。温州有城市书房112家，24小时开放。

1977年4月，通过关系介绍，去温州五星电气低压开关厂上班。这是一家街办小企业，由温州开关厂和五星街道合办，后来居然成为温州市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

介绍信“备注栏”写着出纳，街道原意是让我当出纳（当时没有财务证书要求）。我用一个月练打算盘，前头加减乘除技巧等都练得非常娴熟，非常自信。但企业对出纳这个重要岗位有自己的打算，坚决顶住不办。前后拉锯一个月，最后将我的工作调整为开仪表车床。月工资第一年18元，第二年25元。我眼睛高度近视，做一般活还可以，磨制刀具根本看不清。师傅教了好长时间都不得要领，很是受鄙视。

后来境遇稍有改变，被调去厂办抄抄写写，好像有了用武之地，其实心情很低落。当时大学专招工农兵学员，培养又红又专，而我非工非农非兵，上大学绝无可能；家里两个哥哥、两个姐姐去黑龙江支边，另一个姐姐已经安排工作，当工人也无路可走；高度近视，更使当兵梦成为空想。

其间，时有传言说国家要招收外语专业学生，后来发现是空欢喜一场；又有传言有招收佛教学院的学生，也蠢蠢欲试。总之社会动荡，传言谣言，人心惶惶，前途迷茫。

1977年10月，终于正式传来官方消息要恢复高考。几个要好的同学聚在一起，盼望多年的大学梦有机会实现，纷纷举杯庆贺，充满着对未来的憧憬。

当时复习条件很差，没有任何参考资料和习题，没有老师指点迷津。我4年初中高中课本和4年大考和期中考试试卷都保存得完好，成为复习的主要资料。

荒废几年，打开捆扎在一起的旧课本，数理化没有忘记，看书解题都能独立完成。1972至1973年间，邓小平复出，国家对教育有所重

视，用数学竞赛、作文大赛、书法比赛等鼓励学生多学习。那段时间，老师努力教，学生认真学，基础打得扎实，对后来参加高考帮助很大。

1977年第一年恢复高考，各地都先用初试作筛选。11月29日，初试试场设在母校温州六中。记得初试语文试卷有一段“齐人攫金”故事的翻译：

昔齐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适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问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对曰：“取金之时，不见人，徒见金。”

难度并不大，好多同学却翻译不好，初试即遭淘汰。

初试通过后，准备正式考试。遇到第一个问题是填报志愿。

第一次参加高考，懵里懵懂，不知道自己有什么优势，不知道选择文科还是理科，也不知道什么叫本科、专科，更不知道各专业的具体要求。远在黑龙江支边的二哥，建议我报考理工科，理由是老三届经历丰富，文科优势大；新生记性好、脑子活，选理科有利。我觉得有理，就选择报考理工科。

选专业也很无厘头，因为手头有几本从新华书店购买的《二进制》、《激光技术》等小册子，兴之所至，填报了复旦大学激光技术专业 and 浙江大学电子计算机系，其余大学和专业就放弃了。

1977年高考有几个特点。一是由各省自行命题，没有全国统一试卷。二是考试之前即填写志愿，好像是三个学校，六个专业，约等于瞎子摸象。三是考试科目，理工科考语文、数学、政治、理化4门；文科考语文、数学、政治、史地4门。四是考试成绩绝密，没有公开公布。

12月15至16日，我和全国几百万考生一起，参加了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共同见证了 this 重大历史时刻。

考试试场也是温州六中，这使我如同参加中学的一场普通考试，心态平和，发挥正常。

考试后一个多月后，温州五马街发榜公布参加高考体检名单，看到了我和几个同学的名字。我家住河西桥，属朝阳街道向东居委会，全街道入围仅有2、3人，很是风光。第一年高考成绩无从查考。——

后来在高中同学家里看到一本中学复习资料，选载温州考生的10篇高考作文《路》，其中居然有我的一篇！

但接下来很不顺，体检时，裸眼勉强看到0.1，而报考专业要求裸眼0.5以上，主检医生签字：限报数学专业！那年头因为徐迟先生的《哥德巴赫猜想》引发的数学热，数学专业红得发紫，要分很高，前途不妙。

忐忑等待中，接到市招办的一封征询函，如果大学没有录取，中专去不去？我想想不至于吧，直接否掉。千等万等之后，因为复旦、浙大的两个专业都改为数学系，而我的高考数学成绩没有那么突出，终于确定落榜了。

然后又有转机。原来不在招生序列的温州师专，经教育部批准，拟开始招生，生源就是这批落榜生。我正准备填报时，遇到高中同学周国苗。他和我一样，都通过录取分数线后落榜。他告诉我温州师专是专科，不是本科。我问什么是本科什么是专科。他解释说本科是四年制，而专科只读三年。我憨憨地再问，这有什么不一样吗？周同学终于挑明核心：“本科毕业后工资比专科高一级。”一级工资相差5元，当时是一笔大钱。我一听，马上打消了报师专的念头。

大批扩招落榜生是恢复高考后唯一的一次，可见当时社会对人才渴望是多么强烈。我的做法很冲动也很幼稚，轻易放弃这么好的机会，很多人为之惋惜。

见高中同学，有10多位分别被中国科技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医科大学、杭州大学等录取，心里不免惘然。考上温州师专中文系77级好友严正发话鼓励：“高考如同挤公交车，前一趟挤不上，下一趟说不定有好座位。”严同学后来考研至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再后来赴美留学。多年后相遇，我重提旧事。他说已经忘了说过这句充满哲理的话。

1978年高考是全国统一考试。因为视力原因，我转报文科，填报的大都是中文系、历史系。第二次参加高考有了经验，语文、数学和政治时间安排少一些，重点是复习历史、地理。才发现4年中学，居然

没有设置历史、地理课程！我根据大纲找资料，再靠一点平时积累，复习很顺利。

7月20日至22日，我再次进考场，落笔飞快，每科都提前交卷。最后一门地理考试前，彼此毫不认识的监考老师悄悄对我说，你考上大学很有希望。

考试后，估分350分左右，实际公布成绩5门功课总分361.8分，超过文科重点录取线50多分。其中数学估分60左右，实际73.8分，被杭州大学中文系录取。

好事多磨，其他考生陆续收到大学的通知书，都在准备上学了。我迟了好几天还没有收到，心里很是郁闷，又不知道找谁问。有好心人告诉我，可以去邮局问问。我赶紧赶往市区信河街的邮电局，问了一下，杭州大学录取书就摆在那桌子上。原来我家住市区河西桥50号，可杭州大学工作人员笔误成河西桥15号，正好是一条路的两头。邮递员把录取通知书送往15号，自然没人接收，只好负责任地带回去，虚惊一场。

四年大学生活如白驹过隙，匆匆而过。随着1998年大学合并潮，杭大并入浙江大学，世上再无杭州大学，母校之称也显尴尬。

40多年前高考，改变了一个普通公民的命运。大学毕业后，分配在温州市委办公室，从一个无业青年化身国家干部（公务员）。我先后在温州市级机关党委、团市委、市外经贸委、市政府办公室等单位工作，是一个典型的三门干部（从家门到学校门到机关门）。我珍惜这一切，一直努力谨慎工作，最后在温州市政协副主席、办公室主任任上退休。当年高考青年现已在安享退休，而参加高考的一幕幕却久久难忘。

（原载2022年6月20日《钱江晚报》）

[返回目录](#)

改变命运的天书

—杭州大学中文系78级 任晓岗

或许因为生性愚钝，对于这件改变千百万中国青年命运的历史大事，我当时的反应竟是十分的不开窍。

我上学的年代，从小到大的语文课，是从小“红宝书”一路读到雄文四卷，中间穿插着各种“停课闹革命”，上街游行喊口号，戴着“红小兵”袖章参加各种稀里糊涂的大会……至于《水浒》、《三国》、《红楼梦》等毒草，则是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偷偷批判的。中学物理课是拆装日光灯管和焊接电容器，考试却是开着手扶拖拉机在学校田径场绕跑道一圈，没翻进沟里就算你合格。生物课更接地气，一伙同学到学校后山坡上奉旨开荒，在生物老师的亲切指导下居然种出一只50斤重的大南瓜，被端坐主席台的校长（或者叫校革委会主任，记不真切了）开大会直接点赞：“学校食堂吃不了可以喂猪。”

被这种配方饲料喂大的我，你还指望我对国家民族命运转折之类的宏大主题会有什么真知灼见？

但年少轻狂，却是千年不变的。所以，我也要去试试。

那个年代要参加这类有政治待遇的事，必须由所在单位开介绍信，否则你连报名的资格都木有。领导和蔼可亲地告诉我：政审不合格。原因是老爸当时被关在一个不知名目的“学习班”里不知道学些什么。

从文革阴影中刚刚走出来的人，对这种权利被剥夺的事司空见惯。就在同一年，小镇有个买啤酒的人跟供销商店营业员隔着柜台掐架，一气之下拎起空酒瓶甩过去。营业员缩头一躲，啤酒瓶直飞墙上贴着的英明领袖像。画像破了！传说中的啤酒男为此蹲了五年牢狱。与此相比，没得考试这种鸟事是不是太小？

那么，洗洗睡吧。

1978年高考再度开张，那个关老爸的狗屁学习班早已散伙。本人此时算是身份清白。我拿着一张报纸去找领导。报纸上刊有邓小平“不能以任何理由阻止本单位青年参加高考”的指示。那神情，如同

手持一把复印版的尚方宝剑。但领导就是领导，很高明地把我打发到偏远海边的一个猪禽蛋小收购站蹲点工作，连报名的时间都木有。平心而论，这位领导其实是想培养我做接班人，多次苦口婆心劝我别走。我也信誓旦旦忽悠领导，我是一定考不上的，让我过一把瘾就断绝念想。后来，单位里一个官太太边上看得不忿，在报名截止前自作主张替我开后门办了报名手续。

海边渔乡偏远，既无复习资料，也无同学讨论，更无老师指导。每日天蒙蒙亮就早起要工作。我高中毕业后的工作是“半个杀猪佬”。半个的意思，是只做猪杀完后的剔骨、分割加卖肉，抡着一把半月形的精钢板斧（跟《水浒传》小人书里黑旋风李逵手持的那两把板斧很像），大约有3斤多重！一斧砍下，骨断筋裂。当然，按照师傅传授的刀法，猪骨是绝对不能乱砍一气的，斧刃易崩易钝，每天收摊后打磨斧刃就要吭哧吭哧半个钟头。每一刀下去，都要准确地落在各个骨关节的缝隙里，既省力气又不伤刀。

我蹲点的猪禽收购站有个技术能手，操刀十有三载，经他手所宰猪不下千匹，且手起刀落，绝无拖泥带水之弊，在方圆十里杀名颇盛。乡人戏称其为“天杀星”。

我奉上级令观摩并记录其刀技。有人煞有介事地手捏秒表，做体育裁判状。案场有一条中间凹下的杀猪凳，案板上排下数把奇形怪状的刀具。排刀之时，碰撞之声铿锵，百瓦灯泡在刀锋上映出一溜寒光。

有人吆喝道：“开始！”

随着一声猪嚎，猪厩方向突然窜出一匹猪，且嚎且奔。猪后跟出一条三十余岁的精壮汉子，上身赤膊，双手却戴手套，脚蹬半统胶靴，腰挂一串粗麻绳。

汉子瞄着仓惶奔走的肥猪。待其从脚边奔过时，暴起伸手跨步，闪电般揪住猪尾巴根，双手猛提，二百来斤的猪当即后脚离地，进退不能。汉子伸腿一拨，猪仰天翻倒，四蹄朝天。在凄厉的猪罗惨嚎声中，但见他一手抽出腰间麻绳，三两缠将猪后足绑住，深吸一口气，暴喝一声将猪掀上杀猪凳。抄起牛耳尖刀，从猪咽喉略下处斜向一刀插入直至刀身全没，略一抖腕，右脚顺便一勾，盛血木桶已移至凳下。

刀出血涌，霎时桶满。

刀刃沿猪鬃子娴熟地划了一圈，然后刀尖一探，砉然作响，骨节脱处猪头砰然落地。汉子抡起钢斧，一气砍落四只猪蹄，随即换刀，顺猪腹直拉一刀，并在猪腿内侧横挑四刀。与此同时，他已飞起数脚，将血桶、麻绳、蹄子、头颅诸物踢至一边。顺手拿过一把弯月形的薄刃剥皮刀，嚓嚓嚓，三拉四推加一个翻身，一张带毛猪皮已经剥下。汉子抓过两只钢钩扎住猪后腿，将裸猪挂上横梁，顺着中腹痛快淋漓一刀下去，猪腹豁然洞开，心肝肠肺赫然在目。他左手拽住内脏，右手略略几刀，内脏颓然委地。然后挥起钢斧咣咣咣几下，空中晃动的已是两扇净猪肉了。

从豕突到猪肉晃荡，历时5分26秒。

数年后我在大学里读得庄子的《庖丁解牛》，眼前就闪现出精壮汉子掷刀于案，悠然抽烟的场景。

而在当时，我唯一能看到的文字，就是一份迟到一天的地方报纸。唯一可能与高考沾边的是报纸上有关“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的文章。桌上的煤油灯在海风里摇曳着未知的远方。

在临考前的若干天，我终于回到小县城。

此时的小县城流行着一个奇观：街头会突然出现一排列队前行的中学生，在街上随机拦下一个人，既非公益募捐，也非游行喊口号，而是很认真的叫你当场背诵“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老长一段文字。而且有标准版本，不能背错。背不全？没事，站一边凉快着，听听别人是怎么背诵的。学生们一脸严肃地再拦下一个。于是街角渐渐聚起一群人，高矮胖瘦、男女老少，甚至会有年轻的军人，个个一脸懵圈……直到有个牛人终于一口气背全，学生宣布合格。哄，一伙人作鸟兽散。

我早已在海边把这段文言看得滚瓜烂熟，此时出街，简直相当于身怀绝技行走江湖。只是几次上街居然都没被学生拦住，很遗憾地错过了仗义行侠解救吃瓜群众的机会。

临考那天，我就这么一脸呆萌很没文化地走进考场。碰到监考老师时，脑筋一抽，说了句从乡下说书人那里听来的古话：“三年不赶考，考场出青草。”还自以为老到成熟，留下女老师张成O型的嘴。

打开政治试卷的一刹那，哦，卖糕的！其中一题居然就是完整默写那段关于四个现代化的文字。这个题目要是再答错失分，那可真是天理难容啊……

幸运的是，就这么中了榜单。

本地区那年的文科录取率是159个考生中录取1个，包括大专。奇葩的是，我居然在杭大78级中文系里语文单科成绩第一，全省单科第三。运气非一般的好！

当时还得知一个内幕：语文试卷成绩在本地批阅中得分是88.5分，到省里复审时，发现答案中的一个异体字是正确的，是当地老师不认识扣错分了，于是加上0.5分，变成了89分。……许多年里，我一直不明白那个异体字是怎么鬼使神差写上去的，毕竟连我的语文老师都不认识啊……直到去年在同学间闲聊时无意中涉及，才恍然明白。小学四年级逃到奉化尚田畈乡下躲避武斗时，那套古旧发黄的线装版《东周列国志》给我打下了底子！因为除此之外无书可读，我在一年时间里连猜带蒙地反复读了好几遍，对书里那些稀奇古怪的阴谋与爱情看得津津有味。同学惊呼：你小学四年级就进修了硕士生的课好吗！

读完线装版《东周列国志》的另一个副作用是，武斗结束回到小学原班级时，感觉那些课程简单肤浅到令人想要撞墙。记得我回家告诉母亲这个情况，母亲就带我去见学校领导，向学校的校长提出一个很奇葩的要求：直接向上跳一个年级，没有理由。

小学校长吃惊之余，当场汇集办公室里几位老师，考了我若干道形同面试的问题，在我的对答如流中跳级成功。

感谢远在天堂的奶奶。那个书荒年月里，城里没有书，乡下更没有书。读野书更是一件要挨批斗的高风险举动。但为了满足我喜欢看书的怪癖，她迈着一双小脚，在奉化尚田畈乡村的各个角落里挨家挨户找书，竟奇迹般地从一个个落魄乡绅家借来了整整一套线装版的《东周列国志》，让我第一次知道书居然可以这么装订！上个世纪初在苏

州读到小学四年级的奶奶告诉我，她也看不懂这堆线装古书。但她以多年积累的做人信誉向落魄乡绅保证，这套书一定完璧归赵。所以对我的严格要求是，一不许告诉任何人，二不许弄破一页。否则，鸡毛掸子伺候！我无法想象她是怎么判断这个12岁长孙，可不可能啃得动这厚厚一摞古旧泛黄的天书？

但我居然啃下来了。

因为那年头……实在无书可读。

命运之神的出手招数，就这么令人猝不及防。

（原载2022年6月21日《钱江晚报》）

[返回目录](#)

十六岁的高考

—杭州大学中文系 78 级 应沪晨

16岁上大学，与32岁的长者成为同班同学，这在新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罕见的现象，竟让我们遇上了。

1978年7月那个炎热的夏天，我走进了高考的考场。那天，我刚16周岁零两个多月。

我们上高中是推荐的，先根据学生在初中学习时的表现确定为四类。我当时虽被定为二类，但母亲单位里职工的子女中与我同龄的很多，我勉强够到上高中的条件，真是幸运。我同学的妹妹，初中时是班干部，人长得漂亮，才艺都不错，只是因为哥哥已经得到推荐上了高中，她就不能再轮到了。不能上学，只得去学工，她是在医院学工的，之后就以初中生的身份参加工作，再后来嫁了个男的也不怎么样。十多年前，她丈夫参与重大盗窃，被我亲手办理批准逮捕，之后被判了十余年的徒刑。她自觉无颜对人，也离开干了几十年的单位。令人唏嘘。

高一的时候，县里将县中学一分为二，我们去了新的学区。这个学区原来是个供人烧香拜佛的宫殿，后来成为了“五七”高中，才建了几座教室和宿舍。因此，修建学校的各类设施，成为我们每个星期的重要活动。平整操场、修建池塘、勤工俭学搞小秋收等等，都等待着我们去完成。我们能够在新教室里听课，可能还是得益于学校领导觉得我们会很快地离开学校。

从中学开始的每年暑假，我都得听从父亲的安排，去打点小工补贴家用，同时也是为自己挣回下学期的学费和文具用品。高一那年，我用打工的收入买了一支钢笔，一直用到上大学。可惜有一次因别在胸前在挤公交车时被折断了。那时，我的饭量是急剧增加的。家里中晚餐每顿只蒸两盒铝制特大号饭盒的五人份的米饭，有时就会被我一顿吃掉一盒，于是挨骂是少不了的。

高一开学时，我还是穿着补过膝盖的裤子上学的，当时我的身体正是拔长的阶段。在两个膝盖破洞处补着的一块小的布，不久就因太紧绷，在连接处撕开了，于是我找了两块比原先大点的布更换上去，但不久依然又在连接处被撕开，如是几次后，裤子前半部分已基本不是原来的面貌了。所幸的是，我家里有一台缝纫机，足以让我操练手艺。过了一段时间后，母亲给我做了两条新裤子，想不到一直穿到了我参加工作后才添了新装。高中的四个学期，我的品德评语最好的一条就是艰苦朴素，这也成为我在高中四个学期被评为三好学生的一个有利的因素。

不仅是外面的长裤，里面的短裤也是差不多。臀部也是一补再补的。有一次学校开运动会，我参加了班里的4×400接力赛。当时同组的三人都已经脱下长裤，只着短裤准备就绪，我还在为要不要脱长裤而纠结。一直到最后要开赛了，我才脱下长裤，只着补了两块大补丁的短裤上场。在我接棒跑到班里同学座位附近区域时，班里几位面容较好的女同学在大声喊着加油加油。我生怕被她们取笑，更是加快了速度。最后我们组取得了第一名的佳绩。事后，也没有听人对我说过此事。我想，大概班里的同学生活水平大部分也是不差上下的关系吧。

我们上高中时，恰逢“文革”结束。由于教育模式基本未变，我们继续着那种“半工半读”式的读书生活。在这过程中，我们学会了竞赛似地写作一篇又一篇日记式的“学习体会”，让老师在课堂上大声朗读以供同学们欣赏；学会了抄袭大报小报上的批判文章，并贴到墙上，显示自己的政治觉悟；学会了把完整的柴油机拆卸开来，然后摸索着安装回去，让柴油机发出异样的运转声并喷出乌黑的浓烟，哪怕是被熏得满脸乌黑还是手背被擦破皮；学会了将一个个小小的电子元件组装成简陋的收音机，让它发出电台播音声和其他怪叫声，由此向其他同学炫耀，从中享受到无限的乐趣。我还将自家和邻居家无用的铁挂锁收集起来，取出弹子，重新配上钥匙，使之有了新的使用价值，把废弃的锯条磨成雕刻刀，夹上竹片然后缠上布条，用青田石刻了多枚印章，盖在自己收藏的一百多册连环画上。我参加了学校组织

的射击训练，取得了5发46环的优良成绩，获得了县体委颁发的射手证书。我不知道，少年的精力到底有多少旺盛！

我还试着仿写电影剧本，向语文老师求教；编的一个相声在班里的文艺汇演中，引得同学哈哈大笑。刚刚恢复的高考，对我们来说，还没有形成像后来这样成为学生沉重压力的负担。

记忆中的高考仿佛是在不经意之间到来的。1977年的高考前，我们班的班长、团支部书记和我三个人一起上县里的模拟考场去考了一次。当时我自己的感觉是除了没学过的内容，试题大都能答得上来。但学校最后没有让我们参加真正的考试。大概是为第二年的上线名额考虑吧。

1978年的春节后，我们迎来了高中的第四个学期（当时高中是二年制），学校将我们这一届分成了文理班。在几位看重我的老师的惋惜声中，我选择了文科班的学习。实际上，让一个未满十六岁的少年在几天内选择人生的道路，真有些残忍了。我妈妈得到消息从乡下赶回城里时，一切都已成定局。因为她是想我接她的班当医生，我学文科则与她的愿望彻底地告别了。而在当时的我看来，只是选择了一种自己学习兴趣更浓的方法而已。高中的两年里，我所在的班先后换过四位语文老师，所幸的是，他们都是对我寄予厚望的。

至今我依旧怀念当年充沛的精力。每天早上四点多起床，外出跑步半小时，然后回家烧好早饭，吃好后上学。我坐进教室时，住校的同学才开始起床、晨跑。由此，我每天比他们多了一至二个小时的学习时间。一学期下来，我背下了整本成语词典。

学校为了抓成绩，在我所在的班选取了几位成绩尚可的同学开小灶，还专门给我们几个同学安排了一个小教室，想让我们得以更专心地学习。只是我们少不更事，常常把时间花费在讲笑话、打趣上，惹得管理我们的老师怒火中烧。我还禁不住做些散漫的小动作。有次晚自习结束后，偷偷地与几位同学溜出学校看了一场电影。父母因我到时间还未回家，去学校找了，没找到我。等我回家时已是晚上十点多钟，他们在家里等得已经快疯了。我私下向班里的同学借些当时的“禁书”，如《青春之歌》、《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封

神榜》、《水浒全传》等。这些书页都已发黄的长篇小说，都是在晚自习结束带回家偷偷看完的。这在当时让老师可能认为多余的阅读，在我以后的生活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青春记忆。

至今记忆犹新的是，语文考试中第一大题的填空题，5 个小题我答对了 4 题，如“披露”“伫立”，现在已是寻常之词，但在当时考试中，我是不假思索就填上的。考后与其他同学对答案时，他们都说不曾听到过这样的词语。这些可能就是平时在阅读的过程中无意识地积累下来的。

作文是缩写文章。我在考后对照答案，7 个论点让我选中了 5 个。说到这里，我仍然觉得当年在高中的前三个学期中，通过学习《毛选》里的许多文章，有很大的收获。这样的学习，让我在分析文章的过程中，语文水平不知不觉中得到了提高。特别是有一个学期的后半期，语文老师因故无法继续给我们上课，作为语文课代表的我，只得将积压着的全班同学的作文进行了批改，并在每篇作文的后面加了批改意见。大概我的批语比较老成，有的还带点鼓励，许多同学都以为是哪位老师批改的，竟看得心服口服。

在体检的时候，我的身体当然是倍儿棒的。只是体检的医生更为仔细，发现了我的轻微平底足。这在现在当然不算个事。因为我自己知道，高中的体育成绩是全优，特别是每天的长跑让我的耐力比一般的同学更为有劲。因为那几年的长跑锻炼，身体达到了一个最佳的状况。我的年龄虽属少年二组，但各项成绩已达到了青年组的水平，同时获得了少年二组、少年一组和青年组的体育锻炼达标证章。体检的医生对照体检标准，认为我不宜报考舞蹈类专业，于是一本正经地将限报舞蹈类专业的条子贴在我的体检表内。如今，我的干部档案里还留存着这张让人啼笑皆非的东西。十多年前，组织部门在审查我的干部档案时，还发现里面没有我高中学习登记表的内容，让我回母校去取。让我意想不到的，直到现在，校园里居然仍有关于我的传说。

说实在的，当时我们年纪小，还没有对自己的人生有什么规划。相对于一起参加高考的师兄学姐们，我们这些应届生无论在思想上还是经历上都单纯得像一张白纸。我当时还没有去想过，如果考不上大

学，今后的人生该怎么走，因为这不是我这样一个孩子所能考虑的事。反倒是长辈们着急在心里。在等待高考成绩的那段时间里，妈妈碰到校长就要问自己的儿子能不能考上大学。可校长又怎么知道成绩？于是聪明地回答：你儿子如果考不上大学，学校就没有学生能考上大学了。这话说得妈妈好开心，以后的日子里她还常常说起。到了邮递员老张叔叔送来录取通知书，还没拆开信封，妈妈就自信满满地说：“是杭州大学中文系。”然后从家中拿出一包喜糖送给老张叔叔。原来，妈妈虽然心里着急，却早已准备好庆贺的礼物了。

1978年10月15日，我带着中学的八册语文书，在哥哥的陪同下，进入杭州大学中文系，开始了人生中最美好的学习生活。那年我才满16周岁，还不知道今后的路会怎么走，但能让我继续读书，是我心中最美好的愿望。因为我太喜欢读书了。那时，我不知道除了读书外，我还要干些什么。特别是到了大学后，才知道自己还是多么的无知，只有发狠地读书，才有可能赶上其他同学。四年的时间里，我用完了三本学生证上借书的格子。

四年的大学学习生活很快地过去了。40年前7月的那个傍晚，我拎着一点可怜的生活用品，告别了曾经留下许多青春幻想的校园，披着夕阳的余辉，落寞地踏上了未知的社会。参加工作后，我还先后获得了法律专科、本科等专业的文凭，只是当年16岁的高考经历更让我的记忆充满着青春的味道！

（原载2022年6月30日《钱江晚报》）

[返回目录](#)

两个梦想，两件“牛事”

—杭州大学中文系 78 级 郑广宣

少年时的我，有两个梦想：一是参军，当一名为青少年所敬仰的解放军战士；二是上大学，做一名大学生。我知道只有读更多的书，掌握更多的知识，才能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也才能更好地实现自己的理想。

我的上学读书之路，比较坎坷。1958年，国家颁布总路线，开始大办工业，大炼钢铁，绘制了赶英超美的蓝图。借此东风，我家从上虞农村迁到父亲工作的余姚陆埠。1959年，我在陆埠上了小学。当时正值教育改革，变成春季招生，我虚龄7岁，足龄才5岁半。母亲对老师说，我在家里已经认得好几百字。经过小学一年级教材当场测验，我才报上了名。

开学后，课程中居然有一门俄语。遗憾的是在学了一句俄文“我们爱祖国”后，老师就因病请假，后来则是调动，我们的俄语课也就此结束。直到1969年参军，准备与“苏修”打仗，再学战场俄语。每人一个小册子，七八句话，有“缴枪不杀”“我们优待俘虏”等等。但喊过的这些俄语口号也不知道准不准，因为大家连字母都不认识。

我们家团聚后不久，就赶上了“三年困难时期”。英没赶上，美更不知在哪里？粮食储备越来越少，开办没多久的“全民食堂”难以为继。于是政府又号召“大办农业”。因“大办工业”而进城的我们，又被号召回农村去。我回到上虞老家读小学，那是1962年。

所谓的学校，只是一所老房子，楼上楼下两个教室。两个老师教着三个年级，三个年级也就二、三十个孩子。而且都是用方言教学，与陆埠镇小的普通话教育无法相比。好在一年后就转到公社中心小学。

中心小学离家五六里路，经过三个村子。那路，少数地方铺着石板，大多是泥路，下雨天常会脚下一滑，就得用身体去丈量田埂。那时家里没有雨伞，只能戴一顶直径80厘米左右的大箬帽，斜风细雨能

把胸口以下部位都淋湿，裤子则跟水里捞起来一样。每天大清早就得起来，来回都是走路。在大冬天也是如此。

上虞的冬天很冷。我在当兵前没有穿过棉毛衫裤，也没有穿过绒衣绒裤，更不要说毛线衫裤了。我们那边有句老话：今年还是旧（去）年好，两件布衫当夹袄。我曾想要一条绒裤，我母亲拿出一条高腰大裤腿团起来系裤腰带的夹裤给我。一个正值青春期的少年，怎么会愿意穿这样的古董？所以我常常穿两条或三条长裤过冬。天气稍暖和一些，就赤脚上学。好在乡村学校对此并不计较。

记得学校黑板报有篇表扬稿，写“最远、最小”却最早到校的事。其中“最远”写的就是我，因为我上学的路途最远，而到校最早。常常我到学校了，老师们才起床，有时甚至还没开校门。

1962年的某天午后，我忽然感到内急，赶紧到学校边上的露天粪缸。坐在缸沿上，就是排不出来。边上的同学坐下去不久，就痛快地解决了，那些秽物落在粪水中，发出“呜呜”的声音，在憋得满脸通红仍不能顺遂的我听来，宛如一首美妙的乐曲，甚至都有点羡慕别人能拥有溅到屁屁上的那点水珠。同学来一个又走一个，我在缸沿上坐了近个把小时，仍未能如愿。终于有人去告知了我母亲。母亲来了，说，那怎么办？先回家吧。我拉提着裤子，翘着屁屁，跟母亲一起慢慢挪动着。大概是因为这挪动，终于让那秽物出了口。那一刻的轻松，真是难以用言语描述。

这回事的原因，是那几天一直吃狼箕根（蕨菜的根茎）做的食品。当时农村粮食奇缺，村民只好上山挖狼箕根、红藤刺根（金刚刺的根茎）磨粉充饥。味道尚可，就是吃后干结，排便不畅，非常遭罪。

关于读书，记得母亲说过，你要好好读书，你小伯（小叔）没读多少书，都做了大队会计。等你有了文化，难道还不能做个大队会计？这话很淳朴，也很实在。

临近小学毕业，一次去办公室找班主任，偶尔瞧见老师对我的评语，在是否可以保送一栏，老师填的是“保送”。不过我仍然到镇中参加了小升初考试，顺利考上了丰惠中学。

1965 年秋，我上了初中，却又碰到了新的教育改革。学校实行“半农半读”。入学通知要求报到时带一把锄头。在之后一年中，每周至少有一天参加劳动，填湖造田，开地种菜。所教的东西非常有限，不记得语文学了什么，数学只学到二元二次方程组，生物课为“农业基础知识”所代替，物理、化学则未曾接触。

但这半农半读也只维持了不到一年。1966 年“五一六通知”发布，学校就开始了“停课闹革命”，破“四旧”，大批判，大字报，大串联……学校里只留下冷清的教室，寂寞的书桌，没有了朗朗的读书声。在折腾了一年多之后，我就回到村里参加劳动。又过了一年，1968 年，学校忽然来了通知，让我去拿初中毕业证书。这不仅宣告我中学生活的到此结束，同时也意味着大学梦的破灭。

2017 年初，我们初中毕业五十周年同学聚会，在纪念册里，我写下这样一段话：“在共和国的教育史上，有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的名字叫做‘老三届’，包括了应在 1966—1968 年毕业的全部初高中毕业生。‘老三届’中的 1968 届初中毕业生，无疑是这个群体中最无辜、最可怜的一群人。他们只读了一年初中，就懵懵懂懂地参加了‘史无前例’的运动，糊里糊涂地拿了一张初中毕业文凭，无可奈何地回家种地、待业、下乡。”

我，就是这个可怜的群体中可怜而又无奈的一员。

就这样，初中尚未读完，连高中梦都未做成，我就得回队参加劳动了。

其实农村孩子干农活，大多在未成年时。我也一样，十二、三岁就在“农忙假”时到队里干活。跟母亲去劳动，在属于母亲的田条后半段插秧，算我母亲的工作量，工分也记在母亲名下。此外还有拔秧、割稻、摘豆等等，凡是母亲做的活，都帮上一把，可以多记那么一两个工分。

等我 1967 年放下书包，正式到生产队劳动时，一切就得按社员的标准了。父亲长年在外地工作，没人关照，队里只给我 4 个底分。到 1969 年年底应征入伍时，我也只有 8 分，但干着其他社员一样的活。出牛圈（把牛栏粪挑到田里）、挑猪粪、担人粪、挑草浆河泥，这些

担子都在 150 斤上下，要走过狭窄而又滑腻的田埂，倒在田里。然后用双手抓起这些猪粪、牛粪、草浆河泥，捏碎抛撒。一天下来，腰酸背痛，而手上的恶臭则是怎么洗都洗不掉。

更恶心的是耘田，那时都是跪着耘的。插秧时一行 7 株，耘田时就骑跪在中间那株两侧，左右各 3 株，用手松土、拔草、删稗草。有时耘田前先撒了粪肥，那个味道可想而知。但祖祖辈辈都是这样干下来的，也只认“没有大粪臭，哪来五谷香”的理。每一块田稻都得十天半月耘一遍，到第三遍时，稻苗已经很高。如果前面没有一个用竹子编的苗托，稻叶尖有可能扎到眼睛；胯下没有一个同样用竹子制作的类似骑马鞍那样的苗骑，大腿两侧一定会被稻苗的毛刺割得伤痕累累。

当然，最累的还是双抢割稻。弯腰割稻，直腰在稻桶上打稻。一稻桶打满，已经精疲力竭，饥肠辘辘。时近正午，烈日当空，气温升高，还必须把一担近两百斤的湿谷挑回队里晒场。至于田里的蚂蟥，到处游走的水蛇，更是司空见惯的。我的双脚，至今都留有蚂蟥叮咬后的伤疤。

因上过中学，根据“形势需要”，队里常派我去出墙报、刷标语，参加宣传队的节目编排、演出。有一段时间还被公社抽调去专门搞“大批判”专栏，也算仍然做着与文字有关的事，可以暂时脱离繁重的劳动。

虽然上学时间不长，也没多少书可以读，但对读书的渴望却似乎是与生俱来。只要有书读，不管是什么书，都是不会放过的。当时家里有《林海雪原》、《烈火金刚》、《野火春风斗古城》等。我从小学三四年级开始，直到去部队，每本都看了有三、四遍。有一次在朋友那里看到一本首尾不全的《水浒》，如获至宝。要求三天归还，我三天里居然一口气看了两遍。

大学梦似乎远离了我，幸运的是，参军梦悄然来临。

1968 年，我 15 岁，第一次应征参加体检。因长期营养不良导致脾脏过大，未获通过。1969 年初，再次报名应征，却在体检前患腮腺炎发烧了三天。烧退时，体检也结束了。半年后，再一次应征，大约是

事不过三吧，终于通过体检，圆了我的参军梦。当年12月，我离开家乡，北上山西到了部队。

我们部队是坦克团，要求甲级身体。同村入伍的伙伴，因身体略差，只能去炮兵部队，对我好生羡慕。新兵连训练结束，我并没有分配到坦克营，而是去了摩托化步兵连。问题是代表“摩托化”的装甲车，直到五年后才得以装备。我们只能进行步兵训练，在训练场摸爬滚打，练射击、练投弹、练战术配合。夜间的紧急集合是常事，我从第一次紧急集合用时十几分钟，到后来能够在三四分钟内打好背包、全副武装到达集合地点。有意思的是一次紧急集合，一位战友竟然把军裤前后穿反了。后来那位当炮兵的伙伴来信告知最近到哪里训练打炮，我感慨我这个坦克兵还不如他这个炮兵。

更惨的是我们这个连队一直担任着坦克团边边角角的工作：在太行山上国防施工埋电缆，到部队的“五七”煤矿挖煤，自己动手建造营房……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真正用于军事训练的时间并不多。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即使有一万个想不通，也必须执行命令。

部队的主业是军事训练，站岗放哨，以及国防施工、营房建造等等。当时，战士要获得提职、提干，除了军事素质要过硬，日常生活表现突出，还得有文化知识。所以大家都努力展现各种特长，“要求进步”。

部队在吃饭前、开会前、军事训练前必须列队唱歌，行军也会有歌声；八一节、春节都有自编自演的小汇演；有独有的饭堂广播（即根据学习的内容在大伙吃饭时读所写的体会，表扬好人好事等）；还有黑板报、墙报；各人自己的工作总结、思想汇报；等等。但当时的战士，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其中有一部分还是文盲，不会写信，也不能读报。记得一个山东兵到卫生员那里看病，说：“卫生员，我喉咙有点痛，是不是流氓性感冒引起的半导体发炎？”连队的几个高中生，因为比较内向，不太积极，也不敢承担。我这个初中一年生就有了表现的机会，如出黑板报、办墙报、参加文娱演出等等。

一年后，连队原文书调任，我被推荐担任。之后，我给战士上文化课，为连队写各种工作总结报告，组织战友读书，编导文娱汇演的

节目，教唱歌，等等。在这个过程中，学到了许多文化知识，提高了组织能力。

同时利用一切机会来读书。自1970年庐山会议以后（就是提出不设国家主席的那次会议），传达了伟大领袖“要读点书”的指示，以及劝许世友要读五遍《红楼梦》的话，我们所读的书就不只是“老三篇”和“小红书”了。当时所有图书都由我管理，凡是当年配给部队的书，都能拿来读。《红楼梦》大概读了三、四遍，鲁迅的杂文选和《呐喊》、《彷徨》，还有《艳阳天》、《金光大道》之类“样板”小说，可以经常阅读。但类似后来中文系开的“必读书目”中的书，几乎是碰不到的。记得为了写新闻报道，自己买了语法修辞逻辑的书，这些知识后来在高考中派上了用场。

1973年，我第一次回家探亲。好像是在火车上听到一个新闻，说的是“白卷英雄”张铁生“反潮流”的事。于是心里一动，已经破灭的大学梦有些微复活的征兆。伟人作出“大学还是要办的”的最新指示，但指的是“理工科大学”，而且提出“学制要缩短，教学要革命”。接下来采用的是推荐上大学的方式。那些被推荐者，也有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名称——工农兵学员。我心里暗忖，不知道有没有可能做一个工农兵学员？

1976年10月，我最后一次回家探亲。返回部队时，与来杭州结婚的排长约好在杭城见面。他们夫妇带我爬了宝石山。排长指着北面那一片房子说：那里是杭州大学。这时，忽然有一个念头在心里闪过：能在杭州大学读书，毕业后在杭州生活，应该是很不错的。想不到的是，这个一闪而过的念头居然在两年之后就成为了现实，也许冥冥之中有定数吧。

1977年3月，我从部队复员，回到上虞家乡。公社正在搞推荐上学的事，大队书记跟我说，今年已定了推荐某某。你迟早总是要被招工的，所以……我当然只能点头说：“晓得，晓得。”接下来，在大队也很受“器重”，以各种名义参加外面的活动。曾经为生产大队查账、外出讨债，参加县里组织的《毛选》第五卷的学习，甚至参加在外地举办的沼气池培训，等等。我理解他们的想法，村里领导总得为

村里争取更多的资源。如果我有了工作，村里就少了一个争食的人，而对我自己来说，则是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

没多久，公社中学要招民办教师，大队里便把我推荐到了教师的岗位。于是有了我人生中的第一件“牛事”，——一个只上过一年半农半读的初中，在部队当过几年文书的复员军人，居然担任起了初中二年级的语文教师。

1977年10月，报载国家恢复高考。消息突如其来，大学梦忽然就在眼前，我当然是喜不自禁。那时，学校一般的年轻教师，大多高中毕业，个个跃跃欲试。但正式报名时，居然都选择了中专，这叫我这个只读了一年初中的人怎么还敢去报考大学呢？于是也稀里糊涂跟着报了中专。

当我走进中专考场时，顿时抓瞎了。中专考语文、数学、政治、理化。我语文可拿到七、八十分，政治应该能及格，但数学和理化一点都不懂，只能交白卷。考试结束，我就知道必然名落孙山。连后悔都可以省了，因为没资格。

转眼间，1978年的高考，又紧锣密鼓地开始准备了。这时候，我打定主意：就考大学。大学分文、理科。文科考语文、政治、数学、历史、地理、外语（外语不计分，可以不考）。即使把数学丢弃，只要四门课每门70分，也可以考到280分。主意已定，我就利用做教师的便利，一边教课，一边抓紧复习。

我采取的策略是：不在数学上花太多时间；语文自己在教，不用专门复习；重点放在政治、历史、地理上。我今天把一个洲的教学地图挂在办公室墙上，记地形、记国界政区；明天再换一个洲；接着又换上历朝历代的历史演进图标、重要事件、重要人物。

当时，我父亲在余姚陆埠中学兼任“工宣队”队长。他为我和应届高中毕业的弟弟搞了一套油印复习资料。资料纸质很差，字迹模糊，但十分紧俏和珍贵，因为七门功课齐全。兄弟俩如获至宝，一个考文科、一个考理科，各取所需，一起复习。

7月20日开考。考场就设在隔壁公社的中学里，监考的还是较熟的邻校语文老师，因此比较镇定。待卷子发下，大致浏览后，就开始

答题。感觉这试卷并不难，往往一答题就可以连续不停地书写。规定两个半小时，花了两个小时就基本答完，再检查一遍，就交卷了。

有意思的是数学考试。我拿到试卷，从头到尾翻一遍，觉得一个变形的圆柱体公式题和一个因式分解题还可以做，其他都不会。没什么可选择的，就埋头做这两题吧，竟然被我做出来了！后面还有一道十几分的平面几何题，曾经听教数学的同事讲过类似题目。他在办公桌上给我们一帮青年教师演示过，感觉这题也可以做做看，就把这题也做了。只是人家七八步做完，我做了近三十步。其他都不会，也看不懂，就交了卷。不想监考老师看我的数学试卷步骤非常清楚，其他试卷也都写得满满当当，一考完就跟我们学校的同事说，你们这位语文老师肯定没问题。——这是同事后来告诉我的。

知道高考成绩，是在 8 月份。那天去村边河里游水，碰到公社植保员。他告诉我，成绩已经到了，是 330 多分。我说：“真的假的？”他说，当然是真的！还说了几个一起去考的人的成绩。那么消息是确实的了！我抑制不住兴奋，要想掩饰一下不把笑容露出来都难。真的体会到了什么叫“喜形于色”。

第二天一早去公社拿成绩单，可以根据考分重填志愿。我的成绩语文最好，后来听说是全县第二名，82.5 分，所以填报了杭州大学中文系。让我觉得最不可思议的是，我打算放弃的数学，竟然得了 21.5 分。正是这 21.5 分，使我达到了杭大中文系 330 分的分数线，顺利录取，圆了我的大学梦。

一个只读了一年初中，离开学校 12 年的学生，一个考中专没戏的考生，居然考取了大学！事后想想，确实是一件人生的“牛事”。

10 月 2 日，收到录取通知书。10 月 17 日，到校报到。

入学后，才知道我的同学有多厉害。在寝室里见到的第一位同学张晨曦，语文 85 分；后来又知道同组的任晓岗，语文竟达 89 分，单科浙江省第二名；还有数学 90 多分的、满分的，地理 96 分的……

还有一位樊诗序同学，只是小学毕业。据说，当他看到有同学还在看高尔基的《母亲》时，说这就放心了。因为他虽未上过中学，但中文系“必读书目”中的书，大部分他都读过。后来我们同寝室，与

我的床铺前后相连。他的床铺是最有读书人特色的：床头、床边的墙上、上铺的铺板上都贴满了日语单词，以保证睁开眼睛就能学习并记忆单词。

真是“牛”人如云啊！而我在进大学之前，却连莎士比亚、托尔斯泰都不了解，可见我在面对这帮牛气冲天的同学时的压力。

我们78级和早我们半年进校的77级的读书热情，据老师的评价，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用废寝忘食、夜以继日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同学中洋溢着“把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的读书豪情。

三十年后，我与我的老师说起来，他们都感叹：77、78级那样读书的盛况是再也不会有了！

记得当年同学中，吴存存同学在二年级时就通读了《史记》。最典型的是钱志熙同学，经常读书到深夜。晚上10点左右回寝室，说看书看得累死了，休息休息，背两首唐诗。钱志熙同学后来成为北大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确实是刻苦努力的结果。

同学们如饥似渴、唯恐自己落后的学习热情无时不在鞭策着我。我唯有抓紧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多读一点，再多读一点，以免掉队。那时候，挂着红字白校徽的我们，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无论是买饭排队，还是饭后散步，甚至坐公交车、上厕所，手里无书的时候是非常罕见的。这样的情景，终于在移动网络普及的时候又重现了。——只不过当年我们手里的图书，变成了现在的手机。

四十多年过去了，好像很远，似乎又很近。我该庆幸，我这样一个曾经连棉毛衫裤也穿不起的穷小子，居然在不经意间实现了人生的两个梦想。特别是我的高考，成为我人生中最大的一件“牛事”。但更使我终生难忘的是，在四年的大学生活中，结识了一帮牛气冲天的同学。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很多。

感觉更为幸运的是，我们当年的教师阵容相当“豪华”。夏承焘先生还是中文系的教授；王驾吾先生是我们的系主任；姜亮夫、孙席珍等老先生都给我们开过讲座；蒋礼鸿、徐朔方、沈文倬等老先生是我们的任课老师；郭在贻、吴熊和、蔡义江、王元骧、汪飞白、王维贤、倪宝元等先生正当壮年，是给我们上课的主力。他们深入浅出的

讲解，妙语连珠的演说，带我们走进语言和文学的殿堂，开启了学术之门，为我们毕业后各自的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老师们给予我的更多。

匆匆四年，师恩如山！师恩永不忘！

（原载 2022 年 7 月 11 日《钱江晚报》）

[返回目录](#)

招飞未成，我进了杭大中文系

—杭州大学中文系 78 级 沈卫东

1976 年秋，我 14 岁，从舟山小学附属中学（俗称“戴帽中学”）升入舟山中学，划区就近入学读高中。

舟山中学是舟山最好的中学，有很强的师资力量。但当时仍在“文革”末期，教学上学工、学农一大堆，正规课程却没多少。

入了学还没进教室，就安排去学工。在定海港务局装卸区，给舟山至上海的“815”客轮搬番薯到货舱里。一大麻袋番薯，约一百斤重，工人师傅两手一拎，扛起来就跑。我们脚细手软，根本扛不起麻袋，只好两个人扯着袋角，半抬半拖。抬得两、三趟，就躲到麻袋堆起的小山背后，偷个懒。从破了的袋洞里掏番薯偷着吃，也是偷着乐。

76 年的秋天，真是多事之秋。先是毛主席逝世。噩耗传来，全国人民都处在极度悲痛之中。过得不久，又传来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我们这些毛头小伙子，政治上的事情似懂非懂，学习上的问题过关即可，满脑子想的都是上山打鸟，下海捉蟹，约上要好的同学去打篮球，骑自行车。

高中一年级在迷糊之中就过去了。九月里升为高二。返校不久，隐约传来恢复高考的消息。我们不大明白其中隐含的意义，更不知道它将给一代人带来命运的改变，但还是能感受到各方面都有明显变化：课程调整了，学工学农活动全部取消，教学内容变了，教师上课认真严格，作业大增。年级里，先是按成绩重新分班。接着，又对文理科作了分班。

回到家里，气氛也明显不同了。一面好吃好喝伺候，增加营养；一面经常查问学习情况和测验成绩，不停唠叨上大学的好处，还拿考不上大学就要去下乡插队来威胁。——我们这个年级出了两个另类，都是我的玩伴，居然在 77 年冬天去插队落了户。

另外，家里人通过各种渠道，弄来各地、各校的高考复习资料 and 习题。很多还是那种黄草纸的粗糙纸张油印、复写的，给我加餐加料。

舟山中学 1976 级一共 10 个班，前 5 班为甲段，后 5 班为乙段。高二时，根据成绩分为快、中、慢三班。最优秀的学生进快班，甲段的在 1 班，乙段的是 2 班，配备上最好的教师。两个快班的学生在 78 年高考时大都考上了理想的大学，说明学校“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策略是正确的。

我最初在 4 班，重新分班后，班里七、八个学习达人去了 1 班。我则到了中班，也就是 3 班，是理科班。不久之后，我就明显感觉到被快班抛下了一大截。凭我们班的这个程度，考上大学基本没可能。后来高考的结果也证实了我的判断：中班全军覆没。

说到这里，插一个段子：分到 3 班后的某一天，来了个插班生，跟我同桌。自我介绍是 76 届复读生，来此听课备考。他戴了一副近视眼镜，皮肤白皙，身材瘦削，文文静静。简短交谈，显得知识丰富，谈吐从容，让我心生羡慕。下课后，他站起身来十分笃定地说：我看你们这个班，没有一个能考上大学的！说话之际，他的右手颇有气势地从左至右一划。那种斩钉截铁而充满自信的样子，犹在眼前。——这位同学，就是后来考入杭大历史系、自称捡了中文系的“漏”的、沈澜同学明媒正娶的洪朝辉先生。

理科成绩不理想，考上希望渺茫。徘徊之际，传来了文理分科的消息。对我而言，不啻是一个福音。

我出身在一个军人家庭。但祖父是乡绅，曾在上海法租界给法国人当过教师。父亲原是乡师毕业，投笔从戎之前做着小学校长，从军后也一直是文将。父亲写得一手飘逸灵动的毛笔字，竖排行草，笔走龙蛇，经常让我们几个在外的兄弟捧着来信，费一阵猜测揣摩，纵有怨言也不敢流露。

我从小给父亲铺纸磨墨。在他的要求下，小学二年级就开始写日记，跟着老爷子翻看《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人民前线》，还有“大参考”、“小参考”。闲书中最喜欢的是一本文革前出版的厚厚的《中国古代神话传说故事》，还有一本朱可夫的自传，叫《回忆与思考》，津津有味看了好几遍。从小学起，我一直是语文比较好，作文写起来顺手。写得最多的是大批判、学习体会之类的文体，但多

少也锻炼提高了阅读和写作的能力。凭着这些，在征得家人的同意和老师的意见后，我报名转到了文科班。

文科要考历史和地理，而中学里从来没有开过史地课。我都没有历史、地理的概念。无奈，只有压缩语文、数学、政治等课程的时间，把大部分时间用来看历史、地理书，做史地习题，甚至上其他课时也只管看书做题。有一次被任课老师发现，受到批评，并被告到班主任老师处。幸好班主任对我比较宽容，只是轻描淡写讲了两句，嘱咐不要太过分，就算放过了。

文科大班有八十多人，成绩较差，大多自认升学无望，得过且过。老师又从中选了十个成绩比较好的学生组成了一个小班。我也被选中了。于是每天晚饭后再去学校加课，评讲作文，完成作业和习题。

高考前还有一个插曲：招飞。当一名飞行员，翱翔在祖国的蓝天，是我从小的梦想。我二哥 71 年参军，是东海舰队航空兵雷达团，驻扎在慈溪。有一年回家探亲，送给我一架巴掌大的银色铝制歼六模型。那个年头玩具少，这架模型飞机成了我的最爱，放在书桌上，想象着自己驾驶雄鹰翻滚俯冲。有时还放在书包里带到学校去，在小伙伴们面前炫耀。所以，78 年的五月，学校通知有招飞体检，我毫不犹豫就报了名。

家里人估计我也就是响应一下国家的号召，以我这个身体，不大可能通过严苛的体检关，就含糊同意了。一直到我通过了县里和地区两级初检，要到宁波参加省里统一组织的复检时，老师和我妈妈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班主任李老师找到我妈妈，严肃地说：沈卫东如果去招飞，回来就不要到我班上参加高考复习了！

我妈好言好语劝我几次，没有效果。请远在太原的大舅打来长途电话，我也没松口。最后，在北京开会的老爷子打来电话：孩子大了，想干什么就让他去干吧。

在宁波月湖边上的招待所，呆了四五天，反反复复地做各种名目的身体检查和功能测试，还组织了一次智力水平测试。军委和空军联合组成的招飞小组就住在我们楼上，有一位张参谋在熟络后空闲时跟

我们说：你们这一批是幸运的，航校毕业后，计划去飞最新的战斗机。说得我们心里热乎乎的，有一种跃跃欲试的感觉。月湖的水是黑黑的，月湖的夜色则是那么迷蒙暧昧。体检结束了，通过的幸运儿只是极少数，我并不在其中，而是被打发回家。捏着那张小小的“601”船票，充满了无限的怅惘和失落。

感谢李老师，没有跟我较真。我悄悄回到班级上课，装得像什么都没发生过。没有人来问过我一句你为什么被淘汰了一类的话。李老师看上去就像早就预料到我会落选一样淡定。

学校里复习迎考的空气越来越凝重。终于有一天，讲台上传下来的不是又一张测试卷子，而是报考高校和专业的预填表格：上面五格是重点院校，下面五格是一般院校，还有专门一栏是“是否服从分配”。全国重点可选的很多，记得我填的有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广播学院。一般院校里，文科好像只有杭州大学和浙江师范学院可选。

高考以后，又有一次正式的志愿填报，格式差不多。我在历史系和中文系之间犹豫徘徊了许久。跑去问李老师，她问了我的考试情况，说：当然报中文系！顿了一下，又加了一句：杭大中文系是最好的！

就这样，我和杭大中文78的101位同学拥有了共同的四年大学生活。

上大学后的第一个寒假，就是79年的春节，我回到定海。有一天从街上步行回家，迎面碰上县人武部的李部长。他说：小六子，你这半年到哪去了啊？我答：我考上杭大，在杭州读书哎。他说：哦，怪不得。又说：你的档案还在我们这里放着呢。我想，我的档案不都转到大学去了吗？就问：李叔叔，什么档案啊？他说：就是你招飞的档案。两年之内，除了潜艇兵，其他兵种随你挑。

呵呵，要是78年夏天没有考上大学，我大概率是要去军营里度过我的青春时代了。人生就是这么奇妙。

（原载2022年7月13日《钱江晚报》）

[返回目录](#)

我的高考杂忆

—杭州大学中文系 78 级 吴存存

在我们生命里总是会有几个让人印象特别深刻的梦。收到杭大入学通知书的那个下午的梦境，我至今难忘。

记得当时正在午睡，梦里我走进一个鲜花盛开的花园，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非常好看的花。这时，爸爸叫醒我，说我被杭大录取了。现实中的好消息和梦境中的美丽和愉悦交融在一起，当时真高兴啊！

如今回首，我也常常对这个梦境有点好奇。因为我一直觉得本科四年，真的好像就是生活在一个无忧无虑的大花园中。我入校时十六岁，本科毕业刚二十。所谓的豆蔻年华。我的生活跟现在大学生所热衷的追星、旅行、时装，恋爱和社交几乎无缘。但回想起来，并不觉得遗憾——跟很多同学一样，我们当时都生活在一种“天降大任于斯人”的美好幻觉里，每天一门心思读书，过得很充实。至今我仍觉得，本科四年是最快乐的时光。

这种过于美好的感受，也许是跟我清苦的成长环境相对比而产生的。

从我有记忆起，我就知道我们家比较穷，生活只能非常节俭，因为我们属于出身很不好。

我祖父曾在黄埔军校做过十多年的军医。他其实一直有着比较激进的左倾思想，年轻时曾经写过一付对联“拔剑当为天下愤，读书不受古人愚”，在我的故乡龙湾很受推重。他一直很喜欢陈独秀，据说晚年落魄时，还经常提起陈独秀的演讲如何鼓舞人心。他虽然从没有参加过共产党，却一直对蒋介石的政策很不满。49 年蒋介石赴台之前，他决定留在大陆，要跟着共产党建设新中国。刚解放时，他似乎过得很好，做过温州医院的院长。但五十年代以后，他的境况每趋愈下，以后被定性为“历史反革命”。不但他自己没了工作，没了退休金之类可以维持生计的任何收入，衣食不继，也连累当时已成为小学校长的我父亲，在六十年代初被迫离开教育界。在此后长达近二十年的时

间里，父亲都在温州化工助剂厂做临时工。一直到我上大学的时候，父亲每个月的工资都只有二十四元，而这就是维持我们全家六口生计的主要收入。

这些事情，其实我是在我祖父和父亲都去世很多年后才慢慢知道的。我父亲一直感到自己的人生很失败，他几乎从来不提这些事。

66年文革开始时我4岁。我祖父在1967年就去世了。那时候，我父亲的工厂也停产闹革命。像他那样的出身有问题的人，当然不能属于革命队伍中的一员。因此，除了毛主席发表新指示时要到厂里去参加游行庆祝之外，平时经常在家。工厂复工以后，他被指派在工厂做中班或夜班，白天也常常在家。幸运的是，他因为在六十年代初只是一个工厂临时工，文革时期因此也没有再受到任何注意或冲击。他的相对丰富而且有些“反动”的藏书也没有遭遇任何麻烦。

教育一直是我父亲的兴趣所在。我后来能够考上大学，现在想来，主要是因为我有位很好的父亲。他那时既然再没有学生可教了，就格外注重我们姐弟三个的教育。

记得我大概6岁开始，那时我姐姐8岁，弟弟4岁，三人每天早晚都要临帖写一百个大字。而写的时候，父亲一直站在我们的身后，很认真地指导我们如何用笔。我现在还很清晰地记得他一边看着我们写，一边说“重、重，轻下来，轻，轻，转，好”的声音。我觉得虽然是我们在写字，他花的心血其实更多。

这样的训练一直持续到我16岁上大学。

父亲一直很宠我。他认为我在绘画方面有些天赋。我从8岁开始学中国画，主要学花鸟。那时候，没有什么兴趣爱好补习班，父亲自己也不会画画。他就经常到处打听，通过亲戚朋友的介绍找老师。那个年代老师也不收学费，通常是让小孩画一幅画看看有没有前途。如果被认可了，就让我们带着自己的习作去老师家接受指导。当然，我父母会在过年时给老师送一些“伴手”（礼物）。但那时老师虽然同样很穷，他们都很客气，不愿意接受学生的礼物。

我小时候在温州拜过一些当地颇有名气的画家为师，也常去他们家看他们画画，十岁时还曾经获得过温州地区少年儿童绘画展览一等

奖。老师们喜欢我画画很放得开，对我有很多期许。年少无知的我，也就把将来成为一个画家作为理想，在家天天临摹芥子园等画谱，非常勤奋。

那时，正值文革中后期，学校虽然复学了，但没有人重视。父亲一度考虑让我不上学，只在家学画。但后来不知为什么，他还是让我上学，只不过我没有按部就班地上，而是不断地跳级。这听起来似乎我很聪明，殊不知其实不是那么光彩，也使我在学习上严重偏科。

从小学到高中毕业，我在学的时间不到六年。小学从二年级开始上，上到四年级就停学，在家学画一年，然后直接上初二。但不久感染了急性肝炎，又停学一个学期。

高一的时候，温州文化局组织了几位他们认为画画出色的中学生进行集中训练，说要搞出一些作品参加省里的展览。这样我基本上就不太回原中学上课了。高二我才回校参加上课。

我可以这么自由地跳来跳去，当然是因为当时教育制度很松，也是因为父亲在教育界有很多老同事。跟他们一说，那个学校就同意收我进入我想进的年级。但可以想象，这样的跳级对我的数理化有多糟糕。那时还没有上大学的说法，上课非常自由，做作业也是抄来抄去。我本来对数理化兴趣不大，就干脆放弃了。我跟同班两个女同学达成一个协议，我帮她们写作文，考语文时告诉她们答案，而她们给我抄数理化作业和考试的答案。老师其实看得出来，但时处乱世，他们都睁眼闭眼，并不过问。

我考上大学后，我的中学物理老师跟我说：“我不知道原来你的语文好。我一直看你抄人家的作业，以为你只会画画，学习很差呢。”我那时候的语文确实比一般同学好一些，这要归功于我父亲藏书很不少，并且他也经常教我们读古诗和古文。

我小学二年级就开始读《水浒传》，三年级开始读《三国演义》。其实，当时很多字都还不认识，但大致能把故事读下来。我被这两部小说深深地吸引住，抱起书来就茶饭不思，反复读过不止十遍，好多精彩的对话当时都能自然地背出来。初中因急性肝炎在家休息时，又

通读了两遍《红楼梦》。从那时起，我的偶像也逐渐地从鲁智深过渡到林黛玉。

我父亲除了古典小说外，也有不少现代和外国的小学和文学评论著作。我一知半解，但都翻过一遍。那时，我的中学同学们都读《艳阳天》和《金光大道》。因我父亲一直看不上这些革命小说，家里反倒一本也没有。我至今也没有读过。

我算是77级的高中毕业生（其实不合格）。毕业不久就听说可以考大学了。但我当时只想将来能当画家，所以一门心思要考美术学院。我从小只学中国画。老师告诉我，要考美院的话，就要考素描，而我并没有学过。

77年下半年，我临时抱佛脚，天天练习素描和透视。但我对于素描一直没有太大兴趣，学得不好。而当时社会上学画的人很多。很多人远比我更有才华并且素描的基础也好很多。所以，那年我考美院连初试都没过。

上不了美院，我很抑郁。小时候一直受老师的称赞自以为有画画的天分，但上不了美院，将来就没法画画了，理想几近破灭。所幸我的作文似乎一直写得不错。考语文时的作文，还被改卷的老师抄下来油印，发给大家做范文。我父亲看到那被油印出来的作文非常得意，说那你就改考文科吧。

我自知数理化太差，也不敢告诉我父亲在中学抄作业抄考卷那些荒唐事。接下来的半年，很痛苦地忙着学数学。无奈天性愚钝，78年高考的数学，我只得了12分。幸好语文、历史和地理的成绩都还不错。

在78年，这种情况似乎因十年动乱的原因而受到了特殊的照顾，勉强算是可以过关。要是到了80年代，我这样的数学成绩就上不了大学了。

那时考上大学的人不多。就这样，我考美院失败的挫折感，也在考上大学的虚荣心满足之下逐渐淡化了。

填报入学志愿时，因我姑母在杭州，而姑母跟我们家的关系非常亲密，因此我报的都是杭州的院校，杭大当然是首选。

我考上之后，姑母知道我们家很困难，她无微不至地照顾我在杭州的生活。

而我父母很为我考上大学而骄傲。他们给我买了崭新的一个大箱子，又请裁缝师傅给我新做了两件衬衣和两件式样新颖的外套。妈妈给我织了一件厚毛衣一件薄毛衣。我一下子有了这么多新衣服！以前我基本上都是穿姐姐或表姐们的旧衣服，由里到外都是新衣服感觉很新鲜很快乐。现在想来，那时，这对我父母来说是多大的一笔支出啊。

这些衣服我在大学期间整整穿了四年（而那两件毛衣更是穿到大学毕业十年之后）。这期间再没有买新衣服。

那时候我们几乎从不逛服装店。我甚至还不知道有什么时装店的存在。不过我们丝毫没有自卑，因为大家的生活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何况我们还自命为天之骄子。

在入学之前，我们都不知道大学的课程内容。因为我的数学很差，父亲一直担心我到了大学之后会跟不上。离家之前，他很认真地跟我说：一，如果在大学跟不上，不要紧，你就回家。你会画画，将来总会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的，千万不要在外地自己忍受折磨。二，你还小，要好好学习，不要谈恋爱，不要被别人的甜言蜜语糊弄了。我是第一次离家，心里也很紧张，不知道外面有什么可怕的事情等着我。

后来到校第二天就看到课程表，里面完全没有数理化，心中狂喜。家书的第一封就是告诉父亲，中文系不用上数学课的！至于谈恋爱就更不用担心了。大学四年，我完全是个假小子，根本没有人对我甜言蜜语（2012年同学会时我的学长羽强师兄和亚敏师姐告诉我，其实他们当时都担心我会嫁不出去的）。

在婚恋的事情上，我一直很感谢我的父母。他们从来就没有逼恋逼婚，或给我任何压力，甚至连暗示都没有。后来当我过了二十五岁还没有结婚时，很多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都在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关心”我，唯独我父母似乎浑然不觉。

我的父母都是解放后妇女解放思想的坚定拥护者。我现在的女性主义思想，最初来自他们的身传言教。

入学杭大中文系，我一直感到很幸运。我们在学时，杭大有国内一流的学者做我们的老师。而那时老师要求都很高，一入学就要我们读原著和原注。当时，杭大图书馆可以出借一些年代较近的线装书，使我们接受了非常好的国学和文学理论基础教育。

现在自己在大学教书三十多年，我的感觉是那时的老师几乎是以前在教导研究生的方法和标准来教导我们的。记得我上本科时，经常把自己的幼稚的习作给老师看。而他们对学生总是很认真，提出非常具体而有帮助的意见。

此外，我也很怀念当时大学的学习氛围。同学们几乎都异常用功，大家在一起谈论的内容多是文学、艺术和历史，互相关心最近读了什么好书，甚至在食堂排队买饭时很多同学都拿一本书在看。也许现在看来，当时大学生那么自命不凡，多少有些荒唐可笑。但在这样的氛围中，像我这样少不更事的小丫头，确实在那四年中一知半解地读了不少书，其中的一些好书让我终生受益（也许一些书本的坏影响也等量，这里就暂且略去不提）。

大学四年，一个很温馨的回忆是杭大中文系的食堂。至今仍坚信，那是我吃过的最美味的食堂，并一直很怀念那里的莴笋里脊、肉丸菜底和素鸡等经典杭州家常菜。在去杭州之前，我在家从未吃过这么多好吃的菜，上学后每天在食堂吃饭都感觉是个享受。记得我入校时，体检身高一米六〇，而毕业时身高一米六四。相信这四公分来自杭大中文系食堂的帮助。

我们78级的教室就在食堂的隔壁。每天上午11点，食堂里飘出的诱惑性香味，都会让我们上课心不在焉。我那时上课除了带书本和笔记本，都会带上饭盆。这样老师一宣布下课，就可以第一时间冲到食堂排队，不会因晚到而买不到糖醋小排那样的好菜。

大一时，我每餐都打四两米饭，满满的一盆，再加上很多肉食，因此吃得白白胖胖，跟刚入学时的豆芽菜状态很不一样。第一次放假回家时，父母见了我这样子都特别高兴，一直说：“阿存读大学变漂亮了！”当时我每个月收到14元助学金（都被直接以饭票的形式发给我），而我吃得这么好，每个月还能省下两元换回现金买书。

那时，大学里学费、住宿、医疗还有教科书统统免费，寒暑假更给有困难的学生发一点路费补助。我们无需出去打工，无需忧虑毕业后找不到工作。这跟当时我们所羡慕但不太了解的国外大学里的大学生——尤其是那些来自劳动阶层或移民家庭的为上大学费用而挣扎的学生相比，实在是太幸福的大学生活！

浮生如梦，难忘青春。杭大的四年，是人生中的一段美如鲜花的梦！我知道对于现在的大学生来说，我们的大学生活可能过于书呆子气、乏味和缺乏刺激。而我们同学中那些比较年长一点的同学，也肯定比我们对当时的社会和大学有更为成熟的理解。但无论怎么说，我想，相比于我的同代人，我们当时占用了最好的社会资源，远比大多数人幸运。现在想来，真心感恩。

（原载2022年7月18日《钱江晚报》）

[返回目录](#)

我的生命奇迹

—杭州大学中文系 78 级 赖文洪

如果说人生是一场旅行，那么在漫步前行的路上需要路标，需要里程碑。雁过留声，人过留痕。那些深深地烙印在我的生命里的，是记忆，是故事，是奇迹！

1978 年高考，我的成绩是 358.5 分，列象山县文科第四名。其中数学成绩 75 分，列文科类第一名，幸运地成了杭州大学中文系的学生。

我的录取通知书先送到县城，再转送到生产大队，迟了两天。但是期待我考上大学的人们看起来并不焦虑，见面说的更多的是鼓励，是信任，似乎大家相信在我们公社里连赖文洪都上不了大学就没有人上大学了。我是操场上的那棵树，是成长，是希望。

1973 年 12 月底，我高中毕业回到生产队参加农业劳动。后来担任大队会计、团支部书记和公社通讯报道员、青年突击队队长等。1976 年 4 月，我成为县半脱产干部，做了象山县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编辑。我的工龄就从这里开始计算起。

几个月后，我被调到西周中学，成了 1977 年高中毕业班的班主任老师，担任语文与政治课两门课程。一个高中毕业生当起了高中毕业班的班主任老师，是记忆，是故事，是奇迹！

我的理解，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就是奇迹；人生不能为而又改变了人生的更是奇迹。

1971 年底，我读完了五年半的小学和两年的初中，正式成为农民，一天劳动得 3 个工分。那一年我们读的初中叫农中。那一年高中已经停办了。那一年我 14 岁。

我们大队有 6 个初中生。4 个学木匠、学机工，做徒弟去了，一个女同学认命待嫁着。只有我想读书，但又被关闭了学校的大门，心中尚存一团死火。

几个月过去了。到了三、四月份。春天时光，我正在农田里劳动着，大队杨柳树上的高音喇叭在喊叫：高中恢复了！我们大队分配到

了一个名额，今天开始报名。又有书读了！这对于我来说是喜从天降。我自然第一个报了名，当然全大队也只有我一个人报了名。

有天晚上，也就是六七点钟光景，大队书记通知我去领表格填写，我真的是高兴极了。但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我的一个同学，就是那个已经在学木匠的同学告诉大队书记，他也要报名读书。这一下子可难倒了大队书记，更是给我打了一个闷棍。两个人只有一个名额上高中，怎么办？

我们大队书记是个老兵，几十年来全大队只有他一个党员。据说在1949年春天，他被国民党军队抓壮丁当了兵，过几个月成了解放军的俘虏。后来全国解放了，他想回家。再后来抗美援朝开始了，刚刚到家的他又回到部队。再后来在去朝鲜的行军路上他生病了，不得不再次回家，从此后他一直躺在床上。家里有三四个子女，穿草鞋，睡草床，住草房，是全大队最贫困的家庭之一。

那天晚上，我和同学两人来到他的床前，呆呆的木木的不知所措的站着。书记说：你们两人都要读书？我们大队只有一个名额，谁去读？

他摸索着，从床上抽出一根稻草，折成两段，一长一短，紧紧攥在手里。

他继续说：你们谁抽到长的那一段就可以报名读书。

我与同学四目相对，互相推让着。

我的同学先抽了，抽了那个短的。书记摊开手展出那段长的，是我的。结果是我可以读高中了。

那一段稻草，连同那一段时光，是回忆，是故事，是奇迹！

如果没有邓小平搞“右倾翻案”，如果没有床上的那一段稻草，如果……

生命没有如果，只有后果与结果。

我不知道那一段稻草在我生命旅程里有多重要！我知道，我真真实实地感知到，读了高中之后，我把自己变成了人的模样，有了灵魂，有了思想，可以归类到“知识青年”群体里了。

1973年底，读了两年，高中毕业了，我是大队第一个高中生。

高中毕业后回到大队，叫“回乡知识青年”。同样参加农业劳动，有文化与没有文化就是不一样，我是这么认为的。——因为我天天不想农业劳动，天天不想做体力劳动，而是天天想当知识分子，天天想做用脑子拿工资的工作。心中像着了魔一样，坚定地斩钉截铁地要改变自己的命运。

那些年，当兵参军、工农兵上大学、工厂招工，看起来我都有份，每一次都挨着边了，却又没有缘分；但每一次于我都是成长，又都改变了我。

于是，我成了高中班主任老师，县广播站的新闻编辑，每月33元工资。当然其中12元要交给生产队记工分8分。

我是个很不一样的青年农民。是什么让我坚定地要跳出农门，拿工资吃饭呢？

又是一个回忆，一个故事，一个奇迹。

记得1974年夏，有一天我在田间双抢劳动。这是我高中毕业后的第一个超强度的农业劳动，我突然倒在水田里，痛得打滚，口吐白沫，昏迷过去，不省人事了。这下子吓坏了全大队的人，什么病这么严重啊！

急急忙忙送到公社卫生院，医生一看也吓着了。这是急性睾丸炎发作，卫生院没有医疗条件，快快送到县医院去，这是要死人的病。

县医院离我们公社约五十里路，翻山越岭的。我爸妈已经哭得六神无主，我奶奶是一家之主。奶奶坚决地毋庸置疑地否定了送县医院的意见。命令用竹躺椅由大队的八个壮汉把我抬到二十里外山上去。那里有个简易的寺院，有个老太太负责着。她自称是阿弥陀佛附身。我被抬到山上，老太太一看就信心满满地说，好治好治。然后马上为我念经，让我吃香灰。

一个星期后，病愈回家了。公社卫生院医生和全大队的人都以为稀奇，都开始膜拜这个寺院的老太太。这个寺院之后香火不断，越来越旺。现在已经是一座规模宏伟的寺院了。

那一次，我自以为体验感知了死亡，长时间地回味躺在死亡悬崖边的惊悸、惊觉、惊醒。那场病深深地烙印在我的生命里。

如果没有那场病，如果没有一个强权做主的奶奶，如果……
生命没有如果，只有后果与结果。

祸兮福所倚。自从这场病之后，我更强烈地重视追求“知识青年”的知识两个字了，更向往读书了。

1973年底高中毕业到1978年7月高考上大学，四年半的时间，我抄写过《心经》、《金刚经》、《地藏经》等等经书，抄写过《第二次握手》、《福尔摩斯探案》，抄写过《朱子家训》、《三字经》、《百家姓》等等，还抄写过《数学公式手册》。更令人惊奇的是，我把整本《新华字典》包括释义都抄了。

那年月，我是真诚地拼了一回，用沸腾的青春热血拼了一回。

我说人生是一场旅行，在漫步前行的路上，有路标，有里程碑，更有奇迹。

生命不能没有奇迹！有奇迹的生命才叫精彩！

（原载2022年7月25日《钱江晚报》）

[返回目录](#)

我的高考前传

—杭州大学中文系 78 级 朱承君

可能是天性吧，我自幼喜欢读书。1968 年春天，我不满 6 周岁就上了小学，而且是自己瞒着父母偷偷向老师报的名。上学第一天，背着蓝布的新书包一路小跑。由于太过激动，不小心重重摔了一跤，额头上肿起一大包，算是给孔圣人磕头了。

我就读的是宁波市鄞县的鄞江小学，旧称养正学堂，创立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1941 年曾被日寇占用作马厩。学堂其名应取之易经的蒙卦：“蒙以养正，圣功也。”我读书时，另有与养正堂相连相通的校园，不知其建于何年，但见其格局规整，建筑典雅，有影壁、天井和回廊，也有月洞门、芙蓉花和菜园子，确是读书玩耍的好地方——我在这里度过了快乐的五年半。

小学期间，语文、算术、音乐、美术、体育等课程一应俱全。记得算术课反复练过算盘，音乐课老师都弹风琴，美术课也去室外写生，体育课之外年年还有军训。但没有学过拼音，老师都用本地方言授课（直到高中，只有一个老师说普通话），害得我上大学时因不会说普通话而羞于开口。其实我并不胆怯。我从小学一年级起直到高中毕业都当班长，举凡学校有大型集会，我总是代表学生去上台发言。

至少从我爷爷这辈起，我家就很清贫，只耕不读，无诗书传家。家里没有书桌、没有书厨、也没有藏书，倒是有一本《接生手册》。当年我妈是赤脚医生，专事接生。那本《接生手册》便是我家唯一的专业书籍了。我无事时就拿来仔细翻阅。虽然严重缺乏书香滋养，我的学习成绩却始终优秀，尤其是语文，在同年级几乎无人匹敌。作文经常成为范文，偶尔也获满分。那篇满分作文写的是青黄不接之间生产队开仓发了陈粮，让村民度过一时饥荒的亲身经历。因受当时忆苦思甜活动的影响，由此进行了新旧社会对比，受到老师赏识。

去年，学了一段时间的紫薇斗数。了解到，如果命宫里有科星，男左女右，手掌上必有一条从掌根直通中指的天柱纹，该天柱纹主才

艺，可以金榜题名。幸运的是，我的左手掌真有一条通天的纹路，这也许正是我一个农家子弟在困难的条件下能考上大学的原因吧。

生在农家，须在课余或假期帮家里干些农活。赶在太阳升起前去拔秧，把沾满露珠的青草割回家，顶着烈日送饭菜到田间给正在“双抢”的爸妈，还有在繁星满天的夏夜陪母亲宿在草棚里看管已经成熟的西瓜，如此等等。

其实，参与农事也有很快活的时候。大约在小学三、四年级时，我在暑假当过一次放牛娃。那时生产队的耕牛是社员每户轮养的，是年暑假轮到我家。骑牛与斗牛对一个十来岁的少年有着不可抗拒的诱惑。因此，我很兴奋地领取了父亲的任务。我放牧的是一头大水牛，毛色青灰，身高体壮，长着一对雄伟的犄角。大水牛乐意让这对犄角成为我骑它的阶梯。我总是趁它低头吃草的时候一脚踏上它的角根，等它一抬头，我便“嗖”的一声趴上了它宽阔的背。

我的大水牛有王者风范。每当有其他牛靠近，它便会昂起头向它的同类作睥睨状。于是，小伙伴们便撺掇它们相斗。大水牛总是一声不吭，四蹄不动，前腿直后腿曲，尾巴一扬，伏低脑袋往前拱。随着几声沉闷的牛角碰撞声，它牛便落荒而逃。此时，我的大水牛才会仰天长哞。我惊讶于光吃青草的牛如何能生成如此巨大的身体和气力，造化真是神奇。

那个暑假，我独自为家里挣得了18个工分。

与城里的小孩相比，农村的小孩都是“野生”的。过去没有那么多课业负担，放下书本就是玩耍。春追麻雀夏捕蝉，秋采橡实冬玩雪，项目多得不可胜述。虽然多见树木少见人，但也尽得天地之灵气。

自古人生皆有烦恼。我的人生烦恼始于初中。

1974年秋天，我升学到与养正学堂一路之隔的鄞江中学，开启了为期四年的中学生涯。鄞江中学处于鄞江镇一个四面环水的长方形心地界最西侧的它（tuo）山脚下，与纪念唐太和年间兴修水利的贸县县令王元玮和为造堰殉身的十壮士的它山庙相融。它山庙下便是古代四大水利工程之一的它山堰。当时王元玮和十壮士的塑像早已被毁，

大殿便成了学校的礼堂和食堂，殿后的库房被当作高年级外地学生的寝室。

“文革”的恶果在其最后的两年中暴露无遗。阳光被乌云遮住。甫上初中的我，心里的阴影在持续弥漫。小学时期美好的读书印象到初中时被彻底颠覆。我在中学同学群求证，初中时到底有没有地理、历史和物理、化学课，结果莫衷一是，没有一个人有清晰记忆。难道是我们这一届同学集体不长记性吗？但我却真切地记得：每学期的新教材是到得越来越迟，又变得越来越薄。两年中，我的数学老师走马灯一样换了 7 个，从正规教师到代课教师，调换周期越来越短，讲课能力越来越差。音乐课偶尔还上，政治课雷打不动，英语课肯定没有，体育课常被劳动时间侵占，运动会倒是年年举办。

所幸的是语文课成了我两年中唯一没有被落下的主课，让我内心的那缕未被割断的文脉，日后竟能奇迹般地与大学中文系相接。教我语文的是慈母般的班主任徐老师。她对我总是循循善诱，寄予厚望。老人家今年已经 98 岁了，住在乡间敬老院，脑子有点糊涂。但一见到我却能迅速喊出我的小名。这让我同为她学生又被她遗忘的姐姐啧啧称奇。

我初中两年的主线其实不是读书，而是循环往复的学工、学农、学军和繁重的体力劳动。

备战备荒的年代，军训从小学开始一直持续到初中。每学期开始，学校都会请部队战士来指导我们队列训练。期间有过一次实弹射击，我选择轻机枪三发连射，结果全部脱靶；有一投掷能力最强的张姓男同学向河里扔了手榴弹。在学工期间，连续跟着师傅学烧电焊 1 个月后，我不再对当工人充满向往，因为太单调了。学农时间最长、频率最高，其中最夸张的就是贯穿初中几乎让人累得吐血的造“大寨地”运动了。这项浩大而无聊的工程成了我们这一届同学共同的痛苦记忆。

学校西边便是绵延几十公里的四明山脉，山间的清泉蜿蜒流淌到鄞江，沿途形成了一个名叫李家滩的宽阔河滩。在“教育也要学大寨”的观念指引下，学校抑或是进驻学校的工宣队领导决定组织学生在李

家滩兴造大寨地。这可苦了我们这帮只有十二三岁正处于发育期的少男少女。

与它山庙隔堰相望的是庙前山。山脚有古道，途中有凉亭。我们称之为“四脚凉亭”。从四脚凉亭挖掘黄土，用土箕挑到李家滩，中间多是或纵横或弯曲的阡陌田埂，浩浩荡荡的学生大军穿梭其间。一部分学生则在河滩的鹅卵石上打桩夯土。我们一天起码 5-6 个来回。一个来回不下于 5 公里。每学期总要花上 1 个月时间，算算两年里面负重走了多少路，挑了多少土？肩上的血痕和脚底的水泡都是暂时的，但压抑身体成长却是永久的，本来，我完全可以比现在长得更高大些。关键还在于这事绝对没有意义。家乡是水乡，经常闹水灾，李家滩便是泄洪区，千辛万苦造的大寨地被从四明山呼啸而至的洪水一冲就没了。

辛劳不说，还无书可读。容易读到的便是《大刀记》、《金光大道》和《敌后武工队》等当代小说了。古代四大名著只读过少年版的《水浒传》，结果熟练记住了三十六天罡星的混名和他们所使用的兵器。在本家祠堂“敦睦堂”听艺人说书，常对三侠五义的英雄故事心驰神往。至于外国作家与作品，就只知道有叫尔基的，不知道还有叫斯基的。

比无书可读更要命的是可能无学可上。当年的教育资源极端贫乏，高中尚未普及。我哥上了高中，我姐就不能上，我还能再上吗？为这事，我经常神情恍惚甚至悲愤不已。我是农民户口的优等生，读书再好，政府也不会给我安排工作。现在可能连高中也没有资格读了，更何况是传说中的大学呢？

我不想当农民，最根本的原因是我的皮肤受不了田间蚊蝇成群结队的全面而持续的攻击。以后去干什么好呢？我第一次悄悄地规划了自己的人生，并且确定了去当木匠的志向。在农村，最常见的有木匠、漆匠、泥水匠和裁缝。家里请这些师傅得好酒好饭伺候着，工钱还照付。漆匠太脏，泥水匠需要登高，裁缝是女人做的，就选木匠了。

我倾心于当木匠的 1976 年，其实是个天崩地裂、异象纷呈的年份。先有东北的流星雨，后有唐山的大地震。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三大

巨头相继谢世，真可谓大人欲往，文武先行。是年4月，北京有“扬眉剑出鞘”的四五事件；10月，兴风作浪的四大妖孽被捉。一阳初动，大音希声，雷在地中，万物复苏，正是复卦景象。

当时的我自然并不知道那是大时代的转折期。我只知道那是我初、高中的转换期。我还有机会读高中吗？

经过我母亲的反复奔走和竭力争取，我终于顺利升入高中。但很快，欣喜之情变成哭笑不得。

我们这一届高中约180名学生，分成三个班：一班会计班，二班农机班，三班植保班。我被分在三班。这可能是国家最早的高中段职业教育探索了。很羡慕会计班，重点学数学，经常打算盘，以后当财务，很好的出路啊。农机班重点学农机的操作与维修，学开拖拉机听说是同学们尤其是男同学最开心的课程。植保班重点学化肥的使用和病虫害防治，比如氮肥、磷肥与钾肥的功效，二化螟与三化螟的区别等等，就是培养施肥和治虫的农民罢了。看来此生跳不出农门了，这更坚定了我要去当木匠的决心。

虽然我对读植保班耿耿于怀，但高中教育从一开始至少是结束了初中时期的乱象。学校不再组织学工、学农、学军，基础课程中有了物理、化学。任课老师也不再频繁更换，呈现出重整河山、回归正传的气象。

语文一如既往地排在主课第一位。教语文的葛老师讲课生动形象。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他讲鲁迅《风波》时惟妙惟肖地模仿赵七爷的样子：同时捏起空拳，仿佛握着无形的蛇矛模样，向八一嫂抢进几步道：“你能抵挡他么！”葛老师教写作，总是强调要把可有可无的字、词、句坚决删除。受这一教诲影响，我后来的写作一直偏向于简洁。

教数学的瞿老师是我此生幸遇的第二位老师中的慈母。她是我外婆的邻居，家里有患精神病的妹妹需要照顾。我去外婆家时，常能听到她大发脾气的声音。但瞿老师对待学生永远是耐心细致，不急不躁。每次讲完题目，总会笑咪咪地问大家：听得灵清吗？

班主任朱老师教我们物理（有同学回忆说是机电），开始也教我们化学。他写板书一丝不苟，也让我第一次见识了什么是化学实验。

后来一直教我们化学的任老师，温文尔雅，出身于南京大学化学系。他是我中、小学期间唯一讲普通话的老师，其风格类似于我们杭大中文系的吴熊和教授。教学内容早已烂熟于心，讲课不带教材，只带粉笔。偏爱文科的我因受任老师影响曾一度痴迷于化学。当然，最终只能忍痛割爱。现在我只记得水的分子式，其他都已还给了任老师，惭愧！

浑浑噩噩间，1977 年来啦。如果借用京房易十二卦顺序并把 1976 年作为复卦的话，1977 年就是地泽临卦。按照《象辞》解释：“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此君子邓公也，教化万民，德业无疆。秋季，恢复高考的消息令学界沸腾，学子雀跃。朦胧的前路突然变得清晰，我与心中的木匠挥手作别，立志奔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从此，“挑灯夜读书，油涸意未已。亦知夜既分，未忍舍之起。”补习备考成为生活唯一的主题。勤劳的父母和慈祥的小脚奶奶几乎不再让我接触农活和家务。可亲可敬的老师们压抑了十年的工作热情也被彻底点燃，更对我们这些精神营养严重不良的孩子动了恻隐之心。

瞿老师用“文革”前高中数学标准对我们进行了一次摸底考试。我仅得 6 分，耻辱啊！谁叫我初中换了 7 个数学老师呢。1978 年寒假期间，瞿老师见我们可怜，就选了包括我在内的 4 个男生到她家的厨房里给我们“开小灶”。补充“营养”后，我的数学水平开始突飞猛进，最后的高考数学成绩竟然达到了 68 分。在半年时间里从 6 分跃升至 68 分，也算是人生的一次逆袭了。

我已忘记文理分班的具体时间了，只记得文理分班后，开始恶补政治、历史与地理。

给我们补习政治和历史的是仇老师。估计是见我还有潜力可挖，有一天夜课结束后，他悄悄地塞给我一册复习资料。我如获至宝，无比珍惜，之后不知翻阅记诵了多少遍。

给我们补习地理的是陈老师。我还记得他讲马里亚纳海沟的深度时说，把喜马拉雅扔到沟里去后，还差多少高度的情景。陈老师也给我们上了几堂英语课。我是破天荒第一次听英语课，觉得十分好奇。

虽然陈老师说的英语有满满的本地口音，但毕竟使我认全了 26 个英文字母。以前可是通过数理化课程来认识字母的啊。

葛老师自然是对我进行语文尤其是写作的强化训练。语文是无法在短期内进行补习甚至是复习的。只有写作训练是一个见效快的突破口，葛老师深通其中奥秘。文科班几乎每周都要写一篇作文，与我而言这并不难。难的是葛老师居然一口气给了我 100 个题目，并嘱咐我每天写一篇。葛老师在我身上寄托了他的理想，而老师的理想更是我的理想啊！有时，上学路上遇到上班的葛老师，他便一路给我辅导写作要点，并对之前的作文进行点评。我真的在高考前 100 多天里写成了 100 篇命题作文。而高考的语文试卷中却并没有作文题目，而是要求缩写别人的文章，这让我很是失望！

高考的过程以及考后漫长而焦急的等待都是相似的，这里就不再赘述了。值得一记的是选学校、填志愿。可能是距离较近的原因，老师们对杭州大学情有独钟，对中文系更是赞誉有加。这大大促成了我把考入杭大中文系作为最高理想。

我们 1978 年应届的高考录取率为 5%，共约 180 个毕业生中有 60 人左右参考，仅被录取 3 人，其中文科仅我 1 人。当被杭大中文系录取的消息传来时，我一时名动乡里。我的爹妈也同时荣升为大学生爹妈，算是光宗耀祖了。

在以后的岁月里，有下一届高中的学弟对我说：你是我们的学习榜样，老师总以你们几个为自豪。有个学妹对我说：她曾以我窗口的灯光为题写过作文。这让我意外并且惶恐。盖因时过境迁，社会发展，人才辈出，我早已“泯然众人矣”。现在则想，人生有一回小小的风光足矣！

（原载 2022 年 8 月 1 日《钱江晚报》）

[返回目录](#)

从打工、支农到高考

—杭州大学中文系 78 级 童国樑

1974 年夏，我在原宁波一中（杭大吕漠野教授曾在此任教、系学母屠呦呦的语文老师）高中毕业了。本该是高考的年龄，但因“文革”，高考中断多年。就是想在城里分配工作也是件很难的事，得看具体条件。

由于我哥哥被安排到外地工矿——江西玉山矿，我和姐，一去一留，即一个支农，一个才能分配工矿。我本想支农，在班里也带个头。男孩子多吃点苦无所谓。但无奈家里就是不同意我去支农，且两个子女都不放。那就只能等待有机会时分配，或者等我哥哥从外地调回宁波工作再安排。这样，分配就被搁置起来了，作暂缓分配。

对于读书我一直钟爱，且小学和中学都在重点学校。中、小学均有较好的师资和学习氛围，总算读了点书，学习成绩也好。当了十年班长（初中二年班改为排）。因为是重点中学，学习一直抓得紧。从灵塔中心小学到一中，即使文革最乱时期，老师们也是半天造反，半天上课，称之为“复课闹革命”。加之中学时一些时间整顿教学，所谓刮“右倾回潮风”，从语文、数理化到英语，各科开展学习竞赛拔尖子活动，倒也强化了功课的学习。中学时不分科，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还有英语全学，这样对于学生来说，“营养”就全面一些。

可是，当时社会上读书无用论盛行，以张铁生交白卷为荣。坊间流行“一根扁担二个桶，三角几何有啥用”，“高中毕业钢笔一别，到田头劳动只三分一涅（方言：天）”。“黄帅事件”批判了师道尊严，导致毕业早点安排工作变成硬道理，是“实惠主义”。坊间流行“四只轮子一把刀，穿着白大褂拎皮包”，是指代说驾驶员、卖肉的、医生、跑外勤的，这些职业很吃香。想安排工作，尤其是有一技之长工作是非常困难的事。

待业期间，无事可做，就学着安装半导体收音机。找了替代线路板，在板上打孔、用铜铆钉一个个钉上去，做成了电路板。然后用松香和焊锡焊接各种电子元件。三极管、二级管、电解、电容、电阻、磁棒、线圈、可变、喇叭等等元件，没有电铬铁，就用紫铜自制铬铁头。在煤球炉里煨红焊锡，用漆包线一点点在铆钉点焊接起来。对照线路图，全部焊接上后，插上自制的一号电池电源，开关一开，清脆的东方红乐曲响起，安装成功！有好几个电台可以收听，着实快乐一阵子。

邻居们说，即使安装得再熟练，也不能进春风无线电厂，晶体管厂等在甬的工厂。而且，做这事，也实在费钱，卖掉废品买元件。因为生活没有经济来源，还得额外支出，这事不能长久做。每当看到墙上贴着斗大的标语：“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总是想解决生活问题，必须自食其力。

于是经人介绍后，去给泥水匠做帮手，打零工，学点手艺。做泥工倒也经历过了。在14岁那年，街道响应毛主席号召“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大街小巷开始挖防空洞。在小沙泥街四扇大墙门内，修筑了防空洞。我就跟着一位泥工老师傅，在建造后期，将洞内石块间缝隙用水泥勾缝平整，还有一些修修补补的活计。在那里无偿参加劳动好多天。

后来跟包工的泥工师傅们干活，劳动量就大得多：拌三和土（水泥、砂泥、石片）、递泥桶、搬砖头、砌砖墙。为赶工期，时间也抓得很紧。一个学生娃，刚出道，便干高强度的活，身子是很累。当工程完工后，算工账，也有一点工钱，维持基本生活。包工的活干完了，得另找再干。像打游击似的，打一枪换个地方。

不久，我的邻居介绍我去学做木工。木工师傅在外界也蛮吃得开，算是手艺活。无论“大木”造房子，还是“小木”，做家具，都有社会需求。开始先做大木，给生产大队造一间砖木结构的房屋。到乡下洪塘吃住在师傅王耀辉家。洪塘有个著名的保国寺（全寺没有一颗钉子，全部是榫卯结构，飞鸟不进），所在地有个血泪亭，就在那旁边村落干活。木工活比较细。锯、刨、砍、凿、钉、弹线，样样得会。

手工锯木头费劲，没有老茧的手，拿锯锯木头时间一长，手心就磨起了泡。只得把泡挑破咬咬牙继续干，一直把房子造好。当时在王师傅家里，他们就把我当作家人看待，有啥吃啥。虽苦，自己琢磨领悟，倒也学到了一些木工技术。到现在，家里木工工具一应俱全。一些安装、修补的事情，能够自己解决。

后来有亲戚说，还是介绍你到工厂学点技术吧。然后，我就在宁波江东胜五金工具厂上班，跟着师傅像做学徒工一样。有车、铣、刨工种。跟着一位刨床师傅先学刨配件。师傅也耐心细致，说得也明白。比如把要加工的配件在刨床上放平，紧固镙丝时，要 4 颗镙丝同时用力拧，这样才会平整。按图纸的要求加工。幸好我在学校学过三视图，一般看得懂，比如三角记号是泡光光洁度标记符号，越多说明光洁度越亮。几个月下来，倒也得心应手，与师傅们关系也挺好。就是工资少些，只有 12.5 元一月。有时还要做夜班。

正在这时，原班主任童莉君老师知道我的情况后，就竭力推荐我到宁波鄞县（当时还是县建制，2000 年改县为区）东吴中学任代课教师。并语重心长地说，那里当代课教师 28 元一月，既解决生活问题，也可以继续学习，一定不要放弃学习。遵照恩师教诲，1975 年秋，我打起铺盖就去学校了。

东吴中学，依山傍水。学校大门前有颗高高耸立着树径有三人抱粗的银杏古树。一条清澈的溪流，从三溪清水库潺潺流过校门前，围绕村庄。学校背面有庙山。那正是一块风水宝地。有名的小白西瓜产地正是那里。

学校是小学与中学隔道墙。到校那天，有一位小学老师请假一周。于是，我给五年级小学生当老师。经过一星期驻班蹲点教学，师生们配合很愉快。

那时，初中二（3）班班主任俞忠财老师，因为校办工厂需要，去跑外勤，缺额空出来了。校长找我谈话，要我去当这个班的班主任并任二个班级语文课，一个班级理化，一周有 17 节课。我就应诺了。后来知道，那个班相比其余 3 个班级，可是一个“乱班”，谁都不想插手。而对新手上路，且又做班主任的我来说，真是不小的考验。

我想到了与家长沟通、配合，就一一做家访。其实对我还是学生娃来说，可是头一次上学生家门，心里还有点怯生生的。看见家长们见到城里来的年轻老师，又是沏茶、又是搬椅上坐，很是欢迎，使我信心大增。与家长、学生都有了亲切感，及时互通情况。

语文是主讲，我还把数理化等科目在早自修或课间时穿插一下。学生们很好奇，这位班主任老师怎么样样都教？学生们有了学习主动性，就有针对性的把重点内容补上去。后来学生们成绩一跃而上，所谓的差生也很快追赶上来，进步很快，且大家都热爱集体。课堂纪律好转，任课老师反馈，能进课堂上课了。后来在年级统考摸底时，4个班级基本平衡。

除了上课，那时课外劳动比较多，经常到四三00舰队驻地附近的黄君岙开荒种番薯、土豆，秋末上山摘橡子。橡子是做酒用的原料，由供销社统一收购，可增加班会费收入。班级里还养了一头羊，由学生在课余时间轮流放养。1976年冬天，下着鹅毛大雪。天刚蒙蒙亮，一个曾经调皮捣蛋瘦小的陈恒夫同学，来到学校老师寝室边侧敲门。开门一看，只见他拿着一大捆番薯藤，说下雪天不能放羊了，这些番薯藤给羊吃。后来一到劳动时间，学生们争先恐后地从家里拿来土箕、便桶、锄头等劳动工具，到基地参加劳动，积极性较高。

正像园丁一样，经过二年辛勤培育，园圃的禾苗茁壮成长。学生们快要毕业了。按照原升学比例，只有很少一部分学生可以到五乡中学读高中。为解决东吴中学入高中难问题，学校根据实际情况，经教育局统筹考虑，决定自办高中部，称为戴帽高中。那时师范学校老师也陆续分配来校，师资力量得以充实。4个班级初中毕业学生，加上周边高钱、栗树塘、天童、宝幢、小白、河头、平窑、生姜漕等附近复式班学校毕业的学生，选拔到二个高中班。

在确定高中教师时，校长丁安康老师根据学校讨论决定宣布，在所有的代课教师中仅选我一人担任高中教师，并担任高一（1）班班主任。刹时，想想校方的重视，能与学生们一起成长，也挺高兴。安排六节语文课，再安排初中历史、地理课。教学较成功，还在早自修或自修课时间，我给学生们“吃小灶”，额外讲解高中数学及理化一些

要点。学生们读书积极性很高，学校也满意。说是把城里的重点中学教学风气带到了东吴村里，面貌有了大改变。

有一次，学校搞了一次全区公开教学课，安排 30 多位老师和领导参加旁听。在教室里坐不下，就把课桌全部搬到外面，学生拿着书本上课。课的内容是讲《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课上还与学生有提问互动环节。学生们大胆配合教学，课上讲得激情满怀。课后，大家啧啧称赞，为东吴中学争得了一分荣誉。

1977 年 10 月，就在文革结束后一年，恢复高考的喜讯传来，真是情不自禁地欢呼雀跃起来。好不容易等到高考机会，正想跃跃欲试。可是一条规定却被封禁了。当时规定，知青要有正式农村户口才可以报考，而我的户籍还在城里。报考的事，真象是“鼻尖上的糖：看得见，吃不着”，郁闷极了。就这样，纵有这么好的机会和条件，还是眼睁睁地看着 77 年的统考机会溜掉了。那种惊喜却夹着焦虑、叹惜的情景历历在目。

为了争取报考条件，我坚决要求报名支农。虽然家人不支持，也有很多顾虑。恐怕长久扎根在农村插队，成为“永久牌”，而把在农村过渡即到城里安排工作或保送的工农兵大学生比喻为“飞鸽牌”（飞鸽牌、永久牌都是当时珍稀的自行车商标）。当时农村生活确实艰苦，城乡差别很大。为了能够参加高考，我下定决心，无论如何要搏拼一下，大不了扎根农村一辈子。再说我从小在学校放寒暑假时，基本在农村亲戚家，与农村有着天然的联系。此时，曾在东吴中学任过教的宁波一中同学孙家裕，在早一年在宁波拉丝厂招工，77 年考入浙江大学工科；还有在一起任过教的黄大鸣同学，考入复旦大学物理系，留学美国后留校。他们来信鼓励我积极报考，使我信心大增。任代课教师的李定邦同学后来也考入杭州大学地理系。

1978 年 5 月，按照“厂社挂钩”的“株洲经验”，我要到宁波市江北区慈东公社山东大队插队落户。听说我要走，东吴中学的领导和师生们纷纷挽留。安康校长对我说，学校需要你，希望留下来。已经是代编教师了，到公立老师就一步之差，以后有优先转正机会的。尽管我内心也有这样想法，但继续学习的求知欲，驱使我去考一考。当

然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快要读高二的学生们，毕竟师生们的情谊非常难忘。他们也将临高考，好在有师范学校毕业的教师顶上。

初、高中学生们纷纷送来照片。照片背面签上名字，留作纪念。说在想念时候看看照片，着实令我动容。现任中国工程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的高中班陈剑平同学特为写诗惜别，其中有两句“科学喻高山，你要敢登攀”。我一直作为激励和鞭策的警句。俞仁明与其弟俞光明以及他们父亲，特意为我饯行，依依不舍惜别。师生们都一一深情相送，送到村口很远。记得林忠德老师赋诗有“三溪浦水深千尺，不及我送国梁情。”姜振华老师说：“千里相送终有一别，多多保重啊”，陈仁国老师还说：“莫道前程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这些赠别的话我一直铭记在心，回想起来感到特别温暖和亲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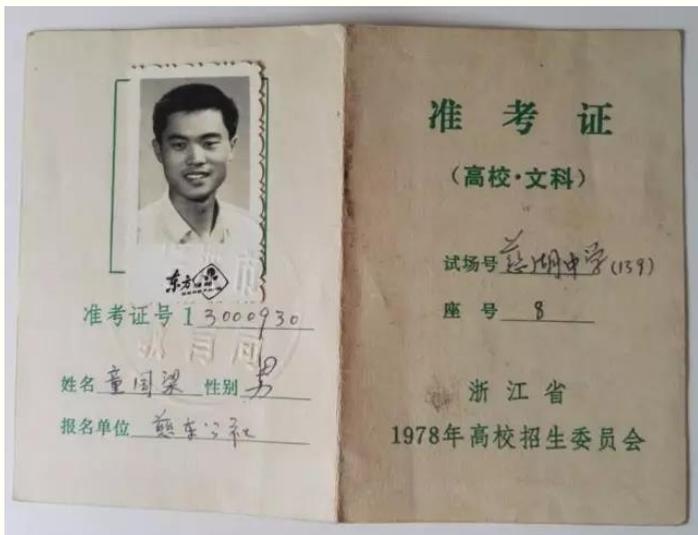
其实我们师生之间就相差五六年，可以说是兄弟姐妹之情。至今仍有当年师生走动联络，友谊依然纯正。高中班好多同学后来纷纷考入大学，发展得很好。初中班陈富宝两个子女都大学毕业了，也常常来看望，已经快是五十年情谊的延续。

在离校 27 年后的 2005 年，我作为老师为主，与学生们多次在家里筹备同学会事谊，大小事宜均考虑周全。同学会那天，初、高中三个班级计一百五六十位师生，竟有 123 位参会。同学会开得热烈隆重，场面激动人心。重温当年岁月，留下深刻记忆。

1978 年 5 月，到慈东公社山东大队报到之后，离高考时间很近了。便要求准备复习备考。但报考什么专业，又是费一番周折。在普遍重理轻文的年代，尤其是经过历次运动，对文科退避三舍。社会上流行“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报考文科，按以前的态势甚至有风险，是需要有勇气的。且文科录取比例也很少。我在学校文理皆优，文科擅长些。特别在东吴中学教学语文多一些，也就偏重文科。

在复习期间，找到宁波二中复习迎考点，有了一些复习资料。经过近一月多紧张复习，就到户籍所在地的慈城报名高考。高考地点设在慈湖中学。因为要住宿，被安排在公社大礼堂里。时值盛夏，实在煎熬。礼堂边河流混浊，蚊蝇成群。由于水土不服，又饮食不洁，竟然在高考的关键时刻发起高烧来。一时心急如焚！

为了不再错过这次非常难得的考试机会，于是在7月20、21、22日三天咬紧牙关挺住，服了点药，用冷毛巾一敷就上考场。考试科目有六门：语文、数学、政治、历史、地理及英语。记得语文考题有“盘桓”、“伫立”等词填充。此时高烧头热，也正云里雾里地“盘桓”、“伫立”



着哎；还好作文是缩写，篇章结构的调遣幅度不是很大，就过关了。最后一天的英语考试是不计分，仅作参考，也就坚持完成全部考试。在这样状态下，虽然出师不利，但最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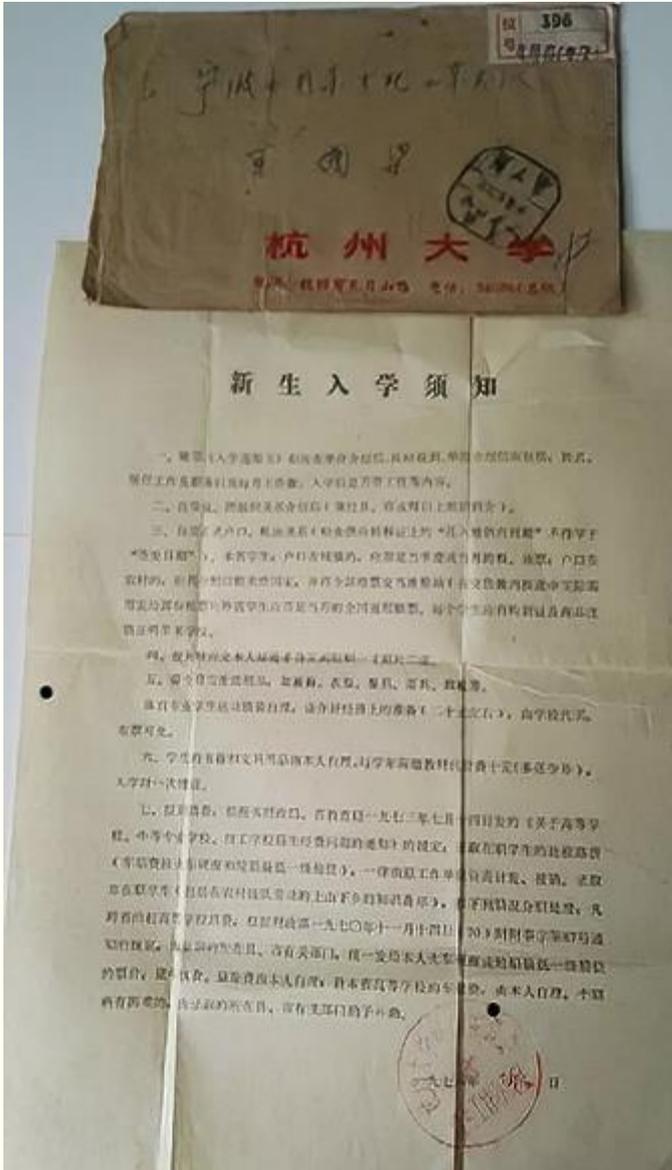
还是考出总分 357.5 分的成绩。

我咨询宁波招生办主任汤菊生时，他说填报重点大学的分数还不够点，可以填报试试。因为当时浙大没有中文专业，而黄大鸣同学已成功报考复旦大学，我便报考该校中文系和新闻系，第二志愿是杭州大学，第一专业中文系。

“盼星星，盼月亮，只盼着深山出太阳。”等待录取的时刻十分漫长。好不容易等到八、九月份，考生们录取通知书陆续寄来。尽管当时高考录取率仅有百分之几，真好比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还是打听到有录取的考生喜讯。而我的却姗姗来迟。

在急切期待中，询问市高招办，得知已被录取，但却没有收到杭大录取通知。于是写信给77年已经考进杭大数学系的蒋敏校友。他是我在鄞县中学高中备课会时结识的天童宝幢知青。可信被张敏校友收到，就帮我到杭大招生办查询到已经录取，还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来信，说：“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他虽不是“蒋敏”，

也未曾见过面，但值得帮这个忙，更值得为我庆贺。原来录取通知书未邮到家里，而是寄给当时插队落户的慈东公社了。公社里想不到居然有人考中了。一时都不知晓我的名字，于是录取信件被搁置了。



当我到慈东公社去取信时，他们才得知原来还是本公社插队知青，一下子高兴起来，说是为公社争了光，向我祝贺。该时已近中秋，我特意买了月饼，分给公社和队里社员，分享来之不易的喜悦。

1978年10月，杭州大学开学报到。开始新的学习旅程，随后也开启了新的人生征程。有幸在杭大中文系读书深造，在浓厚的人文氛围熏陶下，传道解惑，获益良多。与学友们同窗四年，

情谊可贵。

大学毕业以后，我被分配到法院工作。随后，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浙大法律本科专业毕业。到过奉化法院、宁波地、市中级法院、

浙江高级法院工作。从事多个部门，像是“法院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为法律审判、史志编纂、法治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四十年前曾经的高考，是太珍贵的一次精神洗礼。那次高考影响了整个人生。感恩美好的时代，感谢同学、同仁！感怀过去的岁月，感念珍贵的友情！

（2022年7月）

【作者介绍】童国樑，男，1957年宁波出生。1978年就读于杭大中文系。1982年毕业后，先后在宁波地、市中级法院及浙江省高级法院工作。在司法审判、业大、文秘、史志编纂、文化建设等多个岗位工作。入选于法律专家库。曾任《宁波法院》主编、《浙江审判志》、《浙江高院年鉴》编审。出版千万字数的多部史、志、鉴著作，以及文化理论专著《（法治）文化通论（稿）》。任调研员，史志编纂专家组成员，中国法官协会法院文化分会成员。为推进和繁荣法官、法院、法治文化和中华民族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多次多项获得全国、省、市奖励。现任宁波市、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

[返回目录](#)

走向高考

—杭州大学中文系 77 级 田伟

走向高考，于我，可能得从七七年那个春天说起。

那一年已是我入职“杭化”的第三个年头了。一切似乎都很好，依时令春来花开。“春日载阳，有鸣仓庚。”记得读过这古老而美丽的诗句。那一年的春天和以往有什么不同呢？它比以往的春天来得要早一些，也长一点，于我。因为那年开春，我跟师傅受工厂委派，来到浙西山区仙居县安装空分设备。用现在的话讲，这叫技术下乡或对口支援吧。

仙居，仙人居住的地方，就那时候我真够远了。长途客车清早出发，傍晚才到。我和宝品师傅在仙居足足耽了两个月。半个春天过去了，才把整套空分设备安装调试完成打道回府。初春和仲春都是在仙居化肥厂渡过的。

仙居的春天比杭州来得早。两个月没回家，回到杭州才发现，我的老东家周边油菜花田一片金黄，刚进入盛开期。而我刚刚离开的仙居城关镇，金字塔下化肥厂周边田野的油菜都青荚鼓鼓结籽了。这个春天于我和师傅是明显延长了。

对了，派出师傅和我去对口支援的老东家是杭州化工厂。听厂名就知道，当年能以一个省会城市来冠名的厂家，肯定属于全民所有制单位了。这个很要紧。五、六十年代生的人都知道，那年头，除了城市户口、农村户口的城乡分壤之外，城市工作单位也是分三六九等的。长辈们为孩子找对象，首先问的不是干什么工作而是在什么单位工作。反正那辰光，各行各业年轻一代工薪水平都差不多。虽然不比农村公社化，老少统统计工分一刀切，但按人头领粮票的性质也差不多。工农学兵的身份属性倒是被特别强调。

你看，就几年前，工人宣传队还进驻过所有学校，包括我的母校杭二中。号称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工宣队甚至接管了我父母亲们工作的报社这类所谓意识形态单位，那是杭州钢铁厂工宣队。杭钢那时是浙江最有代表性的产业工人集聚地，当然也是公有制全民所有标

杆。“文革”高潮中，造反派武斗，藤帽铁棍的杭钢民兵也是所向披靡的。反正工人身份比父母辈知识分子的帽子香多了。那是划成份拼出身的年代，工农商学兵、党政军民学。怎么排，知识分子都是臭老九，轮不上号。

而我居然在一家全民所有制单位当了工人，并且是机修车间的钳工。这也算是改变家族成份了吧。

“工厂万行，钳工为王。”这是我们工友唤做“老太师”的机修车间主任陈师傅说的。他是七级钳工，最高八级。那还是因为“文革”耽误，多年未评职称。我师傅是五级。他是从大西北兰州一家厂名用代号的军工厂调来的，也算高职称了，担任钳工班副班长。班长汤师傅四级。这是他们之间有疙瘩的某种原因吧。我以徒弟之心揣测，因为五级工要由四级工每天分派工作任务。四级工一直在本厂工作，所有机械设备都熟练，五级工从西北大厂调来不久，解决了夫妻长期分居问题，却面对各种从没接触过的化工机械故障。好在钳工为王，一通百通。

我和汤师傅的徒弟国城兄却是最要好的朋友。当过义务兵的国城兄写得一手好毛笔字，厂里布置宣传橱窗总是找他。我们都是二级工。我进厂就是二级工待遇，原因是我进厂前是杭二中留校的小老师，已有两年多了，教龄抵工龄。

我算“文革”中毕业的首届高中生。那时，高中学制也只有两年。因为“文革”绵延不息，中学已经多年没有大学生进帐任教了，师资奇缺。所以我们毕业时，学校就从平时成绩出色的毕业生中选了一批留校，作为师资培训。整个杭州市各中学加起来一共 500 名，号称五百个小老师。这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高潮时期的一次另类分配，杭州市教育界的一批特殊编制。所以，以后被“革命造反派”盯着不放，一批再批。

我始终没弄明白，我们这算什么体制？公办中学教师算干部是知道的，那应该算是全民所有制了？可是当了两年小老师，其中有一年还是被发配到杭州玻璃厂劳动接受再教育。因为，当小老师没多久就开始批判修正主义教育黑线回潮了。我们这五百个小老师被认作黑线

产物，是走资派培养修正主义的“小绵羊”。那时候的政治术语也够丰富的。大批判、大革命不患无辞。

我留校时也就十七岁吧。因为读书成绩可以，教语文的钟老师还让我参加了学校写作组，所以成了五百分之一，分在杭二中师训班的语文组。并且不久就赶鸭子上架，师训几个月就给初中生上语文课了。记得，我开讲的第一课是散文《海螺渡》。备课笔记写满了大半本练习簿。

我一点没有杭二中小老师的荣耀感。因为父母亲、父亲的父亲都属于知识分子“臭老九”的缘故，所以最羡慕的就是那些分配到工厂的同学，甚至那些到边疆生产兵团去的也好。那都是全民所有制单位吧，哪怕是集体也好，都是公有制，社会主义性质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经八年“文革”洗礼都铭心刻骨了。

小老师们很快被发配到杭州玻璃厂，就是派工宣队进驻我们学校的那家厂，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住工人集体宿舍，下拉丝车间劳动值夜班，全身被飘浮空气中的玻璃丝戳得又痛又痒时，亲们不无恐惧地担心，咱们这批小老师是否已归于黑五类了？所以，当学校顶不住“批林批孔”批教育黑线压力，通知我们师训班结束了，当局将我们二次分配工厂当工人，我真有久旱逢甘霖之感！小老师们结束了以准臭老九身份接受劳动改造再教育的委屈和窝囊，堂堂正正走进了工人阶级队伍。我们先是分到永明树脂厂，大集体性质，后又有一半转到杭化报到，全民所有制。

漫掷书本喜欲狂，这是我当时的真实感受。所以，后来大学毕业又面临工作分配之际，当系领导姜老师找我谈话，征求我对分配去向意见，第一句话便是你愿不愿意当老师时，我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我当过老师，觉得自己不适合当教师。婉言谢绝吧，脑海中当时闪过的便是小老师下车间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那一幕吧。

知道杭州化工厂吗？顺着莫干山大道一直向北，北大桥下，绿油油的田野上空悬浮着一大片灰黑色的云层，云层下面就是我们厂了。这云层是化工厂烟囱排放物形成的雾霾。

杭化是杭州当年污染最严重的化工企业之一。它的一个主要产品是化肥石灰氮。看看这厚厚的牛皮纸包装袋吧，上面赫然印着骷髅头

和两根交叉的森森白骨，像“白虎团”的标志，就知道这种化肥的毒性有多大了。我们每次到石灰氮车间维修或者抢修设备，都要全副武装，披上安全帽盔，扎紧工作服袖口，露出脖子处也围上白纱巾，再戴上如假包换的防毒面具。就是那种电影里才看到的前面拖着一截长长的象鼻子的防毒面具。就这样一工下来，鼻子孔耳朵眼掏出来的都是石灰氮肥料。

还有那尔日夜炉火熊熊，大烟囱一年四季喷云吐雾的矽铁车间。每次更换易损品铜抱箍，也都是抢修不停炉，在烧得火红的焦碳上铺上一层钢板，师徒们就上去跌打滚爬了，脚上钳工班专配的牛皮工作鞋底烫得滋滋直冒烟。这矽钢片生产还是问题生产，据说有一种劳保职业病叫“矽肺”的就跟这有关。

我们在仙居三字塔下养足了精神就又回厂吸化肥了。当然也不尽然。离开主厂区，下坡又上坡，穿过一片油菜田，那边孤零零的围墙里还有一个空分车间是我们厂的。该车间利用空气分离原理生产工业用氧和副产品瓶装氮，主要设备就是我和师傅去仙居安装的那些东西。制氧机吸取的空气当然是新鲜清洁的。那厢还有一起当过小老师的女同学，在车间值机，碰上了可以聊几句。看你干活，还可能帮助递递工具。

所以每次班前会汤师傅分配任务，我对派到远离主厂区的空分车间做生活总是有所期盼。

有盼头的生活是充实的。仙居回来后，我和工友国城兄一起报上了杭州业余化工大学，当然属于不脱产学习。国城兄一手好书法，学制图显然比我有功夫。他并且已经悄悄的看上了我的一个女同学。她当小老师时分在数学组，并且开始了积极有效的恋爱行动。我后来想到，是否受到数学小老师影响，国城兄才不辞辛苦，和我一起老老实实报读业余工大？

是的，现在已是七七年了。在经历了跌宕起伏的一九七六年，在看够了那么多的眼泪、激动、愤怒、沉默以后，如果你还没有麻木，总得有些新的作为，新的期盼吧。

七六年的开端便是周恩来总理逝世，十里长街送英灵，联合国还下了半旗。然后三月，东北遭遇了世界上最大的陨石坠落事件，即吉

林陨石雨。不久就爆发了百万民众清明祭的天安门事件。接着又是朱老总的去世和毛泽东主席的病重，伴随着那场惨绝人寰的唐山大地震，数十万人的性命瞬间灰飞烟灭。毛泽东也在悲忧交加中辞世。也许，上苍就是以这样的天崩地裂来警示，“文革”这样的政治运动，天怒人怨应该结束了！

我记得厂里一位技术员，抱歉已忘了他名字了，那时经常在厂门口北大桥边踟蹰，默默望着北方。工友天林的师傅是车间书记，了解人事多些。天林悄悄告我，那个技术员是唐山籍贯，家里的亲人在大地震时失踪了，其实都已经死了。

我对厂里的技术员工程师有好感。他们一直坚守岗位，生产上有问题随时找得着他们。前两年，杭州民兵藤帽铁棍上街，车间也时有年轻工人呼啸而去，耀武扬威的，眼中无人。但对这些经常下车间一起干活的技术员工程师也是尊重的。你会的他们会，他会的你行吗？

每次设备大修或安装新设备，他们都到现场，被老太师和师傅们围着讲解图纸，点过头以后，大家才散了干活。感觉上，他们就是同样穿一件工作服，脖子上扎条白纱巾，清清爽爽的也透出股书卷气来。

可是要当工程师技术员就必须上大学吧。运动不休的文革已经将高考封印十年了。虽然听说大学这几年恢复了招生，但只招单位保送，领导批准的工农兵学员。而且名额极少。

但钳工班真有工友轮到了。那就是天林。他是老三届高中生，比我大不少，已结婚生子。他读书多，聪明灵光，本来早就应该读大学的，如果不是这场史无前例的“文革”的话。当然，天林现在能够被推荐保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师傅是车间书记吧。而他师傅的师傅则是车间主任老太师！呵呵，原来天林还是老太师的徒孙。原来还是要讲出身的，羡慕吧。但对天林，我和国城绝不妒忌。论工龄，论文化底子，也早应该轮到天林了。然而，这个机修车间三年仅见一回的大学名额，最后竟被天林自己舍弃了。国城兄告我，天林耽心自己读书去了，家里婆媳关系不睦，没人协调，小孩又刚刚出生。

当然放弃了难能可贵也轮不到我们。我和国城兄还是每周两次坚持骑自行车去读工大。空下来他弄他的书法，我玩我的诗。快乐合作

一把，本人拙诗一首，国城兄行草一幅，也在六公园边上的杭州书画社展出了。

如果日子就这么过下去也不错。有稳定的技工工作，有纯洁的兄弟友谊，还有朦胧的青春期盼。工作虽然又脏又累，但歇下来也惬意自在呵。我和国城兄常在工余时间溜到厂子后面的新开河畔，躺在茸茸绿草坡上，听空气中的蜜蜂营营，仿佛闻得到麦苗拔节灌浆的香味。

因为整天汗湿工作服，在我们眼中，化工厂的春天和其他季节的差别并不大。我记忆中的化工厂主厂区是没有鸟语花香的。厂区主干道上都是运送石灰氮散落的肥料，步子重了就扬尘。几棵光秃秃的路边树，枝杈上积满了烟尘，盛夏也没有知了来占枝嘶鸣。

记忆中的那个夏天特别热。那时哪有空调？钳工班里两台排风扇开足了马力对着钻床猛吹。我这天一个人留在班里加工法兰盘，按图纸尺寸大小打孔。给我打下手的是个浙大子弟临时小工，只有十六、七岁。这救了他，不然以这小鬼头爱凑热闹的特点，也把他一锅端进去了。

事故就这么“呼”地一声巨响发生了！在一九七七年那个酷热的夏天，在化工厂没有知了可以攀枝嘶鸣的赤裸裸的近午阳光下。

石灰氮车间几十米高的石灰窑正安装卷扬机。班上两位年轻师傅安装完毕后，依例要对卷扬机负荷承重进行调试。这活儿对钳工班来说太初级阶段了。也许是天太热昏了头，也许是不愿歇石灰化时间耗力气，几个来看试车热闹的工友居然和两位年轻师傅一起上了料车，当了试车的承重物，被启动的卷扬机拉上了数十米高的石灰窑。然后，卷扬机的钢丝绳突然绷断了，一车人从高空摔下来了！

我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参加抢救的，只记得大卡车冲出厂门猛转弯冲上北大桥时的剧震。一车厢横七竖八躺着的是受伤工友。伤得最重的是天林。只有他一直没有发出声响。料车摔下来时一根三角铁正好对着他的头颅。好容易挨到浙二医院，大厅里一片工友痛苦的呻吟。天林依然没有任何声音。我怀抱着他，扶着他脑袋的手颤抖着越来越沉，耳朵里一片知了的嘶鸣声。不是说杭化是没有知了的吗？怎么从石灰窑那里一直嘶叫到医院来了？

医生终于来了，要开颅手术。我把天林破损的脑袋移放到医生手里，手上是红的还有白的，嗓子眼发出的也是一片嘶声：救救天林，医生，救救他——

天林没有救过来。那个热昏头的夏天记忆深处，只留下天林的面容。据说，发生事故时老太师也赶到场。他看着满载徒儿徒孙的料车从高空坠下的心情，无人知道。只是这以后他话更少了，常常一个人背着手走到厂门口望着远方出神。也许，天林没有放弃那个名额，赶上最后一届工农兵大学生就好了！

这以后不久，十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以“全国高校招生会议提出今年招生意见”为题，宣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我义无反顾地走向考场，初试，再复试，录取通知……有时，我冥冥中觉得自己的高考还含有天林们未竟的愿望。

七七级大学生是七八年二月入学的，入学前我评上了七七年度杭化厂先进工作者。我知道，这是老太师们有意把这个名额奖给了考上大学的小钳工。小钳工戴着大红花，穿着蓝色工作服，脖子上扎着白纱巾的光荣照在厂区宣传橱窗挂了很久，国城兄告我。

国城兄四年以后娶了小老师同学，数学组的小忆。她和我同时参加高考并被录取，一毕业就嫁给心仪的国城兄了。她学医成绩优秀留校，后随国城兄一起闯荡岭南画派根据地南粤，从事医教研工作，获终生教育奖，还是省级名中医师。

国城兄善于吸收成长动力蕴发艺术才华。他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书法专业班，以极高的才情，坚韧的毅力，在自己喜欢的书画天地砥砺前行，硕果累累。并以“诗书画印”四艺同修的学术主张开枝散叶，早已是著名的书法家、艺术家了。

（2022年9月）

[返回目录](#)

我的高考录取通知书

—杭州大学外语系 80 级 宋宏亮

1980年夏天一个晚上，小吴匆匆跑到我家，告诉我说，我考上杭大外语系了！小吴妈妈在温州邮电局机要室工作。她妈妈大概是提前看到温州高考上榜名单了。

我家正在吃晚饭，我父母都愣住了。我爸完全的不相信。他既不相信小吴消息的来源，也不相信我能考上大学。我妈将信将疑。她知道小吴妈妈确实在邮电局工作，但是她对我的高考成绩也没有信心。

我自己比较相信小吴带来的喜讯。她跟我在温二中高考复习班同学几个月。我知道，小吴妈妈确实在温州邮电局工作。她带来的消息应该是有根有据的。而我在温二中高考复习班屡次模拟考试中也是入线的。能考上是在我的预料之中。

从梨园转科举，在古代是不可能的。梨园一入深如海，一旦戏子，一辈子戏子。这是我父亲当年给我的一生定性。我父母当年同意我进剧团，完全是为了能逃避上山下乡。但是我爹正告我，你上了这条道，就再也回不来了。

第二天来了邮电局专差，送来我的录取通知书。我爸妈目瞪口呆，邻居也惊掉了眼镜。1980年温州地区高考录取率仅仅4%，竞争异常激烈。我住的我妈医院的宿舍大院，医生院长们的孩子，有n多名参加高考的应届生，可惜都没考上。我一个读完小学就进剧团的戏子却考上了。这太令人不可思议了！有人至今怀疑我做了什么手脚。

其实演员出身参加高考，上大学也很多，可以随便举出例子。不过，都是演员考上艺术院校，算是回炉深造的。比如殷秀梅15岁进入鹤岗歌舞团，在1983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我这样彻底脱离演艺领域，转考外语的，好像真不多。

有人曾经问过我，当年为啥不去考艺术院校？杭大录取你有没有加才艺分？我好像很难回答这类问题。我那时尽力隐瞒我的戏子黑历

史，根本没有考虑过显示才艺能加分。我要上大学的外语系，就是为了远离小舞台，登上一个大平台看世界，能看得远一点。

记得杭大外语系招生老师来温州面试考生，给我一个so that的句型，要我当场造句。我记得自己急中生智，结结巴巴说出：“The police runs so fast that he catches the thief.”于是我就被杭大正式录取了。

[返回目录](#)

第二章：入校

忆杭大报到日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吴磊

四十四年前，1978 年 11 月 2 日，周四，晴天。嘉兴车站的月台上，拥挤的人群中，为我送行的父老乡亲早早集合完毕。亲友们喜气洋洋，用悦耳的乡音讨论热门话题。人人都翘首期待着一趟由东向西的绿皮火车进站。

那一日，世界无大事，只是诞生了 3 位著名的足球明星。嘉兴县的长山河上，有 30 万劳动大军齐集完毕，一项伟大的水利工程拉开序幕。对我而言，这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对现今金榜题目的莘莘学子，以下故事听起来好像在看一本老电影。

记得我怀里揣着一张珍贵的入学通知书，上面盖着“杭州大学革命委员会”红印章（用百度搜索一下：“革命委员会”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各级政权的组织形式，1978 年宪法进行修改，这种特殊时期的特殊产物终告结束）；一份单位介绍信，一份团组织关系介绍信，一份正式户口、粮油关系和当月的粮、油票；正面脱帽一寸照片二张；学年代管费十元（相当于本人当月 1/3 的工资）。

站台上的堆放的行李有：一个超级大的木箱，后来被置放在宿舍行李架的最下端，否则一定会压塌其他同学的箱子；箱子里比较奇葩的有如下几件物品：一件体积庞大的羊羔皮大衣，冬天压在被子上可取暖。一次，我班男生 Tom 看到我穿着羔皮大衣，眼镜大跌，大惊小怪地说，这是北方山里放羊的老大爷穿的。这么热的地方穿这个，要热到出鼻血的。被他一说，害我再不敢穿了。还有一条新翻的丝绵被，厚厚地放在箱子上面，怕压。还有几件冬衣。那时的棉袄又是体积庞大。哎，为什么当年的我如此怕冷啊？害的箱子这么大！

木箱边上，趴着一个超级大的黑色手提包。大箱子装不下的行李，全部由它兜着。记得妈妈帮我准备行装时，忽然发现她宝贝女儿有个短板：不会缝被子。已经没有时间传授技术了。妈妈当机立断，带我

去上海，在各家大商场逛来逛去。最后发现了这个大家伙，让我躺下试一试，整个人可以装下。妈妈很满意，立马下了订单，驮回家。

第一年寒假，我果然高高兴兴地提着这个大袋子，里面塞着被子，回家过年了；又提着妈妈缝好的被子，急急忙忙地回到学校。后来，提着巨大袋子上、下车讨人厌的情景，迫使我去学缝被子。第一次实习是去男生寝室，在帮助我们班男生缝被子中完成的。因为本人当了四年副班长，关心和帮助同学是工作内容之一。为何要缝被子？当年还不知道被套为何物。铺在长桌上缝被子不是一件易事。花花绿绿的被面和被里轻轻折叠好。被胎是棉花絮弹的，厚厚实实。一针一针完成杰作后，一看，糟糕！缝好的被子是一边宽，一边窄，超级难看。好在那位男生不嫌弃，连声说道：谢谢班副！

箱子中还有一宝物，我敢保证杭大仅此一件。那是一根很长很粗的塑料绳子，是我闺蜜亲手打造并赠送于我。每当寒冬刺骨的天气，太阳露脸的时候，我就会找一块大场地，在篮球架或大树下绑好这根长绳。我们 305 寝室的 7 朵金花的 7 床被子和垫被，全都会齐刷刷地爬在上面，在温暖的阳光中聚集能量。那天晚上的寝室里满满地都是温馨。

当然，行李中还有军绿色的书包、铁皮铅笔盒、几本英语词典、一个红灯牌收音机，还有网兜兜住的热水瓶、吃饭用搪瓷碗和脸盆。

一声汽笛，飞快的火车减速，轰隆隆地进站了。我哥哥一手扛起大木箱，一肩背着大行李袋，用力挤上火车，忙着为这些大行李找个架子安放；我跟在哥哥后面，东张西望搜索空位子，好像没找到。车窗外，送行的亲友挥手道别，不时地叮嘱几句。我先看到妈妈的满脸笑容，又看到爸爸在偷偷地抹眼泪……忙转过身去，听到哥哥在叨叨：“这么大的包，怎么拿？”

看着车窗外一路风景，想起昨日。在车站隔壁的粮食仓库里，我工作 8 年单位，领导和同事邀请我回去开了欢送会。有一张合影留念一直保留到现在。出大门时，听到同事小周阿姨在后面喊：“小吴啊，去梁山伯和祝英台读书的好地方，一定是你的缘分在那里。别忘了，

找个对象带回来哦。”我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这位阿姨太逗了，一定是越剧看多了。不过，杭州真是读书人的天堂。

出了杭州城站，迎面看到杭大接我们的校车。好激动啊！感觉享受到贵宾级待遇。坐上校车，一路畅行。现在脑海中最清晰的画面是很快找到了305寝室。我推门进去，哥哥提着行李跟着进去。里面的2位室友，是南京来的Anna和福建的Marry。首先热情地互相打招呼，得知她们外省同学没有收到杭大推迟开学的通知，所以到了。并且积极争当志愿者，为我们把教室和寝室打扫得干干净净，迎接我们的到来。

我选了靠门边的下铺安顿下来。哥哥首先拿出帐篷，敲了几个钉子，把蚊帐挂好。然后去盥洗室看了一眼，就消失了。快到午饭时间，哥哥敲门进来，带来一个漂亮的宝蓝色的塑料桶递给我。吩咐我，提水用这个，省力。送哥哥下楼，他一遍一遍地叮嘱各种注意事项。我很害怕他也会像爸爸那样抹眼泪，连声说再见，再见！转身逃回寝室。

四年中，哥哥给我的蓝桶，每天陪着我洗洗刷刷。光线昏暗的盥洗室里，这个水桶立在哪里，一道靓丽的宝蓝色。毕业离校时，我扔掉很多东西，唯独没舍得扔掉这个宝蓝色的水桶，并带它坐火车回了家。

后来，Anna和Marry同学大笑着告诉我。那天哥哥临走时，还郑重其事地托她们，要多多照顾我。我可是305寝室中最大的大姐姐啊，真是的。

四十四年过去了，涂抹一首江城子，记录下这段往事。

【江城子·难忘亲友送我情】

（次韵苏轼）

金风十月喜新晴。
秀河清。
月台明。
送别时光、满脸笑盈盈。

西子鸳湖波漾漾，金潋滟，玉娉婷。

莺歌雁舞伴瑶筝。

故乡情。

旅人听。

黉馆求知、文脉贯钟灵。

难忘禾城梧叶影，杨柳岸，总青青。

(2022年10月4日)

[返回目录](#)

上大学前夕的感慨

——杭州大学中文系 78 级 倪建平

一九七八年十月二日，我与平日一样照样上山砍柴。中午，当我刚把一担柴卸在门口时，母亲远远地跑过来告诉我：杭州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来了！



我揣着印着鲜红的“杭州大学”落款的信封，获得上大学读书的喜悦和很多美好的憧憬自不必说，无限的感慨也涌上心头。人啊，当你冲破了人生进取的罗网，迎来新机会的时候，往事也会像烟霞一样，时而袭来，时而远去，但永远留在心底。

我的家乡坐落在诸暨、富阳、桐庐、浦江四县交界的诸暨马剑。山清水秀，民风纯朴。与山外相比，虽属贫困山区，但历来耕读传家，人心思进。我们倪家的堂匾叫“带经堂”，意思是要子孙后代像先祖倪宽那样带着经书干农活，干农活和读书要兼得。它喻示：只要你肯努力，人生总是有出路的。因此，历来走出去的成功人士不少，名人辈出。

我虽一生平庸，但在青少年时代，应该说是勤奋上进的。十三、四岁碰上“文革”。作为山里的孩子，读书不正常，很多时间则在山上砍柴。六口之家的烧柴多是我一人承担的。父亲看我不读书，便叫我在下雨天和晚上去跟刚从杭一中回村来的一个同宗伯父去学习。

这个伯父是我们村解放前唯一在北京读过大学的。他家庭成份地主，历史上曾为胡宗南当过秘书，有过上校身份。所以，文革初期就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回村里来。我在当时能有个老师辅导，又能在他那里把《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诗词》当教材，看书看报，遇到问题随时可请教。与村里同龄人相比，劳动和学习两不误，心里感到很充实。

记得当时还没有成语词典，但像“黔驴技穷”这样的成语，伯父会给我讲贵州人引进驴以后，当地的老虎先是惧驴，后来看穿驴的伎俩后把它吃掉的故事。

我当时经常读报。所以一进初中，老师要我们写声讨苏修侵犯我珍宝岛的文章，我就能很快写成。又如1969年，我们马剑通了公路。老师要我们写通车典礼的作文。我听过伯父说写文章要由此及彼展开来的教导，在写了通车典礼的热闹场面后，还把我父辈在没有通公路前在这条崎岖的路上怎样把山里的毛竹背出山去，又怎样把山外的石灰挑进来的艰辛历程等写进去，使文章内容更加丰富。有了这样的底子，我在读初中时就经常受到语文老师的表扬。

但好景不长。运动之中，杭一中的人员来追查伯父的历史问题。我还看到来人几次对伯父拳打脚踢的粗暴。伯父生活不安耽，我学习也就不稳定。

从十五岁开始两年（1969-1970年），为减轻父亲的负担，我一边读初中，一边为生产队牧牛一只，其收入可维持我的口粮。

一九七一年，马剑办起了高中。我很希望继续升学，可“推荐”两字一直堵着我的读书求进之门，原因是我父亲的历史问题。我父亲解放前被抓过壮丁，辽沈战役中在沈阳被解放军整编，从国民党廖耀湘的部队整编到共产党林彪的部队。后在东北农场里学习工作了四、五年后回家种田。但文革中却不胜其扰。因我父亲五二年从东北回来，且我们马剑又是于一九六七年从浦江县划到诸暨县来的，档案不全。文革中村里搞清理阶级队伍，一次又一次的办学习班。父亲虽然头上没有帽子，但当年出去是国民党，至少是个“阶级异己分子”。所以，村里推荐读高中，始终轮不到我。

一九七一年，劳动了一整年后，一次在水库工地上遇塌方致踝骨骨折。在我们农村，这种骨伤得休息一百二十天。如此漫长的日子如何挨过去？我心焦如焚，急于找一份不下地走路的事做。无奈之中，联系了安吉县章吴村的外婆，要求去跟外公学兽医。脚不能走动，可先坐着读医药书。那时年轻记性好，读熟的医药书到现在都还能背出一些来。

我的外公曾是国民党十九路军蔡廷锴手下的一个营长，又会当兽医给战马治病。由于身怀技艺，在安吉良朋、长兴泗安以至安徽广德那一带是有名的“牛医生”。不要说浙皖交界的农村社队，就是当时的浙江省生产建设兵团三师九团（现安吉南湖林场）的牛生病了，也来请他去诊治。

那时，耕牛是农民吃饭的大家伙。春耕或双夏大忙季节，一头耕牛病了，田耕不出来，会影响一个生产队二、三十户人家的吃饭问题。而我外公总能及时赶去解人之难。譬如，春耕季节，耕牛吃多了含苞的草籽，发胀得要死。我外公会及时赶去抢救过来，社员总是感激不

尽。又如，双夏大忙，耕牛关节脱臼了，我外公会在几天之内把它治好，以致不误农事。我当时认为没有其它出路，学它一技傍身再说。

但我外公头上也戴着“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他家旁边的吴昌硕故宅，当时是章吴公社革委会的驻地。外公作为政治上的被专政对象，住得离公社又那么近，他家里我就不可能长年住着。因此，在断断续续学了两个半年后，回到了老家。但当时公社兽医站进不去，搞个体又不允许，只得再在生产队劳动。

一九七四年下半年，我们马剑公社在县里公办（规定招生名额）的两个高中班之外，办起了一个农高中班（三班），名额由当地自定。我当时正好看了参加过国民党同盟会的一个叫季交恕写的《六十年的变迁》一书，书中主人公时断时续的读书经历使我也萌发奇想。在一个下雨天去马剑中学玩时，和任教农高中班班主任的朋友谈起我是否还可以来读书时，得到了他的支持和帮助。于是，在别人第一学期快结束时插班进去，这样读了一年半，拿到了高中毕业文凭。

由于我在读高中期间多次向县广播站投稿，同时又经常给公社里写写弄弄，这两个部门都对我有好印象。所以，在高中毕业后刚完成“双抢”，就被县广播站抽去培训。在县广播站，我下乡采写多篇报导，被连续播出。广播站领导看我可以，就把我抽到编辑部编稿件。这时，坐在我对面的老师就是文革前杭大中文系毕业的。与他相比，在识别稿件是否可用的能力及文字功底上，我自觉相差一大截。因此想到如果要吃这碗饭，必须去读几年中文系。

从县广播站回来，公社里说要把我这个人用起来。先是把我安排到公社的湖源江水电站工地上负责政宣工作，后来又叫我去当代课老师一年。

一九七七年，迎来高考的消息，我怕失去公社给我的一份工作，没怎么复习就去参加考试，自然没考起。实际上，之所以没怎么复习，主要是可惜眼前的位置与担心考不上之间的纠结。

一九七八年上半年，我经过一番认真的思考，认为以前抱怨读书受阻。现在，机会来了又患得患失，不肯放弃眼前的小利。那么将来会懊悔的。于是，已是二十四岁的我，毅然下定如“高考不考起，老

婆也不讨”的决心，脱产去马剑中学复习了两个月。因此，参加七八年高考，自我感觉良好，顺利通过。当得知杭大的录取分数线时，心里笃定，因为我超出了60多分。

收到杭大录取通知书之后，我满怀喜悦，但依然天天参加生产队劳动，直至去杭报到的前一天。让感慨始终藏在心底，使之成为我终生爱读书学习的无形动力。

[返回目录](#)

第三章：学习

曾经聆听在杭大 | 听飞白讲俄国诗歌

——杭州大学中文系 80 级 李剑亮

记得有一位学者曾经说过，一个人来到大学求学，首先当然是要听本校老师的讲课，其次还要多听校外学者的讲座，这样的大学学习才算是完整的。回想自己在母校杭州大学的求学经历，对照此说，还真有不少的感悟与体会。

我在杭大的求学，前后持续近十年。在这期间，我聆听了中文系大部分老师的课，以及他们在课外面向全校学生举办的学术讲座。

本校教师的讲座中，有一次是由飞白老师讲述的俄国诗歌翻译。

那时，飞白老师刚从部队调入中文系，也就是我求学的学系。学校为了让大家尽早地感受这位精通多国语言的诗歌翻译家的风采，组织了一场讲座。讲座的内容是关于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

讲座安排在一个很大的阶梯教室。这个阶梯教室位于图书馆东侧一座大楼的最东端的一楼，与体育馆和大操场相邻。大家习惯称作体育系教室，是当时学校安排讲座的首选之地。

飞白老师身穿黄军装，斜背黄书包。那一身行头，着实让听课的同学们眼睛一亮。在我的记忆里，飞白老师在杭大的日子里，这身行头好像是最常用的。讲座的方式，也是与众不同。在正式开讲之前，飞白老师把事先准备好的两大张全开本的白纸，用图钉挂在黑板上。白纸上是他用毛笔写好的讲课提纲，梳理了马雅可夫斯基的生平简历及其每个时期的代表作。讲课开始后，飞白老师便借助一根教鞭，逐条为我们讲解。

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初，马雅可夫斯基在中国被重新重视。1980 年 4 月，全国苏联文学研究会在武汉召开马雅可夫斯基研讨会。飞白老师作为马雅可夫斯基作品的翻译家和研究者，与戈宝权等学者一同出席。那次会议旨在新的历史时期激活这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资源，重申马雅可夫斯基诗歌的意义。飞白老师的讲座内容当与他参加那次会议的论文主题有关。

就在那次讲座现场，我第一次听到了“楼梯诗”这个词。知道那是苏联“十月革命”以后出现的一种新诗体。其结构特殊，往往一句分成若干行。有时，甚至一个词也分若干行，成楼梯状。其特点是突出诗歌的顿歇作用，强调了最有份量的词语，节奏分明，刚健有力，特别适合于朗诵。它的创造者正是马雅可夫斯基。

飞白老师的讲课风格，属于温文尔雅那一类的。声音也比较轻细，再加上那时刚从部队到高校，就讲课效果而言，可能比不上那些谈笑风生的老教授。但我觉得，飞白老师所讲的内容全都是“干货”。那时，飞白老师对马雅可夫斯基诗歌研究已有多年，正在翻译《马雅可夫斯基诗选》，不久便由上海译文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可见，飞白老师的那场讲座，用专业的说法，是以其扎实的研究成果作为支撑。

讲座后的一个学期，飞白老师为我们中文系学生开设了《外国诗歌选》。讲义是他自编、学校文印室印制的《外国诗歌选》。所选诗歌，分别来自英语、俄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等多种语言的作品。厉害的是，这些作品都是由他本人翻译。记得飞白老师对选修该课的同学要求是有较好的外语基础，结果仅有十多位同学报名选修。许多同学望而却步。因为人少，上课地点安排在 9 幢学生宿舍二楼楼梯口的一间自修小教室。也就在那个学期中，同学们渐渐从别的老师那里得知，飞白老师出生于文学世家。其父汪静之，就是现代文学老师课堂上讲述的那位“湖畔诗人”，20 多岁出版了诗集《蕙的风》。但飞白老师在课堂上从不谈及这些。

[返回目录](#)

曾经聆听在杭大 | 听草婴讲文学翻译

—杭州大学中文系 80 级 李剑亮

草婴先生的讲座，是由飞白老师主持的。记得当时草婴先生的开场白，首先陈述了此次来杭大讲座的两点缘由。第一点，和飞白老师是同行，都热爱翻译，翻译俄罗斯文学作品；第二点，自己是浙江人，来到杭大感到很亲切。草婴先生是浙江慈溪人。

讲座一开始，草婴先生就说，他很羡慕大家能在杭大这样美好的大学读书。当时，大家还以为这是客套话。但听了他学习俄语的经历后才明白，这是草婴先生的真心话。他说，我是在上海念的“俄罗斯大学”。原来，他的俄语不是在大学里学的。1937年，抗战爆发，他随全家从宁波逃难到上海。来上海的第二年，他在一份报纸上看到一条俄国人教俄文的小广告，就按图索骥找到了那户人家，跟一位中年俄国妇女学习俄文。那年他15岁。从此，他对俄罗斯语言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42年，时代出版社出版《苏联文艺》，草婴先生开始为该杂志翻译俄苏文学作品，开启了他翻译俄罗斯文学作品的旅程。

与飞白老师不同的是，草婴先生翻译的作品以小说为主。1950年代，他翻译了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部和第二部、短篇小说集《顿河故事》等。此外，还翻译了尼古拉耶娃的小说《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在介绍了他的这段翻译经历后，草婴先生也向我们叙述了“文革”时期他因翻译肖洛霍夫小说而遭受批斗的情节。

“文革”结束后，草婴先生将翻译工作的重心集中在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之所以选择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草婴先生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说，文艺作品首先要关心人，关心人们的苦难，培养人对人的爱，也就是人道主义精神。在俄罗斯文学中，人道主义思想一直占据首要地位，而托尔斯泰就是杰出的代表。也因为这样，托尔斯泰被称为19世纪世界的良心。

听了草婴先生的这段话，使我改变原先对翻译家的一种粗浅的认识。原以为翻译者只是语言的转换者。但事实上，翻译什么，不翻译什么，在这个选择过程中，已包含了翻译者的文学观，乃至世界观。

草婴先生来杭大举行这场讲座时，由他翻译的托尔斯泰小说《复活》刚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不久。有几位同学和老师拿着事先从书店所购的作品，请草婴先生签名。草婴先生高兴地为他们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不久前，我在王蒙先生的《王蒙自传》（花城出版社，2006年）一书中读到了这样一段文字：“五五年或者五六年，团中央发出号召，要全国青年与团员学习苏联女作家尼古拉耶娃的中篇小说《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此书描写一个刚刚走向生活的女农业技术人员娜斯嘉……对于我，一个21岁的团干部，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作者来说，当然颇有魅力。”王蒙先生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中所塑造的主人公林震，也有一句誓言：“按娜斯嘉的方式生活！”

草婴先生翻译尼古拉耶娃《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的时间，正是1955年。草婴先生当年的文学翻译，对随后中国文坛上的另一个重要作家的人生及其文学创作产生如此深刻的影响，不知草婴先生生前是否知道？

[返回目录](#)

曾经聆听在杭大 | 听张毕来讲红楼梦

—杭州大学中文系 80 级 李剑亮

在杭大读书期间聆听的讲座中，有一场比较特殊。时间是 1982 年春天。

一是主讲人张毕来先生的身份比较特殊。他既是一位学者，时任《红楼梦》学会副会长，以及《红楼梦学刊》的编委；也是一位领导干部，时任民盟中央宣传部部长等职。

二是本次讲座的地点比较特殊，不在校内，而是在当年的省人民大会堂。从学校到省人民大会堂，我们先要从松木场乘坐 6 路公交车到湖滨，再步行至开元路以北、将军路以南的人民大会堂。临行前，负责组织工作的老师提醒我们，建筑物门额上有“人民大会堂”几个字很醒目，很好找。

进入会场，发现场内的听众除了我们杭大中文系的师生外，还有社会各界人士。现在回想起来，当初在杭大读中文系，能被上级机关部门惦记并受邀参加这样的学术讲座，用现在的话来说，还是蛮有存在感的。

张毕来先生那次讲座的题目是《漫说红楼》。内容大致包括三个方面。

首先，向我们介绍说，这个话题是他当时研究《红楼梦》的成果之一。他的同名著作前不久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并向我们展示了他的这本著作。我们在台下虽看不太清书的面貌，但还是觉得很厉害。因为，那时我们自己的老师也很少有出版著作的。

其次，具体报告他的研究方法与研究重点。张毕来先生对《红楼梦》的研究，采用的是当时普遍流行的阶级斗争分析法。比如，把贾府中的人物关系解读为不同的阶级关系，包括贾宝玉和他父亲之间的关系也作如此分析。这种带有浓烈时代色彩的研究方法，当时比较普遍，大家也都听得津津有味。

最后，张毕来先生介绍了他担任“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所作的工作。他说，他曾与作家茅盾一起参加一次研讨会。会上，茅盾建议，大陆应该与台湾学者进行学术交流。而与台湾进行学术交流，最好以《红楼梦》研究为抓手。为此，张毕来先生以“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的身份，在主持全国《红楼梦》学术讨论和中国《红楼梦》学会理事会时，发表了一篇《致台湾红学界同仁书》，倡议两岸学者加强交流、进行合作。随后，《红楼梦学刊》也开始刊载包括台湾学者在内的境内外学者研究《红楼梦》的动态和论著。

那次张毕来先生来杭州，应该是参加公务活动，讲座可能是主要活动外的一项“加试题”。讲座的主持人也是省级机关的一位领导。印象中，主持人更多的是介绍张毕来先生数十年的革命经历。其中有一段革命经历便是在我们浙江金华等地从事地下党活动。他的学术经历也因他的革命经历相结合。1936年，张毕来考入浙江大学文理学院教育系。1937年4月，他主动终止学业，投身抗日运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又先后在国家机关和文教部门任职。

时过境迁，现在回顾张毕来先生当年研究《红楼梦》的成果，显然带有明显的时代局限，学界可能会有不同的评价。即便在当时，我们的同学也常常以自己的任课老师蔡义江教授的《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一书为例，认为学术研究当以文本解读为先，如此才能更加凸显研究的学术价值。

但有一点还是让同学们很是敬佩，敬佩他的学术胆识。在1980年代两岸学术交流处于“乍暖还寒”的时候，他以“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的身份，发表了《致台湾红学界同仁书》，积极推动两岸学者共同开展学术研究，其贡献已超越一般学者的学术活动。我本人也受此启发，曾两次飞跃海峡，与台湾学者一起研讨中国古典文学，也曾邀请台湾学者切磋学术于西溪之西的小和山下。

返回目录

曾经聆听在杭大 | 听谢晋讲电影艺术

—杭州大学中文系 80 级 李剑亮

在杭州大学听的讲座中，有一场颇为独特。那就是 1984 年在学校礼堂举行的《高山下的花环》电影导演学术报告会。主讲人就是谢晋导演本人。讲座结束后，谢晋还与大家一起观看了这部电影。

影片描写解放军某部高干子弟赵蒙生临时下放到某部九连任副指导员。连长梁三喜放心不下连里的工作，一再推迟探亲。在自卫反击战前夕，梁三喜斥责了赵蒙生临阵脱逃的可耻行为；在战场上，靳开来、梁三喜先后英勇牺牲；赵蒙生在血与火的洗礼中经受了考验；战后，梁三喜的亲属用抚恤金及卖猪换来的钱，还清梁三喜生前欠债。

这部电影改编自李存葆的同名小说。早在这部小说发表的当初，我们杭大校园里就出现了人人争看这部小说的热闹场面。如今，由谢晋亲自来讲述与这部电影相关的题目，大家自然翘首以待。学校在分配入场券时，也明显倾向于中文系师生。因此，我也有幸获得了一张珍贵的入场券。这张入场券，直到今天，我还收藏着。

谢导首先讲述了其接拍该片的缘由和编剧过程。

原来，在小说《高山下的花环》发表后，即被改编成同名话剧和电视剧在央视播出。随后，八一电影制片厂计划将其改编成电影。但几次审稿都没通过。争议的焦点是，这部小说描写了社会和军队内部的不正之风，描写了老区群众的贫困生活。正当八一厂犹豫之际，上海电影制片厂积极介入。李存葆开始不大愿意。于是，上影厂传话给他：“只要你肯把改编权交给上影，我们就请最好的导演来拍。”李存葆还是犹豫不决，上影再次传话过来：“如果导演请谢晋，如何？”就这样，上影厂获得了改编权，并邀请谢晋当导演。

谢晋接到这个片子后，便请来老搭档李准，并让李准到云南前线去调研，看看前线指战员到底对什么内容最感兴趣。调查结果有两点，一是梁三喜的欠账单，二是爱发牢骚的靳开来。前线战士对李准说：“就这最真实。你们千万别把它的棱角磨平了！”为此，谢晋要求主

创人员把欠账单这件小道具拍出历史感。所谓历史感，谢晋是这样说明的：“历史感就是再过20年，假如还有农村兵揣着一大把欠账单来打仗，那中国就没希望了！”

最后，谢晋颇为自豪地介绍拍摄战争场面的经历。虽说战斗场面在整部电影中所占比例不大，但既然是战斗场面，就要有战斗场面的真实感。为此，谢晋给时任云南前线总指挥杨得志将军写了一份报告，请求前线部队为影片提供所需军械、场地，并调动部队协助拍摄。这份报告得到了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的批准。讲座最后，谢晋不无激动地说，一个导演能如此调动部队和作战装备，真有点指挥千军万马的感觉。

讲座结束后，谢晋与杭大师生一起观看了这部电影。电影放映结束，大家还沉浸在影片营造的氛围中，直到礼堂里的灯光全部亮起来，大家不约而同地鼓掌。谢晋从座位上站起来，向大家挥手致谢。后来，我在《谢晋自述》中看到一段话，总觉得这段话就是在写那次他与杭大师生一起观看《高山下的花环》时的经历。这段话是这么写的：

“有的戏看完的时候很沉闷，有的戏看完的时候你觉得不由得不得鼓掌，我觉得作为一个导演最幸福的事情就是这个事情。还有一个最幸福的时候，我偶然碰到，很多人一般在电影快完的时候都站起来走了，但是我有几部戏看完的时候，还有的（观众）仍是这样坐着，我觉得是我最幸福的时候，因为我自己看到这地方我自己也很激动，他们很多人觉得自己被镇住了，所以很多人没响，坐在那。我说这个是一个搞艺术的，尤其搞导演的，最幸福的时候。还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的呢？”

返回目录

曾经聆听在杭大 | 听韩素音讲时事

—杭州大学中文系 80 级 李剑亮

在杭大期间，我还有幸聆听了一位国际友人的讲座。这位主讲者，便是著名英籍华裔女作家韩素音女士。

1952 年，韩素音女士用英文创作的自传小说《瑰宝》在西方世界引起轰动，奠定了她在国际文坛上的地位。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她的作品陆续被翻译成中文等 17 国文字。不过，韩素音女士此次讲座的内容，并不涉及其小说创作，而是大家关心的一些时政问题。

整场讲座分两个环节。前一环节由韩素音女士主讲，后一环节是回答现场听众的提问。用现在的话来说，便是互动环节。

主讲部分的内容涉及改革开放与学习英语、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个方面的问题。她首先希望大家多学点英语。她认为，改革开放，不能只懂一种语言，否则要了解其他语种的文化就有困难。并以瑞士为例，说瑞士 500 万人口，却有法语、意大利语和德语三种语言。谈到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时，她指出，中国很大，富强起来，有的国家有些怕，他们不愿中国强大。在谈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题目时，韩素音女士说，邓小平继承、发展了毛主席的理论。韩素音女士还指出，现在有的人不了解中国。也有人故意说中国是资本主义国家，他们希望这样。对此，韩女士认为，中国是个很有希望的国家，现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搞得这么成功。这成功是苦干出来的，奋斗出来的。

比较而言，回答听众提问环节的话题更为广泛，涉及到外交方面的、中英香港谈判方面的、中美关系方面的、关贸总协定方面、出国热问题以及拒绝为江青写传记问题等。这些提问与互动，既体现了杭大学生关心历史、关注现在的优良传统，也反映出韩素音女士丰富的历史知识和开阔的国际视野。比如，在谈到中英香港谈判时，韩素音女士指出，英国给香港 25 万个英籍护照，只有 14% 的人要了出去，而

且其中一部分人又回来了。有的人要英籍护照，但不愿离开香港。韩素音女士相信，香港一定会繁荣稳定。

韩素音女士那次来杭大讲座的时间是 1993 年 12 月 3 日下午。地点是杭大礼堂（现已被拆除）。讲座由时任校长沈善洪教授主持。如今，韩女士与沈校长都已作古。所幸的是，韩女士那次讲座的文稿，由时任杭大副校长金锵先生整理后，以《著名英籍作家韩素音女士与杭州大学师生的谈话》为题，发表在 1994 年第 1 期的《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上。标题下的“按语”，叙述了讲座的背景：“著名英籍作家韩素音女士应邀于 1993 年 12 月 2 日到达杭州。3 日在杭州大学作客。上午，在受聘仪式上接受杭州大学校长沈善洪教授的聘书，担任杭州大学名誉教授，并当场签发支票，建立杭州大学韩素音文学基金；下午，对 1000 多名杭州大学师生代表发表讲话，并回答听众提出的问题。”我那时正重返杭大读博士，因此有幸赶上这一难得的讲座。更令我感到荣幸的是，在那一期的《杭州大学学报》上，也刊登了我的一篇学术论文。故而，那场讲座，于我，记忆特别深刻。

很多年之后，我与杭州大学外语系资深教授朱炯强先生相识，得知当年韩素音女士来杭州大学做讲座并担任名誉教授，就是由朱炯强教授联络而成的。

[返回目录](#)

曾经聆听在杭大 | 听吴逸亭讲古典音乐

—杭州大学中文系 80 级 李剑亮

比较而言，我在杭大期间，听到的讲座，更多的是来自校外的老师为我们开讲的。这些校外的老师中，既有作家，也有翻译家；既有电影导演，也有音乐指挥；既有剧作家，也有表演艺术家。他们大多是国内各行业的佼佼者，也有国际友人。

上海歌剧院的指挥吴逸亭先生，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我们那一批学生的西方古典音乐的启蒙老师。我在校期间先后两次聆听了吴逸亭先生的讲座。两次讲座均由历史系教授兼校图书馆馆长的毛昭晰教授主持。地点也是体育系大教室。

吴逸亭先生给我们作讲座时，看上去已年过花甲，头发稀疏又花白，但一丝不苟。站在讲台上，一挥手，一移步，都散发出一种音乐的节律，给人以一种艺术的美感。

吴先生的第一次讲座，为我们讲解的是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他从贝多芬的生平、创作背景讲起，然后进入作品的欣赏环节。为了让大家真切感受这部作品的艺术魅力，讲座现场准备了一台唱片机。吴老师逐一讲述了该曲四个乐章的表现形式、使用的乐器、表现主题。毛昭晰老师则充当助手，在唱片机旁负责播放乐曲。吴先生讲一章，毛老师播一章。如此讲授，使我们这些原本对古典音乐一无所知的人，也能辨识一些乐器，知道诸如“快板”、“柔板”、“活泼的快板”、“甚快板”以及“序曲”、“组曲”和“奏鸣曲”，“第一主题”、“第二主题”等术语。那时还没有现在的多媒体设备，音响效果比较弱，但现场的师生都听得如痴如醉。

为了帮助大家理解作品的表现内容，吴逸亭先生还介绍了这首作品在创作与流传过程中的一些故事。最初，贝多芬敬佩法国革命的理想，将该作品题献给拿破仑·波拿巴。但是当拿破仑在 1804 年 5 月加冕自己为法国皇帝时，贝多芬走到放置乐谱的桌子前，将写着“波拿

巴”的字挖出来，留下了一个洞。之后，他把标题改为“英雄交响曲，为纪念一位英雄人物”。

记得那次讲座后，学校广播台连续几天播放了贝多芬的多首作品。除了这首《英雄交响曲》外，还有《命运交响曲》、《田园交响曲》等。我猜想，广播台的同学也一定是刚听了吴逸亭先生讲座的。

吴逸亭先生的第二次讲座，以法国作曲家比才的《卡门》为例，把我们带入西方歌剧艺术世界。采用的也是讲解与欣赏相结合的方式。吴先生首先介绍了该剧的剧情，然后重点讲解了第一幕中主人公卡门的著名咏叹调《爱情像一只自由的小鸟》和第二幕中斗牛士埃斯卡米洛上场所唱起的那首著名的《斗牛士之歌》。与第一次讲座一样，毛昭晰老师依旧作助手，按照吴先生讲授的需要，适时播放唱片。

吴先生的这两场精彩的讲座，对我们而言，确实是打开了一扇从未开启的大门。从小我们接受的是清一色的红歌教育。直到上大学的那一年，局面才有所改变。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与《歌曲》编辑部联合举办“听众喜爱的广播歌曲”评选活动，有25万多人次参加评选，产生了《妹妹找哥泪花流》、《祝酒歌》等“听众最喜欢的十五首歌曲”，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人们对音乐欣赏的多元化要求。但对于西方古典音乐，当时的媒体少有介绍与传播。因此，聆听吴先生的讲座，第一次欣赏了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和比才的《卡门》，我们才知道，音乐世界原来如此丰富多彩。

后来，听历史系老师介绍，毛昭晰老师本人对西方古典音乐也有很深厚的素养。他对古典音乐的兴趣，也与吴逸亭先生的影响有关。吴逸亭先生曾是毛昭晰中学时的音乐老师。后来还听说，毛昭晰老师在历史系除了为学生讲授“史前史”等专业课外，还开设“西方古典音乐欣赏”选修课。现在想想，那时能在杭大读历史系，真的是一件幸福的事。

返回目录

曾经聆听在杭大 | 听李玉茹讲京剧艺术

—杭州大学中文系 80 级 李剑亮

进杭大不久，就享受了一场关于京剧艺术的讲座。时间是 1980 年 10 月 28 日。地点是学校大礼堂。主讲人是著名京剧演员李玉茹老师。

李玉茹老师是戏剧家曹禺先生的夫人。那场讲座，曹禺先生也在台上就座。就两人的著名度而言，曹禺先生无疑更为人所知。当时学校的海报宣传即是以曹禺为主角的，但在现场，主讲者实为李玉茹。曹禺先生则坐在一旁，相对平静。

李玉茹老师结合其经典作品《贵妃醉酒》的演出经验，为我们讲述了京剧的艺术特点以及京剧的欣赏方法。因为在上一年，即 1979 年的 8 月至 9 月间，她随上海京剧团出访西欧演出《贵妃醉酒》，饰演杨贵妃。

她首先介绍了京剧舞台上的一些表演要领，如手势、水袖和台步等。在谈到台步时，她说，一个演员只要在舞台走上两步，老戏迷就能看出是业余还是专业，是唱中间的还是两边站的，是真正的大角还是一般的主演。她借此提醒我们，不管学习任何专业，一定要重视基本功的训练。

《贵妃醉酒》原本是梅兰芳先生生前的代表作。在梅先生之后，又有不少演员表演该剧。如陈永玲、李开屏等演员都曾饰演过杨贵妃。因此，后来的表演一定要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就李玉茹自己而言，她说，她演《醉酒》，一方面继承了梅兰芳的典雅。因此，比起陈永玲等人的表演，更显得含蓄一些。另一方面，她在四十多年的演出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形成自己的风格。她说，京剧演员大都重视出场时的效果。她表演《醉酒》闷帘的一声“摆驾”，响彻全场，起到了先声夺人的作用。然后，面含笑，慢步出场。出场后的动作都比较慢，左右“踏步”的跨步很大，几乎达到半个舞台。这些表演和杨玉环的处境、地位、性格以及出场时的具体情境紧密相连。又如，她表演贵妃起身、甩袖、扶桌，十分自然。虽然，贵妃已经醉了，但

她还有些理智，用瞟的眼神看了看左右，抒发了贵妃烦闷和故作姿态的复杂情绪。慢移碎步而踉跄滑倒的下蹲，轻摇金扇的悠闲自在，包涵了因帝王失约而心生辛酸与凄楚。

为了让大家对上述内容有直观的体验，李玉茹老师表演了开头的一小段。她一边唱“海岛冰轮初转腾”词句，一边解说道，动作、眼神要与唱词配合，即唱到哪个字时，眼睛朝向哪边看。唱到哪个字，该甩袖。唱到哪个字时，手心向上。她指出，京剧舞蹈的创作和表演要做到形神兼备。身段和舞蹈的产生来自于对文字的理解，对文字的理解越准确越深刻，做出来的身段和舞蹈才会更生动，更有意境。

李玉茹老师边唱边演的讲课方式，让我们对京剧艺术的特点有了比较感性的认识，也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京剧的艺术魅力。

在讲座的最后，李玉茹老师就如何欣赏京剧，为我们作了些指导。她指出，故事情节、视觉、听觉，是人们欣赏戏剧的最直接的体验。但要真正欣赏京剧，就要跳过这些最直接、最容易获得的快感，去挖掘一些更深层次的快乐。比如，你能够无视故事情节发展本身，而是去欣赏演员在舞台上是如何调度的；你能够忽略角色本身，去欣赏演员是如何塑造角色的；你能够忽略唱腔是否朗朗上口以及歌词能否带来感动，而是欣赏歌者的发音技巧、伴奏者的演奏技巧；你能够忽略舞台布景、道具是否真实的问题，而是探索道具为什么此时此刻出现在这里，究竟对表演起到了怎样的辅助作用。总之，如果你能够进一步地挖掘京剧表演背后的事，而不是着眼于表演本身，就会感受到京剧的魅力和乐趣。但这又需要欣赏者有一定的知识修养和艺术积累，这也是京剧为何曲高和寡的原因。

听完讲座，走出礼堂。我们从几位老师的交谈中得知，曹禺先生与李玉茹老师上一年刚结为伉俪。那年，李玉茹老师 56 岁。岁月，早给她的眼角刻上了细纹，但当她站在台上为我们讲授、表演时，依然丰彩熠熠，雍容大度。

[返回目录](#)

曾经聆听在杭大 | 听乌丙安讲民俗文化

—杭州大学中文系 80 级 李剑亮

1985 年春天，也是在东一教学楼的二楼阶梯教室，辽宁大学的乌丙安教授给杭大师生作了一场题为《中国民间信仰与民俗文化》的讲座。

东一教学楼是在上一年暑假前后启用的新大楼。一楼当时用作教务处、研究生处等办公用房。楼上几层则是中文系、古籍研究所等教学科研单位的用房。一楼西端大间的装潢与配置较好，用作校接待室兼小型会议室；接待室楼上的阶梯大教室宽敞明亮，常用作讲座教室。

乌丙安教授的讲座以中国民间信仰为切入口，讲述了中国民俗文化的表现形态与特征。乌教授认为，中国民间信仰存在“三多”特征，即多样性、多功利性、多神秘性。

乌教授指出，中国民众的崇拜对象漫无边际，涉及万事万物。天地、日月、星辰等自然体，还有风、雨、雷、电等自然物和自然力，以及各种动植物和形形色色的神灵，都在民众的崇拜之列。这便是中国民间信仰的多样性。

具体到某个群体，则又有各自的崇拜重点。如小岛渔民供祭海神娘娘和船神，草原牧民叩拜牲畜保护神，平原农民供奉龙王、土地神，药铺供药神。歌曲《敖包相会》的“敖包”，便是蒙古族崇拜石神的产物——乌教授介绍说，蒙古族牧民在草原上设祭的“敖包”，是一种用石块堆成的石丘，中间有神竿、树枝条，并系有兽畜毛、布条等。通常是排开十三堆石，也有九堆至二十七堆的，是远古石神崇拜的演变。牧民经过时，常常会膜拜，祝词，添加石块，绕石堆祈祷。不同民族对这些崇拜对象又有各自的称呼，如同样是对“天”的崇拜，达斡尔族称其为“腾格尔”，哈萨克族则称“腾格里”。

多功利性表现在人们面对不可抗因素，如天灾人祸时，向各路“神仙鬼怪”这些超人的力量求救，并以“许愿”、“还愿”与鬼神

进行利益上的酬答互换；或晨昏三叩、焚香供祭；或捐资修庙、再塑金身。

多神秘性表现在信仰方式与手段的神秘莫测。例如“巫师”便是可以帮助人们获取吉祥、驱除邪秽的目的神秘工作者。乌教授指出，中国南、北方有各自的巫师。南方的巫师，乌教授以云南怒族巫师为例，指出云南福贡县怒族巫师有两种，一种称“尼玛”，另一种称“达施”。“尼玛”既能为人治病，又可摄人魂，作祟于人。所以人们对尼玛持敬畏态度。尼玛又分大巫“尼玛认”和小巫“尼玛切尼”。“达施”精通咒语，施术占卜祭鬼，主司祭家鬼。怒族认为家人有恶疾，都是家鬼作祟。这时，就要请“达施”来祭鬼、驱鬼，让家人病情好转。

乌教授指出，中国绝大多数民众并不属于哪一个宗教的信徒，但却虔诚奉着不止一个的神灵。他认为这是一个既有趣又复杂的现象，值得学者深入研究。

讲解环节完成后，便是提问环节。坐在我前排的古籍所教授刘操南先生意犹未尽，希望乌教授讲讲北方的巫师崇拜。于是，乌教授便以满族巫师为例介绍。满族崇拜的巫师称“萨满”，这是女真语对巫师的称呼，并一直传到近现代。

“萨满”又分两种。一种是在本氏族内部主持祭祀和跳神的萨满，俗称“家萨满”。一种是跨氏族的驱邪治病的职业萨满，俗称“野萨满”。后者的一种工作方式就是所谓的“跳大神”。为此，乌教授走下讲台，在后排课桌前的过道上为大家模拟了萨满跳大神的动作。并补充说，真正的跳大神还要用多种法器，身缚多面铜镜，帽缀多种饰物，手使刀、叉、鞭等用具，舞姿模仿各种动物形态。

最后，乌教授总结说，中国的民间信仰是中国多民族文化史发展的固有基石和根源，是中国多民族民间文化史的活泼生动的百科全书，是各民族祖先创造和积累下来的文化财富。他希望研究者要从大文化的视角认真对待它，切不可鄙视它、嫌弃它。

讲座由中文系吕洪年老师主持。吕洪年老师曾为我们80级同学开设过《民间文学》选修课。在这门课上，许多同学第一次听说了当时

研究民间文学的两位学者的名字，一位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钟敬文先生。钟先生先后两次组织全国高校教师编写《民间文学概论》教材。吕洪年老师课堂上向我们推荐的就是钟先生主编的这本教材。

还有一位便是这次给我们作讲座的乌丙安教授。他是钟敬文先生的得意门生。1950年代初在北师大随钟先生攻读民间文学。1980年代初，在辽宁大学中文系开设《民俗学概论》选修课。1983年，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民俗学丛话》。该书即以课堂讲义为基础提炼而成。乌教授来杭大讲学的那一年，还出版了《中国民俗学》一书。

虽然民俗学与民间文学在杭大中文学科领域中不像其他学科那样成就突出、影响广泛，但吕洪年老师此次邀请乌丙安教授为杭大师生讲授民俗文化这门在当时相对比较“冷”的学问，体现了杭大教师善于借鉴学科研究前沿成果的新理念与新方法。多年后，我又读到了乌丙安教授的新著《神秘的萨满世界》。感佩之余，又联想起乌教授的这次讲座，眼前呈现出刘操南教授与乌教授的互动交流，以及乌教授为大家模拟跳大神的舞姿。

返回目录

曾经聆听在杭大 | 听浦安迪讲“四大奇书”

—杭州大学中文系 80 级 李剑亮

1984 年秋，在杭大东一教学楼二楼阶梯教室，中文系教授徐朔方先生主持了一场讲座。主讲者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浦安迪（Andrew Henry Plaks）博士。那年浦安迪博士四十岁光景：面孔瘦削，目光深邃，身材高挑，很显年轻。

讲座伊始，徐朔方先生向大家介绍浦安迪博士的学术经历以及本次讲座的题目。徐先生是我们中文系《古代文学》课程老师。但我们这一届的《古代文学》课，徐先生正好轮空。大多数同学对徐先生只闻其名，未见其人。因此，当我从中文系通知栏里看到讲座信息后，便提前赶到讲座现场。

徐先生的主持方式与众不同，全程采用中英文双语介绍。他先用英文介绍本场讲座的题目“*The Four Masterworks of the Ming Novel*”，再用中文表述“明代小说四大奇书”。此前，曾听说徐先生大学期间经历了从英语系转学中文系的故事，颇有几分好奇。此时聆听了他的双语主持词，更是敬佩不已。

浦安迪博士所说的“四大奇书”，便是《金瓶梅》、《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这四部明代长篇小说。

浦安迪博士讲述的重点是“四大奇书”中的反讽手法。他指出，反讽不是讽刺，而是言此意彼，表面上看是在讲故事，其实另有深意在其中。浦安迪博士认为，这些 16 世纪的写本对先前叙事素材所做的是反讽性修改而非直接加工。比如，同样是讲取经故事，百回本的《西游记》就和其他版本很不一样，其中有太多比喻性和寓意性的东西，让人不能不重视这种暗示。明末的百回本小说对民间故事有一种反省，有时并不一定把故事主人公作为英雄看待，而是在道德层面和历史价值层面进行反思。比如，宋江在民间故事里是完美的英雄，在《水浒传》中的形象就未必积极；《三国演义》对刘备和诸葛亮的塑造也是如此。不过，明末的作家对人物形象并不作主观引导，而是留

给读者自己去判断。最后，浦安迪博士指出，这四部小说的素材尽管都渊源有自，但却是地道的文人小说，代表了中国散文小说体裁的成型，体现了晚明士大夫们的文化价值和思想抱负。

后来，我在杭州师范大学学报 1994 年第 5 期上读到了徐朔方先生《我看〈明代小说四大奇书〉》一文。文中写道：“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浦安迪教授的力作《明代小说四大奇书》，1987 年由该校出版社出版，六年之后沈亨寿先生的汉文译本由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编入季羨林教授主编的《海外中国学丛书》。当我细心阅读作者的原文时，自然回想到我和他在普林斯顿朝夕相处的情景，而译者沈亨寿先生和我有七载同窗之谊。”可见，浦安迪博士当年的那次讲座内容是他当时研究课题的一部分。该书译者沈亨寿 1991 年 12 月《译后记》中写道：“本书的译述，承徐朔方教授的关怀和鼓励，又承作者浦安迪教授本人在百忙中对译稿详加校阅，谨此致谢。”

再后来，我在光明日报副刊上读到了徐朔方先生的一篇随笔，内容就是写他 1985 年应邀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访学一年期间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其中也叙述了他与浦安迪博士“在普林斯顿朝夕相处的情景”。

从某种意义上说，浦安迪博士那次来杭大讲学，既是徐朔方教授与浦安迪教授学术交往的一段佳话，也是杭州大学与普林斯顿大学两校之间学术交流的一个缩影。

返回目录

曾经聆听在杭大 | 听唐耿良讲苏州评弹

—杭州大学中文系 80 级 李剑亮

一个梅雨绵绵的夜晚，听一位评弹艺术家讲演苏州评弹的艺术魅力，这是 1984 年初夏我在杭大聆听的又一场讲座。

这位主讲人是来自上海评弹团的唐耿良先生。讲座由中文系平慧善老师主持。平老师当时正协助姜亮夫先生筹建古籍研究所。讲座安排在西教学楼（也是当时学校的行政楼）一楼的一个小教室。或许是临时安排的缘故，事先没有广告宣传。平老师白天给我们上课时顺便通知了我们。因此，那晚前来听讲的主要是中文系的师生，人数并不多。

记得那晚当我冒着细雨前往讲座教室时，邂逅了走读班的宋同学。在我的鼓动下，宋同学与我一同前往。走进教室，发现有关讲座的准备工作还没有做好。那时的教室不像现在配备多媒体等设备，只有一块黑板和一张讲台。我悄悄向平老师推荐，让宋同学在黑板上写一句与本次讲座相关的主题句。平老师爽快地同意了。宋同学自幼学习书法，进入杭大后，在同学中间便小有名气。此时可谓是他的用武之地。只见他在黑板上熟练地写下“衷心感谢唐耿良先生来杭大讲学与演出”二行字。其中“衷心感谢唐耿良先生”为一行，用的是行楷，“来杭大讲学与演出”又一行，用的是隶体。唐先生站在一旁，看着宋同学一笔一划地书写，未曾开讲，已是笑容满脸。

与其他讲座不同的是，这次讲座采用的是讲（知识讲解）演（评话表演）结合、以演为主的方式，正如黑板上主题句中的关键词“讲学与演出”所述。

唐先生首先为我们普及苏州评弹的一些基本常识。让我们明白，苏州评弹原来是苏州评话和苏州弹词的总称。评话俗称大书，是运用苏州方言为主的曲艺形式，只说不唱，将叙事和代语融为一体。而弹词一般由两人说唱，上手持三弦，下手抱琵琶，自弹自唱。

唐先生专攻评话，当时一边在上海评弹团任职，一边兼任苏州评弹学校的辅导老师。从1980年起，他便开始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录制传统长篇苏州评话《三国》的音频节目，共计100回。这部倾注了其无数心血的长篇评话《三国》，使他享誉业界内外。他的说演，嗓音甜润清雅，说表简洁明快，讲评剖析周到，事理论断分明，语言通白晓畅，富于时代气息。人物塑造注意性格逻辑，描摹评析蕴藉而有新意；话语节奏徐疾有致，听来让人感觉爽快。这些特色，在唐先生那次给我们说演的《草船借箭》这一代表性“折子书”中体现得十分鲜明。

唐先生一方面将故事中诸葛亮、周瑜、鲁肃、曹操等人物的动作和表情，生动而又多样地用故事中人物的语言，包括语音和语调来表演。如在说演曹操的对话时，穿插着字正腔圆的普通话，而不像在说演诸葛亮等人物时使用苏州话。另一方面，唐先生还以说书人的动作和表情，来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和爱憎态度。唐先生所使用的苏州话，与我老家平湖方言，同属吴方言且相近。因此，于我而言，聆听这样一个边讲边演的《三国》故事，更觉得耳目一新，趣味无穷。诸葛亮的智慧，周瑜的狭隘、鲁肃的踏实，曹操的多疑，别有一番演绎在眼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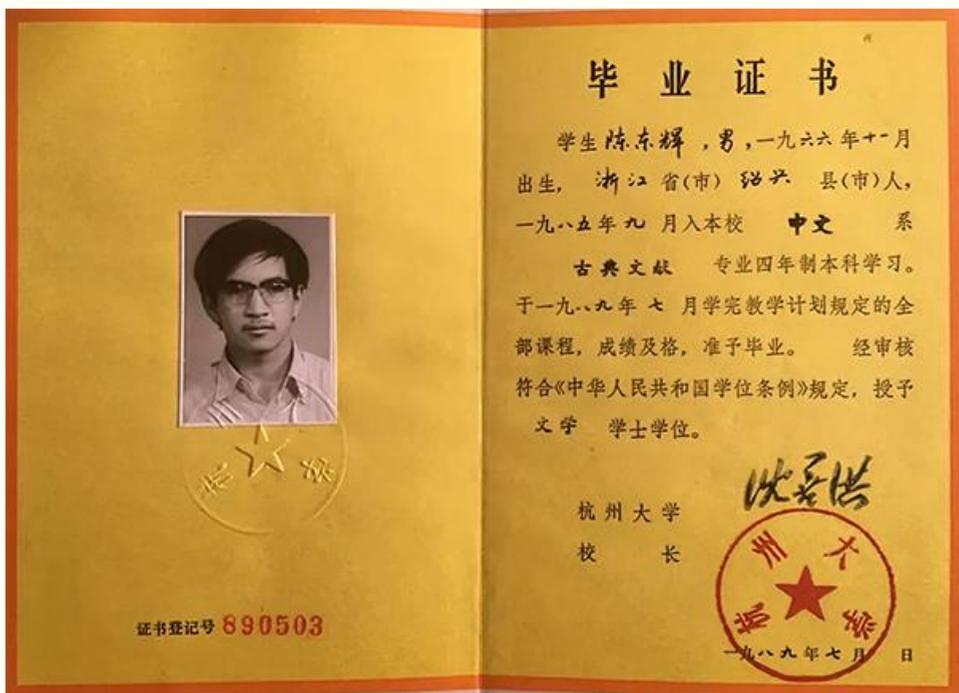
讲座结束后，平老师又邀请唐耿良先生与听讲的部分师生合影。唐先生居中，依旧笑容可掬。他的两旁分别是刘操南先生和平慧善老师。刘操南先生前来听讲，或与唐先生同为江苏人有关（刘先生无锡人，唐先生苏州人）；或与他本人爱好弹词有关。刘先生曾创作并出版《红楼梦弹词开篇集》。时任中文系副主任朱宏达老师则谦逊地站在唐先生的后面。朱老师应该是作为本次讲座主办方负责人而前来参加。

三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的这张照片我依旧保存着。那次的讲座，也为我播下了喜听苏州评弹的种子。唐先生当年录制的100回苏州评话《三国》的音频资料，如今在多个网络平台的客户端可随时收听。每当我收听这些曲目时，自然会想起唐先生当年在杭大为我们所做的那场融讲与演于一体的精彩讲座。

西溪园里曾读书

—杭州大学中文系 85 级 陈东辉

自从我所在学院前年搬到紫金港校区之后，西溪校区去得比以前少多了。不过每次去那个面积不大然而方便实用的校区，走在熟悉的菁菁校园，望着熟悉的历史建筑，遇见熟悉的退休老师，都会有不少往事浮上心头，尤其是学生时代的满满回忆。



我目前任教的浙江大学文学院之前身是原杭州大学中文系和古籍研究所。老杭大的校园就是现在的浙大西溪校区。

我是作为古典文献专业第三届本科生，跟来自大江南北的其他 19 名同学一起，于 1985 年 9 月进入杭大中文系学习的。当时可以说是杭大中文系的全盛时期，名师荟萃，学风优良，乃名副其实的“富农”（北大中文系号称“地主”），总体水平在全国高校中文学科中名列

前茅，尤以“三古”（古典文献学、古代文学、古代汉语）学科实力雄厚而著称。并且，那时校园内外跟学业无关的诱惑较之今日少之又少，因此我能够专心致志而又热情高涨地投入到专业学习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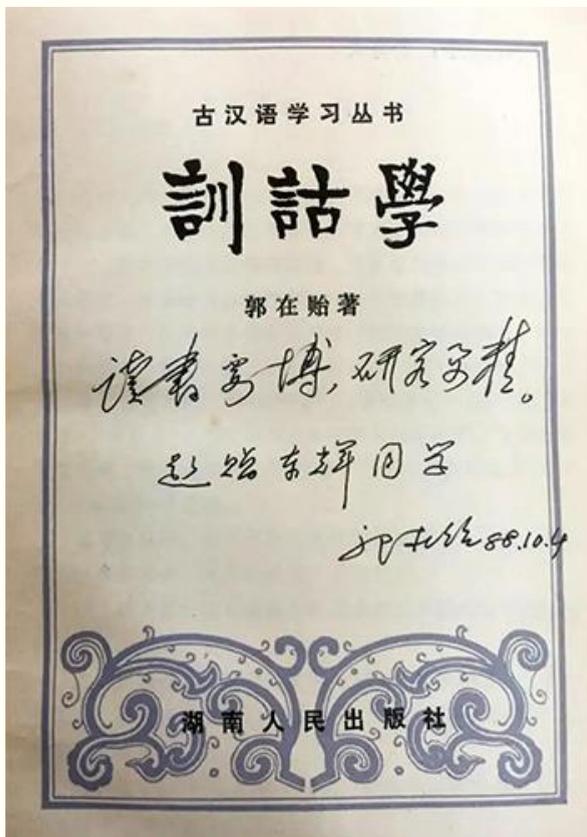
那时我们的专业课比现在多，并且刚入学的大一上半学年就开始上“古代文学”等专业基础课。

记得自己系统修读过吴熊和、朱宏达、邵海清、肖瑞峰、楼含松、伍方南六位老师合开的“古代文学”，黄金贵、方一新、颜洽茂三位老师合开的“古代汉语”，洪湛侯老师的“中国文献学”、“文献要籍解题”和“《诗经》研究”，曾华强老师的“工具书使用”和“辞典学”，任平老师的“目录学”，颜洽茂老师的“版本学”，张涌泉老师的“校勘学”，祝鸿熹老师的“文字学”和“中国历代语言学名著选读”，张金泉老师的“音韵学”，傅杰老师的“训诂学”，郭在贻老师的“《说文》研究”和“《楚辞》研究”（“《楚辞》研究”的后半段由于郭老师生病而由林家骊老师接着上），黄金贵老师的“古代文化知识”，方一新老师的“俗语词研究”（方老师同时兼任我们85级古典文献班的班主任），傅国通老师的“方言学”，朱宏达老师的“诸子研究”，曹方人老师的“《文选》研究”，金小春老师的“史汉研究”，孙敏强老师的“古代文论”，余荃老师的“古代诗论”，吴熊和老师的“唐宋词研究”，肖瑞峰老师的“唐诗研究”，邵海清老师的“古代小说研究”，王维贤老师的“现代语言学”，倪宝元老师的“修辞学”等专业必修课和选修课。

此外，我还有幸聆听了陕西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黄永年老师的“碑刻学”等课程（应邀专程从西安来杭州为我们古典文献专业学生集中授课半个月），并全程旁听了郭在贻老师为汉语史专业研究生开设的“训诂学”课程，以及应蒋礼鸿、郭在贻、祝鸿熹三位研究生导师邀请专程来杭州半个月的裘锡圭老师（时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为汉语史专业研究生开设的“文字学”课程。

在本科阶段，就能聆听这么多优秀教师所上的专业性很强的课程，在今天已经很难有这样的机会了。其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有大三上半学年傅杰老师为我们古典文献专业学生单独开设的“训诂学”课

程。傅老师喜欢在课堂上给我们推荐可供阅读的书，并且所列的书单并不局限于古汉语和古文献，还涉及历史、哲学、文艺学等诸多领域。



记得当时学习“训诂学”课程时，我常常是上午上课，下午就去学校图书馆或东一教学楼六楼的古典文献专业资料室借阅傅老师在课上推荐的书籍，认真阅读了郭在贻的《训诂学》和《训诂丛稿》、洪诚的《训诂学》、张永言的《训诂学简论》、陆宗达和王宁的《训诂方法论》、齐佩瑢的《训诂学概论》、赵振铎的《训诂学史略》、胡朴安的《中国训诂学史》和《中国文字学史》、王力的《中国语言学史》、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张舜徽的《清代扬州学记》、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吕叔湘的《标点古书评议》、蒋礼鸿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刘叶秋的《中国字典史略》、钱钟书的《谈艺录》和《管锥编》等学术精品，从而在训诂学、中国语言学史等方面打下了较为扎实的基础。

我那时还常常去位于官巷口的杭州古籍书店，用节衣缩食而余下的钱，购买了当时对于一名本科生而言感觉价格甚高的一批大部头典籍，其中包括王念孙的《广雅疏证》和《读书杂志》、王引之的《经义述闻》、郝懿行的《尔雅义疏》、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桂馥的《说文解字义证》等传世名著，并选读了这些名著中的部分内容。

后来由于工作需要以及个人研究重点的转移等原因，我很少有时间进一步系统学习训诂学知识。但我至今在这方面仍具备一定基础，能够指导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的研究生，并撰写一些相关领域的论著，内心还是十分感谢当时年仅二十多岁但却学识博洽，后来去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多年之后，如今又回到浙大就职的傅杰老师！

在我的印象中，当时的大学老师虽然生活条件较为艰苦，但大多不像现在这么忙，很少出差，科研压力不大，研究生也带得不多。本科教学是他们的主要工作任务，所以往往有充裕的时间备课，有旺盛的精力讲课。

如郭在贻老师于1988年上半年给我们上“《说文》研究”课程时，已经是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学者，乃当时全国人文学科教授中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但他每次都提前到教室，从未调过一次课，并且常常带着很重的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

我是这门课程的课代表，由我负责将作业收齐后交给郭老师，并将郭老师批改后的作业再分发给同学。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郭老师对每一份作业都进行了认真批改。有的作业的天头、地脚上还有郭老师用红笔写满的意见，真不容易！

就学生而言，外语、就业等方面的压力不像现在这么大。公共课相对较少，外界吸引眼球的东西也不多。因此，可以在专业学习上投入较多的精力，基础打得比较扎实，从而受益终身。想到这些，我觉得自己还是很幸运的！在此，谨向大学时代给我释疑解惑的诸位恩师致以深深的谢意！

当时曾华强老师给我们讲授“工具书使用”课程时，采用的教材是蒋礼鸿先生的《目录学与工具书》。蒋先生是我们专业已故前辈著名学者。他的研究重点虽然在训诂学领域，但在古文献学方面也有很深的功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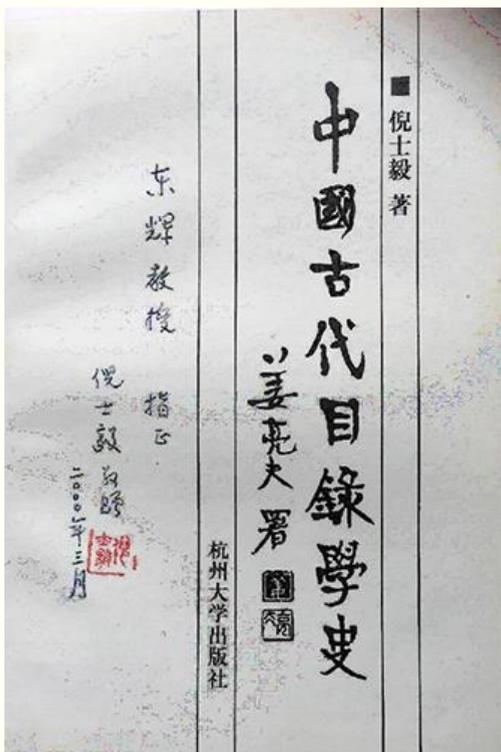
《目录学与工具书》虽然只有大约四万字，无论是篇幅还是书名都不起眼。但言简意赅，善于结合著者本人的治学经验和甘苦，融入了诸多个人研究心得，通过生动的实例，传授有关知识，介绍了各种常用工具书。该书实用性和可读性很强，特色鲜明，极具价值，尤其是对于汉语史、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等专业的学生和老师十分有用。这本书我一直放在书架上的显著位置，已经被翻得很破旧。我对书十分爱惜，这样因反复翻阅而导致破旧的情况很少。

也许是命运的造化，我在校中文系任教后，给本科生所开的“目录学”和“文献检索”两门课程，正是对蒋先生“目录学与工具书”课程的继承与延续。我每年都将《目录学与工具书》列为学生的指定阅读书之一。我之所以这么考虑，一是因为该书本身的重要价值，二是因为古汉语与古文献研究及人才培养相结合，以及在古汉语研究中注重文献考证，也是杭大中文系、汉语言研究所暨汉语史研究中心、古籍研究所的重要学术传统及特色之一，我很想为较好地继承并弘扬这一传统尽绵薄之力。

出于对蒋先生的敬仰，我还专门写了一篇《蒋礼鸿先生〈目录学与工具书〉之特色和价值》，并跟当时还是我们古典文献学专业本科生的李泽栋同学（毕业后保送北大读研）一起编纂了一份十分详细的《蒋礼鸿先生研究文献目录》，都发表在我校汉语史研究中心主办的《汉语史学报》第18辑，也就是纪念蒋先生百年诞辰的专辑上。此外，还曾指导我的研究生李燕撰写了硕士学位论文《蒋礼鸿先生在语言学领域的成就》。

不过我多次跟同学提及，一想到蒋先生，有些不敢站在讲台上滔滔不绝地讲课。因为深感自己在这方面的基本功与蒋先生相差过大，作为类似课程任课教师的后来者，总觉得十分不好意思。

除了中文系老师之外，我当时在校图书馆古籍阅览室查阅资料时，还有幸结识了历史系倪士毅老师。我曾经向他请教过关于诂经精舍的若干问题。他对相关书目、人物相当熟悉，如数家珍，并且和蔼谦逊，平易近人，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令我十分感动的是，虽然我跟倪老师并无深交，而且我是晚辈中的晚辈，但是当他的在原有讲稿之基础上修订而成的专著暨教材《中国古代目录学史》出版之后，那时业已年逾八旬的倪老先生手持该书，走楼梯来到位于五楼的我家中，非常客气地将大作赠送给我。此情此景，历历在目！

近年先后有两家出版社获悉笔者长期给古典文献学专业本科生讲授“目录学”课程，曾主动联系过我，约我写一本关于目录学通论的教材，我婉言谢绝了。

除了诸事繁多，精力有限，况且已经有一本关于古典文献学通论的教材撰写任务在身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觉得倪老师的同类教材水平颇高，自己恐怕很难超越。

不同于沈文倬老师、徐朔方（步奎）老师以及历史系黄时鉴老师等曾经多次建议我主攻清代经学（当然是替我考虑），倪老师以及历史系徐规老师、仓修良老师、杨渭生老师等总是鼓励我把主要精力放在文献学领域，同时提示我可以多关注浙江地方文化。

近年来我在两浙地方文献整理研究方面用力较多。现在回想起来，应该也受到了倪老师等的影响。清代学术史研究一直是我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最初对其产生兴趣可以溯源到三十多年前的学生时代。

记得上大二时，有一次在校图书馆找书，发现书架上有一本已经很破旧的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刊行的《清代扬州学记》。一看著者是洪湛侯老师在“文献要籍解题”课堂上多次提及的著名古文献学家张舜徽先生，于是就取了下来。稍加翻阅，觉得其篇幅不大，内容精彩，深入浅出，很适合初学者，当即决定借回来细细拜读。

我对该书十分喜欢，反复、认真地精读了数遍。从此对清代学术史有了一定了解，并对其中的第六章《阮元》特别感兴趣。从而对这位清代大学者产生了敬仰之情。同时，阮元曾历任浙江学政、浙江巡抚，与我的家乡杭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令我倍感亲切。此外，我当时觉得虽然阮元学识博洽、著述宏富、成就卓越，但后人对他的研究还太少，评价也不够高，很为他抱不平。于是，我试着撰写了《阮元的学术地位与成就》一文。

此后，阮元研究逐渐成为我从事清代学术史研究的重点和中心，至今已出版《阮元与小学》等专著以及《阮元研究文献目录》，发表相关论文四十余篇，另有待刊布的《阮元与杭州》等书稿，并为此阅读、搜集了大量文献资料。笔者住宅的雅称之所以名为“芸雅居”，就是由于我的主攻方向之一是阮元（号芸台）研究，其中深深地融入了自己对阮元的崇敬和对阮元研究的挚爱情结！

当时我读得最多的应该是文献学方面的著作，记得有张舜徽的《中国文献学》、吴枫的《中国古典文献学》、黄永年的《古籍整理概论》、余嘉锡的《古书通例》、来新夏的《古典目录学浅说》、姚名达的《中国目录学史》、王重民的《中国目录学史论丛》、叶德辉的《书林清话》、陈垣的《校勘学释例》、倪其心的《校勘学大纲》、张旭光的《文史工具书评介》、陈国庆的《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余嘉锡的《四库提要辨证》以及《书目答问补正》《四库全书总目》《增订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标注》等等……可以列出一串长长的书名。

那时买书不像现在这么方便，有不少书在杭州不容易买到，于是只有到杭大邮局汇款邮购。记得厚厚两大册的《经籍纂诂》是从中华书局邮购来的，几乎每天都要查阅的《中国丛书综录》则是用获得的奖学金从上海古籍出版社邮购来的。

我经常翻看并且一直向古典文献学专业学生推荐的《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一书，至今完好地保留着盖有“复旦大学出版社图书发行科”公章的收据。

家里书柜中的中华书局1983年出版的傅增湘的《藏园群书经眼录》第1册中，也还夹着盖有“杭州古籍书店收款专用章”（可惜这家书店二十多年前就不存在了）的购书发票。

记得当时洪湛侯老师认为此非入门读物，并且价格有些高，建议我暂时不用买。不过之后我又一次去古籍书店时，店员说《藏园群书经眼录》只剩下最后一套了，再过几天可能就缺货了，于是赶紧买了下来。一开始该书中的某些内容，我还不太能够完全读懂。不过后来越来越体会到这是一部难得的高水平目录学著作，买得很值。

大学毕业留校工作之后，我继续买书、借书、读书。这三十多年来，我几乎每天都在跟书打交道：在办公室、图书馆研究时要看书，在教室授课时要看书，回到家中面对的又是自己万余册的藏书。并且，我所开设的各门课程，几乎都与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两年之前曾有一位杭大中文系的毕业生在“城市秘密”微信公众号发表了一篇题目是“杭大1990，离歌1990”的回忆文章，里面提到几位中文系的老师，其中有一段是关于我的。那一段的标题就叫“陈东辉老师的开关是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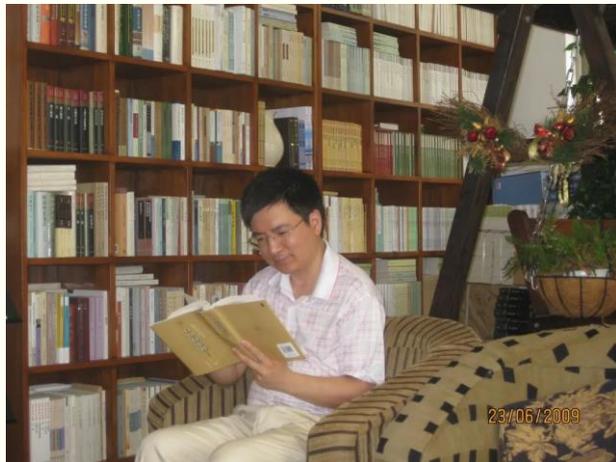
我觉得，读书，尤其是认真读那些质朴的原典，对于古典文献学专业的学生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们提供了最直接、最准确的研究资料，也提供了最翔实、最生动的问题来源。

我的专业是文献学，比较扎实的文献学功底是我从事学术研究的坚实基础。不管是清代学术史的研究，还是中国语言学史探索，或者是中日文化交流史的溯源，我都以文献学作为基准点与契合点，使各个领域的研究都以文献学为主线，并最终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在整理校点《卢文弨全集》时，我以前学过的各种课程差不多全派上了用场，并且文字学、音韵学等知识还显得十分重要。我觉得对于古籍整理研究者而言，在大学阶段打好基础，接受比较全面和严格的学术训练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大学的课程设置不能过于“实用”和“功利”，对于古典文献学专业这样的基础性学科尤其如此。老师和学生的眼光都要放得长远一些。

此时此刻，我无比怀念杭大校园里简朴的老图书馆、东一教学楼六楼那间小小的古典文献专业资料室，还有早已不在的杭大新华书店、教工食堂南边中文系同学开办的知了书屋（其实就是一个很小但我挺喜欢的书亭，由擅长书法的中文系任平老师题写店名）、出版社老大楼底层的晓风书屋西溪店，以及当时几乎每天都去的杭大周边的三联书店、文史书店、枫林晚书店、月光书店、江郎书店、新民书店等高品质的学术书店和南华、艺林、唐风等许多家特价书店……因为那里留下了我当年成长的足迹，伴随我度过了充实而富有意义的大学时光，如今带给自己许多美好的回忆……

谨以本文献给自己曾经拥有过的、非常值得眷恋的青葱岁月的求学、读书生活！



（2022年5月9日于杭州紫金文苑芸雅居）

[返回目录](#)

上大学时，你是怎么学的外语？

—杭州大学中文系 78 级 黄仕忠

大学入学不久，外语分班。有英语测试，分出快、慢班。但这与我无关，因为我选了日语。

我在 1972 年上的初中。初中时，老师也教过英语，但只上了一两节课，就停了。高中时再没学。也没有教汉语拼音，但 26 个字母却是认全了的。那时很多人以“26 个字母也认不全”为豪，就像人们总是大声说“我是大老粗”以示荣光。这意味着一定是工农出身，而与四类分子和小资产阶级无涉。我还会讲两句英语，一句是“Long live Chairman Mao（毛主席万岁）”，另一句“A long, long life to Chairman Mao（毛主席万万岁）”，是那时跟着姐姐学的。她读中学时，我还在读小学。听她说学了英语，在家里说过这两句。我觉得很新奇，一下子就记住了。

我初中在新山学校，当时是“浙江省教育革命先进单位”，有很多人远道而来，参观取经。其中有从省城下放来的大知识分子。比我低一年级的郭润涛，就在那时见过杭州大学的姜亮夫先生，是偷偷去看的。“我记得他穿着大衣，戴着眼镜，镜片像墨水瓶底一样，一直坐在新祠堂的大厅上写东西。我是听别人说，他是姜亮夫。”省幼儿师范的老师来实习，很喜欢机灵聪明的润涛同学，之后也一直保持联系。新山学校是郭姓为主的新山大队办的。润涛是本村人，才有这样的机会，令我好生羡慕。但这样的“先进单位”，也只教了一节课英语，就没了。后来在“白米湾五七中学”读高中，半农半读，大半天是采茶叶、护茶山，没开英语课。当时的说法，十分理直气壮：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学 ABC，照作中国人！

七七年恢复高考，不考英语；七八年加了英语，但只作参考，不计总分。我参加了考试，想着反正就是勾勾画画，总不能交白卷吧。结果我得了五分，看，这不还是有基础的嘛。

不过要在大学里进英语班，不免心虚。所以毫不犹豫报了日语班。没想到，正是这选择，让我之后的求学道路十分顺畅。

其实也是认真思考过的：学英语没什么用，英美是敌国，不可能去的，也不会与老外接触；听说日本人对中国研究很深，有许多书，将来也许有机会读；口语是不必要的，太浪费时间，能阅读就可以了。——这也代表了当时一名普通大学生所能拥有的视野。

日语班是小班，大约二十人，年龄相差很大。何一枫、金树良等是老三届，学过俄语，是重头再学。大多数人日语都是零基础。老师姓何，是杭大俄语专业出身，一直教公共外语。因为取消了俄语课，才改教日语；日语原是她读大学时的副修课。

当时没有正规教材，用的是“上海市业余外语广播讲座”版《日语》。封面是浅粉色的，大约是用樱花的颜色。内容浅显，开头是五十音图。正课也是从“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开始的。日语里有许多汉词，一看就认识，读音也都是从中国南方音变过去的，听起来与浙江东阳人说的方言差不多，难怪叫做“东阳（洋）鬼子”。

虽说大家都是从零开始，但几节课下来，差距就拉开了。老大哥们年龄在二十五岁到三十二岁，我们这帮小毛头，则是十六岁到十八岁。大家跟着读得两遍，就都记住了，但我们到第二课及第 N 课也还记得清清楚楚，老大哥们则记了又忘。何老师为人很温和，尽量平衡照顾大同学，小同学们就越发轻松了。

广播教材太简单，我得给自己加码。课文就在上课时搞掂，平时则读别的。那时没有日语教材可买，即使有，大多只编出第一册。这还是因为七七年恢复高考，为适合新形势而组织编写的。我就把校图书馆能查到的都借来读过。记得有一种理科版，天津出的，有很多理工科专业术语。我就只读课文，专业词汇就跳过去算了。这些教材有一个特点，内容都是讲中国的。要么是中国人写的文章，要么是日本人写中国的事情，似乎是为到中国来的日本人当翻译之用（中日建交后，从日本引进许多大型设备，有许多日本技术人员来做指导），并无为去日本生活而学的意思。文中夹杂大量中文译词，索然无味，读着还拗口，记还是不记，常让人为难。

那时尝试过许多单词记忆方法。比较常用的一种，是每天睡前记十几、二十个单词。记过之后，躺倒便睡。早上醒来，先回忆一遍。凡是能回忆起来的，就基本上记住了。也不多背。此后，主要借助大量的课文阅读。凡是再次出现并能回忆起意思的单词，经过两次复验，加深记忆，就能真正掌握了。后来读心理学著作，发现这符合心理记忆的原理。所以，研究生时仍继续使用，似乎从来没觉得记单词是一件难事。

自动加码后，日语课变得更加简单，进度太慢，听得让人直想睡觉。但班上人少，何老师在讲课中提出问题时，又经常先看我的反应，我也不能真的睡觉。于是学樊诗序同学用左手写字（他是天生的左手将）。左手笔划不易控制，得集中注意力，就不那么困了。体验到左手写字的艰难之后，对老樊的“左书”佩服得五体投地。

很快，所有日语教材我都翻遍了，就去找日语系本科生的教材。那时“新日本语”教材只出版了前两册，三、四册只有油印本，但比图书馆的那些好多了。稍后，则有一些日汉对照的小册子出版。我买过一册《两分铜币》（黑岛传治著，吴俗夫注释，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3月）。

大约79年的冬天，日本早稻田大学的稻畑耕一郎到杭大访问学习。有一天，一班的同学把他约来宿舍见面。倪建平来叫我，二班就只有我去了。当时拍了一张合影，是我个人第一张彩色照片。我请他在《两分铜币》扉页上签了名。

一缕阳光，青春洋溢。稻畑拱着手，像个小炉匠。我在后排右二，和任平一样迎向阳光。

记得大家七嘴八舌地问了他许多问题。有人问他会不会开汽车，他说不会。而且他穿的是一双布鞋，一副书生模样，大约并不能跟上日本年轻人的潮流。20多年后，我们在早稻田再见面时，他已经是头发斑白了。

三年级时，见到七七级同学在复习考研究生。我像是忽然开窍。对呀，我也是可以考研究生的啊！如果考上，毕业分配就不用去求人，至少可以“缓期三年执行”。分析一下“形势”：专业课不难，难的

是外语和政治。英语全国统一出题，据说极难；日语是小语种，各校自己出题，相对容易。政治课嘛，至少我向来比较听话，每堂课都认真听讲，考个及格应当没问题。这么一盘算，颇有胜算。

结果不出所料，我顺利考上了，而且总分很高，因为日语考了 89 分！那时为照顾古代汉语与古代文学考生，外语降到 45 分，还是有人上不了线。我选学日语，只考笔试，真是小菜一碟。后来考博，升职称，外语也不需费神，可谓占尽便宜。

读研究生之后，何老师继续教我们日语。我和志熙、一新去过她家，发现跟我的导师徐朔方先生是前后栋。她先生杨教授教英语，与徐先生是好友。多年后，我回杭州见徐先生，先生还说：何老师一直夸奖你们，说你们都是她的得意学生。遗憾的是，我留在广州工作之后，就再也没有去见过她。

之后，又换成朝鲜族的李老师。他的日语口语很地道，让我的日语听力有较大的提升。

到了新世纪，世界格局大变，我居然有了去日本的机会！2001 年 4 月到 2002 年 3 月，我赴日本创价大学作访问研究，得以遍访日本各公私图书馆，调查、著录日本所藏中国戏曲文献。后来又多次访日，后续完成调查、复核，编成《日藏中国戏曲文献综录》。其中得意之处，是以往多见日本学者为中国所藏文献编目，我却是为日本所藏文献编了目录。又选择那些珍稀文献，分成数次影印出版。同时，就有关问题作了研讨，出版了一本专著。

在这项工作中，我的哑巴日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只是口语没学好，限制了我与日本学者的深度交流。

比较得意的是，我曾用日语做过一次演讲，很成功！对象是创价学会所属北海道幼儿园的小朋友。时长约五分钟。我在前一天下午接到通知，代表中国教员作演讲。晚上花了几分钟时间拟了演讲内容，请创价国际科的轻部女士过目。她只改了一、两个词，说可以了。大致内容是：我的儿子今年四岁，和你们年纪相同。他很希望到日本来，也欢迎你们到中国去。希望你们能成为朋友，让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演讲结束后，国际科主任大为赞赏，说：黄先生，您的

演讲别具风格，很有亲和力。同行的厦门大学日语系雷教授则在点头示意之后，微笑着对我说：昨天怕是准备了一宿吧？

后来，我重访早稻田大学，正值文学部召开学术年会，请我发言。我先用日语作了问候与自我介绍，后面则仍用回中文。结束后，几位早大教授故作惊讶地说：我们都以为你是要用日语完成演讲了呢！

遗憾的是，英语只是作为二外学过一点，应付了考试，就还给老师了。当我有机会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交流时，却只能裹足不前。因为语言不通，不能在欧美国家生活，无法独立展开文献调查。

幸好我的学生外语都很好，不仅能阅读翻译，也能自如交流。我想了很多办法，让博士生走出国门。所以我的学生大多有海外访问学习的经历。在全球化的时代，我们要了解世界。要让我们工作跟上国际潮流，就必须走出去。外语作为交流工具，不可或缺。最近听到有人主张中国人不必学外语，我就只能呵呵了！

各位老同学、老朋友，你还记得你大学时怎么学的外语吗？请说来听听，或许可以让现在的年轻人知道我们那个时候的经历，以及想法、做法，也有助于他们睁大眼睛看世界。

返回目录

第四章：生活

四十一年前日记一则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英专 屠一宝

一九八一年七月九日，毕业联欢会于杭大英语专科班，夜记。

是日晚，微风进窗，细雨茫茫，湿湿沥沥，大大冲淡了夏天之炎热，人倍感心情舒畅。

六时许，联欢会始。八桌酒席，师生七十有余，各就各位，漫谈品酒尝菜。外有滴滴雨声，里响叽叽话语，交杂并起，浑然一体。忽一人作于座，代列坐之生为师敬酒，气氛骤变。师生碰杯，互祝酒词，其声甚盖风雨，纷曰：“往日之情意寓斯杯酒也。”

至高潮，室内热闹非凡。有人故作醉态，仿古人之调而吟诗述怀；有人已醉三分仍山呼干杯；有人颠晃前去敬酒知己。尊师脸现朱红，颇具少年风；姑娘皓嫩之脸泛起红晕，分外娇艳；小伙子白皙之色红润多彩，意气狂放。暂消逝日之紧张心情，轻松下石；大干来年之四化宏业，养精蓄锐。

夫人不可无情，不能终身伏案，而应劳逸相合。“养怡之福，可得永年”，谓是也。

[返回目录](#)

中文系的戏

—杭州大学中文系 77 级 陈文育

大概是大四吧，系里突然兴起了演话剧的热潮。按说中文系演几个话剧也属正常，但直到大四，我们才把这兴趣提上了议事日程。这当然有赖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大讨论所引发出来的巨大热情和毫无顾忌。是我演它，又不是它演我，有什么可怕的。

中文系选的戏很注重文学性，因而也特别难演。如我的老乡黄海滨自编自导的《在酒楼上》，飘散着独特的绍兴乡土味，演好它实属不易。我们年级还特地组织同学们到绍兴去体验生活。绍兴小河上不时荡过的乌篷船、绍兴人头上戴着的独具一格的毡帽，现在还时常飘进我的梦里。这戏一共演了六场，创下中文系演戏场次之最。

对了，我们中文系的人演戏特讲求自我体验，而忽略舞台效果。这可能是我们的通病。也正因为如此，同学们演戏的热情空前高涨，个个都想在台上试一把。这比在台下观战要过瘾多了。

记得我们共演出了四出戏。除《在酒楼上》外，还有反映建国前夕浙江大学学潮的《钱江怒潮》、俄罗斯话剧《大雷雨》。还有一个也是黄海滨写的荒诞派戏剧《黄蜂》，虽然明显带有美国荒诞派名剧《等待戈多》的痕迹，但台上演员演得入神，台下也有较强共鸣。在当时应属一台好戏。只可惜给它演的场次太少了，好像只演了三场。否则在演出的过程中精雕细刻，还会提高的。可惜了！

实际上，我们的戏大多都是这样。大张旗鼓地排，自己当演员，自己当导演，吸引了不少系外爱好戏剧的同学们前来义务帮忙。后台的一大堆事，没有他们是万万不能摆平的。记得历史系一个叫王旭烽的女同学就给我化过妆。那时候还特意请来杭州话剧团的专业演员讲课，声势浩大，可称“轰轰烈烈”，但演出都只有一两场。但这不是浪费。我们有自己的收获。

当然收获各有不同。你说读《牡丹亭》各人的体会会一样吗？谁都有他心目中的哈姆雷特。我不知道同学们的心得是什么，但我有我独特的心得感受，有些心得至今不能忘怀，特说出来共享。

我在《钱江怒潮》中出演一个警察局长。在台上，我的勤务兵是个叫王自亮的小个子同学。可能是我们的戏对得不错，后台的工作人员都跑到台角看热闹了。这时，出事故了。我的一句台词后，本应该桌子上的电话铃响。我接了电话，然后剧情继续。但后台的剧务拥在台角看入迷了，竟忘了按响后台的铃声。电话哑了，剧情断了，戏演不下去了。我和王勤务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幸好我是反派人物，在台上可以无缘无故气急败坏地来回踱步，拿眼睛暗示后台。但那小子竟还是浑然不知。我真的有点气急败坏了。我汗流浹背，脑子飞转。我想起传说中武松打虎那场戏。那天，不知何故，“武松”惹急了“老虎”，台上“武松”打它就是不死，“武松”已经浑身无力，“老虎”依然活蹦乱跳。“武松”无奈，只得暗暗向“老虎”求饶，说大家都是讨口饭吃，快死吧！然后老虎才死。我也急中生智，在台上对王勤务大声说：“某某说要来电话，怎么现在还不来？你去看看，出什么事了？”这才提醒了后台。电话响了，戏得以继续。

它给我的体会是，整台戏中，就这两句台词才是真的“戏”。谁说不是呢？其他的台词都是事先设计好的。你照本宣科，不会大错。就这两句，是我的戏中“戏”。二十六年过去了，我现在记住的只有它。而且详细生动，那台戏我连剧情都基本上忘了。真对不起！

生活中，给你印象深的、或则至死难忘的，不都是这种戏中“戏”吗？只有它才是真的。

这就是中文系“演”的戏。有好有坏，有真有假。

返回目录

大学生活之体育篇

—杭州大学中文系 78 级 黄仕忠

我在 1978 年 10 月 16 日报到入学，就读杭州大学中文系。开课后，我被任命为二班的体育委员。我一直很纳闷，怎么会选中我的呢？

我在乡下长大，只参加过一次白米湾五七中学的田径运动会。但跟同学相比，那成绩根本不值一提。看来唯一的理由，可能是因为人高马大，有些力气吧。

我们年级，最小的十六岁，最大三十二岁。我十七岁上学。上学一个多月后才过的十八岁生日，也算是年龄最小的那拨中的一个。体检表上，身高一米七九；后来考研究生再体检，则是一米八点五。也就是说，大学里才长完身体。老樊总说我是一个“大小孩”，其实说的一点不差。

刚入学时，我们每天早晨六点半要集体出操。九点二十分，则是课间操。那时没有录音广播，是体育委员站到队列前，面对全体同学，领操喊口令：

“同学们，现在开始做广播体操。预备——开始！一，二，三，四；二，二，三、四……”我那时觉得第一句话好长，“现在开始”四个字，很是拗口。总不能四声齐全，不免有几个音是含糊过去的。面对一排排整齐的目光，我每次都是紧张张张的，不敢看面前的同学，只好把目光投向他们头顶的虚空。喊着喊着，总有几个音节，冒出方言。一急，不免乱了节奏，动作更加笨拙。然后便听到学姐们善意的谑笑声。所以喊完操，背心已经湿透了。

我其实从小就很害怕站在人前说话的。做班级体育委员，一直是强自镇定。大约是三年级时，班里搞民主竞选，朝骞同学勇敢地接过担子，我则是终于长长地松了口气。但由于那两年中，强作镇定地跟比自己大许多的师兄学姐说话，慢慢也练了胆子。让内心的恐惧与表面的镇定，找到一个平衡点。这对我日后的学习与工作，都有很大帮助，所以一直心存感激。



获团体第一名后的合影

大学期间，我参加了中文系的许多体育活动，与七七、七九、八零级擅长体育的同学有许多交集。我参加了每年一次的校田径运动会。我们中文系向来是拿全校团体总分第一的。但我个人其实没有能力在单人项目上争第一，只是靠集体项目拿到金牌。我一直是系里 4×400 米接力跑的主力。因为表现比较稳定，很多时候跑第一棒。七七级徐岱的第四棒很强，后来有七九级的任其良，都极强。八零级则有祝明华，是体育特招生，则更强。有他们在，即使第四棒落后 20 米，也照样能赶上夺得第一，很多次则是遥遥领先。这可以说是中文系的必拿项目，也是学校田径运动会上气氛最热烈的时刻。

我个人项目通常选的是 400 米跨栏。因为最厉害的短跑选手都去跑 100 米了，而最厉害的中跑选手，都会选择 400 米和 800 米。跨栏比较冷门，竞争不那么激烈，所以我每次都能拿个第三名，并且连续两年获“三级运动员称号”（任平兄有二级运动员证书，应该是我们年级最厉害的了）。

还有一次，全校三千米长跑赛，从学校本部西边，绕往文二街，沿西溪河从东门返回。我一路领跑，快到东门时，到了极限，几乎喘不过气来，只好减速，最后只拿了第九名。大概因为这个原因，我被招入学校中长跑队。每天下午四点半去本部训练。

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参加元旦的“环湖接力赛”。这是杭州八所高校的固定“节目”。环西湖一周，二十余公里，分成十棒，也可能是十二棒。每人跑 1600 米到 2000 米左右。我有两次跑涌金门这一段，还有一次是里西湖那边的山道。这是浙大与杭大较劲的项目。当时，浙大的体育整体上比杭大要强，但这个项目上，我们每次都赢了浙大。



中文系有黄仕忠与任其良（七九级，后排左一）、
历史系有张富强（后排右四）。

杭大男子中长跑队出了不少人才。如数学系的鞠实儿，现在在中大哲学系，是数理逻辑的国内第一号人物；外语系的凌建平在联合国工作；历史系的张富强在华南理工大学工作。老鞠说还有在清华做教授的。不过我们那时只是一起训练，从不相互问询。结束后，我马上回到在分部的中文系。所以，要不是后来有所交集，其实我连名字也没记住。

我们班女同学里，徐敏是拿金牌的常客。那次沈澜晒出女子中长跑队的合影，令我十分吃惊。原来这小小的个子里竟有这般的能量！和她们相比，我的田径成绩，实在是微不足道。



阳光灿烂的日子里。

在大学里，我几乎每天都做的事情，便是下午四点半之后打篮球。从本科到硕士生、博士生，乃至做大学老师的前二十年，一直如此，所以堪称是一生的伴侣。现在也仍然每个周末与老师们一起打一场“养生篮球”。

在大学之前，我记得只在中学时摸过一次篮球，很是喜欢。诸暨是篮球之乡，村子里就有篮球架。但从我懂事起，从未见有人打球。大约是队里买不起篮球。县城里还有“灯光球场”，我曾从那边上经过，无比向往。

我的篮球是大学里学的。方青稚和我，就像是篮球场上的柱子，每天都杵在那里。那时我们两个同龄人，正是精力过剩的年纪，完全不懂杭州的风花雪月。所以每天下午至少两个小时，不知疲倦地跑呀跳的。天黑才回，洗个冷水澡，晚上又是生龙活虎。吴朝骞更喜欢排球，所以他打篮球的动作，不免有些怪样。另外，对于我们的组队邀请，华关祥组长则是露出银牙笑笑，敬而远之。因为他的门牙，在中学打球时留在了篮球场上。

我代表中文系参加学校篮球比赛的时候，还不太会打球。所以，我给自己的定位，是做好防守，专抢篮板。后来篮球之神乔丹开创公牛时代，有一位队友罗德曼，是 NBA 抢篮板第一高手，令我最是喜爱。大约是有所共鸣吧。

七七级的篮球高手很多。张建康、徐岱都是系队主力，身高体壮。但真正的篮球高手是葛阳生，投篮神准。当然，也有失准的时候。有一场比赛，我连抢四个前场篮板，都传给了葛阳生。当第五个投出时，我都不好意思再抢了。结果还是没中，全场人都笑了。那时中文系的篮球水平一般，从来没有在学校拿过名次。

七七、七八级真是一帮“怪物”，可以说是德、智、体全面发展。因为下乡、支边、工厂生活的磨练，让许多体质孱弱者，被残酷无情地淘汰。只有极小比例的一部分人，幸运地逃出生天，所以都堪称“怪物”。我当老师后参加学校教工篮球队，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是老三届毕业生在唱戏，再没有第一线的年轻教师能够进入。

读研究生时，因为毕竟打过四年球了，我被召入校篮球队，但只是替补。

杭大的篮球，一直比不上浙大。但有一年我们赢了！那次比赛，一直打得很胶着，比分交替上升，始终不能拉开。然后教练喊我上场。对方没有重视，放空了我。化学系的后卫陆同学很有经验，给我连传

四个球。而我那天手很顺，都进了。有两个因为跳得高，旁边的队友学弟说我几乎是扣进去的。第五个则是在弧圈顶。我笑着喊道：“快抢！这个要不进呢。”没想到颠了两下，还进。我全场只打了这几分钟，而且我们最后总共也只赢了浙大七分。大约是我的上场，打破了僵局，所以这是我的篮球生涯中最值得自豪的一次亮相吧。



教育系徐辉，他带我与专业队打过球。
1987年他从英国归来，经过广州，我请他吃过蛇羹。

篮球对我还有其他很多重的意义。因为我把它当作对我的某些能力的训练，而并不只是用来消磨体力而已。

篮球是集体项目，必须讲究配合，让所有队友都融入进来。所谓好球员，就是能让队友变得更好。何况大家一起打球，不能做球霸，要让别人也有表现机会。特别是新手，这让他们更能感觉到打球的愉快，然后我们才有更多的打球伙伴。我经常带着一帮刚学打球或者不太会打球的队友，打赢对手。最觉得快乐的是让篮球也拿不稳的同伴成为投篮高手，因为对方放空了他，而我总能送出妙传。所以朱承君同学给我的毕业留言是：“跟你打球，我总能发挥最佳水平。”

打篮球，还必须有大局观，进攻时要从全局着眼作配合，防守时要能够看穿对方的意图。但球场上又是瞬息即变的，必须有敏捷的反应。所以，我常常用这个来锻炼自己的反应能力、预判能力。也还包含设下陷阱，例如故意留出空间，让对手以为得计，我却瞬间加速，盖帽或者断球。年轻时反应快，三米范围内都是我的地盘，别人还以为我的手特别长。后来读研究生，我对这种锻炼依然乐此不疲，因为它与学术研究中判断力的养成有其关联。

另外一个有关篮球的记忆，是研究生时打学校篮球比赛。那一次，中文系、物理系、经济系三家总分相同，只好凭净胜球排位。三家分别为+1分、+2分、+3分。不幸的是，我们是+1分，只得名列第三。但这已是中文系篮球队的最好成绩了。决赛那一场，是晚上，在学校本部的室内球场。副系主任姜新茂老师也在场边鼓劲。我们本来有机会拿下来的。可惜最后关头，方一新与陈飞（刘操南先生的硕士生）的中投，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忽然失去准星。浪费了我好几个抢下前场篮板后的妙传，结果最后输了一分。

到本科三年级之后，因为要考研究生，感觉时间很紧张。有时不免觉得，自己的身体素质已经很好了。每天花这么多时间在运动上，似乎有些浪费。不过，到了研究生阶段，我已经明白，这种高强度的锻炼，对于我的学术研究是不可或缺的补充。因为做学问，其实也是一项“体力劳动”。一帮人做着“智力竞赛”，看起来关键在于头脑，实际上决定要素在于你的体力，在于你在书桌前能够支撑多少个小时，是否依然能够保证大脑运转正常。而且要求日复一日，天天如此，数十年不懈，方能有所作为。所谓学问，并无什么捷径，都是这样老老实实在地用“工作量”堆积起来的。

回首往事，大学时代养成的运动习惯，不仅给了我许多的快乐，而且也是我一生事业的重要助力。这是我深感庆幸的。

（撰于2018年9月28日，2022年5月4日修订）

[返回目录](#)

第五章：师长

我眼里的沈善洪校长

—杭州大学副校长 金锵

沈善洪校长是八六年到杭大的。他当时在省社科院当院长。动员他来，我参加做了一些工作。我们俩是老交情。五二年的时候，我们就在浙江师范学院（后来的杭州大学）同学。我在教育系，他在历史系。一起在团委工作过。前后算起来，交往有60年了。他在团委是学习委员，学习很用功，功课很好，毕业后留在马列教研室。

沈善洪有文史功底。中学是杭一中毕业，优秀生，底子好。他离校后，去人民大学研究班学习，改学哲学，成绩也很突出。因为喜欢黑格尔，同学给他起个绰号叫“老黑”。他本来可以在学术上做出更大贡献。而且，如果不调动，工资也比现在高。但他从大局出发，来学校工作，在科研上做出了很大牺牲。

来杭大任校长后，也并没有特别偏向自己的学科专业，而是着眼于全校学科建设。除了继续发挥原有的学科优势以外，又大力发展了金融、新闻、计算机、心理等新学科或优势学科。现在有的领导，一到领导岗位就立马建设自己学科，上博士点，扩大招生，等等。但沈校长没有这样做。沈校长有的时候确实会因为工作上的直率引起一些争议，但大家都明白他不是为个人私利，虽有争议，对他也就都理解了。

他到校任校长那一年，刚好有学潮。后来八九年又是一个学潮。很多老师，包括一些年轻教授卷进去。中纪委四号文件还专门要求各学校进行处理。当时情况比较复杂，但沈善洪校长与当时的党委领导顶住了压力，尤其对一些年轻教师和学生非常爱护。总的感觉，他在处理这些问题时，比较稳重宽容。

沈善洪校长做事胆子大，敢讲真话。只要他认为是正确的，只要是对学校发展有利的，他都会花大力去做。即使上级领导有不同意见，他也敢当面顶。比较突出的一件事情是杭州大学申办出版社。当时高校出版社非常少，每年的出书量也很小。对于高校来讲，出版是重要

的学术窗口。随着学校的快速发展，考虑到当时浙江省的出版现状，学校就想申办个出版社。一方面为学校学科发展服务，一方面也可以为浙江的高校服务。当时这个想法报上去，其他方面都同意了，但是最终审批的领导不同意，压在那。那时，刚好省里在开两会。杭大与会的教师在会上力争并在大会《简报》登出“杭大出版社为何难产？”的文章。这下子引起了各方的关注。会后，时任省委主要领导同志来杭大商谈。会上，大家争论得很厉害。沈校长有理说理，双方讲话都直来直去，差点吵起来。后来，主要领导同志做了调和，缓和下来，同意了。原先省里有关领导有自己的考虑，后来他们认识也转过来了。相比于当今较普遍的一些“官大一级压死人”、“下级只会服从”的现象，沈校长算是敢讲话的。当时的省委领导也算能接受不同意见。

强烈的事业心是沈校长给我的又一印象。周扬讲过一个比喻，说两古（古代文学、古代文献）方面，北大是“地主”，杭大是“富农”；说明一南一北，两个学校在文方面很有地位和影响。在沈校长的努力下，杭大几个学科发展得很快。在“211”大学中，杭大排在第72位，在国内省属高校中排第一。当时全国高校1300多所，省属高校1000余所，我们排第一。算是突出的。

在沈善洪校长那一届班子带领下，原杭大在新学科建设、学科交叉融合、年轻人才培养以及国际化等多个方面成就斐然。比如在国际化方面，杭大做得较突出。杭大的国际交流，起步是八四年。八六年，老沈来了以后，很重视，特别是德国的几所大学的交流他费了大力开拓。当时杭大最早建立联系的是美国的印第安纳大学。为了给学校的青年教师创造条件，采取规模对等的办法，与国外高校进行交流互访。这种对等，不是指人数对等，而是根据双方花费的费用对等。我们派出相应人员到对方学校进修访问，同时负责他们来华学中文人员的在校学习费用。一般来讲，在当时，地方院校要想派教师到国外学习是很难的。不仅因为有名额限制，而且当时的学校经费少得可怜。但杭大创新的这种模式，为青年教师的国际化成长提供了有利条件。用这样的办法，几年里我们安排了近200名青年教师出访国外。很多青年

教师学成之后也自觉回校，因为他们内心非常感动于学校的帮助、爱护，有一种回报学校的强烈意愿。

沈校长对生活比较随便，对吃穿等生活条件不大在意。但工作起来却要求认真踏实，对事业十分执著。沈校长有个习惯，一想事情就不停地抽烟，经常他办公室里满是烟气。他也常到薛艳庄书记办公室商量事情。结果，薛书记办公室烟灰缸里的烟头也经常是满的。

沈校长十分关心青年教师的成长。在他与薛书记等的带领下，杭大出来的几个年轻人，如费君清、叶高翔、林正范、肖瑞峰、沈松勤、殷企平、罗卫东、史晋川等，在各自的岗位上都工作得踏踏实实的，成为教授、博导，并当上省内大学的校长或院长。

近十年来，沈校长患病长期住院。他不但修订重新出版了《中国伦理思想史》专著，时时关心祖国的发展与学校的发展，而且以坚强的意志与疾病作斗争。与人谈吐时，仍然保持一贯的幽默风趣。

返回目录

沈善洪校长印象

—杭州大学历史系教授 王元骧

沈善洪校长是值得我敬重的一位杭州大学的老领导。在四校联合之前十余年，杭州大学的发展和崛起，在全国地方高校中名列第一，就与他的领导是分不开的。记得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在苏州大学开会。时任苏州大学副校长的我国著名哲学家任平教授来寓所看我，谈起杭州大学时就赞不绝口，说：“我们苏州大学就是以杭州大学为目标的。”

但我个人与沈校长却接触很少。一则因为我是一个普通教师，与他没有什么工作联系；二则我这个人虽然常为别人说话，但迄今为止，却从没有因个人的事找过领导。尽管路上平时经常碰到，但也都没有什么交谈，打个招呼而已。所以，对沈校长的印象，至今还比较深的也只是我两次去他家和他一次来我家。

我第一次去他家是因为中文系1985届有个学生叫王迅。他是我的玉环老乡，对美学与文论颇有兴趣。尽管我没有给他上过课，但他却常来我家交谈，并要求我作为他的毕业论文的指导教师。从与他的交谈和文字的接触中，我觉得他是一位在学术上颇有潜力和前途的青年。他的毕业论文后被选入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全国大学生优秀学位论文选》一书就足可说明。所以，当他毕业之前谈起，他的对象在浙江农业大学工作，希望自己也能留在杭州，并要求我为他向有关领导推荐时，我也就一口答应了。因而有一次在路上碰到沈校长时就顺便向他提起。沈校长要我什么时候把王迅带到他家里去，他想当面和他谈谈。于是，我就在一天晚上带王迅前去。沈校长向他提了些关于哲学、文化方面的一些问题，王迅也对答如流。从表情上可以看出，沈校长对他十分满意，当即答应让他去留办工作。通过这次接触，沈校长留给我的印象是非常重才，也很善于听取一般教师的意见和建议。

也正是有了这个印象，我才敢第二次去他家里找他。那是因为当时出版社的张节末同志来找我，说海南大学的叶舒宪教授想到杭州大

学来。他自己去找沈校长有些顾虑，问我能不能为他出面说说。我与叶舒宪虽没有什么接触，但觉得他很有才华。因为我在1987年底曾作为教育部（当时叫“国家教委”）的“特邀专家”出任青年科研基金的评委，叶舒宪是基金的申报人之一。论证下来，在十多位申报人中，我觉得他的功底最深，见解最新，水平最高。评委中其他几位专家，如北京大学的袁行霈教授、山东大学的狄其骢教授等，也都有同感。所以听说叶舒宪想来杭大，我感到非常高兴。于是，立即去沈校长办公室找沈校长。但因为时近中午，沈校长已经下班了。于是，我又急匆匆地赶到他家里。当时沈校长还没有吃饭，躺在躺椅上看金庸的武侠小说。可能因为在推荐王迅的事上他认为我还是一个有眼力、负责任的人，听了我的介绍之后，对于叶舒宪也很感兴趣，并立即拍板，说下午叫人事处邬锡同志（时任杭大人事处处长）立即发商调函去。但遗憾的是，后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要他，叶舒宪最终没有到杭大来。

以后因类似的事情我还找过沈校长几次，但在他的办公室里都很快解决。我十分钦佩沈校长这种胆识和魄力，那种当机立断、雷厉风行的工作之风。

他来我家的一次是为了劝说我不离开杭大。我要离开杭大是在他上任之前很早就提出的。起因是1982年杭大分房的问题。当时杭大造了72套所谓“高知楼”，按规定是分给副教授以上教师的。我知道分房之前许多教师都在活动，但我天生一副傲骨，从没有求人的习惯。我想既然有分房条例在，按分房条例办就是，我何必还要去求人？但结果是一些有关系、有门路的讲师都分到了，而唯独卡了我一个副教授！这下把我激怒了，而事实上我住房的实际情况也使我无法再住下去。当时我住在一楼，由于地势低洼，十分潮湿，地板都霉烂了。人一进门，书架就四处摇晃。一不小心，就会一脚把地板踩穿。我的腿上曾因此划了两道长长的口子。加上老鼠横行，有次用一只老鼠弮竟同时弮到两只老鼠。当时的杭大党委书记黄逸宾同志事后知道我的情况后，对我非常同情。但他也很无奈，因房子都各有其主了。但不论怎样，这是由杭州大学分房小组所造成的。特别是事后我还听到，其

中有个别成员在搞鬼，以及一个党委副书记为他的亲信谋私。我更是感到忍无可忍。尽管我去新单位内心也有些矛盾，因为我毕竟是年已半百的人，在杭州大学工作了二十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而到了新单位，一切都得从零开始，压力显然很大。但为了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我还是决意要走。所以我立即打报告给学校要求调离。我与原浙江大学方面联系之后，他们也很欢迎我去，在计划中安排我任新成立的中文系主任（其实我这个人是最不善于、也最不喜欢做行政工作的），并请他们中文系的副主任乐承忠先生经常与我保持联系，包括学科建设和进人的计划等等，也都来与我商量。当时的浙江大学校长路甬祥先生还率人事处长、教务处长等来到我家，要求我尽快过去。但沈校长上任不久就为此特意到我家来执意挽留，说得非常诚恳。事后，徐朔方先生也向我劝说多次。尽管他说：“我不是为学校做说客的。”但听说沈校长也确曾向徐先生转达过挽留我的意思。还据说，有一次路甬祥校长遇见沈校长谈到商调我的事时，沈校长说：“这事就谈到今天为止。以后不要再提了！”弄得路校长非常尴尬。时任浙江大学党委副书记的朱深潮同志事后告诉我：“关于商调的事，现在看来只能是拖一拖了，大家经常碰面，弄得面红耳赤也不好！”我也为此感到有些歉疚，并深为沈校长的热情挽留感动，所以从1987年以后我也就不再提了。

此外，沈校长对我的科研工作也很关心。我的第一部论文集《审美反映与艺术创造》，就是在沈校长直接关心下出版的。此事我在“后记”中曾记过一笔。本书曾先后获得过浙江省以及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书中对于“审美反映”的理论的阐述被学界认为“蕴含丰富”、“思想深刻”，是一个“严谨的理论系统”（陆贵山、王先霈语），“理论上很完整，也很深刻，大大扩大了审美反映论在学界的影响”（童庆炳语）。看来是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可以为历史所肯定的理论。它没有完全辜负沈校长的关心和期望。我也为此而感到欣慰。

我从1954年秋进校读书，1958年秋留校工作，算起来整整五十七年了。对于曾经辉煌一时的中文系在今天堕入历史的低谷也颇感伤怀。

这自然与外部环境有关，但起决定作用的恐怕还在于内部原因。否则就难以理解，许多理工大学还纷纷在创办文科，有些学校的文科院系还都在向前发展。学校领导好像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为重振文科召开过两次“文科大会”。第一次我是参加的。记得，会上曾提出五年之内使文科进入全国高校三强的目标。但现在看来似乎都雷声大、雨点小。所以我倍感要真正取得实效，很需要继承和发扬沈校长这种办学精神和工作作风。

[返回目录](#)

一生能做好两三件事就不错了 与沈善洪在千岛湖交谈

—杭州大学历史系教授 孙仁宗

2007年4月上旬，厉益森来电话，要我给同班同学的通讯写篇稿子，也希望沈善洪能写点他自己的情况。如果善洪不写，建议我来写。我知道善洪眼睛不好，不大可能写东西，要我来写也有困难。以前去看他，很少谈他自己的事情。而从前年下半年起，我就忙于选房、装修、搬家等事，很长时间没到他那边去了。

现在我们两家相隔很远。他家早已搬离学校宿舍区，迁到刀茅巷，位于城东部分。我的新居在浙大新建的教工宿舍紫金文苑，位于城西边缘地带。早就想去看望他，可总是发不起心来。

说起来也真巧，4月16日上午9时许，我有事下楼，走到楼旁的路边。突然听见有人喊我，抬头看见沈善洪夫妇坐在停着的一辆面包车里。原来是韩国研究所的同仁们要去千岛湖游览，善洪是研究所所长。他们是来接一位所里的老师的。寒暄了几句之后，他们就要我们同去，我就不客气地叫了老伴登车同往了。一来我们早就想去千岛湖，与他们同去方便多了；二来这也是抽空让善洪谈谈情况的好机会，可向老厉交差，一带两便。

我们一行连司机11人，驱车约两小时到达千岛湖。一位学生家长带人来接，把我们领到一家农家菜馆吃中饭。菜肴别有风味，有的菜是这里独有的，大家吃得很开心。饭后去游湖，原来说有杭州的身份证，每人的门票只要三十多元，到码头才知道这种优惠从4月1日起取消了。我们照付门票（每人120元）和船费，但给我们安排了一艘新快艇。大约3小时游了鸟岛、锁岛、蛇岛、海瑞寺（在一个岛上）等好几个岛。其实登岛还不如乘快艇，飞快地在湖上漂，过了一岛又一岛，被一个个岛隔开的湖面不断向前伸展，挺有意思。

善洪行走不方便，上下船尤其困难，只好由他夫人陪着留在下榻的星岛度假村。记得我们班2003年宁波聚会时，他很想去会会老同学，

就是因为腿脚不便而未能如愿。现在，房内地板上小步慢慢走还可以，要上下座车、楼梯、石阶，就得有人搀扶。这除了腿脚不灵，还因为眼底斑块使视力严重下降，看不清脚下的路面状况。平时总想看点书报，但10多分钟就得停下休息。腿脚和眼睛疾病都是糖尿病所致，靠注射胰岛素来控制血糖。血压有点高，也服药控制住了。实在说，病是有点厉害的，但他并不过分地搁在心上，照样能吃能睡，开朗乐观，有说有笑。还像以前一样，喜欢不时来点幽默，引得大家发笑。他夫人乐老师，是省电大的。原在云南工作，早些年已调来杭州。本来是要再调进杭大物理系的，沈善洪一做杭大校长反而搁下不调了。乐老师前几年曾小中风，目前别的都正常，就是半身有点发木。她开朗善谈干练，家里大小事情几乎都是她操办的。

原定第二天上午自由活动，因为冷空气南下，从夜里起大雨下个不停，气温骤然降了很多，大家都待在旅馆里。我和沈善洪趁此时对坐聊天，先交谈了一些老同学的近况。这是我们每次见面必谈的话题。接着应我的要求，他从“文革”开始，回顾了治学和办校两件大事。后来在当地工作的学生来看望他，才结束了我们的谈话。回家后，我又上网查到一些相关资料。

善洪读书时就善思考，有见解，班级里很出众。留校后，主攻中国哲学史、思想史，他继续发扬了这一长处。“反右”之后，又经过两次“教改”，这些运动发动学生揭批教师的教学内容，极“左”思潮在课堂上、学术界大肆泛滥。“文革”前，史学界有一场对“让步政策”的大批判，认为在历次农民战争之后，地主阶级根本不可能、也绝对没有对农民作出让步，只有凶狠的反攻倒算。这是从片面的阶级分析、阶级斗争观点出发的极左论调，以致凡地主资产阶级及其人物几乎必反必批。在当时大气候下，我们很多人都盲目地跟着走。一天，在杭大东门口碰见善洪，谈起这场大批判，他却很不以为然。他反问道：抗日根据地有开明士绅，他们是不是统统都要打倒？！在那种大批判高压的气氛下，能坚持独立思考是难能可贵的。当年我和他系科、专业不同，少有联系、交谈。这次谈话却深留在我的脑海里，数十年不忘。

正因这种长处，他在教学上、学术上很快脱颖而出，崭露头角，在系里有“小黑格尔”之称。在“文革”中，他居然成了“反动学术权威”，这在全校青年教师中是独一无二的。“文革”后期，上面号召领导干部读六本书，加强理论学习。他于1973年1月被省里指名调任浙江省委辅导组辅导员，担当哲学学习的辅导。

1979年7月，沈善洪调任浙江省社科院院长。凭借多年的研究和积累，他的《中国哲学史概要》于1980年问世。这是“文革”以后，也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较早由个人撰写的一部具有新见解的中国哲学史专著。次年，沈善洪、王凤贤合著的《王阳明哲学研究》出版，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观点，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注目。他的若干论文也先后发表。1985、1988年，他与王凤贤合著的《中国伦理学说史》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上、下两卷共1600多页，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系统深入研究和阐述中国伦理学说史的第一部专著，受到了学术界的赞誉，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作者曾收到数十封海内外学者的来信。国内一些著名学者在《人民日报》、《哲学研究》、《书林》等报刊上发表书评。2005年，该书又改名为《中国伦理思想史》，分上中下三册由人民出版社重版。对于该书的学术价值，由此可见一斑。

此外，1983年9月，由杭州和宁波的主要学术单位从事思想文化教学研究的学者发起，成立了“浙江省中国哲学史研究会”，沈善洪任会长，省社科院的吴光任副会长。其后，沈善洪任主编，牵头组织了省内外二十余名专家，吴光为执行主编，实际主持了《黄宗羲全集》的编辑点校。全书十二册，由浙江古籍出版社于1985-1994年出齐。2005年该书又重版，增收了不少遗文佚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黄宗羲不仅对封建制度作系统批判，而且还提出带有近代民主主义倾向的政治、经济、法律等思想，与尔后西方启蒙主义者所提的原则，竟惊人相似，今天仍有相当的现实意义。他的《明夷待访录》被众多学者认为是十七世纪中国向往民主政治的纲领。黄宗羲说：“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其中的民本思想已经成为中华人文精神的宝贵遗产。曾任

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已退休的史晓风先生，向温家宝总理转赠了新版《黄宗羲全集》十二卷，温总理回信写道：“承赠‘割爱’之藏书已收到，深表谢意。因忙于‘两会’，迟复为歉。我喜读黄宗羲著作，在于这位学问家的许多思想有着朴素的科学性和民主性。身为天下人，当思天下事。而天下之大事莫过于‘万民之忧乐’了。行事要思万民之忧乐，立身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应谨记这些道理，并身体力行。”

关于治学的大的方面，那天沈善洪都谈到了。上述有些具体情况是我上网后补充的。我从来没有这样地了解他的治学成就，不禁问他：“你后来当了校长，没工夫做学问了，是不是觉得有些可惜呢？”他说：“我不这样想。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能做好两三件事就不错了。”他很看重办学这件人生大事，尽心尽力地当了十年杭州大学校长。

“文革”之后，杭大校长几度调换。为了进一步办好学校，一些学校原领导人联名上书省里，要求调派沈善洪任杭大校长，相信他能够担当起这一重任。他于1986年1月上任，至1996年6月卸任，接着又做了近两年杭大董事长。在他任内十年余，杭大各方面的水平都有很大提升，面貌大变。当然，改革开放提供了良好条件，有校系和各部门负责人及全校师生员工的积极贡献，还有省市党政领导的大力支持。但是，沈善洪作为一校之长，他的眼光、决断和努力也是重要而不可缺少的。据我了解，他和校系负责人一起，起码抓紧抓好了三件大事。（它们无先后之分，排个次序仅为写起来方便。）

一是大力培养、提拔青年教师。其中一个重要措施是在职称评定上，不搞论资排辈，对青年教师择优破格晋升。这在全国高校中实行较早，而许多学校迟迟没这样做。从1987年至1995年，有170多人（次）被破格晋升为教授、副教授。其中40岁以下的教授19人，35岁以下的副教授89人。他们已在各自的学科领域显露才华，有的已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影响。从1994年开始，启动“博士化工程”，鼓励青年教师在职攻读博士学位。1994年下半年，实行100名跨世纪优秀

人才工程。首批评定 53 名年龄在 45 岁以下的青年教师为校跨世纪青年学科带头人，其中 5 名被评为浙江省首批跨世纪中青年学术带头人。

二是积极引进人才，开展对外交流。1991 年以来，共引进博士 69 人，有高级职称者 14 人。与美国、日本、联邦德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意大利、巴西、俄罗斯、韩国等 12 个国家的 55 所院校建立了校际交流关系，聘请外籍专家客座教授来校任教。

在校长任内，善洪很重才爱才。不论对于老先生还是中青年教师，谈到某位有学问、功底好、肯钻研，他就显得很高兴，特别敬重、器爱。有个别青年教师，颇有才气，但在待人接物方面有欠缺，不免受到一些人的议论，甚至认为学校用人不当。善洪却认为，办大学是为了培养有用人才，这样的教师为什么不能用呢？！“我们又不是办雷锋大学！”这是反其道、极而言之的说法。并非不讲品德，但不能因有某些缺点而排斥人才。他有时就爱用这样的说法来鲜明自己的观点。这种极而言之的说法包含着合理思想：要办好一所大学，要赶超国内外先进大学，关键在于提升学校的学术水平。因此，怎么能不重才、爱才呢？！上述两项，都是这方面的重要表现。

三是紧抓学科院系建设。杭大共有 13 个学院：外国语学院、金融与经贸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旅游学院、人文学院、法学院、管理学院、计算机学院、生命科学学院、乡镇经济管理干部学院、成人教育学院、继续教育学院、国际文化交流学院；28 个系，1 个义乌分校。是国务院首批批准的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之一。有博士后流动站 1 个，博士点 13 个，硕士点 61 个，博士生导师 41 人。是国务院首批批准自行审定增列博士生导师的试点单位。即，博士点新增博士生导师，不必报国务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去审定，可由学校学术委员会自行评定。这在当年非重点院校中是极少的，当时一些重点院校也还未能获得这种权力。善洪讲到这一点很有些得意，也是深感宽慰吧。

上面这些事情有许多都是沈善洪亲自过问、敲定，甚或一手抓的。此外，他还注意争取海内外的资助，改善学校的设施和设置。比如，中韩还未建交时，他就当机立断，决定接受韩国现代集团的资助，在杭大设立韩国研究所。现代集团划出一笔款项作为基金，以其利息充

当研究所经费，利率高时每年达 10 万美金。沈善洪现在仍任韩国研究所所长。

我们的母校杭州大学在这 10 年里，面貌日新月异，为国家输送了大批建设人才，在科学研究上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1996 年 9 月学校通过了国家教委“211 工程”主管部门预评审，正式成为了国家面向 21 世纪重点建设的 100 所高校之一。它已经并将更好地成为享誉国内外的一所名校。但是，四校合并中断了它的发展进程，这是令许多人深为惋惜的。

要我写沈善洪，主要就这么些了。当然，由于面临种种矛盾、困难，有些处事未能周全得当，难免会得罪一些人，所作所为也会有不同看法。而他有时批评起人来不留情面，甚至讲话有点尖刻。这是他的老脾气，并非对某个人特别过不去，但却容易伤人，引起一些批评意见。

再回头说一下游千岛湖吧。中午去水上餐厅吃饭。它只是设在船上，摆设并不很考究，烧的都是当地菜。但是这里的菜肴和前一天的农家菜，都比五星级饭店的味道好。最可口的一道菜是石斑鱼，是他们自己夜里下网捕来的。饭后，冒雨驱车回杭。以前和沈善洪碰面最多个把小时，这次同去千岛湖真是难得的巧遇。这篇稿子没让沈善洪看过。如有不妥、失实之处，那是我的错。

返回目录

沈善洪校长和杭州大学的国际交流

—杭州大学外事处处长 陈新铸

1986年初，我从美国回校，当时正值沈善洪校长来杭州大学任职。当年3月，学校命我去学校外事办公室（后改名为外事处）工作。此后，在沈校长的直接领导下，工作长达十多年。期间，我陪同他会见外宾，随同他出国访问，参与外事谈判等。他广博的知识、深厚的文学修养、睿智和幽默的个性，都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使我获益匪浅。他既是我的“顶头上司”，更是我尊敬的师长。

作为掌管全局的一校之长和分管外事的直接领导，沈校长胸怀全局，既有宏观的规划、原则性的指示，又给予具体的工作人员以具体的指导和充分的信任。在拓展学校的对外交流工作中，沈校长具有超前意识。他一再强调，在对外交流中要充分发挥杭州大学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的优势，积极开展对外学术交流，和国外的高校建立校际交流合作关系，争取国外各方面的支持。到他卸任前，杭州大学已和12个国家近50所高校建立了校际合作关系，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上了较高的台阶，在当时国内的地方高校中是走在最前面的。

1. 对外开放颇具慧眼，国际合作意识超前

20世纪80年代，高校招收外国留学生都须经过国家教委的批准，多为公费生，地方高校还不在其列。杭州大学当时虽然也有少量校际交换的留学生，但因人数不多，又属短期训练，形成不了规模。

1986年，沈校长意识到招收外国留学生是学校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方面，决定第一步先争取招收自费留学生。经过多方申请努力，在1987年，国家教委就给予杭州大学以同意招收自费外国留学生的政策特许（但不给予财政支持）。这就为杭州大学的留学生工作早早地打开了一扇大门，使这项工作比一般院校至少提前了十余年。

与韩国教育界、学术界的较早接触，也充分体现了沈校长超前的国际眼光。早在1988年，沈校长就先后结识了韩国著名学者、韩国社会科学院理事长、前高丽大学校长金俊焯教授和韩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后来曾任韩国教育部长、亚洲大学校长的金德中教授。与此同时，韩国大宇财团派人和学校商谈，希望能为大宇公司中层管理人员举办汉语培训班。此时，中韩尚未建交，要做出决定原本是相当困难的，但沈校长给予了肯定的答复，并报经外交部亚洲司批准，又积极争取省内有关部门的支持，终于在1989年夏，使得韩国人士汉语培训班在杭州大学校园举办。这在国内高校实属首家，也为学校日后深入开展中韩交流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92年3月，应韩国亚洲大学之邀，我随同沈校长访韩，受到金俊焯理事长、亚洲大学和大宇公司的盛情接待。沈校长代表学校和亚洲大学签订了建立姐妹学校的协议。大宇财团宣布赠送杭州大学100万美元，在杭州大学开展韩国学研究，在国内建立了最早的韩国研究所。

当年8月，中国政府和韩国政府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2. 开拓对外合作，重视人才培养

在外事工作中，沈校长亲自参与外事接待，广交朋友，深交朋友，对来访的各国友人学者以诚相待，从不摆架子，展示了个人的魅力和风采。同时，他也充分利用国际交往的平台，给学校教师尽量提供出国进修深造的机会。

20世纪80年代，在国家改革开放形势的大背景下，国家教委也有公派出国名额下拨给学校。但受名额限制，远不能满足学校人才建设的需要。大量出国进修、合作研究和攻读学位的机会主要还要依靠校际交流关系的渠道。随着学校国际合作关系的增多，出国交流的教师也逐年增加。在遴选出国人员时，校领导破除论资排辈、机会均等的旧习，特别破格提携年轻才俊，派遣教学骨干和优秀青年教师出国，为他们创造条件，在国外院校深造，使专业水平迅速得以提高。十年

间，数百名教师获得了出国学习机会，他们回校后成为了各院系的领导和学科带头人。国际交流合作确实起到了为学校人才培养和师资队伍建设的作服务的作用。

沈校长在任期间，多次访问亚欧美的姐妹学校和学术机构。在每次出访时，沈校长都会看望我校在国外学习的老师以及杭州大学诸多校友。每到一地，召开座谈会，了解他们在国外的学习生活情况，给予热情的关爱和指导。记得1993年4月，我陪同沈校长访问美国，到了十多个城市，走访十多所高校，会见了80多位杭州大学在美国学习和科研的教师、校友。每次座谈会上，沈校长都有著名的三句话：“学校欢迎大家学成回去，共同建设学校；在国外要好好做学问搞科研，不要虚度时光；暂时回不去的，要和学校保持联系，关心学校的发展。”这些以人为本的话语，给我校的海外学子以极大的激励。他们中的大多数学成回国，成为学校各学科的生力军。

3. 大力弘扬中国文化，做文化交流的使者

沈善洪校长是一位哲学家，是著名的中国传统文化专家。这在杭州大学诸多国外的姐妹学校中是广为人知的。为此，出国访问时，沈校长常被邀请给他们的师生作关于中国文化的学术报告。在1988年7月访问日本静冈县立大学时，和1992年3月访问韩国亚洲大学时，沈校长都作了题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回顾与反思》的学术报告，受到两校师生热烈的欢迎。千人礼堂，座无虚席。1995年8月，我陪同沈校长参加在法国巴黎举行的欧洲华人学会第八届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会上沈校长和香港的霍英东先生、美国哈佛大学的杜维明教授和台北的龚鹏程教授就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现代化发表主旨演讲，受到一致的好评。

自1987年起，杭州大学每年和美国新罕布什尔大学合作组办美国老年人文化学习团，团员多为退休的知识界人士。杭州大学为文化团开设系列讲座，介绍中国的文化、历史、政治、经济、宗教等。沈校长也亲自参与，为文化团作《中国佛教》的讲座，介绍佛教的起源、

在中国的发展、佛教的世俗化和普通百姓的宗教生活，还回答团员们的各种问题。沈校长妙语连珠，深入浅出，深受好评，被美国老年朋友称之为“Philosopher President”——“哲学家校长”。

沈校长的学术讲座，介绍了悠久的中国文化和当今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以及遇到的挑战，使我们的友好院校和国际友人更好更全面地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增进了相互之间的友谊和合作，大大地提高了杭州大学的知名度。这方面，沈校长所起的作用是独一无二的。

[返回目录](#)

怀高屋建瓴宏图， 治学治校具慧眼识人明鉴，重德重才

——寿沈善洪校长八十华诞

——杭州大学中文系教授 吴熊和

在合并成立新浙江大学之前，杭州大学是一所文理学科齐全的综合性大学，是浙江省重点高校和教育部“211工程”高校。历任校长或由原省委书记、省长兼任，或由理科知名教授担任，而沈善洪以文科学者身份出任校长，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全国高校里是屈指可数的。文科人才担任综合性大学校长，本应司空见惯，也有悠久的传统。蔡元培、胡适、傅斯年、马寅初均曾任北京大学校长。但后来这种情况就比较少见了。

作为文科背景的校长，沈校长的长处是学术视野宽阔，敏感性较强，办事果敢，有魄力。他担任杭州大学校长期间，抓住了80年代中期，中国高校难得的发展机遇期，对杭州大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杭州大学原来只有13个系，有较浓厚的师范院校印迹。沈校长上任后，陆续新增了经济、金融、法律、新闻、环境、计算机等系科；在一些传统老系中，还增办了新的专业方向，如中文系就增加了古典文献、影视戏剧等专业。另外还设立了韩国研究所、日本研究所等，以加强对外联系和学术交流，将杭州大学扩充成为学科齐全、适应现代化建设新形势的综合性高校，把一个旧杭州大学变成了新杭州大学，把一个师范性的学校转变成为与现代教育制度接轨的、适应新形势的、在全国有重要影响力的高校，使学校的办学规模和质量有了极大的提升和飞跃。

作为省属高校，杭州大学很多学科的科研与教学水平，与教育部直属重点高校相比毫不逊色。这些成就当然是全校师生员工共同努力的结果，但在很大程度上与沈校长高瞻远瞩的眼光、气魄以及执行力都是分不开的。这是沈校长对杭州大学乃至后来的新浙江大学的重要

贡献。当时，全国有不少著名高校，由于墨守成规、故步自封，就未能抓住这一机遇期，渐趋落伍，失去了原有的光彩。

沈校长作为文科出身的校长，能用人文精神贯注于工作中，使学校有很强的凝聚力、亲和力，能齐心协力、同心同德。这一点是现在很多高校中所缺少的。而这是办好高校的基本条件之一，是灵魂所在。

杭州大学是一所有百年传统的高校，学术基础深厚。沈校长能够尊重各系各专业原有的学术传统，尽力发挥系与学科专业的独立性。这些系科往往积淀深厚、基础扎实、后劲很强。沈校长善于结合新形势的需要，引导系科与现代思维、世界学术接轨，使原有的学术传统发出新的光辉，而不是妄加干涉、指手画脚。在沈校长主持校政期间，杭州大学原有的很多著名学科一方面能保持本色，另一方面能老树发新枝，保持着生生不息的动力与生机，这才是学科发展的正常道路。

沈校长善于发现和培养青年人才，也敢于任用青年人才。这是他极可宝贵的另一重要贡献。我于1986年担任中文系主任时，他对我只提了两个要求：一是搞好团结，二是把年轻人提起来，让他们有知名度。我感觉自己性情平和，与人为善，与世无争，搞好团结问题不大。但要做到后一个要求，任务很重。当时中文系有全国知名的老教授，如夏承焘、姜亮夫、王驾吾等。还有一批在国内久已闻名的优秀中年学者，如蒋礼鸿、徐朔方等。但后继乏人是摆在眼前的最大难题。我经常以接力赛来比喻学术传承，要一棒接一棒。如有一棒中断，就不是几年、十几年的问题，甚至有可能中断和空缺数十年。好在当时自1977级之后，尤其是建立了博士点、硕士点之后，有一大批有理想、有作为的年轻人补充到了我们队伍中来。这批人当中有不少才智之士，是很有前途的，关键是要好好引导、教育和提高。

在沈校长的主持下，当时杭州大学创设了各种有利条件和机遇，让他们走向全国、走向学术前沿。可喜的是，这批青年学者中有不少人，在沈校长的鼓励、提携之下，崭露头角，在当时就在学术界有了知名度、发言权和权威性。沈校长也敢于将其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发挥其作用。这都充分说明了沈校长的远见卓识。现在回头来看，

沈校长所提携的这些学者，多已成为学术界领军人物和学校的中坚力量或领导者。这应该是可以让他感到欣慰的。

杭州大学在沈校长的领导下，不仅发扬了原有的传统，而且杭州大学自己也培养和储备了一批学术骨干，所以杭州大学没有出现明显的学术断层，这在全国高校中也是比较少见的。有的传统优势系科起点甚高，能传承下去就是极大的贡献；有的新兴系科是年轻人大有用武之地，故能人才辈出、青出于蓝。学术传承就应该这样一代一代接下去。

沈校长为人真诚坦率、作风朴实。作为校长，他身上没有官气和官架子，善于和学者教授做朋友。他往往不是以领导者的身份，而是以学术同行的身份，与教授交流。事实上，校长和教授之间，本就不应有高下之分，不应有官气阻隔。邓小平就讲过校长应与教授做朋友。沈校长对教授可以推心置腹，对教授们的生活也非常关心，因此教授们对他也很信服。他反对官场习气，有时到系里来，也没有什么随从和秘书。要找他谈事也很方便。他办公室就他一个，推门即谈，谈完即走。当时校部机关没多少人，办事比较简化。校部机构也很少叠床架屋，没有行政化、衙门化的那一套，工作效率很高。

沈校长的领导方式是一竿子插到底，执行力很强。跟他谈话，用不着客套，可以直来直去。他也偏爱开门见山，几句话就说到点子上。他讲话、做报告都没有官腔和套话，反对文牍主义，喜欢单刀直入，直奔主题。

沈善洪校长不论是在台上还是台下，都始终保持了一个文人和学者的本色。在校长任内，他是一位敢想敢干的实干家；卸任后，他仍是一位宁静的学者。这是他最可敬佩之处。

返回目录

一位有胆识 有作为 有功业的校长

——我体察到的沈善洪

——杭州大学哲学系教授 陈村富

我从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到杭州大学、浙江大學歷經 50 多年，所見所聞校級黨政人物不下百位。有的額頭上貼着個偌大的“馬”字，却令人捉摸不透是哪路之“馬”；有的業績平平，確實是大好人，却如雲似影，連個痕迹也找不到；有的像戲台上的“戲子”，一路上念念不忘表現自己。他那些“業績”倒是給人們留下深刻印象，學校却為之付出了慘痛的代價；有的找各種借口賴着不走，為自己下台後的前程安排妥當了才依依不捨地離開座位；有的還練就了一套背地整人，挑撥離間，借刀殺人，爬坡游水的本事。

令人寬慰的是，幾十年來，我國高校的確涌現了相當一批套路不一的，有魄力、有水平、有威望、有實際功業的，不怕得罪人，也不唯上是從的校領導。在位十年的沈校長就是其中之一。原杭州大學躍升全國省級高校首位，1996 年進入“211”，1998 年“四校”合併前有 2 個一級學科博士點（中文與數學），8 個二級學科博士點，56 個碩士點。之所以有此局面，沈善洪為校長、薛艷莊為書記、金鏘為副校長（後因身體不適而辭去）那幾年是關鍵。而在職時間最長，引領全校奔向省級一流名校的就是沈善洪校長。

我以自身的體驗和觀察展開論述。因為這不是一個理論命題，而是一個事實判斷的陳述與驗證，所以本文的特點是以個人的經歷為依據，“論”從“史”出。

我於 1976 年 1 月因照顧家庭關係從中國社科院哲學所來到原杭州大學政治系。1980 年分別成立哲學系和經濟系並籌劃法律系。當時聽說，有一位專注學問的人，叫沈善洪，“文革”中被打成“反動權威”，遭受批鬥後氣憤之下離開杭大，在浙江省社科院。之後幾年，我們雖未見過面，但透過幾件事可見其人的學術關注。

第一件是動員調到省委綜合處工作的龐學銓到省社科院從事科研工作。小龐（他任浙大副書記後，我還是按老習慣叫他“小龐”，就

像哲学所仍叫叶秀山“小叶”一样）征求我的意见，我认为省社科院没有从事西方哲学研究的条件，还是回杭大好。沈善洪考虑了我说的几个理由，让小庞回杭大哲学系。

第二件事是他虽在省社科院，却很关心杭大哲学系。从当时的系领导知悉，他很关注严群被一位校政工干部占用的房子（至1978年初还未退还）。严群仅一间房。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叶秀山、王树人受严群老朋友贺麟的委托去看望严先生时，无不为之动容。老两口将东西搬到饭桌和床上，腾出坐椅招待客人；吃饭睡觉时，又让用物“官复原职”。一天就这么折腾三次。听说，沈还向学校有的人发了脾气。1978年终于落实了政策。我不知道，老沈从什么渠道了解到我正在向严群学习希腊文、拉丁文，帮他（严群）联络商务印书馆，出版严群的柏拉图释稿，还在想法让严群撰写严复回忆录。我从哲学系总支书记范广品处知道，沈善洪很赞赏。

第三件事是1983年（或84年，记不准）上半年。一天系主任薛克诚告诉我，省社联召开首届评奖会，我于1980年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的论文被评为一等奖。沈善洪、王凤贤和省委党校魏继让都推荐这一篇。沈善洪认为，浙江省、杭大要有一批人多在全国性大刊物上发文章。

第四件事为后来获悉，不过事情是发生于1986年沈善洪正式就任杭大校长前夕。1984-1985年教育部暂停职称评审工作，进行整顿。1986年上半年重新启动。其中一个精神是鉴于所评出的教授年龄偏大，要在年轻人中选拔若干人。当时还是薛艳庄任校长，金锵、夏越炯任副校长。一天洪波对我说：“听说，哲学系有一个人直接从讲师上教授，我想肯定是你。”当时的社会风气不像今日，我真的不知道。后来报省学科组和省评委会时，须先过副教授这一关，再按教授申报条件提供五件代表作，让我补充材料。这时，我知道是真是事。发布以后一段时间，因接待《希腊哲学史》多卷本项目负责人和撰稿人，金锵向他们介绍职称之时，说到沈善洪到任前代表外单位参加杭大评审，之后又担任省学科组长、省评委会领导小组成员之一，他鼎力支持。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当我于1986年下半年一次课后骑车回家路上，听到正在广播沈校长关于杭大发展的谈话时，我不禁停了下来。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大胆提出“提高杭大知名度”。为此，他要采取一系列提高教学科研水平，强化对外学术交流，为有作为的年轻人创造条件，改善办校条件等一系列措施。在当时条件下，不“穿鞋戴帽”，直扑主题“提高知名度”，在有些人眼中就是“校长的办校路线”问题。后来发生的事情确实如此。他支持创办日本所、韩国所、基督教研究中心、德国文化研究所、中外文化交流史中心等一批非行政传统研究机构，破格提升一批副教授、教授，派遣些“红色不艳”的年轻人出国深造或短期交流等等，都难免有人或议论，或担心，甚至打小报告。但是看准了的事，沈校长坚持到底，直到1996年6月他卸任为止。究其源，我认为应归功于他的哲学功底、多年的政治历练，对形势和大局的判断，对改革开放形势下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教育该怎么走，有清醒的认识，准确地把握，坚定的信念。这是我本人根据自己所经历的事件而作出的论断。这里谈几件鲜为人知的事。

自从1980年以来，我一直参加由原北大教授、《人民日报》理论部副主任、我的老师汪子嵩主持的四卷本《希腊哲学史》的撰稿工作，直至2010年8月第四卷出版才算“大功告成”。1981年，以严群为导师、我为助手招收了首届4位希腊哲学研究生。汪先生老家又在杭州，所以经常来杭。金锵就是汪子嵩的亲戚。由于1986年至1992年国内政治形势比较复杂，而汪子嵩在《人民日报》理论部，所以凡是遇到汪子嵩来杭，沈校长、薛书记、金副校长三人总要相会一面，请汪介绍北京的理论动态和国内形势。我以陪同人身份，几次在场。从言谈中我感到，作为一位校长，政治方面的成熟，理论方面的素养，对社会思潮和风向的准确判断和把握，真是至关重要。关系到他对自己所作所为的决策的确切评估和信念，关系到一个学校“当家人”是否能掌好舵，无所畏惧，排除各方面的干扰，义无反顾，勇往直前。这样一个学校也才能不受折腾，少遭损失，达到胜利的彼岸。下面举我承担哲学系主任（1990年9月至1996年10月）期间的两件事证明上述的论断。

1989年12月下旬，我从意大利那不勒斯大学归来，轻松了半年，就给硬压上系主任的担子（当时我仅同意任主管科研的副主任）。当时，刚刚经历了一场政治大风波，师生们思想都比较沉闷。按某部官员的解释，高校容易成为“和平演变”的前沿，还规定文科师生不得赴海外读博士学位，只准不超过3个月的进修。特别是哲学系，除了本校教学外，什么都不许做。

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讲话后，该官员被安排提前退休，高校同全国一样一派生机。然而此时的哲学系却有几位教师“下海”或离职。当时，已经允许哲学系办几种业余教育，举办几种培训班。可是分工负责这一方面工作的副主任迟迟不动，全系上下眼看错过时机。经过5月初一场全系大会讨论后，我第三次向校领导汇报请求校领导帮忙处理这个难题。可是校党委有人（注：薛艳庄已调省政协）仍然将事情判作“领导班子团结问题”，要我这位主任主动做好班子团结工作。我心急如焚，几位教师已经拿出具体方案，完全可以在校内校外举办证书班，可是一到系主管人的手里就搁浅了。哲学系30多位教师中，有些老师颇有“开发创收”的才能。

我的思路是人尽其才，一些人在完成校内教学的前提下重点搞开发，系给予分成奖励。我不抓财政，一心抓科研，抓人才培养，将哲学系水平搞上去，扭转当时面临解体的状态。当时，全年一个系仅1600多元，连个年终聚会都困难。真是久旱逢甘雨，1992年一开学，一纸公文下达，哲学系提前换届，任命黄华新接替副主任工作。全校就一个系实行提前换届，真是特事特办。此后几年，原杭大不少人知道，贫困的哲学系不仅经济上翻身，教学、科研、人才培养、对外交流都跟上去了。

下面叙述的另一件事是备受外校同行赞扬的：杭州大学校长竟然敢在1991年3月批准建立全国第一个“基督教研究中心”。1994年后，兄弟院校才陆续建立同类机构。事情要回溯到1990年，当时高校有许多说不清的“禁令”，特别是人文社科各系几乎伸不开手脚。沈校长陆续签署文件，成立了一批不下20个民办性的非行政系统的研究机构，只给牌子，不给编制、用房和经费，戏称“三无”机构，让教

师们发挥积极性，从海内外交往或合作研究中“找米下锅”。其中1991年3月批准成立的由本人负责的“基督教研究中心”最具敏感性。起始两年，凡有海内外学者来往或讲学，必有校外人关注和听讲。1992年获悉，省某部一个内部简报称：杭大基督教研究中心主任陪同海外传教士一起在卫匡国墓地朝圣，上级指令杭大撤销此机构。当时党委有人表示同意撤销，沈校长坚决顶了回去。上任不久的郑书记找我谈话，询问详情。我向他说明，其实我们是做了一件挽回浙江省面子的大好事。事情是：1991年9月底意中经济文化交流协会会长科隆博率经济文化访华团七人来华，江泽民总书记在京接见。9月30日来杭，省长设宴招待。10月1日原定来杭大参观，但是省经贸系统派车等在黄龙饭店门口，要将七人都接去谈经贸。科隆博很不高兴，一跨进杭大校门就说：“很抱歉，迟到了半个小时。我说，我这个代表团还有文化交流任务，他们却硬要同我们谈经贸。我只好分流，我们3人来杭大。”当时沈校长和薛书记亲自陪同。中饭时，科隆博说卫匡国是意中文化交流的功臣，他一生未参观过卫匡国墓。这次，浙江省外办却不予安排。他一再说：“真遗憾，我这是最后一次来中国了”（注：似乎他真有灵感，翌年就逝世了）。沈校长见状发话：“现在还是好好吃饭，我们立即派人去联络。陈村富亲自带你们去参观。”由于“文革”时，墓地收归杭州市文管会管理。我们向对方说明：科隆博一向对华友好，正是他任总理时中意建立了外交关系。他担任议长后，经常率团来华，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多次接见。“八九”风波后，西欧政界和学者都拒绝参加国庆招待会，唯有科隆博欣然应邀赴宴。所以这次来杭前，国家领导人特地接见了他们。这样，文管会才同意为其开放。第二天早上，我带他们去参观。他们按天主教传统举行仪式。按国际常规的礼仪，我方陪同人员，或是找借口离开，或是在边上默立，而不可在边上随意走动，仅此而已。2001年我在主编的《宗教与文化》（4）的“前言”中无不感慨地写下了一段话：“1991年3月原杭大发文正式成立基督教研究中心，迄今整整十个年头了。当时的形势是很严峻的，高等院校中仅我们一家挂牌基督教研究中心。同年‘八·一九’事件苏联解体之后……研究基督教的处境更为艰

难。……由于原杭州大学领导，尤其值得一书的是校长沈善洪教授坚持区分宗教研究与宗教信仰、学术研究活动与传教活动的界线，顶住解散基督教研究中心的压力，因而保住了这支队伍，为原杭州大学在海内外赢得了声誉。每当我们获悉某校建立基督教研究机构或宗教文化研究机构时，我们都感到由衷的喜悦，觉得又增加了一份安全感。这种心情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能体验到。”2008年10月我在《宗教与文化》（6）的前言中重申了这个感受。我想，在别人已开创，而且证明无风险又有收益的条件下，任何一个领导人都敢作敢为，难得的是遇到风险时，能判明是非、力排干扰，为下属“挡风遮雨”。这是一种无形的凝聚力，感染力，是一个学校师生员工愿意在遇到困难和曲折时为之付出牺牲、为之奋斗，而不是动不动就想另择它校或以走要挟的力量源泉。

我所认知的沈校长，还有不少事迹值得一书。比如说，杭大文史哲合力办七年制综合班，一起组建原杭大的人文学院以及学术方面同海外的交往，等等。但是最终我决定，还是围绕在向世界大学水平奋进中，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校级领导这个主题来评论一位校级领导人。诚然老沈有他的脾气、弱点，有的毛病简直是痼疾。凡写回忆，若通篇读下来都是赞美词，读者根本不认账，效果适得其反。世上没有圣贤和完人，却有自认完美的伪君子。可贵的是，老沈不为自己谋利，也不特殊照顾自己所在的系科，不搞背后算计人的雕虫小技。他对老哲学系和马列部的熟人很不客气。别说个人，就是我们整个哲学系，因为一个教师的挪动，老沈信了“两个半人”的话，在1996年1月的春节茶话会上，把我们党政四个人都损了一通。知道真相后，他就认错了。他还曾错判了一个教师，春节时特地翻阅全书，在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后，他还为此特地召开董氏基金会要给受冤者补评。我喜欢这种敢作敢为的领导，不喜欢那种逢人说好话，凡错不认账的官员。中国的高校若真要“去行政化”，真要改革不适应形势的管理体制，引导高校冲击世界先进水平，就需要有一大批有胆识，有魄力，有水平，有理论涵养，敢作敢为，不怕得罪人，不怕犯错，错了就改的领路人。

但愿我国的高校，浙江的高校犹如喷泉冒出一批批“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称职校长、副校长，书记、副书记！

[返回目录](#)

学者的风范精神的魅力

—杭州大学中文系教授 陈坚

校长是一所大学的灵魂和引航者。历来，杭州大学领导层多为工科、理科的。他们对文科特点很少了解，有的甚至发出诘问：文科有什么用？

自沈善洪先生从省社科院调到杭州大学任校长（1986年初）后，杭州大学，特别是其文科面貌，为之焕然一新。因为从事哲学教学与研究，沈校长对文科，尤其是中文学科，予以特别关注，为之苦心擘画，殚心竭智地扶持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从中文系申报教育部文科基地到各学科博士点的筹划认证，一直到年轻人才的发掘和青年师资的培养都关怀备至，费了他不少的心血。作为一位学人型的领导者，他不做高高在上的“寡人”。很多事情，他知道得很早很具体，如谁发表重要文章、著作。有时比作为系主任的我还要了解得更快。系里谁的课上得深入浅出，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创新热情，谁的课内容陈旧，索然寡味，他颇多了解，并时有评鹭（不一定都准确）。在汇报学术梯队时，漏掉了某位很有潜力的年轻骨干的名字，他也能当场提点。有的年轻教师经常会自己跑到他的办公室谈科研项目，乃至至于职称、房子等。我感到他有一种让人亲近，愿意向他反映情况、倾诉中怀、交流思想的吸引力。

更为可贵的是，他对文科发展所提的方针思路富有战略性。他思想开放，锐意伸拓，不屑于规行距步，安常蹈故。

中文系是传统深厚的、有悠久历史的系科，有很好的治学传统和优势。他要求在原有基础上开拓创新，明目扩胸，倡导要面向社会和时代，面向国家经济和文化的建设，走在时代潮流的前端。不能吃“三古”（古代文学、古代汉语和古典文献学）的老本，特别是在现当代文艺研究等新的学科领域要力争创出自己的特色。在我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发生重大转折的关键时刻，他不遗余力地带领中文系正本清源，批判极“左”路线，吸纳借鉴新的文艺思潮，强调学术探讨不要

受条条框框的束缚，要敢于突破禁忌有自己的发现，彰显独立的学术见解，特别是对现代文艺思想、文艺运动及创作要不怕触雷——政治失误，要敢于面对现实，敢于讲真话，总结新鲜经验，提炼新的思想理念，促进汉语言文学学科的繁荣。

谈到人文社科，必然会涉及学术自由的问题。大学管理者对学术自由的倡导和保护，更关键的应表现为在大学内部培植宽松的学术氛围。沈校长非常注意这种氛围的营造，邀请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夏衍到杭州大学访问就是其一手促成的，足可见其视野的开阔、目光的深远。

1986年春夏之交，夏衍来到杭州，我到西湖汪庄国宾馆去看望他。回来后，我与沈校长随意交谈时，提到夏公问起杭州大学的情况，并提议可否请他来杭大看一看，讲一讲。当时我只是一名普通的教师（时任教研室副主任）。沈校长立马说，这是很有意义的事。夏公是我们文艺界的前辈，也是革命的前辈。他正想听听社会各界对高校办好文科的看法，像夏衍这样有广阔丰富经历和人文精神涵养的人的点拨，那是再好没有了。他要我代他正式邀约，并叮嘱说：“你定好时间，我一定来。”

5月19日下午，原定于2:30开会，沈校长提前半小时就来了，而且还邀了当时主管文科的副校长金锵教授，早早地到东一教学楼下迎候。夏公一下车，他迎上前去，深深鞠了一躬，然后再上前握手。我在一旁作介绍。夏公问：“校长尊姓大名？”沈校长回答：“我是沈善洪。”“你也姓沈？”“我是浙江平湖人。”“我在德清读过书的，都是杭嘉湖的，是同乡也是本家。”两位的对话是如此的家常、亲近而自然。沈校长对于这位左翼（革命）文化的老前辈的钦仰和温情溢于言表。

座谈会开始，沈校长致辞，没有繁文缛节，没有客套，很简洁。沈校长首先表示了对夏公的热忱欢迎。他说，夏公是现代文化史上功勋卓著的战将，与鲁迅一起跟文化围剿做斗争，是地下党在文化界的领军人物，又是杰出作家，有丰富的创作经验。他在年轻时，看过报告文学《包身工》及电影《祝福》、《林家铺子》、《烈火中永生》

等，很成功很受教育。然后，他介绍了文理为主、多学科交叉的杭州大学概况，表示想振兴发展文科，并在原有基础上发展日、韩研究所，诚恳地敦请夏公提供意见和宝贵经验。

夏衍与杭州大学中文系部分师生共同探讨浙江深厚的人文资源和建国后人文学科受到极“左”路线的摧残，民族文化传统与外国文化的引进和融合等问题，然后提出了一个问题：当今物质文明上去了，在建设精神文明方面起很大作用的人文科学如何相应地跟上去？夏衍说：“建国三十七年来，教育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也有过不少的失误。主要是照抄苏联模式，不考虑中国的实际，没有花大力气抓教育，特别是轻视乃至歧视知识分子。缺乏智力资源比缺乏物资资源是更可怕的。”在谈到照抄苏联模式时，他进一步发挥说：“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学的只有一本《联共党史》。这中间有许多地方写得很好，例如谈唯物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等等。但也应该看到，这本书也不是没有缺点，其中既有个人迷信，又有大国沙文主义，特别是几次清党。我们都把这些错误的东西也学过来了……列宁死得太早，对于在苏联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落后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他还来不及找出规律性的方案。列宁是讲民主的，党内有不同意见，他的主张遭到挑战的时候，他就是号召全党辩论，甚至推迟党代会，让大家讲话。列宁死后就不同了，党内民主渐渐地消失了。办法是一次一次地清党。”这一段话，说得何等爽利、痛快。夏公是以自己含血带泪的苦难经历和生命体验，向后代们诉说他对历史的深思。

夏衍是杭州大学中文系接待的最高级别的一位文化名人（作家）。他的讲话视野宽广，分析精辟，富有说服力，师生反映强烈。许多媒体都作了报道，引起校内外广泛关注。送走夏公后，沈校长交代我将讲话稿整理出来。我将记录略予梳理后，以《适应时代面向未来》为题寄给夏公。夏公非常认真，仔细作了删改，并就此事给我写过两封信。信中说：“您给了我一份苦差事，上了年纪的人，讲话就会啰嗦，所以那份记录稿在我手边压了好多天，先是打算改一下，结果还是重新改写。”并特别叮嘱：“最好请沈校长审阅后再发”。我怕打扰校长，直接将文稿交给学报编辑部。没有想到学报一位编辑看了讲话稿

后，由于涉及批判苏联模式的内容感到“吃不准”，径直给夏公去了一封信。信中提到，学报是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刊物，根据“内外有别”的原则，对涉外稿件比较慎重。按照宣传部门有关文件的精神，当前，我国报刊对苏联及东欧国家的内部事务一般不做公开评论，不要点名批评。为慎重起见“希望您对讲话稿中涉及苏联模式和斯大林问题的文字做些斟酌”。夏公阅后很感意外，也有点生气，随即在来信的稿纸上用红笔写了一段话让我转达：“来示拜悉，已作了一些修改，如认为仍有不妥，则可加注‘文责自负’字样，或退回，不打算再改了。关于苏联模式的事，虽则未见诸‘红头文件’，但报刊上已不止一次有人提过，其实，对于斯大林，早在苏共‘二十大’后，我们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就已经提到过了，所以我认为年轻人知道一点，也有好处。”

事情至此，我赶紧请示。沈校长大略翻了一遍，说：“有什么问题？我看也没什么问题，这段历史他讲得好，讲透了。编者过于小心谨慎了，我看不用修改，夏公的稿子就这样发！”这番话说得很干脆，毫不含糊，真是一诺无辞，掷地有声！我立即向有关编辑传达了校长的意见，就这样，夏公的讲话稿才得以在《杭州大学学报》1986年第四期全文发表。文章发表后，夏公将此文收录到文集《天南海北谈》中。据此，我妄自猜测，夏公对这件事的处置是满意的。后来他还将由他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20册）专门托人辗转送到杭州，赠给了杭州大学图书馆。

可以看出，与那种畏畏葸葸、奉命唯谨的做法截然不同，沈校长思维敏锐，处事果断，敢于“违条犯禁”，自主决断，勇于承当风险和责任。这显示了中国学者、当代知识分子的高贵品格，让我深为感佩。试想，如果缩小了学者的言说空间，不管是外在限制，还是所谓的自律，学者们都很难就敏感问题公开发言。在那个“心有余悸”的年代里，沈校长却能保有如此开放包容的思想襟怀，实属不易。正是在这种学术精神的引领和示范下，一批自由率性、立体鲜活的人文学者才脱颖而出，为学校人文学科发展取得历史性的跨越奠定了斐然可观的坚实基础。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我的研究领域从原来现代文学、鲁迅研究转到话剧史和夏衍研究。每每写出一些有关夏衍创作、评论方面的文章，沈校长都屡屡加以鼓励。见面时，他常常会问及夏衍近来如何，你有什么新作？

80 年代最后一个秋天，我到北戴河出席一个话剧史的研讨会，路过北京时探望了夏公。返校后，向沈校长作了汇报。其时，国内文化知识界“左”的气氛趋浓，有人正眈眈旁伺，又要拿夏衍开刀。沈校长对夏公处境不无担心。当我谈到夏公近况如常、泰然自若、宠辱不惊，并转达他对沈校长的问候时，沈校长脸上漾起一掬温慰的笑容，说道：“是啊，那些人现在掀不起什么大浪的，再来批夏衍批巴金，谁听他的！”当时谈话的情景，至今想来还历历在目。面对一股涌动的暗潮，他言辞爽断，风骨凌然，给我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过了不久，有次见面时他问我，夏衍的作品出过全集吗？我说还没有。他即鼓动我说，你应该考虑。当然，这件事谈何容易。在沈校长的鼓励怂恿下，我到省里去呼吁，与有关方面商讨，终于经过三年多的酝酿，奔走，浙江文艺出版社于 2005 年才出版了 16 卷本的《夏衍全集》。我是编委之一，编了其中 6 卷，执笔撰写了全集的序言。在夏衍研究上，如果说我还做出了一些成绩的话，那是与沈校长的关心和诱掖分不开的。对这一点，我一直是扞怀知感，至今犹未淡忘。

大树根深，其质乃坚；高山流水，其声乃远。沈善洪先生的学术风范和精神魅力，当为我辈永远敬重顾惜，并孜孜引为学习的楷模。

返回目录

我心中历史系的一些事

——兼贺沈善洪校长八十华诞

——杭州大学历史系教授 杨树标

我在沈校长来杭州大学任职期间，在他手下“打工”了十几年，先后在教务处处长、科教中心主任、校长助理、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和系主任等岗位上任职，同沈相处较为频繁、密切，交往也颇为知心。经历的事不少，若按大事记的话，的确一桩又一桩；但按故事的话，就无法始其终，波折、情节就较为简短。在沈校长八十华诞，我借中文系吴秀明在《浙大校报》上发的《我心中的中文系》为题，说一点我心中的历史系，为庆贺沈校长来杭州大学任职的十几年有感。

我难得读校报。那天，一读吴秀明的文章，读了几遍。想借题说事，先同住在同一个小区、平时谈得来的中文系雪克教授谈及。他是我老师辈，文字功底颇深厚。他很热心我的借题企图，就手书一帖：“日昨谈及系史。窃再思之，撰作历史系史，实属必要，可称功德无量。惟百年沧桑，教授云集，短者数月，长者终生，已故、健在，大师、杰出、一般，难以协调平衡。如何掌握分寸，实事求是，既充分肯定贡献与成就，又能被系内外教师、校友乃至学术界人士认可并获得好评，非易事也。”又嘱我：“是知难而进，还是知难而止，望慎思之而后定。”过几天，雪克教授又给我送来《联谊报》上的一篇文章《清华失去的，正是这个社会稀缺的》。我读了几遍，画了不少红杠杠，现抄录几段话：“繁体字中的爱字无了心，义字无了我，导师的导字无了道，志气的志字无了言。无心，无我，无道，无言，这正是当下。”“大学是一个社会的精神地标。百年前，西风东渐，东风凋零；百年后，金风席卷，歪风肆虐。我怀疑，我们是否生活在精神最贫困、最没文化的时代。”“大学人文精神的抽离，这个大学无论如何恢复人文学科，都是形同虚设。这不只是清华的问题，也是中国所有大学的问题，也是中国的社会问题。”“看今日清华，居于中关村核心，好一个车水马龙，高楼林立，都再也无法做出于淤泥而不染

的一朵清莲。百年了，盛典了，可我心里明白得很，百年清华，失去了什么。”

我上面所说只是一个铺垫，说远了，拉回来说说我心中的历史系与沈校长在杭州大学的主持。

1. 教授在办大学中的位置

常听说“教授治校”这句话。“过去常听人说，清华是实行教授治校的制度，其实不大准确。清华并没有提出把教授治校作为制度来推行，这一称号是由别人叫出来的。当时北京还有人发表不同的议论。记得有一位新就任的北京某大学的校长，就提出：‘我不赞成教授治校，我的口号是：校长治校，教授治学’，而清华并没有提出这个口号，但是可能会引起这种看法，因为我们有一个教授会，教授会对学校的事，是有发言权的。”（《梅贻琦与清华大学》，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5 年 10 月版）

沈校长来杭州大学任职，就把教授（实际上是指教师）放在办好学校的关键位置。他既重视老的，更注重年轻的，尤其是 1977 级，即高考恢复的第一届学生毕业后留校的。这批人是现在学校中的中坚师资。

就历史系来说，在沈校长手里，师资队伍有七十多人。主力是上个世纪 50、60 年代毕业的本科生，基本上去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念过研究生、进修生。我自己就是 1960 年毕业，在中科院近史所进修（1960 年至 1962 年），参加过田家英主持的“中国通史”编写组和何干之主持的“蒋介石传”编写组，也算是受过他们的“熏陶”。在北京读了不少书，抄了不少卡片。我们这一档教师，主要是受益于沈炼之（世界近代史）、沈镜如（中国近代史）、黎子耀（中国古代史）、叶作舟（世界现代史）、徐规（中国古代史）、胡玉堂（世界古代史）、谢兆熊（世界古代史）、张慕谔（历史要籍）等已经过世的这批教师的教诲，也受益于现在尚健在的管佩韦（世界近代史）、毛昭晰（世界古代史）、吕树本（中国现代史）、

孙仁宗（世界现代史）等教师的教诲。现在打牌子的张荫麟、张其昀、贺昌群、向达、刘节、钱穆、方豪、谭其骧、陈乐素等老师，除个别的，我们大都未见过面，不知道他们教过什么书、留下什么精神。学校还大力引进了北京大学的几位老师，如黄时鉴、丁建弘、梁太济、戴尔俭。沈校长很器重这些引进的人才，不单单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他们确有水平，有才气。黄、丁都兼任过校图书馆馆长。梁现在还是浙江大学学报的几个顾问之一。这几位师兄为历史系作出不少贡献，出过不少成果，为历史系争得过名气。

在沈校长任内，1977 级的学生留系的多是拔尖人才。无论中古史的包伟民，还是世界史的沈坚，这一拨人均在全国相关学术领域里有相当地位。这支师资队伍在全校大人文学科里有两大优势：一是外语好。历史系有十几位老师出国喝过不同程度的“洋墨水”，长的达七八年，如杨杰，在英国获博士学位，还任过全国英国史学会的会长。许多人可以用外语（英语、法语）授课；二是电脑玩得很好，可以说仅次于计算机系。我们系的多媒体教学，在全国高校中领先。五十多所高校（包括北京的几所部属院校）领导参观过我们的多媒体教室与课件。沈校长就支持我们系花了几十万设了这个教室，当时在全国高校为领先。一台投影仪要十多万元，在文科里办这个设备是肯花大钱了。

教师的职称评定，沈校长是很严格的。现在翻阅一下 1988 年 9 月编印的一本《杭州大学教职工名册》，全校只有一百零五位教授。校领导中只有三位教授，部处级中只有教务处处长、研究生部主任、科研处处长、科教中心主任（兼校长助理）、工会主席（数学系兼）六位教授。连党委书记、常务副校长、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均为副教授。

有一个插曲，管教学的副校长是副教授，我曾同沈校长说过，这个位子需要一位教授。沈反问我，为什么一定要晋升呢？他认为条件不够。其他部处的领导清一色为副教授，甚至连校办主任、党办主任、宣传部长（还兼党委副书记）、组织部长还是讲师（助研）。相比之下，也可能这种比是不合适的。现在的校级、部处级第一把手，基本上（恐怕是清一色）是教授。在评教授时，沈校长实行“答辩制”。

正、副教授均要答辩，然后严格投票，三分之二通过才行。曾经为一位副校长晋升教授，连着表决四次，一次比一次票数少，始终未通过。应该说，这是既照顾又公平的。当然，升等事，情况复杂，难免升的升，等的等。有的教书一辈子也没等上，也没“扶正”，反映不一，也是自然的了。在沈校长看来，教授是高校教师队伍中的第一层梯队，是办好学校的支柱，力主提高他们的待遇。杭州大学的工资外补贴，校级领导同教授同等，均为九十元一级。不像有些高校，打扫行政大楼的，补贴比教授还高。

2. 系是大学的基础

大学里办系是几十年形成的成功做法，国家教育部就每年开一次系主任会议。现在大学里有许多院，有院里套院，如人文学院下有艺术系，而对外是艺术学院；有的一个系不知归属于哪个院，如我们历史系，有属于人文学院，有属于历史文化学院，也有属于社会学院的；有文武结合学院，如体育系同教育系合为一个学院，一个是理，一个是文，我们叫它为文武结合的学院；有的系是“部规”十几个门类的一级学科，如文、史、哲各为一级一个大门类，而现在合而为一——人文学院，外语系却单独成立学院，新闻系就单独为“传媒学院”。总而言之，只要市场上有需要的，就打出牌子，根本不评估条件。现如今又出现了一个“国学院”，大概把中文系古典的、历史系古代的打捆在一起，用民国时期的一个名称，又较为时尚，再祭为“国学”。

沈校长办学的另一个思路是：把系科建设，视为办好一所大学的基础。我们历史系，在沈校长任内接过前任的班底，把它办出了特色：

一是形成法国史为中心的世界史，民国史为中心的中国近现代史，宋史为中心的中国古代史（当时元史的研究在全国也有相当的地位）。系里的这三个中心，在全国史学界也算是排上号的。法国史是源于系主任、我们的老师沈炼之教授打下的基础，由楼均信、戴成钧接班，现又由沈坚接班；宋史（包括中古史、历史要籍）是徐规教授打下的基础，由魏得良、杨渭生、仓修良、龚贤明、何忠礼及1977级的包伟

民等组成的一支强势的队伍；民国史由杨树标、金普森打开场面，其中“蒋介石研究”是全国开先河的，现有汪林茂、梁敬明等。

二是出过一大批科研成果，全系每年教师正式出版十几本专著、发表百余篇文章。

三是系里有一个藏书十万、期刊基本齐全的资料室。历史系的资料室在全校是出名的，许多外系的老师也到历史系查阅资料。系资料室由几人组成，设主任（楼子芳）管理，进书、编目、修补工作不断开展，尤其是线装书、外文书、民国时期的书，设有专室。现在看来，许多书也成为“文物”了。如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版的书，也有七八十年了。可惜现在取消了这个资料室，无人管理。

四是系里有一个独立的文物室，是多年多人收藏积累而成。我曾请省博物馆的专家来鉴定过，其中国家一级的文物有好几件。文物室内有玉器、钱币、青铜、瓷器（如宋的五管瓶），还有甲骨文。

五是在沈校长任内建了一座历史大楼，这在全国高校中是独一无二的，虽然规模不大，只有几千平方，五层，至今仍基本上由历史系单独使用（可惜被肢解）。更可贵的是，在沈校长任内，我们系被评为国家教学基地，成为当年十几所高校的历史系教学基地之一。沈校长把我推去参加教育部评定委员会。这次是中文、历史合并评定，有十几所委属大学，三所地方性院校（杭州大学、西北大学和中央民族学院）。我校中文系据我看到的资料排为第五名，历史系排为第十名并列的三所。我系有两个博士点，与几所委属大学的历史系并列，甚至比其中一二所大学还多一个点。一个点是了不起的，像江西省，当年全省还没有一个点。我作为在场的评委，属少数来自地方性院校的评委，上基地的可能是很大的。结果杭州大学历史系被评为国家教学基地，挂铜牌，每年还给钱。

六是我系主任办公室也比较“先进”，当时看来是很“舒适”的。地面、家具、墙壁一个颜色，窗帘是自动的，沙发是旧的，但也得体。办公桌是“老板桌”，里外各一间，里间是小会议室，椭圆形的会议桌，椅子是软布椅。连沈校长同党委书记薛艳庄都说过：“我们到‘杨办’看看”。由于我在学校干过十年行政，到系里任职是干得比

较顺手的。当时金普森任系主任到年龄了，学校提出四位教授中选一位来主持。我毛遂自荐：“我当系主任比较合适”。沈也同意了，就是嘱我：“不要对人太冲。”我曾私底下说过，我对沈是“不叫不到，不给不要，不哭不笑（即不亢不卑）”。我还有一个论调，系主任最好由本系毕业生就任。因为他是亲生儿子，爱这个系，爱这个母亲，外来的怕被糟蹋掉，不爱惜，不心痛。当然，我知道这个想法太偏激。

3. 对外开放

我们是从一所师范性的院校发展而来的。它是1952年院系调整时，由浙江大学文学院、理学院的一部分和之江大学文理学院、当时的浙江师范专科学校、俄文专科学校合并成浙江师范学院，校址在之江大学原址。

1958年根据国家的需要，新建杭州大学同浙江师范学院合并，以师院为基础，定名为杭州大学。沈校长是这个学校历史系毕业，很了解这个学校，也很爱惜这个学校。立足于这个学校的基础，必须打开思路，对外开放，步入现代的综合性大学。这就要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在沈校长主持下，学校先后同十二个国家的五十二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签订了合作交流协议，派出四百多名教师进行合作研究、访问进修，并请进二百多名外国专家来校任教。还聘任了一百多位海外著名专家为杭州大学名誉教授、兼职教授或客座教授；接收二十五个国家五百多名留学生、六百多名进修生；批准向港澳台地区招收学生。沈校长对这项工作是非常细心的，经常坐在外事处办公。有过一个笑话，外事处处长同我说过，因为有人要在外事处发传真到境外，就通过沈校长先同外事处打招呼。外事处同志有一次就开玩笑地对沈说：沈校长，你日理万机。这个传真机你就不要管了吧。

4. 大学里读书是根本

在大学里，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他们的根本是读书。当然，大学是塑造人的一个重要阶段。这是要多方面进行的，而读书是一个基本途径。否则的话，进大学塑造什么呢？！

怎么来读书呢？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我在北京听到一位名人的九字言，即“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据我现在理解，所谓“读死书”即书是死的，要把它读活，把平面的读成立体的，有层次，有活动；“死读书”即要钻研地读，不是一掠而过，泛泛地读，而是要研究书的内容，要学以致用；“读书死”，即活到老读到老，读书读到死为止。其实人的一生读书非常有限，就算一周读一本，那么一个月读四本，一年四十多本，算五十年，也就二千多本书。假如稍微精读一点，减一半，就是一千本书。常听古人说“读万卷”。古代“万卷”，那是几千字、几十页就算一卷了。可现在不行了，几十万字、几百页才成为一本书。谁又能读这么多书呢？！

就我们中国史专业来看，读书有几个特色：第一，必须打下文字（文言文）功底。没有一定的文言文功底，怎么能读四书五经、二十四史呢？我在历史系当助教时，徐规教授还给我们这批年青教师每周讲解《古文观止》，要我们背诵，还进行考试，压力非常大。第二，史学是一个逻辑思维，不是形象思维。虽然不能以“考据”作为唯一，但必须言必有据，辨明史实。要求我们搞史学的，“铁路警察各管一段”是不可能的，只能是“管一站”且管一个小站。史学领域分为中国史与世界史。无论中外，又分为古代、近代、现当代；还分为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民族、文化，等等。像我，算是“史学家”了，实际上只懂得中国史，又限于近现代史，又限于现当代，又限于民国史，又限于民国人物且是主要人物，自己实在懂得的是非常非常有限的。第三，大学本科是人生读书的真正起点。要读的书多多，可时间又十分有限。本科四年，读专业（史学类）书顶多只有两年半至三年时间，即使三年全力以赴也只能读一年四十周，三年一百二十周，每周一本书，合计一百几十本书。什么“文理渗透”、“学科交叉”、

“跨学科”等等口号均为糊弄人的。眼前，在这些口号下未见出过什么样的“人才”；眼下的制度也难能造就什么样的“人才”，至于培养什么“大师级”人才那更是瞎吹了。

我们历史系出过“茅盾文学奖”，出过拥有几十亿资产的总裁，也出过中央部级的干部。那并非上述这些口号的结果，而是他们在历史系打下扎实基础的结果。沈校长是读书型的校长，不仅专业书（中国哲学史，尤其是王阳明研究），许多人文书他都广泛猎及。我平时上他家聊事，他总是手不释卷，孜孜不倦。他是靠读书来治理大学的。

5. 同游河西走廊

沈校长卸任以后，我正好在系主任位上，趁全国高校历史系主任会议，邀沈同游河西走廊。这是沈的专业，既可以散散心，又可以看看河西走廊。我们从兰州出发，看了武威、张掖、酒泉、嘉峪关、敦煌，还看了甘南的拉卜楞寺。沈对风景并不十分在意，而对和专业有关的，就非常执著。如拉卜楞寺，这是甘南藏族地区最大寺院，与西藏哲蚌寺、甘丹寺、色拉寺、扎什伦布寺和青海塔尔寺合称我国喇嘛教格鲁派六大宗主寺。全寺面积占地一千三百亩，主要建筑有扎仓六所、拉康（佛寺）十八所、囊欠贝（活佛公署）十八所、讲经坛一座、印经院一所、藏经楼一所以及僧侣万余。沈对这些虽然走马看花，但尽可能点滴不漏地参观。他对敦煌的莫高窟同样十分崇敬，推及到我校古籍所。从姜亮夫教授开始，现在的一批年青才俊，沈都是十分珍惜，为他们的成长，花费了不少心血。沈对千佛洞这个古代艺术宝库的壁画与彩塑，兴味甚浓，尤其对现编十六号洞窟发现的藏经洞，内藏写本遗书、绢画、刺绣等珍贵文物五万多件中，许多被帝国主义分子大量盗窃和破坏之事，十分关注。我们一路走一路拍了许多照片。

我在系里当了六年系主任。沈更是全心全意地干了十年校长。他是尽心尽力了。他不是完人，他有他的习惯与脾气。仅举一例，如不熟悉的人同他打招呼，他很难热心应答。对女性打招呼更是“冷漠”。我老伴说过，她曾一个人遇见沈，叫一声“沈校长”。他是爱理不理

的。我听地理系一位女教师说，一次同沈打招呼，沈也是爱理不理。她们都非常生气，有意见，说以后遇见沈再也不理他了。真是冤啊，沈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我是想了很多很多（很多天与很多事），下笔只写了一天多（5月30日、31日），不周全，很零碎，多失误，敬请沈校长与同仁谅解。还是雪克教授嘱：“协调平衡”、“掌握分寸，实事求是”、“望慎思之而后定”。但这很难很难，非属下所能做到。

[返回目录](#)

先生之风 山高水长
深切怀念敬爱的杨招棣老师

—杭州大学历史系 82 级 吴志刚

（2018 年 8 月 30 日）

2018 年 1 月 5 日，敬爱的杨招棣老师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望着悬在办公室墙上杨老师书赠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卷轴，我的眼睛充满了泪水，今后我再也聆听不到老师的谆谆教诲！但老师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却又一幕幕地在脑海中浮现，仍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诲人不倦

1983 年 9 月的一天，我们杭州大学历史系 82 级的 70 多位同学正在东临 402 教室等老师上课。《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为历史系学生的主课之一，我们大家简称为《历史文选》，这门课由仓修良、陈仰光老师讲授。这天上午，只见仓老师、仰光老师陪同一位身材魁梧、面色慈祥的中年人走进教室。在大家的好奇目光中，仓老师介绍说：“这位是我们系里的老领导杨招棣老师，现任杭州市委副书记。杨老师十分关心系里的教学工作，也关心同学们。下面《历史文选》中‘诸葛亮传’这一专题由杨老师讲授！”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杨老师。早在考入杭大前，我就已从 50 年代毕业于杭大历史系、后在黄岩中学教书的岳父口中得知杨老师是黄岩院桥人，且 50 年代回来后一直在杭大工作。

在讲“诸葛亮传”前，杨老师首先要求我们注意把握《三国志》与《三国演义》的区别，并认为“二十四史中注释工作做得最好的当推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和胡三省《资治通鉴注》。”随着讲授内容的逐步展开，老师旁征博引，时而板书，时而讲解，把我们带入了引人入胜的知识海洋中。

当讲到“玄卒，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时”，杨老师使用他漂亮的书法在黑板上为我们抄录（《汉书·郊祀志》诗句）：

步出齐东门，遥望荡阴里。
里中有三坟，累累正相似。
问是谁家墓，田疆古冶子。
力能排南山，又能绝地纪。
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
谁能为此谋，相国齐晏子。

讲到赤壁之战中的鲁肃时，杨老师板书赵咨语“纳鲁肃于凡品”，指出赵咨说，孙权是聪明仁慈之主，《三国演义》丑化了鲁肃。

当讲到诸葛亮《出师表》时，他引用了文天祥《正气歌》中的“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这表达了老师对诸葛亮的钦佩。公元 211 年冬，诸葛亮出大散关举行北伐。老师又引用了边塞诗人岑参《轮台歌》诗中的“上将拥旄西出征，平明吹笛大军行”句来烘托场景。最后在评点诸葛亮一生得失教训时，杨老师又在黑板上为我们书录了成都武侯祠中赵藩所书的楹联，即“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并为我们讲述了此联所蕴含的思想和对诸葛亮的客观评价。

时间虽过去了 35 年，但当年课堂的场景仍历历在目，宛如昨日发生的事情，这真是一堂令人难忘的课！

情系桑梓

2005 年 7 月，我受组织安排到黄岩区出任组织部长。为充分发挥黄岩乡贤助推家乡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工作，区委要求组织部门承担好这职责。为此，我们在北京、上海、杭州三地分别成立了硕、博士人才联谊会。杨老师被聘为在杭黄岩籍硕博士人才联谊会的顾问。自此

以后，我们每年在杭州年会上都能相见。我出差杭州时，也时常去老师家探望。

我知道，上世纪80年代末，杨老师为黄岩路桥机场的航班开通出了大力。他还襄助解决了家乡的小学校舍、饮用自来水等大问题，但老师从未在我面前提起过。我们相处时，老师更多寄语的是黄岩发展。他认为，作为台州经济最发达地区，黄岩历史悠久，人杰地灵，在国内知名度较高。特别是1994年撤地建市后，在黄岩工作的同志要求高、压力大，要努力工作，为黄岩振兴多作贡献。同时，老师也有隐忧。认为随着一些省市老领导退下来，大家对黄岩过去历史的了解会产生一些变化，说：你们现职的同志除了努力干好工作，还要多宣传黄岩。

不管是在桂花城初阳苑老师家中，还是在浙江医院，抑或是在浙一医院病房，每次杨老师谈得最多的都是家乡的发展。桑梓之情，溢于言表。他为人宽厚，态度谦逊，在赠我的书籍和书作落款时，总是题写“志刚学弟雅正”。书写的内容“赵州八十犹行脚，只因心头未悄然”，“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都寄托着老师对学生的期许和要求。老师不管是在家乡人民和干部心目中，还是在我们这些受训的学生弟子中，都享有崇高的威望。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杨老师，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返回目录](#)

悔之勉之

——回忆杨招棣先生

——杭州大学化学系 84 级研究生 金友元

(一)

去年九月，伊建新师弟嘱我填首咏茶词，赞一赞杨招棣先生开发安吉白茶的功绩。于是，上网查了杨先生的生平，方知他从九十年代后期起担任《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的执行会长，主要从事茶文化的挖掘和整理工作。在这期间，他和茶文化团队一起，发掘并推广了安吉白茶。

安吉，处于亚热带地区，与我老家余杭毗邻，同在苕溪流域里，气候湿润，以竹乡闻名于全国。凡是有竹的区域必定有茶。在云雾缭绕的丘陵地带，茶树漫山遍野。独特的气候条件，产有大量的特种茶叶。然而，有好茶叶并不意味着就有好的茶叶品牌。

年轻时喜读《三国演义》，记得小说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在汝南新败后，刘备全军士气不振，前途一片渺茫。为此，刘备拜谒司马水镜先生，痛陈缘由：“武有猛将，文有良臣，备怎会一败再败，落到如此地步？望先生教我。”司马先生点拨刘备道：“关羽，张飞，赵云皆万人敌，可无人善用之。”意思很明白：你缺一个善于谋略之人。接下去，便有徐庶走马荐诸葛，刘关张三顾茅庐，孔明先生出山替刘玄德运筹帷幄，文武齐心，共同开创了魏蜀吴三分天下的局面。

安吉有好茶叶，如同刘备麾下猛将。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制作技艺，这些茶叶被当作毛胚贱卖了。杨先生就是那个善于谋略之人。如同诸葛亮建立蜀汉，他规范了茶叶的制作过程，提高了茶品的档次和价值，使安吉白茶声名鹊起，成为一款全国名茶。对于安吉茶农和天下茶客，杨先生功莫大焉！

前年，得友人见赠几罐安吉白茶，心甚感激。此茶的特点是：外观上，金镶碧鞘，白毫显露；冲泡时，色泽淡绿，清冽持久；品尝后，唇齿留香，回味生津。

饮水不忘掘井人。手中握一杯外观和口感俱佳的安吉白茶，寄调词牌《采绿吟》填一阙，铭记杨先生为此茶而付出的辛勤工作。

【采绿吟·安吉白茶赞】

（2021年9月2日）

伊兄建新谙熟茶道，经他一番点拨，方知此茶的发生与杭大化学系前辈杨公招棣有关。遵伊兄嘱，用周草窗韵，聊填一词纪之。

迤邐苕溪畔，薄雾罩、水缓坡低。
和风已至，懒阳才起，催趲晨曦。
竹乡春色里，丘陵地、邈邈嫩绿千畦。
笑嫣然，纤纤手，天天忙碌么妹。

收万篓良材，须知晓、尖芽何法炮制？
浅焙逸清香，却作践毛胚。
感杨公、精虑殚心，开新茗、平凡变神奇。
丛山出，安吉白茶，闻名九畿。

（二）

末学后进的我，却很幸运地与杨先生有过两次交往。一次是在学生时代，另一次则在三十年后。

在《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任职前，杨先生是浙江省级领导。在省级领导之前，杨先生是杭州市级领导。在市级领导之前，杨先生是杭州大学校级领导。在校级领导之前，杨先生是化学系系级领导。然而，无论杨先生任哪级领导，在我们学生的眼里，杨先生始终是个大人物。

我与杨先生唯一一次面对面交流是发生在杨先生就职市级领导之时。

那是一九八七年夏季的某一天。暑假期间，在校的学生不多，杭大校园内显得空荡荡的。因有实验任务，我跟往常一样，清早骑车赶向化学系。锁好车后抬头一望，见大楼前面的台阶前站着一排人，相互交谈甚欢。这些人中，大多是系里的老师们，抬头不见低头见，个个都认识。其中，有系领导张永敏先生和郑小明先生，有老教授周洵钧先生，戚文彬先生，和金松寿先生等。但是，中间一位穿着浅咖啡色中山装的人，却不认识。他气宇轩昂，神采飞扬，正和旁边的几位老先生谈笑风生。

放假期间，系里的先生们不用坐班，今天难得聚得这么齐，必是为了接待中间这位未知名的先生。推理一下，这位先生必有来头，只是不知道有多大来头？小心从旁边绕过人群走进大楼，在楼梯口碰见了师兄朱东伟，我便向他打听此人的来历。朱师兄答曰：“他叫杨招棣，是从我们化学系出去的。你不认识？他现任杭州市委副书记，分管教育，今天返系来视察工作。”

杨招棣！从报纸上电视上经常看到听到这个名字，如雷贯耳。可是没想到，他出自我们化学系！更没想到，今天还近距离见到了他本人！



杨招棣先生

这是我见到的最高层领导了。以前在农村，也有几次见到过在地头指导农业生产的公社干部。七六年末，一次去公社开揭批四人帮大会，在远处，还见过在台上慷慨陈辞的县委副书记。当时认为，这人的官职已经不小了，但与杨先生一比，那还是差几个等级。

得知是个大领导，不免又回头看了他一眼，不过看到的只是个背影。于是，掉头向上，直奔四楼实验室。

一到实验室，我就忙开了。计算，称量，配制溶液，调节器皿，待把反应物质全都加入到高压釜中，已耗时近二小时。正在静等反应釜中升温升压时，忽听到一阵嘈杂声从走廊那边传来。探头向门外一看，是杨先生他们一行向这个方向过来了。

假期里，在实验室中做实验的学生并不多。我们这个可容纳八人的实验室，当下只有我和吴红两人，正在做一个与工厂合作的项目。

猜想一下，杨先生应该是刚视察完下面几个楼层的无机，分析，和物化实验室，现在要视察的是我们有机实验室。当一行人鱼贯而入，这个判断得到了证实。陪同的人群中，现在是清一色有机老师。周洵钧，张永敏，黄宪，陈振初，和洪琳五位先生一个不少。

我们这个实验室是黄宪和陈振初两位主管的。视察一开始，黄先生简单介绍了一下实验室的情况后，话题便转到本实验室所做的项目上。陈先生领着杨先生走近反应釜，指着我向杨先生介绍说：“这是我的一个研究生，名叫金友元，刚拿到硕士学位。我让他负责一个与杭州民生药厂的合作项目，项目名称叫‘氟呱酸改性’。”

杨先生不愧在化学系主持过多年工作，反应异常敏锐：“氟呱酸的商品名是不是叫诺氟沙星？这款是个消炎药吧？市场上有售，听说疗效不错。那么，我们为何要对它进行改性？改性后与改性前有什么异同？”

陈先生笑咪咪地对我说：“回答一下杨老师提出的问题，就从这台仪器开始说起，如何？”

恩师有令，自当遵从。

如果说些场面话，我还真既说不好也说不多。但是，这次杨先生问及的是专业方面，那我就有自信回答杨先生提出的问题了。陈先生

让我从这台仪器开始说起，事出有因。当时，这台高压釜在杭大化学系独一无二，陈先生颇以之为豪。刚从美国进口的这台仪器，机械部份全用不锈钢制成，耐酸耐碱，不易被腐蚀，性能良好，操作简便，且兼数字调控。设计压力可达八个大气压，设计温度可达五百摄氏度，能进行高温高压条件下各类有机合成反应。我们的氟呱酸改性项目中有一步取代反应就要在高温高压下才能完成，所以正用得着这个反应器。比如说，已在釜中的反应就设置在三个大气压和两百摄氏度条件下进行。

听完了介绍，杨先生颌首赞道：“介绍得很好。有了好仪器才能做好实验。有条件的话，这样的仪器该多进几台。”

受到了杨先生的鼓励，我接着解释改性氟呱酸的理由：“纯净氟呱酸的成品为白色粉末，易溶于水，是个水溶性药物。它能被人体迅速吸收，但不同的个体对药物的吸收度不够均衡，有的人只能吸收给药量的百分之五十以下。所以，要对氟呱酸进行改性，其目的就是在分子内部加入一个非极性基团。比方说，改成环丙氟呱酸，从而增加药物的脂溶性，提高人体对其的吸收能力。我们计划将吸收度提高到百分之九十左右，就能在保证疗效的前提下，尽量减少用药量。改性后，单剂的药量可望从四百毫克降低到两百毫克，这样，一方面降低成本，另一方面减少药物对人体的副作用。”

杨先生十分礼贤下士：“我懂了，谢谢小金同学的解释。”回过头与随同的几位先生道：“刚才在物化实际室，我赞扬了郑小明他们研制氨氧化催化剂的工作。在这里，我也要表扬你们改造药物性能的工作。我们杭大在这方面做得好，领先于别的大专院校，带了个好头。高等院校，以实施系统性教学为优先，同时也要将专业知识与生产实践相结合，帮助工矿企业解决技术难题，造福国家，造福人类。”

只听人群中的周先生问道：“小杨刚才的这番话说得有理，知识和实践相结合，但不该是‘学与致用’这个口号换一种说法吧？”

看来周先生以前就一直就称呼杨先生为小杨，至今也不改口？杨先生不以为忤，反而笑着说：“周老还记得当年我们两人与那位工宣队长的几场辩论？‘学以致用’这个口号一直都有，但在电影《决裂》

以后甚嚣尘上，我们都坚决反对。高等教育有高等教育的规律。如果将教育计划去适应一时一地的需求，那就不是高等院校，而是职业培训所。他辩不过我们，只能干生气。哈哈！”

这番话振聋发聩！

在我们年轻的时候，确实容易接受这个“学以致用”的口号，也觉得在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课堂中讲解“马尾巴的功能”的知识直属多余。学到的知识不用于实践，那有什么必要学知识？杨先生这番话如醍醐灌顶，使我顿时明白了读书的真谛：课堂上学到的知识，甚至是专业知识，并不是样样时时都能派到用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可以不学。如果在某时某地要用到某种知识而自己又不具备，才能深刻领悟到什么叫“书到用时方恨少”！

杨先生他们走出门去，回头还不忘嘱咐我们几句，“跟着老师们好好学，你们都有好前途”！

得先生教诲勉励，终生不敢或忘！

（三）

时间飞驰，转眼已是三十年过去了。那是二〇一七年夏季的某一天。这天，我与物理八零朱锦涛，外语七八麻跃进等几人在数学系校友陆国震的微信群里海阔天空地闲聊。不知怎么聊到了诗词，进而聊到了诗词的用韵，聊到了《平水韵》和《词林正韵》在诗词中的应用等等。这天群里较空，也没见到几个校友在线上。可是，聊着聊着，有一个名叫杨芳莘的校友突然加入我们的讨论中。

我知道杨芳莘这个人。她不光是我们化学系七七届的学姐，而且是杨招棣先生的女公子。她是哈佛大学的高才生，知识丰富，事业有成，现任北加州医科大学执行常务副校长。

然而，杨学姐这次加入我们，并不是来参与有关诗词用韵的讨论，而是转达杨先生对我们后辈的教诲和勉励！

杨先生，不光在领导岗位上兢兢业业成绩显著，而且在诗词文章上耕耘多年收获颇丰，乃是一位口碑极好的学者型官员。



杨先生曾用笔名“板桥霜”在报刊杂志上发过多篇诗词文章，而且还出了一本合集，书名就叫《人迹板桥霜》。很显然，这笔名与书名来自唐朝诗人温庭筠下首诗作《商山早行》的颌联对句：

晨起动征铎，客行悲故乡。

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

槲叶落山路，枳花明驿墙。

因思杜陵梦，凫雁满回塘。

用这个笔名，说明杨先生崇敬和效法温庭筠。因此，他的诗词作品有着“花间派”之韵味：简洁明快，清丽俊逸。请欣赏杨先生的一首《忆江南》。这词作于1997年11月16日，猜想词中的米琪应是杨学姐之女，而新州该是新泽西州：

【忆江南·为外孙女米琪周岁而作】

新州好，风景画中游。

晓雾林中寻竹笋，窗前月下话春秋。

能不忆新州！

杨先生不仅精诗词，而且通书法。请欣赏他在甲申夏日手书的一帧手法。正文仅一个字：缘，笔法铁画银钩，力透纸背。题跋是一枚长条篆字印章：苍溪人；落款署名柳南，下有一枚方章。其中，苍溪即指杨先生老家黄岩，出于《墨林今话续编》中的“苍溪方絜”句。



在我所认识的老师中，像杨先生这般既具领导才能又具学者风范的长者，为数不太多。像杨先生那样不懈地提携后进的先辈更是少之又少。我们与杨先生并无微信联系方式，一切都得通过杨学姐转达。听说，杨先生此时正缠绵病榻，却还隔空对我们后生小辈海之勉之，实在令我们敬佩。

至今仍记住杨先生当时对我们说的话：“综合性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就是知识面广博，文理双全，中外皆通。为我们的杭州大学能培养出这样的学生感到骄傲！”

对杨先生所说的前面几句话，学生们愧不可当；对后面一句则极其赞同：我们为杭大感到骄傲！庆幸我们有好领导，有好老师，有好学生！

（四）

寄调《千春词》，记杨先生两度教诲勉励。

【千春词·祭杨公招棣】

（2022年1月5日）

铭记西溪，缅怀道古，回首黄龙。
忆德劭师长，傲醒青涩，智深教授，训海矇瞳。
学子莘莘，课堂溥溥，栋宇英才勤用功。
黉园里，听书声朗朗，夏雨春风。

循踪招棣杨公。
曾两度、数言导启蒙。
用拳拳此意，提携后进，谆谆斯语，指点初逢。
岁月如梭，流年似镜，期盼苗成千丈松。
涅槃后，渡先生舆乘，连璧苍穹。

（2022年1月5日杨招棣先生三周年祭亡日写于圣地亚哥，5月5日改之。）

[返回目录](#)

回顾我的读书生活

—杭州大学中文系教授 郭在贻

我于1957年考入杭州大学中文系。毕业时，我的学习成绩居全班第一。也因此，我侥幸地被留校了。其时，正值组织上要给姜亮夫先生配备助手。系里派了四个人到姜先生家里接受面试。面试的结果，选中了我。从此，我便留在杭州大学语言文学研究室工作（这个研究室在“文革”中被“砸烂”，我又转到中文系任教），开始了我的真正的读书生活。

那时的研究室，条件很不错。导师有夏承焘先生、姜亮夫先生、胡士莹先生、王焕镛先生，现在看来都是一代宗师了。每年有8000元的购书费。图书插架，琳琅满目。我为了看书方便，有一段时间曾借口神经衰弱，不堪集体宿舍的吵闹，搬到资料室里住。因此，得以泛览资料室的大量藏书。夜阑人静之时，一卷在手，青灯独对，觉得人生的乐趣盖无过于此了。那时我年方廿二、三岁，精力旺盛，常常看书看得错过了吃饭时间。赶到食堂时，已经关了门。有时就到路边小摊上买一只甜瓜充饥。每天夜晚，是我读书的最佳时间。吃罢晚饭，我先练习一个小时的毛笔字，然后读书。不到夜里十二时甚至次日凌晨一、二时，是不会就寝的。年年月月，乐此不疲。这样的读书生活坚持了四年，直到1965年“四清”运动开始，才告一段落。

根据我的专业方向，我读书的重点自然是语言文字学方面。清人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我从头到尾读过三四遍。我在自己用的本子上，先用朱笔点读过一遍，然后又密密麻麻地贴满了浮签。用一句套语来说，可谓“丹黄烂然”了。当时读书虽不无重点，但却谈不上专精。所读的书也不局限于语言文字学一个方面，诸凡历史、哲学、文学以及其他杂书，我都如饥似渴地读。《丛书集成初编》中所收的笔记小说之类，大部分我都浏览过。在研读《说文段注》的同时，我也读了不少清人的文集笔记，诸如《日知录》、《潜邱札记》、《十驾斋养新录》、《癸巳类稿》、《癸巳存稿》、《咳余丛考》、《札

朴》、《越缦堂读书记》、《读书胜录》、《纯常子枝语》、《东塾读书记》等。我尤其喜欢读中国古典诗词和中外长篇小说。历代诗人词家中，我最喜欢的是晋陶渊明、唐李商隐、晚唐的三罗（罗隐、罗邺、罗虬）、南唐李煜、清人黄仲则、舒位、龚自珍、纳兰性德以及近现代的苏曼殊、郁达夫等。李商隐的《无题诗》、黄仲则《绮怀诗》、龚自珍《己亥杂诗》，我至今犹能背诵一些。清人汪容甫的骈、散文，尤为我所崇拜，以为诚如汪氏自叙所云：“此殆天授，非人力也。”可望而不可及。中国长篇古典小说如《儒林外史》、《红楼梦》等，我读过若干遍，并且详细地做过卡片，书上写满了批语。外国小说如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雨果的《悲惨世界》、《笑面人》、《九三年》，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都曾使我着迷。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我仅用了一星期的时间就把它读完了，并做了数百张卡片。而使我最感动的外国小说，莫过于托尔斯泰的《复活》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这两部巨著曾极大地震撼着我的心灵，使我久久不能忘怀。

回顾那些年代（1961-1964），我感到生活中充满了诗情画意。除了读书，我也热爱大自然，喜欢欣赏自然美。秀丽的西子湖，曾经是那个时期我心目中的“恋人”。无论是她那“柳垂金线、桃吐丹霞”的春景，还是“丹桂飘香，紫薇争艳”的秋色，都深深地使我陶醉。我常常一个人踽踽地跑到西子湖边，靠在长椅上，对着面前的湖光山色出神。于是黄仲则的诗句便悄悄地涌上心头：

远山如梦雾如痴，
湖面风来酒面吹。
不见古人闻旧曲，
水西楼下立多时。

可惜呀，好景不长，这种宁静而饶有诗趣的读书生活，仅仅维持了四年。到了1965年，先是“四清”运动，接着是“文化大革命”。一场亘古未有的特大风暴席卷着中国大地，没有哪个地方可以安得下

一张平静的书桌。可是，说来也许人们不相信，正是在这十年动乱期间，我的读书生活开始跨入一个新的阶段：即由博览群书打基础转而为进行专门性的研究。那时，我是“逍遥派”。没有事情干，不读书无以打发日子。于是，我就研究起《楚辞》来。我把杭大和浙江图书馆所收藏的《楚辞》书都设法借了出来，一一研读。我发现楚辞中有许多训诂问题前人并没有解决。我把这些问题记在心里，运用我在研究室时学得的一点文字音韵训诂知识，再征之以各种古代文献，试图加以解决。我那时是确实下了一番苦功的，还为此闹过一些笑话。比如有一次我到肉店买肉，一边排队，一边捧着一本书在读。看得入神了，不觉时光之流逝。猛一抬头，肉店已关了门。长长的队伍也不见了，独我一人孤零零地站在原处。这件事，至今人们传为笑谈。有时候，夜里忽然想起一个问题，便立即爬起来翻书。自然，觉是睡不成了。就这样，我在“文革”期间对《楚辞》的训诂做了一番比较深入的研究，断断续续写成《楚辞解诂》一文。这篇文章凡七易其稿，参考的书有近百种。后来有一部分发表于中华书局编辑出版的《文史》杂志。该文连同后来我写的《唐代白话诗释词》一文，曾获得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届青年语言学家奖。当我得知获奖的消息后，我的脑子中登时浮出了曹雪芹那两句自道甘苦的诗：“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虽然有点狂妄，却也不能说不是实情。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云雾散而青天见。我同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得以理直气壮、正儿八经地做学问了。在蒋礼鸿师的影响和熏陶之下，我由传统训诂学的研究而跨入俗语词研究的新领域。这时读的书，多为历代的笔记小说、诗词曲、禅宗语录、敦煌文书之类。自1978至1984年这个阶段，我的创作力似乎特别旺盛，总共写了六十余篇论文。其中一部分已结集为《训诂丛稿》一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回顾我的读书生活，有些什么经验或者教训可言呢？我想有如下几点是可以对我的同辈人或比我年轻的朋友们谈谈的：

一、读书要博，研究要精。

我的意思是说，读书的面不妨宽一些。中外古今文史哲，都要涉猎一些。这对于提高一个人的文化素质大有益处。有人问我：你是研究训诂学的，何必去读那些外国小说？岂非浪费时间？我不这样看。诚然，外国小说对于我的训诂研究确实帮不了忙，但是作为人类历史上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像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等文学巨匠的作品，不管你是搞哪一行的，都应该有所知晓。否则，即使你在某一研究领域做出了成就，也难免是一个浅陋局隘和枯燥乏味的人。但是，谈到做研究工作，我又认为应该专精，切忌博杂。扬雄《法言·问神篇》有云：“人病以多知为杂。”看来“杂”确实是一种毛病。东一榔头西一棒，很难搞出什么名堂来。诚然，我们的前辈学者中确乎有一些“通儒”，他们在众多的学术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但我们的才气、学力和条件均不足以支持我们像他们那样去做。我们宁可现实一些，在自己这块小小的领地内，精耕细作，以期得到较好的收成。比如我是研究训诂学的，而于训诂中，又偏重于历代俗语词的研究。我大抵只能在这个范围中做文章，而不敢有所旁骛。因为我知道，一旦越出了这个范围，我就有可能闹笑话。

二、方法要讲究，学风更重要。

做学问有两点最为紧要，一是方法，二是学风。近来对方法谈得很热闹，我却认为学风问题更为重要。所谓学风，也就是做学问的态度。应当提倡什么样的学风呢？我认为，应当提倡去华崇实的学风，也就是说去掉浮华和赶时髦的一套，提倡老老实实、实事求是。这个话虽然是老生常谈，卑之无甚高论，甚至颇有点不合时宜，冒莘莘学子之大不韪，但我认为这个问题在实践中并未解决。有些青年同志还没有打好起码的基础，却斐然有述作之志；有的同志热衷于西方的这个论、那个论，而对于我们的传统文化却所知甚少。文章中一涉及古代的东西，往往闹笑话。我就看到过一篇研究《楚辞》的论文，其中

引到马其昶的《屈赋微》一书，肯定是从马茂元先生的《楚辞选》一书转引的。马先生称马其昶为“先大父”，这位作者也跟着称“先大父”。可见他根本不知道“先大父”是什么意思，盖误以为官职之称了。这类的笑话并非个别的，限于篇幅，我在这儿不能多举。还有的同志以为靠了外来的新方法，便可以轻而易举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我认为这种想法是不切实际的。

三、做学问要重创造、贵发明。

我认为，判断一个人学术成就的大小，主要的不应看他著作的多少，而要看他有多少发明创造。与其出十本粗制滥造、雷同剽袭之作，毋宁出一本精雕细刻、有独到之见的书。清人顾亭林有云：“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已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剉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乎？承问《日知录》又成几卷，盖期之以废铜；而某自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然庶几采山之铜乎？”（《亭林文集·与人书》）可见真正有价值的著作，应当是采山之铜，而不应是舂剉碎散之旧钱。清人戴震也说：“知十而非真知，不如知一之为真知也。”善哉斯言。清代学人有所谓皖派、吴派。我服膺皖派，而不太佩服吴派，理由即在于皖派具有发明创造精神，吴派则否。我用了十年的时间研究楚辞的训诂，所得不过一篇万把字的论文。假如我用这些时间和精力编写一部《楚辞注释》之类的书，我想也并非不能胜任，但我没有那样做。当然，不应当鄙薄普及工作和资料纂集工作，只是我的性情是，我选择了前述写一篇论文的做法，而没有去编纂一部大书。

四、做学问要刊落声华，甘于寂寞。

所谓甘于寂寞，有两层含意：其一，是指耐得起苦，能于枯寂落寞之中得其真味和乐趣。没有这种精神，学问是很难做得成的。（至

少考据之类的学问是如此）写到此，我想起张舜徽先生有一段话，说得极好，且抄在下面：

盖著述之业，谈何容易，必须刊落声华，沉潜书卷，先之以十年廿载伏案之功，再益以旁推广揽披检之学，反诸己而有得，然后敢着纸笔。艰难寂寞，非文士所能堪。

（《清人文集别录》下册，549页）

可见，艰难寂寞，是学问家所必经的一关。甘于寂寞的第二层含义，是指能够自觉地抵拒外界名与利的诱惑。始终忠实于学术，献身于学术，这点尤难做到。我读《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感到那种宗教家的虔诚、毅力和韧性，是一个人成就一番大事业所必备的主观条件。只是一般凡夫俗子难以达到那样高的境界而已。我自己虽然以“甘于寂寞”自励，但也常常有不甘寂寞的时候。庄子之所谓“内热”，荀子之所谓“热中”，常常侵蚀着我的良知，使我不能做到如《楚辞·橘颂》所云“深固难徙，更壹志兮”，“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

我还年轻，读书甚少，人生的修养尤其不足，本没有资格在这里放言高论。但编辑同志约我撰稿，盛意难却，遂讷讷如上。“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我只好陶渊明先生的话来为自己开脱了。

（1988年2月6日于杭州道古桥）

（原载《文史知识》1988年第9期）

[返回目录](#)

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

郭在贻先生评传

—杭州大学中文系 85 级研究生 黄征

郭在贻先生是我的恩师，是他一手提携我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然而，郭师去世九年半了，我却一直没能为他写一篇评传，心中实在愧疚。这或许是由于我手弱，怕写不好；或许是由于悲痛太过，不堪回首，下意识就不愿提笔。或许还有其他原因。可是，每当深夜梦醒，想到郭师临终前，我拿着袖珍答录机请郭师留言，郭师就是一句话都不说，我总是有一种说不出的难过心情。这不说话的原因，我现在终于明白了几分：这是对人生的眷恋，对生活的热爱，对未竟事业的遗憾，对命运不公的愤怒……这一天是郭师五十周岁生日的前一天，亲友、弟子们正在准备鲜花和蛋糕。谁料，郭师就在这五十周岁差一天的时候，不幸被病魔夺走了生命！我作为最后守在郭师身旁的弟子，眼睁睁看着郭师去世而不能以身自代，悲痛之极，实难诉说。郭师的英年早逝，对学术界和教育界来说是个巨大的损失。当时，闻者莫不震惊。

郭在贻先生是我国当代有杰出贡献的中年语言学家、敦煌学家、楚辞学家。生前为九三学社社员、浙江省第六届政协委员，杭州大学中文系（兼古籍所）教授、系务委员、汉语史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国语言学会理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及语言文学分会副会长、浙江省语言学会副会长、《辞海》编委兼分科主编等。因患肝癌，经多方全力抢救，医治无效。不幸于 1989 年 1 月 10 日 13 时 10 分逝世，终年 50 岁。

郭在贻先生于 1939 年 1 月 11 日诞生于山东省邹平县碑楼村的一个农民家庭。自幼丧父，家境贫寒，全靠哥哥的资助才念完了小学和中学。由于他聪颖过人，又极其刻苦勤奋，郭在贻先生于 1957 年顺利地考上了杭州大学，攻读中文系的中国语言文学专业。郭在贻先生曾在《回顾我的读书生活》一文中回忆说，四年的大学生活中，他在班

上是一个丑小鸭式的人物。因为他年纪小，胆子也小，说话腼腆，开会从不发言，集体活动也不喜欢参加，理所当然被目为落后分子，人皆以白眼视之。郭先生说，回顾这四年的大学生活，实在没有什么可夸耀的。但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就是毕业时，他的学习成绩居全班第一。也因此，他侥幸地被留校了。因为当时留人，首先要留年级干部和班干部，其次要留所谓“积极分子”。他的被留，实出意外。不过，由此我们也可以感觉到，郭在贻先生在年轻时的内向性格，形成了他敏学深思、独富卓见的特点，决不随波逐流，附炎趋势。至于他的被留校，虽说有些偶然，但也决非毫无道理：当时夏承焘、姜亮夫、胡士莹、王焕镛、任铭善、蒋礼鸿等先生，都是著名学者。他们的意见在当时也一定起到了某种程度的作用。他们一定是会推荐像郭在贻先生这样的学术苗子留校的。

郭在贻先生留校在中文系以后，当时正遇到组织上要给姜亮夫先生配备助手。系里派了四个人到姜亮夫先生家里接受面试，结果选中了郭在贻先生。这次，当然是姜先生慧眼识英才的结果，决无半点偶然性了。

郭在贻先生书法出众，清俊秀逸，有晋人王羲之的风格。郭先生练过多种法帖，用力较多的则是《圣教序》。他生前与书法界过往颇密，并担任杭大教工书画社的顾问。

这一时期的读书生活，时间虽然很短，但效果奇佳，郭在贻先生凭着一股猛烈的冲劲，扫荡了一大片古今中外的图书精品，为日后的学术研究打下了宽广而坚实的基础。郭在贻先生后来总结自己读书和做学问的经验时说，“读书要博，研究要精”，这对我们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郭先生认为，读书的面不妨宽一些，古今中外文史哲的书都要涉猎一些，这对提高一个人的文化素质大有好处。外国小说对训诂研究虽然帮不了什么忙，但是作为人类的一笔巨大精神财富，不管你是搞哪一行的，都应该有所知晓，否则你难免成为一个浅陋局隘和枯燥乏味的人。然而，谈到做学问，郭在贻先生又认为必须专精，切忌博杂。他引用汉代扬雄《法言·问神篇》“人病以多知为杂”的话，认为“杂”确实是一种毛病，东一榔头西一棒，很难搞出什么名堂来。

我们的前辈学者中确实有一些“通儒”，他们在众多的学术领域中都取得了卓越成就，但那些都是“超级天才”，而且得之于时代之赐，如果他们在中青年时代也要处在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中的话，恐怕也就做不出那样大的学问了。我们的才气、学力、基础和条件都不足以支持我们像他们那样去做，所以我们宁可现实一些，在自己这块小小的领域内精耕细作，以期得到较好的收成。

可惜好景不长，这种宁静而饶有诗意的读书生活，到了1965年便中断了。先是“四清”，接着是“文革”，一场又一场的政治风暴席卷着中国，没有哪一个角落能安得下一张平静的书桌。郭在贻先生陷入了苦闷和茫然之中，跟着那些一同下乡搞“四清”的同事学会了吸烟。这一件事是在1987年的某天我才知道的。郭在贻先生要我每周至少去见他两次，谈论训诂学和敦煌学，可那天谈得正兴奋的时候，郭先生忽然问我有没有带香烟，我很惊讶，就问他不会吸烟要烟干什么，郭先生笑着回答说，他会吸烟，是在“四清”时下乡学的。由此可见当时他的心情。然而，郭在贻先生很快便成了“逍遥派”，正是在那“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十年动乱中，他开始了读书生活的一个新阶段，由博览群书打基础而转为专门性的研究。郭在贻先生从此开始研究楚辞来。历史上有许多名人、学者都是当国运失正、内心苦闷的时候才开始研读楚辞的，因为屈原的那种怀瑾握瑜、报国无门的心情能引起一切爱国者的共鸣。郭在贻先生于是把杭州大学和浙江图书馆所藏的楚辞类书籍都设法借了出来一一研读，他发现楚辞中还有许多训诂问题前人没有解决，便一一记在心里，运用在语言文学研究室学得的一些文字音韵训诂知识，再查考各种文献资料，试图解决那些问题。当时郭先生研读楚辞非常投入，简直到了忘我遗世的程度。一次，郭先生去肉店买肉，由于那时货少人多，必须排长队，所以郭先生就带着一本《楚辞》，一边排队一边看书。看书看得入神了，不知不觉许多时间过去了，猛一抬头，肉店已经关门，长长的队伍也不见了，只有郭先生一人捧着书还呆呆地站在原地不动。这件事后来一直成为同事们的笑谈。有时候，郭在贻先生夜里忽然想起一个问题，便立即起床查书，直到查明为止，觉当然就睡不成了。就这样，郭在贻先生在

“文革”的十年中对楚辞的训诂问题着实作了一番深入的研究，陆续写成《楚辞解诂》一文。这篇文章的撰写，参考的书有近百种，修改了七次，可以说是郭在贻先生进入学术研究用力最勤的精心之作，后来分别发表在一级大型学术刊物《文史》第六期（1979年）、第十四期（1982年）上。该文与后来写的《唐代白话诗释词》，曾在1984年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届青年语言学家奖金二等奖（当年不设一等奖）。当郭在贻先生得知获奖消息的时候，他脑中浮现出了曹雪芹那两句自道甘苦的诗：“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这个借用实在是再贴切不过了。在那大多数人忙于派系斗争或无所事事的十年中，真是没有几个人能“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而郭在贻先生就是这少数几个人之一。

历史的发展充满了戏剧性，经过了九十九道弯，它的主流又回到了正道上来了。1976年“四人帮”被一举粉碎，云雾散而青天见，郭在贻先生与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得以理直气壮、正儿八经地从事学术研究了。此时的郭在贻先生的心里犹如压抑千年的火山突然喷发，他十多年来苦读精研、蓄积已久的学问终于也一下子冲顶而出，势如洪流，一发而不可收。而且郭在贻先生不像一般的人那样，发表几篇文章之后便倾尽见底，后续无文；郭先生总是不断拓宽研究领域，温故知新，丰入畜出，所以文思如流，汨汨然未有穷尽之日。这就是所谓“后劲”足，能作“可持续性发展”，进入了良性循环。在训诂大师蒋礼鸿先生的影响熏陶下，郭在贻先生由传统训诂学的研究而跨入汉语俗语词研究的新领域，大量研读起历代笔记小说、诗词曲、禅宗语录、敦煌文书之类来。既有传统训诂学的深厚功底，又有开辟新天地的勇气和毅力，郭在贻先生很快在俗语词研究方面取得了突破性成就。自1978年至1984年这个阶段，郭在贻先生的创作精力似乎特别旺盛，总共写了六十多篇论文，其中一部分结集为《训诂丛稿》一书，其他的后来收在《郭在贻语言文学论稿》中。1987年起，郭在贻先生带领学生张涌泉、黄征，合作完成了《敦煌变文集校议》一书；他的敦煌学单篇论文则编为《郭在贻敦煌学论集》。

郭在贻先生的学术成就主要体现在训诂学研究以及训诂学与楚辞学、敦煌学、辞书学、文学的结合研究上。下面试作分类评述。

一、郭在贻先生的传统训诂学研究

郭在贻先生在训诂学上的研究可分为两个时期和两个方面，即早期的传统训诂学研究和晚期的汉语俗语词研究。郭在贻先生早期的传统训诂学研究始于1961年，以后虽然一直没有中断，但1976年以后在蒋礼鸿先生的影响和熏陶下，跨入汉语俗语词研究的新领域，因此研究重心已经转移。郭先生于1963年在《孙诒让研究》上与人合作发表了《籀廑碎金》一文，辑录了孙诒让训诂学方面的零星研究成果。该文是目前所知郭在贻先生发表的最早的学术性文章。稍后，郭先生又与人合作发表《词义短劄》（《语文进修》1964年第1期）一文，则是在传统训诂学研究方面小试牛刀。郭先生大量发表本类成果是在1976年以后，主要有：

（一）《训诂五讲》与《说文段注》五论

这些是郭在贻先生在训诂学理论方面的重要贡献，见识精到，超越前贤。《训诂五讲》未曾单独发表，收在他的第一部专著《训诂丛稿》中，阐发了这样的观点：对旧注和旧的字书、词书应取一分为二的态度，既不要一概抹煞，也不要盲目信从；要充分利用清代学者及近代学者的研究成果；不要以为上了书的就一定是对的；要考求字、词的古义，不要为其今义和常义所惑；要考求本字本义，不要为借字借义所惑；要懂得古书颠倒、错综、叠用等异例；要避免望文生训、增字解经、以今例古等训诂学上的弊病。充分反映郭先生既重训诂实践又重训诂理论的特点。在此基础上，郭先生还陆续发表了《训诂学与古籍整理》、《训诂学与辞书编纂》、《训诂的方法》、《训诂源流述略》、《学习训诂的态度和方法》、《训诂学的基本观点》等一系列重要论文，形成了色彩鲜明的郭氏训诂学理论。这种理论后来郭先生在专著《训诂学》一书中作了更加系统的阐述。《说文段注》五

论则是郭在贻先生对清代学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一书的五篇专题论文。郭先生自从任姜亮夫先生助手起就反复研读《说文解字注》，对这位《说文》研究四大家之首的段玉裁的文字、音韵、训诂学造诣极为钦敬，尤其对他的重创造、重证据的学风，更是深受影响。郭先生指出，前人还很少有用现代语言学观点对段书进行全面、系统的整理与论述；段氏治《说文》的特色及其卓越成就，不仅在于他“究其微旨，通其大例”，对许书作了细密全面的校勘整理，更在于他通过对许书的注释，提出并解决了一系列有关汉语音韵学、文字学、词汇学、训诂学的重大问题，初步运用历史发展的观点和一些科学的方法来研究语言现象，从纯粹校订、考证的旧框子中解放出来，在某种意义上说走上了科学语言学的轨道。因此，全面系统地总结段氏关于词汇学的理论与实践，批判地继承这笔传统语言学中的宝贵遗产，应当成为我国汉语史和汉语词汇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二）一些词语考释论文

郭在贻先生发表了《〈楚辞〉解诂》、《〈汉书〉劄记》、《〈论衡〉劄记》、《古汉语词义劄记》、《评赵纪彬“五恶”疏证》、《训诂劄记》等重要考释性论文，往往创见叠出，胜义纷纶，是他多年潜心研究的结晶。

二、郭在贻先生的汉语俗语词研究

郭在贻先生以其极其深厚的传统训诂学功底转而研究汉语俗语词，可以说是“以大雅治大俗”，犹如庖丁解牛，游刃有余。郭先生在他的《训诂学》一书中首先开辟《训诂学的新领域——汉魏六朝以来的方俗语词研究》专章，把俗语词研究从个别词语考释提高到理论的总结上来。郭先生指出，训诂学作为一种古代文献语言学，应该也必须冲破为经学服务的樊篱，扩大研究范围，开辟新的领域。这个新领域，主要指的是汉魏六朝以来的方俗语词研究，因为汉魏以后的文言语词已经没有多少发展变化，而俗语词则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而这又为

传统训诂学所不甚措意。因此，我们今天研究训诂学必须对方俗语词予以充分的重视。郭先生在书中论述了俗语词研究的意义、它的历史与现状、它的材料与方法、它的未来展望，给我们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理论指导。郭先生的理论不是臆想而来的，而是建立在精湛卓越的词语考释成果基础之上的。郭先生发表过《六朝俗语词杂释》、《唐代俗语词杂释》、《杜诗劄记》、《〈游仙窟〉释词》、《〈太平广记〉词语考释》、《魏晋南北朝史书语词琐记》、《〈世说新语〉词语考释》、《敦煌变文释词》、《王梵志诗校释拾补》等重要论文，对新训诂学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三、郭在贻先生的楚辞学研究

郭在贻先生除了撰有《楚辞解诂》正、续篇外，还有《放流就是放浪吗》、《从马王堆一号汉墓漆棺画谈到〈楚辞·招魂〉的土伯九约》、《楚辞要籍解题》、《近七十年来的楚辞研究》、《论屈原》等文，还参与了《屈原辞典》的主编。楚辞问世以来，注家纷出，但有些问题却一直无人能解决。例如《招魂》篇中“土伯九约”句，“土伯”后土之侯伯，“九约”有的说是“九屈”，有的说是“九尾”，还有的说是“九角”，等等，但郭先生从马王堆一号汉墓漆棺画上土伯的形象发现，土伯并非九屈或九尾、九角的样子，所以“九约”应另求的解。郭先生通过文例比勘，得知“九约”义同“九关”；又通过破假借，得出结论“约”通“钥”，而“关”与“钥”古汉语中乃常见同义词。其他如《大招》中“长袖拂面”的“拂面”破读为“蔽面”，《九章》中“超回志度”的“志度”解为“踟蹰”，皆可称为神解。

四、郭在贻先生的敦煌学研究

郭在贻先生敦煌学研究的主要成果都收在他的专集《郭在贻敦煌学论文集》中，共 16 篇，分别就敦煌变文、王梵志诗中的俗字、俗语

词进行考辨，其中《唐代白话诗释词》考释了十个王梵志诗中的疑难词语，获首届青年语言学家奖。此外，郭先生带领学生张涌泉、黄征承担国家课题“敦煌学三书”的合著，倡导敦煌写本原卷的核校考订，生前完成《敦煌变文集校议》一书的合作，获得王力语言学奖，对敦煌语言文学的研究有着重大影响。

五、郭在贻先生的辞书学研究

郭在贻先生曾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先秦文学卷编写组成员、《辞海》编委兼分科主编等，有着丰富的辞书编纂经验。郭先生写有《〈辞海·语词分册〉义项漏略举例》、《训诂学与辞书编纂》、《谈郝懿行的〈尔雅义疏〉》等文，并在《训诂学》一书中叙述训诂学意义时单列《指导辞书编纂》一节。

六、郭在贻先生的文学研究

郭在贻先生的文学研究，主要写有《试论李贺诗的语言艺术》、《读诗识小录》、《书海片鳞录》等，兹不详述。

郭在贻先生治学，十分注重态度与方法，甘于寂寞，不骛声华，常以前贤“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自励，也常以极佳的书法写下来赠送同事与研究生，认为一个人的学问精粗、大小与其品格、治学态度总是一致的，一个偷懒怕苦、浮躁贪利的人不可能做出精湛的学问。郭先生做学问特别强调“有所发明”，“不掠人之美”，凡所著述皆出于己，言传身教，给我们作出了永不磨灭的榜样。他生前被国家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乃是真正的实至名归。

后记

业师郭在贻先生 1989 年因病逝世，逝世前一日弟子们准备了蛋糕，要在第二日为他庆祝 50 岁诞辰。没有想到就差一日，竟成永别。我是

郭师临终前唯一守在病榻前者，因为是夜里轮值，别的师兄弟都不在。郭师临终前没有任何遗言，但是此前为我们写下了遗嘱。对于这段伤心往事，我一直不大愿意说。郭师在发病前半年，就说他活不过五十岁。他是亲口对我说的，而且是先后两次。我当时很不以为然，还以为他是拿训诂学家黄侃自比。没有想到事情真会如此，而且就差一天满五十。

虽然郭门弟子很多，不过郭师最后两年里真正接触非常多的也就我与张涌泉师兄，因为我们三人组成了一个合作撰着“敦煌学三书”的课题组。

郭师在最后这两年里，频繁约我们去见他。我怕影响先生休息，有一次一个多星期没有去，郭师见后就问我为何那么久不去见他，说他有事要跟我谈。后来每次去，郭师都单独跟我谈治学，一谈就是两三个小时。他说：“我这叫‘金针度人’。人们一般是不肯‘金针度人’的。我现在跟你谈的，都是我的真。”我当时觉得郭先生怎么忽然说这样话，很象禅宗的传授衣钵似的，可是也没有想到他已经预感到自己可能不久于人世了。他一次告诉我痰中有血丝，我却安慰他可能是咽喉炎。现在回想这些事情都特别难过。

如今眼看我自己也奔五十了，虽然没有预感到迈不过这个坎，但是心情确实也比较复杂。不过更多的回忆，还是留到以后再说吧。

返回目录

毛昭晰伯伯

—杭州大学旅游系 96 级研究生 杨芳菲

毛昭晰伯伯是原杭大历史系教授、浙江省文化厅副厅长、文物局局长及浙江省博物馆馆长……，他是一位知识渊博，有家国情怀的优秀知识分子。

毛伯伯和我父亲是杭大历史系的老同事，关系非常好。每次看到我，他都会热情幽默地说：“我是你爸爸的老师。你爸爸是我的领导。”

文革期间，我迷上了针灸草药，为此花了不少时间去实践。毛昭晰伯伯还曾教我认草药，带我沿着杭大校园墙角和宝石山一一去认辨。当时我很惊讶。

与我认识的其它杭大老师不同，教历史的毛老师还通晓西方音乐，还识草药，问啥都懂，中西皆通。他就是本百科全书，全才啊！心中深感佩服。

得知父亲病逝后，毛伯伯十分悲痛。他为失去一位多年的知己好友而悲。在父亲的追悼会上，毛伯伯因悲哀差点昏倒。这让我们全家感动且难过很久。

愿疫情早日消散，和毛伯伯再续前缘！

[返回目录](#)

投身为师十二年

——杭州大学中文系教师 吴工圣

1982年夏天，我从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回到从小生长的故乡杭州，带着派遣证，去省人事厅二次分配。

事先，妻子托人联系了浙江日报社、杭州大学。两个单位都要，杭大先要人。于是，我去杭大报到，分到中文系新闻专业，说好没有住房。当时高校教师住房都紧张。

从1982年到1993年，我当了12年教书匠。

杭州大学的新闻专业是新开办的，当年刚招第一届学生。这一届中文系有四个班，前三个班是中文专业，四班是新闻专业。我当新闻班班主任，兼年级辅导员，与新闻班同学一起，度过难忘的四年。

新闻专业是热门专业，学生百里挑一，来自全省各地，都是帅哥靓妹。我和学生打成一片，跟着他们听课。课外找他们聊天，了解他们的想法和需求，帮助解决困难；布置写周记，从中知晓他们的活思想，以便及时向系里汇报。

我负责发放学生助学金，要审核申请表。农村孩子忠厚老实，城里孩子聪明油滑。符合条件的通过，不符合条件的涮下。因此，得罪几个城里孩子和干部子女。

当时杭大校舍紧张。中文系借省总工会干校办公，学生没有固定教室。“杭大有多大，中文系有多大。”学生上课到处打游击，男生住新宿舍，女生住旧宿舍。

后来，老生毕业，为女生调整新宿舍。记得，当时天下着中雨，我穿着雨衣，推着自行车，一趟一趟帮女生搬家。而男生却躺在宿舍，逍遥自在，不搭一把手。

帮女生搬完家，我去男生宿舍，把一点不怜香惜玉的男生，狠狠骂了一顿。多数男生知错，没还嘴，少数不服，只敢小声嘟囔。一个男生被骂得犯病了，上气不接下气。

事后，有人告到系里。我承认，简单粗暴，不注意工作方式。其实我也是与学生一起成长。尤其与这届学生，相处时间最久，感情也最深，一直送他们毕业。

1986年，这届学生毕业，我入党。2012年学生入学30周年纪念时，我应邀参加聚会。学生变化很大，为人父，为人母，在各个单位独当一面，有的当上领导。沈同学留校教书，担任新闻系副主任；朱同学任新华社西藏分社副社长、新疆分社社长；胡同学任新华社浙江分社采编主任……

我也听到一些坏消息，漂亮聪明的女生黄同学自杀了，女生周同学离婚了。

杭州大学新闻专业初创时，新闻专业教师少，我还兼任83级班主任。

当时，教师团队就五员大将：张大芝、邬武耀、王欣荣、俞月亭，还有我。其中邬武耀是人大调干生，成美老师的同学，我的恩师、入党介绍人。1993年离休后，他仍带病坚持教学，跌倒在讲台上，以身殉职。当时他上衣口袋里，还装着病假条。

不久，王欣荣回原籍山东，俞月亭调福建省广电厅，剩下我们三人，在夹缝中苦苦支撑。终于迎来发展，1988年重建新闻系。

1988年新闻系重建时，我兼任学生党支部书记。我喜欢与年轻人在一起，和他们一起自己也变得年轻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学生是教师最好的作品。新闻系毕业生多数很优秀，活跃在全国新闻单位。

1986级学生慎海雄，就是出色代表。入学时，我担任他的导师。毕业后，他先在新华社浙江分社，后调任上海分社副社长、社长，新华社总社副社长。前两年他空降广东，任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长。

学生中也有少数不争气的。83级何同学，单相思患精神病，住院期间去看望他；毕业后又跑回学校，我留他住家里，第二天骑车送他去车站。85级吴同学，因失恋在女方单位自残。我与该班班长李同学，连夜赶到建德女方单位处置。

我还应邀参加了83级、87级学生毕业周年聚会。与学生聚会是愉快的，难忘的。

82级聚会时，酃同学要我领唱《哎呀，妈妈》。最后一句是“年轻人就是这样相爱的”，被篡改成“年轻人就是这样没出息”。大家唱得最起劲，唱完哄堂大笑，仿佛又回到30年前的杭大。

杭州的七月，上旬处在黄梅天的后期，天气闷热；中下旬出梅，高温天气来临。文革前后的高考，高考阅卷和高考招生，都安排在“黑色七月”。学生“考焦”，教师“烤焦”。当时，防暑条件差，没有空调。考场、阅卷室内放大冰块，考场外救护车紧张待命，以防考生中暑。

现在，高考人性化改在六月。学生、家长、学校一致称好。

在杭大期间，我参加九次高考阅卷，两次高考招生。阅卷是在高温、高度紧张、高工作量下进行。全省理科卷子，集中在浙大阅卷；全省文科卷子，集中在杭大阅卷。

相比阅卷，招生轻松、愉快许多；前紧后松，边工作，边疗养。招生安排在风景秀丽的九溪航空疗养院、上海总工会疗养院，集中四、五天，与外界隔绝联系，为的是保密。

浙江只有一所全国重点大学——浙江大学。四所省重点大学，杭大第一，其它是浙医大，浙农大，中医学院。这四所大学，比其它大学，优先拿到考生档案，优先挑选考生。

一考定终身。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年代，考上大学穿皮鞋，考不上大学穿草鞋。“臭老九”，在那几天变得吃香了。招生的老师，每人手里都有要照顾的条子：有教师子女的，有关系户子女的。

一到招生“禁地”，招生老师带着条子，互相串门递条子，优先录取教师子弟兵。当教师的就风光这么几天，但却可能改变一个年轻学子的一生。

我关系不多，也是带着条子进场的。更绝的是，一名温州瑞安考生黄同学，把自荐信寄到杭大新闻专业。新闻专业负责人将信交给我，我带着自荐信去招生。

疗养院条件很好，是星级宾馆。招生老师一进宾馆，安排好房间，两名老师一间房间，就开始工作，先领考生档案。新闻专业是热门专业，报考人数多，优秀考生多，以 1.5：1 投档：即，录取 1 名考生，可拿到 1.5 份档案。

一般情况，一次投档，就可以完成招生任务。档案是按考生成绩，从高到低排列，录取也从高分到低分录取。因为天热，看档案又兴奋，又紧张，男老师干脆穿背心、短裤工作。为啥兴奋，老师都是爱才惜

才的。看到好学生就高兴，甚至手舞足蹈。为啥紧张，害怕漏掉好学生，耽误考生的一生。

我拿到档案后，首先寻找关系户考生、自荐考生的档案，找到了放在录取的一边。兴趣爱好，是事业成功的一半。只要上分数线，这点忙是可以帮的，也不违反纪律的。

浏览考生档案，是招生关键一关，德智体全面考核。有没有不良行为前科，有就先放下。有没有担任过学生干部，有就先要了。学习成绩偏不偏科，书写是否端正清爽，好的也先要了。身体素质好不好，好就先要了。还要看照片，五官是否端正，端正大方的，先要了。

浏览考生档案，遇到有趣的事情：一名温州管姓女生，考分高出全国重点线很多分，完全可以报人大、复旦新闻系。为啥人大、复旦没录取？仔细查看志愿，人家根本没报全国重点院校新闻系。在省重点院校，从第一志愿，到第二志愿、第三志愿，填写的都是“杭大新闻专业”，而且在服不服从调整一栏中，写的是“不服从”。这么自信，这么热爱杭大新闻专业，作为老师，高兴都来不及，当然第一个录取了。

还看到一个普遍现象，新闻专业每年招 30 名；成绩前 15 名中，几乎全是女生。考虑到新闻工作是最危险的工种，以及女性的生理特点，只好忍痛割爱。我只招 1 / 3 女生，即 10 名左右。

我觉得，我的决策是正确的。后来看到浙江电视台“台风五姐妹”，站在风里雨里报道。做父母的，肯定心痛这些在抗台第一线的女孩子。

有考生分数在全国重点线、省重点线以上，为啥没录取？原来填写志愿也是有窍门的，既要考虑自己的实力、兴趣爱好，又要看到竞争激烈，自己的不足。要服从分配，普通院校也有好专业。

面对僧多粥少，招生院校很牛的，一般只招第一志愿，其次是第二志愿，一般不招第三志愿。“你看不上我，我还不要你。”我就碰到第二志愿的。有个考生第一志愿报考本校另一个热门专业，因为该专业招满了，招生老师把档案送给我。我一看，分数在前 20 名，就录取了。如果该考生是外校的，我根本看不到他的档案。如果对第一批档案不满意，可以退档换档，但要说明理由。

补充一下，那个自荐黄同学，毕业后分回瑞安。后来随哥嫂去意大利打工。多年后回到瑞安电视台工作，结婚生子，编了一本温州话意大利语的翻译读本，为华侨服务，也送了我一本。

[返回目录](#)

师恩绵绵无尽期：纪念恩师戚文彬先生

—杭州大学化学系 73 级 孙春涛

(2021 年 12 月 25 日)

杭州大学化学系戚文彬教授是我故乡浙江省慈溪市新浦镇人，在家乡读完小学后外出求学，1945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学系。从1958年秋开始，戚先生一直在杭州大学化学系执教。曾任分析化学教研室主任，筹建环境化学专业，并任环境化学教研室首任主任。

早在1954年，戚先生就与中国分析化学奠基人王琏教授合作编著出版了《分析化学》教材，被高校普遍采用。他在分析化学和环境化学科研方面卓有建树，是全国著名的分析化学家、浙江省分析化学学科带头人之一。

一、机缘巧合的初遇

我与戚先生相识纯属机缘巧合。1973年7月，经家乡组织推荐，我参加了当年的全国高考，被杭州大学化学系录取。刚入学不久，我去学校医务室看病。医护人员中的一位中年女士在交谈中听出我是慈溪人，就告诉我，她的先生是化学系的戚文彬老师，老家也在慈溪，欢迎我有空时去她家作客。

几天后，我约了同年考入杭大物理系的慈溪新浦老乡一起去杭大教工宿舍拜访戚先生。戚先生身材瘦削，额头较高，慈眉善目，衣着朴素，说一口带有慈溪口音的普通话。看到是家乡来的杭大学生，倍感亲切，鼓励我们：上大学的机会难得，要抓住机遇，努力学习，有什么困难可以去找他。言谈之间，洋溢着浓浓的乡情，倾注着对家乡后辈的关怀与殷切期望。戚先生既有学者风范，又格外平易近人，说起话来笑盈盈的，目光中充满了和蔼和慈祥，使我们如沐春风。初次见面的拘谨一扫而空。

二、教书育人的典范

大学二年级，化学系开设了分析化学课，戚先生是主讲老师之一。每次上课，他总是提前到教室，认真讲课，悉心传授。他的讲课深入浅出，重点突出，条理清楚，语言精炼，深受学生喜爱。对学生提出的各种问题，他总是不厌其烦地耐心解答，直到提问者弄懂为止。

到了大学三年级，根据学校教育安排，我们小组十位同学到杭一中进行教育实习。戚先生是带队老师。杭一中的不少化学老师是戚先生的学生，对戚先生都尊重有加。杭一中从化学教学到班级管理，从教师大会到学校运动会，都请我们这些实习生全方位参与，使我们受益非浅。戚先生对我们的课前试讲工作抓得很紧，每篇教案都手把手指导，字斟句酌；每个教学环节都替我们再三筹划，一丝不苟，所以全组同学的教学实习都完成得不错，受到杭一中指导老师和学生们的一致好评。

大学毕业前夕，学校着手制定毕业生分配方案，系领导找我谈话，询问我是否愿意接受学校统一分配在杭州工作。因为我此前已经与慈溪一家工厂谈妥去他们那儿搞油脂化工，就婉拒了系领导的好意。当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将此事告诉戚先生时，他理解我的选择：答应别人的事，应该信守承诺。而且统配名额中有一部分是要留校或去中学当老师的。他认为，在当时的环境下当老师不一定是一个好的选择，还是搞技术工作可以放开手脚多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后来我才知道，在六十年代的政治运动中，戚先生和化学系的不少学术带头人曾经被下放农村，住过“牛棚”，受过诸多磨难。

三、人生路上的导师

从杭州大学毕业后，我按约回到慈溪。但是，县革委会因为当时高中教师短缺，决定将杭大毕业生全部分配到教育系统任教。这一决定改变了我的生轨迹。技术工作搞不成了，我被分配到了慈溪一所偏远的公社中学担任高中化学教师，心情十分低落。戚先生得悉这一

消息，来信指点我：既然情况已经无法改变，那么不管环境如何，都要认真做好教学工作，把学生教好。后来，他还给我寄来周恩来总理纪念文集，希望我学习周总理的优秀品德，任劳任怨，努力工作。

尽管我当时思想上一下子还有些转不过弯来，但在戚先生的鼓励下，明白了既然当了教师，就要向戚先生学习，尽可能当个好教师，不能辜负国家的培养和老师的教育。当时教学上最大的困难是，我的手上除了与学生一样的课本之外，没有任何教学参考资料。戚先生雪中送炭，帮我借来了教学参考书《中学化学教学法》。我如获至宝，花了几星期的业余时间，把书本中最有用的几万字内容抄了下来，熟记吃透，应用在教学实践中，很快得到了学生的认可和喜爱，教学效果良好。后来，戚先生又送我他自己在用的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版的物质的单质与化合物手册，许多化学教学中的疑难问题可以从中找到解决的线索，对我的教学助益颇多。

戚先生不仅在思想上、专业上帮助我，还在生活上对我悉心关照。我从杭大毕业后不久，他利用回乡探亲的时间专程来我老家看我。那时交通不便，他从新浦到我的老家三管，只能坐班车到逍林，随后步行十里路才能到达，令我十分感动。回杭州后，他还把他老同学女儿的情况介绍给我，后来因顾虑女方在外地，担心调动有困难而作罢，但是戚老师如慈父般的关怀永存我的心头。

1980年，县教育局任命我担任一所中学的校长兼书记，戚先生得知消息，在对我鼓励的同时，告诫我在做学校管理工作的同时要坚持上课，不要丢掉了自己的本行。这是一心专注于做学问的戚先生依据他的人生经历和人生信念给我的忠告。1986年，在做了几年公务员后，我又回到了学校工作，写信告诉了戚先生。戚先生说，这样也好，可以将过去学习的知识更好地用起来了。为了帮助我巩固专业知识，他将刚由北师大等高校联合编著的大学《无机化学》教材邮寄给我。此后，又介绍我师从杭州大学郑洪元先生再次学习《物理化学》，以拓展化学知识，更好地理解化学反应原理。我想：他对于我的热情的关心，不倦的教诲，无私的帮助，既是出于一个出门在外的乡贤对来自

家乡的学生的关怀，更是希望自己的学生能成为一名出色的教师，教好一代代家乡的莘莘学子。

此后，我的工作岗位历经变动，从市教师进修学校到市教育局教研室，再到慈溪中学。虽然长期在管理岗位上工作，但我始终牢记戚先生的教导：“不要丢掉了自己的本行”，一直坚持上化学课，参加化学教学研究活动。有时管理工作十分繁忙，想偷懒把“本行”放下，但一想起戚老师的教诲与期望，我又会坚定信念，继续坚持下去。

四、世界上最善良的人

2001 年秋，听说戚先生病重住院，我即去杭州探视。听戚师母说，戚先生已不大认得人了。但戚先生一看到我，马上就叫出了我的名字——视教育为一生全部事业的优秀教师，往往会把学生牢记在心头。我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先生育人无数，师恩浓重。如今，却已病入膏肓，令人不忍直视。

2002 年初春，戚师母告诉我，戚先生已驾鹤西去。悲痛之余，我当即寄去了吊礼。谁知戚师母却再三推拒，说是她与戚先生都信奉基督教，把上帝的大爱送给周围的人是他们应该做的，不应该收受礼物。罗素说：在一切道德品质之中，善良的本性在世界上是最需要的。戚先生和师母是世界上最善良的人。他们只会给予需要的人以帮助，而从不索取，不愿意接受别人的丝毫报答。

光阴似箭，戚先生离开我们已 20 年了。但是，他那敬业奉献、勤奋严谨的治学精神，勇于探索、执着创新的工作作风，博爱谦和、仁慈宽容的宏大胸怀，睿智儒雅、爱生如子的人格魅力，始终感染着受教于他的一代代学子。师恩绵绵，永远植根于学生的心底。我们今天纪念先生，就要牢记他的教诲，学习他的品德，不辜负他的期望，踏踏实实做好本职工作，努力播撒爱的种子，坚持做一个有益于他人、有益于社会的人。

[返回目录](#)

人往低处走：宋显昌老师印象

—杭州大学历史系 78 级 黄朴民

俗话说：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其实，往高处走，难免与他人竞争，会时不时地陷入殚精竭虑、患得患失、撞得鼻青脸肿的困境。老子说：“夫唯不争，故无尤。”真正的人生大智慧，乃是“不争”，乃是“放下”，即所谓“大智若愚”。“故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很显然，尽管孔夫子汲汲致力于恢复“周礼”，周游列国，风尘仆仆、鞍马劳顿，累得自己全身上下的骨头都快散架，“孔席不暇暖，墨突不及黔”，但骨子里却真的是很通透，一语中的，一针见血，道出了人生的永恒真谛！

我当年杭州大学历史系的诸位师长中，活得很艺术，最通透的，当首推宋显昌老师。他像一杆标尺，显示了作为读书人应该有的理想人生之刻度；像一面镜子，折射出芸芸众生鸡虫之争的荒诞与滑稽景象。他的言行举止，诠释了“人往低处走”的哲学智慧！

1978年11月我们入学后，宋老师是首批给我们这些学生授业解惑的历史系老师之一。当时他约50岁上下，留给我们的第一印象，是中等的身材，衣冠十分整洁，讲话不徐不疾，板书清丽娟秀。一句话，全身上下充沛着一种温文儒雅的气质与风度。这种优雅，这种精致，甚至在他抽烟的细节中都有展示。当时，没有室内禁烟的规定，而任课老师中，抽烟者不在少数。故课间休息时，有烟瘾的老师都会抽上一根烟。那袅袅升起的淡淡烟雾，缭绕在讲台上方，也是当年课堂上的一道特殊的风景线。

在我的印象中，其他的老师吸烟，也就是利群(2角7分一盒)、雄狮(1角8分一盒)、新安江(2角4分一盒)这个层级，至多到大前门(3角5分一盒)的档次，而宋老师则是“牡丹”，每盒的价格为5角(再要上去，就只有“中华”牌了，好像是6角7分一盒)。这在我们的眼里，几乎够得上是奢侈的享受了。因为在当时，我们一天的伙食费，也就3角钱而已；公交车的车资，起步价也就2分钱。我觉得，所谓

的雅人深致，是需要以经济实力为后盾的。宋老师就凭着抽吸“牡丹”牌香烟，让我们留下了难忘的第一印象。

宋老师担任的课程，是历史系学生必修的核心课程“中国通史(古代史)”的上半段，自先秦一直到魏晋南北朝。这门课教学时间被安排为两个学年，每周四节课，分两次讲授。所以，他有一年的时间为我们授课。

由于开学时间晚了 2 个月，所以，第一个学期正式上课，也就 2 个月而已。当时，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积重难返也是常态。这体现在高校的历史教学中，政治因素的渗透与影响依然相当浓厚。具体表现为，大家还是继续热衷于“文革”之前的史学主题，对所谓的“五朵金花”（关于古史分期、资本主义萌芽、农民战争、封建土地所有制、汉民族形成等五个基本问题）的讨论情有独钟，乐此不疲。宋老师在授课过程中也无法超越现实，而不得不对这类“热点”问题加以聚焦和突出。不过，令人钦佩的是，食材尽管无法选择，可厨艺却可以高明发挥。宋老师的厉害之处，是将规定的食材加以巧妙的加工，同样烹制出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菜肴。“大象无形”、“大音希声”式地将我们这些历史的门外汉，引入学术的圈子里，培养起我们的初步学习能力，并为日后从事历史学的教学或研究打下必要的基础。

第一学期本身时间有限，而我们这些学生的基本情况又十分复杂。这包括同学之间年龄相差悬殊，学术基础参差不齐。仅就年龄而言，就是两代人。我们中间既有浪迹江湖多年、30 岁以上的老三届生，也有初出茅庐、18 岁左右的应届生。对此，他也需要加以了解和掌握，以便能在接下来的教学中因材施教，对症下药。所以，他对该学期的期末考试，做出了独到的决断，不搞闭卷考试，而改为撰写读书报告。既然绕不过“五朵金花”这个话语系统，那么，就因地制宜，将主题定为在中国古代史分期的主要流行观点（西周封建说、春秋战国封建说、魏晋封建说等）中任选其中的一种，用 2000 字到 3000 字的篇幅，将该派学术观点的论点与论据加以概括性的梳理与总结，并在此基础上作简要的评点。这其实就是用自己精炼的文字对某一种古史分期的说法

进行缩写。虽然这谈不上有任何的原创新，但是，却可以考察一个人读书的态度与方法，了解一个人逻辑思维水平与文字表述能力，也为授课老师今后的授课教学提供了必要的参数。

宋老师授课的第二个学期，是完整的。这近一年下来，教学已步入正规，同学们的良好学习习惯已初步养成。他对同学们的不同特点也有所了解。在这个前提下，第二学期的期末考试，那就要“因物变化，与时迁移”了。重点是要考核同学们对历史知识掌握的广度与深度，同时培养同学们初步的历史分析与研究能力。宋老师就是这么做的。早在讲课的过程中，他就有意识地埋下了伏笔，还是不能跳出“五朵金花”的窠臼。所以，农民战争的介绍与评价依旧是授课的重点之一。但是，宋老师在讲孙恩卢循起事时，有意识地下延到了隋唐与两宋的农民战争，这似乎是越界了，抢了通史下半段任课老师的地盘。但是，他这么做，是有其深意存焉。

这一点，到期末考试试卷发下来时，终于揭晓了。试卷上有一道问答大题，题目是：试论农民战争口号的变化所体现的阶级关系与时代特征。它的宗旨，就是要通过从“伐无道，诛暴秦”到“均平”、“均贫富，等贵贱”前后期农民战争口号的演变，说明前期农民战争的基本宗旨是立足于反抗暴政，而后期农民战争的基本诉求乃在于追求合法政治权利、追求经济利益。而两者之间的差异，所体现的是农民在国家政权体制下身份束缚程度的减轻和松弛，政权对民众个体控制的有所弱化。农民中的大部分，已由身份性依附隶农渐渐转变为自耕农民了。从而从比较开阔的视野，对古代社会阶级结构的构成与统治被统治双方关系的整合做出有益的尝试性解读。这样的要求，对大学历史系一年级的学生显然是一个挑战。但“取法其上”，方可“得乎其中”，这种能力的培育与提升，方向无疑是完全正确的。宋老师的卓越“史识”，于此可见一斑！

宋老师的学术水准无可怀疑。可是，到我完成在杭州大学七年的学业(本科与硕士)，他依然只是一个讲师的身份。其实，他的资格是足够过硬的。他是“文革”十年之前的老讲师，早年受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吴泽先生门下，是吴先生早年的研究生。到杭州大学任教不久，

就获得了讲师的职称。工资定级在 100 元以上(无怪乎他抽得起“牡丹”牌香烟，当时的大部分老师是助教职称，工资 50 多元，比宋老师的收入少了几近一半)。可是，20 多年下来，他还是一名讲师。而当年他周围那些助教同事，都“后来者居上”，专著迭出，论文广发，晋升为副教授，乃至教授了。这中间的具体原因，作为学生的我，当然不清楚。但是有一条恐怕是客观的情况所致，就是宋老师不写论文。当年的职称晋升，虽然不像今天讲求发表论文的刊物档次，没有 A 刊、B 刊这些标尺来作一刀切，但有论文，还是必须的。这是游戏规则，大家都得遵守的。

是宋老师水平低？能力弱？显然不是的！从期末考试的命题，可见宋老师若愿意花点时间，花些精力，写几篇论文，应该不成为什么问题。文章即使在《历史研究》《文史》这样的大刊物发不了，但交给《杭州大学学报》发，则毫无滞碍。据魏得良等老师讲，《杭州大学学报》曾多次约请宋老师撰文，但宋老师答应“唯唯”，可每次都没有下文，“泥牛入海无消息”。

楼学礼老师在与我的一次闲聊中，提及宋老师的导师吴泽先生到杭州参加一个学术会议，见到宋老师，曾嘱咐他勤快一点，出些成果。作为老师，吴先生对自己学生的水平与能力，是有充分了解的。所以，才会有这样的勉励。宋老师在老师面前敬诺受命。可是，接下来还是我行我素，自得其乐。宋老师平时宽容大度，谦逊随和，在同事中没有敌人。所以，他的同事希望他早日解决职称问题，多有劝说。我相信，这也是出于真诚的，绝非虚与委蛇、言不由衷。我那时少不更事，经常“窜访”魏得良、黄时鉴、徐明德、楼学礼、仓修良、何忠礼、徐和雍诸位老师之家。当然，宋老师的家我也不曾少去。这就很自然地认识了宋师母。她当时在杭州大学后勤部门工作。我到后勤处购买饭菜票时，经常见到她。一说到宋老师，她就为自己先生未晋升高级职称而叹息，满脸遗憾的神色。我想，她在家里对宋老师也许同样免不了“抱怨”吧。

可是所有这些都，即导师的督促，同事的奉劝，夫人的鞭策，对宋老师来说，都好像是拳头打在了棉花上，丝毫不起任何作用。宋老师

还是一如故我，以不变应万变；抽他的“牡丹”烟，细声慢语，一脸谦和，认认真真上他的中国通史课。我想，人家的“魏晋风度”，只是得其“形”，而宋老师身上的“魏晋风度”，则是得其“神”。

我的专业方向是先秦、两汉史。另外，在学业上也还算用功，所以，在校期间，我在宋老师眼里，估计是属于“孺子可教”的一类。缘此之故，我和宋老师还算是走得比较近的，经常跑去他家叨扰。宋老师冲淡简远，雍容大度，从不以此为忤，流露一星半点的嫌烦神，一起聊天。这种闲聊，没有明确的主题，海阔天空，信马由缰。有一次谈到历史学的前景，宋老师说，读历史，搞历史的，不知有多少人。可是，这中间能够成为分子的，只是极少数，而绝大多数，都是分母而已。分母搞出来的东西，车载斗量，汗牛充栋，叠床加屋，可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思。事实上，只有分子做出来的成果，才有藏之名山、传之久远的价值。所以，干我们历史这一行的，首先得自我定位准确，弄清楚自己究竟是“分子”还是“分母”？如果是“分母”，那么，就犯不着皓首穷经，折腾自己了。不若“全真葆性，毋以物累形”，回归本色，化于自然。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历经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之后，我今天再回味宋老师这番话，才似乎懂得了其中所蕴涵的人生真谛。原来，这是宋老师的“夫子自道”。其实，他早就勘破红尘中的一切，早就清醒地把自己定位在“分母”之列。既然是“分母”，那就没有必要为俗务而折腰，为名利而折腾。“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一切都是过眼云烟，一切都是身外之物。最好的选择，就是“不谴是非，而与世俗处”，进入“坐忘”的境界，“黜聪明，离形去知”。所以，什么专著，什么论文，什么职称，都风轻云淡，毫不系怀。在他的骨髓里，认同的是把握当下，放下名缰利锁的羁绊，才属于真正的生活，才属于真正的优雅与超越！当然，要达到这样的境界，还是需要有一定的基础和条件做支撑的。在这方面，宋老师有明显的优势，宋师母操持了所有的家务，宋老师在家里是茶来伸手，饭来张口，不须洗一只碗，扫一次地。宋老师有当时足以高的工资收入，衣食无忧。宋老师的孩子有一份不错的工作。他不用替孩子操心，没

有被“啃老”之虞。总而言之，有实力则强，无欲望则刚。宋老师庶几近之！

宋老师的这种优雅渗透在其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曾记得，我有一次到他家，师母开门后，我听到的是悠扬动听的小提琴声。师母进里屋后，琴声停了下来。宋老师随之手持小提琴迎了出来，一边招呼我在客厅的沙发入座，一边小心翼翼地将小提琴收拾好，放入琴匣。原来，刚才我听到的琴声来自于宋老师的弓弦之下。我当时很惊讶地说：老师您会拉小提琴，还拉得这么好。宋老师淡淡一笑，说道，我这是偶尔玩玩，自娱自乐而已。又一次，我去他家，他正在进晚餐呢。一小碟饺子，面前整整齐齐地摆着七、八个小碟子，里面分别盛装着香醋、酱油、蒜头、麻油、辣椒酱、葱花等佐料。这个场景，特别有仪式感。这个记忆我是特别的深刻。显而易见，超脱旷达与雅人深致，就这样始终伴随着宋老师的日常人生。换句话说，在宋老师那里，所谓的“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根本不是格言的砥砺前行，而是一种纯粹天然的存在方式。

宋老师最后还是评上了副教授，但这已经是在我硕士毕业，离开杭州大学，到山东大学历史系跟随仲莹师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事情了。据说，在那一年的浙江省历史学会的年会上，他提交了一篇讨论历史上清官文化的文章，这篇文章被《杭州大学学报》选中，刊发了出来。于是乎，宋老师在职称评定问题上“达标”了，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地当上了一名副教授。当时，远在济南的我，听到这个消息，真的是非常开心，为宋老师，尤其是宋师母而感到由衷的高兴！有些时候，必要的妥协是需要的，人生毕竟不是一条直线。“通权达变”，这应该是哲学上的大智慧！

宋老师的境界，在杭州大学历史系，并不是个别的现象。我生也晚，并不知道在那“反右”和十年“文革”期间老师们的表现。但是，在我所亲身经历与见证的那七年时间里，母校母系的老师们，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乃是旷达简远。换言之，淡泊名利，谦让宽厚才是他们工作与生活中的主流，是他们生命意识中的主旋律。而宋老师，只是其中相对突出的一个范例罢了。所以，我导师子耀先生 1942 年任副

教授，在此岗位上一干就是 37 年，一直到 1979 年才晋升教授，可从来不见他对此有任何的抱怨！这在浮躁喧哗、急功近利的今天，几乎是难以想象的。应该说，他们这些人，都是真正的“仁者”，而“仁者寿”，则洵非虚言。我的母校杭州大学历史系的老师，绝大多数都活过了 90 岁大关，就是这方面最具有说服力的象征。这一点上，宋显昌老师同样没有例外！

老子有言：“知其白，守其黑；知其雄，守其雌；知其荣，守其辱”，“人往低处走”，宋显昌老师对我们这些后来者的最大启示，归根结底，就在于这一点！

[返回目录](#)

三十年，师恩如山 ——怀念吴熊和教授

—杭州大学中文系 78 级 郑广宣

2012年11月2日下午3点半，我去看望吴老师。听说吴老师最近几天很不好，很是担心。

我到吴老师家，师母正在打电话，说是有急事。吴老师躺在床上，插着氧气管，形容枯槁，嘴微张着，呼吸已十分微弱，脸上没一丝血色，近一米八的个子，盖着一条薄被竟显不出他的身形。我一阵心酸，强忍着泪水，走近吴老师床前，在他耳边轻轻地叫他：“吴老师，我是郑广宣，我来看看您。”他女儿也在边上叫着爸爸，但吴老师没有一点反应。师母说，他已经听不见了。据说人在生命的终点，听觉是最后消失的。也许吴老师能听见，但他已经没力气反应了。也许他真的听不见，因为师母告诉我，吴老师已经昏迷三十多个小时了。而且在病情恶化后，半个月来一直没有进食。我从吴老师的房间出来，师母告诉我，刚才电话中说的急事是关于吴老师的后事。我说，师母你怎么不跟单位联系？无论是学校、院系，还是吴老师的学生，只要你提出来，大家都会来帮忙的。师母说，吴老师有交代。他的身后事，不要麻烦组织，不要麻烦其他人，也不要搞告别等仪式，一切从简。我不能违背吴老师的最后的意愿。

是的，这就是吴老师。他以他的学养和人品，给了学生、给了学界很多。但无论自己有多大困难，总是想着不给别人带来麻烦。即使在他的弥留之际，仍然如此。看着吴老师枯槁的面容，听着他越来越弱的呼吸，三十多年来我所认识的、熟悉的吴老师的点点滴滴，涌上心来。

作为吴老师的学生，毫无疑问，我们是在课堂上认识吴老师的。大概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吴老师为我们讲授“古典文学”课程中的唐宋一段。天气冷，他穿一件中式棉袄，手里只有一本十三院校编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而他讲课，大多数情况下是不打开那本教科书的。他讲宋词，讲苏东坡的“明月几时有”，讲李

清照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讲辛弃疾的“沙场秋点兵”，不管讲到哪一个作家的作品，他几乎都能一字不差的背诵下来。而且为了说明这一个作品的情感、心绪、风格以及作者的生活遭际等等，他总能信手在黑板上写出与此相关的诗词、文句、史料。那一笔行草龙飞凤舞，潇洒之极。几节课下来，同学们就被彻底征服了。在其他课上，总有几位同学在忙自己的事情。但吴老师的课没有一个人开小差的。我们正是在吴老师以及当年杭大诸多名师那儿知道了什么是学问，什么是学养，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的文化人。从吴老师那儿看到了“上下求索”的屈原、“荷锄戴月归”的陶渊明、“天生我材必有用”的李白、“一蓑风雨任平生”的苏东坡的影子。我们也从吴老师身上找到了“儒雅”和“洒脱”等词语的形象注解。在听闻吴老师驾鹤西去的噩耗后，我们有同学说：“一蓑风雨任平生”，正是吴老师一生的真实写照。

而对我来说，受吴老师的教导和影响，大学的四年学习仅仅是开始。在后来的三十多年中，吴老师仍然引领着、指导着、影响着我。甚至可以说，我所策划、责编的几种有影响的图书，都是吴老师的具体指导和帮助的结果。

我毕业的时候，被分配在省级机关。机关工作相对比较清闲，主要的工作就是搬文件。但机关的人际关系就没工作那么轻松。我始终适应不了同事之间不即不离、上下级之间唯官是听的氛围。再加上夫妻两地生活又不能解决，第二年，我就离开省机关，调入出版社做编辑。本来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但吴老师知道后却大加赞赏。他觉得，在这个唯官、唯权的时代，有人能从机关出来做业务，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在因此而受到父母、亲朋的责难和不解后，我从吴老师的肯定中得到了慰藉。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们出版社曾向杭大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的老师们组织了《高中古诗文助读》的书稿，吴老师也参与其中。这是一套高质量的古诗文普及读物，也是当时作者阵容最强的教辅读物。我进出版社后不久，这套书就由我接手，因此也多了与自己的老师再次接触、再次学习的机会。书稿多次重版。到本世纪初，根据高中语

文教学日益功利化的实际，使用这套书的学校师生要求改版，包括注释要细，翻译要字字对应，尽量减少一些鉴赏的内容，等等。记得当时我们请平慧善老师修订吴老师写的内容，平老师就说，吴先生的文章怎么吃得消改？他的文章文气很足的，一删一改，文气就断了。从这一件小事，可以相见吴老师及他的学问在其他老师心目中的地位。

因八十年代初《唐诗鉴赏辞典》的出版，各地纷纷推出有关古代文学方面的类似图书，而古文方面的书还未之见。我就此向吴老师请教是否可以做一本《古文鉴赏辞典》，并希望他能出任主编。吴老师首先肯定了我的想法，同时推荐了更有资历也更有声望的徐中玉先生做这本书的主编，他自己则担任副主编，并协助主编承担了很多工作。《古文鉴赏大辞典》出版后，获得了成功，再版重印多次，并在次年获得由读者投票的“全国金钥匙图书奖一等奖”。

《古文鉴赏大辞典》的成功，触发了出版社领导在这方面作进一步开发的想法。我又与吴老师一起探讨这方面的选题。吴老师觉得“鉴赏辞典”可以偶一为之，但要让图书产生久远的影响，应该在学术上做文章。我根据当时的出版现状，提出了《中国词学大辞典》、《中国诗学大辞典》、《中国曲学大辞典》的选题设想，并请吴老师担任《词学大辞典》的主编。但吴老师觉得这是一项词学研究领域的大工程，应该请这个领域有较高声誉的学者一起参与。他建议我邀请词学研究者相对比较集中的江浙沪三地，包括华东师大、南京师大、南京大学、苏州大学、杭州大学的学者共同参与其事，并且推举最年长的华东师大马兴荣教授为第一主编，而他自己则为第二主编。吴老师总是这样，团结学者同道，尽可能保证图书的质量和学术代表性，但在名利上他却从不计较。后来，我又请他主编了五大本《唐宋词汇评·两宋卷》。他统揽全局，规划体例，提出要求，同时还亲自做了一本。其中他设置并强调的“编年”、“考证”两个栏目，使这套书有别于先前出版的《唐诗汇评》。不仅资料丰富，而且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准。而《唐宋词汇评》的部分工作，则是吴老师身患重病以后完成的。《中国词学大辞典》和《唐宋词汇评》先后获得浙江省出版最

高奖——“树人奖”。《唐宋词汇评》还获得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这里面凝聚着吴老师多少的心血！

1997年，我们计划编辑出版《王国维全集》，请吴老师担任《全集》的顾问。吴老师觉得这是一项学术盛事，对此欣然应允。并在我参与编辑《王国维全集》的十几年中，多次给予具体的指导。记得当我们的工作陷入困境时，吴老师跟我说：“需要的话，我可以给你们看书稿。我的小学功夫还是可以的。”我当然知道吴老师的功底，但我怎么忍心让罹患沉疴的吴老师再操劳呢。

吴老师是一个爱书如命的人。我去吴老师家，吴老师的书桌上总是摊着他在看的书。记得一次他从美国探亲回来，桌上竟摊着《全宋词》的第三册。我惊讶对宋词烂熟于心的吴老师竟然还在如此孜孜不倦地读词。他笑着淡淡地说：“已经三个月没看了，得看看。”再看书的空处，密密麻麻地写着他的心得，有感想、有赏析、有考证，也有相关的资料。后来我知道，吴老师看过的很多书，都有随手所记的旁批。这些旁批，有不少就成为他文章中的内容。“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正是吴老师一生学术生涯的写照。

我们都知道吴老师治学严谨。他做学问要求言必有据。他的著作都是严格的考据、论证以后的产物。同时，他又十分强调著作和文章的思想，强调文章要有真知灼见，不玩概念，不说空话。他因此而专门给博士生开“中国思想史”的课程。他的代表作《唐宋词通论》能成为词学研究领域的扛鼎之作，除了研究领域的宏阔，体例的详备，论述的缜密，更重要的是在他的书中一个个具有指导意义的闪耀着思想光辉的学术观点。这些观点虽然不是颠覆性的，但都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并可以按他提出来的思路、规划继续探究的。

吴老师对学生，特别是对自己的研究生、博士生是严格的。记得一次我去吴老师家，他正在审读一位博士研究生的论文，厚厚的一本，密密麻麻的文字，估计有几十万字。我说这博士论文要写这么多？吴老师说，博士论文嘛，三十万字总是要的。1994年，我与沈松勤一起去桂林参加一个会。松勤说起，有几篇文章交给吴老师，吴老师似乎不太满意，他也不敢拿去发。我说吴老师大概是按他自己的标准要求

你，其实你发出来他也许就认可了。过了一段时间，松勤的一篇文章发出来了。吴老师很高兴地对松勤说：“小沈，这篇文章不错。”正是这种严格要求和热情鼓励，使他的博士生一个个学有所成，大多成了自己研究领域的专家。松勤的博士论文也获得了教育部首届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有幸几次与吴老师一起参加古代文学的学术研讨会，并且常与吴老师住在一个房间。会议期间，总有不少年轻学者慕名前来拜访吴老师，向吴老师请教问题。吴老师总是耐心地、不厌其烦地为他们解答。吴老师宣讲论文，他一般都是只讲自己文章的观点，从来不会因为与他人的观点不同而否定别人，与人争执。儒雅大度，谦谦君子，长者风范，是我从那些与会学者口中听到最多的对吴老师学识人品的赞誉。吴老师对前辈学者非常敬重。会议期间，他总会挤时间去探望那些老先生。我曾跟他一起去拜访过唐圭璋先生、程千帆先生、徐中玉先生、施蛰存先生。

2003年，听说华东师大要举行施蛰存先生百岁华诞、徐中玉先生九十华诞的会议，吴老师不顾自己得恶疾三年多的身体，欣然前往。那次我陪他同去。记得火车下车，吴老师的脚就有点肿，可见身体已大不如前。但他仍然坚持活动的整个过程，还拜望了钱谷融等几位老先生。这也是吴老师最后一次外出。

上世纪八十年代，夏承焘先生的《天风阁学词日记》出版，九十年代《夏承焘集》出版，吴老师为整理夏先生的著作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九十年代末《蒋礼鸿集》列入我们社的出版规划，吴老师亲任编委会主任。作为责任编辑，我又一次得到了吴老师的具体指导。我跟吴老师说：“有些事情你可以叫年轻人做。”吴老师说：“老师的事情我责无旁贷。”

吴老师对自己的朋友也是关心有加。2005年上半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唐宋词通论》的责任编辑吴战垒因病去世。本来他打算去参加告别仪式，并要我安排。考虑到吴老师身体这么不好，怕他在那种场合悲伤过度，就找了个借口没让他参加。过了一段时间，我打电话给他，他在电话里带着哭腔跟我说，他已经哭过三次了。北方一位学者

做了一套《全宋词》的评注，辗转托人请吴老师出任顾问。初时吴老师并不愿意，但情面难却，被算是默认。出书后，对方寄来一笔稿费，吴老师却全部退了回去。吴老师就是这样，对学生、对老师、对朋友，甚至对那些并不熟悉慕名而来的年轻学者，他总是那么重情重义，唯恐有什么不周之处。但从来不需要他人的回报，更不愿无功受禄，收受没有付出劳动的“酬劳”。

吴老师与师母伉俪情深，半个多世纪相濡以沫，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师母。11月2日下午我去看吴老师，师母对我讲，吴老师最后的话，就是要儿子女儿好好照顾妈妈。

吴老师走了。他没带走什么。但他留给我们很多。他的学问，在一部部论著中仍标杆于学术界；他的学养品性，他的人格魅力，会久远地影响着所有接触过他的人；他的睿智，他的儒雅洒脱的形象，永远活在学生的心中。

愿吴老师安息！

(2012年11月10日)

[返回目录](#)

中文系名家学术自传
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

—杭州大学中文系 61 级 韩泉欣

我几十年在高校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回顾我走过来的道路，曲折蜿蜒，处处风景，经历过艰辛，也收获了欢乐，对人生百味都有所体验。想到李白的两句诗：“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意思颇相仿佛，于是就拿来做这篇《自传》的题目。作为社会的一分子，我的工作、我的事业，是与我所处的时代社会联系在一起的；那么我的《自传》并不纯然属于个人。它或多或少可以反映时代的一个侧影。这不是一件毫无意义的事。

01

我生于 1942 年，浙江萧山人。1965 年 9 月毕业于杭州大学中文系，获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学历。毕业后，被分配到杭州大学留学生办公室任汉语教师。一年以后，“文革”爆发，留学生回去了，学校停课闹革命。从 1966 年夏季开始，十年的时间，用来参加各种政治运动，例如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战备训练、农业学大寨、上五七干校、挖防空洞等等，一直折腾到“四人帮”倒台。但即使这样，也还是会留下属于私人的时间和空间，让我们这些“臭老九”有可能去做一些与业务相关的事情。就我个人来说，我的空余时间，主要用在看书上，就好像古人说的，“客子光阴诗卷里”。我对这句话别作一解，以为一个人到世间做客，能经常拿一本好书来读，那会是一桩很惬意的事。但读书不仅仅是一种欣赏、一种陶冶，不仅仅属于个人修为，它还能造就做学问的坚实基础，作为一个人服务社会的有力凭借，所以读书有他的目的。而我当时面临的问题是，不知道以后去做什么工作，可能跟哪个专业相关？这种情况之下，读书就有点随心所欲，泛滥无归，效果并不见好。后来，我就注意从我的原有基础和有限条件出发，实事求是地安排读书计划，适当收窄阅读范围。在古今关系中，以古

为主；在中外关系中，以中为主；在文史哲中，以文为主，兼及史哲。几年实践下来，觉得比之于原来的泛滥无归，效果明显要好一些。比如说，改善了自己的知识结构，为以后从事教育科研打下一定的文史基础；比如说，在阅读文学作品和理论著作的过程中，注意如何去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逐步培养起一种理论兴趣；比如说，要研究一个作家，或者一部著作，开始思考应该从哪里入手，怎样去寻找资料，等等。有一次，我借到一本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一看之下，大受启发，知道研究一个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去寻找资料；而且发现，在中国古代，文史哲是打通的，文学家可以是哲学家，哲学著作同时也是文学作品，如孔孟、老庄、嵇阮、韩愈、朱熹等莫不如此。所以，研究哲学的途径和方法，完全可以推演到文学方面，并由此引起我对目录学的兴趣；阅读作家作品，晓得到图书馆找《四库全书总目》、《书目答问》、《杭州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杭州大学图书馆线装书总目》这类工具书了。不过虽然有这些进步，到此为止，我的专业方向问题仍未解决。

转机出现在1970年。留学生办公室解散，我转入中文系任教。当时，系领导征求我对未来工作的意见，我毫不迟疑地选择了文艺理论教研室。这样算是初步明确了我的专业方向。教研室安排给我的工作，先是去教改小分队，参加地市中学师资的培训，为学生开《文学概论》；高校恢复招生以后，我就回系为本科生讲文学鉴赏和文学批评。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我还参与了由教研室主持的几种理论教材的编写。正是这两方面的工作实践，推动我逐步进入教师的角色。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高等教育出现了崭新面貌，风气初开。各校中文系纷纷增开古代文论、西方文论这些新课，以完善中文系学生的知识结构。我们教研室得风气之先，1978年即定下由我承担古代文论的教学任务，并于1980年指派我参加教育部委托武汉大学和华东师大联合举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师训班学习。师训班由徐中玉、王文生主持。两位先生除了自己给我们讲课以外，还邀请了包括郭绍虞、朱东润、王元化、吴组缃、施蛰存、程千帆、钱仲联、舒芜在内的十多位著名专家为我们做专题讲座，对于打开我们的眼界，拓展我们的

思路，都能起到很好的作用。不过要消化吸收专家所讲内容的精萃，据我个人的体会，还得做一些延伸阅读的工作。举一个例子，程千帆先生当时给我们讲了两个专题：1、读诗举例；2、唐代古文运动。听了觉得非常精彩，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回校之后，我就找来他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古诗考索》、《文论十笺》等著作，作进一步的钻研，以加深对程先生的学术理念和治学方法的理解。我觉得，他的这些理念和方法是可以奉为圭臬而终生受益的。

师训班结业回来之后，我的主要精力投放在《中国古代文论》和《中国文学批评史》两门课的课堂教学，以及一部《中国古代文论选》教材的编写上面。与此同时，我还不得不考虑如何处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教学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关系。因为按照一般的理解，文学理论是文学实践经验的概括与升华。它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的实践基础上产生和发展，反过来又推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的前进。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批评，一方面是对古代文学发展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同时又对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发生影响，两者之间是紧密联系的。一个有趣的事实，在中国文学史上，纯粹的理论家、批评家屈指可数。多数情况下，一身而二任，一个著名的文学家，往往同时也是著名的理论批评家，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再从教学和研究的角度来说，离开中国文学发展的丰富事实，不但很难理解和把握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深刻内涵，而且我们也不难想象，文论课一旦抽掉了丰富事实，变成纯粹的理论推阐之后，会变得多么的枯燥乏味。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觉得古代文论的教学不但应该紧密地结合古代文学的研究，而且必须把古代文学的良好修养作为我们从事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研究的一个基础。所以，最后我又对自己的专业作了适度的调整，以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为研究方向。我们几个同方向的老师后来离开文艺理论教研室，进入古代文学教研室，除了开古代文论和文学批评史课以外，还承担起中国文学史的教学任务。

专业方向固然比较明确了，但我已经年逾不惑，面对繁重的工作任务，内心感觉“压力山大”。好在我事业心还比较强，为人踏实肯干，有一点吃苦耐劳的精神。我就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克服种种困难，在专业教学和专业研究上拿出一点实实在在的成绩。

在教学和研究的过程中，我从三个方面得到仅属于我个人的一点体会：

（一）补课。

我大学本科读了四年。前三年相对平静，比较认真地读了点书。第四年就下乡搞“四清”了。那年代的大学，很难按计划实施教学，学生专业基础相对薄弱。后来没有读研究生，又缺乏必要的专业训练。走上岗位，就感到左支右绌，很难顺利开展工作。我们大多腹笥俭薄，相对于老一辈学人的辞章修养、学问境界，那简直是遥不可及的。这种情况之下，不能不采取一些补救措施。比如花大力气研读最重要的文史典籍，包括重要的总集、别集以及理论著作。达到两个目的：1、通过对文学经典的沉潜涵咏，培养一种敏锐的艺术感觉。2、掌握基本的文学史实和基本的文学理论，提高理论思辨能力。阅读古籍，研究古代的作家作品和文论著作，还得掌握一定的研究手段与研究方法。涉及文献校讎，包括诸如目录、版本、训诂、校勘等一系列很专门的学问，是我以前没有学过，或者学得不好的。现在必须从头开始，边干边学，亡羊补牢，犹未为晚。我的这些努力实际上都带有补课性质，目的只为夯实基础。任务繁重，旷日持久，非可以一蹴而就者。但也只好硬着头皮去做，因为对于研究工作者来说，基础不实，很难有所作为。

（二）寻师。

一个人在问学的道路上，如果能遇到一位好的老师，那是很幸运的。老师学有渊源，境界阔大，本身就为你树立一个标杆；又能够指示门径，让你在学术研究上少走弯路。所以在研究生教学中推导师

制，为莘莘学子的成长创造了极有利的条件，是令人羡慕的。可惜我没有得到这样的机缘，而学问又不能不做。那就只能退一步，自己想方设法去寻找老师。古人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只要我虚心向学，态度诚恳，想总能找到愿意为我传道、授业、解惑的人。我在学习遇到问题，首先跑图书馆、书店、资料室，向书本寻找老师；现在科技进步，资讯发达，从网络获取解决问题的信息，也是不错的选择。高校本来就是人才集中之地，我们中文系历史悠久，名师硕儒更不乏其人。老一辈学人如夏、姜二老，我接触不多。以下蒋祖怡、蒋礼鸿、盛静霞、徐朔方、沈文倬、吴熊和、王元骧、郭在贻诸先生，平时交往中，释疑解惑，多受教益。例如沈文倬先生，一代礼学大家，文革期间，文学研究室解散，先生被安排到系资料室工作。我常去借书，与之相熟。后来同住校内一幢，成了上下邻居，又时相过从。有次我忽发一问：“沈先生，佛与菩萨是什么关系？”答曰：“佛是菩萨的头头。”简捷明了，妙语解颐。先生还说：搞中国古代文学，不懂佛学是不行的。80年代我写了一篇《皎然诗论与佛教哲学》的稿子，拿去向先生请教。两天后，稿子取回。先生说，文章提出的观点是能够成立的，总体上比较满意；但有两点不足：一是讲顿渐关系似侧重在渐悟一边，易于引起误解；第二引文多数未做解说，给人明而未融之感。两点说得非常准确。按先生的意见作了修改以后，我才把文章拿去发表。

老师之中，我特别感念蒋祖怡先生。先生浙江富阳人，父亲蒋伯潜是著名的文史学者。先生幼承家学，对文学发生浓厚兴趣。1937年毕业于无锡国专。1948年应邀到浙江大学任教，后转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中文系。蒋先生早年即有《小说与戏剧》、《骈文与散文》、《诗歌文学纂要》、《文章学纂要》等多种著作问世。解放以后，学术研究的重心转到古代文论和文学批评方面，所著《王充的文学理论》、《文心雕龙论丛》、《锺嵘诗品笺证》在学界颇具影响。60年代，蒋先生为本科生开“文学概论”，对文学研究室的研究生讲“文学批评史”。后来，教育部较早批准在杭大设中国文学批评史硕士点，很大程度上也是借重了蒋祖怡先生的资望。60年代，我读中文本科，

蒋先生是中文系的副系主任，分管教学。我在“文学概论”课上听先生讲文学欣赏与文学批评。文革期间，先生备受迫害，曾两度中风，右腿骨折，致半身瘫痪。但先生凭着对祖国教育事业的高度责任感，以病残之身，继续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79年，作为教研室青年教师的进修内容，我们有四个人，每周一次，到先生府上听讲《文心雕龙》。同年先生开招硕士研究生，迄1992年2月11日逝世，从无中断。由于先生晚年衰病，又不良于行，我受命协助先生工作。几年“见习”下来，使我对于研究生教学的整个流程以及工作要点，已经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与把握。88年我受聘为硕士生导师，能比较快地进入工作状态，显然跟这段经历有关，或者也可以说是拜先生之所赐罢。对于我在科研方面所做的努力，第一，先生的提携奖掖功不可没。81年6月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所约写《陆机评传》，先生提议与我合作，我当然非常高兴。评传出版以后反响不错，山大方面又来约写张载、张协，这两篇就由我独力承担。后来浙江文艺出版社约我做《孟郊诗选》，责编徐元先生是蒋先生的学生，书稿能够落实下来，也是因了蒋先生的推介。第二，通过听课、研读先生的著作以及合作撰写文章，使得我略窥先生的治学门径，以为学习借镜之资。第三，深佩先生为人处世之道。记得80年代我做《孟郊诗选》这部书稿的时候，一次整理出孟诗注释中未获解决的疑难问题计六纸三十一条，晚饭后骑车去蒋宅请求帮助。岂知老先生事必躬亲，逐项落实，我心下大为惶恐，深责自己贸然放弃作独立探索，把一大堆难题推到老先生的面前；但从另一方面看，这一次的经历也让我对先生渊博的学识、严谨的作风、实事求是的态度，有了更真切的体认。虽然认真地说，我并非蒋先生的及门弟子，而实际上受惠于先生者多多，这是我永志不忘的。

在当了多年的老师之后，我对师生关系又产生一种新的认知，就是一定条件下可能发生的地位的转换。且不说从长远的观点看，学生总归要超过自己的老师，这才可能推动事业的发展；即从当下来说，师生之间，一方面是施教与受教的关系，教师因其专业特长以及已有的阅历和经验，对学生负有指导的责任；而作为学生，青春焕发，精力弥满，思想敏锐，也具有种种的优良，值得老师学习。做学问宜实

事求是，忌讳不懂装懂，强不知以为知，因为这样不但于事无补，而且会让我们做老师的陷入尴尬境地。师生之间，良性互动，教学相长，最是至理。2008年我去美国探亲，恰好有两篇博士论文需要指导，一篇讨论晚明士人对儒学文化的悖离与回归，一篇研究清代的赋学理论。两个选题都不在我比较熟悉的领域之内。为了获取发言权，我必须先做功课，阅读相关文献，形成我对论题的一些看法，且持之有故；与此同时，我作为论文的第一读者，再来检视作者的立论是否坚确，论据是否充分，论证是否严密。这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向学生学习了。当时，我已学会电脑打字。我们之间就通过电子邮件交换意见。这使我想起朱熹的两句诗：“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两篇文章都经过十来个回合的往复讨论，深得师生间文事切磋之乐。

（三）关于做课题。

作为一名高校教师，我认识到，科研是教学活动的“源头活水”。如果没有科研的支撑，教师想在课堂上站稳脚跟是很困难的。有鉴于此，我希望，我的教学工作，既有利于对中国文学的基本史实和基本理论的理解和把握，又能够与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前沿保持比较密切的联系。这样，教学活动有了新鲜活泼的内容，个人的科研也比较容易找到合适的题目。

当时从两方面提出设想：

关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学界已经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体系的任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特色相号召，同时把西方文论，特别是中国古代文论，作为可以取资的源头；既然如此，那么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特点和规律做深入的研究，便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中国是一个诗国。诗乃中国文学之大宗。诗歌意境成为理论界讨论的热门话题。例如关于意境的本质与存在方式，意境营造中诸种关系的处理，中国文学的诗性精神以及在各种文学样式中的渗透，文体与风格，个性与风格，时代与风格，思潮与流派等等，我所撰写的论文大抵与之相关，可以代表当时我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与探索。

关于古代作家作品的研究，开始时限于汉魏六朝，涉及的作家为数不少，与研读《文心雕龙》《诗品》同时进行，意图两方面互相促进，也写了一些文章。如果能立意在这方土地上精耕细作，或许可以有更多的收获。

后因教学之需，又把研究延伸到唐代，开始关注陈子昂、李白、杜甫、白居易诸人的思想与创作；接手《孟郊集校注》以后，主要精力则投放到孟郊之上。两方面都留下一些成果。比较而言，孟郊研究做得扎实一些。由孟郊又联系到韩愈，以为韩孟正好处在中国古典诗歌由唐入宋的转捩点上。通过对韩孟诗的解读，以及韩孟诗派在古典诗歌嬗变过程中地位和作用的阐释，可以达致对中国古典诗歌发展规律的更深切的理解，由此萌生了撰写《韩孟诗说》的计划，并开始做若干前期准备工作。但终因杂务缠身，精力不及，此事告寝，深感遗憾。

[返回目录](#)

曲海史册留公名 ——缅怀徐朔方教授

—杭州大学中文系 59 级 李丹

(2007 年 3 月 26 日)

徐朔方先生（1923—2007），原名徐步奎。浙江东阳人。他是温州人的女婿。自 1947 年起，他在温州中学和温州师范学校教过七年书。1954 年，徐先生调往浙江师范学院（1958 年改组为杭州大学，1998 年并入浙江大学）中文系执教，直到与世长辞。

最早刊出徐朔方教授于丙戌年除夕下午 4 点半左右在钱塘江南岸杭州武警医院病逝消息的报纸，是他逝世已六天（正月初六）的《都市快报》。记者何欣写了一篇《徐朔方病逝》的消息。同一天，“中新浙江省网 2 月 23 日电”全文转发了这篇文章。

闻此噩耗，我想起了英国诗人狄伦·托马斯的名句：“And death shall have no dominion（死亡也一定不会战胜）！”

徐老鹤归华表，令人扼腕唏嘘。但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说，似乎也并不太出乎人之意料。因为 84 岁的他，深度昏迷在医院，已近三个年头了。

那是 2003 年 7 月 26 日下午。八十一高龄的徐先生被扶到户外散步，却夏生凉。忽而，天气骤变，浓云密集，黑云翻墨，风卷而至。眼看一场暴风雨就要袭来。搀扶徐朔方教授散步的人，让徐老在原地的路上呆着，自回家去取伞。待返回后，发现徐先生已摔倒在地。急送到杭州同德医院检查，为颅脑出血。经医生奋力抢救，总算留住了这一位“终身教授”的生命。（1994 年，徐朔方教授经浙江省人民政府并报国家人事部批准为杭州大学暂缓退休教授。）

徐老这一摔，几乎让他成了“植物人”。在这次摔倒在地的前一个年头，要比徐步奎先生年长七岁的著名老作家、老诗人莫洛（马骅），在林绵师母陪同下，从温州赴杭州参加省文代会。在文代会期间，莫洛夫妇去看望过他俩的挚友徐步奎。当时徐老的健康情况，诚

如马老的大儿子马大观兄给我发来电子信中所告知的：“徐步奎先生仅脚不太便，反映迟钝，但还能够说很多话。”

去年（2006年）12月，我应邀在杭州师范学院继续教育学院讲学。副院长江平兄在跟我聊天时对我说：“抗战时的1943年，徐步奎先生考入浙江大学师范学院国文系（时避乱，内迁龙泉）。他在国文系读了一年之后，转到英文系。先父江超中（又名江潮，原辽宁大学中文系教授），那时正在浙江大学师范学院国文系读书。曾言及他们那个班级只有11名学生。徐步奎先生是读英文系的，但他常来国文系听课，是那个班级的第12个学生。”

我在讲学之余，由跟徐步奎先生有着两代世交情谊的杭师院退休副教授应守岩兄陪同，去看望我俩的业师吴熊和老先生。老教授吴熊和著有《唐宋词通论》、《唐宋词汇评》等。他原是浙江大学中文系系主任。当我言及欲去探望徐步奎先生时，吴老师直言劝我“不用去了”，因为“一周之前，平慧善老师去看望徐步奎先生，徐先生已经不认识这位跟他一起工作过40多年的老同事了”。“如果你去，徐先生也不会认识你的。何况，他已不会说话”。由是，我真的就没去萧山杭州武警医院探望，只在心中为徐老祈祷。这，竟铸成了我的终身遗憾！

徐老在“神州大地举杯同庆辞旧迎新”的除夕爆竹声中解脱了。惋惜之余，我想起了老子在《道德经》第五十一章所说的：“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又想起了晋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所说的：“修短随化，终期于尽”。是的，人总是要死的，或早或晚，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

徐老走了，回忆往事，旧游如梦。

我成为徐老的一名学生，那是1959年，我考进了杭州大学中文系。他执教我们的元明戏曲。我呢，成了他的科代表。由于我要交班级作业，要向他反映我们学生对教学的要求，因此，我常去他家。

忘不了，他曾经接受我们班级的邀请，跟我们同去西湖划船。

忘不了，他在晚自修时会来我们学生宿舍对我们进行辅导。我们的学生宿舍，仅几个平方，6人或8人挤在一小间，既是寝室，又是学

习室。那个时代，像我们这样的学习环境，已是“高等学府”中的上等设施了。他笑嘻嘻地坐在高低铺的木床下铺床沿上，请我们向他提问。如果他抬头时一不小心，就会把头碰撞到上铺床的床板上。这种事，已发生过。而他，好像无所谓，总是耐心地进行着“你问我答”。他还查阅我们的听课笔记。想起这些往事，我心中油然升腾起无限敬意：这就是诲人不倦的精神啊！这就是令人一辈子都铭记的高尚师德啊！

忘不了，那是1961年初，他的夫人杨笑梅女士不幸病逝。美丽的春天，碧草如茵，可惜师母已不见。我去徐先生家，总能在他窗前听到他弹奏的钢琴声。我走进他的房间，只见他的钢琴架上翻开着一本五线谱。我默记下几句窗下听来的钢琴曲旋律去问马骅老师。马老师告诉我：“徐先生弹奏的钢琴曲是贝多芬的《悲怆》……”啊，中年丧妻，徐步奎先生何其悲哀！“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徐师母独自远行了，徐先生只能用钢琴曲来抒发他对爱妻深沉的爱。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出版的《牡丹亭》内页标注：“徐朔方 杨笑梅校注”。从中可知：瑞安人杨笑梅也是汤显祖研究家。我还打听得：师母杨笑梅是徐先生的大学同学，她的身体一直都不好。两人相恋时，杨笑梅已查出有病。徐先生很爱她，不忍离去，坚定地要跟她结婚。结婚后，杨一直卧床不起，徐先生悉心地照料夫人的起居，家务都是徐先生“包”的。人称徐先生是“模范丈夫”。

我在杭大读书时，曾在马骅老师的房间里，偷看过徐先生请马老（莫洛）给他修改哀悼夫人杨笑梅的长诗。徐先生在手稿的扉页上写着：“献给爱妻杨笑梅。”徐先生写在厚厚的精装笔记本里，写了厚厚的一本。这些深情怀念爱妻的长诗，在25年之后，已纳入徐朔方诗集《似水流年》出版了（1995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当然，在《似水流年》这部诗集里，还有徐先生另一些内容的新诗。是的，徐先生在他学生时代就很爱写新诗。他曾在朱光潜编的《文学》杂志上发表过新诗。写到这里，我应该补叙几句：徐先生中年丧妻，杭大中文系领导非常关心他。领导给徐先生当了“红娘”。徐先生的第二夫

人，是系领导给介绍的杭大中文系 1961 届毕业生绍兴姑娘宋珊苞。学姐宋珊苞毕业后分配在杭州一中（今杭州高级中学）教语文。可叹的是，宋珊苞又早于徐先生撒手人间——她于 2001 年病逝。可慰的是：宋珊苞生育的两个儿子，都很有出息：大儿子徐礼杨，杭大数学系毕业后去美国，获美国数学博士；徐先生的小儿子徐礼松，杭大物理系毕业后去美国留学，已获得物理学硕士。孙子在美国读中学，成绩优异，已获得“美国总统奖”。

我在杭大读书时，知道徐先生很喜欢体育运动。他每天清晨都要骑着自行车绕西湖飞跑一个大圈。他爱游泳。每当夏天下午他给我们班级授课，他常会将游泳裤也带进教室放在讲台上。有时，他会把湿漉漉的游泳裤随手搭挂在教室的窗户，迎风飘扬，不拘生活小节；有时，他一下课，就从手提包里拿出游泳裤，在我们眼前一挥，笑嘻嘻地说一声“我去游泳了”。接着，就骑上自行车离我们而去。

若说他不拘生活小节，似乎又不妥。因为在杭大中文系老师中，穿戴最时髦的是他。在上世纪 60 年代，正值国家困难时期，全国都凭布票购布，每人一年发布票 2 尺 8 寸。整个中国，只有多口人家的家庭凑合起来才能够给家中一位成员新添一件衣服。口号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几亿人的穿戴，几乎是清一色的蓝色或黑色——外国人嘲笑中国人是一群“黑蚂蚁”一群“蓝蚂蚁”。当年，党中央号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生活要“艰苦朴素”。别说老百姓，就连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出国访问，他的衬衫与袜子也是缝缝补补的。而徐步奎先生，他穿“洋派”西装、穿背带西装裤，潇洒地走在杭大校园，特别耀眼。

徐先生爱游泳，更喜欢散步。我在杭大读书时去他家，常在晚饭之后。此时，他会让我陪他往黄龙洞方向散步。他知道我很用功，而那时又值国家困难时期，食物很少，吃不饱，饥肠辘辘，人人营养不良。我班级中患浮肿病的同学有好几个。如窗友张世欣（今浙师大教授，曾任浙师大副校长、校党委副书记），当年他也是浮肿病患者之一。杭大医院配给他的最好的治疗浮肿的药就是一纸袋的米皮糠。我常会向张世欣师兄讨一瓢勺米皮糠来充饥。当年的学子都记得：杭大

曾宣布停课三天，要求全校学生自力更生，以小组为单位到天竺、龙井、九溪十八涧等山中去挖掘葛藤根，然后交给学校食堂磨粉煮汤，给大家“增加营养”。那时，我身体欠佳。徐先生多次劝我“不要太用功，多活一天就够了”。他还说，他读小学与初中时，成绩报告单上挂满“红灯笼”，每个学期总有好几门功课是不及格的。“我哪会像你们班级的人这样用功！”我说：“徐老师，您真会开玩笑。”他说：“真的，我不骗你的。”他知道我是从遂昌来的学生（我是松阳人。1958年，松阳县与遂昌县合并为“遂昌县”。1981年，两县依旧分治），而汤显祖曾在遂昌当过五年知县（明万历二十一年即1583年春，汤显祖从广东徐闻县“量移”到浙江省遂昌县；万历二十六年即1598年，汤显祖弃官离任回老家江西省临川）。因此，散步聊天，聊得最多的便是遂昌的乡俗，或遂昌的名胜。惭愧啊，徐先生知道的遂昌风土人情乡俗与风景名胜，比我所知道的远远要多得多！至于明代时遂昌县金矿、银矿的开采情况，我真的“无可奉告”——因为我不知道。他呢，却能说出许多。他还说汤显祖不愿意给明代朝廷征取金矿银矿的种种恶税，由是弃官回江西临川老家了。此后，我去查汤显祖的诗，的确不假。如：“平昌金矿浸河车，曾道飞烧入用佳。中使只今堆白雪，衰翁几日试黄芽。”（《戏答无怀周翁宗镐十首》）

跟随徐先生散步聊天，是一种享受。关于汤显祖的许多知识，我是在伴随着他散步时得到的。比如，汤显祖两次放犯人回家过年，限期三日，必须自动归狱。再比如，汤显祖在遂昌县搞的“元宵节‘纵囚观灯’”——他从狱牢里放出“在押犯人”，让这些囚犯在正月十五夜去街上观灯，尽情享受中国人欢度元宵佳节的欢乐。还比如，汤显祖写出了剧本，让犯人也参加排演，如果犯人不会唱戏不会演戏，就让人教犯人学敲锣打鼓拉琴吹笛。

我说：“汤显祖认为在押囚犯也有父母妻子子女，也应享受人之‘天伦之乐’。他敢将在押犯人放回家三天欢度春节过大年，这种闻所未闻的破天荒事情，有着不可思议的了不起；汤显祖敢让囚犯在元宵节夜到遂昌街上去自由自在地观灯，我真的有点想不通：汤显祖怎么会有这样大的胆子？”徐先生说：“这叫文明。”又补充说：“汤

显祖说遂昌山民很淳朴，他们都会按时回牢狱的。”啊，我像是在听天书！因为在我的脑子里，全是“阶级斗争”，是“专政”，是“对阶级敌人决不手软”。

徐先生问及汤显祖在遂昌当知县时所兴建的射堂、尊经阁、报愿寺、钟楼，书院等古迹留存情况。当年的我，真的一无所知。在散步时，他还告诉我：汤显祖不只是一个剧作家，还是一位好导演。他写的《紫箫记》，词藻很美，但是不宜在舞台扮演。他的朋友帅机批评汤显祖的这个剧本是“此案头之书，非场上之曲”。汤显祖听后，便重新写。终于写出了可以在舞台演出的53出《紫钗记》，即“临川四梦”之一。“临川四梦”是《紫钗记》、《牡丹亭》、《南柯记》和《邯郸记》。又称“玉茗堂四梦”。但徐先生绝对否认汤显祖的《牡丹亭》是他在遂昌时写成的。徐先生说：“只能够说是‘汤显祖在遂昌时酝酿的’”。在学术界，这成了“一家之言”。

凡熟悉徐朔方先生的人都知道：他的“一家之言”，很多很多，自成体系，振聋发聩。如果给换句雅一点的话，可以叫“他很有个性”。

比如，他一炮打响而成其大名的，是1956年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琵琶记》学术讨论。其时，春风得意正33岁的他，在浙江师范学院（今浙江大学西溪校区）执教外国文学。那时他还担任着浙师院中文系外国文学教研室副主任。他以刊发于1956年4月8日《光明日报》的一篇《琵琶记是怎样一个戏曲》而被邀请到北京去参加《琵琶记》学术讨论会。会上，他独成一派，舌战群雄。与之辩论的，都是国内的一代名流，如翦伯赞、田汉、尚钺、李长之、赵景深、陈中凡、王季思、戴不凡、钱南扬……。1956年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琵琶记讨论专刊》（《戏曲》杂志社编），详尽地记录了每一位学者的发言。例如谁打断了谁的话，谁插嘴说了什么话，都有详尽的载记。这次学术讨论会后，徐先生回到杭州，很快地，他就被中文系领导将他从外国文学教研室调入了古典文学教研室——他又跟他的老师夏承焘先生在一室了。并且，他还担任了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的副主任。在大学本科教学中，像徐朔方先生这样既能够执教外国文学，

又能够教古典文学的“两栖动物”，在我国高等教育界，罕见！因此，学生时代的我们，对学贯中西的徐步奎先生很有些崇拜——尽管他当年还只是一名讲师。

著名元曲研究专家温州人王季思教授是徐步奎先生的国文老师。在《琵琶记》学术讨论时，徐先生不同意王季思《琵琶记》研究的某些观点。今读徐先生的论著，他跟王季思先生的学术分歧好像颇多。不仅《琵琶记》研究存有分歧，其《西厢记》研究，也存分歧。此可如徐先生在《论王实甫〈西厢记〉杂剧的创作年代》的《后记》里所写的：“王季思老师逝世已久，我虽还视息人间，但也垂垂老矣。王老师生前对我奖掖有加，而我这篇文章不得不批评他的《西厢记》作者的时代说。这也许可以说是学习他对业师陈中凡先生的批评。现在虽然已经不可能向他请教了，我想他的在天之灵，如同他生前一样包容广大，一定不会认为我是忤逆。”（《徐朔方说戏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72页。）

在古代文献中，明代叶子奇《草木子》卷四、祝允明《猥谈》、徐渭《南词叙录》等，都说南戏起源于温州，称南戏为“温州南戏”或“永嘉南戏”。此说的旁证，可有如众所周知的《琵琶记》作者是瑞安人高则诚；《张协状元》的“占断东瓯盛事”，说明《张协状元》是在温州编成的。但，徐朔方先生绝对不同意将南戏称为“温州南戏”之说。他认为“南戏广泛流传我国南方各省，并不局限于温州一隅。”（详见徐朔方《曲牌联套体戏曲的兴衰概述》一文）

对于中国近代学术奠基人之一王国维（1871—1927），徐朔方先生也敢大胆地向他挑战。至今为止，能有几个学者敢向王国维先生挑战？徐朔方先生是一个。徐先生直言：“王国维说‘真正的戏剧起于宋代’，可是在他的著作中并没有具体落实，他的真实主张是‘论真正之戏曲，不能不从元剧开始也’。这是王国维曲论的一大缺陷。”“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是我国古代戏曲史的奠基之作。……他以大都、平阳、杭州为杂剧发展的三大中心，无视另一更重要的杂剧中心城市开封。”徐朔方先生的戏曲研究，真犹吴熊和教授在挽联中所写的：“一枕沉酣似续临川四梦；百篇芒角直追曲海二

王。”——“二王”指明代戏曲理论家、剧作家王骥德与近代大学者王国维。“芒角”者，棱角也。

对于70后的新一代戏曲研究者的浮浅学术作风，徐朔方先生极其憎恶鄙夷。同样地，他也“很有个性”。如《再答程芸博士对我汤显祖研究的批评》一文，他写道：“去年，我在大连《外语与外语教学》杂志发表《答程芸博士对我汤显祖研究的批评》时，到此为止，没有再分析下去。现在才知道自己错了，不能寄希望于对方的自知之明。……程芸同志不相信古人的论述，而文章也不能不写，于是就只得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主观能量，写下洋洋大观的两次‘推论’，其勇可嘉。但是，对于问题的实质，我们不得不有所保留。”此时徐老已年近八十，他依然锋芒毕露。（按：程芸，男，1972年生。江西省景德镇人。武汉大学艺术学系副教授。）

徐先生学殖深厚，兼职的头衔很多。如：国家古籍整理领导小组顾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文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高等学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戏曲学会副会长、顾问、中国明代文学研究会顾问。为抢救昆剧，1986年10月，浙江昆剧研习社在杭州成立，他还担任了社长。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徐先生多次应邀前往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日本、中国台湾大学和研究机构讲学。

徐先生终身献身学术，学贯中西，识高当代，建树多方，尤以汤显祖研究和元明清小说研究卓然成为大家。（略）

是的，人们一提起汤显祖，就会想起徐朔方；人们一提起徐朔方，就会想起汤显祖。

20世纪80年代，西风东渐，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金瓶梅》的研究，也沐浴着现代化的学术之风。徐朔方先生编的《〈金瓶梅〉论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金瓶梅〉西方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以及他著的《论〈金瓶梅〉的成书及其他》（齐鲁书社，1988），有独特意蕴与不凡的见解。

徐朔方先生还治史。1984年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他的史学论著《史汉论稿》，便是他在那“我的专业在一个无以名之的年代里被

迫中断”，“到后来秦始皇及法家走运之时”，“在斗室里‘偷闲学少年’”，埋头于《史记》与《汉书》，进行比较研究的硕果。

这真是一座立于奎章真境的丰碑啊！他真的是“学贯中西，傍史依经，曲学会归成泰斗；识通今古，说言鸿论，等身著作伟典范。”（台湾大学曾永义教授挽联）

或许，你可能没想到：他是中共党员。1956年，他提交了入党申请；1962年，他又一次提交入党申请，直到1986年，他终于被批准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还是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83）代表、第七届浙江省人大常委。

徐朔方先生的追悼会，是2007年2月27日（正月初十）在杭州举行的。3月8日（正月十九），他的儿子徐礼杨博士代表全家将徐朔方先生的珍贵遗物，包括徐朔方教授生前的部分手稿、证书、著作、照片和实物，无偿捐献给了浙大档案馆。

徐朔方先生的部分遗物，包括他研究汤显祖的著作《汤显祖全集》、《汤显祖年谱》以及他自己珍藏的汤学研究图书资料三百多册，包括一些珍贵的手稿和孤本，按照徐先生生前的遗愿，也已由他的儿子徐礼杨博士代表全家于2007年3月17日（正月二十八）赠送给了设立在浙江遂昌县的“中国戏曲协会汤显祖研究会”。

如今，徐先生走了，而不是跟我一起散步。悲痛啊！

逝者已矣，留给我们的的是哀悼和无穷的思念。

昔日学生的我，祭奠以诗，吟曰：

（一）

文曲光沉去渐遥，此时怅望傍溪桥。
执经请业今何似，长忆龙吟动九皋。

（二）

哲人其萎上云霄，北斗泰山硕德高。
又见钱塘春水涨，飞花还报尽思涛。

徐朔方（步奎）先生，安息吧！

东浦镇之行：徐和雍老师印象侧记

—杭州大学历史系 77 级 黄朴民

杭州大学历史系读本科时，给我们这一级学生讲授“中国近代史”课程的老师，是徐和雍先生。

当时的徐老师，年近 50 岁，中等个子，戴一副深度的近视眼镜，皮肤有些黝黑，全身上下，透露的是一种朴实无华的气质。在课堂上，他的讲话慢声细气，授课的内容也中规中矩，四平八稳，按部就班，有条不紊；杜绝虚饰，不见激情；没有抑扬顿挫的张扬与汹涌，也没有天马行空式的自由发挥；至为平和，唯有质朴。总之，一句话，徐和雍老师他的授课风格，与波澜壮阔的大江大海绝缘。而是那种风平浪静、朴素自然的小河流水，不会给人带来情绪的亢奋，感官的刺激。但却是淡定稳重，真切管用。一如他的外表形象，所谓的“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徐老师这样讲授中国近代史，固然是他个人性格特征的曲折反映，但我觉得这也与这门课程的性质有关。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在“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与研究上，都有不少“禁区”与“戒律”，只能照本宣科，不许别出心裁。到了“十年艰难探索”期间，更是“红线”纵横，“雷区”遍地，成为典型的“重灾区”。我们上学时，刚刚告别“文革”不久，中国近代史领域的“话语体系”并没有完全改变。所以，一说到曾国藩，那就是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刽子手”面目的呼之欲出；一说到李鸿章，那就是签订丧权辱国的“卖国贼”形象的深入人心；一谈及“义和团运动”的伟大意义，那就是“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迷梦”。这一类“政治正确”定性语言的反复强调、不断重复。所以，许多老师在授课时，不免心有余悸，岂敢胆大妄为、“越雷池一步”？唯有亦步亦趋，“依样画葫芦”才是安全的底线。徐老师在这方面，当然也不可能有例外。

尽管如此，当时的政治氛围毕竟开始宽松了。因此，徐和雍老师在课堂上，偶尔也会透露他自己的一些独到而深刻的学术见解。这对

我们这些初学者来说，不啻为重要的启蒙。譬如，他在谈及光复会时，曾指出，光复会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并没有得到很公允的评价。在同盟会中，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三足鼎立。光复会所做的工作，尤其是在联合会党、发动武装起义等方面所作出的贡献，却多少遭到了淡化，并未能客观地反映真实的历史。这与后来把持话语权的同盟会主导势力的排斥与抑制直接有关。换句话说，革命党在推翻清王朝的大目标上一致。但是，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而有江湖，则难免有人事上的纠葛和矛盾，免不了争权夺利，党同伐异。同盟会中占主流的是兴中会系统，对不完全听从命令、坚持独立性的光复会，自然要打入“另册”。于是，上海光复后，出现了两个沪督（陈其美、李同燮），后期光复会的栋梁陶成章，终于被暗杀。而在居正等人撰写的辛亥革命史书中，光复会不是所谓的“正统”。它的历史功绩，于是乎，就很不幸地隐没不彰，基本上被边缘化了。

徐老师的这类看法，在今天看来，也谈不上惊世骇俗。但是，在当时，他带给我们这些初学者的，则是一场头脑“风暴”令人惊诧，令人震撼！可以说，这逐渐帮助我们建立起对既有历史“书写”范式秉持“质疑”的态度与意识，懂得了真实历史背后原来存在着巨大的复杂性。终于能够明白，作为历史学从业者，应当拥有不满足于现有历史叙述系统所提供的历史事实及其诠释结论的必要性。

由于时间久远，我是怎么同徐和雍老师建立师生之间的个人联系？其中具体的细节已难以回忆起来了。不过，当时我的确经常去他府上求教请益，这应该是事实。可以不夸张地讲，大学本科期间，我去他家里叨扰的次数，应该是在20次以上。也许是他比较欣赏我的勤奋与努力吧。所以，他从来不以我的唐突造访与冒昧打扰为忤，而总是很热情地接待我，并将他手头唯一的一套《中国近代史参考资料》（龚书铎主编，上下两册）相赠，以示鼓励！尽管我后来兴趣主要集中在中国古代史的前半段，与中国近代史的学习与研究渐行渐远。但这套书，我始终视为十分珍贵的礼物，一直置放在我书柜中的醒目位置上。

当然，我记忆深处印象最为深刻的一件事情，是陪同徐和雍先生和师母黄碧华老师（时在杭州大学宣传部工作，后来曾任学校人事处副

处长) 前往绍兴东浦镇的一次调研活动。当时，安徽教育出版社计划出版一些与安徽历史有关的人物传记小册子。在这些人物中，包含有徐锡麟。因为徐锡麟虽是浙江绍兴人，但其一生中最为可歌可泣的事迹，乃是在安徽发动起义，刺杀安徽巡抚恩铭，为推翻清王朝的统治而英勇献身！缘此之故，徐锡麟传记的撰写，被该社列入了出版计划。而徐和雍老师，则被出版社方面约请为此书的作者。

1981年的暑假期间，在绍兴家里度假的我收到了徐老师的一封来信。信中告知我，他和黄碧华老师准备专程到绍兴一次，计划到徐锡麟故乡——绍兴的东浦镇进行实地考察，以了解徐锡麟早年的生活环境与具体经历。他在信中希望我帮助他们做两件事情：一是在绍兴城关镇的招待所预订一个他们在绍兴期间住宿的一个房间，二是希望如果我届时有时间，最好能陪同他们一起到东浦镇。因为他们要访问的一些当地老人不会讲普通话，而他们则听不懂一些绍兴当地的土话，必要时，我可以起“翻译”沟通的作用。“有弟子执其劳”，这个道理我自然懂得。于是就复函表示，欢迎老师和师母光临，一切秉承老师之命做好相关准备。

徐老师与师母如期乘坐火车抵达绍兴。我前往车站迎接，将他们送到预订的位于绍兴城关镇人民路上的县委第三招待所，在旁协助办理好相关的入住手续。次日早晨，我扯着公鸡尾巴起床，到他们的下榻之处与他们会合。陪同他们到城北桥的绍兴航运公司码头，一起乘坐小火轮，前往东浦镇。一个小时后，抵达东浦镇(今天坐汽车，至多15分钟即可到达)。

顾不得旅途劳顿，徐老师夫妇和我即穿过东浦镇的沿河主街，来到了徐锡麟的故居。绍兴名人如“过江之鲫”，徐锡麟的故居在文物保护的名单上根本排不上号。所以，早已颓败倾废为普通的民居，但规模尚在。徐老师夫妇前前后后进行了仔细的观察，并向当时居住在那里的老人询问了一些情况。徐老师的此举，貌似多余。但是，其实是有深意存焉。即，通过现场考察，进一步明确了徐锡麟的家境在当时是很不错的。他积极投身革命，绝不是为了经济上的翻身(他后来能捐得出一大笔钱，弄个厅局级的候补道台头衔，可见其家庭的富

足），而是出于爱国爱民的一片丹忱，是为了实现其矢志不移的政治理念。

参观了徐锡麟的故居之后，我们就辗转去了镇上的“热诚小学”。这所小学的前身，就是徐锡麟本人1904年亲自创办的“热诚学堂”。他当年创办该学堂的宗旨，很显然，是希望推广新式教学，提高家乡民众的文明素质与文化觉悟。这是徐锡麟整个革命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在那里，好不容易寻找到现在学校的一位管理者。通过他来了解当下该学校有关“热诚学堂”的历史介绍，追溯当年徐锡麟从事热诚学堂办学的定位与课程设置，从而从一个侧面认知徐锡麟的教育理念与实践。

在东浦镇街上小餐馆简单用过午餐后，我们通过我的一个朋友找到一个曾经在镇上任过小吏的先生。由他召集了5、6位老人，一起进行了一次座谈。在座谈会上，徐老师夫妇请他们介绍他们所知道的有关徐锡麟在东浦镇生活与学习的传说或故事，以便具体地了解徐锡麟的青少年时代。毫无疑问，徐锡麟对他们而言，是陌生的，隔膜的。所以，老人们的回忆非常零碎，只言片语，真伪混杂，可信度似乎并不怎么高，没有多大的史学研究价值。但是，徐老师夫妇依然听得很认真，很专注，并全神贯注做了笔记。

在归途的轮船上，徐老师和黄老师的兴致都很高，跟我说：东浦之行，虽然所收获的“硬货”并不多，但是，还是很有意义的。这些口述史料，可以参考和印证相关的文献记载。这样，他记叙徐锡麟的家世与青少年时期的事迹，心里就比较有底气了。

东浦之行的次日，徐老师伉俪还仔细参观了胜利路上的大通学堂旧址和和畅堂秋瑾故居。傍晚时分，则采访了时在绍兴第二医院工作的徐锡麟孙女徐乃英女士。不过，徐乃英对乃祖的事迹谈不出太多的实质性内容，徐老师伉俪稍稍有点失望和落寞，但是还是对徐女士的帮助，表达了衷心的感谢！这些活动，我都陪伴在侧，见证了徐和雍老师待人接物的诚挚与治学问道的专致。

如前所述，徐老师撰写的《徐锡麟》一书，只是一本不到十万字的小册子，是通俗型的历史普及著作。其中，有关徐锡麟家庭背景和

早年生活经历的文字，至多，也就两、三千字而已。他完全可以根据现存的史料，做个简单的叙述，就可以交差。可是，就为了这千余字的铺垫性内容，他不辞辛劳，冒着暑热，专程从杭州来绍兴（请注意，当时可没有高铁与动车，绍兴与杭州之间，每天也就一趟快车，二趟慢车），到东浦镇实地调研考察。这种治学上的严谨与认真，难道不是难能可贵，令人肃然起敬？

更让人钦佩的是，当时并没有课题这一说，出版社也不给作者任何撰稿补贴。徐和雍老师伉俪到绍兴调研的费用，如车资、住宿费、餐费等等，花费的都是他们自己的钱。而且为了向采访者表达谢意，他们还准备了小礼品。这方面的花费，也是掏自己的腰包。而当时的稿费，又低得可怜，大概也是千字 8 元左右吧。在这种情况下，徐老师夫妇不计成本，为写好一本在不少人眼里算不得是冠冕堂皇学术专著的小册子，而舍得拿出自己并不富裕的工资投入于研究，这在今天很多人那里，是无法想象的，恐怕会视这种做法为不合时宜。

其实，徐和雍老师的较真，才是学者风骨的真正体现。他的所作所为，恰恰映照出当下所谓学术研究的浮躁与浅薄。当连基本典籍都懒得覆按，动辄到度娘上寻觅资料。这意味着，我们所失去的，乃是对学术起码的敬畏之心，而仅仅留下了那可怜的功利之心。从这个意义上说，徐和雍老师伉俪四十年前的绍兴东浦之行，对我来说，永远是一面镜子，一个警示。当我有所懈怠，想偷懒取巧时，眼前总会浮现当年东浦镇上他们的身影。于是，我惕然警惧，沉下心来，做好手头的事情。

返回目录

忆系主任陈嗣虞先生二三事

—杭州大学化学系 62 级 孔大元

我是一九六二年九月考进杭大化学系的（当年招收两个班共五十人）。记得我们新生入学后不久，系主任陈先生向大家介绍化学系概况，说化学系设有无机化学、分析化学、有机化学、高分子化学四个专业，拥有众多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言辞中透出对本系的熟稔于心和对新生的谆谆教导。听了陈先生的一番介绍，当时我们新生的脑海中觉得化学系真不简单，能进化学系读书是人生中十分正确的选择。

听上几届同学讲，陈先生是从老浙大调过来的，对杭大化学系的建制花了好多心血。据说当时省委江华书记对杭大十分重视，要求杭大办成综合性大学，提出杭大要向北京大学看齐。于是从一九六一年九月开始，杭大化学系与数学、物理、中文、教育等系均由四年制改为五年制。因而，我们一九六二年招收的新生是化学系的第二批五年制学生。在陈主任主持下，我们一九六二年进校新生的教科书均采用北大化学系新生的教材。记得，当年有机化学教程是北大邢其毅教授编写的呢。

当时化学系有一个规定：每隔四周要集会一次。全系四个年级约二百多学子集合在一起，聆听系主任陈先生讲话。此时，只见一位瘦瘦的、个子中等、戴一副眼镜的慈祥老人用洪亮的声音对大家说：

“我是你们的父亲。你们都是我的儿子、女儿。父亲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好。我希望你们好好读书。书读的好不好，百分之百由你们自己决定。不像谈恋爱，只有百分之五十是自己的。”“星期天，你们也要拿出半天来看书，哪有读书人不看书的道理。”

陈先生治学严谨，当年化学系规定，家住杭州市区的学生不许走读，一律住校，只有星期天才可请假回家。而且还有一个附加条件：不能有补考。另一个规定更为严厉：凡学生补考，补考的考题比原先大考的题目还要难一些。其理由是：你已经考过一次了。如果考试成

绩得 59 分，总评时也不能评为及格。一学年中，有两门主课为不及格者，即宣布留级。那时，我们班就有两位同学留级。当时，在陈先生主持下的杭大化学系的教育质量在全国高校中也算是比较高的。记得，文革前的一九六五年，杭大化学系还招收了一位从厦门大学化学系毕业的女研究生。当然，也有数位化学系毕业的学子被其他大学录取为研究生。

[返回目录](#)

良师余式厚

—杭州大学经济系 78 级 罗卫东



余式厚老师（1938-2022）

2022年3月7日，余式厚老师的生命交响曲戛然而止，定格在了84岁。余老师属虎，那年是他的本命年！

不到两个月前，我曾在浙大城市学院北校区行政楼的电梯里见到他，和他聊了几句。万没想到，那次见面竟是永诀！那时的他，虽然行动不便，需要拐杖助力才能行走，但整个人气色不错，红光满面，精神饱满。我以为，像他这样达观而不知老之将至的人，应该会活很

长的。然而，前天下午，传来了他突发心梗猝逝的噩耗！这个愿望瞬间破灭了。

余老师逝世的消息在微信朋友圈瞬间刷屏。同学群里那些缅怀和悼念的文字，也勾起了我的很多回忆。很久以前，他给我上课的情形也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了脑海。

1978年，我刚读大一。由于年龄太小，心智还未完全成熟到适合去听那些高头讲章的理论课，每当上这些课的时候，我总是躲在大个子同学身后看自己感兴趣的书。只有两门课，我是一直抢座在大教室的前排聚精会神认真地听讲的：一门是毛昭晰先生的《世界史》，另一门就是余式厚老师的《形式逻辑》。毛先生毕业于国立浙江大学，当时应该五十多岁了，出身名门，是一个知识底蕴深厚、表达能力极强的名师。他的课旁征博引、比喻丰富，引人入胜，同学们很喜欢。余式厚老师的资历和在学界的名望自然无法与毛先生相提并论，但他的逻辑课受同学欢迎的程度则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一年，他刚到四十岁。或许是生活清苦，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老几岁。天天穿着蓝布中山装，感觉从来也不换的。头发又细又软又长，被风吹起来，飘扬在空中。他吸烟，烟瘾也不小，老远就可以闻到他身上的烟味。几个班合上课的大教室，他一进门带起的风里，都是二手烟和焦油的混合气味。

形式逻辑，按说是极为理性和冷静的“客观知识”，一般老师大概会像上算术课那样讲逻辑。余老师则与众不同。他太热爱逻辑学了。在他看来，一个人如果不懂逻辑，那简直就无法过上正常的生活。他是抱着一腔爱心来传播逻辑理念的。他也太爱学生了，生怕学生将来因不懂逻辑而事业受挫。现在想来，他其实是把逻辑课当作人生课来讲了，苦口婆心，谆谆教诲。在他课堂上的学生，无论是否热爱逻辑，学习的兴趣都会被余老师的激情所点燃。

激情洋溢的余老师，在课堂上的表现是完全沉浸式的。讲到投入处，啼之笑之，舞之蹈之。兴之所至，得意忘形，甚而至于得意忘言。他声如洪钟，但嗓似破锣，代表性的口头禅是：“你错了，你完全错了！”这句话，从他嘴里说出来带有特别的韵味。第一个“你错了”，

语气斩钉截铁，配合咄咄逼人的眼神，毫无质疑的余地。第二句话，“完全”两个字中间有一个稍上扬的拖音，并且佐以暗自得意的狡黠表情。这个余式特征十分出名，历届学生都传为美谈，而且也常常在彼此论辩的时候加以应用。

余老师上课，还有一个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细节是，每当他说完一句话，一时接不上另外一句的时候，必然会发出很大的“啊！啊！”声，简直就像是唐老鸭在清嗓子。这时候，仿佛胸腔也被动员起来，发出奇怪的咕噜声。右手在胸前使劲地画着圈比划，仿佛胸口被一大团东西堵住了。非如此使劲不能把它们掏出来似的。直到他找到如意的表达，这一切才结束，同学们也跟着松了一口气。如果是今天，他上课时各种肢体语言和表情被制成表情包，肯定会很流行。他上课的时候，完全陶醉在逻辑原理及其有趣的应用场景中。那种自足与快乐无疑会感染到学生们。

如果我没记错，当时好像没有使用正式出版的教材，用的是一本油印讲义，大16开。老式打字机把文字打在蜡纸上再誊印到粗糙的纸张，装订成册，厚厚的一本。这本讲义是不是余老师自己编写的，我不知道。反正大概只是期末考试的时候才完整地看了一遍，平时基本上就是上课带着做道具的。余老师除了讲排中律、重言命题、三段论、演绎推理、归纳推理、悖论这些概念的时候，让大家看看讲义，其他时间都是借故事讲逻辑。他善用民间故事、用有趣的民间故事讲解逻辑学的道理，这是他的一绝。阿凡提各种智斗花式反怼巴依老爷，是余老师最爱举的例子。因为它象征着逻辑学的道理超越文化、无远弗届，用形式逻辑武装起来的人在论辩说理时具有战无不胜的智慧力量。有时候，黑板前的余老师，让我觉得就是阿凡提的化身。或者，历史上的那个阿凡提，就是穿着维族男子条纹长袍，头戴小白帽，骑着毛驴的余式厚。刘三姐用山歌智斗莫老爷这件事，余老师也用逻辑学前前后后分析了一遍，让我们觉得很新鲜，很有意思。作为升斗小民的张三李四王二麻子，也都被建构起很多的逻辑学故事。身边的逻辑学、趣味的逻辑学、应用的逻辑学，被余老师阐释得妙趣横生、淋漓尽致。一堂课下来，同学们现学现卖、活学活用，彼此挑对方语言

中的逻辑矛盾。吃饭时、散步时、卧谈时，简直到了无时不在无处不在运用逻辑的地步。

余老师的课，让我知道，一个好老师，普通话是否说得标准，是全然不重要的。有时，普通话不标准反而会平添许多课堂的趣味，增进教学效果。在大学阶段，教过我的好老师中，十有八九都是土普混杂、乡音浓郁的。那些字正腔圆，普通话水平直逼播音员的老师，教学效果反倒一般。余老师是温州人，说着生脆的温州普通话。刚听时，不太适应；时间长了，又颇觉有味。有时候，他为了适应学生的要求，使劲地让自己尽量说得标准一些，反而听上去怪怪的。不如那一口正宗的温普话听着顺耳、亲切。记得有一次，他讲逻辑不能逆推，举了花是红的，红的未必是花这个例子。余老师突然说了一句：“发儿啊，为什么灰样红。”同学们都莫名其妙。他原来是借了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男主角阿米尔对着心爱的姑娘真古兰丹姆表达爱情的那首主题歌“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等大家明白过来，全教室都笑作一团了。这时，余老师会略带尴尬地说：“余老师的普通发不均的啦”。话音未落，教室里又笑成一片。温州话，和福建话一样，H、F 的发音是完全倒过来的：H 说成 F，F 说成 H。

余老师“没大没小”，倒不是说他不尊敬领导和老师，而是在学生面前毫无架子，一点“师道尊严”的谱都不摆。和他在一起，完全不必拘谨。我们那一届的学生普遍年龄偏大。他和学生称兄道弟，勾肩搭背是常有的事。那时候，教师收入总体很低，而余老师既无资历，也无啥头衔，就更是只有一点级别很低的死工资了。但他对学生十分热情慷慨，乐意邀请大家去做客。给我们上课的时候，恰逢他中年得子，喜出望外，买了很多糖果到教室里分发，大家开心得不得了。后来，他的经济状况不断改善以后，据说经常请穷学生下馆子改善伙食。

余老师与人为善，考试给分很人性化，没听说有学生在他的课上挂科的。这并不意味着他放水，而是他有自己的教育理念。在他看来，大多数同学只要认真听课了，对逻辑的重要性有自觉认识了，基本的逻辑知识掌握了，日常应用的能力初步具备了，这堂课的目的就达到

了。按照这样的理念阅卷判分，我们班绝大多数同学的逻辑课得分都在良好以上，只有个别同学得到极高分和极低分。

余老师，到退休了还是一个副教授。若按时下流行的成功标准，他这一生混得很不怎么样。他出过几本书，也写过一些文章。不过，这些东西于评职称而言，是无济于事的。原本它们就不是为了升职称而写的。余老师的写作只为了一个目的：向大众普及逻辑学知识。那本很受读者欢迎的《趣味逻辑学》，被学术界当作不过是一般的科普作品。当下的大学，科研能手扎堆、学术尖兵云集，高水平科研立项和论文发表已经成为学校排名的指挥棒，教师职称晋升的硬杠杠。像余老师这样心无旁骛，倾情教学，但科研业绩平平的人，幸亏退休得早，否则恐怕连副教授也评不上。

我想，一个老师是不是名师，不能单看他头上有多少帽子、多大头衔，学生心里自有一杆秤。可是，如果我们真要坚守教育初心，回归大学正业，最需要的还是余式厚这样的良师。

不是什么大牌教授，却是学生心目中的良师；不是什么学科领袖，但刚去世就触发了铺天盖地的缅怀和思念之情。我敢肯定，余老师所享有的尊重和爱戴是远远超过了很多大名鼎鼎的教授博导的。

余老师在天之灵应该为自己的一生感到欣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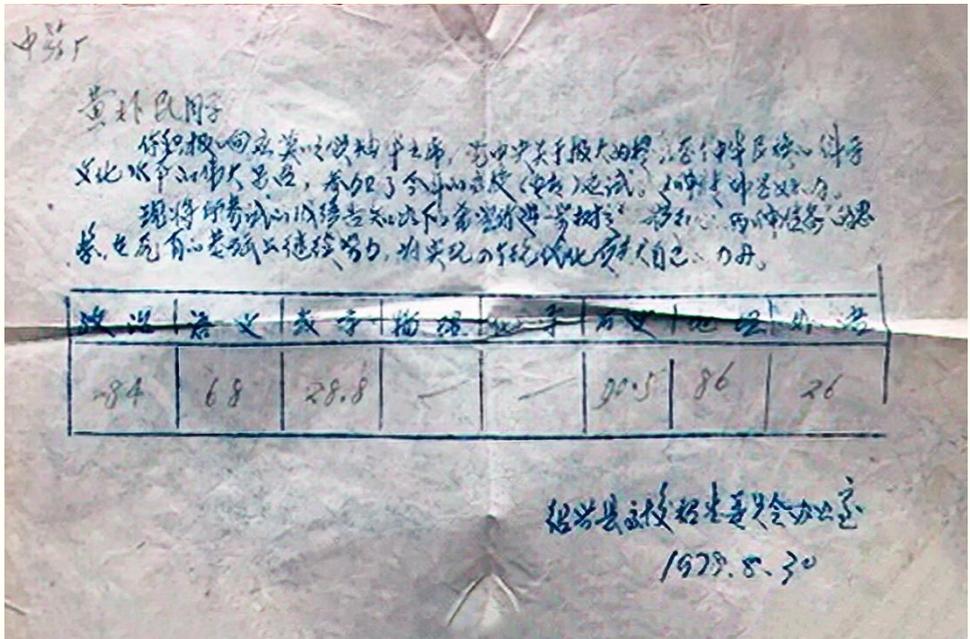
[返回目录](#)

黎子耀教授学述

—杭州大学历史系 78 级 黄朴民

1978 年，我以同等学历的身份，五门科目总分 357.3 分的成绩考入杭州大学历史系。

1982 年，也即我大学毕业的当年，我考上了杭州大学历史系的硕士研究生，业师是黎子耀教授，专业方向为先秦史。从此我算是混入了研究生的行列，这也可以说是我比较规范治学的开始。



（高考成绩单）

附件七

一九八二年攻读硕士学位
研究生准考证

编号 杭大822403

姓名 董朴民

工作单位 杭州大学

报考第一志愿单位 杭州大学

报考学科、专业 历史系中国古代史系文献研究

研究方向 先秦文献研究

考试地点 浙江 省(市) 杭州 地区 杭大研招 市

注：需凭工作单位介绍信才能参加考试的由招生单位在此证正面右上方加盖“补交证件”的



(研究生准考证)

黎子耀教授，湖南汉寿县人(当年关羽受封的亭侯位置，就在此地，故称曰“汉寿亭侯”，侯中最低的“亭”一级)，1907年3月生。据先生的自述称云：他幼年时读私塾多年。稍长，赴常德入湖南第二师范附小，接受新式教育，学名明浩。1923年，入长沙明德中学，得以在诗文方面，受教于刘永济、吴芳吉、苏雪林等名师硕学。1927年考入武汉大学历史系。之后，曾因身体方面的原因，辍学数年。至1935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史学系。先后任教于苏州女师和贵阳女中。著名女高音歌唱家、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张权先生即系其在苏州女师任教期间的学生(一次去先生家听课，是日，先生兴致颇高，让我品尝当时还算是

稀罕之物的比利时巧克力，并告诉我，这是他的老学生张权寄赠的。我这个人涉猎芜杂，就问先生，是那位歌唱家张权？先生答道：就是她。她是我在苏州女子师范教书时的学生。1941年起，任浙江大学史地系讲师、副教授。其间，与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文史专家缪钺诸位先生相友善（这方面的史实掌故，葛剑雄教授《悠悠长水》、方兆辰教授《缪钺先生回忆》等纪念其老师的文字中皆有提及），并给时为浙江大学一年级学生的李政道“中国通史”课程考试100分的成绩，成为当年浙江大学教育史上的一个佳话。1949年后，历任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教授。

大学时期，子耀师受教于著名历史学家、系主任李剑农教授，对中国经济史甚感兴趣。1937年，因国难由苏州回湘，家居一年。期间，在其大学毕业论文的基础上，撰成《补后汉书食货志》。其上卷于1943年发表于《国立浙江大学文学院集刊》，同时发表于浙大史地系主任张其昀先生主编的《思想与时代》杂志。《国立浙江大学文学院



（中间为子耀师）

集刊》因战乱绵延之故而未能续出，故下卷始终未曾公开刊布。这实为一大憾事。1985年5月23日，子耀师让人给我捎来他的一封亲笔信。上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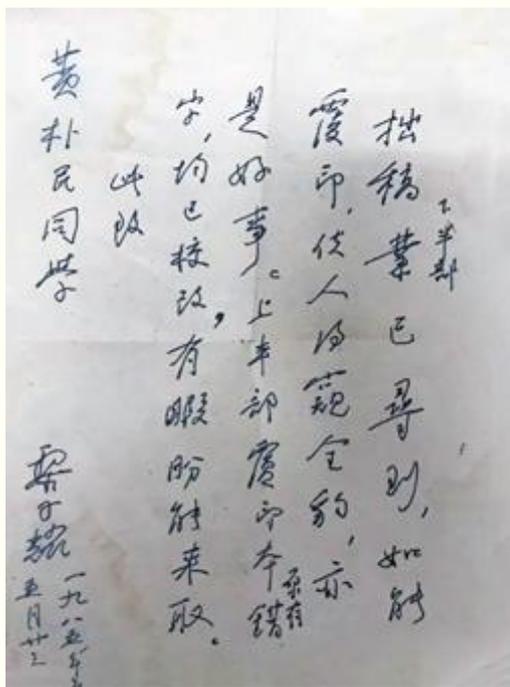
拙稿下半部业已寻到，如能复印，使人得窥全豹，亦是好事。上半部复印本原有错字，均已校改，有暇盼能来取。

此致 黄朴民同学

黎子耀 一九八五.五月廿三。

可能是我当天要动身前往济南参加山东大学历史系的博士生入学考试，这封信我没有能及时收到和阅读。考试结束返回杭州后，此信杂放在一大堆书信文件中也未能发现。许多年后，整理自己的图书信函时才读到，那时已是时过境迁了。总之，我平生所铸的大错之一，是未能够将先生的这部文稿复印保存下来，辜负了先生的信任和嘱托。至今，依然愧疚惶恐，追悔莫及。

依旧是根据子耀师的自述，可知他在浙大任教期间，阅读正史，上起汉魏，下及南北朝。并辑录刘知几《史通》对各体史籍的评论。关于刘知几在学术上的贡献，他曾撰著有《刘知几思想述评》一文（载《思想与时代》月刊第卅期，1944年）。此文从四个方面概括了刘氏《史通》一书的主要内容：1、论史籍的体裁；2、论作史的方法；3、论史家的修养；4、论读史的鉴别。此外，还指出刘氏的治学精神：“谨守求真之义，甘冒犯侮之嫌，”认为这种境界难能可贵，有利于学术思想的发展。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刘氏又早在韩愈提倡



(子耀师亲笔信)

古文运动之前，已经提出文体改革的主张。这也是世之论文学源流者所不可不知的。

子耀师的《史通》研究，为其后来在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讲授中国史学史，不啻作了充分的准备工作。他所讲授的内容，其范围上起古代、下及现代，意在使同学们对中国史学史发展的整个过程得到一个轮廓，有一条清晰的主线，对中国史学史的主要特征有基本的认知。他曾对听课的同学们说：“我没有钱给大家，所给的只是一根钱串子，以便将来自己寻找钱。”

这门课程，子耀师曾先后讲了许多遍，还准备据此着手编写一部中国史学史，但这良好的初衷，因“文革”十年动乱而被迫中辍。已完稿者，仅及南北朝而止。魏晋南北朝史学一章中，他曾挑选几节发表在《杭州大学学报》一刊上。计为：《史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新地位》（1979年第三期），《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编纂学》（1981年第一期），《魏晋南北朝史学的旁支——地记与谱学》（1982年第二期）。最后一篇中探讨了中国地方志的起源与家谱学发达的原因，自有见解，不乏创获。同时，这三篇论文也可以解为何《汉书·艺文志》的图书“六分法”会逐渐演变为《隋书·经籍志》的图书“四分法”之惑，明白史部“异军突起”，独立成为典籍中的一大类，且地位超迈“子部”与“集部”之缘由。其中的症结与谜底，实当从魏晋南北朝门阀制度的历史大背景中去寻觅。正是因为方志、族谱、家谱的高度发达，使史著的数量激增与膨胀，汗牛充栋，浩如烟海。而这一现象的发生，与当时的政治分裂，门阀兴盛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这必然会在当时的图书分类，学术兴替上得以具体生动的反映。从这个意义上讲，魏晋南北朝时期，无疑是中国古代学术生态发生巨变的一大枢机。

子耀师著史之志，虽未得酬，但是在育才方面却是有收获的。他所指导的学生与助手，继续他的事业，克绍箕裘，勇猛精进，以十年之功，终于写成了一部《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约五十万言，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付梓出版，颇得读者的好评，成为治史学史者案头必备的参考书。

宋史研究，是民国年间的浙江大学、解放后的杭州大学历史学研究的一大特色。子耀师他同样要受这个大氛围的寝染。1965年，他研究李心传的史学，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辑录李氏对熊克《中兴小历》的评语共五百余条，分为十类，编为《中兴小历李氏考异类辑》，计十万字。此书之辑，便于考订熊书。四库馆臣辑熊书时，误认此为完本，其实残缺颇多。仅就《系年要录》援引到的《小历》文字来看，熊氏原有而今本无者，多至七十八处。这样，子耀师就通过对一个具体的个案分析，获得了自己的学术判断，即清代四库馆臣的话，并不足以完全置信。

此稿辑成之后，子耀师进而希望写出《〈系年要录〉引用史料目录》和《〈系年要录〉引用史籍叙录》。他又想到李氏对《日历》和其他史籍的利用和考订，亦可分别辑录，加以整理。在当时的原始史料中，《日历》是权威性的。但从《系年要录》的考证来看，《日历》也并非是可以依据的。李氏利用《日历》之处固然很多，驳正它的也不少。这样，就值得将李氏对《日历》取舍两方面的资料汇集起来，成为一编。又如：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所利用的史籍，大都为李氏所利用。这些史籍的资料为《北盟会编》所引用。而李氏在《系年要录》又有所考订者，为数不少，可以编成一部《〈三朝北盟会编〉李氏考异》。又如：《系年要录》中对王明清《挥麈录》，既多采用，又多驳正，也可以汇集成帙。由于时局的影响，使他的这些设想都无从实现。后来他的研究兴趣便逐渐转移到经学方面了。

传说，文王困而演《易》。子耀师则困而读《易》。他自己认为：以前读《易》，不知所云。学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之后，再重读《易经》，遂发现《易经》原来是一部西周社会史。更具体地说，它是一部西周社会对立冲突史。他将《易经》内容分为十类，加以注释。注本初稿曾请著名先秦文献专家、杭州大学中文系原主任王驾吾（焕镛）教授审定。王氏习《易》，向来不出汉、宋两派。但是，对子耀师的观点都颇为推重，赞许说：“凿破鸿蒙，自成一说，为读《易》者开辟一条崭新的道路。就奴隶社会阶级斗争来说，有凭有据，

信非唯心逞臆之谈。《易》无达占，故《易》注较他经为多，然尚无如尊兄所说者，盖得助于马列主义为多也。”

不过，在今天看来，子耀师如此解释《周易》，不免有点求之过深。这也是受当时流风的影响所及，打上了浓厚的时代烙印。回想我自己上世纪80年代初发表的几篇论文，同样是动辄引用“经典作家”的语录撑场面。杭州大学历史系的81届——也即“文革”后首届研究生中，有一位研究“圩田”问题。一开始，论文在导师那里就通不过。原因无他，就是不曾引用“经典作家”的论述。后来总算找来毛泽东“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一语，才得以提交答辩。今天说来，真有恍如隔世之感。

另外，先生用这样的主流语言来表述，也是非正常年代政治冲击的后遗症所致。那种恐怖，那种迫害，给他心里留下的阴影乃是一辈子也无法消除的。说些冠冕堂皇的套话，显示政治正确，是当时所有教师借以自我保护的唯一选择。我朋友潘先生手头有一本浙江师范学院整风办公室编的《批判集：历史系教学检查资料选编》，编辑的时间是1958年9月。很显然，这是当时全国高校“拔白旗”运动的产物。子耀师在集中被树为一号批判对象。那些批判文字都杀气腾腾，看着标题就能令人魂飞魄散、心惊肉跳；罗列的罪名都是可以把人打入十八层地狱的：反动的“英雄”与“群氓”思想；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决定历史发展”的观点；美化古代的统治者，歪曲今天的政治现实；“厚古薄今”的反动本质。到了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子耀师他依然是历史系受冲击、被批判的第一个靶子。据《夏承焘日记》记载，“文革”刚开始，杭州大学首先被批判示众的，就是夏承焘（被胡乔木誉为“一代词宗”）、陈建功（与苏步青齐名的数学家，杭州大学副校长、一级教授）、黎子耀师等人：“[六月四日]晴。晨往校看大字报，震动不小，中文系集中火力对我，数学系对陈建功，历史系对黎子耀，化学系对陈嗣虞。”这样的老是被“运动”，子耀师自然是心有余悸，心态上难免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久而久之，就习惯于拿“历史唯物主义”做“免死金牌”，但

求自保了。对先生的处境和反应，我做学生的，是完全能够予以“同情之理解”的。

关于《易经》的哲学思想，子耀师首先断言八卦中包含阴阳五行思想。写了《阴阳五行思想与〈周易〉》一文（载《杭州大学学报》1979年第1-2期）。几年以后，他发现乾坤两卦的内容，就是阴阳五行思想的具体化。乾卦讲论天道，即太阳的运行规律；坤卦讲论地道，即月亮的运行规律。日月运行，乃有宇宙，故《系辞传》说：“乾坤其易之缊邪，乾坤成列而‘易’在乎其中矣。”

关于《易经》的写作方法，子耀师首先提出《易经》是一部谜语集。它以象征文学的手法反映西周社会的阶级矛盾。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系辞传》引），正是这种写作方法的特点。

子耀师的《易》注，历时十年，稿凡三易。最后又以焦氏《易林》作为旁证解经，丰富了注文的内容。稿本定名为《周易秘义》。著名《周易》研究专家、《周易》“尚氏学”传人黄寿祺教授，《老残游记》后人、福建师范大学刘蕙孙教授，对子耀师的易学观点，亦多有肯定，认为自成一家之言，足资启迪。

子耀师认为儒家经典，多用隐语，以《易》、《诗》为尤著。先秦注经，亦以隐语释隐语，《彖辞》、《象辞》是如此，《毛传》释《诗》亦复如此。这种注经的传统，至汉魏之际而中断。因此他深有感慨地说：“王注行而《易》义失，郑笺作而《诗》义亡。”

对经学中的其他经典，子耀师同样有精湛的研究。如关于《诗经》，他写了《〈诗经清庙之什〉中所见西周礼制考》（载入《西周史研究》陕西社会科学院编）。文中一方面指出《诗经》中包含阴阳五行思想，另一方面叙述了阴阳五行思想影响下先秦吉礼的源流。又如，关于《尚书》的研究，他写了《〈洛诰解〉献疑》一文（载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编《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第一集）。

在他生命最后阶段，他克服白内障眼病带来无法看书写字的困扰，凭惊人的记忆力，致力于先秦经典文献的研究。考镜源流，辨章学术，发凡甄微，烛隐抉原，提玄钩要。在其早年弟子魏得良教授的全力协助下，先后撰著和出版《周易秘义》（浙江人民出版社）、《老子秘

义》（三秦出版社）、《周易导读》（巴蜀书社）、《论语秘义》（陕西人民出版社）、《周易黎氏学》（陕西人民出版社）等著作。其学术成果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和推重，其本人也以著名易学专家在学术史上享有一席之地。

子耀师从撰写《后汉书·食货志补》为自己学术研究的起点，突出反映了他考镜源流、钩沉史实，注重实证的雄厚功力；中年后，转入史学史与政治史、制度文化史的研究与教学；晚年则从事以《周易》为先秦思想文化史的探讨，系统形成以“《周易》黎氏学”为标志的学术思想体系。这三个阶段以及其中的转折，实际上体现了子耀师他本人在治学上的显著特点与高明境界：早年治经济史，注重材料的搜集与甄别，不容许有半点偷懒和马虎，可见其宗旨在于求其“实”；中年治史学史，说明到这一步，已不能局囿于某个单纯的问题，而应该放开视野，长时段，多维度，整体性审视历史的演变，综合性加以融会贯通。由此可见，该阶段治学的宗旨在于求其“通”；晚年治经学，到了此时，就必须建立起自己的学术体系了，形成自己的系统观点和方法论了，在某个或某几个问题的讨论上，为深化历史学的研究做出自己或大或小的贡献了。这表明该阶段的治学宗旨在于求其“理”。这本身就是一个合乎逻辑的研究境界的递嬗历程，是科学理性地走向治学自由世界的通途。尽管历史研究者在具体学术路数上各有不同，但是，求实求真，会通识变，明理致用当是共同的研究宗旨与价值取向。

与学术贡献相比，子耀师的人格修养与思想境界则更堪称楷模，令人高山仰止！他爱惜人才，奖掖后进，可谓不遗余力，乐此不疲。而对个人的名利地位却毫不萦怀、视若浮云。他是1942年的浙江大学副教授，高教4级。这一当，可就是整整37年，1979年才出任教授。在今天人们看来，这几乎是难以置信的事情，可是，子耀师却从容坦然、淡定自若地走了过来。



（左 3 为子耀师）

我在他门下亲炙整整前后三年，离开杭州大学后，也曾无数次庭趋请教求益，但从未见他曾臧否人物、议论时政。他始终认为：学者的本色是治学，超脱一点为好，单纯一点为好；要有豁达的心态，超然的气度，进入陶渊明诗句所倡导的境界：“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但是，这并不等于泯灭是非的界限，出主入奴、阿谀逢迎，而是超越眼前的得失，摆脱俗务的羁绊，坚守自己的原则，维系自己的纯真。为此，他一再提醒我们这些门生要保持独立思考的精神，无论治学还是做人，都不能突破底线。所谓“心之官则思”、“我思故我在”，就是他最为喜欢的格言。弘一法师有偈语言：“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尔忘言。花枝春满，天心月圆。”在我心目中，子耀师已经完全进入了这样优雅的人生理想境界！

子耀师是 2005 年 5 月以 99 岁的高龄驾鹤西去的。他寿届期颐，这当与他旷达的人生态度不无关系。他曾以自己的经历为例子，说明人生有如雪泥鸿爪，充满着各种偶然性。当年抗战胜利，浙大从贵阳回迁，途经武汉，武汉大学的师长、同窗都慰挽他留在母校武大任教。

他说，行李已发往杭州，且自己一直未曾到过杭州，观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美丽西湖乃是自己的一大心愿。于是，就随着浙大大队人马回到杭州。可谁知，这西湖一看，就是整个后半辈子啊！当时，子耀师是微笑着讲述这一切的。我也是微笑着聆听这一切的。但心里却多少浮起一层淡淡的忧愁：人生犹如春梦，应当珍惜拥有！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2022年6月9日）

[返回目录](#)

蒋礼鸿先生的无徵不信

—杭州大学中文系 85 级研究生 黄征

一、蒋礼鸿先生的间接印象

蒋礼鸿先生是郭在贻先生的老师。蒋先生就是当时中文系古汉语古典文献专业教研室的同事，但我们看他完全是隔代长辈，都不好意思直接找蒋先生请教问题，有什么都是请教郭先生。当时，我们对蒋先生的了解也大多是通过郭先生的述说。例如郭先生曾说：“我们是无法和他相比的。”我们当时很惊讶，问为什么？郭先生说：“蒋先生会填词。”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蒋先生在诗词写作上的成就，虽然也看过几首蒋先生写的诗词。近来蒋遂兄把他父母的诗词一首首抄录整理出来，发给我帮助校订，我才惊讶地发现，他们的诗词真的不得了，可以说是和古人在一个水平上的。原以为郭先生只是自谦，但其实蒋先生他们的旧体诗词水平真的很高，有很多很多涉及夫妇唱和的精美作品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

二、蒋礼鸿先生的“精品意识”

到了 1990 年，我脑中一直反复回响着郭先生的话，就考虑还是要读博士。当时就报考了蒋礼鸿先生。其实当年应该有两个人报考了，最后很幸运录取了我。既然要考蒋先生的博士，等于要提高一个层次，就必须要好好读一下他的书。读着读着，发现了蒋先生的学术特点：精品意识，尤其是《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前面五次版本是蒋先生在世的时候亲自修订的。第六版的时候我帮他修订的，但并不是我把我的见解放进去，而是蒋先生第五版有些批注，我把这些批注辑录出来在第六版里增加了进去，书上标注为“六版定本”。

三、蒋礼鸿先生的“无徵不信”

我跟蒋先生读书以后，他给我题了三幅字。这三幅字可以说是对我人生有很大意义的，也比较能够体现杭大精神。

一幅字是“无徵不信”，也可说成“信而有徵”。蒋先生特别写了“徵”。因为“徵”的简化字就是我名字的“征”，长征的征，而这个繁体字的征，是征求意见的征，也有证据的意思。它表示没有证据就不是可靠的。徵就是证据材料，无徵不信，就是说我们讲任何问题都要拿出实事求是的材料。这就是我认为的杭大精神之一。

因为我接触的老先生，无论是中文系的，姜、蒋、郭这些老先生，还是古典文学、外国文学，哪怕是历史系或其他系的，都是按照这个原则来，都是在证据充足的情况下再说话的。当时的老先生很讲究这个。观点可以不同，但是你一定要有证据。无徵不信，是他们当时的信条，不乱讲话，要讲话就是要有证据，所以我认为杭大的精神就是务真求实的精神。

它和浙大的“求是”概念一脉相承，并不冲突。尤其是我们做训诂学的。例如蒋先生做研究的时候，他如果遇到自己理解但又没有证据证明自己观点的字词，就在书后设了个“待质录”。后来我自己做研究时，如果把其中一个解出来了，就会特别高兴。能解出前人解不出的疑难问题，这是我们做学问最大的一种快乐。

所谓“待质录”，指作者当时出书时，因为各种原因，对书本中的一些释义未能找到十足的证明来解释，故统一收集于此，待后人质疑。一般收录在书本的最后。等于说，把疑难问题摆出来，让后面的人来解答。能解出这些问题，其实得益于我们现在的研究条件。蒋先生那个时候看不到原件，但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很多资料，就可以仔细去琢磨一些问题。



“生杖”何物？

我们对敦煌文献广泛浏览后发现，有些内容仅仅通过文字是无法理解的。如蒋先生曾将“生杖”一词留在“待质录”里。按照他当时的理解是：囚禁犯人的刑具。敦煌变文里说，用“生杖”把犯人限制住，但仍旧解释不清楚是什么样子。

后来我在敦煌画卷《十王经》里面看到囚徒脖子上套着一个刑具，不像《水浒传》林冲那样方的，而是一个长条。那个枷分为两半，一半是方的，一半是长的，有一丈长，套在脖子上，想逃跑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忽然有了灵感，顿悟原来这就叫“生杖”。后来我发现资料越来越多，尤其是画卷里面，还有的是两人连在一起。但我也在琢磨，为什么叫“杖”？原来发配的时候，要一路长途跋涉，有些枷力气大的囚犯可能一掰就掰断了，轻松逃跑。但有一个大大长长的，你就不容易弄掉，跑不快。关键是你走路累了，还能像拐杖一样做个支撑。甚至等到官吏处罚你的时候，把你这个一旋转，往后一翻，就可以打到背脊。其实有好多的作用，我这些都找到了证据。我甚至找到了北魏时候一个官员给皇帝的上奏，篇名叫《奏定大枷》。它里面就描写道，通颊木各方五寸，长一丈，用来对付死囚、叛国等死罪之人。有配图，才算把这个词语解释清楚。

这也是无微不信在我身上的一个事例。蒋先生那时候没有找到直接的证据，只是揣测是个刑具。后来我就用图片和文献资料证明了它。

《窦娥冤》里的窦娥戴的叫长枷。长枷也就是生杖。这个既叫大枷也叫长枷，老百姓就叫生杖。后来关于这个典故的文章，曾经在四川大学编论文集的时候准备提交，用邮箱发过去。但发布后，相关图片对方没有收到，所以没能收进集子。后来内蒙古师范大学的《语文月刊》发了邀请要我写篇稿子。我又在电脑里找到了完整的图文，前几年就发在那了。

无微不信，就是信条。蒋先生所有文章都是讲证据的。以前有不明就里的人会说，你们学习中文的有点信口开河，天马行空，很多事靠想象和编造的。

但实际上根本不是，尤其是我们研究语言文字的，没有证据，你根本不能说话。理工科的人经常调侃“你们文科”，但其实文科和理

工科很多地方治学理念是一样的。至少我自己的每一本书，都是靠证据说话的。

我们的书每一条，每一个解释都是靠证据，靠翻书翻字典。大多数数字词考释，我们都是翻书的。有时候为了找一条证据，把书架上的书一本本翻过去，有时要翻一个礼拜，还不一定找得到。

四、蒋礼鸿先生“有所发明”

我们当时能够坚持做学问很不容易的。当时的风气流行的是“下海”之类。可是我们一直坚持做学问，发文章，写书。这有几个方面。一方面，老先生的榜样。他们一生追求真理，踏实做学问。我们受老师的影响；另一方面，我们做学问虽然很艰辛，但是我们也有独得之乐。例如老先生没有解出的问题，我们解出了。这种快乐，作为研究者，很关键的。

蒋先生给我题的字“有所发明”，意思就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我有创新的东西，我破解了前人没破解的东西，这个对于科学的进步是非常重要的，而不仅仅是为了一个讲师和教授发了多少篇文章。记得自己当时评副教授、教授的时候，本来某本书我认为可以用来评职称的，但是出书周期很慢，等到我们职称评完，书还没有出版。虽说有些遗憾，但是想到老师的教诲，也觉得一切都值得，都有价值。



例如《敦煌变文校注》是1997年出版，可是我在1996年1月已经当了教授了。我原以为这本书出版对我评教授有用，但是后来没赶上。所以，虽然我们当时也有晋升职称的需求，但是明显我们真正的研究并不能直接往这上面用。但是，当时我们论文写得多，每年十几篇，小的八千字左右，大的两万字左右。

训诂、校勘，每篇文章都要考证，写成一篇文章大约要花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所以几乎天天做这个，有时做着做着天都亮了。

[返回目录](#)

师母的笑容

—杭州大学中文系 77 级 郑良根

最近看到师母王惠春医生的照片，看到她那一如既往招牌式的笑容，大为感叹和怀念！



这笑容刻在我脑海里几十年了。1978 年至 1984 年在杭州大学读书期间，有时候免不了要去校医院打卡求药，王医生总是这样的笑容相待，让人如沐春风。后来拜访导师倪宝元先生，才知道这是师母。因为常常去导师家上课，也就常常见到师母，倍感亲切。

这种隽永的笑容是发自内心的，是心境的自然流露。于己，是一种乐观开朗豁达轻松的生活态度；于人，是待人宽容真诚和善的终身涵养。有人说，容颜为心境长期自然流露的最真实体现，

信也！

我导师倪宝元先生也是这样和善的人，也是永远挂着这种让人难忘的和善笑容。两人几十年共同刻写的夫妻相！可惜导师因病去世二十余年了，当时也就七十多岁吧。总觉得有点“英年早逝”的味道，每每想起来就惋惜不已。很高兴看到师母健在，90 岁了，还玩手机玩微信甚至玩网购，乐在其中呢！最近听说在杭州很是网红了一番：因为母亲节，作为浙江大学医学院心血管著名专家的儿子倪一鸣发了个视频，感念母亲勤俭持家，善于家教，也希望自己以后能更好报恩母亲。

从导师师母的旧照片，可以看出来，他们一向来都是这样的笑容。而且笑得越来越像，终于成为夫妻相。

最后一张是我珍藏的旧照片，1995年5月份我和学兄王建华去看望倪宝元和王维贤两位导师时拍的。王先生和师母丰先生是以严谨著称的学者，倪先生和师母王医生则以和善著称。



这张照片可以说是一个“夫妻相”的标本，恁谁看了都能一眼就分出来谁谁是一对的。你说是吗？



如今，王学兄和我都已经年轻人的英气不再，换成两鬓斑白。喜见师母那笑容依然可亲可敬又可爱。期盼疫情早点过去，我这个游

子可以早点回家看看。看看家人，也一定要去看望师母。

[返回目录](#)

林淡秋先生剪影

—杭州大学中文系 62 级 贺圣谟

1962 年，我考入杭州大学中文系。当时，林淡秋先生是学校的副校长，分管文科。作为普通学生，不可能与校长有什么交集；偶然在校园里远远地望见，只觉得他虽不戴眼镜，却比戴眼镜的领导更儒雅，更有知识分子气。这种感觉可能与知道他做过《人民日报》副总编，知道他是位作家又是位翻译家有关。

事有凑巧，开学不久，知道班上那位讲一口流利普通话的姑娘是林校长的女儿，叫林崇明。印象中她是个规行距步，“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乖乖女。我和她保持着最一般的同学关系，无事很少交谈。只记得有一次，她要我推荐我所喜欢的俄罗斯作家。我推荐了较为大路的屠格涅夫，并说《春潮》、《阿霞》一类中篇小说比著名的《父与子》、《处女地》等长篇小说更好看。回想起来，当时之所以没有推荐有负面评价的陀斯妥耶夫斯基和更令我心醉的如库普林的《石榴石手镯》，说明还同她保持着距离，并非有啥说啥。

第一次和林校长面对面在 1963 年除夕。那晚，文科食堂举办大型舞会。我不会跳交谊舞，就和几个喜欢清静的同学到我们上课的 227 教室去。那里有灯谜会。听说前一年，盛静霞（弢青）先生曾以“蜡炬成灰泪始干”为谜面，求打一中文系教师名；谜底是“余荇”——“馥”字已可简化为“余”，“焮”“荇”——二字声旁相同，同音相借，既雅又巧，甚为风趣，在系里传为美谈。

但那晚的灯谜大多浅白，近乎歇后语，令人扫兴。正想离开，看到一块黑板上贴着一排纸条，是征对的。有人正在问，用《彷徨》对《呐喊》行不行？坐镇那里的现代文学教研组组长张仲浦先生连说：“可以，可以。”旁边没有扯去的一张是“朝花夕拾”，我即对以“春种秋收”。张仲浦先生听了很高兴，用响亮的喉音（他自己重听）说：“好，好，鲁迅散文对康濯小说，书名对书名，很巧。平仄也对。”这时围拢来的同学已不少。我指着那张“李杜文章，孙吴兵法”

的上联，对了“仪秦才辩，班马史书”。同去的同学以为，李杜以诗著名，上联“文章”两字似乎不妥。我解释道，称李杜诗歌为文章，古已有之，出处是韩愈的“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我对的下联合称《史记》和《汉书》的作者为“班马”，也有出处。虽然班固比司马迁晚得多……。我突然发现大家不吭一声，回看身后，竟是林校长站着，正颌首微笑。

此刻，我意识到不应再喋喋不休了，赶紧住口，想听听林校长说些什么。林校长却什么也没说，不声不响坐到同学让出来的课桌边写了个上联“乃祖乃翁难得顺风拉纤”。我冒失地对了“我兄我弟定能逆水行舟”。张仲浦先生大声读了出来，还说：“对得蛮工，意思也好，朝气蓬勃。”我特别关注林校长的反应，但见他依旧神色凝重，不言不笑，似乎不大欣赏我对的下联，只是不说罢了。老实讲，我自以为对得不错，未见林校长表态，有些失落。这时有谁在喊：“书签（奖品是手绘的国画书签，山水花鸟都有，挺精致）要给贺圣谟拿光啦。”我感到不好意思，搭讪着离开教室，总觉得林校长出的上联里似乎有我没有捉摸到的东西，该好好琢磨。

我在杭大，与林校长近距离接触就只那晚短短的刻把钟，而且未交一言。但他那片刻间凝重的神情都一直留在我心头，历久弥新，还不断发酵。此后漫长的岁月中，随着见闻增长，对有关林校长的事了解增多，越来越觉得这个上联有“舒愤懑”的深长意蕴，不是表达“不怕困难”激励勇进那么简单。

1957年夏秋那场“强台风”改变了无数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

《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被骂得狗血淋头，说是“死人办报”；作为副手的林淡秋责有攸归，难辞其咎。他分管的副刊在“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以后几个月里长出了多少“毒草”啊——据说“毒草”锄掉可以做肥料，不想过了二十多年还没烂掉，反成了“重放的鲜花”。历史老人在看“河东”、“河西”的活报剧，时间还不到三十年呢。

当日，为配合双百方针，贯彻领导意图，积极动员众多名家来这块园地鸣放；一旦说变就变，来者都成了吞钩之鱼。当日组稿约稿就等于帮钓翁打窝子、撒饵料——人家看来是参与了“阳谋”，其实恰

恰是自己中了“阳谋”。后来听他女儿说，当年，还是邓拓劝他回浙江的，认为他不宜留在北京。从“天字第一号”大报的副总编，“投闲置散”到老家小县三门农村，时行的说法是“下基层锻炼”。虽说也有“申请”和“批准”的过场，其实何异严谴重谪。从好友柔石血洒龙华后即决心投身革命，几十年艰难险阻，甘之如饴，朝乾夕惕，不负初心，不想竟会落到靠检讨过日子地步。“人间北看成南”不敢说，“真是真非安在”总难免自问。这种惶惑愤懑恐怕是对家人都不敢说的。于是就有了长话短说，重话轻说，不再三咀嚼难体味出真意的“乃祖乃翁难得顺风拉纤”这句上联。

几十年来，我常常拿来反刍。有时，脑海里浮现列宾《伏尔加河上的纤夫》里全身浴着血汗的雨滴的画面；有时，如闻风急浪高时川江纤夫顶风拉纤的号子，心想，这些也许就是林校长出上联时想到的情景，感到的是悲怆和苍凉。我所对那句“逆水行舟”，不过是用空洞的豪言壮语表达廉价的乐观主义而已。林校长不表赞许，应当说是对我的无言之教。

大学六年，空气中火药味越来越浓，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逐渐渗透到生活和教学中来了。班里一位同学借了我的手表和自行车到西湖边照个相，被批评说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另一个同学日记被人偷看了，里边抄引的密茨凯维支的诗句，被认作反动言论，影影绰绰地听到他已被内定为反动学生。

1964年暑假一过，来了个据说是部队转业的政治辅导员，代替原来的正副年级主任（任课教师），班上气氛立时紧张起来。他是来抓阶级斗争的，深入课堂，果然“一抓就灵”。第一个撞到他枪口上的是刘操南先生。刘先生讲古代神话，课后布置了一个思考题，大意是，鲧治洪水无能，被舜杀了。为什么舜还会派鲧的儿子禹去继续治水？而治水成功后舜还将帝位禅让于禹？政治辅导员当天就召集我们开会，问我们头脑里有没有阶级斗争这根弦？“我们镇压反革命。反革命的儿子与我们有杀父之仇。这种世仇分子我们当然不能重用。你们古代文学课的思考题，不是在明目张胆鼓吹要重用世仇分子吗？不是影射党的干部政策和用人制度不如古代帝王吗？”以此开场，生发开去，

讲到班风问题，归结为“正不压邪”。他的警句是：“什么屠格涅夫、普希金？这是地主富农阴魂不散！”虽然没有点我的名，我清楚这话是冲着我说的，因为我跟一些同学讲过屠格涅夫、普希金。一席话听得我如冰水浇背，毛骨悚然。

五年前在梅山岛劳动，因为喜欢看书，而不受领导待见，一句“不安心梅山”，工资评我最低级；如今是在大学，在中文系，应该是最有文化的地方，居然讲讲屠格涅夫、普希金，还会被上纲到阶级斗争高度，真是匪夷所思。这就远不止是我碰到过的“秀才碰着兵”问题了。我陷入到深深的苦闷之中：我就是为读深读透屠格涅夫、普希金（和以他们为代表的经典作家），向往有博雅渊深的老师教导，有共同爱好的同学切磋的学术环境才考大学的；考上大学原指望多亲炙些“举人”“进士”，哪想得到竟由这样的“兵”来“辅导”我们？看来还得主宰我们的命运。我知道，这个问题找中文系领导是没用的，于是想直接向分管文科的林校长反映情况。相信他作为老布尔什维克，又是作家翻译家，肯定不会和这位政治辅导员一般见识。

林崇明这时是班里的团支书，正在争取入党，当然得紧跟政治辅导员（年级党支部书记）。我不能要求她引我见林校长。试探着向林崇明问起林校长，才知道他春天已调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不在杭大了。对他离开杭大，我心里老大不舍，但向他反映情况的想头未变；几次产生过登门拜谒的冲动，终因素无交往，不宜太过突兀而未去。心想最好有那么一次路遇，因为曾听说他到省委上班常是徒步去的。那段时候，我一有空就骑自行车在杭大宿舍、保俶路、省府附近转悠，希望运气好碰到他。但希望天天落空。这种失落怅惘之感是无处诉说的。

整个社会在向左急转，连我这个对政治不敏感的人也逐渐感觉到了。大中小学都要以阶级斗争为主课，大学生都要下乡搞四清。据说，有“三分之一政权不在我们手中”，当然要去夺回来。中文系的学生出发之前，人人作“文艺观”的彻底检查，为求过关。多数人检查得“入肉三分”，我则是全班的重点。说是“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其实已是“压力山大”，希望拿在别人（不知是谁）手里的“资产阶

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不要落到头上。进大学之前四年劳动挣得个“产业工人”身份，现在泥淖自己跳进来的，当初考什么大学呢？

下乡前学习“桃园经验”，准备一到农村就“访贫问苦”、“扎根串连”、“重新组织阶级队伍”，而自己则“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下乡之初，贯彻“双十条”，后来又有了“廿三条”，哪能想到搞出“桃园经验”与主持通过“十条”的都得完蛋。不过这是后话。如果稍有点先见之明，早应该想到，当初想找林校长要求他对政治辅导员所作所为作个“公断”，实在是为难林校长。后来还知道，辅导员趁全系师生开会时和一位党员同学来“检查”过我的日记。这个大势下，林校长还能说什么，做什么？亏得当时跟林校长连“路遇”的机会都没有，否则还会多出多少事来？

搞两期“四清”回校，文革的前奏曲已隐隐可闻。《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蛮不讲理的文章，竟在最高领导的支持下能号令天下，大报小报一律转载，并成为文科各系阶级斗争主课的必读教材。由《海瑞罢官》的作者吴晗牵扯出个《三家村》，那位“死人办报”的邓拓被勒派为“黑掌柜”。他以马南邨的笔名发表的《燕山夜话》成了众矢之的，声讨批判，遍于报刊。后来得知邓拓曾亲笔题赠林校长一本《燕山夜话》，书被林崇明拿到学校来，大概是供批判用的。在当时的气氛下，一口咬倒你没商量，说“三家村”有杭州分店，掌柜就是林淡秋。就这样，林校长被省委抛了出来，杭大“革命师生”在省委工作组的导演下，开始轰轰烈烈的“林夏战役”。杭大乃至浙江的文化革命就以林淡秋和夏承焘祭刀。林淡秋被派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夏承焘则是铁板钉钉的“反动学术权威”。

当时，“十六条”还没有产生，而“五一六通知”应当已到各级领导机关。打倒他们二人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究竟能起什么作用？我看是连被派来的省委工作组也讲不清楚的。批林的大字报大多虚张声势，帽子很大，实质性的内容很少：有的称其为“漏网右派”，翻的还是十年前在《人民日报》的老账；有的说他“招降纳叛”，说他把陈企霞、陈修良、陈学昭等大右派都罗致到杭大来了；也有说他是三十年代文艺黑线主要人物，属

于“黑帮”，而写大字报的人显然不了解左联时代的文艺思想斗争，所说多捕风捉影。我因家庭出身不好，事实上是“不准革命”的，不得不做“逍遥派”；但大字报倒不能不看，还在笔记本上摘抄了一部分，也算是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文化大革命吧。对我触动最大的是林崇明写她爸爸的一张大字报，因为涉及到我，我把它全文抄下来了，（这份抄件我一直保留至今，几年前还复印了一份给林崇明）：

“一年级时，我告诉林淡秋，班里有个资产阶级子弟×××，高中毕业后劳动了四年，读了不少书，但是对教育方针不满，班里有些人很崇拜他。后来林淡秋对别人说：“这样的人知识很丰富，却让他劳动四年，直到现在才能进大学。”语气之中有不平，有惋惜——这是资本家讲的话！

林又教导我：“学习上不去，老喊政治口号，别人是不听你的。×××知识丰富，同学自然跟他走。”我听了之后，下决心在学习上赶上×××，不愿担任社会工作了。”

我与林校长只有63年除夕（猜灯谜对对子）那晚的一面之缘，当时不曾交谈，也不知道他们父女对话在此前还是此后。想不到林校长竟对我高中毕业时不能升学去劳动深抱同情，即大字报所谓“有不平，有惋惜”。这件我原先一无所知的事令我极为感动，恨不得马上登门去叩谢他四年前对我的知遇。但我还是抑制了冲动——我上门去虽然可能给他些许安慰，但肯定会给他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和伤害。我只能默默铭感这位曾经沧海的长者为我这么个素昧平生的青年仗义执言。在他，当时是出于正直的人的良知和理性，对某一不合理的社会现象直言了看法；在我，却由此在四年后感受到难得的人间真情。在众口汹汹中不随波上下坚持独立判断，这种明智何其可贵；在“人际关系就是阶级关系”被奉为至理之时，林校长那份爱人（我不敢说“爱才”，因为我不配）之心，又何其可贵！可惜的是乖乖女理解不了好爸爸，入党三个月的女儿理解不了入党三十年的父亲。

对于大字报说我“对教育方针不满”，我倒想说几句。1962年高校招生前报上破例登过简章，亮点就在“严格按照考分高低顺序分段录取”这一规定。1958年，我们高中毕业时也算参加过高考。但家庭

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有港台或海外关系，亲属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冲击，特别是反右中划右或被批判（“中右”）的，这些同学都在高校放榜前半个月就戴上大红花被送去“劳动锻炼”了。“58年考成份，62年考成绩”，当时尽人皆知。总不能说58年的教育方针正确，而62年的教育方针错误吧？我进校后，是尽力回避谈自己经历的；但既然当年去劳动，现在才进大学，不是行动上已对58年的做法不满了吗。事实是，正因为58年的做法弊端毕现，才有62年的大力纠偏。林校长的女儿58年才读初中，见闻太少，太过单纯。文革一来，口诛笔伐之际，急不择言，竟把“资本家”这顶大帽子扣向父亲！做父亲的情何以堪？

“林夏战役”，其实也打不出花头。夏承焘先生的诗词大量被贴出来批判。我以前倒是没有读过多少他的诗词，于是乘机一一抄录在笔记本里。重点人物是林淡秋。有一夜，省委工作组把林“揪”回杭大，在杭大大操场开批判会（记得当时还不用“批斗”这个词），至今还历历在目。省委工作组组长姜旭主持大会，喊口号字正腔圆，普通话标准，中气十足，也戏味十足。林校长孤独地坐在台的右方。我发现他一下子繁霜覆顶，老了许多。（其实他才六十岁）我不但纯粹是看客，而且同情完全在他一方，只想听听到底能批出些什么。历史系的林琮听说也是老干部。他揭发的不过是林淡秋当年在苏北根据地每天钻在楼上，不下来接触群众。

这种内容，除了表明她也曾在根据地待过之外，和林淡秋如今反不反党，走没走资本主义道路完全联系不上。倒是图书馆的代表揭发一件事我印象极深：林淡秋曾经派车去接陈学昭，叮嘱司机在陈家弄堂口多揪揪喇叭，好让陈的邻居知道。“这是涨右派志气，灭群众威风！”这件事我相信，而且觉得这里蕴藏着林校长的智慧与仁人之心。那个时代，坐小汽车是地位的标志。有车到家来接，当然表示地位重要。小车频频揪喇叭，看似在催陈学昭赶紧出来，其实是让陈的邻居听的，使他们不敢小看陈学昭。她虽是右派也不容欺侮。这个有意蕴的细节构思得很好，完全可作写作课细节描写的例子，来表现林校长对陈学昭的爱护。看来揭发的人倒是听懂了喇叭声的含意的，故显得

义愤填膺。我心里却暗暗佩服这位孤独地坐在台上的老人，只觉得这样的细节太少。

批判会开得挺长，总要让准备了发言稿的各系各部门代表上台有所表示。一阵风过，下起雨来了，大操场上有点骚动。但林校长仍安静地坐着，只是摸出手拍，把手表褪下来包好，放进裤袋。我以为这个动作表明他的内心没有被这种批判压垮，对自己有信心不会自杀。大会开毕，他在喧嚣的口号声中缓缓退场，显得很从容。

这是我参加过的唯一一次批林大会。以后类似的会我一概不去参加，似乎也没有谁来叫我。如今回忆这个场面，我不禁浮想联翩：此时林校长曾否想到劝他回浙江的邓拓？杭州的万人大会虽然口号响亮，毕竟台上还为他放了把椅子，也不见谁动手动脚。而邓拓，已于5月18日“玉碎”。（袁鹰有《玉碎》一文，写邓拓的最后。）当年离开《人民日报》时，邓拓曾有诗留别报社同人，有云“文章满纸书生累，风雨同舟战友贤”。但他自己没有接受教训，结果还是“弄文罹文网”，陷入死地。曾风雨同舟的贤战友林淡秋，几乎不再写文章，仍未逃脱厄运，还不知道能否“苟全性命于乱世”；据林崇明后来写的文章，他曾有过感到自己“路看来走到头了”的叹息，还曾劝妻子离婚以保全孩子，曾准备全家去农村劳动改造。心情之凄苦、悲凉远非“难得顺风拉纤”所能形容了。

大学读到文革，回想起来只有苦笑。从进校到拿到革委会发的文凭离校，整整六年。“原学制五年，并在校参加文化大革命”，概括了我生命的黄金岁月。1968年9月工宣队奉旨进驻大学，我这届人赶紧腾房走人。我们这届大学生曾被称为“红卫兵大学生”，以区别于“老大学生”和“工农兵大学生”。其实，62年进校的真能套上红袖章的不多。如我，既没有资格奉旨造反，不能“要武”，甚至任何战斗队都没有参加过。无所事事，使我感到恐慌。我总在问自己：这种虚度年华，谁为为之，孰令致之？“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多数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至少整整两年，我们就这么耗着——要说有事，可说的只有66年8月23日全班从杭州出发上北京。哪想得到毛主席驻地是净土，容不得污秽！

所谓“黑八类”来北京是来错了，必须在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之前离开。于是奉命离开，回杭州的人包括父亲成了“黑帮”的林崇明。我们班的人由她“负责”领回。

人的命运真是怪异，从革命高干到反革命“黑帮”，是说变就变。后来竟听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是“革革过命的人的命”的。那么现在正在革别人命的人，过些日子要不要被人革呢？“八亿人口，不斗行吗？”不斗，还要共产党干什么？果然，从这时起，大家整整斗了十年。“一片秦灰夸破立，两丛汉帜斗干戈。”只是，斗出来的并非红彤彤的新世界。弄下去，又要吃不上饭了。

不拍毕业照，不告别的毕业。我被分发到一个偏僻的小县。林崇明分到一个海岛上，从此不相闻问。林校长的命运更不得而知。那时候，还没有“好人一生平安”这首歌，无法用唱歌为想念的老人祈福。有时，心里突然会冒出怪念头：冥冥之中真有因果报应多好，至少可以叫那些以革命名义做恶事的人知所忌惮，让坏人一生不安。

我一直以唯物主义者自许，不想竟遇到了不知是否可称作“心灵感应”的奇迹。1974年暑假，儿子贺秋帆快满六岁，就要上学了。我觉得，应当让他看看我读过书的学校。我专程带他去杭州，陪他去看我在杭大读书时的第七宿舍和上课最多的137、227教室。校园荒芜，满目凄凉。真不知道工农兵大学生是怎样在“上、管、改”的？赶紧出杭大正门，拉着孩子的手，直奔黄龙洞。这是我在杭大六年，去得最多的景点。往左看，一大片杭大教工宿舍，与老师睽隔多年，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还住原地。最想见的当然是林校长，但不知道他目前处境如何？感到不便贸然造访，因此没有安排时间。那天的杭州真安静啊。曙光路上，除偶有公交车开过，几乎没有行人。“湖上寻诗无好句，旧游处处感凄凉。”正吟味间，一位白发老人从黄龙洞方向缓步过来。过去，我其实并不熟悉林校长的步态。我虽近视，但断定走过来的就是他！待到走近，我迎上去，果然是他！

“林校长，我是贺圣谟，林崇明的同学。”

“哦，知道，知道，——记得。”一经对话，立刻沟通。他显得挺高兴。

“崇明在家里，大肚子啦。”说着还夸张地双手比划着大肚子的样子，看得出他对就要做外公充满欣喜。是的，这个时代，还有什么别的事值得欣喜？

他先谈及时局，问我们那里批林批孔怎么搞。我告诉他，造声势之后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批林，话已经讲完；批孔，也不知道怎样和林彪挂钩。还是公社的头头脑脑灵活，知道毛有诗批郭沫若“孔学名高实秕糠”、“多读唐人封建论”，于是命我给全公社老师讲柳宗元的《封建论》。但我除疏通文字外，真不知道该从哪里入手批孔。公社已是基层，虽然也偶尔听到从上面吹来“二批”之外，还有批“周公”。但公社领导没有布置，我们消息又闭塞，大家相应不议。听我讲完，林校长淡淡地说：“大家都疲劳啦。”我们相视一笑。有些意思是用不着说出来的，挑破便傻。

他邀我到他家去。我有点受宠若惊，当然想去，但时候实在不太合适。夏日昼长，我已同孩子说好，从黄龙洞翻栖霞岭下山，到岳庙估计已关门，但门口去看看也好——更何况我和孩子还没有吃晚饭，而林校长显然是晚饭后散步已从黄龙洞回来了。匆忙中我遗憾地告别了他，也没想到匆忙中让孩子叫他一声“爷爷”。我的不善辞令，于此可见。那天走得匆忙，也由此可见——几年后碰到老同学唐君。他绘声绘色地回忆说，那天傍晚和王元骧老师也正在这条路上散步，碰到林校长。林校长告诉他，我正带着孩子在他们前面走。他两人紧赶慢赶追到黄龙洞，但没有追着我。曾共晨夕的同寝室室友，分别六年后想一见而不可得；十年前曾经“设计”过而没有实现的“路遇”今天竟不期而至。不知道这是不是古人所谓“一饮一啄，系之于分”？

现在人无老少都会开口就讲“缘分”二字。讲“百年修得同船渡”的已不只是善男信女。我同林校长的缘分仅只三面。这个世界我见过三面的人何止万千，但谁能长驻我心？因为与林校长接触太少，所以没有故事可以叙述，当然遗憾；但三次见面却深深镌刻在心头，像是读了撞击心头的诗，久久回响。李锐先生有句云：“活在人心便永生。”说得真好！我已到望八之年，心头永远珍藏着对林校长的记忆。虽然至今仍觉得对他的信赖，凭的只是直觉，没有能力做出理性的分

析。我甚至想这样说，好人会有种让人信赖的魅力，即使人家对他了解不多。

本文既不全面，也不深刻，所以只能称作剪影——很可能连轮廓线都剪得不准。

谨以此纪念林校长 110 周年诞辰。

[返回目录](#)

纪念陈立先生—中国工业心理学的奠基人

—杭州大学心理系 80 级研究生 金普泰

(一) 怀念恩师

先生是将我引入心理学雄伟殿堂的导师，也是在我心中除了双亲最为亲近的一位长辈。先生一直是、并将永远是我在教研和生活中的楷模。

一九七八年，迎来了拨乱反正后科学的春天。我准备将工作中搞技术革新取得的经验和自学的心得结合起来，报考著名心理学家陈立先生门下的工程心理学研究生。虽然，由于所在的工厂领导的挽留没能报上名，先生却将我收为编外的“学生”，惠函招见，指导我看控制论的专著，要我“打好扎实的基础”，并让我协助翻译皮亚杰关于儿童到青少年期间思维发展过程的论述。由此延伸，我还自学了数理逻辑。这是我最早有幸在先生的关怀下，一边工作一边学习的经历。我在一九七九年终于经所在工作单位批准，参加当年的研究生入学考试。不辱师训，总分、三门业务课和外语均得考分第一。经过一番“政审”方面的周折，方于一九八〇年正式成为先生的弟子。毕业后，留校工作，成为先生的学术助理（当时先生在教务方面已有秘书王和春老师以及校长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协助）。一九八五年，我接受拉屈罗勃大学的奖学金，在先生的支持下，赴澳大利亚攻读博士学位。先后在斯温本理工大学和新南威尔士大学任教。

我在学术休假期间回国讲学，经常去看望先生和师母。先生一直对我的研究工作很关心，见面必问有何创新。当听到继他老人家之后，我这个学生已成为在美国心理学会 (APA) 最早期刊“心理学通报”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00 周年之卷上发表论文的又一名中国人，并且我和内子刘文凤共同指导的来自香港的博士生也已在先生当年曾登载大作的美国心理学会 (APA) 另一权威期刊“教育心理学”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上发表了研究成果，他老人家脸上露出欣慰

的笑容。这样的勉励也是在无形地督促我们这些弟子们一定要不断努力。就像以往一样，每次见到他老人家都要交上一份“作业”。

我最后一次见到先生是在二〇〇二年十二月。在这之前，得知先生因骨折动了大手术。我们全家六口一齐到浙江医院去探望过他老人家。回悉尼后，我的母亲仍不放心，嘱咐我和内子近期内一定要抽空再去向先生请安。这回见到先生时，他老人家半躺在病床上，正在看别人送来的书稿。见到我们，先生很高兴，照例开门见山就问工作如何？我说：“虽然新南威士大学被 Times 评为全球大学中的第 36 名，但是……”刚说到“但是”，我注意到先生在病榻上仍然手不释卷的情景，就立即打住了。原来我是想接着说：“但是澳大利亚近几年已成为 OECD 国家中唯一削减对高教投入的国家，目前在大学的教学和行政工作越来越繁重，挤去了做研究的时间。”可是，当我想到抗战时期先生用手摇计算机工作，并且在“教育心理学”（*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发表论文的事迹；当我看到这样一位不久前动过大手术（缝了 14 针！）、且年逾百岁的寿星，尚如此孜孜不倦地工作，是什么精神在支撑着他？我立即感到汗颜，不敢再提及那些外在条件的变化。先生说，他最近一直在思索心理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学的问题，想将一些要点联贯起来。要是我有空，很想以后和我多谈几次。当时我想：下次学术休假，一定要做好安排，带上笔记本，留在先生身边一段时间。因为这些思想的火花是我们中国、也是全球学术界的宝贵财富啊！

先生也是一位极富人情味的长者。在那次探望结束时，先生两次将我从门口唤回，久久地握住我的手：“你要答应我一件事。回去后，要代我向你的母亲问好。你知道，我对你的母亲是非常敬重的。没有她的辛苦，就没有你今天的成就。你要加倍地孝顺你的母亲，照顾好你的母亲！你一定答应我，加倍做好这件事！”其实没有先生的栽培，哪里会有我今天的微末成绩？我的嗓子哽住了，顿首含泪离去。知我者莫若师也！先生知道我只有一“士可杀不可辱”的匹夫之勇，以前曾要我“养晦”；也知道我往往一投入工作便忽略起居、饮食和家务，

恐有忤逆不驯，故而赠言预警之。师之谆谆教诲，当使顽石点头，使我铭记在心，终生为戒！

在此后一年中，与先生和师母通了多次越洋电话。尤其是在“非典”（SARS）流行期间，得知先生健康状况稳定，略微宽慰。我除了向先生和师母报告一些教务和科研上的进展（师母虽然年高，仍主持血液病方面的重要研究项目，曾多次派遣研究骨干到我所在的新南威尔士大学的附属医院工作，故常有联系）。还告知，二〇〇二年底，终于收到政府有关部门的正式文件，对于在我少年时期因为日记的内容而被关押在少年劳动管教所之事予以彻底平反纠正。俩老为此表示道贺。在此期间，我还与先生和师母叙叙家常。在寻根的过程中，意外发现东阳档案局保存着一九九九年出版、由原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金普森先生担任学术顾问之一的“刘金氏村史志”和有关档案；收到家乡赠送的“金义门”、“七世同居”和“江南第一家”三幅复制的文物金匾；并受此鼓舞，继续在北京、南京、浙江、福建等地档案馆查到双亲的民国档案。从中了解到抗战时期的很多情况，收获颇丰；北京有关方面正在拟议根据我的家史摄制电影或电视连续剧。先生和师母听了，也为此分享了一份喜悦。此后，中秋、元旦、春节，我都向两位老人家致电问候，保持着密切联系。

到二〇〇四年三月，我在办公室突然收到师妹亦平、亦尚传来的讣告，惊诧、震撼、悲痛得一时失语，跌坐在显示器前无法动弹，竟不能呼唤就在隔壁办公室工作的内子！将近两年来，先生的音容笑貌屡屡闪现在我的心扉，呼之欲出。我今天特别感谢浙大心理系的同人，能高效、如期地编辑这本意义非同寻常的纪念文集，使我们能在一起，将对先生光辉业绩的缅怀，化作奋勇前进的动力！在此我还要对能在百忙中为纪念文集作序撰文的心理和教育界的诸位老前辈——薛艳庄前校长、荆其诚先生、徐联仓先生、张厚燊先生、朱祖祥先生、汪文鏊先生等人——致以崇高的敬意！深信我们将在诸位老前辈的指引下，努力去完成先生开创的事业！

(二) 中秋节抒怀

一九八三年秋，先生已逾八十高龄，不辞辛劳，赴京出席全国学位委员会评审会议，下榻京西宾馆。文革后，国家于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和建立研究生学位制度，百废待举，任务异常繁重。先生是中国研究生学位制度筹建者之一，担任教育口的召集人。当时，很多相关的学科都归在教育口内。先生在遴选进京的委员们中担任召集人，是众望所归。

说也凑巧，那年的中秋节竟夹在会议期间。怎么在外过节呢？眼看中秋节临近，我抽空出去购买那在杭州定然是少不了的月饼。可是，一连走了几家副食品商店，都没发现平常杭州人甚为喜爱的那种皮薄馅多的小月饼，亦称苏式月饼。我心里有点发急了，不管怎样，总得让先生感觉得到一点中秋佳节的气氛吧。于是就问营业员：“请问这儿有没有大的月饼——广东月饼？”

那位营业员不解地摇摇头，指着柜台的另一头：“只有这一种。”

我走过去，把眼镜架往后推一推，俯近玻璃橱窗，发现那是一种比苏式月饼稍微厚一点、大一点的“月饼”，面上也有模糊的红印。请营业员包好后，我就匆匆回到宾馆。

那天晚餐后，陪同先生回到房间。只见皎洁的月光轻柔地透过树影，由窗台如温泉般注入房内；清风徐来，好不快哉。先生心情大畅。当下我用热水瓶将开水注满茶杯（先生每天早晨用一撮龙井茶叶加上两片人参泡茶。此后，随喝随注入开水，至晚间茶味已淡，故总能安然入睡），师生两人坐下，一边随手打开装着月饼的盒子。月饼入口后，我才发觉这种“月饼”又硬又干，既不像苏式月饼酥香，又不如粤式月饼多馅，连忙带着歉意说：“真没想到北京的月饼和杭州的不一样。”谁知先生并不介意，兴致极好，呷了一口清茶，缓缓地和我谈起了往事：

先生幼时丧母，然天资过人，学绩总是名列前茅。考取官费生，留学英国伦敦大学，导师为斯皮尔曼教授。这位导师是因素分析法的

创始人，由于他的突出贡献而授予爵位，人称 Sir Charles Spearman，名望甚高，但却无半点“爵士”架子，待人热情和蔼。

年轻的陈立到英国留学不久，由于才华出众，又勤奋努力，导师斯皮尔曼十分赏识，暗自为收了这位不同凡响的中国留学生感到高兴。当时有一项语汇测验，结果证明当时的陈立已拥有五万以上的英文词汇。

有一日导师突然问他：“你以后想做什么？”

“我想将来当教授，”年轻的研究生平静地回答。

“如果想当大学教授，你应该有博士学位。你可以从硕士转到博士研究生。不过，你需要通过一系列考试。别的考试我想你是不会有问题的，最难的是你要从拉丁文和希腊文中选一门考试。现在只有几个月时间让你准备。你觉得怎样？”导师斯皮尔曼耐心地解释说。

不等到他回答，导师斯皮尔曼生怕自己中意的研究生为难，又紧接着说：“你没有学过拉丁文和希腊文。要是你有困难，我可以向校方提出豁免这项考试。”

“谢谢您的好意！但是我要参加每一项规定的考试。”年轻的中国研究生坚定地说。

导师斯皮尔曼眼里闪现出又惊又喜的光芒，改口说：“你决定要参加考试，我想你是一定能通过的。”

就这样，负笈英倫的年轻中国学子陈立，顺利地通过了考试，成为斯皮尔曼教授的关门弟子。在伦敦大学，年轻的陈立设计、进行了一系列心理学实验，完成了博士论文，并在国际期刊上发表了研究成果。

导师建议陈立到多所著名高等学府去开拓视野。于是，他到过牛津、剑桥，与多位学者切磋，其中有社会心理学家麦独孤(William McDougall)和心理学大师巴特列特(Sir Charles Bartlett)等人。随后，陈立去德国，在格式塔(Gestalt)心理学派创始人之一苛勒(Wolfgang Köhler)之处做博士后研究。在德国这处心理科学的发源地，陈立还结识了从事心理学场论和群体动力学研究的学者勒温(Kurt Lewin)。

当时，在德国纳粹势力逐渐猖獗，夜间常有纳粹党徒冲进大学宿舍随意逮捕知识分子，整间宿舍很不安宁。可是，陈立觉得很奇怪，自己怎么从未遭到盘问，竟然一时无事？后来，勒温告诉他：这是因为那些纳粹党徒分不清亚洲人的面孔，一直误将他当成日本人。在三十年代，日本与纳粹德国走上军国主义的道路，形成“轴心国”。因此，纳粹党徒一般不去干扰他们以为是从“盟国”来的“日本人”。

不久，勒温又告诉陈立：这里已经不是做学问的地方，他已准备离开此地。同时苛勒也由于当时恶劣的政治气氛而出走了。于是，陈立缩短了“博士后”的研究期限。在欧洲游学后，于一九三四年从意大利威尼斯搭乘远洋轮回到祖国。

学成归国的陈立博士立即投入紧张的工作，应聘为清华大学教授。半年时间在大学授课，半年时间在心理研究所开展研究工作（如到平绥铁路南口机厂和江苏南通等地工厂做实地调查）。风华正茂的陈立日以继夜地伏案挥毫，完成“工业心理学概观”著作，成为中国工业心理学的奠基人。

（三）在中外学术界的陈立先生

陈立先生有两大方面是人所共知的：其一为终生在心理学界和教育界辛勤耕耘、努力开拓，成为一代宗师，桃李满天下；其二为秉其大无畏精神，高风亮节，竟能不顾个人安危，当文革将以批吴晗的“海瑞罢官”为先声，在“万马齐喑”之时，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三日著文于“光明日报”反驳化名为“葛铭人”的权奸败类姚文元对心理科学的诬蔑。这一令软膝者战兢、令硬骨者敬佩的著名的“葛陈辩论”，已永远载入中国近现代思想学术史册之中。

抗战爆发，很多知名高等学府和研究所迁往内地。陈立先生的学识造诣和高尚情操极受浙大校长竺可桢先生推崇，经常在一起切磋学问和教务。有一次，陈立先生与竺先生一同外出，幼儿在家发高烧，来不及作细致的诊治，留下后遗症，竺先生一直为此十分歉疚。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陈立先生用手摇计算机对收集的心理数据进行因素

分析，成果丰硕。抗战胜利、日本无条件投降之后，为了建国大计，陈立先生与其他爱国的高级知识分子参与组织“九三学社”。

一九四九年，杭州和平解放，陈立先生为接管浙江大学的委员会成员之一。此后，陈立先生去北京受命筹建心理研究所，与当时正在筹建数学研究所的华罗庚，一同为科学院规划操劳。不久，陈立先生又被浙江方面领导要求回省参与主持高校工作，自此一直留在杭州，工作到百岁之后。在这跨世纪的历程中，先生由于对教育改革、心理科学的发展、国际交流等各个方面所做出的巨大贡献而被授予终生成就奖的荣誉，赢得了各个年龄段学术界人士的无比敬佩。

文革结束不久，先生在一九八〇年率领中国心理学家代表团赴德国出席世界心联大会，对心理科学创始人冯特的学术思想作了客观的评述，并对心理科学的发展方向进行了认真的讨论。与会期间，先生与印度等第三世界国家代表团的负责人举行友好会谈，达成共识，互相支持，为中国方面的代表数年后担任世界心联执行委员之事铺平了道路。

在八十年代，先生作为杭州大学校长和中国心理学科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虽年事已高，尤风尘仆仆亲赴北京，与教育部国际组织联络局负责人商谈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派遣工业心理学专家(普渡大学的奈勒教授和伊利诺斯州大学的霍普金斯教授)来杭州大学考察的事宜。同时，先生又与他培养的学科带头人争取到联合国儿童发展基金会的研究项目。教育部国际组织联络局的王复荪先生告诉先生，斯坦福大学希望送一位博士生到中国来做心理学方面的研究。他探询先生是否愿意担任那位研究生的导师。先生虽然工作很繁重，早已是“超负荷运行”，但为了提高中国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促进学术交流，慨然应允。

为什么斯坦福大学认定陈立先生为其派遣来华的博士生的导师呢？为什么在全国学位评委会先生被推任为教育口(当时教育口囊括所有与教育科学和心理科学有关的学科)的两位召集人之一呢？这是因为先生在国内外心理学术界有三个方面倍受推崇：

其一这是由于先生极其重视理论研究。先生主张每做一个实验，每进行一项调查，无论其规模大小，都应有系统的理论指导，否则将成为无的放矢。记得在九十年代中期，先生曾要我寄给他一本心理学评论“皇帝的新衣”。书中提到：在相当大一部分心理学研究中，因为缺乏有效的理论基础，所以很多研究报告自相矛盾，令人莫衷一是。先生认为此言切中时弊，值得令人深思。在开研讨会时，先生经常引用他当年在德国时的同仁勒温(Kurt Lewin)的名言：“There is nothing so practical as a good theory.”先生在理论上具有令人折服的高度综合概括能力，往往从系统论、控制论入手，建立理论框架，辩证地、科学地提出命题。先生知识渊博，高屋建瓴，对现代认知科学和行为科学的精华在宏观上和微观上兼收并蓄，融为一体，孜孜不倦地开展多学科交叉渗透的研究。

其二是先生大力提倡做研究一定要采用严密的科学方法。先生秉承心理科学创始人冯特(Wilhelm Wundt)和因素分析法创始人导师斯皮尔曼(早年系冯特的学生)的学术理念，作为心理科学的“第三代传人”和因素分析法的“第二代传人”，治学态度极其认真。先生曾撰文讨论冯特创立的实验心理学，曾引言：“心理学的方法都是从自然科学来的，只有因素分析是心理学偿还给自然科学的唯一一种方法论。”先生亲自给研究生和大学毕业班(做毕业论文研究前)开课，讲授“科学方法论”，要求我们在实验设计、现场调查、收集数据、统计分析、报告结果、讨论评估等等一系列程序中要谨慎、细心、严格、翔实。先生曾多次引用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中对前后事件、因果关系的精辟论述，要我们在制订研究计划、开展研究工作和总结研究结果时，必须理清思路，求得客观的结论。如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一度“耳朵认字”之类的报导甚为流行，于光远和陈立先生决定从哲学和科学方法论两个角度加以澄清。先生交给我一项任务，根据国际心理学界对此类报导用严格的实验加以澄清的有关研究，结合科学方法论，写一篇文献综述，发表在“外国心理学”期刊上，并亲自将此文定题为：传心术与“相肌行事”。可以说，浙大、杭大著名的“求是”

学风，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先生与他的老一辈同人多年的严格把关和辛勤耕耘。

其三是由于先生一贯坚持心理科学研究要与实际应用相结合的治学方向。先生认为，心理科学中最具活力的领域之一是工业心理学，其两个分支——工程心理学和组织心理学——是建立在实验心理学、生理心理学、认知心理学、神经科学、社会心理学以及其它有关学科的基础之上的；这两个分支之所以甚具活力，是因为交叉学科的研究大有出成果的余地，并且取得的成果立即可应用到生产、运作、管理、发展的实践中去。先生多次强调心理学不能是“安乐椅心理学”（即 *Armchair Psychology*），而必须是理论通过实践检验、并能真正用于实际生产和生活的应用科学。先生十分重视在实践中即时反馈的作用。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在一九七九年工程心理学研究生入学考试的题目中，有一道就是关于“反馈”的作用。先生是最早将他当年在德国的同人、被誉为“实验社会心理学”之父的勒温（*Kurt Lewin*）所创导的“行动研究”（即 *Action Research*）的概念引进中国的心理学家。先生著文主张在生产、生活实践中不断地根据反馈所得的信息，修正和发展理论，进一步改进实践，以形成螺旋形向上的良性机制。先生这一精辟的学术观点，正好反映了科研（广而言之为科技）是社会生产力的不可或缺的部分这一先进思想。

正由于先生的独特贡献，故在国际学术界倍受崇敬。除了众所周知的被伦敦大学聘为外籍院士外，先生还是美国心理学会（*APA*）的终生名誉会员。一般的会员能定期收到“*American Psychologist*”和“*Monitor*”各一份，可是先生总是收到双份的“*American Psychologist*”、“*Psychological Bulletin*”、“*Psychological Review*”、“*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等美国心理学会（*APA*）期刊（先生每次将其中一份嘱我送交教育系和心理系共用的资料室保存）。这样的礼遇，据我所知，在美国心理学会会员中绝无仅有。

一九八三年，先生访美。当时，心理研究所和北京大学邀请诺贝尔奖获得者、卡内基·梅隆大学的西蒙教授(Prof. Herbert A. Simon)在京讲学。西蒙教授得知此事，经心理研究所的安排，与先生在出国前夕会面，并欣然接受先生的邀请，等先生回国后到杭州大学作学术访问。先生一行访美期间，受到极高的礼遇；心理学界人士是怀着崇敬的心情来拜见先生这位老前辈的。有一次，一位满头白发的老教授在接待宴会上走近先生，说：“我生已晚，不可能见到创建世界上第一间心理实验室的冯特，也无缘见到冯特的学生斯皮尔曼；今天我总算有幸见到您——斯皮尔曼的学生，心理科学第三代的代表。”语毕，他向陈立先生深深地鞠躬行礼。当时的情景，令所有在座的人都十分感动。

先生时时处处都在为加强、完善心理学系的研究条件而操心。在一九八三年访问美国期间，先生与同行的朱祖祥老师和卢盛忠老师还将日用津贴省下来，为心理学系购买了第一台计算机。可是，回国时，因事先未办申请手续的关系，不能将计算机从海关提出。杭大设备科也觉得此事很难办。先生与心理系张青山总支书记和朱祖祥主任商议，决定派遣我去北京和天津，尽量设法将计算机取回。当时先生和系领导指示，无论海关要罚缴多少费用，也要把这台计算机带回来。经过多方交涉和耐心解释，海关最终予以免税放行。当心理学系装起了第一台计算机时，先生和诸位系领导的高兴之情溢于言表。后来，香港大学心理系主任高尚仁教授来访，听到先生对他谈及此事的曲折经过，对先生和他的同事们的无私丰献精神大为敬佩，代表港大心理学系主动表示，今后在软件方面可以全力支援我们。

先生任杭州大学校长之际，国际上许多知名学者都前来拜访，进行学术交流。杭大成了“独步东南”的国际交流中心，世界上文理学科权威人士的“打卡”之地，成果丰富。仅以心理学界来说，先生深邃的学识、精湛的见解、谦和的风度，常使得他与国际著名心理学家在交流中迸出智慧的火花，产生深远的影响。例如，先生与普渡大学的奈勒教授(Prof. Naylor)讨论了组织心理学的要素——整合的动机模型；与伊利诺斯州大学的霍普金斯教授(Prof. Hopkins)探讨了如何

从三里岛核电站事故的调查中进一步加深对人-机关系的认识；与诺贝尔奖获得者、卡内基·梅隆大学的西蒙教授(Prof. Herbert A. Simon)研究了如何界定和加强员工对组织的忠诚(即对组织的承诺,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这一行政管理心理学的重要课题；与哈佛大学布莱泽尔顿博士(Dr. T. B. Brazelton, 后任克林顿总统医疗保健制度改革的首席顾问)评估了亲子关系对儿童身心成长的作用；与加利福尼亚大学格里诺博士(Dr. Greeno)论证了教育心理学中“解决问题”(Problem Solving)思维过程的实验方法；与斯德哥尔摩大学、曾任诺贝尔奖评委的罗宾诺维茨教授(Prof. Robinowitz)交换了在工业心理学研究中开展现场试验的经验；与曾任澳大利亚心理学会主席的辛格教授(Prof. George Singer)分析了昼夜节律与轮班工作制改革的原则；与拉屈罗勃大学的欧弗教授(Prof. Ray Over)鉴定了在认知心理学和心理物理学方面的实验成果。

先生的对外高层次的学术活动，为在杭州大学创建工业心理学国家实验室提供了广阔的国际视野。在此仅举一事，便可見杭大在国际学术交流空前盛况之一斑：在改革开放之初的一九八三年，荣获诺贝尔奖的西蒙教授应先生之请来杭州大学作前沿心理学讲座，然后双方就进一步科研合作举行会谈。西蒙与纽伟尔曾在他们的经典著作 **Human Problem Solving** (人类问题解决) 中，运用计算机操纵的眼动瞳孔追踪仪纪录国际象棋大师的眼动轨迹，从而细察专家的有效思维模式。陈立校长便问，卡内基-梅隆大学人工智能心理研究中心可否帮助杭州大学建立这样当时世界上第一流的心理实验室，西蒙教授慨然应允全力支持。先生大悦。次日是周末，蓝天白云，微风和煦，遂亲自邀西蒙教授夫妇登船遊湖。至湖心亭，步入水坞，先生指着一尊刻着“虫二”的石碑，笑着轻声对我道：“你给他们解释一下这碑的意思。”于是，我告诉西蒙教授及其夫人，这是一个字谜，即“風月”两字去掉边框，隐寓风月无边，美景悦心：

Oh, boundless wonders ye art!

The Wind and the Moon mix in my heart.

西蒙教授和他的艺术家夫人理会其意后，高声笑道：“This is amazing. So amazing!”他们对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欣赏，更加深了他们对中国科技文化发展的支持。西蒙教授还要求杭州大学陈立校长、中科院心理研究所荆其诚副所长和北京师范大学张厚桀教授等人协同帮他起一个有特色的中文名字，而不是一般的音译西蒙。大家讨论再三，按其英文名字 Herbert Simon，取中文名字为司马贺。Prof. Simon听了，十分满意，觉得像汤若望那样有了一个有意义的中文名字，还要我们教他怎么用中文签名。发言稿中，有一小段又要求帮他用中文写成并在旁边用中文拼音注出。他唸起来颇像山东口音，有很多去声。大家听了鼓掌。这些外事活动，均加深了友谊，有助于国际交流的深化。

先生自从早年学成归国后，在高教界不间断地辛勤工作七十载，不仅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学科带头人，而且与老一辈的专家学者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先生每到一处开会，总是去抽空看望那些和他一样孜孜不倦在学术界多年耕耘的同人。如与清华大学的同仁谈当年欧美同学会的活动及该会今后在改革开放中应发挥的作用。当提及老朋友冯友兰先生时，只笑谈他当年在欧美同学会西餐厅不慎将夹在书里的情书失落在地上的趣事，而宽容地不论及他在文革中的行事；与心理研究所的潘菽先生谈心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与南京师范大学的高觉敷先生谈心理学史研究和九三学社的工作。先生求贤若渴，在杭大校长任上，将早年留学法国因杰出的电生理研究荣获博士学位、著名的生理心理学家朱锡侯教授从云南请来杭州大学任教。我出差到北京，先生就嘱咐我代表他老人家去拜望北大的金克木先生、心理学界的荆其诚教授、徐联仓教授、汤慈美教授、张厚桀教授、朱智贤教授等人。甚至在北京就诊期间，先生还与中华医学会的吴阶平会长讨论青少年心理卫生和教育的课题。

先生在全国学位委员会，在评定研究生导师资格时，一贯坚持以实际科研成果为准的客观公正原则。因此，赢得同仁们衷心的敬佩和拥戴。先生担任杭州大学校长期间，对于一些老教授之间在工作上产生的一些误会和摩擦，总是在认真听取汇报后，要求校、系领导妥善

处理矛盾，调解各方看法，坚持以大局为重。先生还推荐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中青年专家到省府任职。他老人家在百忙中还指导一机部厂长培训班、浙江省劳动学会和浙江省科普协会的进程；不顾年事已高，亲自同我一起到海盐衬衫总厂现场调研并在《杭州大学学报》上联名发表“海盐衬衫总厂调查报告”；又去杭州中药二厂等处实地考察企业改革，提出建设性的意见。由于先生卓越的领导艺术，为学术界建立良好学风、达到安定团结，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先生在心中总是怀着大局，考虑着高教的大方向。早在一九八三年，先生出席全国学位委员会会议期间，曾与教育部黄辛白副部长举行会谈，重点讨论如何恢复原来浙江大学的建制，商议将当时行政管理上互相独立的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和浙江农业大学加以合并的规划。

(四) 学子心目中的陈立先生

先生的治学态度极严、思维极其活跃，很少有人能望其项背，这是人所共知的。同样为人熟知、为人称道的，是先生和蔼可亲的性格和待人十分诚恳的长者风范。先生总是心系于众生和学问。我在欢庆先生百岁华诞的寿联上写着：“仁者寿，智者乐。”先生确实是最好的例证！

曾听先生谈及斯皮尔曼和他的学生做学问如何精益求精。例如，他和学生们当年甚至用一根线就可以在坐标图上估计出相关系数，精确度竟可达到小数点后两位。然而，先生平日更多提及的是斯皮尔曼先生处处关心他人的高尚的君子之风。当时伦敦大学有两位影响极其深远的、举世闻名的教授，一位是提出积差相关系数公式的皮尔逊(Karl Pearson)，另一位是提出等级相关系数和信度公式并创立因素分析法的斯皮尔曼(Charles Spearman)。虽然两人均是世界第一流的学者，由于斯皮尔曼不以名人自居，处处替人着想，所以广结善缘，深得人心(more popular)。先生告诉我们，有些课题斯皮尔曼本人很容易就能完成，有些公式斯皮尔曼举手之劳就可导出。但是他想到他的那些学

生今后还要到别处去开展工作，一定要有些研究成果才行，于是就将这些项目交给他们去做，以便他们能发表成果。讲到这里，先生总是停顿一下，用无限期待的眼神看着我们。

先生的意思很明白：我们不单单是要做学问，还要培养、帮助学生，使他们早日成材。这就是教育的宗旨！其实先生作为一位经历数代的教育家，自己不也是这样在身体力行，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吗？这些年来，很遗憾没能将先生所传授的知识学好用好，但在用心用力培养学生这一点上，可以保证是不愧先生之耳提面命的；非但如此，还经常告诉我们的学生，要将助人为乐的学德学风一代一代传下去，以至永远！

一九八三年，杭州大学心理学系文革后招生的第一届学生在做完论文后即将毕业。我因为曾带一些同学去工厂作调查研究，所以和他们都比较熟悉。有一天，毕业班的来水木同学在从六一针织厂一同骑自行车回家的路上问我：“全班同学要在植物园搞一次离校前的野餐活动，想请陈先生参加，不晓得可不可以？”我说：“我马上去陈先生家里，问了以后明天再告诉你们吧。”先生听了我的陈述，十分高兴，当即应允同学们的这项邀请，并且说，这样师生共同参加的活动，今后应当提倡经常开展，不要到快毕业了才举行。讨论了一会儿研究工作，天色已黑，师母就要我留下吃晚饭——我在先生家的餐桌上已是常客，如同自家人；与三位师妹亦平、亦惠和亦尚，更是言笑不拘，与华华也常有对话。

星期天一大早，先生的专职司机蒋师傅就开车来到先生家门口，将先生送到植物园。同学们已聚集在大门口等候。那天风和日丽，满目苍翠，鸟语花香，芳草萋萋。大家围坐在绿茵上，面前摆满带来的糕点糖果，兴致极高。

文革后恢复招生的第一届，真是人才济济，学艺俱佳，充满青年一代学生的生活情趣！联欢活动进行得热火朝天，丰富多彩，球类活动，文娱表演，诙谐妙语，笑声不绝。当时，每一个人都意识到文革后争取到的第一个学习机会是多么来之不易，为此十分珍惜。每一个人都意识到时代所赋予的重任，时代的脉搏就直接在自己的血管里形

成共振。每一个人都明白自己是杭大心理学系创建后的第一届毕业生。教师们数年的默默耕耘，就要看这一届毕业生今后工作中是否有丰硕的成果，作为衡量其收获的指标。每一个人都在心中燃烧着激情，充满着活力，摩拳擦掌，准备毕业后大干一番事业。这样强烈的斗志、高涨的士气，完全冲淡了因即将离别而难免的那种丝丝伤感惆怅之意。

同学们轮流一个个兴高采烈地又是发言，又是歌唱。最后，轮到陈校长给大家讲几句毕业赠言。在如此激动人心的情景感染下，老校长也显得和年轻人一样利索幽默。他在一阵热烈的掌声中忽地站起来，就像当年罗斯福总统在轰轰烈烈、暴风急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向民众作“炉边闲话”一样，即兴演讲，娓娓而谈，称赞同学们心怀天下、豪情万丈，希望同学们互相勉励、学以致用，祝愿同学们捷报频传、为校增光！

老校长的肺腑之言令在场的每一位都为之动容。许多同学眼里都情不自禁，热泪盈眶。然后，老校长的衷心祝愿溶化在经久不息的鼓掌声和道谢声之中。出乎意料地，老校长在讲话结束后，说要给大家唱一首他学生时代唱过的歌。大家刷地一下子静了下来，兴奋地睁大眼睛。只见老校长沉思片刻，似乎沉浸在电光石火的回忆之中，接着渐渐唱出一首我们都陌生的校园歌曲。那时而缓慢、时而昂扬的歌声，就像一首史诗，在诉说着一段久远漫长的故事，使我们隐约地看到，当年一批又一批的有志青年，为了洗清饱受苦难的中国的耻辱，肩并着肩，义无反顾地走向征途，为着崇高远大的理想而奋斗。那时而缓慢、时而昂扬的歌声，又像阵阵号角，在引导出一段永不完结的故事。令我们明确地看到，广阔的疆场将由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去驰骋，丰伟的功绩需要大智大勇去创建。有志之士应永远肩负着时代的使命，献身于民众的福祉。那时而缓慢、时而昂扬的歌声，是如此地鼓舞人心。听着听着，在场所有的人脸上都浮现出充满信心的笑容，尽管很多同学的眼角仍闪烁着激动的泪花。多少年来，往事已如过眼烟云，可是这段回忆却总是屡次生动地浮现在我的脑海之中，历久弥新。我想，所有参加那次毕业前联欢活动的同学都会将此珍藏在心中。先生

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教诲鼓励，其巨大作用是无可计量的，正如当天所在的“植物园”本身一样，桃李无言，下自成蹊。

联欢活动结束后，同学们渐渐散去。我问先生，有否与司机蒋师傅约好停车在哪里等候？先生笑而不答，在原地作了个踏步踏。什么？一位八旬老人要从玉泉植物园走向延龄路灯芯巷？我的头脑里出现了一连串的问号和惊叹号。可是当我注意到先生轻松而坚定的眼神，就明白这是动真格的。我知道先生素来非常体贴身边的工作人员。每逢节假日，就尽量让他们多有机会在家休息。但他老人家这天要这么远的路走回去，我心里实在没有底，顿时感到责任非同小可。于是，小心翼翼地扶着先生向前走去。谁知先生步履甚健，毫不蹒跚，根本不用我多费力气搀扶。只要帮他在高低不平处顾着点就行了，因为他老人家在七十八岁时做过白内障摘除手术后深度视觉欠佳。一路上，先生和我讲了许多话，大都是关于心理学研究和高教管理的事。他说，大学应增加选修课，大学教授应该亲自开课，也附带谈起如何勉励次子亦明在美留学要像他当年那样刻苦坚持之事，等等。途中，我不禁想起了以前读过的诗句：“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宋人程颢当年的感受，此时成了恰如其分的写照。边走边谈，不知不觉就到了先生的家门口。

是的，先生是一位令人尊敬的长者；先生同时在我们心目中更是一位最能与学子息息相通的知心朋友，因为先生的心是永远年青的。记得几年前，我到清华大学讲学，住在甲所。先生嘱咐我到她工作过的工字厅和住过的古月堂拍几张照片。后来，我将照片给先生看时，他非常高兴，指着照片上的房屋告诉我，当时古月堂西厢房住的邻居是从美国来的访问学者维纳，整日埋头专研，回美国后创立了控制论。我读过有关维纳的传记，他早年是一个神童，可是到了晚年，从剧院出来时竟认不得自己的汽车，不得不在停车场用汽车钥匙一辆一辆地去试着打开车门。而先生年逾百岁时，身心尚如此之健，真可谓奇迹！

我在清华讲学时，据闻当年清华有“三老”，其中有一位老学者是顾毓秀先生。而陈立先生比顾老还年长，居“三老”之首。这里究竟有什么秘诀呢？我想 L. J. Hall 的一段诗可以作最好的映证（后来此

段名诗又被引用在《Managing Stress and Anxiety in Various Contexts》
by Jonathan Smith, Putai Jin & Renae Low 一书的结束语中）：

Never, my heart, shalt thou grow old!

.....

One by one my powers depart,

But youth sits smiling in my heart!

陈立先生为国为民奉献终生，从未休息！在他老人家跨越世纪时，作为公认的心理学界泰斗和中国工业心理学奠基人，仍然夙兴夜寐，发出那无私的、宝贵的光和热！先生乃一代宗师，教承冯特、斯皮尔曼，育及中华、欧美澳洲。今天我们在这里纪念先生，就是要努力继承、发扬、光大他的学术思想、研究精神和高尚情操。“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哲人不朽，永存吾心！

（2006年1月8日深夜于悉尼）

[返回目录](#)

第六章：同学

应娅舒：“杭大之声”

—杭州大学外语系 60 级 林珍珍

（2022 年 3 月 31 日）

应娅舒教授是外语系 75 级英语专业学员。毕业之后，于 1983 年，又选择重新回到杭大外语系进修一年。

她就读外语系时，是个文艺活跃分子。由于她音色优美，普通话纯正，曾经在杭州大学广播电台担任主播达三年之久。

当时在校的师生都可以在午休和下午 4 点半至 5 点半时，收听她那甜美的声音。

当时她主持的节目就叫“杭大之声”。有位外语系 78 年级的同学前天告诉我，说他当年几乎每天那两个时段都会收听“杭大之声”，至今留有深刻印象。我想 77 级和 78 级的同学，那时一定都或多或少听过她主持的广播节目。不言而喻，当年她也是年级的文艺骨干。

此外，娅舒的业务水平也很突出。她参与了将于今年六月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六十多万字的【汉英双解重难点实用词语字典】英译文的初审工作。

退休之后，应娅舒教授始终退而不休。除了为北京邮电大学担任教学质量督导工作外，个人的业余爱好也十分广泛。她在老年大学学习制作视频。这是一项耗时的工作，而且需要独创精神。应娅舒学会操作方法之后，常尝试运用学到的技能为亲朋好友及从前的同事制作视频。

[返回目录](#)

“背字典”的语言奇才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辛赛克

（2022 年 10 月 21 日）

一张老照片勾起了对往事的回忆。

李迎波来自江苏苏北县城沭阳，1962 年出生。16 岁考上大学，在 78 级中算是小字辈。他是我大学时期的同窗师弟。

大学四年，我俩每天坚持练习口语，风雨无阻。每晚 6 点半，我们会在学校正门前的道古桥碰面，前往黄龙洞。这既是散步也是学习。此外，他还是我排球的陪练。在外语楼后的草坪上，他防守极佳。我扣他防，几十个来回厮杀，精彩纷呈。

李迎波天资聪颖，机敏过人，一脸稚气，声音清脆悦耳。每次班级考试，大家屁股尚未坐热，他就交卷了，当然都是高分。当年，外语系有几位挺厉害能背英语字典的大神：77 级里有甘恢挺，78 级中有郑嘉平和厉绍雄等。特别是厉绍雄经常气定神闲让人考问，词汇量三万以上，令人刮目。

在汉语中，字典、词典、辞典是有区别的。字典，是以查字的笔画、发音为主的书本；词典，比字多了一层：组词和释义；辞典，是在字典和词典的基础上增加了词的使用方法，基本上包含了词、句的所有知识。然而，学英语的人说“背（英语）字典”范围宽泛，习惯将上述这些分门别类统统一网打尽。

大三时，李迎波去外文书店购买了新版《朗文当代英语辞典》，开始独辟蹊径，剑走偏锋。他每天背诵数页，熟记里面的词义、词组的固定搭配、句型及例句。烂熟于心，了然于胸，然后将其撕下，让我当晚散步时用以检查（也包括之前的内容）。一本《朗文当代英语辞典》当时要花十元钱，专业权威的工具书，人人将其奉若神明视如珍宝，“不可一日无有君”，撕去扔了是想都不敢想的事。博闻强记，过目不忘。李迎波的“野路子”堪称登峰造极、旷古绝今、无人可及！

朗文英语辞典被公认为是最好的英语工具书，凭借其准确、简明易懂的释义，在英国本土及海外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它收词量大，新词语多，例句丰富多样，自然地道的词组搭配全面，实用而详细。这是一部由母语为英语的人编写的纯英语辞典，无论是释义还是例句，都是用英语表达的，没有中文对应词和翻译，为学习者提供了一个纯英语的环境（学过英语的人都知道，英语单词翻译成汉语有时候反而给人造成误解）。这本辞典 1286 页，又厚又重，两块砖头的厚度。李迎波刻意选择了它，以掌握英语精髓，学会用英语思考，难度可想而知。

大四时，厚厚的一本英语辞典被他一页一页地撕去化为乌有。有形资产变成了无形资产，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物理世界和化学世界中的物质不灭定律与能量守恒定律在他身上演绎得炉火纯青。惊叹他的大脑拥有惊人的记忆力和无限的储存空间，像海绵吸水一样不断吸收新的知识，变成了一本活字典。属虎的他，掌握了海量的词汇，厚积薄发，如虎添翼。此外，他还博览群书，藏器待用，好学不倦。

家里的父母、姐姐都非常喜欢这位即懂事又聪明的小弟弟。

中国重返联合国、特别是 1973 年中文从联合国的官方语言提升为大会和安理会的工作语言以来，中文翻译人才的紧缺立即凸显出来。而出色的同声传译人员，特别是在中文方面，“就像音乐会小提琴手一样稀少”。于是，中国政府和联合国达成共识，为青黄不接的局面合作开办联合国译员训练班。

有志者事竟成。82 年毕业前夕，他参加了联合国英语同声传译员的考试。犹如《三国志》中的关云长千里走单骑，李迎波过五关，斩六将，单刀赴会，信心满满，志在必得。

预试、初试、复试三部曲。当时，全国英语专业有 800 多人参加了预试，近 300 人通过。而后，分别进入在北京、上海、广州举行的初试。初试的英译中考题来自外刊杂志中的一篇文章，考生必须知道其中的“north”和“south”是指代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文考题包括古文和成语等，比如问“厉兵秣马”中的“秣”是什么意思。

复试在北京举行，到这一轮时只剩下 40 余人。复试也即联合国译训班的入学考试，难度堪比古代科举。考官共 14 人，联合国方面的 8 人包括联合国人事司司长、翻译司主官等。考题由联合国官员带来，考生按顺序单独面试。联合国考官关注的不仅是应试者的英语水平，还有考生的举止、谈吐、风度等整体印象。很难想象他当时的临场发挥及表现，可结果说明了一切。李迎波脱颖而出，旗开得胜，初战告捷。

然而，在北京的日子“亚历山大”，并不轻松。“观察培训”实质上就是“淘汰式培训”。首先是魔鬼式的强化训练，由翻译室的几位前辈每天陪学员做大量的听力、口译和笔译练习。培训的强度很大，所用的教材时效性很强，基本上都是当天的新闻和评论，或近期的热点话题。教学时使用的材料以联合国的会议记录、报告为主。里面涉及许多专门用词、写法。这些“套路”都需要学习和熟悉。外交部还会邀请一些专家来授课，同时全面观察学员的英语基本功、翻译潜质、领悟力、语言表达习惯、声音状态、刻苦精神、承受高强度工作压力的身体和心理素质……。大浪淘沙，优胜劣汰，只有最优秀的学员才被最终录用。李迎波笑到了最后。官方数字：从 1979 年到 1994 年，联合国译训班共开办 13 期，为中国培养了 200 多名口笔译员，平均每期不足 20 人。

84 年李迎波由外交部派往瑞士驻联合国日内瓦机构工作。除了总部所在美国的纽约设有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和秘书处外，在各国城市当中，瑞士日内瓦是联合国设置办事处或总部最多的城市。这里汇集了世界贸易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林林总总 30 个机构，成了他施展才华一展抱负的用武之地。

89 年他成为自由译者（Freelancer）。再次见到他时，李迎波已是两个可爱男孩的父亲。妻子贤惠大方，一家子在日内瓦安居乐业。我在瑞士洛桑学习，抽空去看他。一尽地主之谊，他邀我参观了联合国万国宫。其胸前佩戴的“中英法”语种徽章耀眼夺目向世人昭示，他不但可以用英语，还能用法语。口译笔译一肩挑，驾轻就熟得心应手，在联合国的舞台上大放异彩。

1945年二战结束后，国际军事法庭在德国纽伦堡开庭，迫切需要创建一个快速、公平的司法程序来审判被告席上22名前纳粹高官。纽伦堡审判包括数十次对纳粹德国军政首脑的军事审判，以及包括纳粹德国内阁在内的六个组织，历时一年（1945年11月21日-1946年10月1日）。法官和检察官来自美国、英国、苏联和法国，被告及其辩护律师来自德国，审判过程中需要同时使用英、俄、德、法四种语言。

如果四种语言交替传译，将需要花四倍的时间，具体做法是，比如一人说德语时，其他语言的译员做笔记，然后依次翻译。法语之后是俄语，然后是英语。对纳粹战犯的讼案需要尽快结束，也需要尽可能公开、透明。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不同语言的口译同步进行？当时能够做翻译的人员有，但法庭、会议同传人才严格说来没有。

纽伦堡审判改变了这一切。法庭上，英、俄、德、法四种语言的译员并排坐在长桌上，每人戴耳机、持麦克风、放低声音，面前竖一块玻璃隔板以便防止干扰其他同事。他们可以听到屋里的一切响动。如果被告说德语，那么德语同传保持沉默，其他同传即时通过麦克风口译把德语分别译成法语、英语、俄语。法庭上所有人都佩戴耳机，任何人发言都必须使用话筒。听众、法官、律师还有记者可以通过调节接受器频道选择译语种类，也可以直接收听原语。频道1至5分别是原语、英语、俄语、法语和德语。纽伦堡审判四种语言实时传译成功，开历史先河，在大型国际场合中上演了首秀。

纽伦堡审判的美国首席检察官罗伯特·杰克逊（Robert Jackson）在回忆中说：“这次审判的顺利和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优质的同传口译系统和优秀的高素质译员”。

纽伦堡审判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一个无与伦比的经典，是人类智慧和技术成就超越语言障碍、实现崇高的公平理想的典范。因为它标志着一种崭新的口译形式的正式确立，而且从此成为国际会议不可或缺的翻译方式。

同声传译是翻译的最高境界，是一项极度烧脑的工作，是在不中断发言者的情况下，不间断地将内容口译给听众的一种翻译方式。要求译者不假思索地迅速完成听取、理解、信息重组和翻译的整个过程。

这种翻译方式能够把会议中讲话人的讲话内容同步翻译到会议中，以实现信息的即时传递。同传口译必须对两种语言的运用都非常娴熟，具有高超的语言技巧和专业的语言表达能力；其次，同传译员必须有“闪电般的思维能力”，因为他在听到的一瞬间就必须理解并且转换语言同步输出他所听到的内容。

同声传译属于全球稀缺人才，也是最难培养的人才之一。李迎波后期所加入的日内瓦 42 人联合国国际翻译团队中，多数是自由译者。联合国对从业人员有着严苛的要求，真正掌握英语做到博大精深绝非易事，而法语则是一门更难学的语言，语法比英语复杂、动词变位千变万化、名词有阴阳性……，师弟靠惊人的毅力自学成才，凭勤奋和天赋创造了奇迹。他在“野路子”上不断进取，撷英采华，有正有奇，是毅力、技能、执着、泪水、汗水综合作用的化学过程，形成了自己的口译学习方法体系。他说，做同传和做新闻挺像的，都需要你是杂家，要求你有极强的学习能力，在短时间内获取大量信息。外语一定要好；中文底子一定要扎实；翻译技巧一定要过硬；知识面一定要广。这就是核心竞争力。谈及笔译，他努力追求这样一种境界：他使你看不到他，他变成一层透明的玻璃，透明得使人看起来，就像没有玻璃一样。联合国的工作给了他一个融入世界的机会、眼光和视野。闲谈间，我提起了大学时期背字典、撕字典的往事，两人不禁开怀大笑。

99 年他举家去了美国。临行前，他给我留下了美利坚的新地址及电话。之后，却石沉大海，杳无音讯……。

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我们俩，虽然我长他 6 岁，他却更像是我的良师益友。走着走着，曾经的莫逆之交，离别之后，竟然也会天各一方，不再相见。生命原来是一场有规律的相遇与错过。人与人之间就是不断地找寻和丢失。

杭大给了我们人生的舞台。四年寒窗磨一剑，风华正茂渴望求知的年代难以忘怀。现实生活中，其实大多数人都按部就班地过着自己的生活，默默地接受生活给予他们的一切，就好像自己的人生“命中注定”一样。但是少数人在努力奋争，试图改变自己的命运，并将改

变命运的想法付诸于行动，命运由自己主宰。开始，我们有相同的命运；后来，选择改变了各自的人生。

真正改变命运的是信念和行动。莫非家境平平的他少年时就胸怀大志志存高远？莫非 78 年的“高考”是他实现梦想和阶层跃迁的唯一天梯？莫非 42 年前背字典成为他挑战自我改变命运的动力和原点？又回到最初的原点，却再也找不回最初，只有原点。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收笔时，下意识上网搜索了他的信息。网上同名同姓叫李迎波的有好几位，对上号的只有一位。在他母校江苏沭阳中学网页校友风采栏目中，李迎波的名字赫然在列。这则消息发布的时间为 2011 年 4 月 2 日。虽然是 11 年多前的旧闻，但仍让我感到欣喜：“李迎波，男，1978 年沭中毕业，考取杭州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1982 年毕业又考入北京联合国译训班攻读硕士学位，1984 年由外交部派往联合国日内瓦分部，担任英语、日语、法语的口语翻译和笔译翻译至今”。学无止境，勤则可达。新的飞跃，新的奇迹。什么时候他又驾驭了日语？！这背后的悬梁刺股只有他才清楚。

既然选择了远方，选择做生活的强者，便只顾风雨兼程。

中国有句成语叫绝顶聪明，李迎波就是这样一位出类拔萃的奇才。他是杭大的骄傲。



1980 年与李迎波（左）摄于西子湖畔

第七章：校园

图书馆轶事与我的杭大情结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辛赛克

60 年代中期建造的杭大图书馆大楼，坐北朝南，矗立在校园正中。它是杭大的名片和骄傲。您可别不信，它曾经是杭州市的地标和最高建筑。这个记录一直保留到文革以后几年。当年八层楼高的主楼与两旁三层附楼紧密相连，形如大鹏展翅。外墙涂色为淡淡的苹果绿，非常好看。这在当时是一大景观。

很少人知道，图书馆大楼的建造初期，它的地基是当时的老杭大学生，肩挑手提，赤脚挥汗，一簸箕一簸箕，硬是从泥泞的工地上挑出来的。挑出来的泥土就堆放在西侧的空地上。这种吃苦耐劳精神，如今难以想象。前辈们谱写了一曲战天斗地、不屈不挠的“杭大精神”。

我从小生长在杭大。孩提时代，除了西湖、钱塘江和保俶山，杭大校园便成了我和发小们经常玩耍的另一片天地。大楼竣工后，门楣上方悬挂上沙孟海题写的“图书馆”匾额。我们这些淘气的孩子，捉迷藏、玩游戏、斗蟋蟀、抓知了、放风筝、打乒乓、踢足球、练车技，玩遍了校园每个角落，自然不会放过图书馆。那是我们登高望远之处。顶楼居高临下，海阔天空，一览众山小：保俶山、松木场、黄龙洞、牛奶场、道古桥及稻田风光，尽收眼底。难忘的童年，真是一段快乐的时光。

图书馆大楼虽已落成，还未及搬迁进入，便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1966 年 9 月 5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红卫兵到北京及全国各地大串联，把“文化革命”的烈火烧向全国。所需食宿和交通费一律全免。于是，红卫兵迅速出动，神州大地到处都有红卫兵的身影。

激情燃烧的岁月，大串联使图书馆成了接待全国各地红卫兵下榻的住宿营地。图书馆门口挂着一幅醒目的横幅标语：“毛主席的红卫兵，杭大欢迎您！”白天大楼前广场上，熙熙攘攘，热闹非凡。天南

地北的人操着不同口音，各路红卫兵长征小分队出发前，扛着红旗，手拿红宝书，引昂高歌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继而奔赴新的战场；表衷心 and 跳“忠字舞”亦是天天上演的节目。当年佩戴、收藏、交换毛主席像章，是一种时尚。亲眼目睹一位北方大汉以杨子荣打虎上山的姿势亮相，双手将棉大衣左右甩开，里面藏着几十枚金光闪闪的毛主席像章，令人瞠目结舌。很羡慕这些大哥哥、大姐姐挂着红卫兵袖章，头戴军帽，身着绿军装，皮带束腰间，威风凛凛走南闯北。他们是时代的宠儿。文革中，顶楼成了造反派“文攻武卫”的司令部。好在当时图书馆没有藏书文物，否则“破四旧”运动必定要对其实现无产阶级专政，难逃付之一炬的文化浩劫。实属万幸。

我家住杭大河南宿舍（也称道古桥宿舍或杭大新村），从小深受杭大人文环境的熏陶。中学是杭大附中（文革中改名为学军中学）。上学由南向北穿越整个校区，图书馆大楼西侧是必经之路。中学老师皆是杭大培养出来的教坛精英，学界翘楚。他们博学多才，治学严谨，能做他们的学生、接受优质教育是我一生的大幸。文革期间虽有“停课闹革命”极左思潮的干扰，不能安下心来好好念书，但学校始终未出现大的动荡，实属不易。作为省重点中学（唯一对外开放的中学），母校经常有接待外宾的任务。美国和加拿大团居多。每次来时，都对我们竖大拇指。有一次，美国男子篮球队来校参观，特别提出与我校排球队进行一场表演赛。能和大名鼎鼎的美利坚巨人同台竞技，意义非凡，深感幸福和自豪。这事让我兴奋了好多天。

几件难忘的事：

一：乔迁之喜

当年图书馆搬迁前夕，连续数日组织师生排成长龙，像蚂蚁搬家一样，手手传递，将大楼真正的主人——一本本书籍搬进宝殿。好大阵仗，神龙不见首尾，场面极为壮观，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结束文革，拨乱反正，使知识重新得以尊重。杭大图书馆作为一个储存与传播文化知识的琅嬛福地，世纪学府，守望价值，将无形的知识与文

明发扬光大，薪火相传。读书点燃智慧，知识照耀人生，最是书香能致远。

二：朝夕相处

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震惊中外。中苏交恶，爆发军事冲突，乃至核战争的可能性在向高位累积。林彪以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名义，发布第一号令。杭大也受到了影响。11月各系“战备疏散”，分散到省内各地，直到次年1月下旬才返回杭州。母亲是杭大的校医，带着我随杭大化学系来到浙江德清莫干山的后洪。这是文革前最后一批65级的学生，知书达理，文化素养极高。与他们朝夕相处，结下了深厚的友情。母亲人缘好，除了杭大师生还为当地百姓看病。而我的出现，成了大家的开心果。郑小明（留校青年教师；曾任杭大校长）、吕根法、伯守芝等，还常常逗我玩耍。浙北山区的冬天，天寒地冻，滴水成冰。老乡将圆竹筒中间的节打穿，特地为我做了个尿桶，方便夜间速战速决。清晨倒尿时，竟结起了冰柱。“珍宝岛”事件，促成了中美关系“解冻”。基辛格几度秘密到访，为尼克松总统访华及中美建交铺路。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瞬间发生微妙变化，从而改变了当时中苏力量的对比，上演了一部新版《三国演义》。此乃后话。

三：争夺资源

杭大地杰人灵，万物皆宝，就连臭大粪也成了香饽饽。当年为了争抢杭大校内的化粪池，邻近的黄龙洞生产大队和花园生产大队的农民，常为粪便的归属权而发生纠纷，甚至冲突。远处的古荡生产队馋涎欲滴，也想横插一杠，分一杯羹。有一次，黄龙洞和花园双方竟出动大队人马聚集在图书馆大楼前。场面失控，青壮年男性手持扁担粪勺怒目相向，准备大打出手。对于此类贫下中农“群体斗殴”事件，校方是劝不住架的，也无法判断是非曲直。只有让西溪派出所干警来平息事态。

四：沙场风云

73 至 75 年间，发小们打排球上了瘾，组成“杭大家属队”。当年，对手是体育系男排。每当比赛时，杭大的教师和家属，立场分明，聚集在场边为我们加油助阵。体育系屡屡成为手下败将。此外，我们还常与“浙大家属队”较量。这是一段值得回忆的骄傲往事。杭大人才辈出，家属更不例外。小伙伴中藏龙卧虎，里面有杭州少体校的选手，还有两位日后成为职业排球运动员（韩华明——浙江省队；郭勇——解放军新疆军区）。我身高不占优势，却爆发力强，弹跳出色，扣球和拦网一点都不吃亏，是家属队中的主力。大学期间，我任杭州大学男排的队长。

五：文化盛宴

周六晚上是杭大电影时光。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的物质生活虽然并不富裕，但精神生活却丰富多彩。每逢此时，教职员工及家属会早早用了晚餐，扛着竹椅板凳，扶老携幼，兴致冲冲，来享受这顿精神大餐。露天电影的放映通常是在大操场或外语楼后的草坪上。只见场上人头攒动，人们兴奋地伸长脖子、翘首仰望的样子，至今历历在目。就连银幕的反面也常常座无虚席。操场草坪一角摆着一张方桌，便是售票处了。除了学校的教工家属外，杭大的电影还吸引了周边的影客（沿山河村、建工宿舍、铁路新村、邮电宿舍等）。当时，要家属卡才能进入杭大校门。为了能看到电影，于是乎，这些校外之人翻墙进入校园。电影票价格则根据影片的长短（寒暑假时会连放两部电影），经典片或普通片等因素来定价，为三分、四分、五分三个等级。有些小孩为了省这钱买棒冰，往往逃票。经常看到总务处的人打着手电筒查票。查到后，一阵呵斥，若还不补票，则伴着哄笑声被撵之银幕背面去看反电影。雨天和冬天，则在大礼堂或健身房放映。杭大继承了抗战时期浙大西迁的优良校风，整个校区像个和谐的大家庭。众人生活在同一个屋檐底下，友爱相处，融洽的关系令人称道。每场电影我都去，从未缺席过。预告中如有好片，还会早早摆上小板凳占个好位置。有国产片，也有进口片；洋电影都来自社会主义国家。早期有苏

联，关系破裂称其“苏修”后，就只剩朝鲜、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等。这些影片您看过吗？“列宁在 1918”、“攻克柏林”、“卖花姑娘”、“摘苹果的时候”、“鲜花盛开的村庄”、“看不见的战线”、“宁死不屈”、“海岸风雷”、“橡树，十万火急”、“沸腾的生活”、“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桥”……。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堪称经典，拍的好。里面的歌声能够打动心弦，让大家的眼泪流得稀里哗啦，不简单啊！《鲜花盛开的村庄》和《摘苹果的时候》的音乐充满欢乐，甜蜜的生活。这场景简直就是共产主义，令人向往。

75 年，我高中毕业，下乡度过三年难忘的知青岁月。当年，杭大子女集体下放的知青点在萧山，唯独我独自去了浙南山区龙泉。这是父亲的意思。1958 年杭大建校时，他与一批军队干部转业来到杭大。中央要求各高等院校加强党的领导。他时任校党委宣传部长，做党组宣传工作。当时，龙泉县委书记是他昔日的战友。联系后，就把我放到龙泉。父亲认为，男孩子远走高飞，多吃些苦，能锻炼人，日后能成才。是他亲自把我送到了龙泉，很有送儿上战场的感觉。下放的地点是茶丰公社查阳大队小查田生产队，在龙泉县城东南 30 公里处。山路崎岖，蜿蜒曲折，再前行几十公里就到福建的地界松溪了。

这里没有知青点，穷乡僻壤，单枪匹马，独自开伙，还得学习当地方言。一个四壁透风夯土墙砌成的房子就是我的新家。那个年代，山里没有电，没有任何农业机械，使用的还是世代代传下来的锄头铁耙，依然采用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方式。不像杭嘉湖平原，山区多种经营，人人须是多面手。除了在梯田中种植水稻，肥田耕地，还得兴修水利，劈山造地，伐木造林，种植香菇白木耳，经营竹笋木材等副业。

挣工分：男的正劳力每天 16 分，女的 11 分，刚开始我拿 9 分，半年后就干上了全劳力。几十里的山路挑着百十斤的东西，轻轻松松；满手血泡、满手老茧，战天斗地，逐渐掌握了各项农活。别小看这个工分，口粮的分配就是以此为依据的。下乡日子清苦，一年中吃不到

几回肉，村里农民家杀猪时，方能打打牙祭。干体力活，胃口惊人，常常一顿饭一斤米。米饭在锅内煮沸时，得掌握好火候，及时将灶膛内柴火熄灭，靠炭火的余热使之水到渠成；盛放在龙泉青瓷大碗里，吃着世界上最香的米饭，尤其那锅巴，妙不可言。能餐餐吃当季香甜的大米，这恐怕是农民比城里人唯一优先享有的特权了。艰苦的环境磨练了我的意志。我还自己养鸡下蛋，在自留地里种了各种蔬菜（黄瓜、茄子、丝瓜、芥菜、长缸豆、西红柿、青菜、葫芦、南瓜等），改善生活。下乡最大的收获是：了解农村，了解中国最底层、最真实的一面。广阔天地很锻炼人，它培养了我独立生活能力及吃苦耐劳的精神。有过这段脱胎换骨的经历，还有什么吃不起的苦？！

77 年高考恢复，给我返城带来了希望。第一年时间太仓促，我没有参加，78 年不能再错过了。临考前三个月，老校长王蛟号召学军校友回母校应试补习。感谢糜一模、吴亚南、卢瑞宝、程兰华、史佩珍、王文源、黄正炎等老师的付出，没有辜负他们的心血。当年，我是在龙泉小梅乡参加的高考。炎热的高温天气，母亲特地赶来，为我做饭，照顾我的生活，让我专心应对考试。高考恢复之年，学军中学考生上线率，高分率为全省之冠。我是丽水地区的文科状元。外语系朱锦清老师在丽水对我进行了英语口语。保险起见，我还加试了体育：百米跑和摸篮板（测试弹跳），均达标。当时英语备受青睐很吃香，填写入学志愿时，毫不犹豫地写下：1. 杭大外语系；2. 杭大中文系；3. 杭大体育系。告别农村回到杭州，母亲才向我透露了她那时最大的担心，怕我耐不住寂寞，春心荡漾，荷尔蒙爆棚找了农村姑娘，私定终身，干出石破天惊的大事。那可真得扎根一辈子了。

时过境迁，物是人非。历经了龙泉三年插队磨练，1978 年“我胡汉三回来了”，回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世界，成了杭大的学生。见到图书馆，又回想起往事，不禁心潮腾涌百感交集。失去了三年黄金时间，大学时，读书有种饥渴感。常去图书馆，喜欢那里的静谧氛围。不光因为那里看书效果特别好，还因为只有在那里才能读到当季的国外英语杂志和各类期刊。尤其欣赏杂志的纸张质地、精美印刷和排版画面，就连洋杂志散发出来的气味都令我着迷。提高阅读能力、开拓

知识面，图书馆成为我了解西方世界的一个重要窗口。大学生活是我人生经历中最充实、最宝贵的一页。

毋庸置疑，位于校区中心地带的图书馆是杭大的灵魂和脊梁。80年代后期图书馆大楼翻修一新，主楼加高一层，还安上了个琉璃瓦顶。两边的裙楼也由原来的三层加高到五层，更大气了。1982年毕业时班级集体照，2017年毕业35周年年级团聚，无一例外选它作为背景，只要你是杭大人，一定有和它的合影。说它是杭大的形象大使一点都不为过。

中国传统文化“以中为尊”。“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吕氏春秋》）。地处中轴线上的图书馆大楼占据学校中心位置，是3个“中”字的集中体现。

“中”是相对的，需要两翼、四面八方呼应。图书馆正前方是保俶山和西湖。最前沿两侧分别是经济旅游系楼与法律系、哲学系楼；紧接着两侧是50年代建造的化学楼和行政楼；殿后的物理系楼和外语系楼则遥相呼应。后方的文教区栉比相邻接踵而至：学军中学、杭州外国语学校、杭州幼儿师范学院、国家海洋研究所、浙江师范大学、浙江商学院、浙江工程学院、浙江财经大学、浙江工商大学、浙江计量学院、杭州广播电视大学、浙江电子工学院、浙江丝绸工学院、省委党校……。

我以为，中轴线是一条物理轴，也是一条精神轴、文化轴。杭大及身后的文教区独有的壮美排序就由它的建立而产生；前后起伏，左右对称的空间都是以这中轴线为依据的，气魄之雄伟就在这个南北引申、一贯到底的规模。杭大图书馆大楼恰似一艘乘风破浪的旗舰。它是领军者，用知识领航，引领千军万马，走向未来。

杭大历史悠久，前身最早是创建于1897年的求是学堂、育英书院。1901年-1914年曾几度易名，1914-1927年停办；1928演变为“国立浙江大学”；育英书院于1914年沿革为私立之江大学。1937年日军占领杭州。抗战期间，浙大举校西迁，在贵州遵义、湄潭等地办学七年。1946年秋回迁杭州。1958年定名杭州大学。其校训为：“求是育英”。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大学停办。1970 年，招收工农兵大学生。1977 年，杭州大学迎来了高考恢复后的第一批大学生。

杭州大学 —— 曾经的思想高地和学术重镇！1998 年 9 月，它与浙江医科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大学四校合并成了新浙大。至此，杭州大学成为历史名词。“杭大”图书馆也变成浙江大学西溪校区图书馆。而当年群星璀璨的西溪路 56 号（杭大新村），也是人去楼空。如今，它们虽已远去，但杭大精神不灭，杭大人的归属感不减，杭大人的身份认同不变！

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曾说过：“一个人的童年将影响他的一生。”童年经历对一个人的性格和命运的影响巨大。古人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更有“孟母三迁”的故事，无不说明环境对人成长的重要性。我很幸运，幸福的童年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杭大充满书香的环境无疑是最好的成长土壤，让我终身受益。

对于杭大图书馆，我有一种特殊的情感：亲眼见证了它的诞生、成长、发展与变迁。它伴随我成长，它曾是岁月的见证，也是我心中永远的丰碑。每次回国，都会去那熟悉的地方走走看看。当年沙孟海题写的“图书馆”匾额依然悬挂在门楣上。触景生情，感慨万千。我的杭大心依然如故。杭大的土壤养育了我，它是我挚爱的家园，更是我童年的原野与乐土。

[返回目录](#)

我经历的一次化学系搬家

—杭州大学化学系 77 级 陈恒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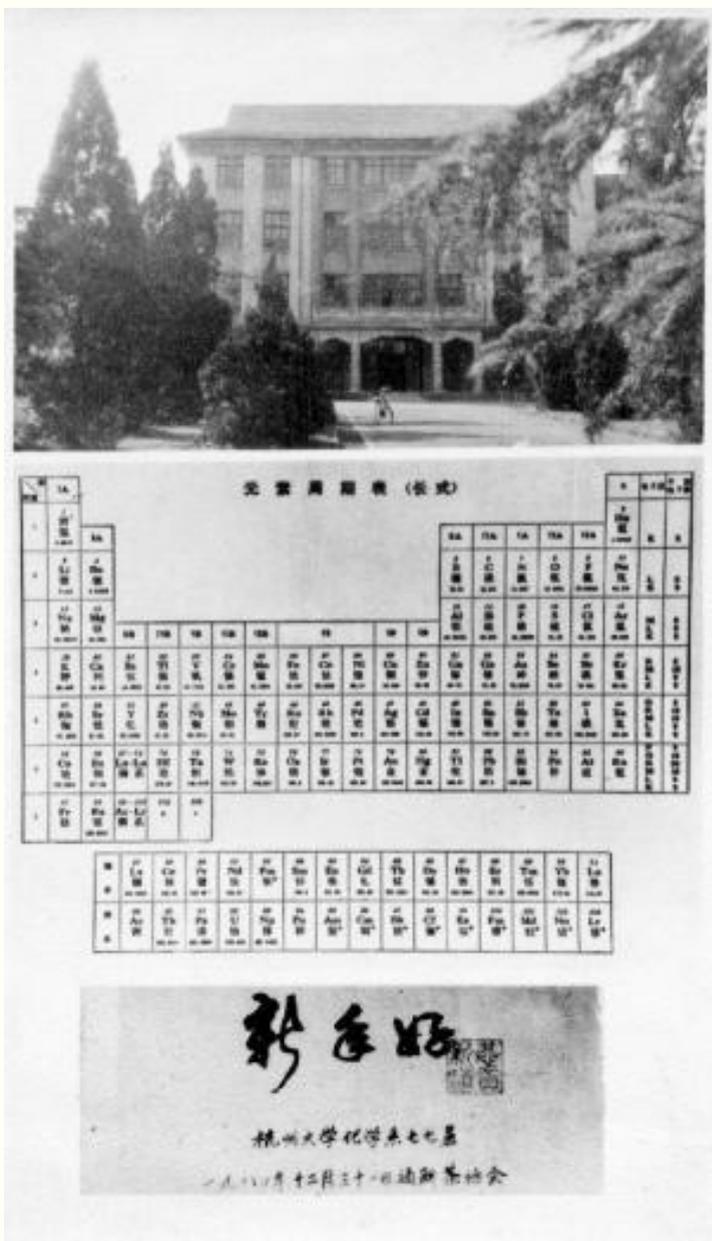
我是 1978 年春季考入杭州大学化学系学习的，与化学系 77 级的其他同学一起，在天目山路 34 号（当年的门牌号）杭州大学主校园内度过了令人难忘的 4 年大学生活。

入学时，杭大化学系位于西二教学楼（也称为老化学楼）。整幢 L 形中式大屋顶的 4 层建筑为化学系所独占。楼大门面向东，正对校中央花园的喷水池。进楼后是门厅，两边是布告栏。从门厅向右拐入 L 型的底边部分，是化学系的教室区。从 1 层到 3 层，每层有 1 个可以容纳 2 百人左右的阶梯教室。除此以外，还有一些小教室也在这一区域的各个楼层。小教室内没有课桌，只有扶手椅。从门厅向西是长长的走廊。走廊的南北两侧分布着办公室、教学实验室和科研实验室。其中一楼是无机和工化的教研室和实验室，还有 1 个可容纳百把人的中型教室；二楼是系党政团办公室、有机组教研室和实验室；三楼的东面部分是分析教研室和实验室，西边则是物化教研室和实验室。门厅部分的主楼有 4 层，顶层 2 百多平方米，是化学系的资料室，收藏有数万册中外期刊和书籍，包括 1907 年（创刊）到 1980 年的美国化学文摘（CA）。

我们当时并不知道，老化学楼并不是杭大化学系的发源地。后来，听我的老师讲，杭大化学系的发源地位于今日学军中学北面的国家海洋二所大院里。1958 年，浙江师范学院从六和塔秦望山上的之江大学原址迁到松木场附近，并入正在筹建的杭州大学。浙师院化学系从六和塔秦望山搬下来后，迁入了当时工农速中的一幢称为红楼的建筑里（当时的红楼位于现海洋二所的大院里，是一幢红砖墙、黑瓦片屋顶的 3 层建筑，如今已不复存在）。所以，红楼应该是杭大化学系的第一个家。在那里，化学系度过了她最初的 2-3 年。1960 年前后，杭大本部的老化学楼落成以后，化学系就从文三路北的红楼搬进了文三路

以南、天目山路北边的老化学楼，成了该楼的第一位主人，并在这里呆了 20 余年。

上世纪 70 年代改革开放以后，高等教育快速发展。杭大化学系每届招收本科生的人数从 77 级的 90 余人，发展到到 78 级的 130 余人，以后稳定在 120 人左右。在校本科生的规模达到了 5 百多人左右。随着无机、有机、分析、物化专业各硕士点的建立，研究生也达到数十人的规模。因此，老化学楼已经不能适应化学系培养人才的需要。从 1980 年开始，在杭大校园的西北面，开建新化学楼。新化学楼（如今的西溪校区西七教学楼）于 1981 年春



1980 年底化学 77 级迎新茶话用的贺年卡采用了老化学楼的照片和元素周期表做主图

季落成，2万多平方米的建筑围绕一个小池塘，分成A区和B区两个部分：A区南北走向有5层，是办公和科研区。其中，一楼是无机和工化教研室和实验室；二楼是系党政团办公室、物化教研室和实验室；三楼是东侧是系资料室，西侧是有机教研室和实验室；四楼东侧是分析教研室和实验室，西侧为结构化学教研室和实验室；五楼东侧为高分子教研室和实验室，中间是环化教研室和实验室，西侧是6个小教室。B区东西走向有4层，是本科教学区。每一层各有2个大实验室（每个可容纳40人同时做实验）、1个实验准备室和1-2个器材和药品室。从一楼到四楼，依次为无机、物化、有机、分析的教学实验室。另外，B区的2-4层建有3个有2百多座位的阶梯教室。1层是工化教学实验室。B区的每一层与A区有一小天桥连接。

在上世纪80年代初，要将化学系的瓶瓶罐罐、仪器设备、图书资料、实验和办公家具从位于南门边的老化学楼搬到西北边的新化学楼，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那时候不像现在这样，可以找搬家公司来服务。化学系的那次搬家全靠教职工和学生自己动手。记得81年春学期考试刚结束，6月30日我们的班主任张孙玮老师将77级全体同学集中起来开会，做了搬家动员，并对搬家的任务分了工。当时77级的同学已经按无机、有机、分析、物化、高分子5个专业方向分了班。我所在的77分析化学专业班承担了搬运化学系资料室图书资料的任务；77无机专业班则承担了搬运系保管室实验器材的任务。78级和79级的同学也参加了这次化学系的搬家工作。从老化学楼到新化学楼，大概有2-3百米路，为了提高搬运效率，系里的工人们将人力三轮车和二轮大板车上捆上铁管做成的加长加宽架子，以便可以承载更多的东西。化学系的实验和办公家具、大型设备、一捆捆的图书，就是由同学和职工们推拉这4-5辆人力车，来回奔波于新、老化学楼之间，一车一车运过去的。贵重的精密仪器，则是由同学捧着或者抬着直接搬到新化学楼的。资料室在老化学楼4楼，将一捆捆重量达十几、二十公斤的图书资料从4楼搬下来，工作量很大。工化教研室的吴增加和金振番老师设法在资料室东面的窗口装了一个滑轮，用粗麻绳挂上一个吊篮，做成一个人力升降机，用它将图书从4楼降到地面后装车运到新化学

楼，再由同学每人 2 捆搬到 3 楼新资料室上架。就这样，化学系 77、78、79 级三个年级的 3 百多位学生与教职工一起，自力更生、齐心协力，在 1981 年的暑假完成了这次化学系的搬家任务。

搬入新化学楼以后，化学系的教学和科研条件得到了显著的改善。在这里，杭大化学系的有机化学博士点、国家理科（化学）教学和科研人才培养基地等重要的学术和教学机构相继建立了起来。研究生的规模也扩大到近百人左右。

1998 年“四校合并”后，新化学楼成为新浙大化学系的一部分。紫金港校区一期建成后，化学本科教学从西溪校区完全迁到紫金港校区。新化学楼内的格局起了很大变化，所有的房间都成了化学、环科、药学等学科的科研实验室。2003 年前后，新化学楼的外墙、门窗和内部楼梯走廊等公用部位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装修，使大楼焕然一新。如今，因城市发展和环境保护的需要，一些污染较大的化学实验室已从新化学楼迁出。也许，若干年以后，随着紫金港二期的建成，新化学楼可能不再会承载化学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功能。但是，西溪校区内的杭大老化学楼和新化学楼，将永远铭刻在从上世纪 60 年代开始的数十届学子的心中，因为这里是我们母系曾经的家！

[返回目录](#)

常忆西溪河下

—杭州大学成教院外语系 88 级 严芸芸
(2022 年 7 月 9 日)

常常想起西溪河下，杭州大学外语系东门的那条小路，有一种久远的记忆。靠近东门的食堂，白天吃饭，晚上变成交谊舞厅；霓虹微亮，三三两两出双入对，漫步在西溪河下。小鹿般撞击的青春花瓣，如今像一坛陈酒揉进相思的梦里。

读书、上班，我曾经在那条小路上来来回回走了十几年。河边长着两排桐树。那些无奈的美好年华，两点成一线的日子，寂寞而漫长。

校园内，不知是饭菜不香还是思乡心切，那只高声喇叭总是重复播放“天边飘过故乡的云，它不停的向我召唤，当身边的微风轻轻吹起，有个声音在对我呼唤……”

春天来了，我喜欢走在有青草、小河、开满花的路上。多少寂寞青春的时光独自徜徉在花海里，恣意踩过含着露珠的青草。

记忆中，总是出现满地泡桐花，淡紫色的，大朵的，铺天盖地躺在地上。我时常梦中回到泡桐开的季节：一树树都开满了不起眼的泡桐花，猛然间要挣脱那窄小的躯干，像烟花一样向苍穹怒放。

父亲神奇地说，他上电子工学院时，也是每天走这条小路。那时，还是一片稻田。四月雨天，小路的泥坑里有泥鳅跳跃。

我想象这两幅画面时，父亲已卧在病床，我也人到中年。

每年的四月，是泡桐花开的季节。

林徽因有美诗曰：“你是四月一树一树的花开。”这用来描述泡桐花也是极好的了。

泡桐花生在市井巷里，像一串串小喇叭簇拥着；泡桐树干高耸，远离人的视线，好像谁也不在乎她灿烂的笑容。只有当一阵风起，才发觉头顶着满树紫色随风飘散，宛若一道淡粉的霞霭。

偶尔还有一个花苞被挤落，“啪”地一声砸在你头上，冷不丁的遭人嫌。人们踩着满地落花，有些漠视，甚至鄙夷。

比起梅花的傲然，桃花的娇俏，牡丹的国色天香，平凡朴素的泡桐花儿，实在缺了点什么。她们密密匝匝地缀满了高大粗壮的树干，像少数民族女人头上戴满的繁杂头饰。

泡桐花浑身扑闪着乡野的气息，也曾经守候着，期待着；万千喇叭听无语，一阵狂风，洒下一地花雨。

梧桐有风来仪，泡桐却兀自繁华，兀自飘零。

在人丁兴旺的家族里，有的花蕾还没尽情绽放便争先恐后地摔落下来。像脑海里闪过的一一个个希望，肥皂泡一样化成了青春的幻影。

《红楼梦》中龄官蹲在沙地上写着“蔷”字，浑然不觉淋了雨。

泡桐花在春雨里也很美。一簇簇、一串串儿。那是云的霓裳，雨的芳踪。整条“西溪河下”，小路像灰姑娘自个儿举办了一场华丽的舞会，天亮就散场了。

费翔那冬天里的一把火，随着迪斯科的节奏，怅然的心儿险些绊倒在电线杆上。上半场过去了，夜幕笼罩。

泡桐花浸润在雨季，似乎是落寞的。清明前后，天上总是飘着霏霏细雨。它的清香耐人寻味，若有若无。只在有月色的晚上，才借风轻扬。

在朗月的夜晚，独处泡桐树下。静谧中，那淡雅的紫色氤氲成烟，似许多潮湿的记忆，有“我在山馆中，满地桐花落”的惆怅。也只有在这时，你轻轻地吸吮她的花瓣，每一丝都是甜的，香甜如蜜般。那种与身俱来带着灵魂的香气，就像一种女子，笼罩着神秘的面纱，你始终翻阅不透。

泡桐花我行我素，洋洋洒洒，有一种悲壮，宁可奔赴死亡，也不愿在枝头簇拥。那坠落的惊心动魄，似有无数有翅膀的花神飞起，啪啪坠落。每个生命只能自己感受那一刻的孤独。

也许是因为自己的人生慢慢踏进了朴实无华的中年之境，更喜欢贴近大自然。曾经少女般的憧憬，牡丹斗艳，桃花带俏。如今从繁华贴近平实，喜欢极简，吃素食，穿纯棉。而曾经不起眼的泡桐花，想起来那么亲切踏实。

有些想起，只有久远，才觉得它的美好。沿途欣赏每一株有生命的花草树木。心下没有激动，也没有伤感，只有喜欢。这种喜欢不浓不淡，刚刚够催开一朵愉悦欢喜的泡桐，久久地开在心里。

西溪河下，永久的青春记忆。

[返回目录](#)

第八章：荟萃

沈善洪校长自述

——杭州大学校长 沈善洪

毕业后留在学校政治系，就改行了。从月轮山下来，转向搞中国哲学史研究。后来，想不到这一生的工作却以搞行政终了。

“文化大革命”后到省社科院，虽有行政担子，仍以学术研究为主。有了与王凤贤合著的《王阳明哲学研究》、《中国伦理学说史》（上、下）的问世。但做了杭大校长后，几乎整天忙于行政工作，别的就不太顾得上了。

十年杭州大学校长（1986年1月至1996年6月），面对的各种矛盾、压力很多，容易得罪人。我光明磊落，无愧于心，绝不以个人的利益得失而做有损学校的事情。

就以成立杭州大学出版社来说，省里主管部门不同意，只准浙江大学有出版社，要杭大和其他高校联合办一个出版社。一天，省里主要领导和一些部长、副部长未加通知就来到杭州大学。有人在会上还是不许杭州大学建立出版社，甚至说如果建起来，他就辞职。面对这种压力，我接着说：我的职务和你的不能相比，但我还是看重我的职务。不过，你要那么说，我也宁可辞职也要把出版社办起来。这时，省委主要领导打圆场，要我们不要争了，出版社问题不谈了。后来，杭州大学出版社终于顺利地办了起来。

这样顶的事情不止一次。比如专升本的问题，我们认为专科生只要学习成绩好，本人愿意，名额许可，就可以转为本科生。但是，一位主管文教的省里负责人说，两者体制不同，不能搞专升本。后来我们还是搞了，省里也不了了之。

我们国家，反“右”很容易搞起来，而反“左”很难。这带来的困难、问题很多。学校知识分子是讨厌“左”的。有些时候，上面布置下来“左”的、反“右”的事情，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比较清醒，没有跟风。我也曾在学校会议上公开讲了看法。

在教师升等这件事上，矛盾很多，议论纷纷。我们破格提拔学术上突出的年轻教师，不死板地搞论资排辈。这要占用一些升等名额，对其他教师有影响，有些人想不通。但我们坚持这样做，破格晋升了一大批。这不仅有利于培养人才，更在于树立注重学术研究的风气。在国内，当年这么做的学校并不多。不过，我们也采取变通办法，在规定名额之外，尽可能地解决了不少教师的职称晋升问题。

在这些事情上，学校领导层是一致的，但也有不一致的时候。比如下海经商热的时候，头头里边有人主张破门开店，另一些人不表态，我坚决反对。学校里有赞同破门开店的人说，就是沈一人捣鬼。我明确表态，杭州大学前门两边的围墙一步也不能拆，不然学校变成“学店”了。

做了校长，少有时间搞学术研究了。还在社科院时，着手主编《黄宗羲全集》，1985年出了第一册。后因不太顾得上，拖了一些时间，先后邀集浙江、上海、北京的20余名专家学者参与，到1994年出齐，共十二册，获得国家优秀图书奖。

1996年6月，不做校长了。两年后，四校合并。合并前后的几年，还参加学校的一些会议、评审等活动。至今仍担任韩国研究所所长。在校长任内，着手主编《浙江文化史》，有杭州大学和社科院的人员参加，历经十多年。今年（2009）终于完成，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分为上、下册。

身体不太好，主要是糖尿病比较严重。曾经几次住院治疗，视力已严重衰退，只能看看报纸大标题，走路也不太灵便。老伴前些年曾中风，如今行动虽无大碍，但半身总是不舒服。

近来有两件高兴事，很感欣慰。

（2009年）11月10日，我曾做过班主任的杭州大学政治系1959级学生，给我做八十大寿。“文化大革命”时，就是这个班要把我当做反动学术权威打倒。可是后来，他们一些同学和我长期保持联系。他们班五十二、三人，目前还在的大概四十五、六人。那次来了三十多人，先开祝寿会，后又祝寿宴。

11月18日，浙江大学校方委托人文学院，为我祝寿。浙江大学党委书记、校长，原杭州大学各位负责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和下属各系负责人都来了。还有从杭州大学调往在杭高校任负责人的大多数也来了，共有五十多人，十分热烈。

（本文由沈善洪口述，孙仁宗整理，时间为2009年11月下旬）

[返回目录](#)

我在杭州大学

—杭州大学中文系 60 届 薛家柱

每次让我填履历、学历，我总是习惯地写上：

“1956 年 9 月—1960 年 8 月，杭州大学中文系学习”。

2016 年是我进校 60 周年，虽然杭州大学早已消失了，但回想起往事，仍感慨万千……

一、挤进大学之门

说真的，我做梦也想不到自己有进大学的机会。我父亲是参加辛亥革命光复杭州的军人，又是蒋介石侍从室的军需官。在讲究出身、成份、海外关系的 20 世纪 50 年代，我初中毕业不让上高中，只能去读师范；师范毕业后，又分配到舟山一个小岛的破庙去教乡村小学。读大学，那简直是神殿午夜梦回的天堂梦想。

一切缘起 1956 年桃花盛开的季节，我到杭州参加全省推广普通话训练班。开幕式上，语言专家任铭善教授一席讲话，让我第一次听到普通话是那么美，大学教授是那么有学问。星期天，我急于想见到梦萦魂绕的西湖，就从文二路穿过松木场，朝西湖方向走去。那时，松木场一带全是田畈，满眼是金黄油菜花和紫色蚕豆花。远远望见了娉婷俊秀的保俶塔，像灯塔在召唤着我。我就沿着荒草萋萋的山径朝古塔一路奔跑、攀登，一口气爬到了山顶。

突然，双目一亮，夺目的光华刺得我有些睁不开眼。只见山下横着一片明湖，迸射出炫目的湖波金辉。啊！这就是西湖，这就是我神往、梦幻已久的西湖！那么开阔、那么秀美。花团锦簇的白堤、苏堤就像两条彩带飘浮于湖上。一叶一叶扁舟滑行在湖面。这是多么迷人的一幅立体画哟，我竟不信人间真有如此美景、真有这样的人间天堂。



西湖使我一见钟情，我当即决定：无论多大困难也要在西湖边求学工作、成家立业，此生只愿长与湖山为伴。刚巧那一年，周恩来总理提出“向科学进军”，小学教师也可以报考大学。于是，我只填报一个志愿——杭州；一所大学——杭州大学（第一年还是浙江师范学院）；一个系——中文系。

当时，离高考只有 2 个多月了，我来得及复习吗？在极度紧张的状况下，白天教全县小学教师学习普通话，晚上复习语文、数学、历史、地理，干脆吃住睡全在办公桌上解决。老天也总算成全了我，渡海到宁波二中高考，成绩还算理想。特别是作文《当祖国需要的时候》，我发挥出自己的最高水准。8 月下旬是发榜的时间，可我等到 8 月 29 日还没接到录取通知。唉！没希望了。我只得快快地离开小岛回家乡宁海。谁知 30 日傍晚突然接到电报：“已录取。电告学校：因台风延迟报到。”啊，这下子大喜过望！我哭哟、笑哟，足足欢腾了半小时。就这样，我终于如愿以偿地考到杭州、挤进大学之门，从此同西湖结下不解之缘。否则在此之前、在此之后（反右）都不可能进大学。

二、比肩的教授班子

一所大学的质量，取决于教师的水准。我一进大学门，还没上课，就听同学们无比骄傲地炫耀教授班子。一听教授名单，全是国内一代名宿：敦煌学权威姜亮夫，古汉语专家任铭善，一代词宗夏承焘，北方左联负责人孙席珍，明清小说专家胡士莹，先秦文学专家王驾吾。除了这六大名教授，还有副教授陆维钊、蒋祖怡、张仲浦、吕漠野，讲师蒋礼鸿、刘操南、徐步奎、马骅……确实，一听这些掷地有声的学术大师的名字，是不比北大差多少。据说，在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这些老教授因不习惯北方的气候和生活，要求留在杭州。嗨！杭大真不愧为全国古典文学半壁江山啊！

上课了，面对这些大学者，我们这些年轻学子真是有些诚惶诚恐。可他们平易近人、认认真真地讲好每堂课，使我们大开眼界。深度近视眼的姜亮夫先生讲古汉语虽然很深，但这位在巴黎、英伦博物院抄录过几万张卡片的大师，用深入浅出的语言使我们领略语言的堂奥，从而能登堂入室；夏承焘先生讲的唐诗宋词鉴赏，那简直把我们领入祖国大好河山的美妙境界；胡士莹先生虽然湖州乡音很重，但一讲《窦娥冤》真是声泪俱下；孙席珍先生讲外国文学从不用讲稿，可对西方作家作品信手拈来、如数家珍……还有刘操南先生讲《离骚》居然能从头至尾背诵全诗，讲到动情处竟大声吟诵、泣不成声；马骅先生讲《凤凰涅槃》，声情并茂、鞭辟入里，简直犹如青年郭沫若；蒋礼鸿一上讲台，满嘴苏北口音，貌不惊人，同学却告诉我，他是原之江大学与朱生豪并称的四大才子。他和盛静霞讲师当年相爱都是用古体诗词谈情说爱，怪不得蒋先生以后成为《辞海》的总编审……讲师都如此水平，就不要说后来成为中国美院书法权威的陆维钊先生当时还仅仅是副教授，其实当时杭大书法写得好的还有夏承焘、王驾吾、胡士莹、任铭善；连后来成为唐诗宋词名家的吴熊和、蔡义江，当时仅仅是年轻的助教，只能替夏承焘、王驾吾等先生发发讲义。



正因为杭大中文系有这样好的教授班子，才能成为学术界半壁江山，才能培养出一代代优秀人才。20世纪末，我陪同电影《柳堡的故事》的作者、南京军区少将创作员胡石言同志，到杭大河南宿舍去拜

访他的老家。我早就知道他是胡士莹先生的儿子。他父亲曾是我学生时代崇拜的对象。这青砖小楼是胡士莹先生的旧居。杭大西溪河南宿舍这五幢青砖小楼建造于1957年，是苏联专家设计的，我们习惯称它们为“教授楼”。姜亮夫、夏承焘、胡士莹、蒋礼鸿、孙席珍等教授均居住在这儿。毕业时，我作为外国文学的研究生由孙席珍先生指导，所以常常来这儿向孙先生请教。那天，胡石言送了我一本他父亲的遗著《宛春杂著》，并同我谈起他能写出《柳堡的故事》那样的电影剧本，这也是他父亲从小严格教育的结果，打下扎实的功底。我也对石言说，我之所以能写出《济公》这样的电视剧本，也是受孙席珍、刘操南、马骅等先生的影响哟。

三、文学创作的发烧友

杭州大学中文系的培养目标主要是中学语文教师，而不是作家。刚考进时，还是浙江师范学院，属师范性学校；少数人培养为机关单位的文职人员或研究人员。可是，我们这一届学生共有300多人，分成11个小班。年龄大的调干生有30多岁，已结过婚；年纪小的应届生还不到20岁。因此夏承焘先生说：“空前绝后。”没想到真被他说了！学校以前没这么多班级，以后更不会有，现在连学校都没了。

我们学生，有的是来自省内外各中学的应届生，有的是中小学教师，也有复员军人，甚至部队文工团、文艺团体，记者、医生、工人等，真是五花八门。

除了大部分同学想搞学术研究，还有一小部分同学对文学创作有兴趣，我就是。考中文系就是想当作家嘛。我最志同道合的是胡尹强，既是同乡、又是同学，一起初中毕业到师范，又一起考进杭大中文系。他写小说，我写诗歌。师范毕业时，他已写出小说《路》的初稿，后来被人民文学出版社看中，改成《前夕》，风行全国。但“文革”时，作为“教育战线黑样板”，遭到批判。

我很快发现，同学中不少人喜欢写作。同班的王学渊（方牧）也喜欢写诗。他也是来自舟山定海的小学教师。年纪比我们大的舟山沈家门小学校长叶宗轼则爱好写小说，连睡在我下铺的陈士濂也是个小说迷。同我并排睡高铺的章祖安虽不写，但谈起诗歌、小说来很有一套，还写得一手好毛笔字。后来他做了陆维钊的得力助手、成为中国美院著名书法教授。

有这么多同学爱好文学创作，我们10班就办起了文学壁报，也叫《萌芽》。主编是裴正琮，他能写能画还喜欢写剧本，第一期《萌芽》上就有他的小剧本。1958年，他主持了杨沫小说《青春之歌》的改编，并担任导演，一炮打响！毕业后就留校担任教师，讲戏剧文学。60年代，调到浙江话剧团从事专业编剧。有这样一批发烧友在一起，周末不去跳舞，关在宿舍里写作。

很快，叶宗轼的短篇小说《墨鱼旺发的日子》在上海《萌芽》发表了，在同学中引起很大反响。接着，1958年创刊的《东海》文艺发表了陈士濂的散文《孩提之爱》，成了我们宿舍的热门话题。以后他因家庭关系，只读了2年，就盲流到青海。后来还是凭自己的创作考进剧团。改革开放后，担任青海省文联副主席兼省作协副主席。《东海》还先后发表过方牧、蒋应武、余荇、徐一清、刘士华等同学和我的诗歌。《送行曲》成为我的处女作。除小说、诗歌外，从事其他类别文学创作和评论的也不少。学生时代，吕洪年已开始民俗民间文学的搜集与研究。陈坚在研究夏衍戏剧与电影。钟婴在研究《红楼梦》

等古典文学。钟本康则在《文艺报》写了不少评论孙犁《白洋淀》的文章。

1960年，我从杭大中文系毕业。那年，刚成立中国作协浙江分会。我被吸收为首批最年轻会员。时至今日，我们这一年级成为中国作协会员的就有七位之多，这在全国大学中文系恐怕也是不多见吧。如果不是接二连三的反右、反右倾等政治运动，我们年级冒出的作家还要多呢。

四、蓬勃的学生戏剧活动

正因为我们这一届中文系学生有不少师范生、文工团员，甚至专业文艺团体来的，因此，校园的文体活动搞得非常活跃。

为了迎接建国十周年，电影界拍摄了一批献礼影片。如《老兵新传》、《青春之歌》、《林则徐》、《聂耳》、《林家铺子》、《杨门女将》等。国庆节3天，让我们好好享受电影大会餐。一部接一部地观看，把穷学生不多的零用钱全花在电影上。回来校门已关，就穿墙而过。

受此启发，我们这群爱好文艺创作的中文系大三学生，就异想天开地想把杨沫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改编成话剧，在舞台上演出。说干就干，在裴正琮同学领衔下，很快将剧本编写出来了，并由他担任导演。演员就从全年级同学中挑选。

这件事得到校方大力支持，校团委书记杨招棣异常关心。他曾到前苏联共青团学院进修，了解苏联大学生校园文艺活动非常丰富多彩。他赞成一般演员由同学饰演，女主角林道静则建议由外文系青年教师翟燕芳担纲。男主角余永泽本由我们班上一位男同学担任，但他和翟老师演对手戏感情出不来，临时改请浙江话剧团的史崇仁（后改由张维国）来救场。张维国还协助导演工作。

史崇仁、张维国毕竟是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刚毕业的高才生，很快把剧本背熟，进入了角色。排练休息时，大家一边围着火炉，搓着冻僵的手脚，一边听张维国朗读苏联小说《一封未发出的信》，真把

我们这些业余演员迷住了。知道应该如何处理台词、如何细腻表达感情。我们这群少男少女成了他忠实的粉丝。

《青春之歌》正式在校内演出了。大礼堂兼大饭厅里立即人山人海，观者如堵，连桌子上都站满了人。演出得到全校师生热情赞扬和喝彩。谢幕后，观众还久久不肯散去，成为杭大校园一大盛事。

消息很快在社会上传开了，各单位纷纷要求《青春之歌》能到他们那儿演出。我们就在省军区礼堂连续公演了半个多月。于是，在一段时间内，杭州市民，特别是青年学生，都津津乐道杭大演出的《青春之歌》。林道静、卢嘉川成为他们的青春偶像。卢嘉川扮演者陈坚同学挺拔的身材、潇洒的风姿、动人的谈吐，迷倒了很多青春少女；就连扮演王晓燕的李如珍同学，也在半个月后就收到雪片般的求爱信……

在《青春之歌》的创作和演出中，我们看到了文艺的力量和作用，正式踏上了创作和研究之路。陈坚成了著名的戏剧教授。裴正琮后来也到浙江话剧团当编剧。演戴瑜的娄瑞槐被分配到杭州话剧团，后调舟山越剧团。李如珍成了全国普通话特级语文教师。我也开始了影视剧创作。

毕业那一年，杨招棣书记又找我们传达省委精神：为了迎接省党代会召开，要我们创作《卧薪尝胆》话剧，配合中央提出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我们又动用原班人马，演员、乐队扩大到全系挑选。导演由浙江电影厂老演员卢业高（叶高）担任，他还担任剧中勾践这个主要角色。叶高原是上海电影厂与舒适、李纬一起支援到浙江的，抗战时曾在重庆参加了陈白尘、阳翰笙的中华剧艺社，与金山、张瑞芳、舒绣文等演出过《屈原》。他一出场声如洪钟的一声“吴王亭！吴王渡……”台词，就把我们这些学生演员征服了。

正式演出放在人民大会堂，观众全是省党代会代表，场面极为宏大。《卧薪尝胆》得到省委表扬，还派浙话大明星周贤珍来抄剧本。这也可算是杭大中文系 1956 年级的毕业创作与演出吧，因此我们几个主创人员托福得以留在杭州文教界工作。后来杨招棣成为杭州市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成了我的顶头上司，还常常谈起杭州大学呢。

（原载《杭州记忆》第一辑）

作者简介：

薛家柱（1938年-2021年9月6日）笔名罗岩。浙江宁海人。1960年毕业于杭州大学中文系。历任杭州教育学院教师，《西湖》文艺副主编，市文联专业作家，杭州市文联副主席，市作协主席。浙江省作协第二、三、四届理事及第四、五届副主席。1958年开始发表作品。198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文学创作一级。

[返回目录](#)

我那 77 级的杭大四年

—杭州大学化学系 77 级 徐琦玲

从何说起呢？

学海沉浮，甘苦自知，千秋有别。
书卷在手，偶有所得，时有所感。
老师问教，启发指点，有方引导。
年轻执着，上下求索，彷徨行进。
同学牵手，相识知己，一生情长。
杭城秀美，西湖山水，别有遁处。

如今三十个年头有余，记忆残缺，这里记载着的只能是我个人的一些花絮和点滴，其他的得靠同窗们的记忆和拾趣了。信手写来，不求其它，只求共识。写完了有如过眼烟云，了无痕迹，读完后也最好别无牵挂。记住，不要做一个黄昏的猎者，拾得满怀夕阳。我还是愿做个拾珠者，带上挂线，每每得一二小珠，串成一链，尽可受用。在杭大期间我好像还写写诗歌，以后的文中陆续选上几首，献丑了。

我们是 1978 年三月初进入杭州大学化学系的。刚到校时的一切，校园、大楼、教室、宿舍、新生、老师，以及各种会议和活动，使我感到既新鲜又疲乏。兴奋期过后，我很快就被一种紧张和孤单的感觉慑住了。初来乍到，第一次离开家庭，不熟悉等，这种缺乏安全的感觉以及不习惯于紧张的学习生涯，是我在杭大几年中时常要面对的困境。我想，我们同学中也有不少经历过这种体力上和精神上的折磨的吧。情绪上的波动，精神上的紧张，不免导致意志上的松懈，所以经常有必要对自己作出调整和放松。不过进校一周后，我找到了能散散心或安静看书的好去处：前者是黄龙洞，后者是图书馆。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友情莫属了，就是我们那亲如手足的同学间的关爱和情谊。

第一次参观杭大图书馆是进校后的第一个星期天。发现我校有藏书八十多万册，觉得真是了不起。我从小就喜欢跑图书馆，借连环画，小说书和杂志等。图书馆是令我神往的地方。这杭大图书馆可真使我心花怒放，如鱼得水。各种文理学科的书籍，杂志，报刊等应有尽有。我真的好像有跌入糖罐的感觉。当初，我就告诉自己，要常到这一知识宝库中汲取并武装我的头脑。我先是从哲学上入手，到传记。后来，注意力渐渐转到一些我国的新兴学科上了，越读越有劲。正是由于在杭大图书馆这一知识海洋中的徘徊和经过无数次的阅读有关的书刊和杂志，打开了我本来是狭窄的思路，引导我进入了新的知识殿堂，使我爱上了生物和遗传的神秘和复杂。我学的是有机化学专业，为生物化学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在大学的最后一年里，我自学了“生物化学”，考上了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的硕士。从此，走上了生物学研究的科研道路。从生物化学到分子生物学，从发育生物学到神经发育生物学，细胞生物学，学路漫漫。直到今天，我还是搞纯基础的生物研究，重点在于神经系统的发育和形成。这个学科涉及到基因、蛋白、细胞分化和病变、干细胞、遗传、神经等等，真是其味无穷，从不觉得枯燥。

第一次去黄龙洞时，就让我感慨万分：杭州真不愧为全国的旅游胜地！黄龙洞的风景真是幽静。当时是春风拂面，树枝上的新芽正在吐露，令人心旷神怡。后来，我就有和同学一起晚饭后去黄龙洞散步的习惯。每到星期天，我常常约友一起去杭州的各个风景点跑。去西湖边坐坐，喝喝茶，爬爬山，谈谈天，放松放松，领略大自然的风姿和光彩。可以说，那时我和好友比在杭州生和长的同学更了解西湖和杭大周边的山山水水了，因为那里无处没有我们的足迹。有一次，宁波来人，我陪他们玩了一下西湖。没想到，他到我父母那儿告了我一状，说我不用心读书。不识好意，真让我伤心。后来我想，他是出于对我一片好心，也就不在意了。

能感受自然是我的存在。这空气，阳光和月色；这树木，花草和地衣；这沙滩，岩石和山麓；这大海，江河和湖泊；这四季分明的节气；这飞鸟，走兽和昆虫等等，等等，我都喜欢，都爱。对大自然的

亲近是我一生不可缺少的，数十年不变，现在也是如此。我想，同窗们在读我的冰岛之旅的一些博文时就会有这种认同的。这四年的学海沉浮，若没有好友相伴，西湖美景，大自然赋予的解脱力，我恐怕会是个失落者，真的很难说。感激你们，我的同窗，我的好友，我的西湖。

从社会到杭大， we 有过各种阅历，经历过各种运动和磨难，做过身不由己的事，说过身不由己的话。前几天，从一朋友中第一次看到用青涩来形容我们这一代人。特地在网上查了一下，请见（<http://www.baik.com/wiki/青涩>）。青涩多用来形容人不成熟，源于六、七十年代。我们自小缺乏营养，面色发黄，思想保守，眼神简单清澈。是啊，我们那个时代缺少阳光，使我们这些年轻的苹果们没法成熟，总带有青涩味。我想我们大家挖掘一下当时的照片，说不定可以开一个题为“青涩年代”的肖像摄影展。

进入大学，时代光明了，使我们有成熟的机会了。当时，我深知自己身上的缺陷和不足，也意识到自己没有社会背景和依靠。我的前程就掌握在我自己的手中。要抓住这难得的机会和良好的环境，好好学习，学有所成，才能求得学术乃至人生的自由。这是我努力学习的动力之一。不过我并非一开始就这么头脑清醒，胸有成竹的。这种成熟和自信来自一个漫长和曲折的过程。时有失落，时有泄气和惰性。我需常自我勉励。学化学的，自然会接触到居里夫人和她的成就。阅读她的传记后，玛丽·居里成了我的偶像和学习的榜样。要热爱和钻研一个专长，为社会和人类做一点事，首先要学好和掌握知识。这是我一生努力学习和专注事业的一个源泉。

语言是人生的一个窗户。我想，我是先从英语下手的。刚进校不久，我们有英语考试，按水平分快慢两班。我在慢班。时间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紧凑的，我也不例外，关键在于如何掌握。我给自己订了学英语的时间表，早晚各一小时。早上练习读，躲在树丛中大声地朗读。晚上则练习单词，语法和写作。教我们的那位英文老师真有水平，我至今仍记得她教我们如何想象用水龙头的直接开和关来学外国语，而不是从中文转换而成，这样就可避免 Chinglish 了。这个方

法对于我来英国后的语言能力的提高促进很大。由此，也给在英的生活，学习和工作带来了方便。

我们的同学大都来自浙江。我第一次领略了我们省内地方话和口音的多样化。同学中有干过各行各业的，阅历不同，年龄不一。但目标是一致的，学习都非常的努力，学风极好。记得，有时同学们为能专注听课，上课前早早就占了好位子。我们大都晚自习到熄灯为止，还常常抱怨熄灯太早。这种勤奋好学的风气在我们身上打下了烙印，一生也改不了。另外，在进校不久就让我看到了同学们的思想风貌。那一次是讨论助学金的问题，大家的风格高，针对自己的情况，酌情申请了金额，很快就评好了。我想，这也是我们杭大化学系同学间和睦相处的一个实实在在的基础吧。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班上有许多同学鸳鸯成对，这也是我们这个同窗大家庭的一个见证。

经过十年沉积，我们同学中多有精英和高手。有时，磕磕碰碰的较量也是难免的，人之常情嘛。但各种集体活动，如晚会和春游等，把我们团聚在一起，各显神通和才能，使我们同学之间有机会增进接触和了解。平时宿舍，晚自习和实验等也是互相熟悉的好机会。我们寝室六个女孩，熄灯后常常精神聚餐。大家各自说着吃过的好东西和菜肴，向往着，谈论着，口水直流，渐入梦乡……不过，不知为何，那时我常有被人追赶、我飞呀飞的奔逃的噩梦。

校园内，有时也有让人哭笑不得的事。记得，有一次在食堂买菜。当时，买肉凭票。我和好友一起买了一块肉，正忙于付钱，肉和碗就不翼而飞了。我们找了好长时间，就是找不到。好像是半小时后才找到我们的碗，是空的……

我们这些考上研究生的先回家了，好像没有参加毕业典礼。留下来的同学要经过分配这一个关口。其中的种种奥妙和事情，我是不知情的。希望同学们能聊聊，谈谈这段往事……对我来说，杭大的四年，我有过忧虑，困惑和牵挂，但这是积累和成熟的四年。由此结交的同学和好友，是一生相伴的。真正的黄金四年。能赶上高考，能进入高等学府，能学有所成，能有这么多的同窗好友，我觉得自己真是个幸运儿。

尘封两往事，经历忘亦难

—杭州大学化学系 52 级 龚钰秋

我从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到四校合并，有 40 年是在杭大化学系渡过的。其中，有两件往事记忆深刻，难以忘怀。

一、第一次大搬迁

在 1958 年秋季开学的时候，当时的浙江师范学院和新成立的杭州大学是分开招生的，可以说完全是两个学校。那时，浙江师范学院的文科已经在天目山路新址，理科还在六和塔那边；杭大当时的全部活动区域实际上就在文三路以北现学军中学和生科院（前者是浙江省干部学校旧址，后者是浙江省工农速成中学旧址）。所以文三路以南是浙江师范学院，以北是杭大，二者之间还相隔一大片水稻田。同时现西溪校区西 1-西 7 教学楼直至北门也还是水稻田。两校中间还有一条石子马路，行驶着 10 路公共汽车，是文教区里各学校师生进入市区的主要交通工具。

那时，虽然从复旦大学调来知名数学家陈建功先生当杭大校长，但总体办学条件并不好：师资缺乏，教室和实验室严重不足，面临着很大的困难。从 1958 年底开始，浙江师院和杭大就着手合并，组建新的杭州大学了，随后理科各系及实验室也陆续从钱塘江边的秦望山上搬下山来。

回想起来，杭大化学系的搬迁故事蛮多，经历过 3 次就是其中之一：

第一次是从六和塔那边搬到工农速成中学的旧址——红楼。[注：红楼已改建为现在的国家海洋二所的一部分]；

第二次由红楼搬往现西溪校区西二教学楼（老化学楼）；

第三次再由西二教学楼搬到现址——西七教学楼（新化学楼）。

我经历的是第一次搬迁工作，由于运输工具缺乏，搬运的工人很少，几乎所有的实验室药品、实验桌子和仪器设备都是从汽车上一件一件由学生和青年教师用人工方法搬进实验室的。特别是几十架“摇摆天平”，更是一人一架用手捧着登上汽车，慢慢运到红楼的。由于暑期正值高温季节，不少工作都只能放在晚间进行。大家口中吃着食堂发给的一人一个刀切馒头，不知疲倦地忙碌着。在整个暑假期间，部分暑期留校学生和年青教师始终是这次搬迁的主力军。他们没有报酬，不辞辛劳，任劳任怨，冒着高温酷暑圆满地完成了化学系第一次搬迁任务，表现出高度的主人翁精神和团结协作的工作作风。在全系的搬迁总结大会上受到系领导的高度赞誉。

二、从师范性到综合性的大跨越

浙江师范学院和杭州大学合并，标志着一个新的大学和新的化学系诞生，也召唤着师范性要向综合性的转型。当时，化学系虽然从复旦大学和南京大学等综合大学分配来了几位青年教师（如南大来的黄宪、沈报恩；复旦来的陈振初、王国勤），但是系内大多数的老中青年教师几乎都来自师范院校，小部分还来自省属重点中学。他们没有办综合大学化学系的经历。这个情况在学校各个系都普遍存在着。

对于杭州大学究竟办师范性还是综合性这个问题，校内外有着不同的看法，有的争论还很激烈。后来，学校很快制订了一个全面办好综合性大学的规划，在各系明确专业方向的基础上，制订出一个“派出计划”。全校（特别是理科各系）选派了一大批中青年教师分赴国内知名高校进修学习，时间在1-3年不等。

化学系则在系主任陈嗣虞先生主持下，先后向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和厦门大学等知名高校派出十余名教师前往。我清楚记得，陈先生对我说，你到复旦去的主要任务有两点：一是边听课边备课，准备进修结束后回来开专业课；二是跟着导师学习科研方法，尽可能把搞科研的本事学回来。他还特别语重心长地说：只有专业课开出来了，科研工作开展起来了，学生可以做毕

业论文了，我们方才有资格说师范性向综合性迈出了实质性步伐，否则就是“挂羊头卖狗肉”。

我是1959年9月至1960年6月和1961年9月至1963年7月两次赴复旦大学学习和进修的，前后有3年时间。

第一次进修主要是回来后能给四年级学生上专业课。那时，学生做毕业论文的时间很少，上课和做实验一共只有一个学期。

第二次去复旦进修是得益于“高教六十条”的颁布。学校要狠抓基础理论，要静下心来搞教学、做学问。

当时，化学系派出的一批教师几乎都师从各校大名鼎鼎的教授（后来都成为院士）如戴安邦、高鸿，顾翼东、严志弦、何炳林、卢嘉锡和林尚安等。老师的言传身教，自己的潜心学习，再加上跟二导师、三导师整天泡在实验室里。

系里派出去的一批中青年教师就这样个个学有所得归来，学制亦从4年改为5年。专门化课程在全系各教研组陆续开出，如无机组开设稀有元素化学和配位化学，有机组开设有机合成和高分子化学，分析组开设化学分析和仪器分析，物化组开设化学动力学和物质结构等专门化课程。这些老师后来大多成为各专业学科带头人，在全国高校相关学科中享有一定的知名度，成为化学系后来申请研究生学位授予权点的中坚力量。

和我同在复旦进修的，记得还有物理系的老师。他们学习无线电和半导体专业；政治系的老师学习经济学史专业。回想起来，如果没有学校和系领导当时那种大胆而果断的“派出计划”，杭大要在较短时间内实现师范性向综合性的大跨越将是不可想象的。

返回目录

依稀往事杭大情

—杭州大学化学系 73 级 孙春涛

(2016 年 10 月 2 日)

我的母校——杭州大学，不仅为我提供了改变命运的 1973-1976 年三年大学教育，1989 年又为我额外提供了物理化学旁听学习机会。1996-1998 年，在杭大与浙大合并前夕，我又有幸参加了杭大教学论专业研究生课程班学习。从母校大学毕业已经过去了四十年，时光荏苒，往事依稀。随着毕业 40 周年同学会的临近，当年在母校的丰富多彩的学习生活，逐渐浮上心头。

一、接到了录取通知书

一生中令人难忘的日子不多，令人难忘而且改变命运的日子更是少而又少。1973 年 9 月 19 日，就是这样一个日子。

这是一个平平常常的星期三，上午给小学升初中过渡班学生上了三节课，回家吃好午饭匆匆赶到学校批改作业。刚坐下不久，就接到了杭州大学《入学通知书》，上面写着：经宁波地区革委会批准，录取孙春涛入杭州大学化学系学习，9 月 21 日到校报到。

捧着录取通知书，短短的一段文字，我读了一遍又一遍。被大学录取了？而且是到杭州大学读书？真是期盼已久又喜出望外的大喜事。

我出生于上海南市区一个普通工人家庭。小时候，由祖母照顾，时常住在慈溪。随着弟弟们的增多，也就在慈溪读书了。文革开始，没书读了，就明里暗里向父母亲要求回上海。后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父母说，你回上海，你弟弟就得支边支农，只能委曲你了，等以后有机会再出来。然而，没有父母在身边照顾的“外来人”在农村的生活，其辛苦与心酸只有自己知道。光是要求以社员的身份参加生产队劳动，就费尽了周折。比起内心的煎熬，寒冬腊月下冰河捕鱼，除

夕上高高的荒山顶着刺骨的寒风砍柴都算不上事。什么时候有机会“出去”，只有天知道。

1973年五、六月间，传来国家要通过推荐与考试相结合，选拔工农兵上大学的消息。这可是文革以来的第一次。我是六六届初中毕业生，加上当时我已经在民办小学教了三年书，在大队有望推荐得上的年轻人里应该是排在前头的。果然，我被推荐列入了参加招生考试的人选。这时，学校刚好放暑假，作为民办教师，白天得参加生产队劳动。我利用晚上时间，抓紧自学高中数理化教材，赶在考试前匆匆看完了教材内容。在七月下旬的高校招生考试中，自己感觉语文、政治、数学、理化四门考试都考得还可以。可是，自考试以后已经过去了快两个月，没有任何录取的消息。期间，又有辽宁考生张铁生的写信事件发生。高校中专如何录取，估计招生部门也很纠结。我的命运会如何，只能听天由命。

随着9月1日我任教学校开学，我又沉浸在做孩子王的生活。白天埋头工作，放学以后打理着三分地的自留地，强制自己不要再去做大梦。就在差不多快要绝望的时候，天大的喜事却突然降临了。

19日下午还得上好最后几节课，学生们都知道了他们的老师要去上大学了，听课时特别的认真，眼神中满是留恋，令人感动。20日抓紧时间完成教育上的移交，办好户口、粮油、团组织关系等迁移手续，与同事、亲戚、朋友告别。

9月21日上午，整理了些简单的行李，用一根扁担挑着赶十多里路到汽车站。七十年代的汽车少得可怜，等到下午快到一点时才有车去余姚，刚巧赶上下午两点开往杭州的的火车。

下午六点，到达杭州城站。一出火车站，就有杭大的老师接去红楼旁边的接待站里。不一会儿，学校的大货车就把我们七、八位新生连同不多的行李拉到了杭大。学校大门口，有化学系老师迎接。又有老师用三轮车把我们送到学生宿舍门口，送进寝室。晚上，班主任陈秀华老师、系团总支书记张桂芬老师前来看望，问寒问暖，关怀备至。先报到的同学，也来照应。

一到杭州，就被母校的温情包裹，心里充满着温暖与感激之情。母校，从今往后，我就成了您万千学子中的一分子。无论今后我的人生道路将会怎样，都将深深地打上您的烙印。

二、同学

1973级杭大化学系开学时，共有同学60人，分为两个班级；每班三个小组，每组十位同学。后来一位同学因病休学，又转入外语系的路毅和吴素霞同学，到毕业时共有同学61人。说是两个班级，其实上课时都是一起听课的。一班班长娄封根，毕业后回老家工作，担任仙居中学学校领导；副班长王静江，毕业后分配到江山中学任教，后来担任江山教育局教研室教研员。二班班长徐振达，是一位忠厚人，会关心同学，毕业后听说在桐乡市科委工作；副班长汤淼荣，杭州人，工作负责，不怕麻烦，毕业后留校任教，是二班唯一留校工作的同学。二班团支部书记俞岳龙，临安人，毕业后在老家临安的一所中学担任领导，因无联系，也不知是哪所中学。我与宁波人臧延达是团支部委员。

时处文革，分组学习讨论比较多，所以组内的同学相处的时间最多。

我所在的二班六组，有十位同学。组长丁露庆和副组长徐杏娣，年龄在组里算小的，能担任组领导，都有过人之处，学习努力，办事公正。冯文安是共产党员，处事老练，对组长们的工作指导有方。方正源是66届高中毕业生，从黑龙江支边回来，有大哥哥风范，但从不摆老资格。卢衡与郑士根是研究型人才，喜欢在学习上多问几个为什么。毕业以后，卢衡进了省博物馆，成了正高级研究馆员。郑士根在工作之余，爱好古玩。玩古玩可是一个需要较强探究能力的活儿。雷德锋和叶爱珍是温州人，具有明显的温州人特点：进取性强，灵敏度高。两人都是体育健将，跑路速度快、步伐频率高。听说后来雷德锋担任了机关干部，叶爱珍当上了教师。然而人生无常，两人均英年早

逝，令人痛惜。吴萍萍读大学时不怎么爱讲话，但从杭大化学系 1976 届同学微信群微信看来，其实萍萍同学个性活泼，知识面也很广。

小组同学会的讨论，地点都在我们小组的男生宿舍——第七宿舍 343 室。内容大多是政治学习，从学习中共十大文件，到批林批孔，学习法家著作，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这些大事，记忆均已淡薄。倒是一些小事，令人记忆犹新。

小事之一：1974 年年底的一个星期天，小组外出活动。七点多钟，全组同学就背着照相机和年糕、蔬菜等野炊食材从学校出发。经浙大附中、植物园、浙江医院到龙井。龙井水清澈，似可见底。水面有一条自然形成的折痕，引发同学们纷纷探究起其形成原因。在浙江二台警卫班吃了野炊——年糕汤。同学们吃得高兴，年糕汤的味道并不亚于现在豪华酒店的丰盛酒席。下午，过徐村，到六和塔。傍晚坐车到湖滨，将胶卷交照相馆冲洗，然后步行回学校。全程约 50 里。一路兴致勃勃，连女同学也一点不感到吃力。只是第二天取出冲洗好的胶卷一看，发现卢衡借来的照相机所拍胶卷全部报废。究其原因，是照相机漏光！啊哟，浪费了全组同学多少表情呀。幸亏还有另一架比较简陋的照像机没有漏光，留下了几张同学们的合影。

小事之二：出发去嘉兴参加农业学大寨工作队前几天，系里分给组里两张罗马尼亚彩色故事片《巴布什卡历险记》电影票。听人介绍，此影片好看。但资源有限，由谁去看呢？组长坚持公正公平原则：抽签！看谁的运气好谁去。我与雷德锋中签，兴奋了好一阵子。要知道，文革中好的电影实在太少。除了样板戏外，没有几部其他电影，国外的更是凤毛麟角。下午看了电影，晚上就向室友复述了故事情节。尽管我讲故事的水平实在有限，室友们仍然听得津津有味。事后，我凭记忆写下了 6000 多字的影片剧情介绍。

小事之三：1975 年下半年，我们在嘉兴参加省农业学大寨工作队工作。1976 年 1 月下半月农历过年前，我因晨起做操不慎跌倒造成左足背关节损伤和内出血。起先还能强撑着行走、工作，晚上还去生产队主持了队干部座谈会，帮毛雪芹老师一起算了组里的伙食帐。到第二天，伤情反而严重了，走不了了。时近年关，临近放假，工作组决

定让我早走几天去上海家中养伤。第三天一早，由大队派机船送我到嘉兴上火车。其时，方正源、丁露庆、雷德锋已因肝功能异常回杭州休息或疗养了。剩下的同学几乎全部冒雨送我到嘉兴。尤其是卢衡，冒着刺骨的西北风和密集的冬雨，背着我下船上火车，脸上的雨水混着汗水，其景其情，至今犹在眼前。徐杏娣正好要去上海探望亲戚，组里请她与我同行以便照顾。到了上海，她借了手推车将我送出车站，又帮我租到了当时上海流行的三轮出租车。

三、老师

说起文革时期的大学教育，不少人受一些小说、影视作品的影响，总认为工农兵学员学习基础差，学习时间少，教学质量低下。文革期间，工农兵学员学习基础确有参差不齐，但对学习时间和教学质量需要进行客观分析。各校情况不一样，师资状况不一样，不能一概而论。

1974 年上半年的一天，我去政治系老乡处作客，偶遇当年杭大慈溪招生组老师。他说得很明白，大学招生，当然希望新生文化基础好一些，整齐一些，便于组织教育教学。在招生中，尽可能招收文化基础相对较好的考生，是杭大的目标。我们入学后，化学系领导在文革的大背景下，为学生多学知识提高能力尽了努力。在安排教育计划时，除了当时必须安排的政治学习外，文化学习（包括下厂）的总时数并不少。根据系里制订的教育计划，我们这一届同学三年在校学习时间共 132 周。每周在校学习六天（只休息星期天）。除去寒暑假、节假日和星期天，共在校学习 792 天。文革后大学本科四年，每周学习五天，寒暑假放假一般在 85 天左右。学校规定必须在校学习与我们的那时候的三年相差不多。只是，那时的政治学习和农业学大寨工作化去了较多的时间，文化学习时间受到挤压，又没有严格的考试制度。那是当时的形势决定的，谁也无法改变。

当时，杭大化学系的老师大多德才兼备。无机化学童九如、夏式均、王耐冬老师；有机化学陈义镛、侯玮、洪琳、陈振初、张永敏老师；分析化学戚文彬、吕荣山老师；物理化学李本乐、胡科诚、郑洪

元、吴念慈老师，以及教过我们的其他化学老师，学识渊博，教学认真，对学习基础参差不齐的学生十分耐心，还经常进行学习方法指导和课外辅导。数学王云海老师教学深入浅出，英语陈新城老师教学热情高，在同学们参加嘉兴工作队时还到我们所在大队了解我们英语学习情况。政治陈烈老师、物理胡老师教学都很投入。老师们不仅尽心尽力教书育人，对我们的生活也关怀备至。当同学们有困难时，团总支书记张桂芬老师和班主任陈秀华、沈富良老师，总是能尽力帮助。其他老师也是如此。1974年下半年，我因扁桃体经常发炎需要手术，王耐冬老师知道后十分热心地帮我联系她的亲戚——浙二医院专家黄医师对我进行诊治，手术效果良好。1989年，我想学习杭大读书时读得最少的物理化学，经戚文彬老师牵线，拜郑洪元老师为师。郑老师非常热情，在百忙中多次写信或面对面对我进行自学辅导。在参加在读全日制本科生班物理化学结业考试中，我得了93分。郑老师替我感到高兴，还请我到他家吃饭。

我们这一届同学，毕业以后基本上都成为各行各业各个单位的骨干。除了自己坚持终身学习、发奋工作外，母校杭大老师们为我们打下的基础是不可或缺的决定性因素。可以说，没有母校杭大的三年教育，就不会有我们的今天。

在杭大化学系诸多恩师中，对我影响特别深，给我鼓励最多，也最使我感激的是戚文彬老师。（详情见前文《师恩绵绵无尽期：纪念恩师戚文彬先生》）

四、农业学大寨工作队

1975年11月19日至1976年2月22日，我们杭大大三、大二师生在嘉兴参加浙江省农业学大寨工作队。行前一星期，11月12日，中共浙江省委在省体育馆召开了农业学大寨誓师大会，省委书记铁瑛亲自作了报告，可见上面对这项工作的重视。化学系分在高照公社，我所在的第6小组负责新联大队。新联大队工作组成员14人，除了我们

同学 10 人外，还有张逊玮、毛雪琴两位老师，系办厂赵生荣、吴汝康两位职工。由张逊玮、冯文安任正副组长。

工作组管的事多。我协管工作组宣传与伙食，负责知识青年、政治夜校等工作，与郑士根、叶爱珍包干第八生产队。

伙食管理上，工作组 14 人，加上大队派来为我们当炊事员的知识青年周七忠，共 15 人。每人每月定粮 37.5 斤，除每人留 0.5 斤粮票吃点心外，合计每月可买米 555 斤，每天用米 18.5 斤；每人每月伙食费 14 元，合计 210 元，扣除饭费（含柴火）每斤米 0.18 元合计 102 元，可用菜金 108 元，每天 3.6 元。大宗物品采购，由我与周七忠共同负责；平常每天的小菜，由周七忠采购，每天报账。

安顿下来后，对所处环境作了了解。新联大队位于高照公社东部，是全社距嘉兴市区最近的大队。嘉兴地处著名的鱼米之乡杭嘉湖平原，河网密布，气候宜人，人均耕地也不少。农田种植水稻、大小麦、蚕豆、油菜；桑地种桑养蚕。但农民的生活却显得比较贫困。以重点生产队八队为例，全小队共 44 户，175 人，土地 398 亩。近年来，粮食亩产连年下降，1967 年亩产 1250 斤，1969 年 1100 多斤，今年预计只有 1000 斤左右。社员收入，1974 年每分工分值 0.073 元，今年预算只有 0.065 元。每户家庭一对劳力全年工分收入仅 500 元，加上上交土肥，合计也只有 780 元。扣除生产队分的粮食、柴草等，到年终结算能有个一、二百元现金到手就谢天谢地了。

大队和生产队干部分析粮食亩产下降、社员收入减少的原因，主要是派性（社员之间不团结）和无政府主义（干部威信不高，部分社员外出搞“资本主义”）。谈到阶级斗争，生产队有地主两户 4 人，富农 2 户 3 人，从杭州工厂清洗回家的特务 1 户 1 人。这些阶级敌人，均已年老体弱，好像也没有什么破坏的行动。在对他们的评议中，说得最多的是他们对子女教育抓得不够，子女不是很听干部的话。这也算阶级斗争？又不是评先进，要求方方面面都要优秀。对于如何解决亩产下降、收入减少的问题，干部、社员都比较迷茫。依靠抓阶级斗争，看来不灵。田地里就只能刨出这些收入来。人口在增加，还有城里的知识青年来农村的也越来越多，今后的收入只会减少，不会增多。

从今天的眼光来看，不改变生产经营模式，不发展第三产业，是怎么抓都不灵的。

知识青年工作，是我的重要任务。经调查、座谈、个别访问，基本摸清了知识青年的情况。新联大队前后共有知识青年 95 人。历年来，已有 27 人通过招工、顶职、服役、病调等离开了农村。目前，还有 68 人。这 68 人，最早的 1965 年就来了农村了。1969 年来了几个，1970 年来的最多。文化程度参差不齐，有文盲 5 人，初小 7 人，高小 25 人，初中 28 人，高中 3 人。

知识青年反映出来内心苦闷很多，有两个问题让我至今仍有深刻印象。一是收入低下。有一个表现相当好的嘉兴女知青反映：她是 1970 年年初下乡的，当年挣工分 1600 多分，以后每年增加，1973 年后稳定在 2600 分左右。每天都与生产队社员一样出勤干活，年终算账，今年每工分 0.06 元，全年毛收入 156 元。知识青年不养猪，没有土肥上交。这 156 元就是她的全年全部收入。辛苦一年，可能还要“倒挂”（指倒欠生产队钱）。二是招工、上调不公。据知识青年反映，招工进城的大多是上面有人打招呼，或是家长与当地干部搞好关系的。光靠自己好好劳动，想招工进城是越来越难。不少知识青年反映：刚下农村时，尽管也对城市有留恋，对陌生的农村有畏惧，但经过教育、动员，总有一些“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豪情与梦想。但是，来农村的日子一多，原有的一些豪情消失，梦想破灭，剩下的只是祈求如何能早一天离开农村招工进城。看着知识青年们郁闷、迷茫的眼神，我们这些自己也是刚从农村出来不久的学生又有什么办法？

1976 年春节后不久，接上级通知，结束为时三个月的农业学大寨工作，让我们回校继续上课学习。回顾三个月的工作，我们究竟为农民和知识青年解决了些什么问题和困难？好象没有。当然，这三个月也没有白来。对农村、农民和下乡知识青年有了更多的了解。尽管我们自己也来自农村，也是知识青年，也当过农民。但是，这次我们是以另外一个角度，以审视的目光来进行了解和思考。离开的时候，我们心中留下了农民和知识青年各自的“迷茫”——中国农村往何处去？知识青年的路在何方？

编者注：

作者孙春涛曾任慈溪中学校长、党总支书记，被评为浙江省和慈溪市劳动模范，宁波市名校长。此文原是杭大化学系 1976 届毕业 40 周年同学会组委会征稿之作。

[返回目录](#)

杭大，那时的我们

—杭州大学地理系 92 级 谌群芳

五月夏浅，闲来无事，整点小人物的青春小回忆，我们一起走过的从前。那时的岁月总是能激起浪花朵朵，那时的我们，总有些瞬间，如蝶翩跹，轻舞飞扬。

林清玄在《白雪少年》中说：那些岁月虽在我们的流年中流逝，但借着非常非常微小的事物，往往一勾就是一大片。仿佛是草原里的小红花，先是看到了那朵红花，然后发现了一整片大草原。红花可能凋落，而草原却成为一个大的背景。我们就在那背景里成长起来。

杭大就是那时我们四年成长的背景。我所铭记的，不是纯粹的风景，而是站在风景里迎面走过的我们，以及那些驻在时光里从未说过的怀念。

那时，最具有时代标志的就是每周末的舞会。以至于 10 年后，我路过政苑社区周末舞会时，竟然忍不住进去蹦恰恰了一曲。杭大的舞厅好像有三处，最火爆、面积最大的就是工体房舞厅。如今好像改造成了浙大西溪幼儿园。斜对面还有一个体育系的舞厅，面积稍小一些。这个位置如今应该是田家炳书院。另外，北门男生区域有一个舞厅。

当时有句流行语叫：“浙大书呆子、杭大二流子、农大土包子。”每逢周末，“书呆子”和“土包子”男生都纷纷汇聚“二流子”的舞厅，眼睛发着狼一样的光。那时，体育系的帅哥往往就是“收割机”。美丽文科女生早早微笑以待。每一次的微笑都浅藏着无言的伏笔。第二天傍晚，4 幢、5 幢、6 幢女生宿舍楼下必多了一场“深情等待”的风景。

那时的周末，扫盲舞会盛行。不知一次都没踏过舞步的女生有没有？青涩一些的理科女生，舞场也是常常去的，只不过往往都是打打酱油。二步、三步、四步，迪斯科、恰恰……孟庭苇、张学友曾温柔了无数的青春。

那时的我们觉得刘德华和梁朝伟简直帅的惊天动地。那时的我们，伤心可以欲绝，快乐可以翻天。根本没敢想到大学的未来，更不敢去想爱的距离，任凭青春的荷尔蒙面对面。那些纯纯的爱后来多数都奏成了舞会的终曲“友谊地久天长”。

当初，还有一项较为小众的运动，那就是溜旱冰，位置就是在东门附近的校医院旁边（如今校医院在北门）。我曾经斗胆想去冒险。但当我看到一些因溜冰摔破手表、摔破膝盖光荣负伤的同学奔赴医院的场景后，我果断选择放弃。

92 地理系，我们这一级有五个专业（地本、地专、水环、港航、气象）。毕业时，我们系已经更名为“资源与海洋工程系”。我们地理专业本科 22 位男生和 8 位高考理科女生属于极不情愿的被同学了。因为高考志愿是“服从调配”（当年高考录取率大概 12%）。从此，我们牵手，有了求是育英故事中的事。

在杭大标志性建筑东二教学楼，我们有了一位温婉善良的班主任吴德秀老师，有了地质陈谅闻老师、地貌蒋时晖老师、水文吴林祖老师、气象方龙龙老师、植物地理何绍箕老师、自然地理侯慧粼老师和冯友健老师、土壤地理俞春鸣老师、地球概论朱光良老师（本来是刘南老师，因出国）、房地产评估欧阳安蛟老师、地图王利军老师、测量学余健生老师，城市规划杨建军老师、文献检索课陈田耕老师、经济地理程玉申老师、遥感毛明海老师.....。

随着他们，我们足迹于杭州的山、兰溪的水、瑶岭的仙境、天目山的植被。当年，男生睡在中学的教室课桌上都能幻化成美美的回忆，把大麦误做韭菜的“无知”故事更是层出不穷。

陈老师登山如履平地、方老师文艺指挥、候老师亦师亦母、蒋老师兼师兼友、朱老师秒灭全班，还有陈桥驿弟子范今朝才子。这其中的故事一篇文章码不完。而今他们中的多数已退休安康静好，而当年的我们已被岁月抛光打磨成中年男女。

专业课以外，我们上课的足迹踏遍杭大校园的每个角落。我们经常出没于西三教学楼上物理课，西五教学楼（9 幢南门第一幢教学楼，门口有假山水池）上化学课、到西一教学楼上高等数学、到东一教学

楼上政治经济学，到东临教学楼上法律基础。像大学语文、公共关系学、逻辑学这种选修课分布在杭大各个教学楼。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全校有点颜值的女生几乎都上过余式厚老师逻辑学这门课，据说爆满（很惭愧，我没选）。即便没上过课，也喝过余老师提供的“阿姆斯特丹的酒”。余老师当时属于社交领域很广（据说各种礼仪活动方面的评委），课也讲得风趣，且经常资助一些贫困的大学生（比如介绍薪酬较高的家教），估计是被女同学喜欢的主要原因。

那时，我们的物理盛正卯老师也算是英俊小生。如今已经是浙大物理系的知名教授，随着岁月一起增长的还有那华发。15年后，他居然认出我曾是他的学生。

法律基础季涛老师，按照如今流行的说法，就是“小鲜肉”，脸上熠熠生辉自带光芒的那种。整个地理系的同一级不同专业都在一起上，季老师点名“真贱”（水环曾剑同学请原谅），引起哄笑无数，也丝毫不影响他的迷妹功夫。

英语的小王老师敦实可爱型，要用一个符号表示的话那就是“萌萌哒”。20年后浙大紫金港食堂再遇，“小王”已经是中年王了，但是那可爱的笑容仿佛又从岁月中走了出来。

英语曹老师则是干脆利落型，语法分析特清晰，对我的直接成效就是：从入大学才第一次接触听力的我，迅速提升了水平，成为同学中获得六级证书的先遣队员。2006年，我们有幸搬到同一个小区（浙大紫金文苑），却在我女儿已经小学四年级才有缘迎面再遇。容颜未改乡音在，岁月无情亦有情。

93年有一件事比较创新。新闻系和省广电局联合在杭大全校91级和92级范围内计划招20-30名培养新闻节目主持人班。活动在女生中有点小轰动了，总计报名的人有三倍之多。地理系自然也有女生去报名。选拔方式包含笔试和面试。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位被录取的新闻系女同学，后来在4幢出入的形象是电影“红粉”中秋仪的模样，颇为引人侧目。

94年春天的时候，我怀着赤子之心申请成为了预备党员。其中与系总支秘书邵亚萍老师的正面引导和杭大的创新氛围密不可分。多年后，我们之间朋友的情感要浓墨于老师的角色。毕业于杭大88历史的她转行专注行政法耕耘，如今已成为城市学院法学院的领导成员。

记得新生刚入学不久，学生会体育部的姬富强（90师兄）就找我参加校运会竞走比赛（高中时我是长兴中学3000米常胜冠军）。姬师兄还专门解释了姬姓的富和贵，而我那稀奇少见的姓“湛”却着实让姬师兄等众多师兄师姐们文盲了一把。就连我的宝石课老师就曾好奇我是不是少数名族。尽管“竞走”与我而言完全陌生，也不妨碍我被成功游说。可惜的是，在运动会那周，一次训练不慎，崴了脚，最终缺席赛场。

地理系在运动场上年年都高唱凯歌，战果累累。我想，估计是有很多姬师兄这样的学生干部有关吧！地理系学生会岗位竞争非常激烈，公开竞聘上岗在全校属于先行者。我大概是在大三下学期通过演讲成功竞聘学生会副主席岗位的第一届女生。

学生会文艺书画社的几位同学印象深刻。有爱好吉他的92郭戩同学（现在建筑职业技术学院）、擅长篆刻的92祝顺和同学（现在金华汤溪中学），还有办经纬报的91港航陈鸿杜同学，好像还有一位94环资的师弟（当然还有很多“我们”，不过记忆断片太多）。

犹记得新生杯合唱的故事。地理系合唱抗战老歌冼星海作曲的“在太行山上”。每天紧锣密鼓的训练，地点就是东横教学楼。我是三人合唱女伴舞之一，属于南郭小姐。但是因为方老师是我们的指挥，获个二等奖自然不是难事。时隔20年，当我参加浙大机关团合唱“娄山关”，站在舞台上，再次获奖，眼前恍惚当年。

参加挑战杯，属于初生牛犊不怕虎。主题是“杭州城市洪涝灾害调查研究”。团队成员有赵班班、陈支书、阿宝等。指导老师依旧是方老师。为了得到调查数据，我们甚至心惊胆战地做了“贼”。我的日记也有详情记录，属于无论如何都抹不掉的回忆。当然，最后的我们也奇葩地获了奖。莫非是上苍对我们勇气的馈赠？

一年级的公共课，我们四个专业基本都是一起大教室进行的。加上当时还有一届专科，学生最多时可达一百多号人。每逢排球赛、篮球赛，我们就会打破专业抱团组队。我属于打酱油，却也常常能入队，但都是替补为主。还记得篮球赛一上场就被对手胳膊肘拐了一记后光荣负伤下场，从此就一直隐隐觉得有胸口疼的幻觉。

现今东二教学楼依旧在，只是早已入住浙大建筑设计院。一楼最东面设计成了有点小调调的咖啡馆，也似乎只有这个角落还保存着大学的味道。我偶尔到西溪校区会绕着东二标志性建筑走一下，喝一杯，坐一会。只是晚上 8 点就要关门，与积压的流年冲撞起来，徒增了许多伤感。

图书馆，是学生时代最难以忘记的亲密，也是我眼中的秘密小天堂，也理解了博尔赫斯。与“死党”施洁亢同学（那时似乎尚未流行“闺蜜”）一起出入图书馆是我们每天的必修课。我们的夜自修基本以抢占图书馆位置为学习乐趣之一。每逢期末考试，图书馆总是人满为患。冬天时候，夜自修结束。走过图书馆中间区域的小卖部，茶叶蛋的诱惑不可抵挡。我们常常肩并肩进入图书馆，肩并肩出入食堂，肩并肩进入寝室。

我的经典阅读经历，其实就是开始于大学时期。从图书馆借阅了大量中外经典书籍，有相当一部分是晚上打着手电筒熬夜完成阅读的。其中有一部分属于不完全开放的书本，比如陈忠实的《白鹿原》，比如贾平凹的《废都》。国外的一些经典名著也尝试大量接触。惭愧的是，可能文学功底欠缺，类似《追忆似水年华》、《百年孤独》、《日瓦戈医生》我都没勇气读完。待到互联网时代，看到有名家微博安慰大家“所谓名著，都是难懂难读的”，才稍稍减轻了几丝忐忑的。后来又有名家说：“没读过《月亮与六便士》的，都不是合格的中文系学生”，就突然没来由的自信膨胀起来了。因为我这个地理系学生不仅读了，而且还写了读后感。这一段较为私人的经历也是多年后奠定了我想成为文艺女青年的雏因。

97 年的那年校庆，我还在图书馆的校庆专刊上卖弄了一块豆腐干文字。不过，现在的我只能浪迹于理工科队伍中做个业余的码字小白。

图书馆通向杭大南门的小径已经有了 LOGO 设计，诸如世纪之光，也有了石凳座椅。南门进来中间区域有一块大草地。大学期间，为数不多的一些照片合影都与这块草坪，以及中间的喷泉有关。

关于它记忆最深的就是电视台的一次采访。我们学生会的一部分同学席地围圈而坐，讨论的话题是“你认为什么样的穿着最合适”。组织者是邵亚萍老师。

跟采访有关的还有一次记忆就是参加了一个香港电影编剧组的采访，故事主题因为与地理或地质之类有关。当时参加人范围很小，采访地点是校办一个会客室。印象有杭大的常务副校长夏越炯老师（也是我们的系友），邵亚萍老师、林金富 90 师兄（后来留系、后来省地震局再后来台州组织部）以及 92 地理的我。

寝室这个单元，是那时的我们大学生涯盘踞最久的地盘。寝室里的人和事自然就更加难以忘却了。大学四年，我们是校园内的小候鸟，搬过 2 次宿舍。而 92 男生，一直住在 9 幢。9-12 幢都是男生区域。那时候，女生可以自由出入男生宿舍，反之则被禁止。92 女生主要住较新的 4 幢。4 幢北面就是 6 幢。6 幢北面就是教工食堂（一楼）和二食堂（二楼）。食堂的西面是一个篮球场。6 幢东面是 5 幢。5 幢的东北面是一食堂。5 幢 6 幢都是三层楼，改造过的 4 幢是 6 层楼。现今，这几幢宿舍已经全部改造成了颇有杭大气息的“启真名苑”。

一食堂最深的一份记忆就是有一位打菜的伯伯，对女生也是始终笑呵呵的。每每给女生打菜的时候总是照顾一下，多一丢丢。大概是觉得淑女太窈窕，有点心疼女娃娃。可是男生就不高兴了！

那时，我常光顾 5 幢。一楼有我的 91 法律系朋友方洁、王丽霞；二楼有我的 91 物理系朋友开洁英（他们班级唯一的女生）。我也常去 6 幢。5 幢有我的一位高中楼晓洁同学（92 日语）。

4 幢门口有个自行车棚，女生彩旗常年飘飘。当然，没有电影“芳华”中的唯美。每周都有女生彩旗被盗事件发生，“案子”也很难破。据说，也有破过案的。那“贼”屋子堆满琳琅满目的女生物件。当时，4 幢一个房间住 8 个人。我们班共 8 个女生，6 个女生一起住 131，而姓氏拼音最前的 F 同学（方幼君）和 H 同学（胡幼华）被分出

去与财经系的同寝室。默默感谢宿舍管理老师的语文功底（我姓 Chen，被姓 Zhan），否则，我的室友就是财经女了。而水环的 2 位女生曹丽军和胡晓红被安排在了我的寝室（不知她俩是不是默默的不高兴？）。

我们的第二处住所是不得不提及的，因为闹过一出夜幕惊悚剧。当时，因为 4 幢改造，我们迁移到了东临的招待所平房过渡一年，住在最东边一间。宿舍管理进出口在最西边，南面就是杭大围墙，北面是教工宿舍 2 幢，距离都是咫尺。某一晚，在财经学院参加老乡同学会，听完失恋故事，又歌罢舞罢返回宿舍，已是黑漆漆一片。不敢打搅管理阿姨，我就悄悄地走到最东边宿舍窗口，小声地呼唤室友帮我开大门。就在这个关键的当口，我背后正对的一间教工宿舍窗口有个同样黑漆漆的身影突然动了起来！艾玛，此时我相信有探照灯的话，绝对可以照射出我那根根耸立的毛孔。我的第一反应：拔腿就跑！速度应该打破了我百米冲刺的最好记录。而耳旁呼呼风声的背后，在另一股风危险迫至之前，我安全踏进了平房的管理大门。第二天，听到保卫处消息说：前一晚，有贼在教工宿舍偷窃，结果是未遂。不知有没有我的百米功劳？

从招待所回迁到 4 幢时候，我们升了二楼，住在了 301 房间。我寝室左边以及对面三个寝室都是法律系，斜对面左侧是历史系。寝室的斜对面右侧是水环、港航、气象的混合寝室。那时候，串门是常有的事，玩牌也是形式之一，瓜子是主要消耗品。往往观战的人远远大于参战的人。常串门的直接后果就是，法律系的优秀才女蔡柯、王佩芬、何伟慧等等都成了我的好朋友。她们如今分别在银行、法院、保险系统成为了骨干力量，过着自己想要的生活。

也有极喜欢运动的同学，比如港航的陆晓蓉同学，就经常性抱着一只篮球出没。现在的她还喜欢上了水上皮划艇。水环的曹丽军同学常常陷入伟人式的沉思，总是被我无情地拉回现实。

我们寝室的施友云高挑温柔，长发飘飘，常常是舞会中被男生高度关注的焦点。所谓吃了嘴短拿了手软。在那个狮子头五毛钱一份的年代，我们非常羡慕寝室长李群有一个会挣钱忒大方的男朋友。

来自于东阳的贾桂英非常自律，特别懂事，经常会顾虑家庭的经济因素而学习刻苦生活节约，尽管我们也都不富裕。我的下铺周文慧如她的名字一样，一直是个文静贤惠的女生，想来是最合适的如花美眷，事实也是。

水环的胡晓红是位特纯情可爱且有一股浪漫气息的女生，说话温柔小声还经常会脸蛋红扑扑。

我和小施同学属于铁杆闺蜜，有很多共同爱好。我们相互的高中同学都认识了好多，其中后来不乏成为好友的。我们经常成双出没学习场所以外，也成双受邀参加一些男同学的生日 party，譬如水环班的。最后她成了水环的媳妇，也会成双出游。譬如我们一起数次去绍兴她的老家；譬如我们，还有吉他王子郭戡，一起去了余姚赵明班长老家（如今自己开了律师事务所），可以快乐睡地板；再譬如 96 年我们坐了 32 小时的火车穷游了西安和华山。同去的还有大施和李群。那种与经济无关的快乐似乎很难再这么自然获得了。

当然，最难忘的是夜晚熄灯后，我们躲在被窝的卧谈会。那话题从老师到同学，从友情到爱情，从熟人到陌生人，好像学习很少能成为主题（忽略我们的不好学）。“西湖之声”的“孤山夜话”一度成为我们不眠的理由，那男性独特磁性的声音也成了我们女生的入眠毒瘾曲。数年后，当我认识了“孤山夜话”的声音主人以及“西湖之声”的一众主持人后，只能用“呵呵”才能完整表达我的情绪了。

大学四年，我们好像有四任班长，包括第一任口才大王赵明、文艺青年郭戡、诚实灵活叶晓辉和守信靠谱叶建华。赵班班高中就积极进步了，入学时是我们班唯一的党员。好口才不是吹的，凭这项本领大学期间在绿皮火车上成功俘获了另一半。后来，我们经过四年的证据挖掘，一致认为三寸不乱之舌桂冠非赵班班莫属。他的职业契合度也是最高——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我们班的阿宝同学（项秀宝）是孤独的。他的孤独是因为他是班级的“第 9 个女生”。他四年时光，痴心不改，对女生的关照，波涛汹涌，绵延不绝。有一次，我们整个寝室回笼觉睡过了头，错过了上课时间，就是阿宝同学呼哧呼哧跑到 4 幢深情呼唤我们去上课的。帮

女生占座位，前排后排都是女生；帮女生买东西，帮女生抄作业，陪女生打球，期末考试帮女生辅导功课；请女生去鼎鼎有名的文三路中磁会堂看录像。最要命的是，总是笑呵呵对待女同学。经常被男生嘲笑，更是被男生恨得牙痒痒（估计是妒嫉作祟）。

高个老六同学（张志远），内向害羞，却拥有于连的勇气。他一直认为自己应该读文科。远在弗兰克福的他，用青春枝枝节节的不懈奋斗和不足为外人道的坚持成功转向了文科，书写了他的人生成就，华丽逆袭成为德国最大律所 HEUSSEN 合伙人，也是我国商务部聘用的唯一双国籍专业律师。

杭大时期，他曾四次鼓足勇气去邀请班级的 1/8 女生去看电影，仅得到一次的呼应。甚至于出现过忒悲催的故事：“请你看刘德华的《天若有情》，结果发现座位却被过道分开”。而今，早把异国他乡做故乡的我们说起过往，已是风淡云轻。倒带回放，25 年前那一双双怯怯的眼神，清澈透底。

96 年毕业时，杭大人要留在杭州，当时有一个重要门槛就是必须有“红卡”指标（大概是 15% 以内）。也恰好这一年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年：杭大进入“211”行列。这一年，杭州有了第一部大哥大。

20 年后，同学会上我才得知，这一年还有工作“包分配”一说。这一年，我的《规划与地价关系的初步研究》（指导老师冯友建）一文获得杭大第七届学生科技论文二等奖。同时按照四年综合测评排序，我非常荣幸地拿到第一名。也欣喜地获得了唯一的浙江省优秀毕业生荣誉称号，也意外地获得班级唯一一个推荐华师大的保送名额（几年后我再次考研，不得不感慨命运造化弄人）。

不过，由于当年家境拮据，与班主任吴老师深谈后，个性要强的我主动放弃保研，选择了留校工作。只是，我的杭大，只亲密工作了一年半，恰遇 98 年春天四校合并。地理系分崩离析，水环和港航先后合并到建工学院，海洋学院；资环和气象留在了本部地科学院。我则调到浙大玉泉校区工作至今（现在留校的还有地理系同班的陈海荣、方幼君，师兄师姐史舟、包永平、郑丹文等），从此成为浙大人。那

个自由、开放、包容的杭大就成为了我心中忽远又忽近、深埋的一个梦，一如那时众多的我们，会发芽，亦会生根。

我的同班同学，除了本文中提及的以外，还有省教学名师，有资深评估师，有小小书画家，也有政府官员，有人类灵魂工程师，还有投资人，甚至有的资产过亿。因为距离的原因，我想，他们对母校杭大的怀念定是远远大于我这个局中人的。

这年头，有一个让人胆战心惊的流行：那就是一不小心，就会找不到母校……小学的，中学的，大学的。其实，大家真正挂念的不是那片草地、那幢建筑、那个名称，而是那时的我们一起走过的与贫富无关的那份从前，以及一直不敢主动提及的青春藤蔓。

活这么大，我们丢过很多东西，唯有那样的回忆无法丢掉。那些回忆活在岁月的痕迹里，已经慢慢沉淀出好看的样子。季羨林先生说：“人活一世，就像作一首小诗。你的成功与失败都是片片诗情，点点诗意。”愿我们的一生，始终都能与诗意为伴。

感谢杭大！那样的时光，让我记住了那时咯噔的我们，无论现在，还是未来，足以葳蕤一生。

（2018年5月27日于求是园）

[返回目录](#)

我与西溪路五十六号的故事

物非人非

—杭州大学中文系 82 级 方达



1、和西溪路五十六号之间的缘分

上大学期间，我去西溪路 56 号都是求教。现在去，我是作为杭大的一个学生或老师的朋友身份去的。当然，物也非了，人也非了。当年，我去过吕洪年、华宇清、祝鸿熹、邵海清等老师家里。

还有一次是帮陆坚老师搬东西。那是他要去援藏，恰逢肝炎爆发的时候。师兄叶辉（中文系 79 级专修班的，光明日报浙江记者站原站长）邀我一起帮忙，用三轮车把陆坚老师的行李从家里拉到火车站。陆老师当时就是住在杭大新村的。

我和《西溪路五十六号》的缘分算比较深的。这本书的作者是我不大学的老师汤洵。他给我们讲过写作课，上过戏剧欣赏课，所以我比较熟悉。汤老师也是我比较尊敬和喜爱的老师。

毕业后，我和汤老师之间也有一些交往。当最早知道汤老师要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就跟老师说，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有需要我的，我一定尽力。

汤老师为确定陆维钊先生的资料要去平湖陆维钊先生纪念馆和故居，我就开车送他去，找了平湖的沈力行同学，使这次任务顺利完成。

后来，书的出版遇到经费难题。我发动部分同学捐助了部分款项，也算为这本书的问世做了一点点工作。

2、和其他老师的交集

我是在当了工农兵之后才上大学的，所以是年级、中文系和杭大的学生干部，和老师的接触面比较广。除了中文系的老师外，和学校的领导也有较多接触联系。

我觉得杭大的老师确实有学术水平，有人格魅力，对我们学生也有很好的关怀，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回忆。

比如前面说到的陆坚老师。他教我们古代文学，学术上和教学上都是同学们一致认可的，而且很支持学生的课外活动。他担任杭大教务处处长时，我作为校学生会副主席，在搞文体活动、百科知识竞赛时，都要向他申请活动经费。陆老师对于我们的活动，只要是能给予支持的都大力支持。

1984年，我们学生会和省民间文学研究会联合组织到东阳采风活动。我们当时组织了30多个同学到东阳采风半个月，经费是个大问题。后来，我们就找学校陆坚老师，教务处专门给我们解决了经费问题。

分管学生工作的校党委副书记董如宾、校宣传部长童勺素，教务处李孝华等老师，都是工作兢兢业业，热爱学生的好老师、好领导。

3、专业领域出书

我写了一本叫做《教你如何打官司》的普法读本。这本书并不是教你打官司的技巧，而是想用最通俗的语言把法律的精神传达给读者，

让读者有一些基本的法律常识和法律思维，目的是为了让你避免打官司。一般学中文的很难在法律专业上也专业，而搞法律的又往往不擅长讲法律故事。

而我是学中文的，又是学法律的。我觉得，我有这方面的优势。于是，用了这样一种老百姓听得懂，又喜闻乐见的方法来传播法律理念，讲述法律精神，教授一般法律原则和规定，以及具体的实务操作。

因为法律的范围非常大，每个人也不可能把法律的各个方面都经历，所以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要保证我说的不错。但是，没有办法把各个方面全部都照顾到，更不可能把一些问题说得很深。我也不想把这些案例往专业探讨的道路上去写，那不是我这本书的任务。因此，也有人认为这本书不够“专业”。但这本书本身不是为专业服务，是为普法而生的。

说到写书的想法，还要从我在中文系读书说起。那时，系里有个刊物叫《飞来峰》。学生会有个刊物是《大学春秋》，由陈立校长亲自题写刊名，我是主编。当时诗歌小说等文艺作品，都是年轻人非常热捧的。如果说一个大学生不会做几首诗，不会写故事散文的话，就显得不够高大上。那时候，文学刊物日子很好过。一篇小说的发表是名利双收，非常厉害。比如张贤亮《灵与肉》、《高山下的花环》等，都名噪一时。

参加工作后，我结合自己的工作和当时群众的法制需求，根据案例写普法宣传的稿子，很受当时报刊杂志的欢迎（我也借此拿了比当时工资还高的稿费收入）。这客观上为我后来写的这书作了一种准备。

杭大之所以到现在还能为大家所怀念，是因为杭大培养了很多方方面面优秀的学子。她的成就体现在每一个学生在地社会的地位及作用上。我觉得在一个大学里，不应该只是学一点书本知识或者专业技能，更重要的是要提高一个人的社会觉悟、修养水平和学习能力。比如我自己，我学的是中文，但从事了法律工作；法律是一种理性思维，要凭证据、逻辑，不能凭个人情感和想象。但法律也不应该是一个个冰冷的法条，在司法中也应该有人文体现（就是人们常说的“司法也是

有温度的”）。我在办案过程中，比纯粹法律专业的同事相比会多一些思考。

4、介绍两本最好的书

以前我很喜欢看书，中学时农村条件差，拿到什么书就看什么书，看得很杂，野史也看了很多。我当时看书的速度是比较快的，白话文一个小时大约可以看一百多页，文言文也可以看六、七十页。

所以，一般的小说几个小时就看完了。印象很深的是高中时蹭看《书剑恩仇录》。我坐教室第一排，有书的同学在最后一排。下课以后，他翻开看。我到他身边，把他翻开的两页都看完了。然后去上了一趟厕所回来，他还才看了半页，真急死我了！

要说介绍两本好书，我推荐陈忠实的《白鹿原》和柳青的《创业史》。我觉得，这两本书是我眼里真正的小说！能够全景式反映一个时期的社会生活，具有历史的厚重感。作者对社会、人文的思考深入其间，对人物和细节的描写真实、鲜活、细致、感人。

5、对《偶拾》一诗的理解

我觉得这首诗表达了作者对自由的渴望和心灵表达的欲望。时代已经从禁锢中解冻，社会正在发生伟大的变革，人们都在进行各种闯荡。然而，目标还没清晰，各种有形无形的羁绊、束缚还像幽灵一样缠绕周围。

诗的主人公只是一个平凡的个体，没有经天纬地的雄才大略，没有呼风唤雨的强大能量，而只是一个平凡的小个体。但他也是一个人！他虽然默默无闻，但他渴望得到思想和灵魂的自由！他还想得到他人的理解和尊重。最起码，他希望自己的心能像水中的小鱼那样自由自在。那份夕阳下的安宁，是他在不安分的年代里希望得到的归宿。

[返回目录](#)

我与杭大的故事
杭大是时代潮流的引领者
—杭州大学中文系 82 级 方达

1、到杭大的过程

我曾写过一篇叫《我的高考》的文章（公众号《航埠鸟》上刊载），详细介绍了这个过程。我是 1974 年 1 月高中毕业的。那个时候，根本没有考大学这一说。我就回乡种田、做小工。1975 年开始推荐工农兵上大学。我那时候在农村，因为没背景，没被推荐上。1976 年，我满了 18 岁，就去当兵了。后来恢复高考了，我当时在部队。虽然很想考大学，但领导不允许考地方大学，我们能考的是军校。而当时，我们部队的军校只有一个中专，还要读四年。我不愿意去。

1980 年，我服役期满回到老家。我的一部分同学已经考上大学。同学就和我说明有个复习班挺好，我就报名去参加了。1981 年，我刚好考到分数线，没录取。直到 1982 年我才考上的。当时，对学校没敢有很多选择，只能是分数线到了能去哪读就去哪读。只知道浙大是工科的，杭大是文理的。杭大的招生人数又比较多，所以我尝试报考了杭大。

当时我想，如果能考上重点大学，我就读哲学，要把人生是怎样的搞明白（认为一般大学的哲学系满足不了这个要求）。如果一般大学，我就读中文系，因为我自己语文又比较好，当年考了 97 分（110 的总分），是全省第三名（第二名是我大学同年级的一个同学，他是 98 分）。当时浙大是理科生的首选，杭大则是文科生的首选。我就选了杭大中文系。

我们中文系 82 级共有四个班，其中三个是汉语言文学班，一个是刚开办的新闻班。每个班四十多人，共 167 人。部分课程（如现代汉语、写作、英语）四个班分小班授课。部分课程（如中国通史、古代汉语、古代文学）是上大课，四个班一起上课。

2、杭大同学情的特别之处

大学里的同学不同于中学里的同学。中学的同学地域性很强，而大学同学来自五湖四海，互相之间没有多大的联系。能够进到好的大学的，都是在当地的精英。到大学后，有个对自己重新定位的问题：既不要因为我原来是地方精英，在新同学中成了普通一员而自卑；也不要因为成为了精英中的精英而觉得了不起。四年大学一读，人的变化是非常大的。毫不夸张地说，四年学得好的，完全可以给那些不用心学的人当老师。

大学同学的感情还很少掺杂功利，这是非常珍贵的。我认为同学之间应该相互多了解和交流。刚进大学的时候，我发现同学之间还非常羞涩，不敢交往。我就想，能否找个让大家相聚、交流、了解的平台。

我看大家基本都没有超过 20 周岁（我当然是超过的），觉得可以从小组做起，通过给大家过 20 岁的生日的形式来实现交流目的。我们一个小组有 11 个同学。我就跟大家商量，每个同学都要过个 20 岁生日。规矩是：有同学过生日那天，全组每个人在食堂里打两个菜，端回到宿舍里来吃（男生宿舍 8 个人，女生 3 个人也到男生宿舍），还有一斤散装水果酒。然后，共同出资买个笔记本，笔记本上每个同学给这个过生日的同学写一段话。这段话是鼓励的，或希望的，或回忆的。这样，我们四年里 10 个同学都过了 20 岁生日。

刚开始的时候，大家会比较羞涩（尤其女同学比较难请），甚至会觉得没什么意义，有些勉强。后来就越过越有意思，直到最后大家起哄说，一定要给我补过一个生日。

这件事情当时在我们同学里面不少人都知道，都觉得受益匪浅。四年大学期间，我付出很多时间、精力和心血，在班里、年级里、系里和学校里，组织了很多活动。虽然很累，还影响学习，而且要面对一些同学不理解的委屈。但越到后来（包括毕业后多年），越得到同学们的赞同和肯定。

现在每人一个手机，我不觉得沉迷这种虚拟世界是好事。我们是必须跟上互联网时代的步伐没错，但是我们不能被虚拟世界所绑架。人和人之间线下的交流还是非常必要的，需要情商，需要时间，需要感情，需要坚持。

如果说，同学之间没有面对面的交流，那么不仅对我们身边的同学缺乏基本的了解，我们更不可能进到内心世界里与他进行心灵交流，并产生思想火花。个人力量终究是有限的，只有和别人进行交流和碰撞，你才会得到更多的灵感，出现更多的成就。这种交流，线上线下不应偏废，（两个方面都应该顾及）。不应该因为线上发达了，就认为我们完全不需要线下的交流，线下交流是不可代替的。

3、杭大精神是什么？

这个问题比较难说。杭大就像我们《西溪路 56 号》书上所记载的，有那么多的大师。他们首先就是在学问上能自成一家，专心钻研，才能成为一个大家。一个大学需要大师，大师是靠真本事，而不是靠捧出来的。所以对于学问的追求，对于个人修养的追求，是大学里的第一要义。

第二，大学也不是一个脱离社会的象牙塔。无论大学的老师也好，学生也好，也应该和社会同呼吸共命运。杭大在十年动乱期间保护过灵隐寺。在 1984 年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时候，杭大学生自发热烈迎接驻军部队凯旋，掀起了学英雄的高潮，当时社会反响很大。部队从天目山路过来，我们学生就站在马路两侧，鼓掌、送花、喊口号。

后来发展到去军营慰问、邀请军人们到学校做报告、搞联欢等，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这是杭大校风中爱国热情的一个很好例证。所以学校不应该是脱离社会的象牙塔，而应该是和社会的脉搏同呼吸共命运的共同体。还应该作为一个社会最有激情，最具热血，能够引领社会潮流的地方。

4、我们这代年轻人当如何去传承杭州大学的哪些精神？

我觉得还是应该有一贯的传统的想法，也就是说，作为一个读书人要修身养性、治国齐家平天下。在学校里要尽量扩展视野，加深自己的认知，从而形成自己的世界观，为服务社会，甚至引领社会，做好充分的准备。现在的社会，诱惑确实非常多，每个人是否能够有我们前辈那种“板凳甘坐十年冷”的精神？现在不是真的说要坐十年的冷板凳，而是说我们要脚踏实地、扎扎实实地做好基础工作，不要急功近利、浮光掠影，更不能虚度光阴。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年轻人在精神面貌上能够向前辈们学习的一个方面。

现在年轻人的优点很明显，比如思维敏锐，涉及面很广，接受知识的能力很强，更没有衣食之忧。因此，他们这一代人的起点很高，应该能够为社会，为世界的未来做出更多的贡献，而不仅仅是只为个人的前途着想。世界上真正能成名成家的总是很少的一部分，大多数人只能是一个普通人。我觉得，一个人能够觉得自己一辈子没白活就是成功的。

[返回目录](#)

我和西溪路五十六号的故事 我魂牵梦绕的精神家园

—杭州大学中文系 77 级 费君清

1. 杭大新村的缘分

我在杭大学习和工作长达 20 多年。在此期间，一直都住在学校宿舍。因此，与杭大新村很有缘分，有着千丝万缕割不断的联系。

我是 77 级，于 1978 年 3 月进校读书，在 1982 年 2 月本科毕业后留校任教，直到 1999 年下半年调离。

我留校后，一开始住在校内集体宿舍。曾在总工会干校临时住四人一间和两人一间的合住寝室。过了一段时间，随着中文系回迁，也搬回校内。回来后，先在原校医院搬出的 10 幢二楼住；等到 10 幢要拆旧建新，又搬到 2 幢。与我合住的几个室友都是留校工作的同事，前后有中文系黄老师和孙老师及历史系洪老师。

洪老师是最后一位与我合住的室友。大约在 1985 年，他去美国深造，但人事关系仍留在学校。所以，这间房子名义上是我们两人，实际上是我一个人住。

恰好那时妻子从江苏大学调入我校，有了这一间 14 平米的房子就相当于有了一个小窝，可以安顿下来。在那个年代，能有这么一个小窝，我们是相当满意了。我儿子冲冲幼时就在这里磕磕碰碰，跌跌撞撞地长大，左右邻居们都认识他。此地，现在成了浙大启真名苑。

那时的 2 幢还是大家习见的“筒子楼”，即中间一条走廊，两侧是房间，与作为女生宿舍的 5 幢、6 幢的格式是完全一样的。它原本是作为学生宿舍来设计的。后来教工多了，没有足够的宿舍，就把学生宿舍临时拿出来安置教师，充当教工宿舍。

这种宿舍的条件是比较简陋的。一般是根据各家的人口多少来安排房间：三口之家一般只给一间；人口再多一点的会给南北两间。至

于有没有给三间的，我还真不知道。卫生间是公共的，没有洗浴间。若要洗浴，一般都得去校内公共浴室。



2幢也没有厨房。各家都是在自己门口的走廊上放个煤饼炉，搭个简易的小搁板，以此做些简单的饭菜。每到饭点，平时十分

安静的走廊上就会热闹起来，仿佛奏响了“锅碗瓢盆交响曲”。整个楼道里气味杂陈。各家在做什么菜，邻居可以闻味而知。

大家相处熟了，自然有来有往，互相照拂，关系十分融洽。直到若干年后，大家渐渐分散出去，住进独家独户的房子。但碰在一起，仍会怀念早先的那些日子，并有一些依依不舍的情愫。记得，有一年邻居们曾以二幢老住户的名义发出通知，组织了一场聚会活动。我也特意赶去参加。

到了1988年，我家有了从校内集体宿舍换到天目山路对面的河南宿舍的机会。新家就是西溪路56号杭大新村，房号是17幢28号。当时别说有多开心了。

因为离开了集体宿舍，有了独家独户的房子就意味着可以单独办理居民户口（不再是集体户口），也可以申请使用瓶装煤气。要知道，有了瓶装煤气，我们生活状况就能提升一个台阶：

一是可以告别很难伺候的煤饼炉，从而大大节省我们夫妇花在家务上的精力和时间。

二是有了自家独立的卫生间，可以在家里洗澡淋浴。那简直是在梦里都会笑出声来的。

三是那时恰好到了孩子要上幼儿园的年纪。杭大幼儿园的质量相当好，属于杭州市上乘的幼儿园，而且就坐落在杭大新村里面，可谓近在咫尺，甚为方便。

四是杭大新村是个人口素质比较高的院落，不必顾虑孩子的安全问题。故后来我们会指派几岁的儿子在大清早拎着个小篮子出门去附



近拿牛奶。他会很乐意帮我们这个忙，接下任务就自个儿屁颠屁颠地

在杭大二幢集体户的粮食证

去了。因此，我们在河南宿舍住了近六年，感觉真是很好。

2. 杭大新村

杭大的教工宿舍不止这三个：河南宿舍（西溪路 56 号所在地），河东宿舍（文三路杭大新村），体育场路杭大宿舍，还有庆丰村那边的一个，不过规模稍小一点。在这四个中，我住过其中两个，即河南宿舍和河东宿舍，而体育场路杭大宿舍和庆丰村宿舍我也是了解的，我因工作关系经常要去那里。

再加上我的博士生导师吴熊和先生和我的老领导陶春法老师，后来也都搬到体育场路宿舍去了。于是我去那里的次数自然也多起来。

总体而言，这几个杭大宿舍都是相当不错的，可以说各有专长。如建筑物最新的要属体育场路宿舍和庆丰村宿舍，其中体育场路宿舍还在杭州市核心区，交通十分便利，学区也很好，附近就有名校杭

一中，所以会受到许多人的喜欢。不过对杭大人来说，我想最喜欢的地方还是要数西溪路 56 号，理由后面再说。

而文三路的杭大新村也会令人青睐。虽然它的小区规模要小一点，楼房也比较低矮和陈旧，但是这里也有自己的一些优势。一是它与学校相隔并不远，从学校东门出去有一座小桥与它可以连通，只要步行 20 分钟左右即可。二是河东宿舍与名校文三街小学（属于全国前 100



强的小学）仅一墙之隔。它的毕业生对应学区又是一所名校——杭州学军中学，也是位居全国前 100 所。就这一点而言，河东宿舍要强过河南宿舍。

河南宿舍的学区是保俶塔小学，这个小学是名校，也属于国内前 100 所。不过它对应的中学是向阳中学，虽然也不错，但是与学军中学相比还是会有一定的差距。

由此可见，河东宿舍所具有的优势也会使它变得十分诱人。九十年代我没有太多犹豫就从河南宿舍换到河东宿舍，就是考虑到孩子上学的因素。

今日看来，杭大宿舍多数坐落在杭州市最好的文教区。那里有着国内最好的幼儿园、小学、中学乃至大学。于是，杭大教职工可以不费什么气力就享受到这些优质资源，真是一种幸运。

3. 为什么特别喜欢西溪路 56 号的杭大新村？

我比较喜欢杭大新村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是它离学校最近，上下班最方便，享受学校资源最便捷。从学校到河南宿舍，步行只需十分钟。说句玩笑话，即使杭大校内的上课铃声响了，从杭大新村走过去都来得及。

第二是它规模最大，住户最多，各种信息也最灵通。所以我的导师吴熊和先生晚年时很希望能从体育场路宿舍搬回学校附近的宿舍。后来启真名苑建成了，吴先生的愿望也顺利实现。

在吴先生乔迁启真名苑后，我曾去贺喜。看到他的寓所坐落在面朝天目山路的最前面一幢。该幢的位置估摸就是我原先所住二幢的地方。

屋内开敞明亮，南面一无遮挡。尤其是从卧室可以悠然望见南面漂亮的宝石山和亭亭玉立的保俶塔，直接面对美丽杭州的最标志性景色，不禁油然而起“对面青山多妩媚”的感觉。居此华屋，天下美景伸手可触，怎不让人心旷神怡，幸福指数大增。

第三是小区里大师最多，积淀最深，文化品味也最高。河南宿舍可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以我们中文系而言，许多老师都是住在河南宿舍的，如姜亮夫、蒋礼鸿、沈文倬、徐步奎、蒋祖怡、陆坚、吴熊和、蔡义江、郭在贻、邵海清、蔡良骥等等，很难详述。再加上其它院系的一些著名人物，足见杭大新村所拥有的丰富宝藏。

院子里有几幢五十年代建的小洋楼可谓是最好的。朝南有小院子，二楼有小阳台。楼道里就是红漆的木地板。据说，还有当时比较稀奇的抽水马桶和浴缸。

由于这种小洋楼的成本比较高，后来就不再建了。

4. 对《西溪路五十六号》书中提到的老先生的印象

我读的就是中文系，中文系的先生给了我重要影响。其中，印象最为突出的老师有四位：他们是硕士生导师陆坚先生、博士生导师吴熊和先生、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徐步奎先生和直接分管 77 级的系领导姜新茂先生。

他们的言传身教，使我终生受益。很多时候，杭大的精神与文化就是通过这些老师再传递给我们的。

杭大以人为本，关心和爱护学生，突显人文关怀，对学生的教育和帮助特别大。像我们这些在本科之后又继续攻读硕士、博士的人，可能体会得更深一些。

读研时，我们的导师非常好，待学生就象是亲人一样。

读博士时，吴师母每当我们去时，都会问寒问暖，并为我们沏茶和端水果。

读硕士时，导师陆老师会邀请我和师弟去他家吃饭，师母何老师则亲自下厨为我们做菜。

陆老师的家也在河南宿舍，习称“七十二家房客”的楼里，进门是个不太大的客厅，靠墙摆着一张四方桌。平时没人的时候，这张桌子为了节省空间总是靠着墙，而当我们去吃饭时，就要把桌子移出来放在小客厅的中间。这时，小客厅就会显得愈加局促。

但刘禹锡《陋室铭》说得好：“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为吾德馨。”在老师家，虽然简朴但充满芬芳。时光过去了三十多年，当时在老师家吃的什么菜已经忘了，但是对叨扰吃饭的事总记忆犹新。

想当年我们在老师家里一点也不感到拘束，十分自然地聊到学习和工作上的事情。往往在这个时候，老师就会把做人做事做学问的道理传授给我们。

5. 影响我一生的两本书

我们进入大学之前，正是知识饥渴的年代。十多年，没有正经上学，没有书籍可读，偶然找到几本书也不能正大光明地看。

等到考进了杭州大学这知识的殿堂，就像鲜活的鱼儿游入大海，别说有多高兴，恨不得把天底下所有书籍都看过来。因此，我和同学们一样，在大学四年确实读了不少书。

不过，现在我很难明确地回答您是“哪两本书最影响我一生”这个问题。但是我可以回答，是哪两个人最影响我的人生态度。我认为，最影响我的人是陶渊明和苏东坡。他们的集子如《陶渊明集》和《苏轼诗集》是我十分喜爱的书。

最初对陶渊明产生兴趣，是从徐步奎先生的课堂作业开始的。那次，由徐先生讲魏晋文学。他布置我们围绕陶渊明写一篇作业，题目自拟。我就写了一篇论述陶渊明存在入世与出世内心矛盾的文章。在作业批改完毕之后的一次课上，徐先生在课堂上点了十位同学的名字，要求这些被点到名字的同学站起来。我们十个人当时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道什么事，但都老老实实地站了起来。

结果徐先生说了一段令中文系 77 级同学终身难忘的话。他说：“你们这一届是我教过的所有学生中最好的一届；这十位同学又是这次作业中做得最好的。”后来，我喜欢古代文学，并把它作为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的方向，其实就跟徐先生的表扬和鼓励有关。因为受到徐先生的鼓励，我仔细研读了陶渊明的全部作品，后来的本科毕业论文选题也是定的陶渊明。

我之所以喜欢《陶渊明集》，一是因为陶渊明诗歌的艺术成就很高，二是因为他思想品德的清高。那种“不为五斗米折腰”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境界都是我所特别喜欢的。

其次，特别喜欢的要数苏东坡了。北宋文人常有一股浩然正气。他们的人生经历、诗文创作、仕隐生涯等都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奇闻轶事，受到后人的喜爱和钦慕。苏轼就是其中一个杰出代表。

中华书局整理出版过《苏轼诗集》、《苏轼文集》和多种版本的苏东坡诗词选。另外，还有多种传记，如林语堂和王水照先生撰写的，我都很喜欢。他处事为人的态度对中文系的学生而言很有杀伤力，也是我十分欣赏的。

[返回目录](#)

我与杭大的故事

种下一粒求知的种子

—杭州大学中文系 82 级 金军民

1. 考入杭大

我是义乌来杭州的，小地方来的。当时，从义乌来杭的一共三个同学，整个年级有四个同学。

选择考杭大，是因为第一在高中的时候，我就很喜欢写东西，包括诗歌散文这些的。所以，希望自己将来能往作家方向努力，感觉中文系最适合，当时就想到杭大中文系了。因为杭大中文系当时的影响力很大。

第二，早就知道杭大有非常厉害的老先生。因为中学上课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就老说起姜亮夫、夏承焘先生，所以我对杭大的老先生们早有所耳闻。当时，杭大还有个化学系金松寿教授是义乌人，还来我们义乌中学作过演讲。当时所有的同学听完他的演讲后，都是心潮澎湃，深受感动。

所以，我对杭大很早就有所了解，也早就心向往之了。

2. 杭大精神是什么？

这个问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认识，而且这种形而上的问题也没有统一的标准。在我眼里的杭大精神有四个方面：

第一，求是求真，追求真理。这么多大师，汤老师书里也只是写了一部分。这些大师之所以称为大师，就是他们有一种不断追求的精神。而且杭大的传承很有历史。虽然杭大本源的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但整体来说它扎根于浙江。浙江人就是求是的精神。那么，这些大师熏陶下的学生，理所当然会具备这样的精神。虽然不全部，但多多少少都会继承一些。

第二，博采众长，开放包容。杭大当时虽然是一所浙江省的大学，但是也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我们在读书的时候，没有地域的区别，就觉得大家都是杭大人。社会上有些地方可能有“山头”，我们杭大是没有的。杭大又是一个综合性大学，我写的近作“读后感”里有提到，当时我就触动很深。我想起蔡元培，想起北大。为什么大家都说那个时候真好，因为那个时候的北大很包容，允许各种学术争论。允许学术争论才是包容的一种特征。

确实，杭大的空气是比较自由的。杭大的教育可以用“放养”来形容，就是让学生在相对比较自由的环境里去求知、去学习。当然，“放养”是宽容但不是放任。在这样一种氛围里，学生们也养成对自己行为负责、自我约束的习惯。我记得，当时整个中文系公开处理的学生好像四年中只有一起。当时，上课时也没听老师说这个不允许，那个不允许。班干部也没有管我们，也不太敢管我们。像我前段时间抖音上看到一段视频：职业学校的女生干部管宿舍。我们那个时候的班干部哪会这样！绝对不会盛气凌人的。当时，我们就很明确，班干部是为我们服务的，我们人格上是平等的。不可能说，你是团支书、你是班长，就有特权，就可以高高在上、盛气凌人。为什么我们当时会有这种风气，那就是学校的风气，学校的传承。包括我们的老师也是非常平易近人。

第三，向上向善，家国情怀。当时，我们绝大多数的同学，都抱着振兴中华、报效国家这样的理想。虽然，于个人而言，考上大学就是离开了农村，鲤鱼跳龙门，但是没有大学这样一个平台，你也不可能实现，你也不可能到一个更高的平台去报效国家。所以，传统儒家的思想对我们影响很大。我自己一直认为，道和儒是完全不同的思想，但他们有很相似的地方，比如都非常注重个人修养。但儒家思想更加崇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更注重报效国家，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者兼济天下。中文系作为一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授渠道和传承平台，儒家的思想传承是耳濡目染的。

我们的课程就决定了我们要接触这类思想，从课程设置来说就是要接触这类传统。学校或老师并不是强制性让我们接受，而是我们在

读书，或者说遨游在这些古典文学著作中的时候，自然而然潜移默化地就受到这种思想影响，包括被古代人物的形象所感染。比如，读屈原的《离骚》，就被屈原感染了。还记得刘操南先生穿得比较朴实。他讲《离骚》的时候是唱出来的，方达有唱，我也记得；还比如吴熊和老师，当时穿的短袖好像还是绸缎的；乍一看，以为是个财主，一把纸扇，一个包。那个包也从不打开，上课就经常摇摇扇子。他有口音，但是讲得很生动。听课我虽然不是很听得清，但是听课的人很多。吴老师和蔡良骥老师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上课很活泼，讲着讲着，自己哈哈会笑，下面的同学也笑。同学笑也没关系，老先生一点也不介意。

第四，治学严谨，精益求精。杭大精神里还有一条就是自学和做事的严谨更值得一提，也是很关键的一条。我在这个岗位上我尽可能去做到最好，是否做得最优秀我们不能保证，但至少在这个岗位上我对得起这个岗位。我尽力了。

3. 大学中难忘的事

那个时候，上学有点懒散，经常睡到快上课了才起。早饭也经常不吃，就背上书包匆匆赶往教室。我们当时的公共课都是大课上的，专业课就是小课多一点。我当时比较感兴趣的是现当代文学。本科时，我们没有分得那么专业，但是公共课我也很喜欢听。比如历史课有个老师，我记不得他的名字了。他戴着一副眼镜，讲起课来活灵活现的，就好像他就在历史现场一样。到了下午除了上课外，我们有一帮同学组织了一个足球俱乐部。

当时，爱好体育的人比较多，而且我们的爱好还很专一，就是喜欢足球。这也是有原因的。记得1981年的时候，中国足球队亚太区预选赛，最后进入四强了，打得挺好的。当时进入四强有科威特、沙特阿拉伯、新西兰和中国。中国队差点出线了，那时还是经验不足。在这以前，我们不了解足球。但是看了这个足球，突然发现别人脚下可以玩得那么好，简直比手还灵活，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然，我们

中学也有玩过，但不是足球，是排球；条件不足，只能排球当足球踢。没想到，到大学后有一群情投意合的同学。于是，我们成立了一个足球俱乐部，而且名字叫 devil，就是魔鬼的意思。当时中文系四个班，三个语言文学，一个新闻班（我是一班的），所以足球俱乐部这四个班都有同学参加。

当时足球俱乐部成立起来，就像经历了一个成人礼。进入了俱乐部后，我感觉自己就像成年了一样，不像学生了。我们这群人在一起，除了球以外，还可以聊文学、历史甚至很多人生的事情。比如，当时杭大的许志强同学，他聊的东西就很有趣，有些是我们闻所未闻的。所以，杭大的学习生活非常让我们开阔视野。这个俱乐部也是我们释放青春，释放能量的场所。那个时候，也有同学抽烟喝酒，不是说这个习惯好，但是就是感觉提前进入了成人世界。

我在快毕业的时候，学会了两样东西，一个是下围棋，一个是抽烟。当然这个不好，只怪自己意志力薄弱，但同时也感觉这个行为很有男人气质，很像男子汉。足球场上我是核心组织前卫，相当于 10 号位。前锋当时是张晓东，王今平是守门员。当时的队服也很有意思，我们为了筹措经费，就在杭大校园里面摆书摊，卖掉书的钱去买足球，买队服一类的。我们当时在杭大食堂门口卖，是原来大礼堂那个，后来在后门新开的食堂也摆过。当时，这些行为都是被学校允许的，这里也可见的杭大非常包容。当时书也卖得掉，那个时候书是流行，所以学校里买书的同学不少。我们卖的不仅是书，杂志一类的也卖。

当时我们踢足球，算是“风流人物”。这个风流人物要打个引号，因为学校里面就我们俱乐部的同学算是朋友比较多的。跟其他同学相比，我们跨系认识的人多一些，比如当时化学系、体育系、生物系、地理系，经常在一起踢球。有时候，他们踢球比较好的也会过来和我们一起玩。只是毕业后，每个人去了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单位。我自己就去了很多单位。那个时候通讯也不是太方便，非常可惜和遗憾，后面断了联系。也怪自己不够懂事，没能很好地去珍惜大学时建立起来的友情。现在可能来往的也主要还是自己同个年级的。



足球队合影

4. 今昔比较

我不想去教育现在的孩子。能够看到社会的问题是为了改进社会，而不是为了否定这个社会，要以这个作为出发点。正如我们搞研究也是这样，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

现在社会有一些浮夸，有些人又比较高调，但实际上他本人的能力又未必能达到。因此我崇尚的还是做人做事要低调一些。

中文系学习过程中，让我们认识了很多，古代的、当代的、中国的、外国的。这些大师们都有和我们聊天，而他们思想又比较深邃。大师们思考的，很多可能是世界和人类这种宏观问题。但工作中，我们遇到的又都是很现实的问题。

所以，中文系给了我们一种思维的品质，告诉我们思维的方法。所以，中文系也是万金油。每个人经历又都不同，很多人到了行政机关，遇到的问题都是很现实的。

今天聊了这么多，突然觉得自己很惭愧，觉得自己在杭大还没能好好读。我们读大学时也算是幸运的。一方面，八十年代是物质从匮乏到充裕，精神从单纯到比较丰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接触了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以及各种思潮。到了杭大后，突然发现原来世界这么丰富多彩！这是我们那代人的幸运。

这 and 现代年轻人很不同。因为他们出生的时候，物质已经很丰富了，和我们那时候完全不同。通过杭大四年，我们体会到了终身学习的重要性。由于大学还要考虑完成学业，反而大学毕业后，我对知识的渴求达到了一个高峰。大学对我而言，开启了一扇门，进入到知识的殿堂，领略了知识的魅力，就像神经上被刺激了，也像是种下了一粒求知的种子。

[返回目录](#)

我与西溪路五十六号的故事

说不完的回忆

—杭州大学中文系 78 级 任平

1. 和杭大新村的缘分

一段写在杭大新村建造之前的历史

抗战时期，浙江大学迁到了龙泉，建立了龙泉分校。龙泉分校的主任是郑晓沧。他刚刚从英国回来就给这个漂亮的地方取了一个英文名“fine yard”翻译成中文就叫“芳野”。

龙泉分校保留了浙江大学的文科和部分理科的主要力量。当时教育系、中文系、历史系、外语系等主要的教授都在这里。这就成为了后来杭州大学的一股学术力量。

浙江大学从龙泉回杭后，政府刚把旧的浙江大学收回来。我父亲是收复委员会的委员。所以五十年代初建校的时候，我父亲都参与了。

当时的党委焦书记要召开全校性的重要会议，总是要把两个教务长带上：一个是王承绪（他是教育系的教授，又是中国第一个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他是从英国回来的），另一个就是我父亲。王教授和我父亲在一个办公室面对面坐的。同一年，两人又都被打成了右派，命运相似。

从龙泉回杭后，老教授们还没有地方住，学校就安排先生们先搬到了罗苑（现平湖秋月），后搬到杭大新村。记得在罗苑居住的时候，我们家和陈学恂先生一家，还有陆维钊先生一家都是邻居。（但我的书法受到陆维钊先生的影响，倒不是住在一起当邻居的时候，那是后来的事了。）

杭大新村是 1956 年开始建，1957 年才开始住人。我是 1957-1958 年住在里面。我们住在 6 幢（就是两层楼的教授楼）。当时的邻居是

杭大党委书记焦梦晓，还有教育系的陈学恂教授。陈老师儿子和女儿都是我的同学。

杭大新村的二进宫

1957年反右斗争后，我父亲被打成右派。所以原来的6幢我们就没资格再住了，搬到了文三新村的杭大新村。也就是从三室一厅变成了南北两间。

那个阶段，父亲遭了殃，姐姐去了南京工作。姐姐其实考上了南京师大，但是因为父亲当时有问题，就取消了她的入学资格，后来到了南京炼油厂工作。所以我姐姐一生，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南京度过的。当然，后来姐姐通过自己努力，到北京石油学院读了四年书。

姐姐和我差12岁，她已经是考大学的年纪，我还刚刚读小学。母亲是小学校长，工作很忙，一周才回来一次。姐姐就像母亲一样，很关心我。她在南京的时候，我经常给她写信，可以说这辈子写信写得最多的就是姐姐。有时候，就是像明信片一样大小的（想到了就写）也会给她寄过去。她知道我会画画，所以我在信里也会给她画画。她则会把从中学里学到的苏联歌曲，比如《山楂树》、《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等，教给我唱。

所以，我的小学就是在文三路的杭大新村读完了。

后来省里落实政策，把我父亲帽子摘了，工作也恢复了。我们又搬回到现在西溪路56号的杭大新村。这次搬到了14幢。

这个14幢比6幢稍小一点，但也有三室一厅。当时的邻居就是金观涛先生。我到14幢的时候刚刚开始读初中。

2. 几个杭大新村的不同

童年玩乐交友的回忆

住6幢的时候，我还很小，天天跑来跑去疯玩。包括隔壁陈学恂教授的儿子，他比我大一岁。那时候，杭大新村还在建，还有很多脚手架。我们就在脚手架下面跑来跑去，其实很危险。但当时胆子很大。

后来再住 14 幢的时候，我已经比较懂事了。周围的邻居和我年龄差不多的，都成了好朋友，比如金观源、金观涛、胡大林的小孩（胡大林的父亲是历史系系主任，有五个孩子：老大胡大林、大妹妹胡大萌、第二个胡大苏杭州著名舞蹈家，杭州跳白毛女跳得最好的。她的儿子就是大疆无人机的老板。还有胡大红、胡大丽她们都是画画的。）

所以杭大新村是很出人才的。

我和胡大林好，就是因为他也是画画的，和我兴趣相投。

这也说明在西溪路 56 号的这个杭大新村，实际上人文环境很强。

当时，我们小朋友之间关系很好，什么都知道，连他们父亲母亲的情况都很清楚。比如胡大林的父亲是早期研究基督教历史的，还是原来上虞春晖中学的校长。他的夫人是章曼丽曾经是居民区的小组长，也是很能干的，是教音乐的。所以他们的几个女儿都懂音乐、舞蹈。他们家艺术细胞很强，胡大丽到了美国，也成为了出名的画家。

从发小到出书

我有个发小是蒋遂。因为我们两家的父亲关系很好，他们总在一起切磋学问，所以蒋遂很小就和我一起玩得比较多。

有一年，我们两家的父亲都参与了《辞海》的修订。周恩来把全国的专家都集中到上海，在外白渡桥的浦江饭店。那个时候，国家条件不好，没什么吃的，所以两个父亲就把我们两个孩子带过去，一起吃一起玩。

大人们都在编《辞海》，我们小孩也不懂，问也不敢问。浦江饭店又很大，我和蒋遂两人就在大厅里面玩纸飞机。窗户外就是黄浦江，我们就在那看船，世界各国的船看了个遍。那个时候我三年级，蒋遂二年级。

黄浦江上的邮轮

后来蒋遂提议，把大家的回忆文章汇总起来出本书。这样文章也不会散落各地。我觉得这件事非常有价值，就给这本书取了个名字

《烟雨西溪》。取这个名字是因为觉得风浪刚停，烟雨飘渺；大家都在回忆，这段小时候和文革时候发生的事是一番烟雨旧事。

在这之前我们也有个集子，是讲杭大附中，也就是现在的学军中学校的，出了一本回忆录。没有直接出版，但是自己印刷了。它不是一般的回忆，不仅回忆了知青生活，还回忆了中学生活及到工厂工作以后的生活，非常生动和全面。

所以有这个基础，我就觉得关于杭大新村的回忆录的确也应该有个这样的出版。因为我们这批人（杭大新村的子女）都是在这个地方长大的，对这里是非常有感情的。

3. 读夏承焘老先生的诗

看完《论词绝句 100 首》后，我有感而发写了这首《读瞿禅太先生论词绝句》。这也是我真实的感想。

因为夏承焘是我父亲的老师，我喊他是太老师。当时疫情来了，我就能在家里静下心来写点东西。《论词绝句 100 首》这本书讲的就是他读词后的体会。我就在疫情期间把他的 100 首词抄了一遍。

《读瞿禅太先生论词绝句》

（2020 年 2 月 10 日）

词海寻源到教坊，花间淮海走维扬。
铁板铜牙大江去，晓风残月笛音长。
婣娟共诉相思夜，暮柳独依瘦红妆。
豪情谁寄千岗外，无尽诗思湖岸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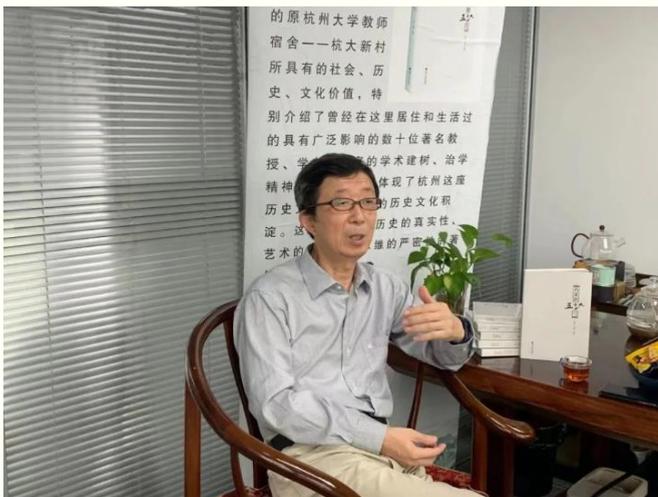
[返回目录](#)

我和杭大的故事

—杭州大学中文系 77 级 岳耀勇

1、杭大精神究竟是什么？

这就是当时马华所讲的，大学四年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并不是学了什么知识，而是掌握了学习方法和人生态度。这才是最重要的。



知识当然重要。四年中，我们看了很多书。但实话说，这些书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得到。而学习方法和人生态度却不是任何地方都可以学到的。那

那个时候，我们拥有前所未有的学习条件。文革结束，一切知识充分涌流，经典作品都重印。我们通宵排队买书，买了《一千零一夜》、《悲惨世界》等经典名著。当时很便宜，几毛钱一块钱左右，一大摞。

我们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所以大家都很自觉。到了晚上，没有人要求，都在看书，就像海绵一样去吸收知识，学了很多东西。这些知识对我们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老师教给我们的学习方式和人生态度。

记得9月10日读书会上，有个慈溪来的同学陈红捷说了一件事：进杭大后第一次开校运会，中文系拿到总分第一名。球类项目在全校也是数一数二的。

杭大有一种理念，读书不能死读书。不仅是每天坐在教室里听课，到图书馆看书，更重要的要全面发展。所以，我们在做剧社的时候，杭大老师，包括那些教古典文学的老夫子都很赞成。没有人说你们这些搞剧社的同学不务正业，每天就知道玩、排戏。每个老师都很支持。

我们当时的生活是，白天上课看书，晚上排戏看电视。当时中文系唯一一台 19 寸黑白电视机，放在我对面的寝室里，由当时剧社的头、编剧黄海滨和我负责管理的。

学校本部只有周六和周日晚上可以看电视，而我们中文系天天可以看电视，别的系的同学都很羡慕。记得那时汪嘉伟率领中国男子排球队出线，我们所有同学都很兴奋，举着火把，一直往南跑到解百，再跑回来。

所以，中文系有一点好。从老师开始，就认为这是种正常的现象。学生不光要读书，更要全面发展，文体都要好。所以中文系的文艺和体育都很强。

毕业后，我还拍过两个电视剧，从编剧、副导演，到制片主任、制片人、群演等等全部干过。这和上学时演戏是一个道理，从电视剧实践中认识艺术规律。杭大的传统就是不要死学学死，要在玩中学，学得活。

毕业后回母校，我曾经和老师聊过。自己在社会上走了几十年，才逐渐明白学校教育的短处在哪里。我们要去适应社会，不要总是在象牙塔里。学中文的都想当编辑、小说家、诗人。事实上，中文系出来成小说家的还是极少数。

我们当年毕业的同学走上社会，适应能力要比现在的大学生强，因为我们是社会上滚过以后去读的大学。假如我们从校门到校门，不可能学得那么深。徐步奎老师曾经说，我们这批学生是空前绝后的。

学文学，学文科，有社会经验的人就是比没社会经验的人要学得深刻一些。比如读鲁迅的作品，没有丰富的社会经验，你是不可能完全理解的。当时真可谓是教学相长，师生之间互相影响，互相学习。

老师们影响了我们。我们年轻人身上的朝气，那种蔑视一切的胆量，也影响了老师，给杭大带去了一种很好的风气。

2、杭大精神对人生的影响

我读书的时候，很喜欢戏剧文学，也很想留校。但是，当时没有专业对口的单位，只好进了检察院。

后来有个机会，去省戏剧家协会主办的《戏文》杂志，但最终单位不放人。最后，我在检察院干了一辈子。显然，这不是我的理想，不是我的专业。但大学毕业出来，十之八、九不会找到完全专业对口的工作。理想和职业之间的关系，我这辈子就想明白了这个。

人一定要有理想。没有理想，就没有方向。但是理想和职业之间，往往是不能吻合在一起的。所以你做一份职业，做一份工作时，首先要有职业精神，最起码你要对得起这份工资。比如我在检察院，不能混日子，这是不可以的。是个检察官就要像个检察官，要负责。

我开始做的是文字综合工作，后来做新闻宣传工作。我就努力把新闻和法律结合起来，尽力做出成绩。退居二线以后，又逐渐回归到文学上来，做了检察文化工作。

当初大学时候的理想，我仍旧没有忘记掉，还保留在心灵深处，现在重新再拾起来。后来，作为省检察官文联负责人成为省文联委员后，我很激动，发过一条微博：兜兜转转几十年，我终于回到革命队伍里来了。

退休以后，我又做了文澜读书岛阅读沙龙。读书，这是我本性中最喜欢的东西，幸好没有彻底丢了。

所以，人不要轻易地放弃自己的理想，要做到初心不改。

我和年轻人说，不要把事情想得很简单。你学什么专业就要从事什么职业，不可能。当你做不到专业对口时，要会转，转到你的职业上来。

当然，你实在不喜欢，也可以跳槽。跳得好当然是好的，也有跳槽多次还找不到方向的，就要去思考自己是否应该有所改变？人要是能屈能伸。

在这个社会上，生存是第一位的。但是生存的同时，你又不要忘了自己的初心。

中文系学生是最典型的中国传统书生。中国老话说，百无一用是书生。有时候看，书生是真的没用。但从哲学上讲，最没用的也许是最有用的。

从实用主义讲，它似乎不是一种谋生手段，至少它不是一门手艺。文学，就是卖嘴皮子，码字的。但是任何时代都少不了文学。我们不要指望靠文学立竿见影赚多少钱。但没有了文学，这个社会、世界就很不一样。

我觉得，自己身上一种固执的精神，也是原来大学里给我留下的，一直没有改变。

3、传承杭州大学精神

我有三点想法，第一点：大气。名校就有名校的大气。比如，看到有些地方大学的内部设置纠结于该叫“学院”还是“系”。我便有些不以为然，名校名专业不会计较于名头如何如何，而只在乎自己是否真正有学术深度和高度。这就是大气和自信。杭州大学一直以来给予我们的，就是那种大气包容的度量，而不是斤斤计较于细枝末节的小家子气。那种宽容、包容的大气让我印象很深。当年，我们有些思想非常离经叛道，老师都很包容。有些学生犯下错误，老师和学校也是包容和保护为主，让我们一直记在心里。

第二点：坚韧和执着。毕业后我知道，杭大有个古籍研究所，开设了古典文献专业，方向是先秦和敦煌学。后来，我在一个展览中知道，中国的敦煌学半壁江山在浙江，从王国维开始。今年1月我在文澜读书岛分享了《常书鸿传》，邀请我的同学张涌泉教授来讲讲敦煌学和浙江的关系。从敦煌学的发展中我理解到，一代一代学人的坚持和传承，对于一所大学，对于一个人，都是极其重要的。你认清人生目标后，就应该坚持，无论最后是否做得成功，你都要去做。成与不成你决定不了，但是我一直在做，我就心安了。至于我是否能被社会认可，不重要，我也决定不了。我不在乎结果，我更在乎的是过程。如今姜亮夫教授不在了，但是敦煌学这个学科一直在浙大传承。

第三点：实践精神。我们任何东西，无论专业还是爱好，要学以致用，要和社会结合在一起，不要成为束之高阁的东西。我后来回学校也老和老师同学说，不要在象牙塔里。不然，你出学校后就会到处碰壁。我们一定要搞清楚自己的职业和理想的关系，把我们学的东西融到职业当中。每个职业都有其价值观，你喜欢的文学也有，其中必定能融合在一起。我们身边的同学，有些人始终是书生，有些人始终没找到自己，甚至也没有人生目标，随波逐流的大有人在。所以我们要适应社会。这么多学校，杭大总体上来说在这方面做得很不错。

成功人生，就是被他人认可。但自己不要太当回事，不要去比较。你觉得成功就行。成功没有标准，有钱有地位有专业是成功，但是也有很多种成功方式。比如我曾经遇到些朋友，因为得不到提拔在哭。后来我劝她说，你女儿教育得很好，就很成功。我告诉她，不要去比较人与人之间提拔的事，想想自己的女儿，每个人的成功都可以是不同的。

[返回目录](#)

我和杭大之间的故事

—杭州大学中文系 77 级 王自亮

一、传承杭大精神

第一，要传承的是杭大的人文精神。

杭州大学从 1958 年创建以后，其实是承接了老浙大这脉的精神文化，可谓源远流长。

老浙大精神是什么？除了理性、科学精神外，它还有人文精神，代表人物就竺可桢校长。（这种人文精神）是杭大从浙大分出来以后带出来的（当然不是从老浙大直接分出来的），同时在杭大的建立过程中再度凝固和加深了。因为杭大是以文科见长，同时理科也很好，所以它是文理都很具备的规模和结构。

浙江这个地方，南宋以来，就是中国文化和经济的重心，江浙两省都是。

因此，近代以来，江浙形成的文化，一系列的交往、商业、产业、社会的理念，我们都可以归之为人文精神。

这些精神在杭大老先生身上体现得很浓厚。他们的这些精神自觉不自觉地被我们认同、接纳和发扬光大。

我们那代学生是有对比的，也有反思的。于是，老先生这里的东西我们一下子觉得太好了，这些正是我们所没有的。它其实早就存在，无非中断了十多年，现在再把这个接续上来。这个前后过程带给我们的反思，包括野蛮与文明、理性与愚昧，科学与反科学的对比，是非常充分的，这种对比非常强烈。



因此，我觉得杭大比起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之后的浙大来，很有独到之处。

可能当时的浙大在工科和工程上非常强，对社会建设和经济建设很有帮助。但是相对而言，工科型的浙大和周边的学校缺乏杭大的人文精神，包括人际关系，对文化的认知、对社会的认知；包括如何看待这个世界，对改革开放的态度，还有像文史哲新的潮流。我们当时是全身心拥抱它，且在批判中接受，而非无原则接受。

第二，杭大有个好处：它的校风和学风，不是锋芒毕露的，不是咄咄逼人的；它是实事求是。严谨、理性、谦和、亲和力的，这样的一个校风学风。

杭大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校风学风，是实事求是的，注重积累的，也是循序渐进的。上次我去岳麓书院，看到实事求是这四个字高悬在大厅里，真是无比感慨。这应该成为我们的一个传统。杭大有这个传统，有的系科和专业在这方面很突出。

比如我们中文系的徐步奎老师。他是懂就懂，不懂就不懂。他回答问题很简洁，例如人们请教他这个问题如何解释，他或许会直接回答：“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我没有研究过”或“我不懂”。你起先可能有点失望，但发现他作为一个老师，其实是实事求是：一是一，二是二。不是如今有些教授看起来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其实未必如此。王焕镛老师、蒋礼鸿老师、郭在贻老师也都具备这样的精神。

郭在贻老师非常朴实，就像个老农，山东来的。但他讲训诂学时，竟然让我们这些学生都热血沸腾起来。我这个热爱自由诗的人，也动过做古汉语的念头。据说，那个年代他看书可以看到昏倒在地上；到菜场去买菜他也看书，轮到他时菜也卖光了；在资料室和家里更是看书，别人认为他是书呆子。他其实不是：他是真正在思考，做学问。

杭大中文系考据、训诂、音韵，特别是敦煌学、楚辞研究和先秦诸子研究，这些都拔尖，是一点点积累起来的。我认为，一个大学的发展过程，就是文化积累的过程，就是自我反思的过程，就是知行合一的过程。杭大这种学风、校风对我们有重大影响。

第三，杭大给我们带来终身受用的方法论和工具。

有些方法可能很传统。但是，你只要从事这门学科，这种方法是最基本、最传统的，你就不可能完全去改变。比如训诂、文字、音韵。无非现在加个计算机、数字化，检索程序上方便了我们，但是基本精神还是一样的。这些传统的治学方法和工具，是非常实在管用的。计算机带来的方便与这些学术传统，是不矛盾的。

杭大其他的系，比如数学、心理学、历史、地理等都非常好。陈桥驿先生也曾经给我们做过讲座。所以，杭大是既严谨又开放，既理性又人文，最基本的这些东西到现在还很受用，特别是“板凳坐得十年冷”的甘于寂寞精神。

有些老师上课时，经常和我们讲这些。我虽然不做考据、训诂、音韵，但是我觉得可以把这种精神用到工作上。比如，一生多次转型，干过很多行当：企业、媒体、公务员、高校。前不久和我的学生说，大学毕业后干过五、六个行当，每 3-5 年换一次。变化很大，我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杭大给予我的那种方法论，那种思想和精神，坐冷板凳，严谨科学。

现在尤其可贵的是，在很热闹的、变化多端的社会，你能够沉下心来认真做一两件事，确实是很不容易的。

最近我写《吉利传》。老同学余刚帮助我调研。我采访了 200 多人，行程几万公里，四大工艺和重要部位都走过来，靠的不是杭大精神的支撑吗？

我是一个文科出身的人，到汽车公司干了四年，算是把汽车这个领域还搞得比较深入。靠的是什么，还不是杭大精神吗？

还有，我从企业到高校到机关到媒体，怎么转型？就是终生学习精神，边干边学，善于学习。这也是杭大给我的。

二、杭大的人文精神在人生中的体现

我人生的选择过程中，杭大给我的，还有我自己得出的领悟。

第一，是“天下为公”。

这不是说大话，是孙中山提出的。其实古代就有了，孙中山接受了并把它重提了。到我这一代，觉得这样一种精神值得继承。

我做企业、做公共管理，省市两级机关都呆过。我做过省政府办公厅研究室主任，做过台州市行政公署办公室秘书科长，还做过台州日报总编。这个认知，于公于私来讲都有益处。于私，我以此为精神支持得到锻炼；于公，我为社会做了些成绩。

你不能局限自己，好像我活着、赚钱、成家，过好的生活，然后死去。当然，你不能说这样的生活一点也没有意义，可能也有它的乐趣。但在我看来，一个人如果有点能力，有点作为的话，还是要抱着“天下为公”的理念，尽可能为这个民族、社会，也为他人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

第二，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可能我的优势在写诗或者写文学批评，我已经出版了 20 多本书。但我有没有可能在我写作的同时，把我其他方面的优势挖掘出来？比如，我参与管理，可能它是我的第二优势。但我是否能把这第二优势发挥出来呢？

这就是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所谓人力资源就包括我们所拥有的那些。我们要将其运用到社会。说到底社会为你提供舞台，你有幸去表演，有观众，当然还有评委。比如，你的父母，你的亲人，你的老师都是评委。如果我死后还有人能说，此人为社会是做了一点贡献的。这就值得了。

第三，在自己转型过程中，一定要有个动力和方法。

所谓动力也是杭大教给我的。人的意义在哪里？你为什么活着？我在杭大学习期间得出一个体会，人生的意义在于其活着的过程。其实，生死这两头都一样。这一过程要做得好，首先让自己比较满意。其次让别人相对满意，起码不要伤害别人，不能害人。在有能力情况下做好事，做有意义的事，自己喜欢做的事。也许有些事情可能你不是很喜欢，但对社会有用，你也去做，也发挥得好。这个过程充满了乐趣。这个就是好的过程。

工具方法也很多，最大的方法就是学习。学习既是方法，也是工具，也是目的。人在学习中得到愉悦和快乐。学习是快乐的，一定要创造快乐工作法、快乐学习法。

工作虽然很苦，但要以苦为乐。比如，你们一遍遍拍摄视频，虽然很辛苦，怎么想法说服我，激发我，让我表现得更好，这就是过程。这个过程很有乐趣。这种学习精神是一种终身学习，不间断的，无处不在的学习。

每个行业都是博大精深的，特别是当代社会。比如，人工智能、生物工程，非常激动人心又充满危险，包括马斯克开发的那些工程与成果。不懂怎么办？只有学习，在学习的过程中学会学习。

我就是凭着这三条转型的。虽然没有大的成功，但我觉得自己还是认可的。人没有动力不行，不然做到最后会觉得很累。

相比较，现在很多人以赚钱为动力，你认为人的终极动力是什么？人的动力很神奇。外部的动力都是暂时的，局部的。所谓自我动力，就是认清人生的意义，认清自我，认清人活着为什么。在这之后，你就会找到你的动力。你不去找，它自己也会来。

比如，你觉得人生的意义在这过程中，要把这过程做得很完美，那你动力就来了。你原来不会拍的也会拍了，原来不会说话的也会说了，原来不会做技术的也会做了。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会给你乐趣。你每克服一个困难就给你一个乐趣。

很多人在困难前就止步了，其实这是错了。比如，有时我写书也会很累。我那本名为《鹰的蒙太奇》的诗歌批评集，因为后来转向写作《吉利传》就搁置了，现在又开始整理与修改了，值到今天还在忙，现在基本定稿了。有时也会烦，干嘛呢这么辛苦？我也会抱怨，甚至对自己不满。但是，当我重新坐到电脑前，动力又来了。我想，我的这本书，哪怕有一句话对别人发生影响，我写得再累也是值得的。而且我在审稿过程中，会觉得有些话写得不错呀。这种三秒钟得意也是动力，是“自我陶醉”。

三、传承杭大精神

这个社会 and 所有的社会一样都不是完美无缺的。这个社会有这个社会 的烦恼和不如意、不理想，让我们不愉快。也许碰到的问题成堆，我们可能都会有种种不满。

但是你想想，唐朝这么好的朝代，李白都要抱怨：“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他是说自己活得太不痛快了，明天我就坐条船淡出江湖了。还有什么：“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他说那些道路很宽广，怎么就没有我一条路呢？几乎好多唐朝诗人都这样。所以，首先就是有一条，对时代不要抱怨，要抱怨的是你自己，你的认知水平、你的为人、你的工作，做事还没到这个程度。时代没什么好抱怨的：时代不因你的抱怨而改变。当你行动的时候，就改变了。唐代宋代和后世的诗人可以抱怨，因为“愤怒出诗人”嘛。现实社会中的人能抱怨什么呢？

所以我觉得，对时代要用正确的方法论来看待它，要从自身寻找问题。时代既然是一种客观存在，我们就要正确看待它，然后有效地改变它。发挥我们的能动性和主动性，发挥一种自己想改变现状的信心。

第二，这个时代为什么要发扬杭大精神？因为一个浮躁、摇摆不定，不确定性大大增加的时代，恰好需要一种恒定的理想主义精神。杭大精神就是有批判精神的理想主义。我们说的理想主义不是一种空洞的东西。如果没有理解它，就是自己没有把握好。我所说的理想主义，是指每个社会都在改变中。所谓理想主义带有一种美好的，有情怀的，不动摇的，不怕困难的精神，共同去营造一个相对宽松的，积极的、开放的、有活力的社会。我觉得，杭大精神就在这里。

其次，一个浮躁时代就像一个摇晃的船。它需要压舱石。杭大精神就是一块“压舱石”。它是自古以来，先秦以来，唐宋元明清，不乏其人，直到这一代老先生身上本来就继承了这种精神。这种精神在任何时代都是压舱石：人之所以为人，社会之所以为社会，时代为时代，它都需要一个稳定器，这个稳定器就是中国的文化与文明，鲁迅

称之为“民族脊梁”的那种东西。近年我读了许倬云先生的《万古江河》，又有了新的体会。

四、对我人生影响比较大的几本书

第一本鲁迅的《野草》，包括他的其他作品，对我世界观、审美、人生的影响很大，对我诗歌创作影响很大。《野草》里面有种极为透彻又很决绝的东西，而且融合了尼采、佛教，把虚无的东西转化为新的现实和力量，有种超越感。

我的大学论文就是《论〈野草〉的美学特征》，可惜找不到了。当时都是手写，粗心大意，没有留底。现在想来当时胆子很大，竟然敢论鲁迅先生《野草》的美学。我当时毕竟只有二十多岁。

《野草》的境界很美，其实就是绝地反击。这个世界把我逼到绝境，我就要反过来，要抗争，要对峙，要质问。鲁迅的情感就像地火在运行，在奔腾，非常契合那个时代。任何时代都有人有过这样的发问：我怎么走下去？

我们看到了一个孤独而决绝的鲁迅，也是天地间独立特行的鲁迅，于无声处听惊雷的鲁迅。《野草》可以当作散文、诗歌或散文诗，但本质绝对是诗歌的。我敢说，最近 100 多年来的诗歌没有多少作品超过它，超过《野草》。鲁迅不光是文学家、思想家、评论家，还是个大诗人。

还有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1998 年买的。我在扉页上题“朝闻道夕死可矣”，且画了大量的记号，满满的。每年新学期开学，我就向研究生推荐这本书。

它讲的是自由的本质是什么，我们这个社会是建立在什么之上，而自由秩序是自发形成的一种社会秩序。当时是九十年代，社会正处于转折期，经济发展很快。这时，各种思想介绍进来，哈耶克对自由的理解很透彻，对社会的构成也说得很透彻。

自由的秩序建立在人的尊严，对他人的尊重，还有财产权、个人权利不受侵犯。有了自由环境后才有自由秩序。自由环境是不断拓展

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地上长出来的，是社会不断调整过程中慢慢形成的，包括宪法、法律、经济、社会。法律和自由的关系，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这些思想非常深刻地影响了九十年代之后的我。所以，我不是一个单纯的诗人，也不是一个单纯的职业经理人，或者是单纯的政府官员。我其实还是追求激情和理性相平衡的，尤其是对思想、对社会投入非常大的力量去做研究，且用亲身的经历去印证它，给它一个解释。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我们这一代人也是在行动中成长的。

我现在认识到，比如先是陆九渊，后来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心外无物和致良知等，实际上把实践和理论从根本上融合，而不是拼在一起；两者始终在一起，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知是有行动支撑的知，行是在“知”笼罩下的行。它们本来就是一体的。人要有良知。良知可以解释为真理、精神、人文。我现在最服王阳明，但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都要做他。他这种看世界的方法，这种指导思想思想可以借鉴。

我推荐大家看王阳明全集，看《传习录》。

返回目录

我和杭大的故事

—杭州大学中文系 77 级 余刚

一、同学

同学之间有意思的事，特别是《在远古的荒原和未来的铜像之间》的酝酿过程和后续之事，我在一篇文章中都说到了。

当时，我们有几个同学关系很好，其中包括王自亮。记得在大二的时候，我们一起跑到一个同学王依民家。他家在舟山定海。我就是在那里第一次看到大海。后来在大四，我们几人就一起合写了那首我们的“荒原”。



那个时候，我们同学之间关系是很好的，走动很多。甚至这种好的关系保持了几十年，一直到现在。

与王自亮保持了长久的友谊。在学校里，我们都是“杨帆诗社”的成员。毕业后，他回到台州。但我们通过通信的方式，讨论诗歌问题。例如，我们讨论了诗歌语言的“润活”问题，说到诗歌的宏大架构时，认为不能“大而无当”。

后来，他来杭州工作，那走动就更多了。另一位一起进行诗歌讨论的是王依民。后来，他还专门写了文章，对我的第一本个人诗集《热爱》进行了评论，指出了优缺点，并进行鼓励。

经过了那么多年，但是我们都认为最好的时光就是大学那四年，给我们留下了最美好的回忆。

二、老师

有几位老师对我们的人生、成长产生了影响。

我是读大学前就写诗的。来到学校后，第一个鼓励我的是余荇老师。无论诗歌怎样，他会在课堂上点评。这激励了我。

第二个是蔡良骥老师。他本人就是诗人，一方面他鼓励我，讲了很多诗歌经验；另一方面，是他首先从福建带回了北岛等人的诗，通过这个途径，我们这批同学读到了朦胧诗。此后，我们的诗风从传统走向现代，开始转向了。

进一步促使我们转变的是汪飞白老师。他专门开了俄国未来主义者马雅可夫斯基早期诗作欣赏课。汪老师当时还油印了教材，包括《穿裤子的云》（节选），这对我的影响很大。

马雅可夫斯基描写高楼和窗口，不是说是亮起了灯，而是说是在分发 54 张扑克牌，非常形象。《穿裤子的云》更绝，里面说我给所有的事物加上两个字：“虚无”。这样一下子就把我启智了。

如果说汪老师是从外国文学方面给我们提供养分，那么从先秦文学到唐宋时期等的诗歌，吴熊和老师对我的影响很大。他把中国诗歌特别是唐诗讲得太美了，可惜没有录下来。他讲了这几堂课后，我终生受益。

从那时起，我就喜欢唐宋诗词，一直到现在为止，兴趣不减。刘操南老师，第一堂课给我们讲如何刻苦读书。在讲到他当年住的灵隐寺时，他讲了一个典故，我印象很深：泉从何时冷？峰从何处来？意境很深。这就促使我们不时学习哲学，以及注意对典故的掌握和运用。可以说每个老师都给我们带来影响。

三、杭大精神

杭大精神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刚才我已经说过了。

比如淡泊明志，这个一直在脑子里。很多事情要入世，但不能太入世；要出世，但也不能太出世；要有所为有所不为，要放弃一些东西。

此外钻研精神，好像也有一点。对有意义的事，会一以贯之做下去。这些，我们都觉得是理所当然。

作者简介：

余刚，杭州人。1977年考入杭州大学中文系。诗歌写作始于上世纪70年代，出版诗集《梦幻的彼岸》（合集）、《热爱》、《超现实书》、《锦瑟》、《为时间写生》和评论集《更新的火却在消失》。部分作品收入《新浪潮诗集》、《中国探索诗鉴赏辞典》、《后朦胧诗全集》、《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以梦为马》、《现代汉诗年鉴，1998》、《1999年中国最佳诗歌选》、《2001年中国最佳诗歌选》、《新诗三百首》、《1978-2008中国诗典》、《谱系与典藏 - 当代先锋诗30年》、《悬空的圣殿 - 非非主义20年图志史》、《光荣与梦想》、《现代汉诗110首》、《归巢与启程 - 中澳当代诗选》。

[返回目录](#)

我在杭州大学读书的时光

—杭州大学化学系 76 级 杨金田

45年前的1977年3月5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那一天，我去杭州大学报到读书，实现了从农民到大学生的转变。

就在上一年的1976年，我国人民相继痛失了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和毛泽东主席三位最高领袖，经历了“唐山大地震”的自然灾害和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

那一年，我有幸以“回乡青年”的身份搭上“工农兵上大学”的末班车，经推荐和考核、选拔后被杭州大学化学系录取为1976级新生。因当年各条战线拨乱反正而推迟到次年春季入学。

那天，阳光灿烂，春风拂面。我怀着喜悦的心情，背着被包，拎着网兜，从老家桐乡县河山公社（今桐乡市河山镇）洗马庄出发，步行1小时到德清县新联公社（现新联乡）的蔡界轮船码头搭乘苏（州）—杭（州）班轮船赴杭州。上船后，巧遇高中同学潘凤林。他比我早1小时在练市上船赴杭大物理系报到。一路上有老同学作伴，一起憧憬未来的大学生活。轮船沿江南运河途经新市、韶村、塘栖、武林头、拱宸桥等码头，4小时后抵达杭州卖鱼桥码头上岸。然后，乘1路电车至武林门，再沿天目山路往西步行抵杭州大学南大门（当时“天目山路34号”，现“天目山路148号”）。

当我站在简洁大气的杭州大学校门前，看到两旁的立柱上镶嵌着由红军书法家、中国书协首届主席舒同手书的“杭州大学”校名时，内心情不自禁地呼喊：“杭大，我来了！”

校门口有各系的迎新接待人员。在化学系高年级同学的带领下，我们沿着大门右侧的林荫道，来到中轴线右侧的一个大教室办理入学报到手续。上缴了录取通知书、户口迁移证，填写了相关表格，领取了学生证、校徽、寝室钥匙后，就来到第七宿舍楼的房间中。

杭州大学学生校徽

我对杭州大学的环境是大致熟悉的。因为我在1973年高中毕业后，回乡务农期间，曾多次摇船来杭州，在松木场一带“扒垃圾”（杭州人叫“捉邋絮”），垃圾埠头就在杭大东门口。我们白天挑着箩筐在杭大周边走弄穿巷找垃圾，夜里在臭气熏天、蚊蝇成群的垃圾船上睡觉。蓬首垢面、浑身臭味的我，非常仰慕满面春风、潇洒靓丽的杭大学生。

在扒垃圾期间，我曾经在杭大留下过“不光彩的足迹”。有一次，我出于对杭大的好奇心和寻找垃圾的迫切心，先将箩筐从墙角丢进，人从东门混进杭大“扒垃圾”。当我喜滋滋地挑着垃圾担从东门出来时，被门卫当作“偷邋絮的人”抓住。不但没收了垃圾，还责令我写检讨书和保证书。从此，我就暗暗立下“此生若有机会上大学必上杭大”的誓愿。如今终于天遂人愿，美梦成真！

杭州大学校园共有3个大门。其中南大门为正门。

站在南大门朝南远眺，可见西湖北岸的保俶山和保俶塔，山峦苍翠，塔影缥缈。门前直指杭大路，向南沿曙光路右转通向黄龙洞景区和浙江大学。大门口便是东西向的天目山路，左转往东去武林门和良山门，右转往西通古荡和留下。大门内中轴线正中央、坐北朝南的图书馆大楼就是全校的标志性建筑。楼前是一大片草坪树木，绿草如茵，绿树吐翠。进门左右两侧是宽敞的车辆和人流通道。高大挺拔、绿冠成荫的一棵棵梧桐和香樟，两旁排列，似一个个张开手臂的师友欢迎新生入学。

北大门面向文三街（今文三路）。穿过文三街就是生物系和学军中学。

东大门口是松木场河（现名“西溪”）和河畔小路（今保俶北路）。往南沿保俶路通向松木场、少年宫广场和西湖北岸的断桥、白堤等景区；往北沿河畔小路通向文一路和余杭塘。

校园内分西区、北区、东区三个区域。

我们读书的化学系大楼位于西区，就在南大门内西侧的第一幢楼（今“西二教学楼”，建于1960年），是一幢L形、4层和3层的混合建筑体。系大门朝东面向中心花园，出门右侧便是学校正门。大楼外墙下部暗红色，上部乳黄色，屋面青灰色，门窗朱红色，地面灰白色。进门厅后向右拐入L型的底边区域是教室区。1层至3层，每层有1个约200座位的阶梯教室和若干个中、小教室。从门厅向西是长长的走廊，南北两侧分布着办公室、实验室。一楼是无机化学和工业化学教研室、实验室和1个约90座位的中教室。大厅向内右前方上楼梯到二楼，那里是系领导及管理人员办公室、有机化学教研室和实验室。三楼的东西两端分别是分析化学教研室、物理化学教研室和实验室。门厅的主楼部分有4层，顶层是200多m²的化学系资料室。大楼南侧是草坪和树林（此地于1982年新建了旅游大楼，现称“西一教学楼”），北面依次为物理系和数学系大楼。



当时的杭州大学化学系大楼（今“西二教学楼”）

与化学楼所在的西区相呼应的东区是地理系、教育系、外语系、历史系等楼，沿校园主干道呈东西对称分布（政治系在文二街128号，

中文系在上宁桥与下宁桥之间的松木场河西岸，今浙江省总工会干部学校）。这个楼群的楼与楼之间有辅楼和天桥相连，下雨天不用撑伞可在楼间穿行。中部某楼的走廊要道处设有一片小型书店。我们从化学楼听课后转去东区食堂用餐时可经书店门口，顺便购书。

校园东门内侧是生活区。第一、第三、第五宿舍楼和第二、第四、第六宿舍楼（共 6 幢三层楼）沿东中轴线呈对称排列。东中轴线的北端是大礼堂和大食堂。大食堂西面是一块大球场（有 6 片篮球场和 2 片排球场）。球场北侧是通向东门的人行道。路的东段北面是 400 米的标准田径场；路的西端北面是体育馆、体操馆和游泳池。

北区有第七、第八、第十 3 幢宿舍楼，以及金工车间和印刷厂。第八宿舍楼西边是医务室。我们班男生宿舍在第七宿舍楼三楼。



我们读书时男生住在这幢第七宿舍楼的三楼西端

教工宿舍分别安排在南门外和东门外两处，分别称为“河南教工宿舍”（又称“杭大新村”，西溪路 56 号）和“河东教工宿舍”。

我们班入学时共 60 名学生，按 10 人一组分为 6 个学习小组。我所在的第 1 小组由 6 名男生和 4 名女生组成。6 名男生（俞田波来自奉化、王光瑞来自岱山、黄招义来自苍南、刘继彬来自庆元、孙维林来自临海、我来自桐乡）住第七宿舍三楼西端第一个房间（读书期间搬过 3 次房间，都在三楼），朝夕相处，亲如兄弟，遂成终生好友；4 名女生（许黎霞来自建德、王猛进来自遂昌、竺水金来自新昌、岑菊芬来自慈溪）住第五宿舍楼一楼。我班的班主任盛奕老师（她的先生许承威是化学系高分子化学教授），圆脸短发，品貌端庄，和蔼可亲，爱生如子，为我们的学习和生活提供无微不至的关心和指导。

刚进大学时，我觉得以下几点很新鲜：一是各班学生听课的教室不是固定的。学生听课必须背着书包进教室，下课后就背起书包转移；二是基础课教室地面呈阶梯形（称为“阶梯教室”）。讲台地面最低，听课座位逐排升高，后排听课的人不会被前排挡住视线；三是讲台后面墙上的黑板不是一块而是可上下移动的 4 块。老师在写满一块黑板后就往上推，把上面的另一块黑板拉下来再写，避免上课中途擦黑板；四是授专业课的小教室，学生听课没有课桌，只有右侧扶手变形为木板的靠背椅子；五是上课所用教材全是由任课老师编写、学校文印室刻写、油印、装订的讲义（因“十年浩劫”造成高校教材奇缺）等。我十分佩服刻写蜡纸的老师，手工刻写的字迹端正漂亮犹如铅字印刷。

当时的化学系领导班子很强。党总支书记徐秀敏女士是一位 12 岁就担任抗日游击区儿童团长的革命老干部。系主任金松寿、副主任周洵钧分别是著名的物理化学家和有机化学家。副主任马福泰和副书记汤福隆也都是著名的化学教授。在召开全系师生大会或举办学术报告时，我们才有机会看到这些系领导。1996 年出任杭州大学校长的著名化学家郑小明老师虽然没有给我们班授课，但当时就赫赫有名。我们闻知他在催化研究所研发催化剂硕果累累，1978 年就荣获全国科学大会优秀成果奖。

当年给我们授课的都是年富力强的优秀老师，后来都成为著名教授。例如夏式均、童九如、倪兆艾等讲授“无机化学”，张孙玮、汤福隆等讲授“分析化学”，洪琳、阮明德、陈振初等讲授“有机化

学”，李本乐、郑洪元等讲授“物理化学”，董南、吴念慈等讲授“结构化学”。时年48岁，高额头、方脸庞、厚嘴唇的夏式均老师，对电化学内容滚瓜烂熟，讲课不看讲稿，语调低沉温和。他于1980年初把讲义整理成《电极电势及其应用》一书由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生于1929年，身材高挑、皮肤白皙、眼睛溜圆、目光炯炯的留苏博士倪兆艾老师讲授元素化学，讲课幽默风趣，常把“氯化钠(NaCl)”读作“落花拉…”；年届40，中等个子，英俊洒脱，后来相继出任杭州大学科研处长、宁波大学副校长的张孙玮老师对分析化学造诣很深，说话富有激情，语音略带沙哑，一手漂亮的粉笔板书如行云流水；年纪40出头，身材瘦长，戴一副近视眼镜的李本乐老师，讲解物理化学中的化学热力学和化学动力学，板书端正秀逸，提纲挈领，语音和颜悦色，娓娓动听；生于1935年，后来出任杭州大学党委统战部和组织部副部长的阮明德老师讲授有机化学，喜欢将“羧基”(—COOH)讲成“酥鸡”，偶尔摸出手帕，发出“啊哼-吐”的一声，把一口痰吐在手帕中包好放回口袋继续讲解；年近60、身材魁梧，浓眉方脸、说话偶有结巴的洪琳(与“红磷”谐音)老师熟悉农药化学，授课时喜欢穿插化学史料及其代表人物，激励学生成长成才；生于1932年，短发齐耳、目光如炬、步履轻盈、性格豪爽的董南老师擅长结构化学。她用秀丽的板书、清脆的语音，巧妙地把抽象空洞的原子轨道和分子轨道讲得活灵活现，把深奥难懂的薛定谔(Schrödinger)方程求解过程，讲得像剥笋壳那样一层一层地展开。直到听了董南老师的课，才使我基本理解了“原子轨道并不是一种固定轨道而是一种由波函数(ψ)描述的电子运动状态”。在参加工作3年后的1982年秋-1983年夏，我因工作之需返回杭大化学系进修结构化学和量子化学，再次聆听董南、吴念慈等老师的教诲。我还去物理系旁听了量子力学和数学物理方法等课，为自己在湖州师专开设结构化学课程打下了基础。

当时给我们授课的 8 位老师照片（其他老师未能搜全）。



上排自左至右：夏式均，张孙玮，童九如，李本乐
下排自左至右：阮明德，洪琳，陈振初，郑洪元

政治、数学、物理、英语、体育等课程都由其他相应系指派老师讲授。其中，时年 40 多岁的王云海老师给我们讲授高等数学。他中等身材，面容和蔼。每次上课都成竹在胸、从容不迫地走上讲台，撮取一支粉笔就潇洒地授课。板书清秀整洁，语调抑扬顿挫。常用各种生动有趣的比喻来解释苦涩难懂的微分、积分、微分方程等数学内涵。他形象地把微分比喻成“将番薯切成一片一片的薯片”，并用双手做模拟动作。每当看到学生们显示有所理解的表情时，他常常用沾满粉笔灰的右手顶一下眼镜，导致镜片蒙上点点白灰。2 节课下来，4 块黑板上留下 4 版由汉字和数学符号混杂的板书，宛如漂亮的数学书法。由政治系派来化学系讲授哲学课的也是一位中年的男性老师。他的授课特点是大段大段地板书原理和要点让学生抄录。基于喜欢文科、笔记完整的优势，我对政治类测试一般能得较好分数。有一次“哲学考试”偶得 100 分，害得这位老师专程找我“一见尊容”。

那时候，我们的生活是清苦的。首先是住宿条件差。学生宿舍楼是筒子楼，每层中间走廊，寝室分布在走廊的南北两侧。学生寝室大约 15 m²，房间靠墙两侧搭 3 张双层床，住 6 个人，各人的箱子放于床铺底下。通向走廊的房间角落里立一个三角柱形的木质脸盆架。对面两床之间拼接 2 张方桌，桌子两侧有抽屉可放学习和生活用品，学生坐在床沿上自修。睡上铺的同学必须踩着下铺和桌面上、下床。室内没有厕所、盥洗室和阳台。学生解手、洗衣、洗澡都必须跑到走廊中段朝北的公用盥洗室和厕所，经常要排队等候。其次是伙食标准低。每月由国家供给每位学生 36 斤粮票和 12.50 元生活费。生活委员侯爱武每月分别把 36 斤饭票、10 元菜票和 2.50 元现金发到每个同学手上。出身农村、入学前曾当过生产队长的我，饭量较大，每天要吃 3 斤粳米饭（其中早餐半斤粥、中餐和晚餐各 1 斤饭、晚自修后回寝室半斤冷饭），自己的饭票远远不够。幸亏有几位女同学可怜我。她们从牙缝里省出饭票来资助我，才使我填饱肚子。有时晚饭后忘了买冷饭，晚上就用开水把我母亲做的芝麻炒米粉调成糊充饥，寝室里顿时充满芝麻和炒米混杂的焦香，引得同室的同学直流口水。当时的市场上物资匮乏，作为天之骄子的大学生，每月只供应 2 两肉票，可以到食堂换取 2 块“大肉”。同学们在平时都舍不得用这 2 张宝贵的肉票，留着招待来访的亲友。食堂里设施简陋，饭厅里放几个简易的方桌，墙边摆几个矮柜存放碗盆。菜肴常常是清水煮白菜或萝卜，再放点盐就出锅外售。开饭时，我们背着书包、排队向窗口取得饭菜后，就围站在方桌上用餐，狼吞虎咽，津津有味。因长期缺油少食，且学习任务重、心理压力大，我一度患上严重贫血和神经衰弱，经常去学校医务室配来谷维素、养血安神糖浆等药服用。至第一学期末，我的体重从 126 斤降到 106 斤，脸色从黝黑色变成苍白色甚至菜青色。像我这样的农家子弟都不好意思向家里父母要钱，每月唯有这 2.50 元零花钱应付肥皂、牙膏、寄信、买书等日常开销，难免寅吃卯粮。

那时候，我们的学习是刻苦的。基于化学专业的特点，我们不但要学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工业化学、结构化学等专业课程和高等数学、普通物理、大学英语等基础课程，还要学

习无机化学实验、有机化学实验、分析化学实验、物理化学实验、工业化学实验等实验课程，并且下化工企业见习教学和专业实习。每天晚上，我们必须完成当天的习题和实验报告。在校期间，我们曾经在老师的带领和指导下，分别去余杭塘北岸的杭州硫酸厂、武林门的人民玻璃厂观摩教学，分组轮流到化学系大楼西侧、制备硫酸镍（一种绿色的晶状粉末）的系办工厂顶班劳动。还去过位于武林门运河北岸的杭州摩擦材料厂教学实习，参与制造汽车刹车片（将适宜的高分子树脂涂抹在纤维布上后经热压、成形、冷却而成）等。当时的课外娱乐活动相当稀少。我只记得，同学们曾偶尔利用周末晚上，相约去文二街（今文二路）的一个露天院子里看电影，享受非常难得的放松时光。我仍记得，1978年春天的某天，班里曾组织去杭州九里松至灵隐寺一带春游，其中有一项爬山比赛。我组来自庆元山区的刘继彬同学在爬山比赛中展露身手，遥遥领先，荣获冠军，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矮小个子、板寸平头、黑红脸膛、罕言寡语的继彬，那天身穿黑色夹袄和便裤，脚蹬黑色方口布鞋，两道浓黑的眉毛下瞪着一双宝石般的小眼睛，目光似剑。向山顶爬行时，他身轻如燕，如履平地。我还记得，1979年“五一”节期间，我曾陪同室的俞田波、王光瑞、黄招义、刘继彬同学一道坐轮船到我老家洗马庄游览田园风光。晚上，5个人挤在2张旧床上聊天眯糊，等待天明。



班里嘉兴地区同学毕业前合影（吴晓鸣供，摄于1979年7月）

前排左起：钱哲英（海宁），汤惠琴（安吉），吴晓鸣（德清）；
中排左起：熊长发（长兴），王生富（长广公司）；
后排左起：童建中（吴兴），厉步军（海盐），杨金田（桐乡）

作为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的1976级学生，我们与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77级师弟师妹同校学习，背负着世人和师长们既怀疑又期待的目光。因此，我们更加如饥似渴、废寝忘食地学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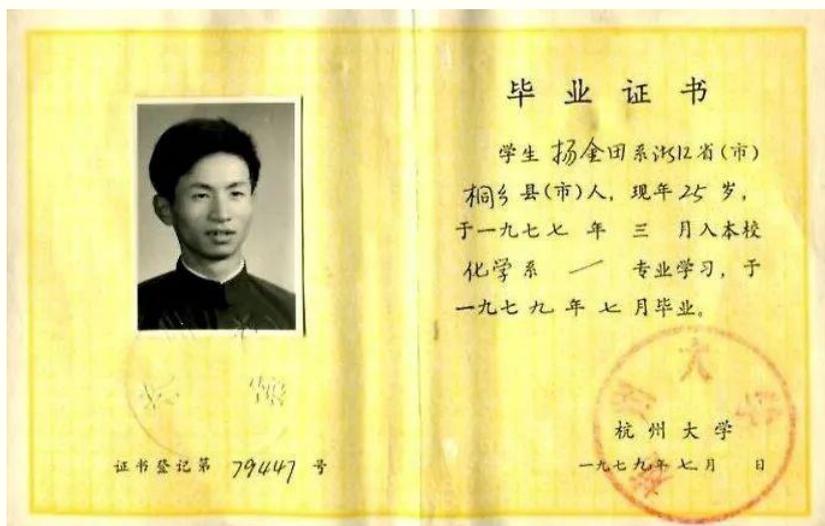
正值粉碎“四人帮”不久，在高教战线拨乱反正、教学风气焕然一新的形势下，同学们铆足了劲，一门心思学习，形成你追我赶、争先恐后的局面。清晨或傍晚，我们在林荫道、花坛旁、草坪上读课文背单词；白天，我们聚集在教室听课、笔记，或在实验室操作、记录；晚上，我们在自修室或阅览室做习题、写报告。除了有限的睡眠以外，几乎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学习上，就连在食堂买饭排队的时间也都用来背英语。一直喜欢文学而从未接触过化学的我，在专业学习上势必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入校前，我自己填写的志愿是中文系，最终阴差阳错地录取在化学系。事后得知，当年杭大分配给桐乡县的新生名额11名，对应于政治系、中文系、历史系、外语系、教育系、地理系、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生物系、体育系各系1名。

我至今也没有机会弄清楚，为什么同样是高中毕业，我老家桐乡的高中没有开设化学课，致使我在刚进化学系时连水分子（ H_2O ）也不认识。于是，我被迫硬着头皮“硬地廊掘鳝鱼”，一边跟学“大学化学”，一边自学“中学化学”。直至一学期后，才勉强补齐中学化学基础。

学习之余，我注意发挥喜欢语文的一点点长处，参与编撰、抄写班级和化学系的“黑板报”或“宣传栏”。与1975级的高尔相、1977级的黄步琪等同学组成化学系报道组，偶尔还被抽到学校宣传组帮忙出刊宣传栏或大批判专栏。经常向学校广播台投稿被录用后播报出来，由此慢慢地扩大交际圈，多次荣获优秀团员和“三好学生”荣誉。

在毕业前的 1979 年 6 月，经班长俞田波、党支部委员范伟强 2 位党员同学介绍，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一、大二和大三年级学生党支部书记分别是童九如老师、1977 届师兄汤淼荣和 1978 届师兄王永强。



笔者读杭州大学时的毕业证书（1979 年 7 月）

1979 年 7 月 6 日，我们完成最后一门课程毕业考试，随后就在校翘首等待毕业分配。

在杭大读书两年半，我一直没机会游览杭州西湖。直至等待分配期间，总算有了约同学一起游西湖的空档。于是，我写信给父亲寻求经费资助。他把家里多年积累的一船稻草卖给了砖瓦厂凑得 50 元钱，花 6-7 个小时经步行、乘船专程来杭大给我送钱，然后当天乘夜班轮船返回。我利用父亲送来的 50 元和少量的派遣费度过了为期一个月等待分配的时光。期间约同学一起游览了六公园、柳浪闻莺、花港观鱼、六和塔、苏堤、白堤、灵隐寺等景点。

直到 8 月 7 日，我们终于等来了“毕业分配方案”。全班同学聚集在化学大楼一楼阶梯教室，屏住呼吸聆听系领导宣布省教委下达的 1979 届大学毕业生分配文件。会后就拿到了“应届毕业生报到证”。

全班同学中，除了范伟强等个别同学考取硕士生，少数同学到国家、省、市等政府机关报到外，大部分同学奔赴各地各级各类学校当教师。离校那天，既没有欢送大会，也没有告别聚餐。大家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相互道别，劳燕分飞。



在入校 20 周年相聚母校杭大化学系时与同学合影
(1997-05-02)

前排左起：黄招义，竺水金，侯爱武，王猛进，刘继彬；
后排左起：杨金田，王光瑞，俞田波。

光阴似箭，人生易老。一转眼，43 年过去了。当年青春年少、风华正茂的“小伙子”、“大姑娘”，如今已变成年近古稀、白发苍苍的“老头子”、“老太婆”。在这 40 多年的风雨岁月里，我们参与了改革开放的宏伟大业，收获了辛勤耕耘的成功喜悦，饱尝了家庭生活的酸甜苦辣。我们班的同学中，涌现出许多化学专家、大学教授、企业老总、政府官员、高级教师、教学能手和中学校长等，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了显著的业绩。在回味无穷与喜悦的同时，我们十分怀念英年早逝的范学政、吴焕彬、郑金钿和孙维林同学。惟愿，逝者安息，生者安乐！

我的大学生活

—杭州大学政治系 63 级 李树茂

一九六三年八月底，我带着一令草席，一条只有被里没有被面的棉被，一只中型帆布旅行包，里面装了几件满是补丁的单衣单裤，怀揣录取通知书，跨进了高等学府——杭州大学的大门。

杭州大学的前身是之江大学文理学院。建国后，之江大学拆分并入浙江大学和浙江师范学院。一九五八年，又与浙江师范学院合并，单独成为我省唯一的一座综合性大学。

报到时给我的学号是 63011，校徽号码与此同。床铺号是三幢三楼 11 号。有趣的是，当年给我的助学金也是每月 11 元；与每个月的伙食费 11 元相等，发给我的铝质饭盒也是 011 号。

报到的第二天，班主任召集开会、点名。全班三十九位同学作自我介绍。然后由他分组，宣布临时班委和各小组长名单，指定我为班生活委员。这一临时戴上的“官帽”一戴就是五年，怎么也撂不掉。

当天下午，学校召开欢迎新同学入学暨开学典礼大会，校领导简要地介绍了学校的历史，学习的环境。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软硬件设施。他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将来都是国家的栋梁。这里是高等学府。你们接受的是国家的高等教育，要时刻记住自己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所谓高等，并非指地位、待遇高人一等，而是指学问、人品比别人高。显然，领导们是希望新同学经过几年的学习，大家都能成为有学问、有教养，温文尔雅的谦谦君子。同时，在会上还宣布了必须遵守的校规。其中有一条是在校学习期间不准谈恋爱。如有，一经发现，立即开除学籍。

这条规定一个多月后就见效了。教育系一位杭州籍女生，趁全班同学上体育课之机，在寝室的高低铺上上吊自杀了。开始不明就里，后经法医检验，发现已怀孕三个月。据说是她高中班主任造的孽。可怜这位女同学，在大学学习还不到两个月，就香消玉殒了。

杭州的冬天特别冷。学校对贫寒子弟均有周济。第一学期就周济我棉衣一件，军绿色绒裤一条，夏天还有蚊帐可借。棉衣和绒裤陪伴我上完了五年大学。我穿的衣裤也是全校最差者之一，满身都是补丁。那时一只针线包绝对少不了，衣服破了自己缝缝补补。像我这样的学生，一个数千人的学校，少说也有几十人，绝对不会有人嘲笑你、歧视你。自己也不会有寒酸的感觉。

那时，做新衣买布要布票，教职员中也有穿补丁衣服的。只不过他们的是在缝纫机上补，比我们的补丁漂亮。穿皮鞋、戴手表的学生是极少数。这些人不是归国华侨，就是高干子女。

我担任班级生活委员，要管全班同学的吃喝拉撒。这工作极烦人，甚至影响自己学习。每个月要帮全班同学买好饭菜票，助学金是按月发的，分若干等级。甲等每月 12.5 元，只有孤儿和烈属子女可享受。乙等 11 元，其他的有 9 元、7 元、5 元的。全班同学基本上都有。我将钱和粮票收起来，因助学金不同，每个人交的钱也不一样，买好后再分发给他们。

最麻烦的是班里还有一位回民同学，不吃猪肉。几乎每天都要为他去食堂会计那里登记。偶尔忘了，还会被埋怨。

遇到义务劳动，或帮学校周边生产队社员双抢劳动，或全校性大扫除，我的角色就像个生产队长，把工具领来分发，并指派各组任务。完事后，又要由我一件不漏地还回去。

第一个学期，每星期六下午是半天的在校义务劳动，内容是平整学校东边的场地，也就是现在天目山路以北、保俶北路以西这块，以便扩建围墙。那时，这块地还是个乱坟岗。我们的任务就是挖坟扒墓，将一个个小土包推平。时不时，会挖出些骷髅。有时还有少量银元和其他陪葬品。

我们对死人骨根本不怕，只是想象这骷髅生前会是什么人？是罪犯、是乞丐、是饿殍？但肯定不会是富人或达官显贵。对于银元等，大家也不屑一顾，随泥土和尸骨移走。

劳动中还认识了一位奇人，一米八的个子，白白胖胖，年龄三十岁左右。只是埋头挖土，不说一句话。后来知道，他是我校副校长、

教育系主任、全国著名心理学家陈立教授的智障儿子。别看他长得人高马大，智力只相当于五、六岁小孩。陈教授有意让儿子参加无偿的劳动锻炼。后来听说，还安排他到某个街道办的集体小厂劳动。陈教授每月给这个厂人民币 20 元，以工厂的名义给儿子发工资，让儿子觉得自食其力了。他儿子也很高兴。真不愧是心理学教授，用这一方法来矫正儿子的智力。

大学的学习既紧张又有趣，学术氛围浓厚。第一个学年开的有中文写作课和古文课、中国近代史和外语。这是文科的公共课程。

我们政治系的专业课有中国革命史(胡绳主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艾思奇主编)及马、恩、列、毛的一些名著，如《共产党宣言》、《歌达纲领批判》，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

第二学年，除哲学课继续外，新开的有政治经济学、形式逻辑学、资本论、国家学说等。

我们的学制是四年，实际只学了三年，其中有九个月还参加了“四清运动”。这对我们政治系的学生来说，可以讲是上了一堂社会人文课。可对后两年考进大学的同学就亏大了，他们只上了两年或一年课，只上了一年的还未接触到专业知识，就在一九七零年宣告毕业。此后，全国所有大学停办。

那时，老师讲课还比较放得开，课堂秩序也好，没有一个学生缺课或迟到早退。有的老师自带热水瓶、茶杯。一个上午两场课(中间休息十分钟)下来，基本上把一瓶水喝光。有的不停抽烟，估计半天要抽上一包。有的广征博引，笑口常开，幽默风趣。有的严肃谨慎，不苟言笑，字斟句酌。尽管各个老师的讲课风格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知识渊博，上课既不按教科书讲，也不按他们自编的讲义说，而全是新的内容，甚至把自编讲义的章节、次序都打乱。所讲内容比所有教科书都宽泛、精彩，弄得学生们上课紧张记笔记，下课认真对笔记。课上完了，还给大家推荐一批中外名著，作为课外阅读参考资料，末了都不忘加一句：大家要以批判的眼光去看这些书。从这些课外书中，我们初涉了外国著名哲学家如亚里士多德、黑格尔的一些名著。

周一至周六上午，都是上大课时间。学生们从宿舍到食堂，再到课堂，三点一线。下午、晚上均为自学时间，或去图书馆、或阅览室、或在大教室学习。

校园里不会出现男女同学手拉手的亲密举动。如果有，那是天大的绯闻，绝对是违纪了。

回想当年在大学学到的知识，有些至今仍管用，老师讲的原理仍没变。比如那个贫困线系数，必须保持在这个系数之内，超过了贫困差距就会拉大，社会就要动荡。又如货币与市场的关系，市场上有一元钱的物资，就必须要有八元货币预备，才能保证市场正常运转；超过一比八的比例，滥发货币，就会引起物价上涨，带来经济危机。低于这个比例，就会有很多人买不起东西。

我国的GDP，那时叫国民生产总值。老师认为，我国的计算方法很不科学，数字中有水分，有些是重复计算的。如农民种棉花到工人织成布这一过程，既有农业产值，也有工业产值，其中有些是重复的。当时，敢于讲这些要冒很大风险。

一九六四年前后，全国哲学界都在批判中央党校原副校长、哲学家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认为杨反对毛主席的“一分为二”，宣扬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可以合二而一，主张阶级调和，反对毛泽东思想。批判的文章铺天盖地。

当时我们正在学习哲学三大规律中的对立统一规律，将毛主席的《矛盾论》，与杨献珍的观点和那些批判文章比照，怎么都看不出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有什么本质区别。毛主席说世界上所有事物都存在对立统一关系，都可以一分为二。我认为，既然可以从一里分出二来，说明它们有一个共同的载体，自然可以复合(或还原)为一。两位哲学家是从不同的角度阐述这一哲学命题，没有根本矛盾。那些批判杨献珍的人在偷换概念，把一个严肃的哲学学术问题简单化、庸俗化了。尽管当时有着许多想法，但不敢深入思考，也绝不敢透露半句，更不敢与同学交流、探讨。相信其它同学也会有这样的想法。政治系哲学教研组也没有就此问题组织学生进行讨论、批判，说明教师中也有不同意见。

当时的杭州大学真个是名师荟萃，群贤毕集。全国著名的一流专家学者就有数十人。尤其中文系师资力量更强，列全国第二，排在北京大学之后。如国学大师、楚辞专家姜亮夫，唐宋诗词专家夏承焘、文学家林淡秋、语言学家任铭善、蒋礼鸿、古典文学家王驾吾、徐步奎、刘操南、文艺理论家孙席珍。其他的如教育家王承绪、心理学家陈立、化学家王琏、生物学家江希明和陈士怡、哲学家严群，还有一批数学家、物理学家、地质学家、历史学家、体育专家等。

我们进校时，这些老先生大多已年近古稀。其中，有不少被错划为右派，不能上讲台，我们也无缘领教。姜亮夫先生个子矮小，不修边幅，戴着高度近视眼镜，拄着拐杖走路。外语系专家德梦铁女士又白又胖，是个已入中国籍的苏联人。其夫君化学专家、庚子赔款第一批留美归国学生王琏，一九六六年十二月被犯罪分子劫财杀害。凶手是浙农大的一个学生。林淡秋是我们的副校长，人很随和，常穿一双布鞋在学校和住家之间行走。陈立教授、王驾吾教授身材魁梧。

除这几人见面能认识外，其他的都是在文革中批判“反动学术权威”时，从他们胸前挂的牌子上，人与名才对上号。原来，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一代词宗夏承焘，那位就是著名的语言学家任铭善……政治系著名哲学家严群教授，是辛亥革命先驱严复先生的孙子。我们进校后就听说了他的故事。据说他精通六国语言，尤其精通古印度文、古波斯语、希伯来文和西方哲学史。有些古稀语种，全国仅存他一人能懂，是个国宝级的人物。他上课讲“科学”两字，不用讲稿就可讲两小时。可惜，一九五七年被错划为极右分子。他也不参加政治系活动，平时都待在家里搞学术研究。

系里还有一位老师是同乡，叫王荣，当时是经济学讲师。一九六五年上半年在诸暨县斯宅公社殿口大队搞“四清”时，为同一个小组组员。他可能从我口音中听出来，笑着告诉我，他也是宣平人，老家在柳城镇县前村。后来，他是著名的经济学教授、资本论研究专家。

我们的班主任沈善洪老师，杭州市人，三十多岁，专攻哲学。二十多年后，成了杭州大学校长，浙江哲学界泰斗级人物。他治学非常刻苦严谨，其座右铭是“不羨红袖勤读书”。这本来是一句借红袖添

香故事励志的格言，压在他房间书桌玻璃板下。在那个轰轰烈烈的年代，被一位同学发现，拿来当作走白专道路的典型，在全系大会上批斗。然后身披这条白纸黑字格言，游校示众。他父母就住在本市清河坊。为节省时间，每个月给父母的生活费，都通过邮局邮寄。这是全班同学都知道的秘密。他常常告诫我们，地摊上的书不要去买。书价便宜，往往知识也廉价，会误人子弟。读书就要读原著、专著、名著。这才是做学问的正道。他三十多岁就已谢顶，四十多岁才成家。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我因公事去杭州大学。毕业后，还是第一次踏进母校，顺道去看了老师。经人指点，推开他办公室的门。他一眼就认出了我，叫出了我名字，指出在哪个单位工作、担任什么职务。我很惊讶，都三十年了，老师怎么会记得这般清楚？他问我，为什么那么多年都不去看他？他已从校长岗位上退下来，现在什么都不是了。我说那次批斗你的会我也参加了，有些愧对老师。他笑着说：噯，那些都是小孩子的玩意，老师早已忘了，根本不会记在心上。他还说，我们班是他当班主任的最后一个班，印象特别深刻。哪些同学在哪里工作，担任什么职务，哪些同学已故去，都能如数家珍般说出来。我说，你永远是我们的好老师、好班主任。沈善洪教授的学识、人品、师德，堪称是一代人的楷模！

杭州大学的南面就是黄龙洞，原本是个道教圣地，后辟为旅游休闲场所。黄龙洞门前有副对联，曰：黄泽不竭，老子其犹。周围是大片的竹林。进门后，曲径通幽，怪石磷峋，亭台楼阁，小巧玲珑。用类似太湖石堆砌而成的假山，洞窟纵横，千奇百怪。还有黄龙吐水及放生池、各类奇竹等景观。学校离此只十几分钟路程。那时也不需买票，所以我们经常光顾这一洞天福地。每逢节假日，约上几位同学好友或独自一人，带着书本到此。先是对庙门前的对联参禅悟道一番，有兴趣了还可进内略作游览。然后到竹林深处，找个僻静地躺下，看书累了，闭会眼睛，思考一下人生之路。或透过竹枝，仰观天光云影。天气晴好，阳光随竹枝摇曳，宛如摇落一地碎金，充满诗情画意。此时，心情极好。有时一待就是一整天。中饭带上花五分钱买的一根油条加一只烧饼，或花八分钱去松木场饮食店吃上一碗阳春面。这方法

非常好。每月可以从伙食费中节省出几角钱来，解决寄信、理发、洗澡的钱，偶尔还能看场电影。有时，星期天也会与同学去荡会西湖或进城逛会街。

有一次在平湖秋月行走，偶见湖中荷花盛开。蓝天、白云倒影在水中，与碧绿的莲叶、粉红的荷花，构成一幅绝美的图画。原来宋朝诗人杨万里当年描写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就是我现在看到的景象。许多名人的著述或教科书都把“接天”两字解释成无穷无尽，好像与天连在一起了，其实是不准确的。这里的“接天”不是形容多，而是形容它的美，好像荷花就种在天上，与蓝天、白云、绿叶、红花相互映衬，非常的美。没有看到过这种景象的，体会不了这种意境。

上街时，我们走的最多的是吴山路、武林路。杭州的习惯称东西向为街，南北向为路。吴山、武林两条路都很古老。两边大多是土木结构的二层或三层民房。楼上住人，楼下为杂货铺或小作坊。

夏天的傍晚，家家都在门前泼水降温。有的搬出小桌子、小椅子，全家在门口的人行道上用餐。已用过餐的，或搬出竹榻，或卸下门板，或铺开竹席，躺在自家门前乘凉。手摇蒲扇，旁边放着凉茶。有的还与近在咫尺同样躺着的邻居闲聊。男人们都赤膊短裤，两条路的两边，成了白花花的肉的世界，一道独特而靓丽的风景。

学校每星期六晚上，会在大操场放一场露天电影。票价五分钱，自觉买票，现场有纠察人员抽查。我们这些穷学生大多不会去看，偶尔会站在操场角落远远地听一会。记得买票去看的有《甲午风云》、《刘三姐》等少数几部。

那时，文科各系都有内部教学资料片。中文系在饭厅闭门放社会上尚未公开的电影越剧《红楼梦》，据说现场哭声一片。有的女生哭湿了几块手帕。外语系的教学片最多，都是进口的原声片。我们政治系为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放过两部译制故事片：一为日本的《暗无天日》，一为美国的《炼狱》，都是讲司法机关通过刑讯逼供，故意制造冤假错案的。想不到，这两部电影对我以后的工作还带来了一定的启迪作用。

一九六五年下半年，高教部发现高校学生的体质下降。经国务院批准，给高校每个在校生每人每月增加伙食费三元，全部由国家财政拨款。我们原来的伙食费每月11元，对我这个农村孩子来说，已经很好了。现在一下子增加到14元，真的是太好了！每天两餐都有荤菜。我参加工作后，在机关食堂每月伙食费也不过15元左右。

大学里，男女同学混合用餐。每人每月30斤粮票、14元钱，有许多结余。后来，学校干脆取消了定量和凭票制，进食堂自由取食。我记得，那时肉丝面片、面条、韭芽肉丝炒年糕和肉包子，白面馒头一大桶一大桶抬上来，吃多少取多少。规定只能在饭厅用，不能带到外面。

这样的日子过了大约半年，那个轰轰烈烈的运动来了。一些外地来杭串联的学生认为，杭大的伙食太好，培养出的都是些修正主义苗子，贴出大字报，要求改正。

这下杭大的学生不干了！虽然有许多不同的派别，但在驱赶这些“白眼狼”的行动上是一致的。将他们批斗一阵后，逐出校门。还有上海高校的少数女学生，吃白面馒头时剥皮吃，馒头皮到处丢，发现后也拉来批斗，将这些“资产阶级臭小姐”赶出去。学校为避免这类纠纷发生，又恢复了用餐凭票制，并将串联学生和本校生分开用餐。

我们刚进校的那几年，全国都在学雷锋、王杰、欧阳海等英雄人物。社会风气和校风都比较正常。同学之间也比较团结，互相帮助，人人争做好事。开学初，校领导期望大家都能成为有学问的谦谦君子。可运动一来，在那个造反有理口号的鼓动下，学校成了政治竞技的角斗场，同学间也四分五裂。那时，还有个奇怪的现象，改名成风。有的将自己名字改为“造反”、“文革”、“文化”，更多的则改为卫东、忠东、卫彪、卫国等。

曾有过这样一件事。一位同学出差去某县，他明确知道班里有位同学分配在该县一座中学任教，专程上门拜访。可几乎问遍了所有学生和老师，还去县教育局查找，都说没有此人。后来知道，他在临近毕业时改成一个很革命化的名字。原来在班里用的名字就永远消失了。

我国在六十年代还没有退休制度，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人员流动很少。除非自然减员，或因开除、下放等原因才会空出名额来。还有部队每年都有大批的转业干部需要安置。所以，每年大学招生的名额很少，一九六三年全国只招十一万多人。

考大学很难。考进去后，实行的是免费教育（书本、讲义费和部分伙食费自理），对学生的管理也很严。学校的公告栏中，经常会贴出处分学生的告示。对学生的处分有警告、记过、记大过、劝退、勒令退学、开除学籍等。

每学期都要进行考试。有主课不及格的，学年结束时给予补考一次。仍不及格的予以留级。毕业班补考不及格或论文通不过的，只发肄业证书，不发毕业证书，分配工作时享受大专待遇，工资比本科毕业的低一级。

我们那届毕业班因是特殊年代，延期一年毕业。既没有进行毕业考试，也没有写毕业论文和论文答辩，甚至连规定的学科都没学完。就在一九六八年八月，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四部门联名下发的关于一九六七年、一九六八年毕业的大学生分配工作的意见精神，宣布我们这两届学生毕业了，决定予以分配工作。

学校发给我大红的 67011 号毕业文凭。翻开硬壳封皮，首页是毛泽东的彩色照片，第二页是毛泽东题词：为人民服务。背面是主席语录：斗私批修。第三页正反两面是林彪题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第四页又是林彪的话：你们要永远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第五页才是折叠起来的毕业证书，证明我于一九六三年九月至一九六八年七月在该校政治系学习（规定学制四年），并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准予毕业。文末盖的是杭州大学革命委员会的钢印。

拿到了红彤彤的文凭，我的五年大学生活正式结束了。时为一九六八年八月十八日。

（原载“老杭大”公众号 2022-06-01）

[返回目录](#)

大学之门

—杭州大学中文系 78 级 钱志熙

（2022 年 6 月 16 日）

大学对于我来说，曾经只是一个传说；后来又成为带点焦渴的希冀与梦想，最终成为了一个现实。

我小时候听到过乡里几个大学生的事。

其中一位是我们村的。他父亲是地下党，临解放时被捕牺牲。由于家里还有未亡人，所以解放初修烈士墓时，他没有葬到雁荡山烈士公墓，而是在村对面的山上造了一个烈士墓，墓上是我们熟悉的方尖碑。这位村里唯一的、烈士遗孤的大学生很不幸。考上不久就得病去世了。关于他的如何的聪明，怎样的被两所大学同时录取的传奇，在好长的时间还被村人诵说着。听说，他那时已经有未婚妻，当然也是大学或者高中的同学，曾经来过他家。这就使这个传说更增加了一点凄美的色彩。关于他长期卧病辗转于床第的倔犟，拒绝家人为他做法事，以及他的未婚妻的悲恻，到了我初长成时，更多了一种回味。我承认，这样的故事对我人生会有一些影响。

另一位是我外婆村里的，上的浙大化学系，后来在衢化工作。我大舅与他小学同学，据说小学时我大舅读书比他好。当然，这是我外婆说的。这一位大学生，我恍惚见过一两面。乡里人说到他时，说得最多的是他的深度近视眼，还有上了大学后与家里为他订的娃娃亲闹解约的事。这种事，在乡里本来就算是一种大新闻。

不管怎么说，在童年的心目中，大学生是了不得的，简直跟神一样的存在。我从小喜欢听温州鼓词，故事的主角无非文武解元与状元郎。当时，在我心目里，大学生也跟解元、状元一样，只是一种传说。至于“大学教授”这个词，是在读小学时。一次，一个同学听到铃声响，还是慢条斯里地往教室走。老师说了一句：某某真像大学教授一样（意即慢悠悠或者是大模大样的意思）。于是，在很长时间里，这成了我对大学教授的一种想象。我无法确定，在我的孩提时代，当听

到这些有关大学的传说时，我有没有想过有朝一日自己也要去上大学？也许有那么一点，因为毕竟是美好的事情；但总的来说是朦胧的。

事实上，就在我上小学的那一年，大学就已经停止正常招生的了。在那时，我并不知道这事，好像这件事也与我邈不相关。但其结果是使得我的整个小学、初中、高中的学习，都与考大学这样的事情毫无关系。我们都无法听到有关大学的传说，更别说向往了。这就无怪乎我在小时候不可能就有一个大学梦。一切都和现在的孩子是两样的，或者说都是相反的。现在叫应试教育，当年应该叫“不试教育”，也差不多可以叫不教育，但终归得承认，它还是一种教育。

诚然，从小学到初中、高中，老师还是一直教着的。师资还是不错的，尤其是小学与高中。小学老师基本上都是正式师范毕业的。小学老师中，两种出身的人比较多：一种是地主成份的，一种革命烈士子女。浙南是游击区，烈士不少。解放后，子女都得到党的培养，上学读书，上得最多的是师范。

乐清中学则是一所正规的学校，四十年代创办，有传统。老师也都是本科毕业，其中就有杭大毕业的。相对来说，初中因为上的是刚办不久的公社中学，师资就差一点了！基本上是文革前后的初、高中毕业生，但也都在认真地教，而且有些老师也教得很好。文革中，农村在教育方面是有所普及的，虽然质量大不如前。比我大十多岁那个年龄层的人，上初中还是希罕事。从前的初中生，在村里已经是大知识分子了！因为那时全县只有县城与大镇（区）才有中学。文革中，每个公社都办了初中。先是叫农中，后来还是改为正式中学的名字。这中间，其实也有一种进步，或者说是有所拨正。

总之，对于我这个年龄层的农村孩子来说，只要在读，家里让读，想上初中基本上不成问题，而且基本上不论出身成份。但要上高中，情况就不一样了。县中或区中的招生名额下到公社贫管会，再由他们分配。其实就是公社干部在分配上高中的名额。各村（那时叫大队）的名额的多少，虽不能说是平摊，但的确有个名额的问题。某年这个村初中毕业生多，就不一定都能上高中。其间有个挑选。这样一来，

村里即大队的干部，其实也掌握着一种分配权。挑选的标准，除了关系之外，就是看成份了。

记得我的初中同学中，有一、两位读书很好的，却因为成份的原因上不了高中。我家是贫农，成份没问题。但我祖父是国民党员，父亲农闲一直做点小生意。母亲笃信佛教也是村里出名，那时叫“迷信”。所以，以当时的眼光来看，我家是带有明显的落后群众家庭的色彩的。所以，在上初中时，忧虑的不是上大学那一层，而是怕上不了高中。

七十年代初大学，还有中专，恢复招生，实行保送制度，招收工农兵学员。大学开始进入我的视野。这时的大学生，对我来说，已经不是什么传说了，而且多能眼见的了。但却是一种说不清的既羡慕又复杂的情绪。

保送工农兵学员，其实是需要有一定的背景的，有点像古代的乡举里选。当然，古代的乡举里选，主要掌握在州、县。保送工农兵学员的机制，我没有做过历史的调查。但据我的当时所了解的情况，公社掌握着决定权。具体来说，就是县、公社、大队三级的选择权。公社的权限是最大的，但也必须大队的配合。这样一来，就能大体知道被保送上大学者基本的背景条件了。我读初中时，我们村里就有一位初中生保送了大学生。他哥当时是公社书记。

保送上大学，据说名额定了以后，也有一点形式化的考试。哪里出卷？谁主持考试？这些我不清楚。各地可能也不一样，但是有考试的。有这样两件事情给我这种印象：一是，有一次，据说几个人在公社楼上考大学。还有一次，就是我跟我哥和他的几个朋友到村里这位已经定了要保送上大学的家里去玩。他说正在复习应考，看到他书桌上堆了几本书。其中一本是竟然是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鲁迅的杂文集，从县新华书店买回了不少，但知道有《中国小说史略》，得拜这位同村之赐。有些书，虽然未读，早知道总比晚知道好，那怕只知道书名。这位同村先辈，后来上的是浙农大。

那时，一般背景的，或者我理解为只有大队、公社这两级的背景的，似乎都只能上农大。但我也见过保送上名牌大学的，其中一位是

山上一个偏僻村庄的。村庄虽偏僻，却是当年浙南游击纵队的活动区。这位的家里，当年做过“三五支队”的居停。他父亲好像还救过一位老革命。老领导想起他父亲，不知是邀请进城做客，还是故地重游到他们家，问起孩子们情况。说是孩子多，不容易找到事情做。老干部就说，想上大学吗？这中间应该有一些惊愕的表情与有趣的对话，因为没有亲耳听到，又不是写小说，不好虚构。总之，这位才有小学程度的先生，就这样进了沪上名校。据说大学专门派了教授给他补初中的课。

还见过一位保送上名校的，一时风光无两，假期回乡到处相亲。那时林立果选美，据说选到了温州。这两件事，又被乡人连在一起谈了一阵。

回过头来，再说上高中的事吧！那年我这个大队里，一共有三位初中毕业生。另两位的关系都比我强些。据说，其中一人还拿我祖父是国民党员来说事。我哥就是因为这个入不了共青团的。这件事情在我家是一个阴影。所以，我初中时要申请入团，我父亲就有些担心。他是从不往公社、学校这样地方跑的老实农民。一个晚上，却突然发想，带着我去学校找一位老师问入团的事。老师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说完全没有问题。他这才释然地领我回家。

这次是上高中遇到困难了！我那时小，完全没有自助的能力。这次主要是我母亲去找人，反正挺险的。最后，好像是到姨父村庄“假渡”了一个名额。因为他那个村庄，那年没有初中毕业生。姨父在那村里做会计，多少有点话语权。这里面的事情，其实我自己一直不太清楚。父母都已去世，也无从问清楚了。上了大学后，我的事父母就完全管不上。所以，我看到现在有的大学生，一直是父母帮着，每个环节父母都想插个手，觉得挺不好的！影响孩子的独立性。但每想起自己上高中这件事情，就能理解几分了。当父母的，对于孩子的事，在他们有能力管、还能够得着地方，他们总是要管的。总之，我上高中了，不然的话，也就没有后来的考大学。所以必须叙这一层。

高中时，担任学校图书馆的出纳员，杂七杂八读些书刊，也喜欢读小说。除了民国时期印的那种石印绣像本、通常被称为“黄色”的

那种之外，就是苏联小说了。但读得最多还是文革时期的小说。“一个作家”的作品，是全都读过的。于是迷上了写小说，一直到高中毕业后还在写。当然，多半是些战天斗地式的，回乡知青的故事占大半，按照着《牛田洋》、《艳阳天》及一些文革时反映知青的小说撰造的。和有此同好一位同学一起写。他母亲家在山里，跟浙南游击纵队（俗称三五支队）略有瓜葛，就写起革命题材来了。把他妈妈塑造成地下小通讯员。那一段的感觉还是很有意思的，也多少练了一点笔墨。



研究生活动照（右二为作者）。

高中两年还算愉快！高中毕业后就犯难了。

先是学手艺，跟堂兄学锻铁，打柴刀、锄头之类的！后来又做赤脚医生，当春苗、红雨的晚辈。一次，温州卫校医士班到我们公社搞开门办学，我们几个“赤医”跟着他们听课、采药、看病。看到这些未来的正牌医生，羡慕之情，无以言表。简直把人家看到天上去了！

一次出去搞活动，带卫校老师走山路。走累了在凉亭休息，说到上大学的事。他们很肯定地安慰说：以后不会只搞保送，会恢复正常

的大学招生考试。可惜，当时自己见识有限，没有理解这些话。当然，即使知道会招生考试，也不知道究竟怎么个招法，怎么个考法。人在某个阶段，总是会为那阶段的见识所限！我想，只有非凡的人才会先知先觉，为自己创造各种原本没有的条件。

卫校的师生们走了以后，又过了好几个月。恢复高考的信息其实已经出来的，城里消息灵通人士，已经在准备复习了！可是乡下消息实在闭塞得不得了，何况又一个劲地忙着地里的与山上的活。双抢过后，连着一个月天天上山斫柴，将那年小队分到户的一片柴山都快斫完，像赌气要折磨自己似的。每天挑着一百来斤的柴草走好几里山路，累得身体都要散架。

一天担柴回来，却见几个高中同学等在家里。这才知道，明天县里有招收高考复习班的考试。一位家在山里的同学当晚就住在我家。翌日四点钟起床出门，走过有高中同学住着的村庄，把大家都叫上！考大学去喽！走了两个多小时的山路，回到阔别两年的母校乐清一中参加复习班考试。那时，我们觉得不是在考复习班，就是在考大学了。考上了就很有可能考上大学！实在考不上就拉倒！

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这样一件事。考完复习班后，我们几个同学走在山路上，结伴还乡。一位同学抖着准考证说：“留着这个，将来给孙子们瞧瞧！爷爷当年也考过了！”这话虽然冒点傻气，可是还真的是那时的某种心态的表现。

复习班招生考试，只考数学与语文两门。数学大概是全砸了，我本来数、理、化就不好，更何况又荒废了两年。接着来的就是某某考上复习班的消息！那也是很光荣的事情，不亚于后来考上大学。

我没有及时接到上复习班的通知！以为没戏了。对于，接下来如何准备高考，也没一点路数，那段时间感觉有点在耗着。差不多过了两周，居然由我在社办企业工作的堂叔之手，送来一张复习班的入学通知书！那时，农村没有详细的通讯地址，什么通知都寄到公社。也不知道这份通知书在公社又耽搁了多少时间，不期然地被有时会在公社上走动的堂叔看到了，才欢天喜地地递到了我手上。

这时复习班已经开班一段时间了。到了学校，找到原来的班主任老师才知就里。他说，是因为扩充复习班，重新阅卷。詹老师看到你的作文，说这篇写得好呀！班主任跟詹老师说，这是我班上。他作文原不错的。这样就获得进复习班的机会。记得那作文的题目是《华主席掌舵方向明》。

上了复习班，却发现早已没有座位了。好多座位已被旁听的占走了，我只能站着听。那年头，在县城住宿、生活都极不方便，加上独学无友。所以一个月复习班都没上完就回家了。倒是带回了几本复习资料。这又得怪自己的缺少主动性，不会积极地向老师问学，或者向先进们靠拢。

总而言之，这个复习班是没上好！少半是客观原因，多半是主观上的迟钝！说到底，还是对考大学这个事没有什么数！这事对于我们其实是完全陌生的。我相信那些年龄大些，尤其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会自觉一些，也更懂得怎样复习！

现在想来，第一年的高考其实并不难。我认为，在同等学力的情况下，其实比的是另外一些条件。也就是说，谁知道得早，谁的客观条件好些，等等！用今天话来说，也就是谁不那么菜鸟些！而我，觉得在高考方面，恐怕是菜鸟中的菜鸟！

七七年的高考是落选了。到底考了多少分？自己也不知道。那时候，好像只有上分数线才有通知，没考上的一般人是查不到分的。可能也是自己不愿意去查。但从心里上说，第一次高考是没有什么心理负担的。多少有这样的自我安慰。大学多难考呀！哪能一次就考上？那些一次就考上的都是超级人才。今天人说的就是超级学霸，甚至跟天才也相差不远了。

但接下来的复习应考，却不那么轻松了。虽然还不敢说志在必得！但也差不多是这种心态了。家里原本由我负担的斫柴、挑水及田头园角的那些农活，老父亲也都默默无言去做了。番薯熟时，几千斤的番薯，都是年迈的老父亲自己从山地上挑回家的。而我则静坐阁楼攻书。“公子在书房把书读”，闲常听惯了这句鼓词，此时像是应在自己的

身上。只可惜，现实情形是如此的尴尬，令人深感内疚！但也许从那时起，我才敢将自己定位为一个读书人。

我小时候最爱听“读书人”三个字，羡慕而毫无批判性地接受那些鼓词、看戏文里的书生。我虽出身农家，但因祖父当过私塾老师，父亲也识文断字，从小听惯了乡绅们的故事，又爱听鼓词。所以说，我的思想一直是很旧的。我后来之所以喜欢古典文学这一行，其实是小时候就埋下了这“封建”的根。

再说复习应考中的一些情节。一段时间，考虑到独学无友的难处，我和两位报考理科的同学结伴复习。方式是轮流着在每人家里住一段时间。各家的父母也心甘情愿地伺候着，不仅侍候他们的儿子，还侍候儿子的学友。甚至衣服都是各家父母洗的。那时，真不知道这是一种罪过！

我们家乡中雁荡山上有一个玉虹道观，是宋代一位李少和李真人修仙之地，后来也做了僧寺。我们嫌家里吵闹，发心去玉虹道观复习。楼观东海日，户对瓯江潮，风景又美！到那里一问，和尚们倒是同意的，说你们要住就住吧！也可以搭食，可这地方能住吗？结果在洞中道观的西凉台上只住了一宿，耐不住蚊虫的咬，又加上饮食不便，就又搬回家了。后来读到古人玉虹洞夜宿诗，体会得很真切！总之，这又是一个遗憾。不然的话，真能过一段晨钟暮鼓的生活。遥想前贤寄寺读书的故事，又是何等的风雅！

没想到这仅仅持续了一昼夜的道观“修学”，后来不知怎么传遍了山乡。于是，在我家乡就流传着几位因为在玉虹洞攻书考上大学的故事。仙师保佑呀！对呀，仙师当年也是读书人。哪有读书人不帮读书人的？和我一起复习的两位好友，一位后来上了财政学校，在市财税局做得风生水起，现在又成了一家大公司的总经理，身家不知凡几。另一位上了浙农大，后来考上中国农科院植保所，专做大豆线虫的研究。先是在农科院工作，后来又去了美国，现在是明尼苏达大学的教授。

当年高考，还受一件事的困扰。就是大家都说，文科招生少，很难考！至少，在乐清县内是这样说的。你考文科呀，很难考的呀！可

我不考文科更难呀，心里这样的想。我一直觉得乐清是重理轻文的。考文科是少数派，开头还没有专门的文科复习班，所以一直摸不到边。第二年，我上了两周的文科复习班，听一位老师讲世界史。“邓尼金”吗？这个名字你们这样记吧，这是块金子，可掉在泥里了。乐清话，掉下的掉发音为“邓”。就这样记，好像还真管用。

复习那阵，每两天写一篇作文，揣摩遍所有出题方式。到了考场，却发现那年不出作文题，只是一篇缩写，感觉相当的遗憾。这些作文后来订成一厚本，也被后来参加高考的人借去用过。再后来，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或者被母亲煮饭时当引火烧掉了！早先写的那些小说本子，可能也被她烧火烧掉了。

放榜的那天，我们起了个大早，坐河轮结伴到柳市看榜。当时，还有区教办这样的机构。我是在柳市考区考的，所以区上也出榜。都怪我们去得太早，直扒在办公室窗台上看里面人写榜。理科榜写完了，我同学的名字在其中。抄榜的人进去了，很长时间不再出来。我们都说抄完了，柳市考区文科一个都没考上！当时，甚至连问一下的胆量都没有！与榜上有名这位同学辞别后，蔫蔫地回来。好几铺路呀，不坐河轮走着回了。一路的村庄、山水，像是都改了颜色。回到家后，一夜消黯。

第二天是考上乐清中学的三弟的开学日。他直嚷着不去读了，说这大学也太难考了！读了高中也没用！好歹总算劝慰他定了，并且保证我能把大学考上。这才让他把心理稳下来，帮他收拾篋箱子，送他去上学。

这竹篋箱子，我们那里叫“脚蓝子”，行脚时用的。我家的这幅，是我父亲当年“走宁波”时置办的，算是结实讲究的。先是借给亲戚家两兄弟读书用，后来我上高中用了两年。现在收拾出来给三弟用，日后我四弟上高中，仍然用的这个脚篮子。

我挑着脚篮子把弟弟送到乐中，替他办完入学手续。心里一直默算着明年高考的事情。文科这么难，要不要改考理科？

此时，遇到我的初中数学老师。她是送女儿过来报到。一见面就向我贺喜：某某，你这次很出色呀！

把我弄糊涂了，我正困顿着呢！很不好意思地说，我没考上呢！

而她却以为我在卖关子。我这个人哪有这种幽默性格呢？何况是对自己的老师？若然，岂不是尾巴翘到天上去！我说，黄老师，真没考上呀！

她说，过县前头时，见榜上明明写着你的名字呢！老师性格开朗得很，说完哈哈笑着说：这个人，考上大学，连自己都不知道！那略带后仰的身姿，我现在都记得很清晰！

听了老师的话后，兄弟俩赶紧往街头跑。一路仍惴惴然地藏着一份欣喜！直到看到县前头大墙的红榜上赫然闪着“钱志熙”这三个字，才松了一口气！那时候，自然想起《白光》那个小说。看过榜，领着三弟在小面馆要了两份榨菜肉丝面，自己还要了一碗雁荡啤！考上大学后唯一的庆典！



与大学、研究生同学黄仕忠（左）的合影。

其实，昨天我离开区教办后不久，那位抄榜的老师又续抄出柳市考区的文科榜了。同去看榜的同学是看到了，只是他春风得意，在镇上亲戚家住了一夜。等到第二天一早，他让先从镇上回来的他叔跑到我家报喜时，我已经走在送弟上学的十里山陇中！

这一场误会，这一天一夜愁苦，现在看来是一贴不错的生涯良药。它让我更加地明白，这的确是一个需要十分珍惜的、新的开端。因为我差点掉到某个深渊里去了！从今后，我的每一次进学，我都认为是一种侥幸！从来没有认为这些必然属于我！

就这样，大学之门向我打开了！没想到，呆在这里面就是一辈子！我从来不埋怨它的清苦！即使在当年不少大学老师纷纷的或下海，或从政时，我也是笃定的！我没想过别的，在大学里呆一辈子！希望大学好点，更好点！

作者简介：

钱志熙，1960年出生于浙江乐清。1978年考入杭州大学中文系，读本科、研究生。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李白研究会会长、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著有《魏晋诗歌艺术原论》、《唐前生命观与文学生命主题》、《汉魏乐府艺术研究》、《唐诗近体源流》、《黄庭坚诗学体系研究》等。

[返回目录](#)

杭大哲学系求学杂忆

—杭州大学哲学系 90 级 厉才茂

01

我成为 90 年代

第一个拿到杭州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学生

“祝贺你，成为我们学校 90 年代第一个拿到录取通知书的同学。”1990 年 8 月 22 日下午 5 点，杭州大学教务处，董如宾副校长将一张刚刚填好姓名的录取通知书交到我手里，郑重地对我说了这句话。接过录取通知书那一刻，我激动得难以自抑，连哲学系领导提醒我要不要向学校申请学费减免，我竟然忘了自己真实的家境，毫不含糊地回答说：“学费我能交！”

两天前，我还在家乡天台山一所中学临时代课，热切等待着高考录取的消息。去年，我第一次高考，就因下肢残疾而高分落选。不过，等待总是意味着希望与机会。8 月 20 日傍晚，县广播站传来最初的好消息，通知我去杭州面试。第二天一早，我在同学帮助下冒雨赶往县城，先到县教育局领了通行证。当时山区长途汽车少，开往省城的班车早就没了。如注的雨水却一刻不肯停歇，仿佛老天爷也在考验我。站在大雨中，我拦了一辆又一辆的过路车，辗转来到 200 公里外的杭州。穿过钱塘江大桥，又跋涉好几里山路，赶到省招生驻地屏风山疗养院，已近傍晚。登上宾馆大门口台阶，迎面撞见了刚刚完成本科生录取、正要集中返校的杭大招生团队。听完我的来意，董如宾副校长和各位老师用长者怜惜的眼光，望着被大雨彻底淋透、手里紧紧攥着根本辨认不出字迹的通行证、步伐蹒跚而又镇定自若的我，小声地议论着我的到来和对我的安排。在大家的附议下，很快做出了一个改变我的一生、对学校而言也极具挑战性的决定：推迟学校本科录取结束时间，给我一次单独面试的机会。

面试于8月22日下午3点在杭大东一教学楼一楼教务处的小会议室里进行。哲学系正好在楼上。十多位面试官围坐在一起，除了头一天屏风山见过的老师，又来了马志政、范广品、朱法贞等3位哲学系党政领导。两个小时，各位面试官针对我的生活能力、学习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前前后后问了几十个问题。全程看似轻松愉悦，仿佛谈着家常，但言辞间机锋不断、跌宕起伏，甚至还带了那么点哲学意涵。整个场景，想起来犹在眼前。一位老师问：“你为什么报考杭州大学？”我回答：“我的同乡，从杭州大学考入清华大学研究生的徐方富告诉我：你如果成绩考上了，就填报杭州大学来，因为杭大的老师比其他院校的老师更富同情心。”另一位老师又问：“如果这次杭大录取不了你，将来会做什么？”我回答：“我从学校到学校，除了高三时当过一年同班同学的英语老师，后来到一个初中代过课，并没有社会经验，真不知道以后做什么。不过我有一个想法，无论如何，我得帮助家庭减轻负担。”我知道自己在搏感情，努力赢取在场老师的同情。在法律保护权益之前，我实在想不出能有比争取老师们的同情心更有效的办法。面试最后在我拄着拐杖纵身跃上五、六级台阶以证明自己生活能力所引致的欢笑声中结束。各位老师经过短暂商量，又把我叫回会议室。系主任马志政老师代表面试官作总结，让我第一次领略到哲学老师所独有的严肃的俏皮。他说：“小厉同学，你的成绩和过往表现都非常好。但是，哲学也不是坐而论道，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得有个好身体。但是，综合你今天的表现，学校决定录取你！”听着这两个“但是”和最后的“决定”，我的心情像坐了过山车，给圆满结束的面试增添了戏剧性的效果。

进入哲学系后，我慢慢意识到，杭州大学当年之所以录取我，并不是因为我才能出众，也不是靠耍小聪明，而是得益于杭大独一无二的心胸和气质，得益于“求是育英”校训所塑造的包容、多元、开放的办学格局和人文环境。大学四年，我和所有朝气蓬勃的青年学生一样，自由徜徉在书本、课业和知识海洋里，主动参与到学校的各类社团活动中。在这里，我几乎没有感受到自己是一名身障学生。学校唯一的声乐班招新，我顺利入列。从此，图书馆前面小树林里多了一位

晨起拄着拐杖的练声者。哲学系党总支审查预备党员资格，有人质疑我求异、执拗的性格特点。马上有老师为我“袒护”，说要不是因为坚持与执着，现在的我顶多是个大山里的修鞋匠。大学四年，学校的助学贷款和奖学金帮助我顺利毕业。同寝室 7 位同学每天轮流替我打饭解除了我最现实的困难。身体的局限、物质的匮乏，并没有将我封锁在校园的角落，反而激起我对自由思想和精神世界的追求。学校的开放包容、同学的热情友好，带动我融会到青春校园的脉动里，热忱拥抱每一个参与和发展的机会。大四那年，经过系里、学校和省上层层推荐，我破天荒地被国家教委和团中央评为“全国三好学生”。我知道，将这样的荣誉称号授予一位在学校从没有获得过体育成绩的残障学生，不只是对我个人的激励，也是褒奖不墨守成规、敢于打破界限的学校！是的，大学的精神，就在于不断突破既有规则、随时尝试改革创新。这是大学的朝气所在，也是社会的活力之源。那时候的杭州大学，始终坚持育人为本、学术为上的办学理想，到处洋溢着求新求变、奋发向上的蓬勃生机。想起来，这正是她最青春迷人、最让我们留恋的地方。

毕业临行前，当时兼任省政协副主席的学校党委书记薛艳庄，在张金山副校长陪同下，专门到学生宿舍来看望，给同学们送行。张副校长向薛书记讲起我当时入学面试的特殊经历，又介绍我很快要到北大读研究生，薛书记竖起大拇指说：“我们学校没招错人呐！”确实，杭州大学在招收和培养残障大学生这一问题上，是富有远见的。因为不拘一格的教育理念，那些年杭大陆续招收了几十名残障学生。这在当时中国的大学校园里也是很少见的。而今这些学生同样成为了各领域的人才。仅我的天台同乡，除了上面提到的中国石油大学英语系教授徐方富，就还有回乡贡献档案事业的梁森将和远赴德国留学并任职慕尼黑大学心理学教授的施壮华。那位靠唇语入学杭大数学系的杭州姑娘杨洋，现在是我的同事，担任着中国残联执行理事和中国聋人协会主席的重要职务。在我之后，哲学系又招收了数名残障学生，年轻有为的陈益伟已经升任浙江省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从福利院成长起来的轮椅小伙子丁豪巧妙地把互联网和社会工作结合起来，创造

出独具杭州特色的社群服务模式。杭大没有因为残障而拒绝我们。我们因为杭大的教育和滋养而超越障碍、成就梦想。今天，我们可以自信地对母校说：“杭大，您没有招错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

02

我和同学们曾经一度“徘徊”
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

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再次掀起我国改革开放风潮，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领域不断发生着深刻的变化。高等教育同样面临结构性变革的压力。其中受冲击最大的，当属文史哲等非应用性学科，不得不被动做出调整，以应对时局发展和环境变化。在杭大哲学系学习的我们，也感受到了市场化改革给高等教育和师生思想带来的影响。历史总是在时间的透镜中被认识和评价。今天，我们很多人愿意用更加正面的态度去理解和评论30年前这一改革风潮，因为我们体会到了改革开放带给国家和社会的极大信心，体会到了社会开放、思想多元、制度创新所蕴含的强大活力。但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如果抛开情感因素和价值判断，回到大学生涯芜杂的历史事实面前，我们还能从琐碎的记忆中唤起经受过的改革阵痛和思想迷茫，可以想起我和同学们曾经一度游离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留下了“哲学应该如何面对社会变革”的长久思考。

当时杭大哲学系的一个重大调整，是1993年将“哲学系”更名为“哲学社会学系”。更名大会开得很悲壮。学校有关领导出席并讲话，解释了哲学系生存发展面临的困境以及改革调整的必要性。大概的意思是，作为基础学科的哲学专业于一个院系而言已经独木难支，需要社会学这一应用学科来补强；同时哲学作为研究型的专业，本科教育需要限缩，以拓展研究生教育；更名后对内适应学校学科结构调整的要求，对外解决了学生“进得来”（报考）、“出得去”（就业）的需求。我们都明白，这次更名是哲学系自我保存的无奈之举和以退为进的权宜之计，但还是担心哲学系的内部运行和持续发展，忧虑哲学

专业有朝一日不存在了，所以内心有着抗拒更名的各种理由。第一，所谓没有本科生源的问题，其实早些年已存在。它是由中国社会缺少思想启蒙、中学阶段缺乏哲学教育的现实决定的。第二，所谓拓展学科空间，其实发展社会学可不以牺牲哲学研究为代价。后来政治思想工作专科（“政工班”）小幅调整为社会工作专科（“社工班”），也印证了更名的局限。第三，最为关键的是，哲学系自80年成立以来，课程设置本来就兼具基础性和应用性，既有政治、外语、体育、计算机和大学语文、高等数学等这些公共必修课，中、西、马哲学专业课，还有社会学、心理学、逻辑学、伦理学、美学、自然科学（科学哲学）等专业基础课。其中，专业基础课占据整个课程体系的半壁江山。除了社会学原理、普通心理学、形式逻辑，还有更高阶的社会调查与统计、社会心理学、数理逻辑以及更实用的口才学，可谓百科全书式的人才培养计划，完全应对得了社会变革的各种需要。

我们学生都很在意哲学学科面临的发展瓶颈问题，但解决问题自有学校和系里的党政领导去操心。我们当时更愿意关注并讨论一些天马行空、高远宏阔的问题。比如80年代那个激情飞扬的人文思潮为什么短时间归于沉寂？经济改革和社会变革为什么不以思想革新为引领？哲学为什么不能为国家改革发展提供理念，反而沦落到要被“剃刀”的地步？哲学究竟有什么用？于是，重点好像又回到了我们刚刚进入哲学系时老师向我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当我们经过学习，已经在我们的思想中将公正、秩序、美、善这样美好而有价值的理念放在具体事物的前头，并且明确感受到讨论哲学问题所带来的精神愉悦时，突然发觉学习哲学的意义和价值受到了现实的挑战！这样的思想冲击，无疑是那个时代哲学系学生最大的精神困境。

不过，我们学生好像并没有为这样的两难问题所困扰。杭大哲学系更名反而帮助我们找到了通向现实主义的道路。哲学系老师对实践哲学的学术旨趣也让我们相信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并不必然是鸿沟。那个时候，陈村富教授带领的希腊哲学研究队伍已经着手希腊哲学史第四卷的撰写，学术研究进展到希腊化时期。有的老师开始转向政治哲学和伦理学研究。中国哲学的课程相对比较少，但是浙江“事

功学派”、“功利学派”却很合乎同学们的口味。有的还因此转而研读美国实用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的老师和研究生也不局限于本本，开始密切关注和研究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包括我们的班主任郁建兴老师在内，有多位后来成为国内社会建设和公共政策领域有名的专家。那时，杭大哲学系依然以古希腊哲学研究为旗帜，但是内在已经渗透着行动哲学、生活哲学的学术基因，承继了尊重理性、崇尚务实、力行事功的文化传统。所以，我们同学逐渐地从内心上对哲学系的更名不再那么排斥，反而因此更加关注改革、贴近现实了。

我有一段自身经历，可以说明我们当时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这条路上走得有多远。1993年春天，杭大针对破解改革实践中的诸多问题，首次面向全体师生设立研究课题。我在朱法贞、奚从清等诸位老师的指导帮助下也提出了申请，最后获得了课题支持经费800元。这相当于那时我们学生一年的生活费。我的研究题目是中国农村社会保障问题研究，重点关注农民养老保障以及农业政策性保险问题。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养老由谁来保障？农民遇到台风暴雨怎么做到不弃收绝收？这些小时候农村生活中就感受到的大问题，构成了市场化改革背景下的研究主题。大三那年，一到节假日，我就会拄着拐杖，背着行包，往省内各地的民政部门、供养机构、基层乡镇和农户家里跑。走街串巷，足迹遍及余杭、萧山、三门、天台等地。研究报告形成后，还被推荐参加全国大学生挑战杯大赛，得了优胜奖。现在看来，当时的研究方法、研究结论虽然都很稚嫩，但直面现实问题的研究态度、坚持以人为本的研究导向，关注社会民生的研究情怀，却深深融进了我的思想和血脉。当我从北大取得西方哲学博士学位后，带着人道主义的理想，又兜兜转转来到现实问题面前，致力于推动我国残障政策与理论研究。杭大哲学系学习时期播下的种子，后来有了更多的收获。

每个哲学系的学生心中都有一个哲学梦

对于我们这些中学阶段没有接受过哲学教育的学生来说，学习哲学既艰辛又快乐。与一般知识教育显著不同，哲学是一个运思的过程，是一种精神的探索。所幸在杭大哲学系我们遇到了一批对生活 and 思想充满热情的教师。他们就像一盏盏明灯，引领我们学生不断锚定目标，调整航线，避开险滩，到达思想彼岸。

杭大哲学系的重点学科是西方哲学。帅气儒雅的包利民老师是我们大一时的班主任，研究古希腊哲学，带着我们这些新生欣赏哲学的童年。他的课堂有个鲜明的特点，会创造一种节奏，在设问、追问和沉思中让学生不自觉地“卷入”哲学运思，逐渐培养哲学思辨的习惯。讲授近代哲学的庞学铨老师，刚从德国大学访问研究回来。他的讲课概念清晰、逻辑缜密、视野开阔，偶尔还会抖个包袱，带领我们穿越德国古典哲学和现代欧陆哲学这段艰难航道。博士毕业留校不久、致力于海德格尔思想研究的大胡子孙周兴老师，为我们开设海德格尔哲学《存在与时间》专题课程，偶尔也会穿插讲他正在翻译的《林中路》。说实在，要把“此在总是已经在世界中存在”和“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这些意思真正讲明白，于他自己是一种“解释”上的考验，于我们这些学生也是个艰难的“理解”过程。海德格尔的思想深度和语言的艰涩程度，都是我们前所未见的。好在专题课程时间宽裕，课堂形式不限。有时，我们就在校园大草坪的树荫下听讲；有时，我们师生还一起“切磋”。这都是以前哲学史课程未曾体验过的。从我们的经历看，本科阶段适当安排一些哲学经典研读，深度讲解某一位哲学家的思想进路，带给年轻学子的哲学思考可能要比单纯的哲学史教学丰富深刻得多。孙周兴老师的专题课程引领我后来进一步深入现象学研究。

就在我们志得意满，以为登堂入室、窥见哲学奥秘的时候，孙周兴老师的一番言论，让我们的心头都冷下来。他多次说，从精神上讲，我们都是“土著”，没有一个“贵族”，因此达不到真正哲学的高度。

现在想来，那时候他获得博士学位不久，刚刚经历了思想探索的艰难历程，难免有谦卑自抑的成分，但也因此抱持着对哲学的特别敬畏。人无贤愚，学无先后，唯勤惰之别。自谦“土著”的孙周兴老师现今已“贵”为浙江大学敦和讲席教授。我们这些“土著”学生也一直保持着对哲学的热情，尽管哲学对我们而言，始终如咫尺天涯一般。

每个哲学系的毕业生，心中都有哲学梦。我们不再像学堂里那样追问哲学是什么，但会以更加合乎哲学的方式生活。我们保持对世界的好奇心，存疑所见所闻，追问事物本源，不为任何权威所吓倒，不被任何时尚所迷惑。我们认识事物的逻辑和秩序，习惯用概念、判断、推理等方式去解释各种现象和思维，确定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我们寻找生命的源头活水，日日新，又日新，周流而无碍，生生而不息。我们把心安放，回到童年，回到故乡，回到自然，满心欢喜地生活和劳作。这就是杭大哲学系学习带给我们的成长和欢乐。

作者简介

厉才茂，浙江天台人，1994年毕业于杭州大学哲学社会学系，获哲学学士学位；200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获西方哲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残联研究室二级巡视员、残疾人事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研究会秘书长，《残疾人研究》杂志常务副主编；曾任北京市残联理事、研究室主任、市政府残工委秘书处办公室主任。

返回目录

怀任斋，父亲的会客厅

—杭州大学数学系函授生 蒋遂



蒋礼鸿先生在工作中

我家因为世事变迁，“客厅”者常常名不副实。父亲接待宾客，既有在客厅的，也有在卧室的。那既是卧室，也是书房，更是餐厅。早年，父亲因为与任心叔先生深厚的关系，将自己书斋取名“怀任斋”。

1966年以前，我家住在杭大道古桥宿舍五幢四号。那是三室一厅一厨一卫的结构，教授居室。因父母两位讲师，也分配到了一套。这套居室有三个房间，大房是父母的卧室。另一间书房是父亲工作室，摆满书架，那书架是向学校租的；有一张硕大的红木书桌，“文革”

中被贱卖了；还有一张床，是姐姐睡觉的。一间小房，摆着箱子衣橱和一张床，我和保姆睡。

那客厅像模像样的，当然也作为餐厅，父母在这里接待宾朋。那时候，经常来聊天的多是道古桥宿舍的先生们。记得有夏先生瞿禅，住在我家前面四幢四号，和我家对门。因为是父亲的恩师，父母让我叫他“太老师”。有任先生心叔，与我父亲是之江大学的同学，比我父亲高两届。所以他毕业留校任教，又成了父亲的老师。任先生健谈。母亲说过，如果一群人在一起，则有任先生侃侃而谈；若钱钟书先生来了，任先生也不响了（钱钟书先生 1938 年末与父亲同时抵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任教）。有蒋祖怡先生，时任杭大中文系副系主任。蒋先生任副系主任，有中文系的人说他很吃亏。那时中文系的工作大多是他做的，但出名的却不是他。有《浙江大学中文系系史》为证，《历任系主任》一节中就没有他名字，因为他是副职。有孔成九先生，是中文系总支书记。孔先生对知识分子很尊重，落下个右倾的帽子。

印象很深的是锺钟山（泰）先生。父亲 1934 年被嘉兴秀州中学保送考入进杭州之江大学国文系，锺先生是系主任。锺先生对父亲非常赏识。父亲在锺先生悉心栽培下深得国学精粹。1960 年代，锺先生重回杭州。他的两位得意门生任心叔先生和我父亲喜出望外，招待他吃住。父母照例要我喊他“太老师”。太老师看到我坐无坐相，就对我说：“站如松，坐如钟”，并且亲自示范给我看坐姿，使我终身受益。

1966 年“文革”开始了，道古桥宿舍大多先生们，有打倒并“踩上一脚”的如夏瞿禅先生；迫害至死的如任心叔先生；批斗靠边站的如蒋祖怡先生，等等。父亲因课堂上对伟大领袖文字不规范提出意见，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自然就没人上门谈古论今了。不仅如此，我家还被一分为二，住进外



锺钟山先生

语系青年教师陈纲一家。所幸陈家人善良，没对我们“反革命家庭”有所歧视和迫害，还暗中帮助我们度过艰难岁月。陈纲叔叔的岳母是东北哈尔滨人，特好客，外语系青年教师常来“串门”。那时，我家和陈家共用客厅。那些年轻教师也没把我家当“反革命”，有些还和我家挺热络的。有一位庄根元老师和父亲很能聊，还特意买了“湖笔”，请父亲题字。1995年父亲过世，庄老师把父亲题字拍了照，送到我家。

1975年，因我年龄渐大，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道古桥宿舍显然不方便住了。经陈纲联系和外语系教师劳逸君调换，搬到杭大河东宿舍。住到河东宿舍二幢，楼上有政治系盛斯猷老师及他的夫人，数学系的程怀玉老师；有数学系谢庭藩老师；还有四幢政治系张永蕙老师等。二幢的居室是两个单间，中间一条进廊，厨房厕所共用，所以根本没有客厅。夏季到来，整幢宿舍人家差不多都到前面大草坪，搬了凳子、竹椅乘凉。我家也不例外。盛斯猷老师也健谈，拍打着扇子指着女儿程小米（以后请我父亲改名为程明之）说：“我每天对她革命大批判！”他带着恭敬的口吻说：“蒋先生搬到河东，是我们河东的荣幸！”我母亲有个侄子袁义江，在兰州大学教数学，想调到杭大。母亲和谢庭藩老师商量，惜未成功。1978年，我与夫人成婚，张永蕙老师有一天对我母亲说：“盛先生，你媳妇腰怎么这么细，你没给她吃饱吧？”

“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杭大在河东宿舍又建起新五幢，我家和盛斯猷老师都搬过去。我家楼上搬来了徐先生朔方。他是从夫人宋珊宝老师的杭一中宿舍搬来的。徐先生也是中文系的，原先住过道古桥宿舍17幢、3幢，“文革”中被造反派看中3幢的房子，不得不搬到杭一中。徐先生和我父母一直蛮要好的。他和我母亲都是古典文学教研室的，搞汤显祖研究，有些考据上的问题要我父亲帮助。在17幢的时候，徐先生前妻杨笑梅因家庭政治问题受迫害，精神失常自杀。临终前，留下两封遗书，一封给徐先生、一封给我父母（见夏先生《天风阁学词日记》），可见两家关系之深。

由于“文革”结束了，父母又回到教学岗位上，来的人就多起来了。

1980年代初，有日本汉学家波多野太郎来中国访问徐先生和我父亲（波多曾撰文赞誉父亲专著《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为研究古代中国戏曲小说的“指路明灯”）。两家张罗宴请波多，客厅设在徐先生家。两家都烧了拿手菜，徐家是“金银蹄”（咸肉脚踵和鲜肉脚踵）。我家烧了“西湖醋鱼”，是我内人下厨。波多野大嚼之余大叹苦经，说至今还租着房子，买不起房，对我们两家住学校宿舍羡慕之至。波多野不愧是汉学家，带着日文翻译不用，侃侃而谈。波多野的翻译无事可做。她重庆大学毕业，校址在白沙。我父母抗战时也在白沙，故而她与母亲有话可谈。临了，波多野打道回旅馆，父母送他一块手指大小的象牙微雕，上面的刻字只有毫米大小。波多送我父亲一条领带。



波多野太郎先生访问杭州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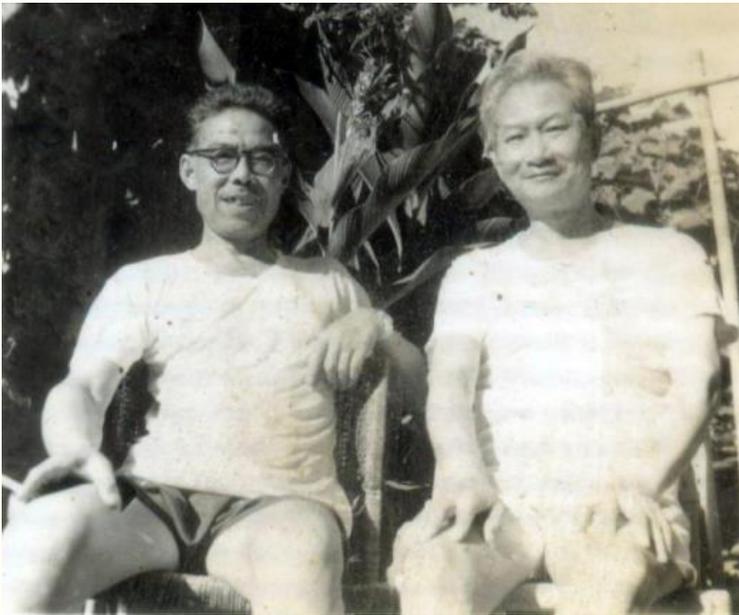
有一天，我下班回家，母亲告诉我说，陈从周先生来过。陈先生是地道的杭州人，祖籍在浙江上虞，早年家在拱宸桥小河直街，以后搬到西湖边韶华巷。他就读之江大学时，父亲已毕业留校任教，所以算得上他老师，其实年纪差得并不多，都是同辈人。陈先生就读之江国文系，感兴趣的却是中国古代园林建筑，著有《说园》等著作。杭州郭庄也是他发掘出来的。他 1949 年以后在上海同济大学任教。母亲说，谈起陈先生在园林建筑上取得的成就，他说“只是雕虫小技”，谦虚之意溢于言表。我对陈先生特佩服，理由有二：其一，他对友人师长的尊重。任心叔先生去世后，他找我父亲用上好的高丽笺将任先生诗词抄录成《尘海楼诗词》长卷，多请友好名流题跋，其中有叶圣陶、胡士莹等。陈先生将长卷送南京博物院收藏，本意想流芳百世，岂知文革后期因博物院院长姚迁自杀，长卷渺无下落。陈先生多次查寻此卷未有音讯，致函江苏省政协追责，未果而身先逝。任先生公子任平和我父亲博士弟子黄征均去查问亦未果，遂成疑案。陈先生对师长崇敬怀念之心可见一斑（任心叔先生也是陈先生老师，任、蒋、陈亲密无间）。其二，陈先生为保护上海徐汇区藏书楼，与市委领导拍桌子力争，结果中风倒地，不久即去世。古有“文死谏，武死战”之说，现代文人恐怕只有陈先生一人矣！

1979 年，父亲在蓝田国师好友吴忠匡（字亚森）先生携千金吴璠（璠，读“门”，美玉也）自哈尔滨游历大江南北，先至北京访钱钟书，又到南京访锺钟山，最后到达杭州。吴先生在蓝田国师是钱基博先生（钱钟书父亲）助手，我父亲是锺钟山先生助手。文人雅集，父亲称他为吴郎，有蒋、钱（锺书），蒋、吴诗词唱和。吴曾任国军王耀武秘书，1957 年以言获罪戴上“右派”帽子。此次是父亲与吴先生分别半个多世纪后再聚首。吴先生兴奋无比，嘱女儿去小店沽一壶美酒。并对女儿说，我带你游历全国拜访名人，你蒋伯伯也是名人！是夜，吴先生与女儿借宿在隔壁地理系侯伟玲老师家。侯老师一家出远门，借宿的还有中文系郑择魁、朱克玲夫妇。郑、朱二位秉烛夜读，吴先生又是一番感慨：“现在年轻人真努力啊！”郑择魁老师以后任

中文系系主任，可惜拼坏了身子，英年早逝！匆匆两天过去，吴先生要回北方了，父亲执手写下：

中医携女见过，留二日而去。

一枝借了更奚求？请看前庭瓜蔓幽。
绝域风尘君竟至，卅年琐碎话无头。
从兹一去七千里，能得重来几许秋？
挥手不须潜别泪，中郎有女此何忧？
伤怀！伤怀！



吴中医与蒋礼鸿

1982年，杭大在道古桥宿舍又建起两幢新楼，即27幢和28幢，安排中、高级知识分子和老干部居住，人称“教授楼”。我家和徐朔方先生家也搬了过去，都住27幢。我家左右手住中文系郭在贻先生和陆坚先生，再左面是中文系祝鸿熹先生。郭先生从姜亮夫先生和我父亲修汉语史，陆先生从夏瞿禅先生和我母亲修古典文学。陆坚先生随和，常常踱到我家聊天。我儿子蒋凝叫他“陆伯伯”，叫他夫人何明

春先生“何妈妈”。郭先生则从前庭穿过，找我父亲谈学问。所以祝、郭、蒋、陆家的院子相互不打围墙。

也有四川大学张永言先生来过。张先生的博士生朱庆之回忆：

记得去看蒋先生是在一个下午。大概是由方一新陪同的。因为我记得当时好像还去方家看了一下。蒋先生好像坐在一张圈椅里，蒋师母张罗完茶水后，也坐在一边。寒暄之后，蒋先生与张先生谈起重庆中央大学旧事。张先生特别提到蒋先生当时获得国民政府教育部的什么奖。听说蒋先生再也没有重返蜀地，张先生乘机邀请蒋先生来成都主持我的答辩。不过，当时蒋先生说自己不轻易出门，只愿意待在杭州。我们以为蒋先生婉拒。1989年春，我在北大季先生处学梵文。大概4月份的样子，突然收到梁晓虹的信，说听到蒋先生嘀咕：“去年张永言来说要请我去成都主持答辩，为何到现在没有消息？”我立刻写信给张先生。张先生喜出望外，立即函请蒋先生。我本应6月答辩，但因在北大学梵文，没有时间写论文，只好推迟到9月。我1990年6月回成都后，利用两个月时间，夜以继日，终于在8月底完成了论文。张先生安排送40位专家评审，收回39份。



朱庆之博士答辩专家

左起：项楚、向熹、蒋礼鸿、祝鸿熹、刘坚、张永言、赵振铎

住到 27 幢后，常常来家的还有父亲的研究生、博士生；研究生、博士生答辩也在家里。有一次，博士生任继昉（现湖北大学教授）来我家，汇报吕叔湘先生对他博士论文的意见。无意中，给吕先生的信件要改投他家的地址，邮局要盖私章，可他没有。父亲默默从抽屉里取出一枚旧印章，在阳台水泥上打磨平整，默默地用刻刀刻成他的私章，把任继昉感动得！郭在贻先生患肝癌于五十岁生日前一天谢世，父亲痛惜之。郭先生门下博士生蒋骥骋、方一新、梁晓虹转投父亲门下，父亲悉心栽培至取得学位。梁晓虹由于攻读博士学位，与丈夫产生矛盾而分手。晓虹内心痛苦之时常来我家排遣，母亲耐心开导她，使她坚定信念投身学术，在东瀛闯出一片禅文化研究天地。



梁晓虹和母亲盛静霞、郭在贻夫人彭娜琪

一些貌似“不搭介”的人，也会来我家。有一次，物理系王锦光先生来向父亲请教。原来，王先生是研究中国古代物理史的。父亲阅报时，看到一则杭大历史系青年教师闻人军研究《考工记》的报道。他请楼上历史系教授徐规先生传话，请闻人军来家讨论《考工记》。

几天后，闻先生携新著《考工记译注》来家，父亲对闻先生说了一通鼓励的话，以后还细读了《考工记译注》。

还有一些“大人物”，也来过我家。

杭大中文系传闻有夏（瞿禅）派、姜（亮夫）派之争，其实也是无稽之谈。父亲是夏先生弟子，自然是夏派，又与姜先生一样研究敦煌学，似乎有些尴尬。杭大古籍所曾设想购敦煌文献缩微焦圈，父亲与姜先生又有些看法不一，弄得好像有点紧张。以后父亲《敦煌变文字义通释》有出新版本，大约是第五版。父亲送到姜先生家，姜先生捧着《通释》连声说：“了不起，了不起！”不久姜先生来到我家，姜先生腿脚不好，眼睛也不好，由女婿徐汉树，博士弟子俞忠鑫陪着来。俞忠鑫攻读姜先生博士生前，是我父亲的硕士研究生，故对姜、蒋二位均是弟子。姜、蒋二位均不善言辞，倒是汉树、忠鑫和我母亲讲了许多话。姜先生以高龄之身由女婿、弟子陪同前来，传达的信息不言自明，汉树还拍摄了照片留影。



姜亮夫先生拜会蒋礼鸿

有一位俄罗斯的汉学家，敦煌学家，名字好像叫“孟西科夫”（音，实在记不清楚了）也到 27 幢我家来过。他身材粗壮，似乎不像白种人，倒是更像蒙古人。他汉语也很流利，只是他的著作是俄文的。他送了一本著作和一只俄罗斯风格的木制汤匙。父亲因没有准备，没送礼物。以后，这本著作送给父亲的侄子马华（马华精通俄语）。

来的名人中，级别最高的是季羨林先生。那天季先生来我家，穿着一身灰色中山装，是那种穿多年的旧衣服，脚上穿一双布鞋。季先生也寡言，他盛赞父亲的《通释》写得好。父亲说：“我只一本小书。”季先生说：“司马迁也一本书。”2000 年敦煌藏经洞发现 100 周年，浙江日报要整版报道“敦煌学与浙江”，主任记者张学勤来采访我。说起季先生来访一事，他问季先生的话有无书面发表，我说“无”。他显得很遗憾，大概媒体报道讲究一个“证据”。其实我倒觉得没什么，一个人对社会做出贡献，并不需要什么“名誉”。父亲一直对做学问抱这样的心态：“为无益之事，遣有涯之生。”

（2016 年 3 月 9 日原稿，2022 年 8 月 4 日改定）

[返回目录](#)

今天是你的生日，世上再无杭州大学

—杭州大学哲学系 78 级 祝毅

5月3日，是曾经的杭州大学的校庆日。

杭州大学历史悠久，前身是创建于1897年的求是书院和育英书院。求是书院于1928年改名为国立浙江大学，其校训为“求是”。育英书院后演变为教会之江大学，其校训为“育英”。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浙江大学师范学院及文学院和理学院的一部分、之江大学文理学院与新中国成立后创办的浙江师范专科学校、俄文专科学校合并，成为浙江师范学院。1958年11月26日，浙江师范学院与新成立杭州大学合并，定名：杭州大学。其校训为：“求是育英”。

1，杭州大学在1995年教育部全国综合性大学（不含理工类大学）排名中列第13位。其中排名11位的是厦门大学、第12位的是中国人民大学。杭州大学与厦大和人大的分差只有五分和二分；

2，全国首个大学评价体系1996年对全国所有大学评价杭州大学排名第45名。第42名厦门大学、第43名北京师范大学、第44名中国人民大学、第46名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第47名南京农业大学、第48名中国石油大学、第49名上海大学、第50名北京理工大学。

3，杭州大学是国务院首批批准的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是国务院首批自行审定增列博士生导师教师试点单位，当时全国只有约四十所高校获此试点，尚有三分之一的教育部直属重点高校未获此殊荣。在教育部1984年公布的博士点单位中，杭州大学有博士点10个，是全国少有的博士点达到10个的单位之一（排名靠前，同期苏州大学和云南大学各只有一个博士点），四校合并前，杭州大学建有博士后流动站1个，博士点30个，硕士点61个。

4，杭州大学是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1996年杭州大学通过国家教委组织的“211工程”部门预审，成为二十一世纪国家重点建设的大学之一。

5，杭州大学是教育部特别邀请与会“教育部直属高校会议”单位。该会议的范围是：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部分部属重点大学（约占部属高校的三分之一）、个别地方重点大学。

6，杭州大学是全国地方重点高校协作会会长单位。该协作会成立于1994年，由杭州大学、辽宁大学、内蒙古大学、苏州大学、西北大学、云南大学6校发起成立，北京大学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会议。1998年1月第四次会议时南昌大学和新疆大学加入，形成地方重点综合性8所大学协作会。现已成为“全国九所地方综合性大学协作会（SC9）”。其成员为：山西大学、云南大学、内蒙古大学、辽宁大学、西北大学、苏州大学、郑州大学、南昌大学、新疆大学。

7，杭州大学的教学实力十分雄厚。根据当时国家教委80年代初的统计，杭州大学拥有教授93人，列全国所有大学第30位。其前后大学排列如下：第29位吉林大学98、第31位重庆大学91、第32位山东大学84。

8，杭州大学的本科生教育质量在全国高校中领先。从1977年恢复高考到1998年四校合并，杭州大学本科生中有七人当选中科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在全国所有大学中并列第九位。列杭州大学之后的高校有：并列第十位的山东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东南大学、天津大学；并列第十一位的哈尔滨工业大学、山东工业大学、中南大学、合肥工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排在第十二位的四川大学、武汉大学、大连理工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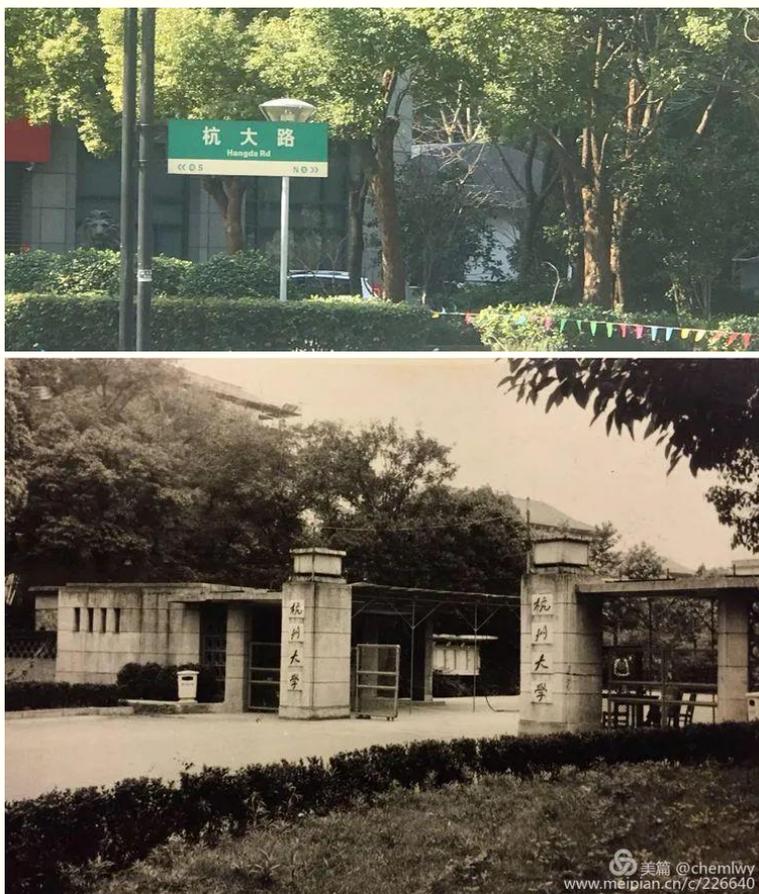
9，杭州大学是全国最早对外开放合作的高校之一。学校与美国、日本、联邦德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意大利、巴西、俄罗斯、韩国等12个国家的55所院校建立了校际交流关系，聘请外籍专家客座教授来校任教，科技合作和学术交流日益频繁。同时，经国家教委批准，杭州大学被列为可以向港澳台胞、海外侨胞招生的学校。

10，杭州大学有一大批著名学者：陈建功、王琏、陈立、梅光迪、孟宪承、王遽常、马叙伦、郑晓沧、董聿茂、姜亮夫、夏承焘、王驾吾、胡士莹、王承绪、陈学恂、沈炼之、任铭善、严群、金松寿、徐

瑞云、白正国、陈士怡、江希明、朱福、周洵钧、陈桥驿、徐规等，是浙江省的文理学术高地。

一九九八年九月十五日，同根同源的原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四校合并，组成了新的浙江大学，四十六年来的四校分治宣告结束。杭州大学从此也结束了自己独立发展的历史进程。

历史记忆：校园已更名为“浙江大学西溪校区”，【杭大路】地名始终会在。



（原载“老杭大”公众号 2022 年 5 月 3 日）

[返回目录](#)

“杭大”在哪里？

——题杭大人出版社

——杭州大学中文系 77 级 施建基

杭大在哪里？在杭大路标里。宝石山下，黄龙一脉，文教胜地。

杭大在哪里？在杭大新村里。道古桥边，历史街区，年轮刻记。

杭大在哪里？在杭大民宿里。古刹钟声，径山深处，心有成蹊。

杭大在哪里？在西溪校园里。求是育英，千钧校训，百年桃李。

杭大在哪里？在万人履历里。饱经岁月，遍走四海，徽证如一。

杭大在哪里？在微信电波里。五洲同频，日夜泉涌，永不消逝。

杭大在哪里？在光影绘画里。青葱翠莲，冰天烈焰，长情醉忆。

杭大在哪里？在心里，在梦里，在眼里，在远方和诗里……



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1-970152-42-5